

#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大全

主编 / [英] 阿诺德·托因比

1945—1950年  
的中东



## 出版说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原为英国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又译皇家国际事务学会，通称查塔姆大厦）负责编纂的《国际事务概览·战时编》（1939—1946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主编为英国史学界权威阿诺德·托因比，主要编写人员均为英美著名学者。战时编共十一卷，按专题编写：《1939年3月的世界》，《大战前夕，1939年》，《轴心国的初期胜利》，《希特勒的欧洲》，《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战时中东》，《大战和中立国》，《1942—1946年的远东》，《欧洲的重组》，《四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管制，1945—1946年》和《1945—1950年的中东》。

这套二战史大全的特点是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注释详尽，文字流畅，叙事生动。书内引用了大量政府文件、会议记录、档案材料以及当年国际政坛上的国家首脑、重要人物的私人笔记、个人回忆录等第一手资料，立论皆有根据。丛书不仅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两大军事营垒的军事态势、实力消长、战争进展的情况，还详细叙述了战争期间、战前和战后一段时间内各主要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涉及当时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情况。全书堪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百科全书，是各军政机关、大专院校、学术机构和有关研究人员了解、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必备参考书。

这套丛书的中译本自1978年起由我社组织翻译陆续出版，到1990年出齐。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1945—1995年），我社特以精装本形式重印全书，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

1995年4月

##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

## 第一编 综论：各国政策的相互作风

1945—1950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中东的政治气氛，犹如一股压缩在一个封闭容器中的气体。对盟国来讲，这儿是战时的重要战略地区，甚至不仅主要是英帝国的一个交通枢纽或石油供应来源（两次大战之间后者已经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是美国和英国经过这里进入苏联的主要通路（此外只有危险的北极航线了）。由于通过波斯向苏联供应战争物资，美国军队进入了中东；自从十九世纪初期年轻的共和国对柏柏尔 海盗作战以来，这还是美国第一次进入中东。来自西方的政治家和军人，旅行到莫斯科执行艰巨的任务，也要先经过中东。同盟国“三大国”领袖 1943 年首次举行会晤，就是在德黑兰。可是，对中东各国政府和政治上有觉悟的阶级说来，这次战争加强了他们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或更早些）以来所作的种种努力，以争取完全摆脱列强的影响和控制。首先是英帝国，其次是法国，对过去属于奥斯曼帝国的“肥沃新月”的控制，曾在 1919—1920 年期间大为加剧，但在此同时，这种控制却受到了埃及、土耳其和波斯的挑战。到 1939 年时，土耳其和波斯具有完全的独立和主权已纷不止十五年了。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共和国要在作战的列强之间保持其非交战国地位仍有困难；而波斯则由于英国和苏联要求横穿它的国土建立交通联系，在 1941 年暂时丧失了实际上的独立。在南方，1939 年时阿拉伯语系各国的独立地位，比土耳其和波斯还要不完全。在两次大战期间，埃及和伊拉克分别从保护国与委任统治地的地位转变成为主权国家，但英国却要它们接受同盟条约。列万特国家 和巴勒斯坦则仍处于委任统治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机会来了，这种不平等的地位受到了挑战。在埃及和伊拉克，英国使用了武力或武力威胁，迫使两国遵守与英国的同盟条约，以抵制那些好战的民族主义分子勾结轴心国或寻求轴心国庇护的企图。在列万特国家中，法国的委任统治威信已名存实亡，最初是由于 1940 年法国向轴心国投降，而更重要的则是由于英国和自由法国在一年之后在这个地区驱逐了维希分子政权。对于民族主义者要求在战争结束时实现几乎完全的独立一事，英国和法国的态度显然不同；民族主义者因而得以乘机利用，讨了便宜。从 1942 年起巴勒斯坦的情况是：一些最有影响的阿拉伯政治家，由于其所采取的不妥协态度，被迫流亡在外，变得对当时的局面无能为力；而与此同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则全力以赴地争取获得主权国家的地位，以便全面控制移民、土地购买和定居等事宜。波斯的领土虽处于三个主要盟国的军队占领之下，但它却拒绝了苏联 1944 年提出的石油开采特权的要求，随之对操在英伊石油公司手中的颇有价值的开采特权也有了微词。

---

见《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 年：战时中东》（Survey for 1939—1946: The Middle East in the War）。

柏柏尔国家，一作马格里布国家，系指埃及以西的北非伊斯兰教各国。它们对商船通过地中海要收取黄金。柏柏尔之战，即指美国在十九世纪初期（1807—1805，1815）与上述国家之间的战争与冲突，其关键即在于过境纳贡问题。——译者

列万特原为地中海沿岸从埃及到土耳其（包括后者在内）一线诸国的综合称谓，亦译近东国家；但此处列万特国家一语则专指原法属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法属委任统治地）的叙利亚和黎巴嫩两国。——译者

见《概览，1939—1946 年：战时中东》，第 479 页。波斯政府后来企图追征战争期间英国武装部队在波斯所用的石油产品的销售税。这一点显然没有包括在当时的任何英波协定中。英国政府后来反驳说，“在

一位美国的中东史学家认为，作为战争带来的副产品，英国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把几百年来未曾统一过的这个地区的大部分统一起来了，而英国所创办的阿拉伯通讯社和阿拉伯广播电台就是这个统一过程的象征。然而，有许多情况可以说明，这种统一是在与地方政府和民族主义运动的愿望背道而驰的条件下实现的，因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两者对英国影响的反感至少也象 1919—1920 年间那样的强烈。在两次大战期间，英国的政策是采取一系列措施，与其他的外国利益（法国或美国石油公司的），或与较温和的民族主义者本身，达成平衡和妥协，以便保护英国在中东的根本利益。1945 年后这项政策还会继续推行，但必须使出全部的力气和采取更加巧妙的手段，这是因为战争使英国财政资源极度枯竭，使它的绝对优势和作为世界强国的相对地位都削弱了。在 1944 年间，英国勉强承认，今后在沙特阿拉伯的主要利益是属于美国的了。当时美国在该地的石油开采已开始接近于英伊石油公司的生产水平，并在达兰拥 3 有一个空军基地。英国战时联合内阁企图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主张把这块地方分成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和阿拉伯人的两个国家。丘吉尔希望在战后争取美国的合作来推行一项巴勒斯坦问题上的联合政策。英国外交部认为：它与埃及和伊拉克的两个同盟条约（还有十年左右才满期），无疑都可以作为英国与这些国家、法国与列万特各国调整战后关系的两块样板。英国外交部还希望在英国政策鼓励之下于 1945 年成立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将为这样一个体制提供政治上和社会上的联系，通过延长英美中东补给中心的建设性工作，使其经济的发展得以推进。但是，战争结束时，战前列强彼此间的谅解已荡然无存，使英国关于战后中东的设想也失去了主要的依据。英国在 1943 年 11 月和 1945 年 6 月借口保障中东地区的普遍安全，进行了干涉，说是该地区受到坚持独立的民族主义者与寸步不让的保守主义者戴高乐派两者之间冲突的威胁。这种干涉给了各地的民族主义者武装力量一个榜样，使他们体会到希洛德求助于恺撒的好处。埃及在阿拉伯联盟中举足轻重，而在缓和英国与埃及之间的战后关系方面，则毫无建树。在埃及

---

为了盟国共同的事业——从而也是间接的保卫了波斯的情况下”，在波斯所用的石油产品要缴税一事，是“不可能作为一个问题成立的”〔《泰晤士报》（TheTimes）外交记者报道，1952 年 9 月 9 日〕。

J.C. 赫尔维茨：“中东的团结和不团结”，《国际调解》（J.C.Hurewitz：“UnityandDisunityinthMiddleEast”，InternationalConciliation），1952 年 5 月，第 222—224 页，第 232 页。

见《概览，1939—1946 年：战时中东》，第 261—263 页。

见下文，原著第 191—192 页。

见盖伊·亨特：“经济问题：中东补给中心”（GuyHunter：“EconomicProblems：TheMiddleEastSupplyCentre”），《概览，1939—1946 年：战时中东》，第 189 页。英国中东办事处成立于 1945 年底。以继续执行中东补给中心在经济方面的咨询工作，由于战后英国无力对中东提供任何大规模财政援助，未能发挥效能〔赫尔维茨，前引文，第 228—229 页；又见英国中央新闻处：《英国和中东的发展》（GreatBritain，CentralOfficeofInformation：BritainandMiddleEastDevelopment），伦敦，1945 年版，第 43—45 页〕。

希洛德是古代巴勒斯坦的一个王朝。希洛德二世（公元前？—43 年）被罗马统帅恺撒立为全巴勒斯坦的统治者。此处是以希洛德求助于恺撒来比喻民族主义者求助于大国后台一事而言的。——译者

“今天轮到我，明天轮到你”是法国外长皮杜尔庄咨询会议上辩论中所作的预言性的警告〔《官方公报：辩论集》（JournalOfficiel，Debats），1945 年 6 月 16 日，第 1114—1118 页〕。在其后六年中，当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介入到英国处理巴勒斯坦和波斯的纠纷中去时，英国转而体验到挫折和痛苦。

的两个主要城市中，仍驻有英军司令部和大量部队，显然，撤出还遥遥无期。

埃及和犹太复国主义者都认为，在 1945 年 6—7 月英 4 国大选后上了台的工党，预示着较之丘吉尔重新当政更为圆通的政策。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靠着英国工党不久前支持他们的主张的保证，立即迫使新政府满足他们的最大限度的要求。可是，英国在中东的利益，使英国不能忽视阿拉伯有关邻邦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主张。工党政府采取了前任历届政府的那种政策，即试图把美国政府从漠不关心的态度方面引导过来，它劝告美国政府说，英国有义务同美国共同制定和实施一项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方案。但是，为了在 1945 年 11 月建立英美巴勒斯坦问题调查委员会而进行的外交谈判的正常步骤，却使犹太复国主义者感到难以忍受。他们坚持要在冬季前，把在德国和奥地利难民集中营中的十万名幸存的犹太人，迁移到巴勒斯坦去，而合法移民由于限额（这是可恨的 1939 年白皮书所强加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已满，实际已经结束了。因此自从 1945 年 10 月以后，就出现了一场时起时伏的对抗——非法组织起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移民和英国所采取的防止移民的反措施，犹太抵抗运动对英国军事设施的攻击和英国保安部队所采取的反击行动。英国政府由于有所顾虑，怕得罪美国，不敢使用全部军事力量对犹太抵抗运动进行镇压；但结果却使英国的委任统治不可挽回地日益失灵，终于造成了巴勒斯坦境内法律和秩序的垮台。

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得不等到 1945 年 11 月才见到过渡期间英国政策的声明，而埃及政府向英国政府提出的、为修订条约进行协商的要求，则直到 1946 年 1 月底才得

谨慎的主要因素，是苏联对土耳其和波斯施加的压力。这种压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已开始，在整个 1946 年间还在继续，从未间断过。苏联政府的最终目标，无疑是要把希腊、土耳其和波斯拉到象东欧各卫星国那样的 5 地位。正如把它边疆以外的缓冲地区保护带推进到易北河和亚得里亚海那样，苏联还想把作为南俄和外高加索工业区屏障的中东缓冲地区保护带推进到东地中海和波斯湾。这就是 1940 年 11 月莫洛托夫在与纳粹头子们会谈中所提出的那种设想。直接的目标则是在黑海海峡建立苏联的基地、迫使土耳其归还在外高加索边境的领土，以及取得波斯北方五省的石油开采特权。由于土耳其政府和人民捍卫主权的决心，苏联政府所采取的方式，只限于施加外交压力和进行威胁。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六个月期间，他们

---

1936 年英埃条约规定，英国从开罗和亚力山大撤出驻军，同时并规定在运河区驻扎少量英军，由埃及承担供应义务。埃及政府在 1945 年 6 月宣布将不照此行事，而要求英国部队必须从埃及领土上全部撤出。同年 8 月和 9 月，英国常驻大臣办事处和英国大使馆在立即宣布从开罗和亚力山大撤出一事是否可行的问题上，似有意见分歧（见下文：原著第 116 页）。

在犹太抵抗运动中，有一个作为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行政委员会成员的指挥官。在他指挥下有两股军队：一般是被称为派尔马契的正规部队，另一股是被称为“哈加纳”的地方部队。两股军队都属于不受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管辖的、主张公开向英国政府当局宣战的两个政治组织。这两个组织是：伊尔贡-兹瓦伊-卢米（“犹太复国主义者民族武装组织”）和“以色列自由战士”，后者以其创始人命名，通称为斯特恩集团。

希腊在冷战中的作用，见《概览，1947—1948 年》，第 177—183 页；《概览，1949—1950 年》，第 120—126 页。

见《概览，1939—1946 年：战时中东》，第 449 页。

却利用当时盟国武装力量奉命留在波斯这个机会，在红军保护下，在波斯的主要经济地区阿塞拜疆省和波斯库尔德斯坦省，成立了共产党分裂主义者政权，同时对波斯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后者（名义上）参加苏—伊联合石油公司开采北方各省石油。战时任命美国军官充当波斯宪兵队顾问的办法虽在1945年再度被保留下来，但美国政府却单方面决定从波斯撤出其部队，比1942年英-苏-伊条约所规定的日期还提前了四个月。毫无疑问，人们因此就有了一个美国对波斯不发生兴趣的印象。所以1945年12月和1946年1月主动提出要对阿塞拜疆情况进行国际调查的，是英国的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而不是美国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1946年3月，苏联政府宣布：在国际同意的撤军日期之后，还准备在波斯北部留驻一部分他们的武装力量，一直到了这个时候，美国反对苏联对波斯施加压力的那种态度，才清晰地表现出来。与此同时，世界上威力最大的军舰之一，美国的“密苏里”号，被派往伊斯坦布尔作礼节性访问，借以强调美国对于正在抵制苏联压力的土耳其的独立和主权颇为关切。

可是，由于美国公众对于美国新近获得利益——主要是沙特阿拉伯石油——的地区，还不太了解，甚至还有怀疑，所以公众舆论还不赞成在该地区承担任何义务。于是在中东的北部地区抵制苏联施加冷战压力的主要担子，在1946年期间就继续落在英国政府的肩上了。当时英国政府倘若能够把巴勒斯坦问题抽出来单独处理，那么，它就可能考虑到，象战时联合内阁那样，把巴勒斯坦分成两个部分，并把其余的一部分并入外约旦，便可充分满足犹太复国主义者成立国家的愿望。不过，在苏联冷战的干扰下，英国这样做，至少也需要有自从1939年以来英国就需要的那种阿拉伯诸邻国的消极同意。泛阿拉伯的感情认为在阿拉伯巴勒斯坦境内只能给予犹太人以少数民族社团的地位，并不准备对犹太复国主义者作出更多的让步。当时有人威胁要谋求莫斯科的支持，正如：1940—1941年期间有些泛阿拉伯鹰派分子就曾求助德国纳粹支持那样。阿拉伯联盟各国彼此也是貌合神离，不过还不象1948年那么明显而已。英美巴勒斯坦问题调查委员会的多数成员，回避了巴勒斯坦分治问题，不肯采用外科开刀的手术，却提出了一系列更类似止痛药物式的建议。不可能设想美国因此就会愿意按照这些建议或其他方案，分担维持巴勒斯坦法律和秩序的任务。杜鲁门总统除促成巴勒斯坦收容来良欧洲的十万名犹太人入境外，并不准备再做什么事。由于1946年11月国会大选临近，杜鲁门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干预行动，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愈来愈受到要考虑纽约州及美国东部人口稠密各州犹太人拥有的大量选票这一事实的影响。与此同时，埃及政府迫使英国政府作出让步，在原则上同意从埃及撤退全部英国军队，作为埃及同意与英国谈判签订新英埃同盟条约的代价；安全理事会则要求英法从叙利亚及黎巴嫩撤退驻军。在这种情况下，巴勒斯坦就被看成是英国在中东未来的主要基地了。由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对英国居民生命财产采取暴力行动，原已强硬起来的英国政策，这时进一步强硬了。英国政府根据英美委员会的建议，在解除犹太抵抗运动武装的条件下，准许十万名欧洲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当犹太抵抗运动扩大其暴力行动的范围，来抗议英

---

关于美国在中东取代英国某些职责的必要性问题，为了制造公众舆论而进行的早期准备，见哈尔福德·艾·霍斯金斯：“强权政治的新时代”（Halford L. Hoskins：“The New Era of Power Politics”），《时事丛刊》（Headline Series），第57号，纽约外交政策协会出版，1946年5—6月。·9·

国政策中的这种倾向时，英国政府就出动军队，把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行政委员会中与犹太抵抗运动妥协的成员，以及数百名证明是犹太抵抗运动的人员，都逮捕了。接着，一个犹太复国主义极端分子的组织，袭击了巴勒斯坦政府的秘书处，九十一名（英国、阿拉伯和犹太）人员遭到杀害，使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紧张程度。就在这个时候，英国政府旧调重弹，公布了一项成立犹太和阿拉伯商自治省统归一个中央的英国行政机构管辖的老方案。但这项方案遭到杜鲁门总统及其顾问、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一致的反对，而阿拉伯各国则提出了它们自己的一套不妥协的建议。不管怎么说，英国对犹太抵抗运动采取的反击措施所引起的震动，使绝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负责领导人明白，自 1942 年比尔特莫尔宣言以来，他们要把整个巴勒斯坦拿下来的那种政策，永远不会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因此，他们提出了一项分治的建议。要求在巴勒斯坦全境三分之二的土地上成立独立的国家，而相形之下，英国的计划只不过是设想在巴勒斯坦全境约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成立一个犹太省而已。英国政府谋求同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达成一项妥协办法，但摆在面前的移民政策仍然是一个障碍：对未经官方准许径自从欧洲进入巴勒斯坦人数越来越多的移民，英国政府所采取的对策是，强行把他们赶到塞浦路斯拘留营去；而犹太复国主义者则不同意对上述移民的入境加以限制，除非准许入境的限额得到实质性的增加；但是，在入境限额问题上，英国又曾向阿拉伯国家保证：在当前协商中决不让步。于是极端分子的组织就加紧了对英国在巴勒斯坦的行政当局的袭击，以致在 1947 年 1 月底时，英国不得不发布命令，撤退不必要的英国居民，而把必要的人员集中到由军队守护和电网围起来的“安全区”。

这项“破釜沉舟的政策不可避免地使英国的威信扫地”。可是，这种不光彩下场却是由于下述那种局面造成的：当犹太极端分子的各种组织得以在其居民区内潜伏下来并受到保护的时候，英国当局却不容许其保安部队采取任何真正的坚决措施；因为英国政府经常考虑的是他们在巴勒斯坦的行动会对美国国内舆论产生什么影响这一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国内也是意见分歧的。<sup>8</sup> 当时英国经济形势正在风雨飘摇之中。1947 年 2 月，由于煤荒，再加上出现了六十六年来未曾有过的严冬，这就使英国经济一时陷于瘫痪。当时英国政府又作出了一系列改变过去政策的激进的决定，以减轻其在海外所承担的义务。印度次大陆将在当年夏天取得独立。美国接到了通知说：英国为了支持希腊和土耳其的独立以对抗苏联的冷战，3 月 31 日以后将不再继续自大战以来向该两国提供军事上和军事顾问方面的援助。英国同埃及修订同盟条约的谈判，也由于在英—埃苏丹的地位问题上发生分歧而宣告破裂，

---

在耶路撒冷英国商人的一次集会中所通过的决议就是这样形容的（《泰晤士报》，1947 年 2 月 1 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海外保持庞大军事力量一事，使英国对印度和埃及欠下了沉重的英镑债务，对其他中东国家所欠的债务则数字略小。战争所带来的经济困难，使英国无论用货物或可兑换的货币按照债权人所希望的汇率来清偿债务，都是做不到的。在英国国内，有人提出意见说，这些债务的数字在战时已经人为地加以膨胀了，因此应当向下调整到较为公正的水平上。债权国则吵着要全部偿还以发展其本国的经济。不仅如此，在债务国和债权国两方面，这个财政问题都有些感情用事。1951 年当丘吉尔作为反对党领袖时就透露过，他的战时联合内阁曾企图提出一种针锋相对的主张，说在轴心国的入侵中，英国保卫了这些债权国。但是后看则反驳说，正是由于他们无可奈何同英帝国有了牵连，所以才成为轴心国进攻的目标（又见下文，原著第 136—137 页）。



可是埃及舆论却被鼓动起来，认为英—埃苏丹与埃及联合倒是全国一致的希望。1947年8月，埃及提出了一个论点说，战后形势发生变化，使英埃条约在1956年期满之前已经失效了。但该论点并未获得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三分之二多数的支持，从而运河区仍然是英国手中的主要军事和空军基地。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巴勒斯坦才失去了作为英国基地的主要吸引力。1947年2月，当英国政府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给联合国时，它决定放弃这块委任统治地的意图，还不是完全明朗的。到了9月，这件事才公布出来：在公布的一星期内，中东主要军火站将由运河区转移至肯尼亚。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于1947年3月作出接替并扩大以往英国对希腊及土耳其援助的决定，构成了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项创举——它与过去的作法截然不同，以致人们给他起了一个非正式的名称，叫做杜鲁门主义。虽然阻力来自传统的孤立主义者，来自把全部信念寄托在联合国身上的理想主义者，来自那些从根本上就对美国同英帝国主义混在一起抱有怀疑的人们，但是授权进行必要的第一批贷款的法案，却以绰绰有余的多数终于在参众两院通过了。不久，美国就对波斯提供了一笔军事贷款，并派遣了一个美国军事顾问团。当时苏联政府对波斯施加压力，使其批准苏联在去年用威胁利诱的手段强加于人的那项有关波斯北部的石油协定，但是在年富力强的美国大使支持之下，年逾古稀的波斯首相却机智地顶住了这股压力而占了上风。这位美国大使坚持：波斯国会对苏—波石油协定草案所涉及的利害得失，应自由地放手作出决定。英国政府则顾虑：如桌在波斯北部苏联吃了闭门羹，那么，英伊石油公司在波斯西南权益范围内的经营活动，也会同样受到干扰。

这样，在1947年一年中，冷战期间保卫中东北部边界的责任，实际上已由英国转到了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迅速地提高了它的产量。1946年12月，英国政府控制大部分股权的英伊石油公司，将其年产量百分之二十的石油包销权让给了两家头号的美国石油销售机构，为期二十年。但当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的建议于1947年9月提交给联合国大会时，英美两国的政策却没有协调一致。出现这种情况，双方政府都有责任。英国外交部显然仍然非常强调不能让阿拉伯国家联盟各国疏远英国。当时英国正同伊拉克进行一项修订条约的谈判，市贝文则希望该条约将为其他中东国家的防御安排树立一个样板。在英国国内，继续存在着低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能量和决心的那种趋向，但是由于犹太复国主义的“活动分子”所进行的破坏成功地使英国委任统治地当局陷于瘫痪，使英国又添上了一种怨恨的心理（外交大臣本人的发言中就曾表现出这种心理）。这样，情况就更加复杂化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舆论中享有相当广泛的威信，它把英国描绘成为一个阴险毒辣、有着纳粹色彩的“侵略国”，所以，为了反

---

见下文，原著第86页。

产量（以百万公吨为计算单位）：[联合国经济事务部：《中东经济情况评论》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ffairs: Review of Economic Conditions in the Middle East），1951年版，第60页，表24]

1948年1月22日，下院辩论（H.C. Deb.）：第5辑，第446卷，第400栏。修订的条款系由伊拉克首相及其他大臣在英国签署，但由于立即遭到巴格达民族主义者强烈示威的反对而流产（见下文，原著第153—157页）。

见下文，原著第199页注（即本书第342页注——译者）。

对这个“侵略国”，使用一切抵抗手段都是公正的。与此同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其中有很多人都曾在纳粹占领时期的欧洲转入“地下”担任了领导的角色）则被描绘成为理想化的抵抗运动。对于这种抵抗运动来说，打伏击，掷炸弹，都成了解放的行动。而他们组织的任何

真真假假、含沙射影的运动，只不过是骗人上当的一种烟幕而已。可是，在美国和欧洲国家里，对犹太复国主义者不经批准径行向巴勒斯坦移民的运动，甚至对其中鹰派的极端主义者——用英国人的话来说，那些“恐怖 10 分子”——竟给予了大量的财政支援和道义上有力的支持，而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政府，对此种情况却采取了容忍宽恕的态度，这就使已经受到挫折的英国人的心里又增加了新的愤激情绪。由于不管执行什么政策路线，都不得不考虑可能在美国国内产生什么影响，这就使巴勒斯坦的英国当局对犹太复国主义看作出于事无补的勃然大怒的姿态，而这种情状只能为它们之间的隔阂火上加油。

因此，在委任统治的授权期限于 1958 年 6 月 15 日到期之前的几个月里，英国在巴勒斯坦的态度就变得越来越消极和本位主义了。而与此同时，在美国政府中，国务院和国防部则继续对阿拉伯国家所持的敌意抱有顾虑，怕它威胁阿拉伯石油的输出。由于西半球石油蕴藏量日益减少，沙特阿拉伯就成了它的石油的另一来源；其所以越来越重要，因为不但美国海军需要，而且也可满足欧洲复兴计划中正在扩大的燃料要求。看来总统象其他许多美国人一样，对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民族愿望也抱有一种不偏不倚的同情态度——也许并不曾完全意识到由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生存和民族权利所引起的困难的严重性。毫无疑问，总统之遵循他的个人倾向，也是由于受到民主党内当家的一伙人的怂恿的结果。这些人的职业就是从国内政治方面考虑问题：一般说来，这就是犹太人的选票和舆论。对于踌躇不决的联合国大会，总统在关键时刻施加了强大的压力，拉到了必要的三分之二多数票，按照特别委员会的建议，把巴勒斯坦分成七巧板式大大小小的七块（犹太人三块，阿拉伯人三块，国际共管一块）。联合国大会这次的决议之所以行不通，不但表现在它无视英国和其他代表团的忠告，而且也表现在它只是含糊其词地提到组织一支国际志愿军的问题，从而证明它不能维持巴勒斯坦两个敌对社会之间的和平而终归失败了。英国政府一再声明，决不出动他们的军队，来强迫上述两个敌对社会中的任何一方实施联合国大会的这项政策。英国政府的这种态度，虽然受到舆论一致的拥护，但美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听到后却很不舒服。这因为后者的立场——虔诚地希望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边界 将 11 会象

---

从美国方面说。在这些事件发生后，几年来一直有一些美国评论家推论说英国政策的动机是不能见人的。J·C·赫尔维茨就说，直至 1949 年联合王国还在阿拉伯人反对美国支持以色列的那种情绪上“大作文章”，作为“讨好阿拉伯联盟的手段”（“中东的团结和不团结”，《国际调解》，1952 年 5 月，第 255 页）。詹姆斯·G·麦克唐纳（James G. McDonald）也提到过，他和其他一些在中东的美国人士认为，英国的目标是“引导中东的纷扰情绪一般地不要指向英国”；而这项目标“在英国政策中是颇有重要影响的”（《1948—1951 年我在以色列的使命》（My Mission in Israel, 1948—1951），伦敦，高兰兹，1951 年版，第 182 页）。

中东石油产量 1947 年原为四千二百万吨，但设想至 1951 年应增加一倍多，即意味着其世界产量中的百分比从百分之十一增长至百分之十六左右。事实上，1951 年中东石油产量达到九千七百五十万吨，相当于世界产量的百分之十六点四。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边界那样友好——不但与英国的立场迥然不同，而且也是有案可稽的。在行动上，英美之间这种不协调的模样一直继续下去。自1947年12月以后，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攻击和犹太人的反击，终于变成了一场地方性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阿拉伯国家支援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但到了1948年4月的时候，由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争取实现其民族独立的目标过程中，团结紧密而又训练有素，终于占了上风。英国始终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从巴勒斯坦问题脱身方面，自称对交战双方保持中立，却招致了双方的恶感。过去三年间，英国军警在犹太“恐怖分子”手中遭受了上千的伤亡，同时英国政府由于政治上的理由，却不让他们使用全部力量来对付这些“恐怖分子”，这就使他们现在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明显地有了一种歧视的倾向。有一些事实足以证明：为了对付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恐怖主义，曾发生过两次主要的报复行动，结果造成了约五十名无辜犹太人的惨遭杀害，而这两次行动是应该由英国警察部队的逃兵负责的。在巴勒斯坦的无政府状况变得日益严重期间，美国的政策摇摆不定，企图调和形势中一些利害分歧的因素——诸如阿拉伯国家停止供应中东石油所造成的威胁，“苏联的威胁”，指望在巴勒斯坦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流血，以及国内政治中亲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那种压力等。直到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期满的财候，总统才终于决定立即承认以色列国家；而此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公开战争，则使英美关系更加紧张。美国在安理会谴责阿拉伯各国，说它们是侵略者，如它们拒不接受停火，就对它们进行制裁。英国的政策则是继续说服阿拉伯各国接受停火，使其得以在巴勒斯坦占有映大决议所规定的那部分土地，但不愿以制裁来恫吓，以避免进一步引起敌对的情绪。无论如何，与英国结成同盟的那些12阿拉伯国家依然从英国取得军火，而在阿卜杜拉国王的阿拉伯军团中服役的英国军官也正在直接参加战斗——这些事实较之美国干的那种以秘密输送军火、提供金钱和以志愿的军事人员来支援以色列的作法，明显地偏袒一方的情况更加露骨，因而在美国就有了一个强烈的反英舆论和宣传运动，再次变成了选举年中的一件吵吵闹闹的大事。在英美关系的这场可悲的灾难中，唯一受惠者是苏联政府。它自从1947年5月以来，为了达到使英国在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完蛋的目的，暂时已不对犹太复国主义采取敌视的态度，而且现在还允许它的卫星国捷克斯洛伐克向以色列出售飞机和军火。

---

见下文，原著第250页。

巴勒斯坦的一个阿拉伯负责人在1953年宣称，英国当初原应与美国合作，强制实施联合国分割巴勒斯坦的决议。当时作者提出反对意见说，阿拉伯国家那时却是强烈反对分割的，可是他答道：“是的，但有一句俗话：就是用锁链，也应当把他们带到天堂来！”

“犹太人则申述说，他们偏袒了阿拉伯人，他们打算把盘哨所都交给阿拉伯人，他们向阿拉伯人供应军火，他们对阿拉伯人的行动视若无睹，而对犹太人则极为严峻苛刻。这种讲法虽不免有点夸张，但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哈里·扎赫尔：《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Harry Sacher：Israel,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tate），伦敦，魏登费尔德—尼科尔森，1959年版，第235页]

见哈尔·莱尔曼（Hal Lehrman），引于下文，原著第268页。J·C·赫尔维茨指出，在为处理巴勒斯坦问题而建立的联合国各种委员会中，苏联集团自1948年4月以后就被有计划地排斥在外了（“中东的团结和不团结”，《国际调解》，1952年5月，第253—254页）。

见下文，原著第273页。

事实上，美国犹太人参加以色列志愿军的数字，看来小于英国犹太人参加的数字。/

1948年5月底，英国的政策终于根据美国的政策进行了调整。两国政府联合起来向巴勒斯坦的交战双方施加压力，要它们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停火，停火期间双方均不得接受来自国外的人员或物质援助。英国这时停止向阿拉伯国家输送军火已经一年多了，但美国政府却不能也不愿削减对以色列财政方面的援助，以供其从海外秘密购买重型武器。后来英国在联合国内的态度说明，为了适应当前巴勒斯坦的军事形势，英国政府纵然不曾授意给联合国调解人（瑞典皇室伯纳多特伯爵），但是也赞成了他所提出的对于联合国大会决议中有关划分巴勒斯坦领土的那项不切实际的条款应加修改的建议。该建议设想由以色列全部或部分让出南巴勒斯坦（以色列本来计划把该地发展为引水灌溉的谷物地区及矿产资源地区），而以最近被其军事占领的西加利利地区永归其所有，作为交换条件。英国的用心，显然是想使阿拉伯人控制南巴勒斯坦，作为潜在的军事基地以及运河区与约旦之间的通道，而且这块地方可能还蕴藏着石油。正当调解人的建议送交联合国大会加以讨论期间，由于以色列获得大量军火，阿拉伯各国间政治上争吵，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使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军事上占了优势。以阿拉伯国家违反停火为借口，以色列发动了一系列地区性的进攻，到了1948年底，以色列除拥有联合国指定划分给它的全部领土外，还占据了原来划给阿拉伯国家的大片土地。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当时尚未在事实上承认以色列）采取了一切外交手段，来阻止以色列在损害阿拉伯情况下继续推进；当以色列军队为驱逐驻在巴勒斯坦的埃及军队而进入埃及领土时，英国甚至准备援用英埃条约。但由于以色列已处于优势地位，美国继续保持着一种越来越超然的态度。在联合国中，美国代表团只是提出一项条件，客气地敦促以色列，要后者在其占领的地区已超过联合国所规定的范围的情况下，给予阿拉伯人以相应的土地作为交换，但对于如何实现这项条件却一事未做。美国同时还热情支持以色列加入联合国的申请。只是到了以色列军队已经跨进埃及境内并且据说已经威胁到外约旦时，美国才对以色列提出了警告。可是杜鲁门总统却仍不让他的政府承担责任与英国合作：英国单独派遣侦察机视察巴勒斯坦—埃及战线军事形势，结果是五架英国飞机被以色列击落了下來。英国议会和公众对这次屈辱遭遇的反应、阿拉伯各国和以色列之间开始停战谈判，这两件事结合在一起，使贝文对以色列的不妥协态度不得不有所软化。过去，英国政府自作主张，把达到参军年龄的犹太移民都拘留在塞浦路斯，现在也都予以释放了；对以色列事实上的承认，也予以宣布了。但是，1949年3月，以色列的巡逻部队推进到位于亚喀巴湾上的巴勒斯坦最南部出海口而加以占领时，一支新近在约旦境内亚喀巴本土建立起来的英国驻军也随之加强了。由于以色列军队只在国际边境线自己的一边活动，英国的这部分驻军并未采取什么军事行动。一个英国政府发言人声称，该部分驻军稳定了当地的局面，而且还有助于使以色列与约旦达成了停战协定。

对于阿拉伯各国来说，巴勒斯坦的战争，增添了受到挫折的情绪，而这种情绪立即在下面两件事上具体地表现了出来：一是埃及的首相被暗杀了，

---

调解人另一项建议就是把拥有十万名犹太居民的耶路撒冷（维持该城与以色列海岸一带的交通一直是极端困难的）划为阿拉伯人的领土。但是该项建议却成了调解人在9月间被以色列鹰派极端主义分子杀害的一个主要原因。

双方同时都违反了停战协定。

二是自称于 1954 年把叙利亚从法国委任统治下解放出来而立下功劳的那个寡头政权，被军事政变所推翻了。最后，这种受到挫折的情绪，也同样在谋杀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和在废黜法鲁克国王的埃及军事政变中发泄出来。与阿拉伯世界内部的这种骚动相应而来的，是在西方——特别是在英国——所引起的强烈反感，于是阿拉伯各国对待西方的政策也变得顽固地不合作起来。1949 年底，英美两国政府认为：耶路撒冷事实上已被以色列和约旦军队分别占据，这已使 1947 年 11 月联合国把该地区国际化的建议变得无从实现，故改而支持一项妥协性的建议，把原建议中的国际共管机构局限于照料圣址及该城的公共利益方面。可是，埃及和叙利亚，却得以同时对西方，对以色列，以及对“英国的仆从国”约旦报仇泄愤，诱使阿拉伯联盟各国、天主教各国以及苏联集团结成奇怪的一伙，凑成三分之二的多数，投票赞成全部国际化的方案——尽管现在没有一国准备把这个方案强加于以色列和约旦。1950 年 5 月，美英法三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企图稳定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局势，但后者却重申了阿拉伯人的立场作为答复。

在杜鲁门主义指导下，美国在土耳其所承担的紧迫任务，是加强态度坚决而装备陈旧的土耳其的军事力量，使其得以抵御苏联可能的进攻，同时还需防止财政上的负担会压垮落后的土耳其经济。美国建议的解决方案是土耳其军事力量的大规模现代化，这不可避免地要包括国民经济中许多部门的现代化。由于土耳其在冷战中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以及土耳其领导人的反应相对说来又是那么令人鼓舞（与美国在国民党中国的经验相对比而言），以致美国对土耳其的援助终于变成了共同安全条例下一项长期承担下来的义务。不管怎样，波斯的形式也远不是一帆风顺的，并在 1961 年还引起了英美政策上的另一次冲突。1946 年下半年，苏联改变了政策，侵略性的色彩淡了一些，波斯立即遭受苏联控制的危机总算是暂时避免了，接着波斯的 5 政治家们就制订了一项野心勃勃地发展国家经济的七年计划大纲。1947 年，该计划交给一家美国顾问团所组成的公司进行规划，精简到可以落实的规模，估计要用六亿五千万美元。这笔费用将来自两个方面，大致每方面各出一半：一方面是英伊石油公司所提供的石油产地使用费和波斯国内的各种收入，另一方面则希望国际银行能提供一项贷款。在此期间，由于英国政府采取限制红利的政策，很自然地就造成了波斯在石油方面收入的减少，所以英伊石油公司主动提出了双方进行协商来制定补偿办法的建议。但是政治上敏感的波斯人，

---

“这种灾难主要是英国人造成的。英国在 1947 年通过巴尔福宣言，答应把巴勒斯坦变成犹太人的‘家园’，使巴勒斯坦从此对犹太人敞开了大门。英国的保护和照顾，使犹太人得以把巴勒斯坦当作他们的家乡，在那里生息繁衍。在英国军队保护之下，犹太人的殖民地建立起来并且扩大了，那里的犹太移民也越来越多。受到英国委任统治的庇护，犹太恐怖主义扎了根，开了花，而且在英国训练之下成了一支有组织的军事力量。在整个过程中，英国却不让我们武装起来，而对犹太人武装自己却视而不见，一直到他们强大得完全可以独立的时候。到了这时，英国却撤退了，而且宣称他们要保持中立。可见，英国是这种灾难的主要造成者，不能推卸责任。”〔穆萨·阿拉米：“巴勒斯坦的教训”，《中东杂志》（Musa Alani：The Lesson of Pales Middle East Journal），1949 年 10 月，第 3 卷，第 373—374 页；这可以看成是代表阿拉伯人中比较温和的一种说法〕

约旦由于苏联的否决一直未能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1948 年 12 月，其他阿拉伯国家以同样方式联合了一些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以及苏联集团，共同挫败了要把阿拉伯巴勒斯坦并入约旦王国的一项英国建议（见下文，原著第 290 页）。

长期以来已对其国家最有价值的天然资源的开发被掌握在外人手里一事，心有不满，现在又记起了波斯从石油方面所取得的收入与英国政府从英伊石油公司所征收的赋税收入两者之间相差悬殊。波斯政府与石油公司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谈判不时为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和共产党人举行的反对英伊石油公司的示威运动所打断。在谈判中，波斯政府代表援引了委内瑞拉政府最近与一个从事生产和提炼的美国石油公司所商订的平分利润办法，作为例子；但是波斯人不但忽视了自委内瑞拉运至主要销售市场的运费要比自波斯运至主要销售市场的运费低这一事实，而且他们还要求把平分利润的规定应用到英伊石油公司在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及销售市场方面。1949年7月。双方终于达成了一项妥协方案，按照该方案，波斯在1948年和1949年所取得的产地使用费与现时协定相比将增加百分之八十三，而且预计由于1950年以后生产扩充的结果，1949年的二千三百万英镑这个数字还会进一步超过。但，波斯政府对这项新方案却态度冷淡。不管怎么说，这时一小撮民族主义者已经为取消英伊石油公司的特权而进行了大喊大叫；在他们的坚决反对下，国会也就没有批准这项新方案。由于其他不利的因素，这时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化了。农业上的歉收，由于进口半奢侈品引起城市资金大量浪费，两者所造成的影响，使1949—1950年期间波斯的经济严重恶化。这时，美国政府也不愿提供波斯国王所渴望的那项两亿五千万美元贷款了，理由是：在波斯腐败和无能的行政机构还没有根本加以改革之前，就是有了外国的贷款，也是会完全被浪费掉的——正如在当时的国民党中国一样。此外，在1949—1950年期间，总的说来，英美两国的石油利益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美国驻德黑兰的七年计划顾问团的主任，是来自波斯湾的一个美国石油公司的经理；他就公开评论过英国，说英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促进过中东的经济发展。在波斯经营石油生产的英国人和进行七年计划工作的美国人之间，促进彼此相互谅解的工作，看来做得是很差的。至于波斯人，过去一个多世纪来一直是通过让英国人和俄国人相互厮杀的办法来保持自己的独立，现在又看到了利用美国的同情来达到自己目的的机会——来反对1950年期间坚决不肯在尚未批准的1949年“补充协定”之外作进一步让步的英伊石油公司。

英美未能协调彼此对波斯的态度，其后果直到1951年夏季以后才完全暴

---

在1948—1950年间，英国政府收到的税收达一亿英镑，而付给波斯的石油产地使用费则只有三千八百七十万英镑（劳伦斯·洛克哈特博士：“英—波石油争议的原因”，《皇家中亚学会季刊》（Dr Laurence Lockhart：“The Causes of the Anglo-Persian Oil Dispute”，*Journal of the Royal Central Asian Society*），1953年4月，第40卷，第145页）。

这场冲突是由于两种情况碰到一起造成的：一个是英镑区迫切需要节约它所持有的美元储备，而这种情况招致了1949年9月的英镑贬值危机；另一个则是英国石油产量，特别是英国有波斯的石油产量的增加。虽然英国的石油生产需要消耗一部分黄金或美元（支付产地使用费，美国技术装备等等），但与同一数量的美国石油在英镑区的美元成本相比较，它的总“美元成分”在1950年估计也只为百分之三十左右；而其“净美元成分”（扣除英国石油在北美销售所取得的美元收益）则只为百分之十五左右。因此，在1949年，英国在整个英镑区及与之有双边贸易协定的国家如阿根廷、丹麦等国中，采取了措施，以英国能生产的石油替代了过去进口的美国石油，但这却遭到受排挤在美国石油公司的强烈抗议最后，双方达成了一系列的妥协办法。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各国的重整军备计划，大刺激了世界对石油的需求（见霍斯特·门德肖森：《1949—1950年间的美元缺乏与石油过剩》（Horst Mendershausen：*Dollar Shortage and Oil Surplus in 1949—1950*），第11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国际金融论丛，1950年版）。

露出来，因而不属于本卷记叙范围之内。不过，英国在世界中已经窘态毕露的那种处境，却在埃及看得最为明显，因为埃及一直想把英国的军事力量从其领土上赶出去。在1950年1月埃及大选后重新执政的华夫脱政府，很快就恢复了英—埃防务问题的会谈，报纸则向美国提出呼吁，希望能迫使英国作出让步。对于叙利亚共和国与哈希姆王国之一伊拉克或约旦——实行联合的建议，当时争论激烈。该项建议的反对者，很快就把它看成是英国鼓动下的产物（关于此点证据不够充分），而且是遭到美国反对的。在塞浦路斯，情况也是同样。居于大多数的希腊语系的政治领导人，也企图与希腊合并；他们受到怂恿寄希望于美国能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使英国同意他们的愿望。在1960年2月英国大选中，工党以微弱的多数重新执政，但这样一个不稳定的政府，毫无疑问会影响英国在中东的声望和权威，会影响英国制定政策的决心，也许特别是对波斯石油问题的僵局要在它超出合理政治范围之前尽力予以解决的决心。美国政府则极其不希望人们把它看成是在阿拉伯世界中取英国势力而代之的一个国家。因而在这个阶段中，其积极的行动只限于提供经济发展方面的援助，这一点在杜鲁门总统1949年1月20日就职演说中已经有所申明。但是，在阿拉伯世界中，那些行将成为受惠者的国家，则长期对这个“第四点计划”抱着种种无稽的疑虑。这种否定的态度，作为对帝国主义普遍有反感的一项后果，特别是作为巴勒斯坦灾难遗留下来的不

---

“英国在全世界特别是在欧洲的威信日渐低落。它在远东的声势也一落千丈。它不得不从印度、巴基斯坦、锡兰和巴勒斯坦撤出，今天，英国已落在美国、苏联之后，变成了一个第三流的国家。它的经济、它的军事利益、它的现在和未来都变成了华盛顿的一个包袱。”〔民族主义者菲克里·阿巴扎（Fikri Abaza）在《图画》周刊（al-Musawwar）上的文章，引自《埃及金融市场报》（Bourse Egyptienne），1951年4月13日〕

“每当埃及说：‘这是我的权利，而英国则只关心它的利益’，美国就说：‘有了权利才有利益的好处。’”〔《金字塔报》（al-Ahtam），转引自《埃及金融市场报》，1950年6月10日〕

“关于阿卜杜拉国王在英国的鼓动下主张建立大叙利亚的这种说法，根据在这个问题上阿卜杜拉与英国来往的信件看来，似乎是不能成立的。从黎巴嫩与叙利亚所抱的强烈反对态度的角度来看，正是由于英国的节制，阿卜杜拉才没有推行他的那项为阿拉伯所反对的主张，难道这不是同样真的吗？”〔马吉德·哈杜里：“肥沃新月统一的方案”（Majid Khaddri：“The Scheme of Fertile Crescent Unity”），刊于理查德·N·弗赖伊（Richard N. Frye）主编的《近在与大国》（The Near East and the Great Powers），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171页〕

关于英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的迹象，在对英国不友好的方面被夸大成为事实了。但关于本问题，可参阅乔治·伦乔夫斯基：《世界事务中的中东》（George Lenczowski：The Middle East in World Affairs），纽约，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254页：“虽然美国在大马士革的公使馆对叙利亚国内问题的发展保持严格的中立态度，但由于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石油方面有投资，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保持亲密关系一事，在美国政策中是占有优先考虑的地位的，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了。伊本·沙特坚决抵制大叙利亚的计划，因为该计划会加强他的对手的地位。……因此，美国的政策也赞成保持一个独立的叙利亚。”

在1944、1946和1947年中，有一些走漏出来的消息和事出有因的暗示说，塞浦路斯同希腊合并一事是得到美国国务院中某些方面的赞同的（见下文，原著第172—173页）。

见阿瑟·Z·加德纳：“第四点计划与阿拉伯世界——美国的一个看法”（Arthur Z. Gardiner：“Point Four and the Arab World, an American View”），《中东杂志》，1950年7月。第4卷，第298—299页；又见乔治·黑金：“第四点计划与中东——中东的一个看法”（George Hakim：“Point Four and the Middle East—Middle East View”），同上，1950年1月，第4卷，第183—195页。1951年2月，阿拉伯联盟批准了“第四点计划”的原则，各会员国不久就签字接受了它。

公正和屈辱之感的一项后果，很自然地就在阿拉伯国家被邀请同西方合作共同制定的一项联合防止可能发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计划的时侯，非常强烈地表现了出来。政治上的意见是一致的，都认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利用中东主要是为了它的帝国主义的目的，而对当地人民的利益，则只是给予敷衍了事的关注（按照民族主义者的讲法，则认为只是漠然地置诸脑后）。如果可能的话，这些国家还企图在破坏程度将大大超过过去历届战争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那种愿望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苏联宣传工具却巧妙地利用了那种企图保持中立的愿望以及反对英美政策的情绪，把两者看成是其“和平拥护者”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朝鲜战争18爆发前三星期，英帝中参谋总长谋求同埃及首相和外交大臣商讨中东的防务问题时，他提出警告说，一旦战争爆发，苏联的地面部队在四个月之内就能攻到埃及；但是埃及反驳说：只是因为埃及成了英国的基地，所以才变成了侵略的目标；而且自从1946年英国提出从埃及全部撤出的建议之后，战争的危险性也并未有所增加：因此，要想说服埃及人民，使其相信假想中的苏联的侵略会比当前的英国占领更糟，那倒是难上加难了。

英国在中东威信的下降，是同它的战后虚弱情况分不开的，而英美政策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所存在的严重分歧，现在则更突出地说明了这一点。美国发现土耳其是可以作为自己的可靠的权力支柱的——虽然对付这个权力支柱有时也有些麻烦，但美国也发现阿拉伯各国和波斯却处于一种“权力的真空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穆斯林的复兴，对共产主义的渗透提供了唯一的心理上的抵制。不过，由于共产主义者和穆斯林复兴主义者在倾向上都属于群众中的同一个阶层，而且都准备把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作为共同的事业，因而使上述那种心理上的抵制，也变得是靠不住的了。1950年夏，朝鲜战争爆发时，中东出现了一种情景，同托马斯·哈代在《王朝的主人》一书中根据其悲剧性的想象力所描绘出来的拿破仑的斗争，不无相似之处。巴勒斯坦阿拉伯难民的苦难，以及辗转来自各国、为在以色列这块天国的土地上重建家园而斗争的那些流离失所的犹太人的苦难，都是足以引起哈代的那位怜悯之神的同情的。但是，邪恶之神会带着欣赏的心情，来看恐怖主义在许多国家中所扮演的那种角色——摧毁政治上的反对力量，或者使某些政治上的头面人物葬身于血泊之中，成为席卷社会上整个整个集团和阶级的这种失望情绪的牺牲者。但是，无论如何，中东却为哈代的讽刺之神，在这个动

---

见巴黎共产党机关报《中东杂志》（Moyen-Orient）编辑马克面姆·罗丹松（Maxime Bodinson）的文章“军事准备与和平的缔造者”（“Pre-paratiftsmilitairesetfacteursdepaix”），1950年4月，第4—5页和第10页。

埃及外交部：《埃及王国政府与联合王国政府间有关双方会谈、照会和其他往来文件的档案，1950年3月至1951年11月》（EgyptMinistryofEorcignAffairs:RecordsofConversation, NotesandPapersexchangedbetweentheRoyalEgyptianGovernmentandtheUniedKingdomGovernment, March1950—November1951），开罗，1951年版，第13—15页，第21页。

见马克·亚力山大（笔名）：“共产党在中东的战略”，《二十世纪杂志》（MarkAlexander,psend.：“CommunistStrategyintheMiddleEast”，TwchliethCentury），第394—400页；又见“近东的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阵线”，《评论》（“TheNearEast’sCommunist-FaseistFront”，Commentary），1952年5月，第456—462页。

关于把极端的民族主义看成是一种“为摆脱现实政治上和经济上失望的一种盲目和不自觉的决心”这一



荡的时代提供了一些最为复杂的情景，例如，当前权力所在的一些体制，显然正在崩溃之中，而急欲取而代之的那些新生的体制，则尚处于脆弱的萌芽阶段。阿拉伯国家联盟，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医治不合理瓜分阿拉伯世界这个创伤而突起的一种统一力量的巨大组织，也由于执行了错误的路线，卷入王室和个人之间的倾轧之中，而变得分崩离析了。联盟为了促进经济事务、交通、文化事务、国籍和护照问题、社会活动以及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合作而设置的各种委员会，也都陷进普遍的纠缠不清的政治冲突中去了。阿拉伯各国为了抵制犹太复国主义，甚至拒绝讨论巴勒斯坦的分治问题，而且还愤怒地驳斥了1947年11月联合国所提出的各项建议，但仅在一年多的时间之后，就被迫沿着远远更加不利的分界线上接受了停战。这时虽回过头来把1947年11月原来的各项建议看成是当前最好的解决办法，希望加以履行，但已无济于事了。以色列在它争取独立的斗争变得尖锐起来之前，曾把它自己看成是中东的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典范，是对其他阿拉伯邻邦的一种鼓舞的力量。但是在与后者发生冲突的过程中，由于同时要追求许多目标，这就使它不得不把活动局限于采取各种各样的权宜之计，来吸引外国资本家的投资，以挽救其经济上的瘫痪。为了制止世界上的战争而建立了联合国组织的各主要大国，主要地是由于彼此目的不同，意见各异，要在面积不大于威尔士的一片土地上（指巴勒斯坦而言）制止一场局部的战争，事实证明也是无能为力的，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减轻一些战争带来的灾难而已，的确，它们总算使这场战争在一个月之内停了下来，而且当战争再度爆发后，又使其在两星期内停了下来。英国工党站在反对党地位，自1919年以来一直赞同所有中东评论家对英帝国主义所作的批判，但是这时却发现自己由于负起了政府工作的责任，而不得不为英帝国的特权地位进行辩护，以反对来自自己队伍中反对派的意见。就是基于善良的愿望，企图来解决一个规模较小的政治问题——塞浦路斯问题，它所作的努力，也是既受挫于当地民族主义的不妥协态度，又受挫于因冷战而产生的战略考虑的冲击。带头敦促英国政府放弃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的，倒是丘吉尔。在波斯，民族主义对经济现实考虑极少，大工业组织则因低估了民族主义的实力及其非理性特点而受到谴责，民族主义与大工业组织两者之间的冲突，终于在1950年爆发了出来。总的说来，美国在中东的观察家，由于对中东问题所抱的超然态度，比之更直接陷入到中东问题之内的英国，更加意识到为了适应迅速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有调整其政策的必要。但是正当英国面对其自身的实力日渐削弱这样一个尴尬的事实而畏缩不前的时候，美国在巴勒斯坦、波斯以及以后在埃及所进行的干涉

---

点，见T·凯勒·扬：“伊朗的民族主义”（T.CuylerYoung：“NationalisminIran”），《中东的民族主义：中东学会主办的中东事务第六届年会所提出的一系列论文》（NationalismintheMiddleEast：

aseseriesofaddressespresentedattheSixthAnnualConferenceonMiddleEastAffairs,sponsoredbytheMiddleEast

见A.D.：“阿拉伯联盟，其发展和困难”，《今日世界》（A.D.：

“TheArabLeagueDevelopmentandDifficulties”，TheWorldToday），1951年5月，第7卷，第187—196页。

“一个公正、合理、简单和具有说服力的态度……就是真诚地从一个对我们没有关连或传统关系的国家（在该国家中，我们既不象在印度那样拥有主权，也不象在埃及那样保持有条约上的权利）作好撤退的准备。……英王政府由于轻率地放弃了在埃及的条约权利，英国政府目前为了保护运河，不得不把巴勒斯坦作为一个跳板。……但是这种不智的行为揭穿了我们对该国不抱有私心的那种讲法……大削弱了在有关巴勒斯坦问题中我们道义上的地位。”（1946年8月1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26卷，第1255—1256栏）

行动的结果，却促使中东的民族主义进一步打击了英国的威信；当时美国还没有取英国而代之的准备（除了在希腊和土耳其以外），而其对中东所提供的东西在实质上也没有超过技术和财政上的援助，而且接受这类援助也不要求受援国承担任何义务。结果是这种“权力的真空状态”扩大到了整个的地区；在冷战的气氛下，它威胁着四方所谓的全球性安全的构想，并在 1952 年引起了“肥沃新月”中一系列政治上的动乱。

---

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个法官曾写过一本书，叙述了他在一些中东国家和印度所作的一次私人旅行中的经历。在该书中，他引用了一些人向他讲的毫无根据的粗暴控诉来谴责英“帝国主义”）而不用司法的态度加以审查〔威廉·O·道格拉斯：《陌生的国土和友好的人民》（William O. Douglas: Strange Lands and Friendly People），纽约；哈珀，1951 年版；伦敦，高兰兹，1952 年版；见《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中的书评，1952 年 10 月，第 28 卷，第 549—550 页，和《中东杂志》，1952 年春季，第 6 卷，第 252—253 页）。汉斯·科恩（Hans Kohn）曾经中肯地说：“我们美国人不当将民族自决看作世界上的灵丹妙药。……这个世界之所以受苦，是由于动荡得太厉害，而不是由于动荡得不够，是由于过于狂热，而不是由于狂热不够。”〔引自“中东民族主义的一般特征”（“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ism in the Middle East”），该文载中东学会出版的《中东的民族主义》，第 66—67 页〕

据说美国近东事务助理国务卿乔治·麦吉曾于 1949 年 11 月在中东美国外交官会议上宣称，在国会最近尚无可能批准向中东拨出巨大款项之前，美国将不鼓励缔结任何地区性的公约（麦克唐纳：《1948—1951 年我在以色列的使命》，第 182 页）。

## 第二编 土耳其、波斯和苏联

### 第一章 土耳其

#### 第一节从“神经战”到杜鲁门主义， 1945—1947年

本《概览》前面一卷中曾以一部分篇幅追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土关系的经过，并继续写到1945年3月19日苏联政府致土耳其政府的照会为止。该照会说，土苏中立和互不侵犯条约（即将满期）已“不再适应新的形势”

而需作“重大的修改”。按照战后情况，作某些调整其实是很自然的；但是在6月，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说，如缔结一项新的条约，则应允许他们在黑海海峡建立一个基地，除俄国和土耳其外，该海峡对一切国家的军舰均不开放，并要求归还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地区（俄国在1877—

1878年的战争中曾将该两地并入外高加索，并于1921年重新割让给土耳其）。安卡拉电台说，苏联政府也曾要求成立一个更民主和更有代议制性质的土耳其政府，并声称作为交还卡尔斯和阿尔达汉的报酬，土耳其应从叙利亚收回阿勒颇城及其铁路枢纽站。在此期间，22苏军机关报《红星报》抓住了土耳其政论家的抗议——即土耳其不能牺牲其独立和荣誉以博取俄国的友谊，而且也不希望象巴尔干一些国家那样布尔什维克化——谴责他们利用苏联与英国之间的意见分歧，并希望因而发生一场新的战争。最后还威胁着说：“这种疯狂的见解有可能产生令人最不愉快的后果。”7月10日，土

---

《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443—466页。

1945年6月7日莫洛托夫对土耳其驻莫斯科大使的声明，以及6月22日苏联驻土耳其大使对土耳其代理外交部长的声明；见内吉梅丁·萨达克（1947—1950年土耳其外交部长）：“土耳其面对苏联”：《外交》季刊（Necmed-dinSadak：“TurkeyFacesTheSoviets”，ForeignAffairs），1949年4月，第27卷，第458页；《泰晤士报》，1945年6月26日和28日。

德国在1918年3月所强加于苏维埃政府身上的布列特—里托夫斯克条约第四条第二款规定，俄国军队撤出卡尔斯、阿尔达汉和巴统地区，以及俄国对各该地区与邻国特别是与土耳其关系的重新调整应不予干涉。当奥斯曼帝国在那年年底瓦解时，短命的亚美尼亚（埃里温）和格鲁吉亚两个民族共和国曾分别占领过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地区。但在1920年10月，当再度活跃起来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和苏俄双方都进攻亚美尼亚共和国时，土耳其重新占领了卡尔斯地区，并于1921年2月要求格鲁吉亚归还阿尔达汉。苏联随即把短命的民族共和国的领土重新并入外高加索，根据1921年3月16日的苏土条约，承认土耳其对卡尔斯和阿尔达汉的所有权（见《概览，1920—1923年》，第361—372页，并参阅V.赫沃斯托夫教授：“事实的真相”，《新时代》（ProfessorV.Khvostov：“FactsoftheCase”，NewTimes），1946年2月1日，第24—25页）。

苏联宣传机器及其巴尔干卫星国立刻掀起一股攻击土耳其政治领袖与机构的逆流，扣以“法西斯分子”和“反动派”的大帽子。

1941年12月艾登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曾向他提及，土耳其或许有可能得到叙利亚北部的某些地区，作为让步的报酬，丘吉尔所写的战史中没有详细说明这些地区（温斯顿·S·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WinstonS.Churchill：TheSecondWorldWar），伦敦，卡斯尔，1950年版，第3卷，第558页；波士顿霍顿·米夫林，1950年版，第3卷第628—620页）。

见《新苏黎世报》（NeueZurcherZeitullg），1945年6月29日，莫斯科与伊斯坦布尔的电讯。

土耳其外交部长哈桑·萨卡在其参加旧金山会议后的归国途中，在伦敦停了下来，与艾登讨论苏联的要求。第二天，他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1936年的蒙特勒公约，即目前黑海海峡制度所依据的公约，是一个多边协定，因此，它不能单独由土耳其和苏联来作出修改。与此同时，土耳其官方的安纳托利亚通讯社否认“外国谣传”，申明土耳其没有收复阿勒颇地区的任何打算；但是叙利亚和黎巴嫩共产党立即宣称，他们支持叙利亚收复亚历山大勒塔（哈塔伊）州的民族要求。委任统治国法国曾把该州于1939年割让给土耳其。

很显然，蒙特勒公约第十九条和第二十条所规定的在战时禁止通过海峡的限制，对苏联已不再能维持下去。7月17日，在有杜鲁门、斯大林和丘吉尔参加的波茨坦会议上，丘吉尔首先发言说，英国愿意参加一个保证苏联海军和商船自由使用海峡的新的协定；但关于苏联在海峡建立基地和对卡尔斯与阿尔达汉的要求，他却极力主张，土耳其应不必“过分担心”。据说，斯大林作了回答说，这些要求中的第一个要求是基于土耳其太弱，不能有效地保证自由通航的权利——这无疑是同苏联指责的、土耳其

在战时曾允许轴心国的海军舰只通过海峡一事有关。

杜鲁门把海峡问题与欧洲内陆国际水道（诸如多瑙河问题）联系起来，并提出自由和不受限制通航的建议，但斯大林拒绝讨论此事。也不同意在发表的公报中有任何提及此事之处。三国政府只同意（见于该会议议定书的一项条款中，而该项条款在1947年前始终未曾发表）蒙特勒公约“由于其不适合现状”，应加以修改，以及三国政府中每一政府应与土耳其政府进行直接会谈。

看来，在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提出收复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地区的要求，是从两个方面出发的：一是恢复到1921年以前的原状，二是俄国有权享有一个更巩固的边界，作为它与土耳其缔结一项新条约的代价。

这种要求受到各国（包括美国在内）的亚美尼亚人团体的支持，而他们

---

《纽约时报》（NewYorkTimeS），1945年7月12日。

《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Guardian），1945年7月12日；《费加罗报》（Figaro），8月7日。关于割让哈塔伊一事，见《概览，1938年》，第1卷，第479—492页。

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464页。

见詹姆斯·F·贝尔纳斯：《坦率的话》（JamesF.Byrnes：SpeakingFrankly），纽约，哈珀：伦敦，海涅曼；1947年版，第77—78页；《国务院公报》（DepartmentofStateBulletin），1945年3月12日，第212页；丘吉尔：《和平的力》（TheSineu'sofPeace），伦敦，卡斯尔。1948年版，第118页，1946年3月15日在纽约的演说。

英国外交部：《柏林会议议定书，柏林，1945年8月2日》

（GreatBritain,ForeignOffice:ProtocoloftheProceelingsoftheBerlinConference，Berlin,2ndAugust，1945）.敕令第7087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7年版），第16条。

据约翰·c·梅特卡夫（JohnO.Metcalf）报道（《纽约先驱论坛报》（NewYerkHeraldTrihune），1945年10月10日），斯大林曾“说明俄国希望把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归还[苏维埃]亚美尼亚，因为俄国觉得它们合法地属于亚美尼亚”；而曾在外高加索旅行并作过研究的W·E·D·艾伦（W.E.D.Allen）早在二十年以前讨论有关1853—1855年高加索战役时说，卡尔斯是土耳其某进攻外高加索的“一个良好的前进基地”，但在土耳其军队的防卫上却是一个守不住的据点[《赛伯邑国》（Beled-es-Siba），伦敦，麦克米伦，1952年版，第155—158页]。贝尔纳斯的简短引证（前引书，第77页）缺乏准确性。

见《纽约时报》，1945年7月11日和8月7日。

所宣布的归还卡尔斯和阿尔达汉的宣言则曾受到苏联的广泛宣传。来自世界各国的亚美尼亚教派的主教和大主教们,在1945年6月曾应邀赴苏维埃亚美尼亚,去选举一位埃奇米阿德津的亚美尼亚教长(大主教);在苏维埃政权统治下,这项职务早已被废除。新的亚美尼亚教长要求“被土耳其强行夺去的土地应从它手中拿出来,退还给已加入苏维埃亚美尼亚的合法原主”,这一要求是与12月2日莫斯科人民委员会所公布的决议一道发表的,该决议声称正在作好准备以接纳被驱逐出境而希望回到苏维埃亚美尼亚的亚美尼亚人。土耳其总理说“没有一个亚美尼亚人”在那些地区生活,并据以驳斥苏维埃亚美尼亚对卡尔斯和阿尔达汉的要求;一位苏联政论家反驳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土耳其放逐亚美尼亚人之前,仅在卡尔斯地区就曾有近十万人在那里居住,并自以为是地说道:“在国际法的记录中,从来没有犯杀尽当地居民一事作为杀人者有权占有被杀者的

土地之理由。”然而,正如早在十四年以前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在1914至1921年之间,“亚美尼亚民族的大部分被屠杀和被消灭”是从十六世纪末以来,俄国、奥斯曼和波斯帝国之间对高加索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居民所进行的一种“阴谋、煽动和引诱同反阴谋和屠杀的游戏”的。“合乎逻辑的和令人毛骨悚然的结果”,而后,24 来一位记者注意到,彻尔克斯族的穆斯林,在他们对俄国的吞并所进行的抵抗终于在1864年被打垮之后,被屠杀或者放逐的人数,与五十年以后在土耳其人手中遭难的亚美尼亚人的数量几乎相等。

1945年11月2日,美国驻土耳其大使递交了一份美国政府对海峡有所建议的照会。该建议企图让海峡主权完全归于土耳其人手中:与此同时。与蒙特勒公约相比,对黑海海峡国家也作出一些实质性的让步。海峡国家的军舰(象一切国家的商船一样)在任何时候都能在海峡自由通航,而不受战时的限制;反之,其他国家的军舰将禁止通航,但在共同议定的和平时吨吨收限额以内的,或者经黑海国家的特许的,或者征得联合国当局同意的,仍可通航。11月21日,英国大使送交了一份备忘录,支持美、国建议,但同时说明蒙特勒公约的修改并非当务之急。、12月5日,土耳其总理秀克留·萨拉若卢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他的政府接受美国建议作为进行讨论的一个基础,在三个有利害关系的国家都发表其意见后,将提出:自己的建议;美国

---

《纽约时报》,1945年12月3日;《泰晤士报》,1945年12月4日,引自《苏联广播收听报》(SovietMonitor)。许多苏联领事馆对要求回国的亚美尼亚人的登记工作在积极地进行,这引起了颇大的响应,特别是在中东各国,那里的双美尼亚难民团伴仍然没有同化,而且害怕出现民族主义的独立政府。《莫斯科新闻》(MoseowNews),1948年7月16日估计要求回国的总人数为八万六千人。

赫沃斯托夫在《新时代》上的文章,1946年2月1日,第21—25页。

w.E.D.艾伦:《格鲁吉亚人史》(History,of,theGeorgian. PeoPle),伦敦,基根·保罗、特伦奇、特拉比纳,1932年版,第164页。

《经济学家》(TheEconomist),1946年10月5日,第547页。令人回忆起苏联政府最近曾镇压了高加索的三个自治共和国,并把其居民迁往西伯利亚,因为他们在1942年曾同德国侵略者站在一边。

原文载美国国务院:《土耳其海峡问题》(U.S.A., Department-ofState :ThePrnb l emoftheTurkishStraits)。出版物编号2752。近东第5辑(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7年版),第47页(以下简称《土耳其海峡问题》)。

《泰晤士报》,1945年11月26日。

参加修改蒙特勒公约的会议，不仅是“合适的，而且是必要的”。12月27日，《泰晤士报》上发表了该报驻土耳其记者所写的报道，该报道可以被认作是半官方“授意的”。它评述说，假定在土耳其与苏联交战的情况下，美国所提出的黑海国家的军舰在“任何时候”应自由使用海峡的建议，将使土耳其的地位“无法防守，荒唐可笑”；在那种情况下，难道会期望其他缔约国迫使土耳其对俄国军舰保持海峡开放吗？何况美国的建议 25 是否能满足苏联政府的要求，也使人大为怀疑，因为后者的要求是：只有在取得海峡上永久性或暂时性的防御基地时，苏联才能应付由于土耳其的弱点渐出现的那种可能情况，才能应付土耳其默许侵略者反苏的那种可能情况。但是，这一要求不管其提出的形式何等婉转，肯定会被认为是对土耳其主权的侵犯而遭到断然的拒绝。

最近，土耳其政府由于限制民主自由而受到来自本国以及苏联集团的不友好宣传的尖锐批评。这种对民主自由的限制是奥斯曼帝国时代的一个遗留物，而在阿塔图克的一党制政权统治下并未完全被取消，或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实行紧急措施而不可避免地加强起来了。早在1945年11月，土耳其政府就曾废除了严厉限制出版和集会自由的法律。然而，这就鼓励了伊斯坦布尔许多新的出版物采取的路线带上了苏联宣传的味道；例如，有一家报纸要求知道土耳其是否已经变成了英国的一个殖民地。土耳其政府反对这种对其加强1939年英土同盟政策的含蓄的批评，并继续重视民族的团结，这就不能与受到内战威胁的希腊和波斯同日而语了。但是，如果重新制定出版法，只会使他们遭受苏联反土宣传的另一次正面的攻击。因此，土耳其国会的许多代表煽动了伊斯坦布尔大学和中学的学生去领导12月4日的示威游行，这次示威游行袭击了那些敢于提出这类问题的出版物的办公室和印刷厂，以及被断定是亲苏的两家书店。

苏土彼此互不客气的照会和宣传接踵而来，土耳其官方叙述说，这次示威游行是由“民主的”土耳其青年“自发组织的”，但这活却遭到莫斯科电台的回击，后者宣称土耳其成了“希姆莱和戈培尔民主的一个忠实的翻版”。

两周以后（12月20日，当“三强”的外长们在莫斯科会晤时），莫斯科报纸和电台转载并广播了由两位格鲁吉亚历史学家在第比利斯的一家报纸上所写的一封信，要求把大片地方归还给（苏维埃）格鲁吉亚，即安纳托利亚的东北部沿海地区（西至离今苏上边界一百八十英里的吉雷孙，直到深达

---

《世界报》（Monde）和《新苏黎世报》，1945年12月7日。

见《泰晤士报》驻伊斯坦布尔记者报道，1945年11月1日；刘易斯·V·托马斯和理查德·N·弗赖伊：《美国、土耳其和伊朗》（Lewis V. Thomas and Richard N. Fry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urkey and Iran），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105—106页；伯纳德·刘易斯：“土耳其近况”（Bernard Lewis: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urkey”），《国际事务》，1951年7月，第27卷，第320页。

《曼彻斯特卫报》驻伊斯坦布尔记者报道，1945年12月17日；由于共产党人的授意，这一天在波斯的阿塞拜疆发生了政变，见下文，原著第58页以后。

内务部长说：“警官们跟随了示威游行，但没有进行干预”（安卡拉电台，12月4日傍晚），一周以后，总理评论说，示威游行者的目的是“镇压不爱国的活动”（《纽约时报》，1945年12月13日）。刘易斯·v·托马斯评述说，土耳其报纸中《只有极小部分可以异想天开地没有多少说服力地给扣上亲共的帽子》（《美国、土耳其和伊朗》，第104页并参阅第111页）。

1945年12月6日，希腊语广播；照会原文载《纽约时报》，1945年12月17日。

七十英里的内地)，换句话说，也就是位于早已是苏联要求归还的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地区以西的那么一大块领土。该信声称，“在远古时代，格鲁吉亚人民就在这块大地上生活、耕种与斗争……创建新的文明中心和政府”，而奥斯曼土耳其人所进行的征服“仅仅带来了死亡和毁灭”，而这却是还不到五百年的事。实际上，威尔逊总统1920年11月22日的裁决，就建议把现在所要求的整个地区事实上都包括了进去，而且还包括了流产的“大亚美尼亚”的大部分地方。但是，格鲁吉亚和拉兹两地情况并不相同：格鲁吉亚的王公们，由于请求俄国的保护，避免了被奥斯曼和波斯帝国的吞并，并保全了他们的基督教信仰（至少直到其国家合并于苏联为止）；而格鲁吉亚两位教授现在所要求的拉兹，则由于奥斯曼征服的结果，当地人民已改信伊斯兰教，他们的封建酋长被允许有相当程度的自治，直到十九世纪。正如D·J·达林所指出，这一类凭借捏造的历史所提出的要求，迄今在苏联已成为笑柄，由于土耳其报纸斩钉截铁他说整个民族宁可“赴汤蹈火”也不愿割让“寸土”，所以双方接着就照老样子彼此谩骂起来。《红星报》抨击了土耳其“好战的演说家”，说他们在“爱好自由的民族”同希特勒奋战时一声不吭，于是土耳其总理萨拉若卢在电台中反驳说，两位格鲁吉亚教授不是“希特勒哲学”附了体，就是患了“嗜血狂”。毫无疑问，1946年1月12日在伦敦《工人日报》上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不是偶然的，它在反复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表明土耳其不宜控制海峡，接着就进行公开的威胁、土耳其反动派似乎非常喜欢炫耀自己的力量。或许它们不久就会知道，1946年已非1939年，而剑拔夸张的作法早已是过了时的玩意儿。<sup>27</sup>这是缔造和平的一年，也是挖掉战争老根的一年。首先，中东必须成为和平与民主的一个真正的堡垒。在战争结束之后才六个月，苏联就想按照共产党的模样努力把土耳其变成“和平和民主的堡垒”一事，竟成了衡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彼此日渐分道扬镳的尺度，这对非共产主义世界来说，特别是对英国工党政府的外交大臣来说，看来应象是“一场……双方的报刊都参加接旗呐喊的……神经战”。1946年2月21日，欧内斯特·贝文向下院提出保证说，他和他的同僚们一直在密切地注视着有关控制海峡问题的国际方面的情况，认为“纵然是这一个特定的大国而不是那一个特定的大国，在一个特定的地方建立基地”，也不会对世界和平有什么贡献。但，就是这种谨慎的意见，以及温斯顿·丘吉尔（他

---

原文教《纽约时报》，1945年12月21日。

见H·w·V·但珀利编：《巴黎和会史》（AHistoryofthePeaceConferenceOfParis，ed.H.w.V.Temperley），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英国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24年版（以下简称《和会史》），第6卷，第83—84页；美国，亚美尼亚民族委员会：《根据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裁决所作出的亚美尼亚和土耳其的边界》（UnitedStates，ArmenianNationalCommittee：

TheFrontierbetweenArmeniaandTurkeyasdecidedbyPresidentWoodrowWilson），1945年版，附有地图。

见《伊斯兰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ofIslam），“拉兹”（Laz）条。

“通往地中海的东方道路”，《自由欧洲》（“TheEasternRoadtotheMediterranean”。FreeEurope），1946年7月，第13卷，第199页。

《曼彻斯特卫报》和《纽约时报》，1945年12月28日；《泰晤士报》，1946年1月7日；《纽约时报》，1946年1月13日。

下院辩论，第5辑，第419卷，第135—1356栏。

作为反对党领袖享有较大的自由) 在 3 月 15 日于纽约所提出的主张, 同样都招致了反驳: 苏联希望控制被内陆包围的黑海的唯一入海口一事, 英国加以反对是不合乎逻辑的; 英国本身一直在世界通路——地中海——的两端集中武力, 可以任意把它加以封闭: “这个, 对丘吉尔先生是天经地义的, 而苏联如在海峡上有了要塞, 则就会意味着基督教文明的没落了。”

大家知道, 美国 1945 年 11 月 2 日照会所提出的关于海峡的建议, 可以被认为会使土耳其在万一与苏联冲突时处于难以防守的地位。然而, 美国海军部长(詹姆斯·G·福雷斯特)早在 1945 年 6 月 24 日就注意到苏联把“土耳其从英国势力范围内拉出来”的目的, 1945—1946 年冬天, 苏联对波斯施加军事和外交压力, 特别是在规定的日子(1946 年 3 月 2 日)红军没有从波斯的阿塞拜疆撤退(三强事前曾同意在这一天从波斯国土上完全撤出其各自的部队), 这在美国舆论界看来, 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3 月 5 日, 海军部宣称, 十六个月以前死于美国的土耳其大使的遗体将由世界上最强大的军舰、美国军舰“密苏里”号护送回国, 而按照外交礼节, 通常派一艘巡洋舰进行护送也就够了。后来发现, 这个决定是一种妥协方案, 原来美国国务院不希望刺激苏联, —

美国海军则希望派遣实力雄厚的舰队到东地中海巡 28 逻, 而这种示威又是总统早已核准的。事实上, 一个象沃尔特·李普曼那样有地位的政治家仍把中东争夺权力的斗争看作是“英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虽有工党领导人的种种好听的词令, 而伦敦的外交政策与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帕默斯顿的外交政策, 仍是不容易区别清楚的”。李普曼请苏联领导人研究美国人对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的反应: “他们将发现美国人民并没有接受丘吉尔先生的加入反苏联盟的建议……它是一种悲观绝望的意见……等于承认调解已经失败。”李普曼试图为俄国在中近东的“合法的和可以接受的利益的外围边缘”加以规定——即沿着“的里雅斯特、萨洛尼卡和多德卡尼斯群岛以及希腊其他岛屿……红海……波斯湾”形成一个半圆。但是, 他又继续写道, 俄国人不应试图把他们在巴尔干、土耳其和波斯的合法利益扩大成为排他性的利益。“这里, 一定要进行合作, 并尊重他们和我们共同制定的原则和义务,

---

丘吉尔:《和平的力量》,第 118 页。

《工人日报》(DallyWorker),1946 年 3 月 19 日。

见上文,原著第 24 页。

《福雷斯特日记》,沃尔特·米利斯编(TheForrestaIDiaries,cd.walterMillis),纽约,瓦伊金出版社,1951 年版,第 71 页。

见下文:原著第 58—59 页和第 66—67 页。

1946 年 3 月 5 日,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发表著名演说的丘吉尔,在 10 日告诉福雷斯特,整个舰队应当驶人马尔马拉海(《福雷斯特日记》,第 145 页)。

西方战略家们曾进行争辩说,要控制黑海与爱琴海之间的交通,不仅俾峡各基地,而且整个爱琴海地区的空中优势:现在都是必需的了[见“俄国、土耳其和海峡”(“Russia,Turkey,andtheStraits”),《今日世界》,1964 年 9 月,第 2 卷,第 400 页];苏联驻希腊大使罗迪亚诺夫海军上将,在与希腊首相进行贸易会谈过程中,刚刚建议多德卡尼斯群岛的一个港口应交由俄国人自由处置,以作为其与希腊贸易的商船添加燃料和修理之用[《曼彻斯特卫报》,1946 年 2 月 28 日,《每日先驱报》(DailyHerald)外交记者报道,3 月 1 日,《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nyTimes)外交记者报道,3 月 3 日,《战斗报》(Combat),3 月 3—4 日(材料来源:希腊驻伦敦大使馆)]。



然后才能有解决办法，否则对我们大家的结果——对他们和我们自己的结果，都会比那些目光短浅的人们所想象的要坏得多。”美国军舰“密苏里”号及其随行舰队的巡游“将使莫斯科毫不含糊地懂得，我们认为他们对外扩张的限度正是在什么地方”。接着，他又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不曾受到过损伤的美国人民在导致和平方面虽然没有准备承认失败，但“却到了承认有失败的可能性的地步”。要在世界上美国人民心目中过去一直是很疏远的地方承担保持权力平衡的新义务，为了在美国国内作好负责的舆论准备，他的这种论证也许是必要的。英国权力的没落，美国权力的上升，使这个义务成为绝对必要的了。但是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则极力想使美国不在中东扩大其权力和责任，在为招待出席4月25日召开的巴黎会议的美国代表团所举行的宴会上，他们谴责美国在土耳其、埃及和波斯寻找基地。

1945年11月，土耳其出版法的放宽，是共和人民党内部所进行的个人倾轧和原则冲突的部分结果，该党在当时仍是土耳其唯一合法的政治组织。起而反对伊诺努总统以及该党的领导的，是以杰拉尔·拜亚尔为首的人士；1918年阿塔图克去世时，拜亚尔曾任总理。反对的理由是各种各样的。战时的经济严重情况导致贪污事件的增加和工作效率的低落，这一切都在当权者身上反映出来了。人们日益感到：共和国的某些理想依然只是一纸空文的期望，这些理想，现在应当付诸实施，“或者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或者甚至只作为一个权宜之计，因为土耳其现在当然是自觉和不自觉地更急于接近它心目中的英、美两国的国家形式，也只有这两个国家支持它反对俄国”。共和人民党的领导顺应局势的要求，于1945年11月废除了禁止任何有组织的反对党的法律，持不同政见的人士在第二个月就正式成立了民主党，主张放宽政府对土耳其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控制。由于反对党（民主党）的要求，政府于1946年5月制定法律，第一次规定了直接和秘密的选举。民主党抵制5月26日的市政选举，并抗议没有给他们充裕时间以建立自己的组织。随后举行的7月大选，据一位美国观察家说，其特点是：执政党采取了某种“恐怖主义和高压政治（特别是农民选民的）”，“而在统计选票一事上，又发生了大量和广泛的舞弊行为”，结果使民主党在这次选举中仅拿到六十五个席位，而执政党则拿到三百九十六个席位——“这个结果决不能反映前者在一个公正政府下所能拿到的总票数”。然而，这却是民主党的一个检验实力的大好机会，他们除了在其他重要城镇干得十分出色外，在仍然是土耳其知识分子中心的现代城市伊斯坦布尔，顺利地使自己在二十三个30席位中赢得十九个席位。显然，执政党感到有必要力图缓和普遍流露出来的对昂贵的生活费用的不满情绪；这种昂贵的生活费用从战时以来一直持续着，而且在总动

---

《纽约先驱论坛报》，1946年3月6日和9日。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128页。

托马斯和弗赖伊：《美国、土耳其和伊朗》，第103页。又见伯纳德·刘易斯：“土耳其近况”，《国际事务》，1951年7月，第27卷，第321页，论述了富阿德·科普鲁卢教授在组织一个反对党时所起的作用；他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1950年民主党组成首届政府时，曾任外交部长。

关于民主党纲领的扼要叙述，见A·C·爱德华兹：“大战对土耳其的影响”（A.C.Edwards：“TheImpactoftheWaronTurkey”），《国际事务》，1946年7月，第22卷，第394页，托马斯（前引文）指出，许多具有自由思想的政治家们仍愿继续留在共和人民党内，并力图从内部来影响其发展。

托马斯和弗赖伊：《美国、土耳其和伊朗》，第104页。

员的基础上，必须维持一支人数达七十五万的军队以对付苏联的冷战威胁，从而加重了国民经济的沉重负担。秀克留·萨拉若卢内阁被加上了在战争期间不作好事、专作坏事的各种罪名，成了替罪羊，只有其外交部长还留在雷杰普·佩凯尔所领导的新内阁之中。雷杰普·佩凯尔以对苏联抱不妥协态度著称，而在这个问题上，不论政府和反对党都不存在分歧。新政府利用1946年9月的货币贬值来刺激土耳其的出口，但好处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苏联反对土耳其和波斯的冷战攻势，引起了土耳其和阿拉伯世界之间试图搞好团结的努力。3月29日，伊拉克政界元老努里·赛义德同土耳其谈判缔结了一项友好与睦邻条约，但直到1947年6月，伊拉克议会才批准该条约。

1946年11月28日，土耳其外交部秘书长访问安曼，表达了土耳其政府就约旦哈希姆王国获得独立而致阿卜杜拉国王的祝贺。1947年1月，阿卜杜拉国王访问土耳其，并缔结了一项友好条约。1946年6月，黎巴嫩总统对土耳其进行国事访问，人们把这次访问的目的看作是促进土耳其与叙利亚和解。因为两国过去在亚历山大勒塔州问题上发生争执而疏远了。但叙利亚政府对这两个哈希姆国（伊拉克和约旦）有所猜忌，因而对任何和解横加反对。

土耳其表示：埃及要求英军撤出苏伊士运河区是不合时宜的，因而埃土关系随即变得紧张起来。对此，埃及报纸进行反驳说：如果出于战略上的需要，一支英国驻军驻在土耳其要比驻在苏伊士运河区更好：“倘若我们面临两者择其一的情况，那么我们宁可作这样的选择：让你们那里驻有俄国人，而我们摆脱英国人。”有影响的埃及专栏作家阿卜德·卡迪尔·马齐尼则评述说，建议中的中东公约将使阿拉伯世界变成英国和土耳其所利用的工具：“不必要地同俄国作对，会使我们一无所获。”

规定海峡制度的蒙特勒公约，到1946年11月9日满期时得自动延期五年，除非在8月9日前，由某一缔约国宣布该条约作废。苏联政府趁这个时机有选择地公布了它所缴获的关于德国外交部在战争期间处理德土关系的文

---

见下文，原著第43页注（即本书第74页注——译者）。苏联宣传机器曾继续攻击“反动的”土耳其政府片支持亚美尼亚人的要求。现在苏联又支持了一个波斯人的库尔德斯坦“民主政府”（见下文，原著第62—63页）；6月15日，工会报纸《劳动报》（Trud）刊登了一篇攻击土耳其的文章。说它虐待其不到两百万人的库尔德少数民族。关于库尔德人在土耳其的地位的报道，见“最近在土耳其的一个记者”（“A correspondent recently in Turkey”），《经济学家》，1946年10月5日，第547页，以及托马斯与弗赖伊：《美国、土耳其和伊朗》，第79页，第80页，第115页。

见同上书，第109—110页。

见马吉德·哈杜里：《独立的伊拉克》（Majid Khadduri：Indepon - dent Iran），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51年版，第261—263页，又见下文，原著第150页注（即本书第255页注——译者），第151页；原文教《现代东方季刊》（Cahiers de L'Orient Contemporain），1947年第3—4季度，第11—12期，第149—150页。

原文载同上，1947年第1—2季度，第9—10期，第25—26页。

见上文，原著第22页和注（即本书第38页注——译者）。

见哈杜里，前引文。

转引自《中东时报》（Middle East Times），耶路撒冷，犹太复国主义者刊物，1946年6月20日；《中东舆论》（Middle East Opinion），开罗，阿拉伯联盟机关报，1946年12月30日。一般情况，见M·科隆贝：“土耳其相中车问题”（M. Colombe：“La Turquie et les problèmes du Moyen-Orient”），《现代东方季刊》，1947年第3—4季度，第11—12期，第140—141页。

件；<sup>15</sup>并在8月8日递交了一项照会，重申了他们的不满：说土耳其政府没有在战时对轴心国的海军船舰封闭海峡；说他们采取了美国1945年11月2日的建议，坚决认为控制海峡的责任属于土耳其和其他黑海国家，苏联政府还在结论中提出建议——“土耳其和苏联，作为具有最大利害关系，并能保证商船自由通航和海峡安全的国家，将共同组织海峡的防卫，以防止其他国家利用海峡来达到敌视黑海国家之目的。”8月15日，共产党《人道报》在为俄国人的要求作辩护时指出，海峡的南部是受英国控制的海洋，英国的正当的利益是在大西洋，然而其军队遍布从的里雅斯特通过希腊直到巴勒斯坦一带，而“土耳其的虚假的民主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是德国政策的工具”，现在却又变成了英国政策的工具。《人道报》继续写道，可以预期，现在“帝国主义者”会把海峡问题交付给装作是不偏不倚的某种国际大会或者国际会议，而事实上其代表们则“在会议的休息室里，同来自伦敦的乐队指挥，用英国的语言进行谈话”。8月19日，《观察家报》的外交记者，提出了一个可以代表英国方面的局势估计，他指出：俄国鼓励波斯的阿塞拜疆人自治，使土耳其的东翼改了样，所以如果土耳其现在把海峡基地割让给俄国，它就将“很快地变为附属国，而根据滚球游戏中木柱连锁倒下的道理，希腊、叙利亚和伊拉克也将立32即面临一种同样的处境”。该记者把英土同盟（土耳其新总理刚刚把它描绘成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主要基础），比成1938年希特勒神经战时期的法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同盟：正象没有英国的支持，当时法国就不能维护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一样，所以现在“没有美国的支持，英国也不能维护土耳其的独立。这个问题将取决于美国是否把海峡看作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在较早一些时候，美国政府曾要求土耳其政府偿付四百五十万美元，作为勾销估计约值一亿四千万美元的租借法案账目之用。在同一天，8月19日，美国政府答复了苏联的照会说，美国政府注意到苏联照会不曾提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权处理对海峡的侵略性进攻或进攻的威胁；而其正常管理则应继续主要由土耳其负责。8月21日，英国递交了一份同样宗旨的照会。

第二天，土耳其对苏联照会作了答复，为土耳其战时对轴心国舰只使用海峡曾加以控制一事作了相当长的辩护，拒绝了苏联共管的要求，因为这与土耳其“不可剥夺的主权”，与土耳其不受限制的安全，以及与土耳其在海峡中

---

<sup>15</sup> 来由马德莱娜和米歇尔·厄里斯托夫（Madeleine and Michel Eristov）译自俄文，称为《德国外交部秘密文件》（Documents secrets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Allemagne），第1卷：土耳其（巴黎，保罗·德蓬出版社，1946年版）。对原著的出版说明，见《苏格兰人报》（Scotsman），1946年8月13日。

原文载《苏联新闻》（Soviet News），1946年8月14日；《土耳其诸州问题》（Problem of the Turkish States），第47—49页。

见下文，原著第58—59页和第67—68页。

《泰晤士报》，1946年8月15日。

《观察家报》（Observer），1946年8月19日。

《泰晤士报》，1946年5月9日；《纽约时报》，1946年5月10日。

原文载《土耳其海峡问题》，第49—50页；见《福雷斯特日记》，第192页。

原文载《土耳其海峡问题》，第50页。贝文在1946年10月22日说，尽管英国政府在大战期间关于蒙特卡罗公约的解释，与土耳其存在某些意见分歧，他们认为，大体上，公约的条件曾经受到诚意的遵守（下院辩论，第5辑，第427卷，第1495栏）。

作为一个“均衡与联络因素”所起的作用，都是格格不入的。

三天以后，8月25日，塔斯社发自贝鲁特的一篇报道说：根据“当地某些方面”的消息，英国曾在海峡建立了一个军事供应基地，控制了伊斯坦布尔附近的耶希尔柯伊的土耳其飞机场，并在色雷斯和黑海海岸建立并指挥反潜艇的雷达站；英国外交部确认，象对其他若干国家一样，对土耳其也曾供应雷达设备与提供技术人员。 9

月1日，莫斯科电台又重新指责英国曾在海峡建立一个基地，列举了海军舰只和飞机的数字，高射炮与电台的数量，以及本年内英国曾供给土耳其的其他设备，并断言英国专家们曾就建立海岸要塞问题向土耳其人提供意见。在夏季，苏联对土耳其的军事压力变本加厉了。据说，在土耳其大选和在8月8日苏联提出照会的时候，大批苏军向靠近外高加索的边界移动，据华盛顿估计，俄国人在外高加索驻有十九万军队，在保加利亚驻有九万多军队。后来据称，一支由两百个苏维埃亚美尼亚人组成的袭击队已深入土耳其领土的卡尔斯—阿尔达汉地区，或许是为了试探土耳其的反应；而据确实可靠的消息，这决不是唯一的这类事件。在6月中旬至8月底，苏联黑海舰队曾在外高加索边境以北四十五英里的波提基地举行军事演习。这些示威行动，使土耳其总参谋部怀疑苏联可能蓄意发动一场真正的进攻。在9月和10月，土耳其总参谋部举行了佯称为“演习”的总动员，并从难以防卫的卡尔斯阵地秘密撤出其部队，转移到紧挨着埃尔祖鲁姆以东的更坚固的帕辛莱尔峡道。与此同时，在8月28日，莫斯科电台就尖锐地批评了这次土耳其和“反动的”美国报刊所制造的大吹大擂的宣传，即美国航空母舰“富兰克林·D·罗斯福”号与其他七艘军舰驶抵地中海，以及英国两艘驱逐舰行将到伊斯坦布尔进行访问。

正是随着这种“神经战”的准备，9月24日，苏联向土耳其政府递交了一项新照会。它坚持认为：黑海被陆地所包围，与直布罗陀海峡和苏伊士运河那样的国际海道相比，性质是根本不同的，这因为黑海的入海口主要涉及到黑海海岸各国，而国际通道则必须有利害关系最大的一些国家参加，形成“一种国际控制”——尽管这种控制并没有得到实现。土耳其对苏联共同管

---

原文载《土耳其海峡问题》，第50—55页。

《纽约时报》，1946年8月25日；《纽约先驱论坛报》，1946年8月27日。

《纽约先驱论坛报》，1946年9月2日。这些数字是英国国务大臣所证实的，1947年3月17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35卷，第20栏）。塔斯社曾断言美国在安卡拉、伊斯坦布尔、埃尔祖鲁姆等地正在修建重要国际机场，并为此目的而给了土耳其一笔四千五百万美元的贷款《雷诺新闻》（Reynolds News），1946年4月28日）。《新时代》（1947年1月1日，第15页）一再指责美国专家正在积极援助土耳其人。

参阅《人道报》（L'Humanite），1946年10月22日：“据说……英国控制伊斯坦布尔和查纳卡累飞机场，并在整个土耳其海岸设有许多雷达基地。五千名英国专家正在土耳其的司令部、军校、空军和海军中服务。”

关于卡尔斯的战略意义，见上文，原著第23页注（即本书第40页注——译者）；关于埃尔祖鲁姆的战略意义，见金罗斯勋爵：“俄国与土耳其相遇的地方”，《听众》周刊（Lord Kinross：

“Where Russia and Turkey meet”，Listener），1952年3月6日，第369—370页。这次秘密撤退后来曾透露给C·L·苏兹贝格（C.L. Sulzberger）。对此，他补充说：“苏联在撤退地区——主要是在阿塞拜疆，安插了许多代理人。土耳其曾在该地区重建了自己的兵力，并清除了嫌疑者”（《纽约时报》，1950年3月28日）；又见《经济学家》，1948年1月3日，第21页。

理海峡的建议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反对，这暴露了它的怀疑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而且这有损苏联的尊严。34……如果土耳其竟然在拒绝接受苏联建议之后，开始与某些非黑海国家一起在海峡采取军事措施，这种举动当然就与黑海国家的安全利益背道而驰了。10月9日，美国和英国政府递交的照会对此作了回答，表示的意见是，波茨坦会议建议的苏土之间进行直接会谈，现已达到交换意见的目的，因此，没有理由再继续下去了。美国和英国政府仍准备参加蒙特勒公约缔约国的会议，以考虑该条约的修订。10月18日，土耳其送交的复照大体上重申了土耳其8月22日照会中的论点，并提出新的理由，不承认海峡问题是黑海国家的专有特权，即海峡成了“两个世界。——指黑海北部的苏联世界和地中海与地中海以外的“自由”世界——之间的一个联系，这就使土耳其处于“一种特殊微妙的地理位置”之中。在该照会发表前，《真理报》评论员大卫·萨斯拉夫斯基在10月20日作了评述：“土耳其外交的产品只不过是英美原样的一种翻版。……来自美国的翻译者正在成为土耳其外交中的关键人物”，而土耳其外交所反映出来的美国人讲的话，“与其说是其中一切冠冕堂皇的东西，倒不如说是其中一切蛮横无礼的东西。”事实上，在前一天，进出口银行已批准向美国企业家提供二千五百万美元的担保，使后者得以把这个数目的信贷借给土耳其政府，作为其购买机车、车皮、修理厂和重建国营工厂设备之用。这些国营工厂在战争期间因无法从德国获得零件而遭受损失，在1939年以前大部分零件是由德国供给的。

据说，在11月，保加利亚对希腊共产党游击队的支持有所增加，不幸，该游击队是在靠近土耳其在色雷斯的西部边界，很显然，这给伊斯坦布尔共产主义进行新35的“政治迫害”提供了机会。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伊斯坦布尔与色雷斯以及海峡海岸一带曾一直处于戒严法管制之下，当12月6日，国民议会投票决议戒严法再延长六个月时，民主党代表反对这个“镇压集会和停止报刊措施”的决议。然而，在12月17日，地方军区的指挥官宣称，已采取严厉措施，以结束共产党人授意的活动，这些活动对扰乱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是个威胁。在被镇压的组织中有社会主义工农党（由曾在莫斯科受训的谢菲克·许斯尼·代格梅尔蒂克博士在上一年内合法地成立的，他原为1920年成立的土耳其共产党总书记，但该党被阿塔图克所镇压）；由埃萨德·阿迪尔·米斯泰贾比领导的土耳其社会党；伊斯坦布尔工人工会

---

原文载《苏联新闻》，第59—60页。对于苏联另一次照会所说的直接会谈的作用尚未穷尽的讲法，英国驻莫斯科大使口头答复说，他的政府相信继续会谈是不能达到更有益的目的的（《泰晤士报》外交记者报道，1946年11月22日；《纽约时报》，1946年12月24日）。

原文载《土耳其海峡问题》，第60—68页。

1946年10月22日《苏联新闻》报道。

《纽约时报》，1946年10月20日。当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于4月访土期间，伊诺努总统曾说过，土耳其希望美国为此目的而贷款“几亿美元”（同上，1946年4月12日）。

《泰晤士报》驻安卡拉记者报道，1946年11月26日。

《纽约时报》，1946年12月6日。

根据阿塔图克1934年所通过的强制法〔《现代东方》（OrlenteModerno），1934年12月，第577—579页〕而采用的这个姓名，可以译成“土耳其‘普通人’”；参阅波斯共产党人所选用的贬称“杜德”——“人民群众”一词。

联合会以及伊斯坦布尔工人俱乐部。八家被认定为颠覆性的刊物被勒令停刊，七十多名嫌疑者被捕，其中五十六名终于受到审判，内有四十五名被判以一年至五年不等的徒刑，谢菲克·许斯尼·代格梅尔蒂克判刑最重，而埃萨德·阿迪尔·米斯泰贾比则在十一个被释者之列。美国评论家斯图尔特·艾尔索普从安卡拉报道说，土耳其人估计苏联在上土耳其花费的宣传费，大约从十八万美元到五、六倍于此数；即使这个数字可能被夸大了，而“有资格的观察家们”确信，苏联正在利用对经济的普遍不满情绪，争取（可能是通过保加利亚）人们倒向共产主义。莫斯科电台对土耳其报纸呼吁“劳资之间的调和”一事进行讽刺性的抨击。此后，土耳其政府于1947年2月20日又公布了一项新法律，允许雇工（但非政府工作人员）和雇主成立工会，但禁止罢工和闭厂以及组织带有政治纲领的工会。

在此期间，由于感到战争已经使国家的经济日益枯竭，战后的英国工党政府试图在国内建立一个福利国家，并减少其所承担的帝国义务。1947年初，英国遇到了煤炭不足的问题，而这恰巧又是六十六年来最冷的一个冬天，使情况变得更加严重，构成了英国经济生活势将瘫痪的威胁。这次“冬天危机”在2月份达到了顶峰。2月14日，惶惶不安的政府宣称：没有得到解决的巴勒斯坦冲突，应交联合国裁决；又在20日宣称，印度次大陆准备在夏天取得独立。同埃及谈判修改1936年的英埃条约在1月已告中断。英国政府在2月21日的一份照会中通知美国国务院说，从3月31日联合王国的财政年度的最后一天起，他们将不得不取消自战争以来他们提供希腊和土耳其的财政、经济和顾问等方面的援助。2月19日，美国评论家斯图尔特·艾尔索普从安卡拉报道说：“在俄国人发动进攻的情况下，最乐观的估计是，土耳其能抵抗六个月。而专家们则更倾向于猜测在一个月和六个星期之间。”与此同时，艾尔索普继续写道，维持土耳其军队动员的费用，“把通货膨胀和财政混乱两个幽灵不断地引得越来越远。这里，在一些观察专家中，没有乐观，只有不同程度的悲观。”于是，3月12日，杜鲁门总统在

---

《共和国报》（LaRepublique），伊斯坦布尔出版，1948年7月15日。另一方面，一位苏联作家宣称，“成千名进步领袖和工会会员”曾被投入监狱。这种反对民主阵营的过火行动是按照来自华盛顿的直接命令而采取的（A·库兹明纳：“土耳其的外交政策”（A.Kuzmina：“Turkey'sForeignPolicy”），《新时代》，1948年4月14日，第9页）。

《纽约先驱论坛报》，1947年2月16日。约在1946年7月大选的时候，社会主义党曾因对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发出贺电而被停止活动。而最近出现的《真言报》（Gercek）〔与《真理报》（Pravda）同义〕则被看作是接受俄国津贴的，由于刊载“挑衅性”的文章而遭到停刊（A.C.塞奇威克（A.C.SedgWiek）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1946年7月27日）。

见《1947年年鉴》（AnnualRegister，1947），第4—9页。

见下文，原著第238页。

见下文，原著第130页。

见代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1947年3月20日的声明〔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关于美国对希腊与土耳其提供援助的第2616号议案的意见听取会》（U.S.A. Houseof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onForeignAffairs : Hearings..onH.R.2616 ,aBilltoprovideforAssistancetoGreeceandTurkey）,以下简称《对希腊与土耳其援助的议案》，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7年版，第1页和第7页〕；《福雷斯持尔日记》，第245—253页。

《纽约先驱论坛报》，1947年2月19日。

国会两院的联席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地中海局势的演说，历史上称为杜鲁门主义。在这次演说中，杜鲁门要求国会授权，到 1948 年 6 月 30 日时期为止，给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拨款达四亿美元，并对这些国家提供技术人员和训练设备。土耳其的一份预计是一亿美元，用之于军事装备和运输系统的现代化，使之有可能实现某种程度的复员，从而使其国民经济减轻负担。当参议员对 37 该议案的辩论临近结束时，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范登堡用下列赞成的话，总结了这场辩论。首先，如果本议案通不过……则请求美国援助的英雄的希腊，在几个月之内就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极权主义的卫星国。其次，邻近苏俄的土耳其，是苏俄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周围一带剩下来的唯一的独立国家。它曾不屈不挠地抵抗一场“神经战”。如果希腊失去独立，则土耳其就将四面楚歌，其独立可能就是下一个牺牲品。第三，从这些主要的动机出发，如果本议案通不过，我们就不能忽视，从达达尼尔海峡到中国海，并朝西到大西洋水域，……就会出现一个共产党连锁反应的可能性。

第四，美国……不能逃避根本的自身利益——美国不应在一个极权主义世界中寸步难行。……

第五，如果我们付诸行动，我们就应为联合国“坚守阵地”，直到联合国能够循序渐进地承担这些责任之时——这样一种发展，我们不仅期望而且公开予以鼓励。……国会中的反对派来自两方面，一来自那些理想主义者，他们害怕美国承担一种更应当由联合国来承担的义务，二来自那些传统地反对从英国失败的手中继承一种“帝国主义”政策的人。然而，该议案于 4 月 22 日在参议院以六十七票对二十三票、五票缺席通过，并于 5 月 9 日在众议院以二百八十七票对一百零七票、三十七票弃权通过。苏联和共产党的宣传却没有多少新的东西可说，只能暗示说美国石油垄断组织赞成援助计划，因为它们希望把希腊和土耳其变成“进攻中东的”基地，但是，英国一位重要的共产党记者写道：

由于受到了杜鲁门和贝文两位先生的支持，土耳其在大吃一惊的世界面前，作为民主与自由的捍卫者，摇摇

晃晃地走到舞台前面，鞠躬致谢。……

这是一个有着几百万没有土地的农民国家，农民们在少得可怜的土地上，忍饥挨饿，辛勤劳动，以维持拥有无限财富的地主上层建筑，维持残忍腐败的官僚机器，养活一支六十万到八十万人的军队，以及维持一个警察机构——其庞大、残忍和无法无天就象佛朗哥西班牙的警察机构一样。……

他们养肥了声名狼藉的本国政府及其按照伦敦和华盛顿的反苏政策所制订的罪恶的侵略计划。现在美国担负起维持这伙危险匪帮的主要责任。

## 第二节 从杜鲁门主义到朝鲜战争， 1947—1950 年

---

《国会记录》（Congressional Record），1947 年 4 月 22 日，第 3772—3773 页。

见《概览，1947—1948 年》，第 15—17 页。

“美国外交政策”（“American Foreign Policy”），《新时代》，1947 年 3 月 2 日，第 2 页；关于代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否认的话，见《国会记录》，1947 年 4 月 22 日，第 3780 页。

弗兰克·皮凯思（Frank Pitcairn，即克劳德·科伯恩（Claude Conkburn）的笔名）在《工人日报》上的文章，1947 年 3 月 17 日。

1947年5月，一个专门工作团，其中包括十二个美国陆军、六个海军和三个空军军官以及两个美国国务院的经济学家，到了土耳其，同土耳其的武装部队和政府官员进行商谈，作为在土耳其落实杜鲁门主义的第一步。近三十年中，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久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的武装部队都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机械化，相对说来，使土耳其的武装部队远远落在后面，所以，它较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奥斯曼帝国的武装部队更为不如（不管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西方接受了什么样的援助）。此外，它大部分的装备也是过了时的和杂牌的，因此还带来了供应零件和弹药的困难。所以，武装部队的全部现代化一事，远非仍然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土耳其经济拥有的技术和财政手段所能做到的事，而在经过一段不打仗的时期之后。一个国家的将领职位往往为一些最为保守的分子所把持的情况，在土耳其也不是例外。土耳其参谋部中的高级干部都是些1914年前曾受过德国人训练的一批人，不但对当前的各种缺点倾向于作过低的估计，而且闭着眼对土耳其士兵传统和久经考验的勇气寄予“惊人的信任”。

有的人满以为机械化战争的最新式的武器，土耳其

其述是能自行制造的。至于级别更低的那些军官，上级要求他们去学这种机械化战争新事物的奥秘，他们有时可不愿有失尊严地变成“机械匠这类的粗人”。<sup>39</sup> 介于发展缓慢的奥斯曼帝国的过去和阿塔图克按照西方模式建立一个现代世俗国家的梦想这两者之间的这种过渡情况，正是土耳其整个经济上的特征。对于美国的顾问们来说，各种各样的实际上和心理上必须克

---

土耳其之类的国家和技术上最先进的诸国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是各方面的，并不限于武装部队的问题。参阅托马斯和弗赖伊：《美国、土耳其和伊朗》，第102页：“若以1914年土耳其的钢铁工人同1914年美国匹兹堡的钢铁工人相比，逊色还较小，而若以土耳其卡腊比克的钢铁工人同美国橡树岭的技术人员相比，差距就大一些了，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为了保证土耳其的生存，它在培养足够数量新土耳其人方面所作的一切努力……到头来确是完全落了空，这岂不是也是事实吗？……就军事力量来说，对于这些尖锐问题的回答，非常可能是毫无保留地一个‘是’字。四十年代后期与二十年代初期相比，土耳其距世界水平更远”。

把工具交给土耳其的一般士兵去操作是靠不住的，因为他们的报酬过低（相当于每年四美元），即使由于疏忽而遗失或搞坏一个锤子，他也赔不起罚款。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1950年5月12日。

约瑟夫·G·哈里森（Joseph G. Harrison）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上的文章，1949年2月26日。

土耳其的海军朋友们告诉一个美国海军军官说，他们决心要建造一艘航空母舰。“他终于参观了土耳其希望在其中建造航空母舰的船坞，并提出了坦率但并非不友好的意见。他认为土耳其人即使在那里修理一辆汽车也会是件难事。”（约瑟夫·哈里森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发表的文章）

本书作者的一位朋友在1939年前曾参观过土耳其的一个农业专科学校，看到一个园艺人员正对一群学生作树木修剪的接枝技术的示范。这位朋友问这群学生是否自己也愿意实习一番，后看带着几分激动回答说，让他们干这类体力劳动的话，那可是太丢脸了：

见马克斯·韦斯顿·索恩伯格、格雷厄姆·斯普赖和乔治·索尔：《土耳其：一个经济的估价》（Max Weston Thornburg, Graham Spry, and George Sonle: Turkey, an Economic Appraisal），纽约，二十世纪基金会，1949年版。它是1947年夏的一份调查报告（又见该书的书评，载《中东杂志》，1949年10月，第4卷，第480—482页）。在读书题为“一种畸形经济”（第108—109页）一节中举了一个很好的计划



服的障碍，很快就一目了然了：

……但是当美国的这一批人和那一批人在土耳其的港口登陆，在土耳其的铁路和公路上旅行，在土耳其的农村和厂矿进行视察的时候，他们才发现：那些港口没有能力装卸计划中要送来的那些物资。那些公路也必须重建，否则就不能适应现代化军队的调动，而在那里也没有一个能够支持正在缔造中的那种高效率战争机器的工业。逐渐地……重点开始从枪炮和卡车转到港口和公路方面了。美国代表切访问了公共工程部和交通部。有人告诉他们说，新的工业化的五年计划不过是若干巨大公共工程计划项目之一，但单单它就能提高公路的运输量估计每年为五十万吨。可是，公共工程部公路建设的最近计划却表明，即使只就字面上看，修建和保养一万二千五百英里的公路，以便把土耳其的公路提高到一百年前欧洲的平均水平，按照计划中每年支出一亿四千万英镑计算，也需要十五年的时间。美国人视察了矿石产地，但是看不到熔铁炉；看到了新的鼓风炉，但是却没有炼焦炉；看到了潜在的油田，但是却没有油井。他们带回来的印象是：土耳其是一个不发达国家，辛勤努力但经验不足，虽然有经济潜力和纸面上的计划，可是缺少资本、熟练的劳动力和工程技术能力，而最重要的是缺少经济常识和组织体制。当时在基本的战略原则问题上出现了一个说法，认为一旦与俄国发生战争，土耳其在海峡和爱琴海的港口不比其在黑海的港口价值大多少，因而对土耳其最方便的港口是距塞得港北部和东北部四百五十英里的伊斯肯

德仑（亚历山大勒塔）。然而从这个港口向北的公路和铁路交通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军事运输的要求（在过去，交通的落后曾构成土耳其防务战略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美国人作了修筑战略公路的准备——从该港伸向东北到埃尔祖鲁姆（这是防卫苏联从外高加索进行侵略的东安纳托利亚的军事基地），以及伸向西北到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传统上，土耳其防卫俄国侵略的防务，是设在伊斯坦布尔以西三十英里的色雷斯的查塔尔贾和埃尔祖鲁姆以东的派辛莱尔峡道的两道防线。但是作为1948年和1949年初的土耳其军事演习的结果，看来美国的军事观察人员已经作出决定，认为这些防

---

错误的例子，说明它是主观主义扣缺少经验结合起来的产物，而缺少经验则表现在“过分地把注意力用到西方化中新奇花哨的皮毛上”〔A.T.斯蒂尔（A.T.Steele）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的文章，1950年11月19日〕。

驻安卡拉记者报道，《经济学家》，1948年1月3日，第21页。

关于这个计划的经济意义以及所遇到的困难，见罗伯特·w·克尔温：“土耳其的公路计划”

（Robert W. Kerwin：“The Turkish Roads Program”），《中东杂志》，1950年4月，第4卷，第196—208页。关于共产党人对这个计划的战略意义的看法，见萨米·巴斯里：“中东的战略路线”（Samy el Besry：“Les routes stratégiques du Moyen-Orient”，《中东杂志》，1951年1月，第8—9页。

见上文，原著第39页。

见下文，原著第51页所引用的那篇文章，该文章刊登在半官方的《民族报》（Ulus）上，1949年3月26日。见阿斯拉·亨巴拉西（Aslan Hum-baraci）在《新政治家与民族》（New Statesman and Nation）上所写的一些文章，1949年6月4日，第679页；《国际论坛》（Tribune des Nations），1949年6月10日；《世界报》，1949年7月12日。这位作家曾于1946年起做过《纽约时报》驻土耳其记者，但于1949年春辞职，表面上是由于他一贯地受到土耳其和美国双方的检查和“恫吓”——两者都阻止他客观地报道土耳其武装部队同美国使团之间的困难〔他的辞职信原文登在《亚美尼亚事务》（Armenian Affairs），1949—1950年冬季，第1卷，第77—79页）。这时他一度居住在布拉格，但后来显然由于对铁幕后的情况不满，造反

线在苏联的全面进攻之下，除非是在一段极短的时间内，不象是能够守住的样子；因而，当前最好的办法就是希望以伊斯肯德伦作为供应基地，用十二个到十五个土耳其师去守住托罗斯山脉以南地区；然后，从这个桥头堡对南俄罗斯的油田和工业区进行空袭。

根据杜鲁门主义，美国的目标是减轻土耳其武装部队对其国民经济所造成的负担，采用的办法是把武装人员的数目减少百分之三十左右，同时则使部队机械化，以提高其火力和机动性。然而到 1947 年末，这个计划已经开始执行的时候，土耳其经济上更加普遍的各种需要却迫切地呈现出来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储存了一亿六千万美元以上的黄金和美元，以及约六千五百万元的不能兑换的货币，但是为了填补战时累积起来的对资金和消费品的需要，战后已经大量支用了这笔储备。这样，它每年从美国的进口额由 1936—1939 年期间的七百万美元至一千四百万美元，在 1949 年已上升到八千一百万美元左右。土耳其指望继续从美国购买的东西，价值上大大超过其可能卖给美国的东西，未来的美元逆差也不可能用美国在土耳其私人投资来加以弥补。这因为美国的生意人，凭着他们对成本和效率方面的敏感性，是以批判的态度来看待土耳其工业的效率不高的国家垄断组织的（土耳其产品的生产成本大大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只是由于在国内排挤了与其竞争的外国产品，国内市场才站住了脚）。而且，1942—1943 年土耳其政府曾对资本采取高度歧视性的抽税办法，人们也是记忆犹新的。当外国投资上还存在这种障碍的时候，虽然土耳其政府放松了阿塔图克政权时期实行的那种限制办法——禁止外国公司把资本和利润转移到国外去，但这也不过是一项暂

---

后到巴黎避难去了。

见乔治·菲尔丁·埃利奥特少校 (Major George Fielding Eliot) 在 1913 年 5 月访问土耳其后所写的那本书《仇恨、希望和烈性炸药》(Bate, Hope, and High Explosives)，印地安纳波利斯和纽约，鲍勃斯-梅里尔，1948 年版，第 218 页。不管怎么说，直到 1951 年土耳其政府才事实上让美国使用其航空基地，部分是因为它怕激怒苏联，部分是因为它坚持要求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作为美国使用其空军基地的代价（见“中东基地和条约”（“Bases and Treaties in the Middle East”），《经济学家》，1951 年 3 月 3 日，第 491 页；D.J.K.：“希腊、土耳其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D.J.K.：“Greece, Turkey, and N.A.T.O.”），《今日世界》，1952 年 4 月，第 8 期。第 163 页；以及下文，原着第 53 页）。

美国经济合作总署：《欧洲复兴计划，土耳其国家研究》（U.S.A. 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 Turkey Country Study），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9 年版，第 12 页、第 14 页（以下简称《欧洲复兴计划：土耳其》）。

见伊丽莎白·门罗：“对土耳其的美元援助”（Elizabeth Monroe：“Dollar Aid for Turkey”），《苏格兰人报》，1948 年 1 月 21 日；关于阿塔图克的国家主义政策的历史原因，见厄梅尔·杰拉尔·萨尔克：“新土耳其的经济政策”（Omer Celal Sarc：“Economic Policy of the New Turkey”），《中东杂志》，1948 年 10 月，第 2 卷，第 430—446 页。大部分的愤懑情绪，是由于美国在德国的占领区一度排斥了土耳其主要出口商品烟叶造成的（因为战前德国是土耳其烟叶的主要市场）。土耳其人抱怨美国推销弗吉尼亚烟叶，对土耳其烟叶采取了歧视的作法，但是土耳其烟叶的定价过高看来也要负部分的责任；参阅“马歇尔计划和我们的烟草问题”一文（“Le Plan Marshall et la question des tabacs”），《共和国报》（伊斯坦布尔），1948 年 5 月 29 日，以及《经济学家》中的有关文章，1948 年 6 月 26 日，第 1053 页，以及 1948 年 7 月 24 日，第 137—138 页。关于 1946 年 9 月佩凯尔政府对土耳其货币贬值失败一事，见上文，原著第 30 页。

见《纽约时报》，1947 年 5 月 26 日。1948 年 7 月，土耳其同美国签订一项特别经济合作协定，并于 1950 年 1 月 31 日重加修订〔美国国务院：《条约和其他国际性公约汇编》

时的权宜之计而已，何况存在于土耳其民族主义中那种对“经济的帝国主义”的猜疑情绪根深蒂固，并不是很容易就可以克服的。

美国政府声称，它在欧洲复兴计划下对土耳其提供“马歇尔援助计划”的目标是：作为谷物和其他粮食作物的生产国，土耳其的潜力是远远大于其过去的实际产量的。扩大肥料、农业工具和机器的使用，通过排水和灌溉把荒地加以开拓，改善土耳其国内的运输——这些办法结合起来，可以显著地增加产量、避免浪费和改善分配。这些办法可以提高土耳其人民过去的那种低水平的生活标准，同时还可以把更多的粮食作物向其他欧洲复兴计划国家出口。开发土耳其的矿产资源，可以使土耳其具有出口的外汇顺差。至少有一种矿产品——铬，对美国的战略目标说来，也是具有重要利益的。这种性质的经济发展，可以在物质上改善土耳其国内和国际的经济地位，而且还带来一个在国民收入较高的水平上大体能保持新的稳定局面那种可以过得去的前景。

至于养活四分之三人口的农业，为了增加现有农业的产量和扩大可耕地面积，土耳其最需要的是现代设备<sup>42</sup>和现代农业技术。这样干，结果应当是非常实惠的，因为现有的装备和操作方法，一般都很原始，不管从每人的产量和每亩的产量来说，生产率都是低的。土耳其也有必要改变其农业生产上的重点，这也是重要的。谷物、油料作物和工业用纤维的产量也是可以增加的。提高和改进水果和蔬菜方面的包装能力，将既能促进国内的消费，也能增加出口。包装鱼类出口的可能性，至今还没有充分发掘，但大有可为。

在工业上，看来可能最有前途的是在开采矿产品方面。土耳其已知储藏的煤和褐煤数量不小，但质量如何还没有完全测定。此外，它的铬和铁矿石的储藏量也不小，而铜、锰和铅也有增产的可能性。依靠国外信贷和技术人员的帮助，土耳其应能大大加强这个经济领域的活动。

土耳其正在鼓励通过学校教育以培养领导骨干和管理人员，并派遣学生和专门团体到国外学习，以增加工程师、科学家、医生、农业经济学者以及其他各种专业人员的队伍……土耳其就这样利用了国外的技术援助以加速其国家的发展。有种种迹象说明，国内大搞教育和利用外国的帮助的政策，是会继续下去的。

从1948年4月欧洲复兴计划开始实施到1950年6月30日财政年度结束这个期间，土耳其共获得一亿零八百万美元的直接援助和相当于七千五百万美元的间接援助，主要是用在农业、采煤和交通的现代化方面。在这两年中，供应给土耳其的军事装备的估计数字，名义上约两亿美元，但是美国军事当局声称，其实际价值却是远远超过这个数字的。<sup>43</sup>土耳其政府对于这种援助措施的态度大体上可以从土耳其报纸的评论中看出来，不过土耳其的报纸所享

---

( TreatiesandOtherInternationalAetsSeries ) ，第 1794 和 2037 页 ]。

关于土耳其的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的重大战略意义的一个说明，见《概览，1939—1946年：作战中的角逐》。

在这一点上，有一两句话在公布的原文中被删掉了。

文尔弗雷德·米凯利斯：“1950年的中东经济”（AlfredMichaelis：“TheMiddleEastEconomyin1950”），《中东杂志》，1951年春季，第225卷。在1948—1953年期间，土耳其政府要求欧洲经济复兴计划提供援助的主要项目是：

<sup>43</sup> 万美元

受的出版自由却是有限的,不大可能把报纸 43 的评论和官方的态度之间的分歧完全都揭示出来,传说给上土耳其的财政和军事援助不足,报纸上对此一再有过抗议。<sup>灌</sup>对照之下,西欧诸国拿到的数目就比它大得多,甚至象希腊这样一个(在土耳其心目中)对国内二万名共产党叛乱分子都束手无策的国家,拿到的数目也比土耳其大,而上土耳其则是保卫西方自由、抵抗苏联威胁的勇敢前哨,<sup>达</sup>而国内也实际上不存在什么共产主义的问题。<sup>经</sup>有人主张,同美国的国会和人民打交道,要记住土耳其的一句老话:“不哭的孩子吃不上奶”。<sup>经</sup>人们发现,美国的军事援助不仅在数量上不够,而且也不包括同苏联可能用以对付土耳其的武器旗鼓相当的那种最新式武器。<sup>建</sup>

碰上这些心理上如何适应的问题。美国顾问们不得不采取极大耐心的体谅态度。<sup>站</sup>在军事部门中间,由于必须教那些将来可以成为指导员的土耳其人(数目有好儿千人)弄懂英文,训练他们掌握新的机械和器材的基本操作知识,情况更是如此。在想要拥有象雷达之类的现代器材一事上,土耳其人表现得永远是那么急不可耐的样子,因为他们把这件事看成不但与他们的名誉地位有关,而且也是他们国家现代化的象征——虽然他们还没训练出来足够数量的人员去使用这些东西。<sup>洲</sup>美国人不得不对土耳其政府的最上层施加压力,要求把保守的参谋部的状况来一个大改变。二十五年前费夫齐·查克马克元帅原是阿塔图克建立上土耳其共和国时候忠心耿耿的支持者,当时曾代表军队表示全力支持新政权,条件是他作为总参谋长直接向当共和国总统的阿塔图克负责,而不向内阁负责。结果是:直到查克马克引退的 1943 年,他的工作是不受政府文官的控制和干预的。“参谋部制定的军队预算送到大国民议会纯粹是为了形式上加以通过。二十年来,没有一个议员敢对军队的预算提出任何问题。”然而,在查克马克引退以后,总参谋长总算是对总理负责了。当 1949 年初议会讨论预算时,“第一次有人对军事问题提出了公开的批评,这件事搞得政府非常窘,因为没有一个是政府成员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是权威性的。另一方面。美国的军事援助……却使土耳其政府感到需要把军队事务集中在一个负责的政府部门里。”<sup>洲</sup>1949 年 6 月,议会因此通过了几项法律,把所有的国防组织部置于国防部长的权力之下,同时建立了一个国防最高委员会来调配战时的国家资源。该委员会除以总理为主席外,包括了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和内阁经济各部的部长。“这样,在土耳其的历史上,武装部队第一次才被置于文官政府的控制之下。” 1949 年 10 月,继上述措施而

---

<sup>灌</sup> 溉 68.5

<sup>达</sup> 克煤矿盆地 41.9

<sup>经</sup> 营管理) 40

<sup>经</sup> 营管理) 30

<sup>建</sup> 19.6

<sup>站</sup> 20.5

<sup>洲</sup> 复兴计划:土耳其》,第 37 页)。

土耳其政府提出的数字表明,在目前的落后状况下,它的食物消费水平是欧洲最低的,但如有适当的发展,它还是能在欧洲复兴中发挥最重要作用的,而且,土耳其虽然有关国的军事援助,但 1949 年仍然在把总预算的百分之三十九用于国防方面(土耳其政府:《关于土耳其 1950—1951 年和 1951—1952 年度计划,致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备忘录汇编》(TurkishGov-ernment:GeneralMemoradumforO.E.E.C.,Turkey:1950—1951and1951—1952Programmes),巴黎,欧洲经济合作组织,1950 年,油印本,第 25—27 页、第

来的是一百多名高级将领强制退休，这就为美国人最近培养出来的年青的技术专家创造了晋升的机会。有个美国通讯记者的报道，范围更广了，也许还带一点乐观的口气，他说：由于自身安全的巩固和对美国友谊的坚定信念，土耳其 45 的新信心正在开花结果，使民主倾向强化了，而这种强化，甚至官方的反对党也承认，已从政治上和公民自由方面给土耳其带来了“新面貌”。

新闻传正在重新修订，以保护报纸刊登批评的合法权利，只要这种批评不犯叛国罪。选举法正在重新起草，以保证自由和民主的选举。对少数民族（主要是对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歧视，也确实有所改善。

虽然公民权利方面的这些收获，并不是美国援助土耳其的当前的目的，但却是这种援助的直接结果，因所以说没有这种援助，就不会有这些收获，也不为过分。1947 年夏，伊诺努总统企图使执政党（共和人民党）同作为反对党的民主党进行和解，或者至少也要缓和一下双方势不两立的局面，但是失败了。7 月，他私下透露了他的意图，想放弃他从阿塔图克继承下来的、既是共和人民党领袖又（看来当然）是国家首脑的那种双重身分的地位，并想今后只当共和国总统，不偏不倚地发挥作用。1947 年 9 月，由于内阁阁员的辞职以及共和人民党的议会党团中形成了一个四十多个议员（其中大部分是年青人）所组成的“进步”集团，保守派总理雷杰普·佩凯尔被迫下台，由外交部长哈桑·萨卡组成了新的政府。萨卡换掉了原佩凯尔内阁中的几个“死硬”分子，起用了进步派的几个年青人物。1948 年 6 月，议会和报纸对某些部长的经济政策的批评，造成了萨卡内阁的改组。改组后的内阁又添了几个原批评政府的人物，使其成员包括了四个四十五岁以下的部长。但是有关国民经济的各部部长却继续被生活费用上涨问题搞得焦头烂额，而共和人民党内部“进步派”和死硬的“极端派”之间的纠纷却有增无已，直闹到

---

54—62 页]。

见阿比丹·达韦：“美国朋友应当懂得这点！”（AbidinDaver：“L’Ameriqueamiedoitlecomprendre！”），《共和国报》，1949 年 7 月 15 日；“美国的安全和土耳其”（“LaSecuritedel’AmeriqueetlaTurquie”），同上，1949 年 8 月 1 日。参阅托马斯和弗赖伊：《美国、土耳其和伊朗》，第 128 页。据报道，当 1948 年 4 月希腊和土耳其对两者间的友好条约再度予以肯定时，安卡拉却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希腊人要求缔结军事同盟的建议（霍默·比加特（HomerBigart）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的文章，1949 年 4 月 15 日）。

“不哭的孩子吃不上奶”（“Aglamayncoeugamemevermezler”），阿比丹·达韦在《共和国报》上的文章，1946 年 6 月 17 日。

“要我们接受的装备，是七、八年前试制出来的原始的东西，大战最后几年才大量生产，在美国武装部队中这种装备现在已陈旧过时；所以，名义上美国是把二千五百万美元的军援给了我们，而事实上则是把这笔钱花在为其武装部队生产新的装备方面了。……麦克·布赖德将军可能满足于这种援助，满足于继续按照同样的缓慢步伐进行下去，但是我们不得不把这件事的真相公开地摊出来……以证明美国的援助是不够的。我们坚决要新武器和斩装备。”（《共和国报》，1950 年 7 月 26 日）

路易斯·v·托马斯对国外美国专家的那种倾向提出了警告：不要以为自己是专家就冲昏了头脑。例如，在土耳其工作的美国农业专家（还不要谈那些从未在土耳其工作过的或者仅在那儿呆一两个星期的专家们）就硬说，“如果我们干了甲这件事，那么乙这件事就会随之而来。可是听者却会立刻发现，他的意思究竟是指：（一）如果甲这件事是在衣阿华做的（或者是在乌干达做的，或者在任何其他工作的地方做的，都是一样），那么乙这件事就会随之而来。或者还是指：（二）根据在土耳其的充分经验，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在那里做了甲这件事，那么乙这件事就会随之而来。只有他的意思是指（二）而言的时候，对土耳其来说这个人才算是真正的专家。”（托马斯和弗赖伊：《美国、土耳其和伊朗》，第 149 页）

哈桑”萨卡 1949 年 1 月被迫下台为 46 止。共和人民党副主席塞姆斯丁·居纳尔塔伊组成了从性质上说是进步力量占优势的新内阁，并在自由选举和出版自由 方面提出了保证。可是到了 6 月，经济部长又辞职了，显然是因为他不能从欧洲复兴计划方面为土耳其捞到更大一笔援助而受到了批评。19 托年 10 月的补选，受到了反对党的抵制。作为它的一部分政策，反对党以抵制来抗议，说它受到排斥，在监督选举行动一事中没有占到一个份儿。这次补选的投票率非常低，是对共和人民党政权日益不满（尤其是在城市里）的一个标志。

内吉梅丁·萨达克当《晚报》编辑的时候，原是共和人民党“进步派”中一个批评雷杰普·佩凯尔政府的人物，现在高升，当上了哈桑·萨卡政府的外交部长。当 1948 年 6 月 30 日美国舰队正在访问伊斯坦布尔时，他在一个招待会上宣称，由于土耳其早已“不止是”美国的“盟国”了，所以，如果美国认为法律上是可能的话、土耳其政府愿意通过同盟的形式把这些关系更加正式地和有效地具体化起来。7 月 2 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记者招待会上加以评论说，美国正在“大力”援助土耳其，而且对它能保持一个自由和独立的政府一事深感兴趣，但是这样的正式同盟则会牵涉到美国整个外交政策方面和美国“事实上同每一个其他国家”的关系方面的种种考虑。

在华盛顿的婉言谢绝之后不久，苏联方面就多少带着几分丑态出场了——开始向上土耳其递送秋波。过去有十八个月，苏联没有向驻土耳其大使馆派遣大使，大使馆的事务只由一个代办来主持，直到 1948 年 2 月 24 日亚历山大·拉夫里谢夫才彼任命为驻土大使。美国的一个新闻记者早从这件事上看到了苏联的意图，即想利用土耳其对美国军事和经济援助规模的不满一事乘虚而入。但是这件事给土耳其人留下了什么印象，却看不出来。11 月 17 日，在苏联大使馆为庆祝俄国革命周年所举行的招待会上，拉夫里谢夫也许是公然要使土耳其总理为难。根据这次事件的最详尽的记载：快到午夜的时候，他

---

在经济领域里的问题，参阅《欧洲复兴计划：土耳其》，第 40 页：“由于 [土耳其要求美国供应的] 大部分器材……就其用途来说，是包括在土耳其政府所制定的各种各样基本建设计划之内的东西，以及由于这些计划的进行不但目前赶不上进度，而且这些计划的大部分经济合作总署还不曾批准，所以，实际上要用或要买的的东西，还不是按照原来估计的那么大的数量……土耳其经济发展中的一项严重缺陷，是几乎完全没有成本会计制度，或者说完全没有成本的概念。”（罗伯特·W·克尔温在《中东杂志》上的文章，1950 年 4 月，第 4 卷，第 207 页）

《泰晤士报》驻伊斯坦布尔记者的文章：“转变中的土耳其”（“Tur - keyinTransition”），1949 年 8 月 17 日。

《泰晤士报》驻伊斯坦布尔记者的文章：“转变中的土耳其”，1949 年 8 月 17 日。

除了一个自由主义的民主党外，1948 年 7 月。又正式成立了一个右翼的国民党，但后者在 1950 年的选举中只拿到一个席位和二十四万张选票（见下文，原著第 53—54 页）。

约瑟夫·G·哈里森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的文章，1949 年 4 月 2 日。

见《泰晤士报》驻土耳其记者的文章：“土耳其的政治斗争：执政党的裂痕”（“Turkish Political Struggle in the Governing party”），1947 年 9 月 30 日。

政府企图在“不低于成本”的基础上规定物价以控制生活费用的上涨，却有时被零售商人巧妙地钻了空子。零售商人暗中勾结起来，只在货物已在零售辛迪加中周转过之后方拿到市面上出售，这样每一个零售商人在其经手过程中拿到一份合法利润【H·C·霍尼：《土英字典》（H.C.394 页，见“zincirleme”一词的解释）

坚持要为哈桑·萨卡的告别再“干一杯”伏特加。然后，一群新闻记者和其他的人就听到他用不大的声音问 47 道：“究竟是准把美国人带到了土耳其的呢？你还记得在阿塔图克时候和你们独立战争时候俄土两国的那种友谊吗？”根据某些记载，他接着又说：“你必须知道，苏联军队一天从德国人那里缴获的坦克就比美国人给你们的坦克多一倍。我们有共同的疆界和共同的利益。为什么你们让陌生人介入到我们中间来呢？”土耳其人有一个“鼓舞人心”的传说：他的这一席话使哈桑·萨卡听了有点冒火，回答说：这个责任是在苏联一方，因为苏联威胁了土耳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可是，有许多评论员则认为，另外还有一种传说倒是似乎可能的，即萨卡对他的这种违反外交惯例的挑拨离间手段没有理睬。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政府对俄国正教教会采取了宽客的政策，为选出新的莫斯科大主教而重新恢复了宗教会议，目的就是压低下君士坦丁堡的普世基督教大主教的职权的办法，来提高莫斯科大主教的职权在俄国以外正教教会中的威望。然而，与此同时，冷战似乎也牵连到普世基督教大主教本人和他所采取的政策。马克西莫斯五世 1946 年当选为普世基督教大主教时，只有五十一岁，那么年青是很不寻常的。据说，苏联政府当时是支持他的，但是后来由于他要保持“严格的中立”态度，也对他失望了。至于土耳其政府（这个政府在共和国初期打退希腊人入侵后的年代里，却使这位代表拜占庭希腊精神的大主教的日子很不好过），也对他有所不满，因为他表现得反共不够积极。据说，这种两面夹攻的压力是他 1948 年害了神经衰弱症的原因——如果这不是一个借口的话——使他非辞职不可。不管怎么说，他的辞职是推迟了。这时，土耳其期刊《米勒特》就对宗教会议提出警告说：如果它不肯把宗教传统抛在一边，并对大主教施加压力促其辞职，那么，它自身也会有嫌疑。1948 年 10 月 18 日，他终于辞了职。11 月 1 日，由十七个本土耳其国内教区的主教组成的宗教会议开始选举马克西莫斯五世的继承人。土耳其政府支持的候选人是全美大主教阿瑟纳戈拉斯。在过去二大年中，阿瑟纳戈拉斯一直 48 是一个突出的人物，“作出了一项看来几乎是无法作到的事——撮美洲各国的正教团体都团结起来了”。不过要把他选出来，形式上

---

“极端派”一词原文采用的是 ifratcl，来自阿拉伯文抽象名词 ifrat，有“过分”的意思。另一方面，通常采用的阿拉伯词则是 mutatarraf，为派生动词 tarraf 的分词，意即“走在边上”（见《现代东方》，1948 年 1—3 月合订本，第 12 页；伯纳德·刘易斯：《阿拉伯文外交政治用语手册》（Handbook of Diplomatic and Political Arabic），伦敦，卢扎克，1947 年版，第 5 页）。

见《格拉斯哥先驱报》（Glasgow Herald），1949 年 2 月 21 日。

见“土耳其建国二十五周年”（“Tufkey's Silver Jubilee”），《经济学家》，1948 年 10 月 23 日，第 667 页。土耳其的补选并不是由于需要随时举行的，而是每隔一个规定的时候就举行一次，以填补上次选举后出现的空额。

C·L·苏兹贝格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1948 年 7 月 1 日。

见《纽约时报》，1948 年 7 月 3 日。

拉夫里谢夫曾任苏联驻保加利亚公使，外交部巴尔干事务司司长，并在 1947 年任联合国关于希腊边界事件调查委员会的苏联首席代表。

A·C·塞奇威克（A.C. Sedgwick）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1948 年 4 月 9 日。

阿尔菲奥·鲁索（Alfio Russo）在《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上的文章，1949 年 1 月 2 日。

也有困难，因为土耳其共和国历来要求大主教一职应由土耳其人担任，而网瑟纳戈拉斯则于 1938 年拿到了美国公民证。不过，他是生在埃皮鲁斯的，而埃皮鲁斯当时却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所以，他就合法地拿到了宗教会议的十一张选他的票，而其他六张则是空白的。接着，这位新大主教正式被授予了土耳其的国籍。有的报道说，他曾在华盛顿讲过，这件事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而在内心深处他还是保留着美国国籍的。在他离开美国时，他宣称，他确信美国将会“给世界带来它在为维护人类良由的尊严而进行的斗争中听需要的精神和道义上的力量”。遗憾的是他现在正要离开这块“福地”了。不过，他正把“一个希望”带往中东，“这就是“你们这里所享有的四大良由就可能成为世界的四大自由了”。杜鲁门最近再次当选为总统后的就职演说，将“为一个新的反对暴政的攻势开辟道路”，而且也是“给铁幕后的世界以希望和鼓舞的一次讲话”。杜鲁门总统还特地为他的这次旅行准备了一架由美国空军人员驾驶的飞机。他的就职仪式于 1949 年 1 月 27 日举行，苏联集团的国家没有派代表参加。但是在庆祝他当大主教而举行的首次礼拜仪式上，美国大西洋和地中海舰队的总司令以及美国、英国和希腊的大使都出席了。1949 年 7 月，他也仿照罗马教皇的例子，发布谕令把所有支持共

产主义的人都逐出教门。

1948 年 9 月 15 日，一年前逃出匈牙利以后寄居在美国的前匈牙利总理费伦茨·纳吉拿着一张美国护照到了伊斯坦布尔，表面上是作为一家美国杂志的通讯记者来的。可是上土耳其报纸却报道说，他来的目的是想把巴尔干各国逃出来的难民组织到一个共同反共阵线里面。9 月 19 日，莫斯科电台谴责他说，“在美国特务机关的唆使和 49 怂恿下”，他想煽起铁幕后的恐怖活动和破坏活动。上土耳其政府随即也发表了一项公报，说是政府已下令把从事反对别的国家的政治活动的人们都驱逐出境。于是纳吉就悄悄地又溜回到西方去了。1949 年 4 月，《真理报》从一件事里又嗅到了特务活动的臭味。这就是一个退休的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传教士和一个伦敦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院士这时候分别组织了两个探险队去调查一份报告中所说的情况。该报告说，在一万六千九百英尺高的阿勒山（即传统所说的阿拉拉特山，位于同苏联和波斯相毗邻的土耳其边界上的斜坡处），有一块地方的积雪反常地完全融化了，一个库尔德人发现了“看来是一条船的化石遗物”。那些相信《旧

---

根据 1948 年 11 月 23 日和 24 日《共和国报》的报道，拉夫里谢夫曾经说过，土耳其从美国获得的五百辆坦克和五百架飞机，即使仅用之于军事检阅几乎也是不够的。

鲁索，前引文。

普世基督教大主教，是土耳其东正教大主教的称谓（天主教认为东正教属于新教系统，而基督教则认为属于天主教系统），亦即自命为东正教之首的意思。俄国、希腊等国东正教都想与其分庭抗礼，其中明争暗斗甚多，本段即其一例。——译者

见《概览，1939—1946 年：战时中东》，第 495—496 页。

见《概览，1925 年》，第 2 卷，第 266—272 页。

见康斯坦丁·阿吉里斯 (Constantine Argyris) 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的文章，1948 年 4 月 23 日；《埃及金融市场报》，1948 年 7 月 21 日，引自土耳其《最后邮报》；马克·马尔索 (Marc Marceau) 在《世界报》上的文章，1948 年 11 月 24 日。

转引自《埃及金融市场报》，1948 年 10 月 7 日。



约全书》中句句都是真实的人们所作的解释是，它只可能是诺亚方舟，而不可能是别的东西。《纽约先驱论坛报》描绘这件事所用的词句是“多少有点古怪的探险队”和“这桩明明白白异想天开的勾当”。《真理报》的评论员则疑心——或许不无理由——它是心里怀有特务意图而“手里捧着《圣经》的假面舞会”。筹备中的英国探险队的组织者（将由一个十九岁的荷兰学生陪同），由于土耳其政府拒绝发给他们到这个战略地区去的护照，最后是屈服了。但是他的那位美国竞争者则比较固执，而且口袋里现钞也多得多。所以尽管国务院加以阻止，E·艾伦·史密斯博士和他四个青年助手还是坐飞机到了土耳其。他们不但消除了土耳其政府的不安，而且后者还派了一个土耳其向导带他到山的斜坡处进行考察。可是不久，他们就从那里筋疲力尽地返回美国去了一只发现了他们从事的工作过于艰巨，他们的身体素质和登山经验不能胜任。

与此同时，在苏土关系史中也出现了更为严重的事件。当苏联驻安卡拉大使馆的一名官员被强迫押解回国的时候，据说该官员的穆斯林出身的妻子跑到土耳其政府那里请求避难。1949年5月，苏联大使馆说收到她的一封信，要求从上土耳其警察局的“扣押”中“开释”出来，但是土耳其内政部却拒绝把她引渡给苏联大使馆。5月31日，苏联外交部通知土耳其驻莫斯科大使说，前一天土耳其

其的一个外交信使单身搭火车从莫斯科往安卡拉途经外高加索时自杀，死于苏联边境内一百五十英里一个叫做50索契地方的医院里。至少可以说，这两件事凑在一起显然太巧了。上土耳其政府对于这个信使的死亡原因所抱的怀疑态度，在授予死者以英雄称号并派遣九名高级将领参加他的葬礼一事中，表现了出来。

1947年12月，属于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五千名安卡拉大学的学生举行了一次激烈的示威游行，要求开除三名在美国受过教育的教师，指控他们搞共产主义活动，并且以同样的罪名从该大学校长那里勒索到一份书面的辞职信，而其罪名显然是以他二十五年前写的一篇文章作为根据的。当这三个受嫌疑的教师事件提交到大学联席会议上审议时，比较老成持重的伊斯坦布尔大学代表认为控诉的证据不足，而代表安卡拉大学的少数派则认为他们有罪，据说还企图对他们采取停职的行政措施。在土耳其与保加利亚接壤的边界上，双方都有巡逻队严加防守，但对于在两国之间往来的特务或逃亡者来说，仍有可乘之机。1949年6月，土耳其政府加重了对颠覆活动的刑事处分。另一方面，土耳其反共编辑中的一个领导人物发动了一个运动，要求重

---

阿吉里斯，前引文。

在奥斯曼帝国米勒特制度下，普世基督教大主教当然算是正教米勒特制度下的一个奥斯曼臣民。

《纽约时报》，1948年12月17日。

同上，1949年1月24日。

《希腊公报》（Greek Bulletin），伦敦，1949年2月16日。关于“左派”对这件事的讲法，见阿斯拉·亨巴拉西：“巴尔干政治中的土耳其”，《新中欧观察家报》（“Turkey in Balkan Politics”，New Central Europe Observer），1949年5月28日，第2卷，第124—125页。

《共和国报》，1948年9月17日；《纽约时报》，1948年9月20日。

这位院士据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当过英国驻华沙公使馆助理商务参赞和英国驻德黑兰公使馆负责交通事务的官员，虽然当时他的名字还不见于《外交部名册》（Foreign Office List）。

新审查著名诗人纳津·希克梅特的案件。据说，希克梅特承认是共产党人，他的著作败坏了武装部队的士气，因而在1937年被判处二十八年徒刑。他的判决不但明显过重，而且对于判决所根据的那项法律是否有效一事，有人也表示了种种怀疑。在经51天十九天的绝食而他的支持者又同反共学生发动了一场严重冲突之后，他受到了特赦，于1950年7月15日获释。然后于1951年6月，他逃往苏联。

1949年初，西方为缔结北大西洋公约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土耳其和希腊政府作为美国军事援助的受援国，自然对此发生兴趣。2月，土耳其外交部长内吉梅丁·萨达克在动身前往伦敦和巴黎前声称，虽然土耳其参加这个筹划中的地区性的大西洋公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的兴趣却在于建立一个包括土耳其、希腊、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在内的地中海安全体系，他还补充一句说，土耳其参加巴勒斯坦调解委员会是由于真诚地希望看到一年多来毒化了中东的阿拉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冲突能够解决。希腊外交部长也表示了同样的兴趣；在萨达克与贝文和法国外交部长罗贝尔·舒曼举行会谈之后，《泰晤士报》在一篇重要文章中用同情的口吻评论说，希腊和土耳其政府希望这个新的公约不至于影响对它们商国的供给和援助，这种希望得到保证的心情是很自然的。然而，北大西洋公约的全文公布时，却把意大利以及阿尔及利亚的三个北部省也包括了进去。为此，土耳其执政党的机关报《民族报》于3月26日发表了一篇非常不满的文章。在那篇文章中，佩亚米·萨法声称：“由于西方所组织的安全体系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同样也可以不把它放在眼里。这样，我们的外交政策反倒有了自由和灵活性，得以适应我们邻国的谅解。”一旦第三次世界大战在世界其他地区爆发，土耳其是可以避免牵涉进去的。美国答应给土耳其的一切，不过是“两个星期的抵抗”，继之而来的则是“被占领的岁月，在此期间土耳其不得不冒着一半土耳其的城市被摧毁，一半土耳其居民被消灭，而让另一半剩下的居民变成布尔什维克的那种风险，来等待西方盟国的卷土重来”。然而，两天之后，《民族报》又发表了另一篇文章，说：头一篇文章代表的只是个人的观点，而该报也不是直接属于政府或外交部的机构。观察者却不相信最初的这篇文章没有官方的批

---

美联社驻伊斯坦布尔记者报道，1948年11月13日。

《纽约先驱论坛报》，1949年4月14日。

见《经济学家》1949年3月6日，第291页。

《共和国报》，1949年5月29日—6月2日。

《共和国报》：1949年6月3日和4日；《纽约时报》，1949年6月14日。

纳迪尔·纳迪（Nadir Nadi）对这件事有一段评论说（《共和国报》，1948年2月25日）：“当英国丘吉尔下台由工党取而代之的时候，我们执政党的一个著名作家在报纸上写道：‘我们比英国工党更左，因为我们搞煤矿和铁路的国有化在他们之前。’有一个时期，主张向左靠拢和希望国有化成了一种风尚，尽管肯定不采用这种荒唐可笑的方式。后来，随着尼龙袜子的出现，一种个人主义支配了我们的社会结构。这好象我们从一个极端倒向了另一个极端。”

土保的摩擦也是由于彼此侵犯领空事件引起的。1948年2月9日，两架土耳其的英制喷火式战斗机在距土耳其边界以北三十五英里的保加利亚海岸城市索佐波尔的上空被击落。6月底，保加利亚一架客机上的乘客劫持了座机，在土耳其领土上降落。土耳其政府不顾他们的愿望，拒绝把他们遣返回国。关于1950年初保加利亚政府把国内大部分土耳其少数民族驱逐出境一事的决定，见M.P.：“关于土耳其少数民族被逐出保加利亚的事件”（M.P.：，“The Expulsion of the Turkish Minority from Bulgaria”），《今日世界》，1951

准居然会刊登了出来。但是土耳其的其他报纸则很快就把《民族报》52的这种中立假象揭穿了。土耳其外交部长在动身访问美国之前宣称：关于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不負責任的意见是不加以考虑的”，他在议会里已对外交政策作了说明：“土耳其如果受到攻击，当用一切手段保卫它自己；但如果受到攻击的是另一个国家，土耳其则将根据其条约上的义务而决定其态度。”当他在美国时，他对美国驻德军政府慕尼黑机构的代表间接地提到上一年7月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拒绝他要求同美国缔结正式同盟的那件事，他说：“应当认识到；土耳其同美国彼此还没有达成任何明文规定的条约关系……土耳其人不是‘条约迷’；诚实的人们满足于握握手就一言为定了；所以，为了使我们自己安心，我们倒不拘泥于要有一个正式的条约……然而我也必须说，土耳其人民对于土耳其还没有被包括在西欧安全体系之内这件事却是关心的……”然后，他作出结论说，虽然土耳其“不参加集体安全体系也完全能够保卫它的自由和独立”，但“如果正式使一个可能从事侵略的国家知道土耳其是受到一个它与其他自由国家所签订的互助公约的支持的”，那么，它“就会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处于一个更加无可比拟的优越地位。”虽然萨达克把杜鲁门总统的一些安抚的话带回了土耳其，但在7月，美国反对党的两个参议员（参议员辩论北大西洋公约期间）在赞成土耳其进入北约组织时讲53的一些话，却重新勾起了土耳其原来在这个问题上的那种不满。无论如何，欧洲委员会在8月初的第一次会议上接纳土耳其和希腊入会一事，是受到了欢迎的，虽然安卡拉一些反对党派的批评者把这事描绘成安慰奖；而过去由于土耳其被排斥于北约组织之外所引起的那种愤感情绪也暂时消退了。1950年3月初，美国地中海舰队的分舰队对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进行了访问，这也加强了土耳其的信心。但是在3月23日，即土耳其外交部长准备次日启程赴罗马同意大利签订友好条约的时候，他再次强调了地中海同

---

年1月，第7卷，第30—36页。

如有“任何集团从事一个社会阶级控制或压制另一个社会阶级，或从事颠覆当前的社会和经济秩序……以及如有任何集团反对共和制度，或从事压制或削弱民族情绪等活动”者，将对其成员依法惩处（《伊斯坦布尔报》，1949年6月10日，转引自《现代东方季刊》，1949年第2—3季度合订本，1949年，第18—19期，第167页）。同样，1946年7月伊斯梅尔·西德基政府所颁布的埃及王国法令也对一些“目的在于使一个社会阶级凌驾于另一个社会阶级之上或者目的在于改变国家的经济或社会结构的”组织，给以刑事处罚〔《巴勒斯坦邮报》（Palestine Post），1946年7月11日〕。

《纽约时》，1949年10月2日。

《共和国报》，1950年5月16日。刘易斯·V·托马斯评论这种示威说：“这是不是意味着，土耳其大学里的人们……在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也沾染上了许多欧洲国家中大学暴动群众的沙文主义的种种特点呢？……毫无疑问，他们中有些人可能还会沿着这条冒冒失失和灾难性的道路滑下去……成为在政治舞台幕后活动的成年人的工具。……而土耳其的一些好心人，却发现无理由认为这个问题较今日国内其他任何一个征兆更能使人谈虎色变。”（托马斯和弗赖伊：《美国、土耳其和伊朗》，第111—112页）

《苏联新闻》，1951年7月6日。

《泰晤士报》，1949年2月10日；《埃及金融市场报》，1949年2月14日；又见“建立一个东方集团的计划”（“projetdecreationd'unblooriental”）：《现代东方季刊》，1949年第1季度，第17期，第37—38页。关于巴勒斯坦调解委员会，见下文，原著第290页。

转引自《现代东方季刊》，1949年第2—3季度，第18—19期，第170—171页；并转引自阿斯兰·亨巴拉西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1949年3月28日。

盟的必要性，而这个同盟不但“一定要建立在有美国参加的基础上，而且当然还有土耳其——由于它所处的关键性战略地位。自然，也要包括英国和法国在内”。5月11日，在美、英、法外交部长会议的前夕，据报道说土耳其政府曾要求把土耳其包括在北约组织之内，同时还加上一段评论说，当阿拉伯诸国同以色列在法律上仍处于战争状态之中、当阿拉伯国家联盟本身由于彼此不和显然四分五裂，而1936年英埃条约还没有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替代物的时候，东地中海防御公约的形成是不可能实现的。<sup>54</sup>土耳其的民主党在1950年5月14日的普选中以压倒的多数取得了胜利，从而取代了土耳其共和国建国以来连续执政二十七年的共和人民党的统治。这次胜利之来，使几乎所有的外国观察家都大吃一惊，因为他们虽然承认“土耳其人民对于在英雄年代的紧张阶段之后逐渐‘走下坡路’的那个政权所表现的越来越大的不满情绪”，却不相信这个执政党长期建立起来的政治影响甚至在一次真正的自由选举中也不能再次获得成功。很自然，意大利共产党的《团结报》（5月21日）就作了结论说，美国对于这次选举的结果是施加了影响的，以便把土耳其政府“这块政治招牌民主化”，并把一个誓将对经济活动的国家控制（它是即将下台的共和人民党政权的特征）予以自由化的政党推上台。但是一个比较客观的、消息非常灵通的、研究土耳其问题的人则说：“毫无疑问，美国近三年中施加了强大的压力来支持私人企业和反对国家社会主义，而共和人民党政府在这方面的动向无疑大半是根据美国的贷款条件和美国顾问的意见行事的。但是有人说美国因为赞成政治变革而采取了直接行动；对这种议论，我却找不到事实上的根据。顶多也只能说，他们帮助创造了一种有利的氛围。”他指出，使执政党不影响选举的自由“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五年来走向民主的一系列步骤中的最后一步”，而出版的自由化就是另一个例子。土耳其的统治者不见得是为了取悦于一个外国而改变其政府形式的、也不会那么幼稚，竟相信土耳其扩大或阻止国内的民主自由，会对华盛顿发生很大的作用，乃至影响其作出帮助或者不帮助土耳其的那种决定。但是在政府仅仅为了有利可图的原因而要想取悦于西方的背景之下，一般说来，土耳其国内也存在有亲西方的因而也是亲良主的种种迹象。这种表现，在最下层，流行的是在博斯普鲁斯的海滩上和伊斯坦布尔的街道上，嚼着口香糖和穿着豹皮花纹衬衫；在最高层，是在大学、学校和家里学习<sup>55</sup>

---

越来越多的批评迫使《民族报》不得不请这篇文章的作者“加以澄清”。……这位作者则说他的观点被误解了……他的文章……是“由于我们所有的报纸因土耳其被排挤出公约之外而表达出的民族忧虑和愤恨的结果，并不是‘为全面的孤立主义政策作辩护’。然后，他又转到……为自己辩护的方面，‘辛酸地抱怨说’，土耳其已被‘打入孤立主义的冷宫’，而‘我们伟大的西方朋友们对此也不能逃避道义上的责任’”（《基督教学箴言报》特派记者报道，1949年4月9日）。

《泰晤士报》，1949年4月2日。此处提到的条约义务只牵涉到1948年4月5日重申有效的土希战前友好公约和1939年10月与英法签订的互助公约；而关于后一个公约，英法政府直到1949年6月才重申继续生效（《共和国报》，1949年6月17日）。

见上文，原著第46页。

《新报》（DieNenezeitung）1949年4月21日。土耳其希冀从美国获得书面保证一事，的确是象他这里所说的那样；所以有些方面就建者与英法签订的1939年公约中，删掉规定在战争发生时土耳其不介入对俄战争的那项条款（较全面的说明见《概览，1939—1946年：作战中的角逐》；参阅《世界报》，1949年5月20日；《共和国报》，1949年6月17日）。

英美的语言、文学和历史……许多不同的因素促成了亲西方感情的增长。一方面，“美国取德国而代之，成了主要大国，从而也就成立了抗拒自古以来俄国威胁的标兵。另一方面，西方的胜利的事业以及由此而来的威望，联系到西方的制度和习惯方面，不可避免地也产生了吸引力。不过，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在共和国的学校和大学里，新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他们虽然接受了基马尔革命的主要目标，但是却把这些都看成是早已完成了的东西。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民族主义了。对于他们来说，西方自由的传统具有浓厚的吸引力；民主也不仅仅是暂时性政治上的整顿或者是改变风尚的问题，而是一种最美好的希望，即在一个自由世界中，立足于平等和自尊的基础之上，实现土耳其文化上和政治上的统一。

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已经成为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威胁的那种国际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了。在这个时候总结三年来美国援助土耳其的经验教训，美国人和土耳其人双方都知道、土耳其军事和经济结构的现代化过程比“原先预计的要长得多”。对此，一个美国海军中校很快就发表了他的看法：关于应当作出时间安排和加以计划的援助方案，其期限不是两年，不是五年，而是一代！这是我们可以帮助土耳其人的唯一的办法，以便使其一步步地改变传统的旧观念，并使其获得关于它所生活的技术世界所特有的现代观点。这种趋向确是已经定了下来。完成这个转变，需要的是时间。

同时，群众中有一种强烈倾向，要求实质上恢复穆斯林的传统宗教活动——它虽被阿塔图克的世俗立法“废除”，但并未实际上绝迹，而共和人民党和民主党的新政府都不得不加以同意。阿塔图克当时的意图是：在集体和个人的意识中，对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崇拜都应当凌驾于对伊斯兰教的崇拜之上。可是有些敏感的土耳其教育家却开始察觉，不管民族主义受到了多么热情的宣传，但不能填补年青知识界精神上和伦理上的一片空虚。由于没有更好的东西以资代替，他们可能从共产主义这种假宗教中去寻找满足。无论如何，战后土耳其最热衷于把伊斯兰教恢复到过去那样的地位的人们，看来也象那些波旁王朝人物一样，都是些宗教狂，过去三十年来，他们既没有学到任何东西，也没忘掉任何东西。一些老资格的西方观察家对于这一运动可能

---

《国会记录》，1949年7月18日，第9624—9625页。“这个问题的最重要方面是：我们的美国朋友日益知道，一个强大的土耳其对美国自身的安全来说也是生死攸关的。……我们对民主阵营的感情将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公约的形式，成为和平的保证、而一旦战争来临，也将成为胜利的保证。”（阿比丹·达韦在《共和国报》上的文章，1949年7月23日）

《泰晤士报》（1949年8月10日的社论）对接纳土耳其是否妥当提出了疑问，见卡西姆·居莱克（KasimGülek）的反驳，同上，1949年8月18日。

《纽约时报》驻伊斯坦布尔记者的报道，1949年8月7日。反对党派曾对所谓不公平的选举制度提出抗议，拒绝参加出国代表团，这就使当时土耳其代表团全部由清一色的共和人民党政府人员组成（《泰晤士报》，1949年8月12日）。对于土耳其，欧洲委员会的某些成员国提出了不少的疑问：土耳其既是一个穆斯林占绝对多数的国家，是否“也享有其他成员国那样的传统，作为其进步工具的土耳其政府的类型，是否符合其他成员国关于法律原则的解释？”（《曼彻斯特卫报》驻斯特拉斯堡记者的报道，1949年8月10日）对于这些疑问，一个身为作家的土耳其领导人深有体会地说：“政教分离、自由和民主”是和欧洲各国同化的三项原则，土耳其必须遵循（纳迪尔·纳迪在《共和国报》上的文章，1949年8月13日）。

阿比丹·达韦报道了他在访问伦敦期间所获得的保证；土耳其一无所失，也没有对远方的国家承担什么新的义务（《共和国报》，1949年12月9日）。

具有消极的反动性质一事，开始担心起来。事实上，土耳其在当前世界上的立足点问题的实质已经被菲利普·托因比抓住了，他指出：西方化还没有触及到基本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仍然是顽固地中东式的。比起埃及或伊朗来，它是这种模式的温和的变型，不过政治上的变革并不曾改变了这种模式。……虽然有人会说，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在某些方面反倒是好不容易地走到了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的前面，但是这种结构决不会使土耳其变成一个没有把握的军事国家。如有必要，土耳其人将下决心艰苦地战斗下去；如果他们竟然被打败，那也决不会是由于任何内部的瓦解或动乱。 —

## 第二章 波斯

### 第一节 冷战，拒绝苏联的石油要求， 1945—1947年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结束，英国、苏联和美国的部队仍旧占领着波斯的时候，那个国家却已处于一种内部冲突的局面，它脖陇地预示着象五年后将在朝鲜爆发的那样一场战争。在这场本国内部对抗力量的冲突中，一方是革命的伊朗人民党及其劳工组织——统一工会中央理事会、（这两者在战争期间由于苏联当局的鼓励，特别是在苏联占领的北部地区和首都，早就非常活跃），另一方是控制着政府和行政机构的波斯有产阶级所操纵的各种力量。双方在使用暴力和恐怖来反对其对手方面，都没表现出丝毫的节制。总参谋长哈桑·阿尔法将军掌握着反对伊朗人民党的各种力量的组织和指挥权，他有一个英国妻子，所以成了伊朗人民党和苏联宣传家们的一个现成活靶子；然而，由于苏联一系列政策的结果，到1945年夏季，在苏联占领的北方各省中，波斯政府的权力实际上已降低到零。在那个地区，伊朗人民党控制着主要的城镇、交通、警察和监狱，在监狱里他们用传统的方对波斯表示亲善的姿态，但是莫洛托夫说，他的政府需要时间来考虑这个建议。不过，在波茨坦会议（1945年7月17日至3月2日）上仍达成了协议，即占领部队应立即从德黑兰撤出，将来进一步的撤出，由三国外长于9月间在伦敦会晤时再行考虑。据报告，首都的撤兵在9月底之前按时完成，尽管后来据说俄国人在那里还有几千名便衣人员。其间，美国政府于8月28日单方面宣布，除去大约有二千名人员须暂时留下以维护和看守军用设施外，他们的军队将于11月1日之前从波斯撤出。从与日本停战之日算起，英苏军队应在六个月内从波斯撤出，这个时限将于1946年3月2日到期。1945年9月，三国外长在伦敦会昭的时候，贝文在19日给莫洛托夫的一封信中曾建议：除英国部队在南部油田地区和苏联部队在阿塞拜疆可以继续留驻到1946年3月2日之外，他们两国政府应该同意：他们各自的部队在12月中旬以前从整个波斯撤出。但是，莫洛托夫答复时顽固地坚持那个约定的日期，只是说，“如果必要，最后撤出的计划……在所说时间快到的时候，我们之间可以再讨论”，他认为不需要由三国外长来讨论这个问题。当时已有近四十年历史

---

见阿比丹·达韦：“为了中东的安全”（“pour la securite du Moyen-Orient”），《共和国报》，1950年5月11日。1949年3月，土耳其愚弄了阿拉伯国家联盟，成为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穆斯林国家；同年12月，彼此互派了外交代表，接着于1950年7月又签订了一个贸易协定。

《泰晤士报》让论，1950年5月16日。后来，菲利普·托因比（Philip Toynbee）写道，共和人民党“已变成腐败不堪、麻木不仁的官僚主义、自鸣得意和用人唯亲了。无人怀疑这个政党早期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在其掌权的最后几年中，它的地位已经江河日下，它的理想已经荡然无存，它的精力已经消磨殆尽”（《苏格兰人报》，1950年11月11日）。

显然，只有埃贡·卡斯克利内（Egon Kaedeline）一个人才这么写（《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50年5月11日）：“某些观察家竟敢预言，共和人民党……会被赶下台”。但是马克·马尔索（《世界报》，5月13日）也代表一般的看法说，共和人民党应能获得三百个席位左右。事实上，共和人民党只获得了六十九个席位，而民主党人和十名其他人士则获得了四百零八席。百分之五十三点六的选民支持了民主党人，但百分之四十则支持了共和党人；选民的投票率是百分之八十八点九（《曼彻斯特卫报》，1950年5月23

的波斯宪法，规定要建立省议会，但是事实上任何事情都不曾做过。然而，到了1945年初，伊朗人民党的几种报纸为争取成立省议会开展了一个运动，其动机可以从他们的论据中看出。他们争辩说，虽然阿塞拜疆人民在1943年的普选中投票选了伊朗人民党的党员，从而“表明反动派对他们的影响是很小的”，但是，被选出的伊朗人民党议员在中央议会中无法战胜“卖国的多数派”。到了仲夏时候，有消息报道说，已成立了一个阿塞拜疆民族解放委员会，虽然这一报道是被否认了，但8月份在这个富饶而有价值的省份中组成了一个“民主”党，当地的伊朗人民党很快地就合并了进去，这就在实质上证实了这一报道。伊朗人民党和苏联的宣传家们为这一行动提出来的托辞，仍旧是借口波斯政府在处理伊朗人民党骚动时采取了高压政策。由于阿塞拜疆省领受过札萨国王的严厉手段（札萨国王对阿塞拜疆存有偏见，这是因为该省曾经是被他在1923—1925年推翻的恺加王朝的主要支柱），由于中央政府不允许正式使用当地的土耳其方言（阿塞里语），这就给自治运动更加增添了力量。尽管如此，“民主党”59的领导人们还是发现，从苏联外高加索渗入“大批政治掮客”是加强他们地方上的支持者的一个好办法，这种人在人种混杂、方言繁多的阿塞拜疆是不容易被识破的。领导这个运动的是贾法尔·皮沙瓦里，他曾是短命的吉兰省内的苏维埃共和国（1920—1921年）内务人民委员，其后是共产国际的一名代理人：1936年他又回到波斯，表面上是逃避苏联的清党，他曾被札萨国王的政府监禁过，在札萨国王退位之后，又曾出面编辑伊朗人民党的《爱兹哈尔报》；他在1943年普选中获得了大不

---

日）。

伯纳德·刘易斯：“土耳其近况”，《国际事务》，1951年7月，第27卷，第322—323页。

C·L·苏兹贝格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1950年3月28日。

哈罗德·G·小鲍恩中校：“从海军方面看赴土耳其的使命”，《美国海军学院学报》

（Commander Harold G. Bowen, Jr.: “Naval Aspects of the Mission to Turkey”, 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1951年10月，第77卷，第1049页。

伯纳德·刘易斯：“土耳其伊斯兰教的复兴”（Bernard Lewis: “Islamic Revival in Turkey”），《国际事务》，1952年1月，第98卷，第38—48页；刘易斯·v·托马斯：“土耳其伊斯兰教的近况”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urkish Islam”），《中东杂志》，1952年冬季，第6卷，第22~24页。另一方面，埃米尔·马默斯坦（Emile Marmorstein）则认为那里的局势提出了更多的问题：“中东的人们受到了一些新的问题的折磨，而这些新的问题则是以下种种相互依存事件凑在一起所造成的结果——诸如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新技术的引进，交通的手段，管理的方法，垄断资本主义的扩张以及传统生活方式的没落。他们正在寻找对所有他们的问题提供全部答案的解决办法，例如，对他们说来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事而对于这些事他们又怎么办，等等。对于他们的这个世界，那些希望采取积极态度的人们不得不在民族复兴的哲学、革命的共产主义道路以及忠于他们的祖宗的信仰和习惯三者之间作出自己的决定。”在土耳其伊斯兰教复兴主义者的所谓反动趋势中，作者看到了一个激进教会的复活，它起而反对“人们信奉为存在于人人心中那个永生的亚玛力”〔“中东民族主义宗教上的反对派”（“Religious Opposition to Nationalism in the Middle East”），《国际事务》，1952年7月，第28卷，第357页〕。

《苏格兰人报》，1950年11月13日。

《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481页。

英国外交部：《柏林会议议定书》，（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Protocol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Berlin Conference）敕令第7087号，第14条。



里士最多的选票而当选，但是后来议会拒不发给他当选证书。11月16日，聚集到“民主”党（塔斯社曾为它大事宣传）内的各色人物，开始公开叛乱，切断大不里士和德黑兰之间的全部交通，并在第二天夜间夺取了大不里士东南一百英里的米亚内城及其铁路枢纽站。两天后从大不里士来到德黑兰的一位商人说，反叛者主要是亚美尼亚人和来自巴库的穿便衣的红军：一位波斯政府的发言人则补充说，从俄国人的卡车上分发给反叛者的武器，查明是从1941年夏天俄国人进行干涉之后被他们没收的波斯军火库中拿出来的。11月17日，波斯政府要求苏联大使馆通知苏联军事当局，一支波斯武装部队正从首都派往米亚内和大不里士，但是，首先出发的两营步兵在加兹温附近被俄国人阻止住了。《消息报》煞费苦心地向它的读者们说，阿塞拜疆的运动是自发的和由人民大众参加的，但是受到了当地宪兵和“反动的大地主”的激烈反对：《消息报》继续说，英国广播公司把这个运动虚假地说成是由俄国纵容的一次分裂主义者的叛乱，是为了转移人们对“尽人皆知的”应由英国当局负责的巴勒斯坦、埃及和印度尼西亚骚动的注意。

波斯驻华盛顿大使、在英国受过教育的侯赛因·阿·60拉向美国国务院陈述了情况，结果美国政府于11月24日向苏联政府建议，立即采取步骤，将全部盟国部队在1月1日之前从波斯撤出；美国的照会以圆滑的外交辞令暗示：把波斯部队从北部各省赶回去的苏联指挥官可能是没有接到命令而自行采取行动的，并且“料想”苏联政府现已对他们发出指示，以便与1943年德黑兰会议上三大国所签署的关于波斯主权的宣言相一致。英国政府也送交了一份类似的照会，但是这次没有建议在规定的1946年3月2日以前提早撤出部队。11月29日苏联政府答复说，他们认为没有理由要重新考虑撤出的日期，并补充指出，苏联政府已通知伊朗政府：派遣更多的伊朗部队到伊朗北部并不能使混乱和流血停止，反而会使混乱和流血增加，这将迫使苏联政府把自己更多的部队开进伊朗，以便维持秩序和保证苏联驻军的安全。在波斯北部的苏联驻军估计有三万到七万人。人们认为：这种公开表示对苏联驻军安全的关心，既是对波斯军队的力量的过分夸张，又是对了解红军情况的那

---

贝文1945年10月10日在下院的发言（下院辩论，第5辑，第411卷，第245—247栏）。

1907年补充基本法第二十九条〔见海沦·米勒·戴维斯：《近东和中东国家的宪法、选举法、条约》（Helen Miller Davis: Constitutions, Elections, Treaties of States in the Near and Middle East），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1947年版，第82页〕，又见下文，原著第64页。

《火焰报》（Shu'lavar），1944年12月30日；《自由报》（Azadagan），1945年1月6日；《爱兹哈尔报》（Azhlr），1945年1月9日。关于沙战在1909年至1914年间事实上把阿塞拜疆从波斯分裂出去以及关于苏联当局于1942年初在那里纵容分裂主义论调的发表，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484—485页，第29页，第466页。

见乔恩·金奇：《七根倒了的柱子》（Jon Kinlche: Seven Fallen Pillars），伦敦，塞克和沃伯格，1950年版，第115页；解放者（金奇的笔名）在1945年7月1日和15日的《观察家报》上和1945年7月17日的《世界报》上的文章。

“它的剩余产物供应了缺粮的其他地区，特别是德黑兰；水果和皮革是珍贵的出口货物，连同家禽和乳制品等还运往这个国家的其他省份。波斯最富裕的地区之一，生产稻米和木材的沿里海诸省，以及拥有多余粮食和水果的霍腊散省（两者都在俄国人占领区内），也都很可能会受到阿塞拜疆的命运的深刻影响。”（A.K.S.拉姆顿：“阿塞拜疆问题”（“The Asarbaijan Problem”），《今日世界》，1946年2月，第2卷，第56—57页）

些人的才智的侮辱。

与此同时，11月27日来自莫斯科的报道说，苏联政府曾通知波斯政府，他们以很大的同情关怀着一星期以前“波斯阿塞拜疆‘全民’大会”所宣布的自治要求。

由于俄国人禁止观察者参加〔《泰晤士报》特派记者报61道〕，这个大会的酝酿过程只能从远处来观察，但是有足够的事实材料已经被人知道。这个运动是卓有成效地计划和执行的，并且留下内行人筹划的全部痕迹。“民主党人”被很好地组织起来；他们的反对者被彻底吓倒了。驻在这个地区的波斯政府部队虚弱无力，或者很快就变得这样了。一两个陆军和宪兵的哨所进行了战斗，但是大多数人立刻屈服于俄国的威胁和利诱，士兵们仍困在他们的兵营中，很多军官朝德黑兰跑。“民主党人”很

就在莫斯科三大国外长会议举行之前，12月16日，据宣布，大不里士的彼斯的少量驻军已经向“民主党人”投降；

同时，作为11月下旬在阿塞拜疆举行的选举的结果，

莫斯科电台宣布，一个由贾法尔·皮沙瓦里领导的“波斯62阿塞拜疆民族政府”已经成立。这个政府的第一项声明宣称，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但是，“为了消除城市和乡村不断增长的失业，‘政府’将把国家的土地和那些从阿塞拜疆逃走的或对阿塞拜疆自治进行蛊惑宣传的反动派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这个声明还恐吓“所有那些用怠工和破坏活动来危害秩序和安全的人”，要作为“人民之敌”给予惩罚，民族政府仍承认波斯中央政府。并将执行它的法令，只要这些法令彻波斯阿塞拜疆的自治、同人民的权利和波斯阿塞拜疆民族议会的决议是不相抵触的。

在煽反对中央政府的自治运动的向时，俄国人的目标还转向了靠近伊拉克边境的阿塞拜疆西南山区的库尔德居民，俄国人和他们在1942年就有了临时性的联系。1944年，苏联驻雷扎耶领事馆又恢复了同那里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者的接触，并在马哈巴德成立了一个库尔德斯坦—苏联文化协会。为了需要人去领导库尔德民族主义者的运动，俄国人几经周折选中了马哈巴德的世袭法官和宗教领袖卡迪·穆罕默德；他是一位“强有力的和独裁主义性格”的人物，1945年9月他和其他知名人士一起被“硬推”到巴库去接受苏联的思想教育之后，就宣布成立一个库尔德“民主”党，并发表了一个宣言，其宗旨与阿塞拜疆“民主党”的也很相似。这个运动在10月份凑巧又得到了由穆拉·穆斯塔法领导的一帮属于巴尔赞部落的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增援。他们经过长时间的反伊拉克政府的叛乱之后，最后从他们的山区根据地赶出了

---

伊斯坎达里（《中东杂志》，1950年5月，第8—9页）；巴什基罗夫，第54—61页。

詹姆斯·奥尔德里奇（James J. O'Rourke）在他的一部七百页长的小说《外交家》〔（The Diplomat），伦敦，博德利·黑德，1949年版〕中，试图把这个运动描绘成“是真诚的和……由本地发动的”，而“俄国的干预则显得微不足道”。他让小说中的英雄出来讲，“俄国人的间接影响也许有一些，但是我要指出、它比起我们自己在伊朗通过直接控制大臣、政党、国家财政和利用小恩小惠所施加的影响，那是要小得多的”（第606页）。到了1950年，奥尔德里奇在朝鲜问题上已公开地站到共产党人一边。

《泰晤士报》驻波斯特派记者报道，1946年1月26日。

见伦乔夫斯基：《俄国和西方国家在伊朗》，第224页；关于这个运动的其他卓越人物，见约瑟夫·艾尔索普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的文章，1946年12月30日。

照会原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1年，第1辑，增编第1号，第50—52页。

来：他们越过边界，进入波斯之后就被苏联军官安置在卡迪穆罕默德的管辖之下，并在那里吸引了来自伊拉克的总数近三千人的其他库尔德难民和冒险家，而且都用从伊拉克军队那里夺来的英国武器装备得很好。大不里士的落到阿塞拜疆“民主党”手中，提醒了卡迪穆罕默德于12月15日也宣布成立一个“库尔德人民政府”，这个政府控制了马哈巴德周围大约五十英里的地区。成立了一个由十三名议员组成的“民族议会”，1946年1月22日，卡迪穆罕默德被选为主席。一些来自中层或上层阶级的人士被任命为“内阁部长”，五名部落领袖得到了“元帅”的军衔，穿上了苏联高级军官的制服。

1945年12月19日，莫斯科外长会议开始举行，斯大林在和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第一次会见时便强调指出，波斯指使的破坏活动已严重危及巴库油田，他说，对那阶政府不可能寄以信任。3月份能否按约定的日期从波斯撤退苏联部队，这将取决于波斯政府的行动表现；他提醒贝尔纳斯，1921年的苏波条约规定，如果第三方面利用波斯威胁苏联的安全，苏联政府就有权派遣军队进入波斯。在他们第二次会见时，斯大林没有就贝文提出的建议，即三大国应派遣一个联合委员会去波斯全面调查这个问题，向贝尔纳斯作出任何许诺；但是在圣诞节下午，莫洛托夫私下对贝尔纳斯说，他以为贝文的建议大体上是可以接受的；对此，贝尔纳斯回答说，他“特别希望”波斯问题不要在即将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来。同天晚上，贝文接受了莫洛托夫对他的建议所提出的几点修正：只有一点除外，即对于已约定的从波斯撤出部队的日期暂不作决定（贝文的论点是，这个日期是1942年英国—苏联—波斯条约所确定的，不应该改变）。第二天下午三国外长再次会晤时，显然苏联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因为莫洛托夫这时说，把波斯问题列入他们的会议日程是不合适的，因此不能予以考虑。641945年6月到10月

---

转引自《人道报》，1945年11月21日。

原文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1年，第1辑，增编第1号，第53—55页（7号）和56—57页（10号）；关于德黑兰宣言见《概览，1939—1946年：战中中东》，第473页。在美国的照会发表时，一位共和党国会议员提醒人们注意他和另一位议员9月间从波斯访问归来后写给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他们注意到最近重新任命了一批美国军官为波斯宪兵队的顾问，任期两年；并评论说：“我们不相信我们的政府会带着赞许的眼光看待这种局势，例如，墨西哥可以同样地和俄国军官签订这种合同。”（《国会记录》，1945年12月3日，第11361—11364页和1945年12月5日，第11500—11501页）纽约《工人日报》（1945年12月16日）谴责波斯宪兵队的美国首席顾问斯瓦茨科普夫上校“破坏了为反对英美石油托拉斯和航空垄断组织所支持的半殖民地的封建制度而斗争的那个民族的基本民主自由”；“进步的”《新共和》周刊〔（New Republic），1945年12月31日，第888页〕则评论说：“我们自然同情有自由精神的分成制佃户和伊朗人民党的知识分子，甚至也同情自称为‘民主主义者’的愤怒的阿塞拜疆人。”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1年，第1辑，增编第1号，第57—58页（第11号）。

《泰晤士报》驻波斯特派记者报道，1946年1月26日；参阅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118—119页。“从西方的观点来看，这种选举是根本不能令人满意的，虽然波斯其他地区的选举或许也不过是这样。据目击者说，大多数投票人是工厂工人和‘城镇的渣滓’。没有几个商人和富有阶级去参加投票。穿军服的苏联士兵驾驶着美国制造伪红军卡车，把一车车的投票人载往投票处。大多数投票人是文盲，他们的空白选票是由投票处的办事人员代为填写的，虽然波斯其他地方的办法也同样是如此。只准许投‘民主党’候选人的票。结果就显示出了压倒的多数，……这就是受到监督的‘自由’选举的明证。”（《泰晤士报》，1946年1月26日）

这一期间，波斯政府是由一位比较强存力的人物穆赫辛，萨德领导的，由于他早期在司法部工作的经历，他被左翼报刊攻击为“屠杀热爱自由的人们的凶手……有名的刽子手”。他辞职后，就由七十六岁的易卜拉欣·哈基米来继任首相；伊朗人民党的宣传家把萨德的辞职说成是由于“不可抗拒的民众运动的高涨”。由于驻德黑兰的苏联大使被召回莫斯科，使馆人员已停止和波斯政府打交道，省哈基米在12月14日通知苏联政府说，他准备参加莫斯科会议以便讨论他的国家的问题时；哈基米没有得到任何回答；甚至在人们得知“三大国”外长没有能解决那个问题之前，哈基米政府已经摇摇欲坠。12月1日德黑兰市长被解职，据说是因为他和一年前为反对苏联扶植的伊朗人民党而成立的民族意志党有关系；12月25日内政大臣被迫辞职，据说是因为在他当阿塞拜疆的总督时他没有与亲苏分子们合作；31日，一位不管大臣也辞职了，他在德黑兰被认为是极其亲英的；再过一天又得悉公路和交通大臣的辞职。尽管如此多，哈基米政府还是继续研究贝文的建议，那是莫斯科会议结束之后由驻德黑兰的英美两国大使重新提出来的。建议内容为：由一个樊美苏三国委员会来研究和建议波斯政府设立省议会，有宁省议会就可以把“阿塞拜疆良族府”吸收进去，但是在波斯议会中却遭到了左右两方面的反对——“这好象是在要求波斯给同盛国以照顾，而不是帮助波斯来摆脱一个使这里的政界充满悻悻恐惧的局面”——1946年1月10日，波斯政府在一片欢呼声中宣布；他们决定拒绝这个建议。

一星期后，当联合国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伦敦召开时，

率领波斯代表团的波斯驻伦敦大使赛德·哈桑·塔基扎达征求贝文和贝尔纳斯两人的意见：他是否应当向安全理事会控诉苏联干预了他的国家的事务。这两位外长显然向他指出了这样一种愿望，即安全理事会在其当前的初期阶段所应承担的“只能是最紧迫的事务”。然而，到1月19日波斯的控诉就正式提了出来；苏联代表团怀疑这个动议是英国煽动起来的，两天后它以控诉英国在希腊驻军相报复，同时乌克兰代表团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反对英国在印度尼西亚驻军的控诉。1月24日苏联对波斯控诉的答复，表示这个问题能够而且应该通过双边谈判的办法来解决，同时宣称阿塞拜疆的事件与苏联部队的驻在那里并没有联系，“因为有许多无可争辩的和完全客观的

---

同上，1945年12月17日。

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156页，第466—467页；关于库尔德民族主义概况，见W.G.埃尔夫斯通：“库尔德问题”（W.G.Ephinston：“TheKurdishQuestion”），《国际事务》，1946年1月，第22卷，第91—103页；库尔德研究中心：《库尔德人状况备忘录和他们的要求》（Centred'EtudesKurdes：MemorandumsurlasituationdesKurdesetleursrevendications），巴黎，1948年版。

这个阿拉伯字 Qaidi（法官）的波斯发音几乎和阿拉伯字 ghazi（胜利的）的发音一样，现代报刊常常以“ghezi”或“qazi”来称呼卡迪穆罕默德。

小阿尔奇·罗斯福：“马哈巴德的库尔德共和国”（ArchieRooseveltJr：“TheKurdishRepublicofMahabad”），《中东杂志》，1947年7月，第1卷，第247—257页。

关于斯大林在1946年4月4日向新近到达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重复这一论点，见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出使莫斯科，1946—1949年》（WalterBedellSmith：MoscowMission，1946—1949），伦敦，海涅曼，1950年版，第40页。

关于苏联援引这个条约来为1941年8月对波斯的干涉进行辩解，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135页。

事实可以作证”，阿塞拜疆的事件完全是波斯人的内部事件——波斯北方的“民众渴望”，在波斯国家“范围内的民族自治”，这对于一个民主国家来说，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维辛斯基的信中还讲到，波斯反动势力方面的那种敌视苏联的反民主的和集体迫害的活动，对苏联阿塞拜疆和巴库正在造成“一种有组织的敌对行动和挑拨离间等等的危险”。塔基扎达在26日对这封信作了详细的答复之后，于28日向安全理事会提交了他的政府的要求：在苏联军队从波斯领土按期完成撤退之前，波斯的军队和官员应该被允许执行其正常的职能而不受苏联部队的干涉，安全理事会应劝告苏联撤回对“阿塞拜疆的叛乱者或其他地方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全部道义上的和物质上的支持。维辛斯基得到波兰代表团的支持，坚持说他的政府准备和波斯政府继续举行双边会议，并反对把这个问题保留在安全理事会的议事日程上。但是在30日，维辛斯基作了让步：“万一出乎意料之外，由于发生别的情况或某些鲁莽者的干扰，因而得不到结果的话”，安全理事会可以要求得到关于情况进展的报告。

正当苏联驻安全理事会代表团这样拖延时间的时 66 候，德黑兰的哈基米政府也终于在1月20日倒台了；26日，议会以五十二票对五十一票仅超过一票选出了七十岁的艾哈迈德·卡旺·萨勒塔纳为首相，这位来自里海之滨的吉兰省的地主，自从1942—1943年在他的首相任期之内就已开始和伊朗人民党进行策略性的联合，并且在1943年的竞选中曾利用他在地方上的影响来帮助该党。他处理事务时充满自信，精力充沛，这正是很多波斯政治家所缺乏的。虽然现在他在一次接见记者时宣称，他对任何外国都没有爱憎的偏见，他只是关心为波斯服务，但是前后有两个月光景他被当作一个能够和俄国人谈判的人而在波斯受到人们热烈的欢迎。他把他的就职通知三大国后，收到了斯大林的一封友好的复信；2月18日，他即率领一个波斯代表团乘苏联飞机去莫斯科访问。在他启程前两天，他免除了阿尔法将军的总参谋长职务，这位将军被左翼报刊攻击为“法西斯分子”和“亲英的反动派”；临启程的时候，代表团中的三位预定成员留了下来，据说是因为莫斯科不欢迎他们。代表团启程时，又恰好遇上了左翼报刊发动的一个反对所谓英国武装波斯南方部落、反对英国大使和反对英伊石油公司的激烈运动，后者在对待

---

见上文，原著第57页。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118—121页；贝文1946年2月21日在下院的发言（下院辩论，第5辑，第419卷，第1357—1358栏）。1952年4月24日，为了澄清总统关于1945—1946年美国对波斯政策的一项声明，贝尔纳斯说，1945年12月19日他曾传话给斯大林，告诉他“如果苏联不按照1942年在德黑兰所作的庄严承诺从波斯撤出它的军队，又如果波斯政府在联合国提出抗议的话，美国政府将在联合国中支持波斯”（《泰晤士报》，1952年4月26日）。以前发表的证词并没有暗示美国政府在1946年3月以前曾采取这样坚定的一个立场；见下文，原著第66—67页。

伊斯坎达里（《中东杂志》，1950年5月，第8—9页）。

但是维辛斯基后来在安全理事会上争辩说，在1945年12月1日的一份照会中波斯政府曾宣称，他们“对1945年11月和苏联政府谈判的结果感到满意”（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946年1月28日和29日：《正式记录》，第1年，第1辑；第1号，第39—40页，第49—51页）。

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482页。

《纽约时报》，1945年12月3日，1946年1月1日；《泰晤士报》，1945年12月28日，1946年1月2日。

工人方面被攻击为一直保持“骇人听闻条件”，虽然事实上尽管有由于战时材料缺乏而引起的尖锐的住房问题：“这家公司工人的条件还是比波斯任何其他工业工人的条件要好。

其间，美国部队于1月1日已经从波斯撤出，12月23日，英国驻波斯和伊拉克部队总司令部声明，现在只有六百名英国部队留在波斯，这部分人将于规定的日期（3月2日）离开。但是，在3月1日，莫斯科电台宣称：波斯首相在四天前已经在莫斯科得到通知，苏联部队将自“局势比较稳定”的东北部各省撤出，“从3月2日起实施”，但是“在波斯其他部分的苏联部队在局势明朗之前仍将留在那里”。在德黑兰出席议会的全部九十六名代表（伊朗人民党的议员未出席）向一位要求对这个声明提出强烈抗议的发言人热烈鼓掌；在莫斯科，波斯首相向莫洛托夫递交了一封抗议信。对于波斯问题迄今还未积极参加辩论的美国政府，现在也动起来了。他们在3月6日给莫斯科的一份照会中说，他们对于在1942年条约规定的日期之后仍留驻苏联部队的这一决定不能不表示关切。12日，国务院宣布他们已经收到有关报告，说“最近一星期内又有更多的苏联武装部队和重武器装备正从苏联边境方面向南通过大不里士朝德黑兰和伊朗西部边境移动”。14日，莫斯科电台广播了塔斯社发的一项声明

说，这个报告不符合事实；但是根据能够得到美国官方消息的伦乔夫斯基的说法，美国驻波斯大使馆空军武官在德黑兰以西只有二十五英里的地方曾看到苏联的谢尔曼型坦克：

首都的人们都预料，在3月21日至27日的伊朗新年节日里，伊朗人民党和一伙苏联的代理人会发动一次武装政变。然而政变并未实现。外交界的观察家把苏联在这关键时刻踌躇不决的原因归之于美国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其证明是国务院立即把俄国军队的调动情况公布了出来，另一方面，宪兵顾问斯瓦茨科普夫上校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来保卫首都，也是一个证明。

英国外交部也没有忘记通过它的莫斯科大使馆强烈要求苏联对于该国部队继续留驻在波斯作出解释。

其间，卡旺·萨勒塔纳已于3月10日从莫斯科回国，他在12日向议会发表了演说，这是按规定解散议会以进行一次普选之前所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第二天他告诉报纸记者，他在莫斯科的谈判没有取得成果。苏联政府没有能够接受他的关于撤退苏联军队的重要而又迫切的要求；他也不能够

---

《泰晤士报》驻波斯特派记者报道，1946年1月28日。”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123页；贝文1946年2月21日在下院的发言（下院辩论，第5辑，第419卷，第1357—1358栏）。一位作者在美国对外关系协会（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编的《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45—1947年》〔（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Affairs, 1945—1947），纽约和伦敦，哈珀，1947年版，第89页〕中，不知根据什么证据坚持认为，英国人想劝阻波斯人是因为他们“不急于在波斯公开他们自己的政策”。许多事情表明，无论是苏联政府还是他们的傀儡伊朗人民党都不想进行一次公开宣传，把它们对英波关系的不满端出来。相反地，他们试图鼓励英伊石油公司租借地里的罢工，并把国际的注意力引向冷战的其它方面。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1年，第1辑，增编第1号，第16—19页。

同上，第24页；同上，第1年，第1辑，第1号，第71页。提到的鲁莽者，也许是指贝文，他曾带头希望把这件事列入议程。

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154页，第156页。

同意苏联人提出的要求，这些要求后来陈述如下：

1. 苏联军队无限期地留在伊朗某些地区。

2. 伊朗政府承认阿塞拜疆的内部自治。一旦伊朗政府默认了这个要求，苏联政府将采取步骤作出如下的安排：

(1) 在对中央政府的关系上，阿塞拜疆总理将接受总督的职衔；

(2) 阿塞拜疆将不设陆军部和外交部，

(3) 阿塞拜疆岁入的百分之三十将交给伊朗中央政府；

(4) 与中央政府的一切通讯往来将使用波斯语文。

3. 苏联政府放弃它对石油开采特权的要求，而代之以设立一个伊朗-苏联联合股份公司，在这个公司中苏联将拥有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伊朗则拥有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卡旺说，当新任命的苏联大使过几天就要到达德黑兰时，他希望就苏联军队问题重新举行谈判，一旦苏联军队撤出，他就和阿塞拜疆“政府”开始进行谈判，并考虑和俄国缔结一个石油协定；但是只有议会才能够批准这些事项，而根据最近的一项法律，在所有外国军队撤出之前，不选举新的议会。3月14日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宣称，如果苏联一波斯的争执在25日安全理事会开会之前还不得解决，而波斯政府自己又不提出这个问题，那么美国就会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国务院获悉，苏联代办曾警告波斯首相，他的政府将把波斯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控诉看作是一种“不友好的行为”，因此美国驻德黑兰大使出来证实，如果波斯人不提这个问题，美国政府将提出这个问题。波斯内阁在应采取什么策略的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但波斯驻美大使侯赛因·阿拉在18日将这一争端提给了安全理事会。第二天维辛斯基的副手安德烈·A·葛罗米柯通知联合国秘书长说：波斯的动议令人感到意外，因为这两国政府间的谈判正在进行，所以他的政府要求安全理事会对这件事的考虑延迟到4月10日。3月20日，新任苏联大使伊凡·V·萨德奇科夫到达德黑兰，据说他给首相带来了斯大林的口信。与此同时，被伊朗人民党视作最可怕的敌手之一、三年来一直遭到攻击的赛德·齐亚丁·塔巴塔巴伊。这时受到了“预防性的”监禁。23日，首相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由于直接谈判的结果，苏联军队有可能在两天后安全理事会开会之前开始撤退；同时，他已指示侯赛因·阿拉“避免作任何可能导致进一步

---

见《纽约时报》，1月27日；《观察亨报》“人物传略”，1946年3月24日。

《泰晤士报》，1946年2月5日。

这种非难早在一年前已经平息；见《概览 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481—482页和《泰晤士报》后来驻波斯记者的报道，1946年4月6日。

《泰晤士报》，1946年3月2日，M·马格宁(M·Magnien)在《人道报》(1946年3月3—4日和5日)上克尽厥职地竭力争辩说，卡旺·萨勒塔纳政府“还不是绝对巩固，还可能遭到一次由封建反动派阴谋策划的政变的危险”；他说，这一阴谋不仅在北方制造混乱，还同南方的据说由英国人武装的部落相勾结。

“可以肯定地说，英国从收斯撤走它的正规军队是不会有有多大损失的，因为他们还拥有一支很强大的外国雇佣车队伍。……大不列颠不是在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塞浦路斯、埃及、希腊和意大利北部，违背这些国家人民的意愿，依旧驻扎着军队吗？更不必说利比亚、的黎波里塔尼亚、直布罗陀和马耳他了。……是什么条约允许英国军队去干涉希腊事务的呢？在英国庇护下的法西斯分子安德斯的武装部队有什么权利进入朱利安·马奇的斯洛文尼亚人的领土？英国军队在荷属东印度又是在干什么？”

侯赛因·阿拉(Husain Ala)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信，1946年3月27日，《正式记录》、第1年，第1辑，第2号，第65—66页。

争吵的声明和行动”，这一指示被认为是对阿拉 20 日抗议苏联要求推迟安全理事会议程的那封信的训斥。24 日，苏联大使拜访了卡旺，并递给他三个备忘录。一个备忘录是宣布红军的撤出将从当天开始，并将延续五到六个星期；一个是关于筹建苏联—波斯联合石油公司的事；另一个是关于阿塞拜疆自治政府组织方式的建议。就在同天傍晚，莫斯科电台广播了一个声明：“根锡和波斯政府达成的协议”，撤退军队已经开始。但是根据波斯方面关于经过情况的叙述，卡旺曾反对苏联大使向他口头提出的“不得发生不能预见的情况”这个条件。

安全理事会关于波斯控诉的议案，现在被卡旺巧妙地用作从苏联政府取得更好条件的杠杆。3 月 26 日安全理事会开始商讨议程的时候，葛罗米柯坚决主张不应该把波斯的控诉包括在内，因为苏联军队的撤退已经开始。70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这个议程的争论点遭到否决，然后他再次要求把议程推迟到 4 月 10 日，坚持说苏波两国政府间已经达成了一项谅解，并警告与会代表，他的政府在那个日期之前不准备参加安全理事会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讨论。这个论点又遭到否决，只有波兰代表支持他。3 月 28 日，他愤怒地离开了安全理事会会议室，留在那里的波斯代表声称，当他得知苏联的撤退已经开始时，他知道两国政府间对于任何争端“都没有达成秘密的或以其他方式的协议或谅解”。29 日，在苏联代表团仍旧缺席的情况下，安全理事会一致同意，要求两国政府在 4 月 3 日作出关于他们谈判进展情况的报告，特别应作出说明的是，他们达成协议时是否给传闻中的撤军附加了条件。

这时，德黑兰的苏联大使馆似乎在进行活动，竭力想把出席安全理事会的波斯代表侯赛因·阿拉换下来，

但是在 4 月 1 日，安理会主席接到了卡旺的一件公函，确认对阿拉的任命。3 日，为了答复葛罗米柯一再重申的两国政府就苏联撤军一事已经达成协议，阿拉告诉安理会说，他从他的政府得到的 4 月 1 日的最新消息，并不能证实葛罗米柯所说的话。他得到的消息是：卡旺评论 3 月 24 日苏联的建议说，他不能接受苏联部队从整个波斯完全撤出所附加的任何条件：阿塞拜疆的法律地位是一个内部问题，他的政府会加以解决的；关于苏联—波斯联合石油公司的建议是一个有待提交下届议会审议的问题，但只有在苏联军队撤退之后才有可能举行合法的选举。侯赛因·阿拉继续说（无疑是根据德黑兰的指示），如果苏联代表收回附加在苏联撤军上的关于“不能预见的情况”的条件，并向安理会保证他们的无条件撤军将在 5 月 6 日以前完成的话，他将不要求安理会在目前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但在议程中则仍予以保留。于是，安理会同意把进一步的讨论推迟到 5 月 6 日。4 月 5 日清晨，波斯内阁

---

《纽约时报》，1946 年 3 月 8 日和 12 日。

伦乔夫斯基：《俄国和西方国家在伊朗》，第 298 页。

右翼曾希望提出一个延长本届议会直到苏联撤兵完毕的法案，但是一连几天一群由伊朗人民党组织的暴徒进行阻挠，使出席会议的不能达到法定人数（《纽约时报》，1946 年 3 月 7 日和 13 日）。

1946 年 3 月 27 日侯赛因·阿拉的发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 1 年，第 1 辑，第 2 号，第 64—65 页。这时，《消息报》（Izvestia）也提醒它的读者，在 1919 年的凡尔赛和会上波斯代表曾提出对十九世纪被沙皇俄国吞并的领土的过分要求（见《和会史》，第 6 卷，第 211 页）；并且宣称波斯的“统治集团”仍在希望通过使苏联与别的大国发生争吵来得到这些领土（《泰晤士报》报道，1946 年 3 月



正式批准在下列原则基础上同苏联政府达成一项，协议：

1. 从3月24日起六个星期内完成在波斯领土内的撤军。

2. 关于为期五十年的联合石油公司的计划（头二十五年俄国将拥有股份的百分之五十一，波斯拥有百分之四十九），应从3月24日起的七个月内提交波斯议会。3. 应承认阿塞拜疆是一个内部问题，波斯政府将宽宏大量地予以处理，并考虑在现存法律范围内作必需的改革。4月22日，德黑兰电台广播了中央政府对阿塞拜疆提出的建议：它说，各部部长……将由省议会选出，由中央政府批准。一名总督将由中央政府征得省议会的同意后加以任命。宪兵司令将由中央政府任命。官方语言将是波斯语。……民主的政治组织和工会在阿塞拜疆将准许自由活动。……不干涉阿塞拜疆的人民或工人参预“民主”运动的任何活动。向下届议会提交一项法案：增加来自阿塞拜疆省的议员名额，以求同该省的实际人口数符合一致。一个阿塞拜疆代表团穿着他们的“民族军”制服，于28日抵达德黑兰。代表团由贾法尔·皮沙瓦里率领，包括：俄国出生的“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萨迪克·帕迪甘；哈姆萨省的省长（这个省，在阿塞拜疆的东南，省会赞兼，由于红军的纵容已被“民主党人，在去年冬季侵占）；以及一位“库尔德共和国”的代表。谈判拖延下去，5月3日，对72德黑兰一直抱敌对态度的大不里士电台宣布：阿塞拜疆“民族政府”和库尔德“民族政府”已在4月23日签订了一项为期二十年的条约。

5月6日，侯赛因·阿拉通知安全理事会，他的政府进行的官方调查表明，苏军已从东北部和里海之滨各省撤退完毕。他的政府“通过其他途径”得知，阿塞拜疆的撤军将于5月7日之前完成；但是由于以前所诉说的干扰，波斯政府的官员从1945年11月7日起已经不能在这个省份行使权力，因此不能通过直接观察来证实这个报告；一俟他们能够查明事实真相，他们就向安理会报告。于是安理会要求他们到5月20日作出进一步的报告；苏联代表团再次愤怒地退席。11日，大不里士电台宣布，同中央政府的谈判已经破裂：“阿塞拜疆民族决不会屈服于中央政府的暴政。……阿塞拜疆民族军队现在已准备同自由的敌人战斗。”按照波斯首相的说法，僵局是出现在“民

---

15日)。

《泰晤士报》外交记者报道，1946年3月14日和25日。

《约时报》，1946年3月15日。关于贝尔纳斯同莫洛托夫4月在巴黎再次会晤时，莫洛托夫向他表示对美国的态度强烈不满，见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126页。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1年，第1辑，增编第2号，第

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472—473页。他于1947年3月17日被释放。4月8日，前参谋长阿尔法将军被逮捕，一位政府发言人〔显然是穆扎法、菲鲁兹，关于他，见下文，原著第78页注（即本书第134页注——译者）〕说，根据报告和文件，证明他在策划危及国家安全的阴谋，并把强盗集团武装成他的私人游击队（《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1946年4月10—11日；并见上文，原著第66页）。他在10月30日又从严密的监禁中被释放出来。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前引文。根据伦乔夫斯基的说法，“卡旺在这个令人神经紧张的时期所作的一些指示，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和驻在德黑兰的苏美大使分别交谈后定下来的。对伊朗来说，不幸的是，美国大使默里先生在这个关键时刻遵照他的医生的指示卧床养病。结果，苏联大使拜访首相的次数就更多了，他坚持要有一个使莫斯科满意的解决办法的态度也更强硬了。”（伦乔夫斯基：《俄国和西方国家在伊朗》，第299页）。

主党人”的要求上：要由他们，而不是由中央政府，来任命省长以及军队和宪兵的司令（经德黑兰同意）；他们还要求在农民中间自由地分配国家土地。代表们已经回到大不里士去接受新的指示，谈判将在以后继续进行。但是，19日傍晚，大不里士电台用几种语言宣称：“流血已经开始。下午5点收到的消息说，政府军队已经开始攻击。宣布处于战争状态。准备战斗。坚持不屈。捍卫你们的自由。一直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它还报道，所73有的大城镇都已实行戒严，已经为这个省和各主要城镇任命了军事长官。第二天，波斯代表向安全理事会作了早在两个星期前要求他作的报告：波斯政府在阿塞拜疆仍旧不能有效地行使权力，特别是不能够去调查所传穿便衣的苏联军队还留驻在那里，苏联的军事装备交给了要求自治的人去使用。但是，他补充说，已经任命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并且据说现在是在大不里士。第二天他又报告说，接到他政府的通知，这个委员会在大不里士和另外七个城镇经过一个星期的仔细调查之后，“没有发现苏联军队、装备或运输工具的任何踪迹。……根据在所有这些地区被问到的可靠的当地人的说法，苏联军队是在5月6日撤出阿塞拜疆的。卡旺·萨勒塔纳（签名）。”

在这之前不久，大不里士“政府”已撤销了它的戒严令，声称“和平的办法占了优势”。在德黑兰，国防大臣向内阁报告说，惊动了大不里士“政府”的这次攻击，据信是由一名当地的军队指挥官受到贿赂而发动的。第二天，大不里士电台宣布，分别来自大不里士和德黑兰的两个代表团将到新近发生战斗的地区去进行调查。驻华盛顿的波斯大使馆5月29日宣称，他们的政府已指示侯赛因·阿拉，不要再向安全理事会作任何关于苏波争端的进一步的声明。大不里士电台的调子现在变得和解了：6月11日，穆扎法·菲

---

莫斯科广播原文载《泰晤士报》，1946年3月25日：参阅侯赛因·阿拉1946年4月3日发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1年，第1辑，第2号，第85—86页。

这是从波斯宣传司长穆扎法·菲鲁兹亲王8月31日声明中得出的结论。他的父亲努斯拉特·达拉·菲鲁兹亲王是前恺加王朝的后裔，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他就积极地反对英国在波斯的政策，后来死在礼萨国王的监狱里（见J.孤·鲍尔弗阁下：《波斯最近发生的事件》（Hon.J.M.Balfour;RecentHappeningsInPersia），爱丁堡和伦敦，布莱克伍德，1922年版，第123—124页，第156页，第218页，第227页，第254—255页，第276页，第280页；伦乔夫斯基：《俄国和西方国家在伊朗》，第231页）。

伦敦《工人日报》（1946年4月5日）评论说：“联合国组织中反苏大军的冒险活动暂时平息下来。……联合国组织……只有在各国权利平等和互相尊重主权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关于石油协定草案原文见《苏联新闻》，1947年9月13日。在纸面上，这个协定似乎比英伊石油公司的特许权对波斯更为有利得多（1947年8月24日《真理报》如此宣称），但是波斯人从苏一波里海渔业公司所得到的经验一直是不能令人鼓舞的。这个渔业公司是根据1927年10月1日一个为期二十五年的协定建立起来的，名义上给波斯政府一半股份和一半董事名额。“当董事会上双方票数相等的时候，会议无权投决定票；但是实际上，苏联坚持三名波斯成员应该是‘友好的’。波斯人和俄国人应该轮流担任经理；但是在1941年轮到波斯人的时候，俄国人不允许由波斯人领导公司。偶尔，董事们陷入僵局的时候，俄国人经理就按照董事会上俄国成员的意见行事，并把反对意见转给德黑兰的苏联大使馆”[阿瑟·C·米尔斯波《美国人在波斯》（ArthurC.MillSpaugh：AmericansinPersia），华盛顿，布鲁金斯学院，1946年版]，第175页；参阅E·P·哈里斯：《世界工会联合会代表团访问伊朗：（少数派）报告》，1947年版，附录，第2页；爱德华·萨布利埃（Edouardbablier）在《世界报》上的文章，1947年8月12日；M·菲利普斯·普赖斯议员（M.PhilippsPrice，M.P.）在《曼彻斯特卫报》上的文章，1947年10月25日；伊丽莎白·门罗在《观察家报》上的文章，1947年11月2日。

鲁兹率领一个中央政府代表团去大不里士，以便“拟订出接受这个省回到政府中来的详细计划”。他率领代表团检阅了仪仗队，通过鼓掌欢迎的人群而来到了自治政府的总部；他只花了两天时间就在一项方案上达成了协议，而这个方案与卡旺·萨勒塔纳4月22日提出的建议并没有很大差别。阿塞拜疆“国会”将变成省议会，它有权保有这个省岁入的四分之三；中央政府将从省议会提名的一批人中遴选和任命一位总督；“民族军”的未来将由一个联合委员会来决定；阿塞里语（阿塞拜疆的土耳其语）或库尔德语——如果有条件的话，在小学里同波斯语一起教授。德黑兰和大不里士之间发生这些曲折变化的原因，显然是因为考虑到议会的批准苏波石油协定要取决于选举的举行，而卡旺·萨勒塔纳又使选举取决于大不里士“政府”的屈服（至少在名义上）；一旦德黑兰证实苏联军队终于离去，侯赛因·阿拉的谴责声音在安全理事会上已经沉寂，大不里士就采取了和解态度，看来背后一定是受到了莫斯科的压力。

据说，6月2日一位莫斯科电台的评论员曾说过：“苏联对波斯这样友好的态度，在一个大国同一个小国家之间的全部历史上是罕见的”，并继续批评英伊石油公司在波斯西南部胡泽斯坦省的租借地的情况，把租借地里的英国当局说成是伊朗人民党控制的工会和所有“民主”党派、团体的绊脚石。事实上，早在1942—1943年，伊朗人民党就已派遣代理人去胡泽斯坦，在油田和阿巴丹炼油厂的工人中间煽动不满情绪。然而这些代理人（其中很多人来自阿塞拜疆）曾得到严格的指示：行动须谨慎小心，在战争继续进行期间，不要造成太大的骚动，以便不妨碍俄国所迫切需要的、西方盟国正在提供的战争物资（包括阿巴丹炼油厂的飞机汽油）顺利通过波斯；但是，这些代理人也曾被告知，当战争结束之后，盟国不再以物资供给俄国的时候，一有可能就要在胡泽斯坦掀起大规模的骚乱活动。

在英伊石油公司的生产地区煽动骚乱的计划是非常仔细地拟订的。选定的第一个暴动的地点，是阿巴丹以东大约九十英里的、比较新的阿加贾里油田。那个油田的迅速发展造成了劳动力的大量增加，但是战争限制了这家公司，使它不能在那里为它的工人提供足够的舒适的生活起居方面的设施，以补偿当地特别气闷和多灰尘的不利条件。由此引起的不满情绪，很容易被伊朗人民党的煽动者们所利用，他们在1946年5月10日成功地挑起了一场罢工，这次罢工延续了三个星期，最后，公司答应大量增加工资，罢工期间的工资照付，并在整个油田区年提供大量新的舒适的生活设施和社会服务，罢工才得到解决。阿加贾里的罢工，在其他油田和阿巴丹立即引起75了反应，

---

《泰晤士报》，1946年4月23日。

条约原文见小阿尔奇·罗斯福：“马哈巴德的库尔德共和国”，《中东杂志》，1947年7月，第1卷，第258—259页。

据报道，苏联部队“不仅住在这个国家；而且夺去了这个国家的不动产，从森林一直到兵营的门窗”（1947年《经济学家》特派记者的文章，191年3月29日，第460页）。

安全理事会中以美国和英国为首的大多数代表在4月15日和23日作出决定：波斯事件应该在议程上保留到5月6日，尽管波斯政府“完全相信苏联政府的诺言和保证”，在4月15日撤销了他们的控诉。这就引起了葛罗米柯的无辜受害的抗议：“某些国家把伊朗当作一种抵押品，根据情况和当时所追求的政治目的而任意摆弄。……竭力利用伊朗作为国际政治交易中的小筹码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1年，第1辑，第2号，第140页，第203页）

在这些地方伊朗人民党的代理人早已充分打好基础。宣布总罢工之后，在7月中旬，阿巴丹发生了最严重的骚乱。来自波斯北部的伊朗人民党代理人在当地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居民之间潜伏的相互仇恨上巧妙地大做文章，结果很多人在流血冲突中失去了生命。局势很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如果不是迟迟才领悟到这种危险的波斯政府终于宣布了戒严令。于是波斯的军队和警察进行干预，很快地恢复了秩序；但是罢工者拒绝复工。7月16日，穆扎法·菲鲁兹从德黑兰率领一个政府调查团到达那里，允许增加罢工者的工资和其他福利，劝说他们复工，还保释了被当地波斯军事长官逮捕的五名伊朗人民党领袖。8月后来，为了抚慰参加波斯内阁的伊朗人民党的代表们，这位军事长官还被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就是为了他在罢工期间为恢复秩序而采取的那些措施。

这时，在波斯的一些主要城镇中，数以千计的机会主义分子正在被接纳为工会会员或伊朗人民党党员，显然这个党被认为是大有前途的。而在乡村地区，伊朗人民党大言不惭地宣称要在各地建立农民协会，并在某些有利地区组织“真正的农民起义”，实行拒付地租，抢劫地主的谷仓和夺取他们的土地。8月1日，卡旺组成了一个新内阁，那位“伊朗人民党的同盟者”穆扎法·菲鲁兹成了副首相兼劳工和宣传大臣；伊拉杰·伊斯坎达里被任命为商业和工业大臣；教育大臣和卫生大臣的职位则由他的两个伊朗人民党同事担任。但重要的是，卡旺仍亲自控制着内政和外交这两个重要的大臣职位。《泰晤士报》外交记者在8月3日评论说，英伊石油公司的英国雇员们对波斯政府维持法律和秩序的一些规定仍旧感到不满，英国海军部已于7月17日命令三艘军舰驶往靠近阿巴丹的阿拉伯河的伊拉克领水，而这是1930年英国—伊拉克条约所允许的；印度政府（当时仍属英国管辖）也在8月2日声明：“为了使他们在局势需要时，可以就近保护印度人、英国人和阿拉伯人的生命，为了保护印度和英国在波斯南部的利益，正在从印度派军队到巴士拉去。”伦敦印度事务部的一位发言人说，除非发生重大事变，派军队进入波斯领土不致发生问题。第二天，波斯政府发表了一项声明，批评英国的行动，理由是：没有外来的干涉，他们完全能够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波斯的左翼报纸立即行动起来，伊朗人民党的机关报《领袖报》攻击英国所采取的行动“对于一个和平和民主的世界是不适宜的”，并且质问道：“艾德礼先生和贝文先生的政府是被那一伙头戴石油冠、坐在对殖民地敲骨吸髓而建立起来的宝座上的英国人捧上台的吗？”6日，英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说：

波斯石油工业，给大不列颠和波斯两国之间为了双方的利益而继续有成效地合作，提供了一个场地。英王陛下政府愿意在各个方面发挥它的作用，提供它的有价值的帮助，并深信英伊石油公司与波斯政府将能充分地合作无间。但是，波斯政府有责任保证全国处于十分稳定的状态，以便使波斯的石

---

《纽约时报》，1946年5月20日。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1年，第1辑，增编第2号，第52—54页。同时，穆扎法·菲鲁兹在德黑兰说，侯赛因·阿拉的第一个报告是“他个人的意见，不是波斯政府的意见”。

《纽约时报》，1946年5月22日。

同上，1946年5月30日。

伦乔夫斯基：《俄国和西方国家在伊朗》，第290页。它挑选了大不列颠政府的内政部长萨拉穆拉·贾维德博士，他是一位老资格的、受过俄国教育的共产党员，新近在从事建立秘密警察的工作。

油能够在波斯和世界的经济中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8日，波斯外交部宣称，他们已要求现已到达巴士拉的那个旅团调回印度，并且已对英国广播公司和新德里电台广播的调子提出抗议；但是波斯照会的总的态度据说并非“不是不友好的”。英国在15日作出伪答复是和解的，它欢迎波斯政府迅速而有效地恢复油田的秩序和安宁，并否认谣传所说的新近派往巴士拉的军队奉有在万一必要时即开进波斯的命令。

当卡旺·萨勒塔纳还在谋求苏联军队撤出波斯北部的时候，他对右翼批评和反对他的人是很严厉的；但是一旦苏联完成撤军，同阿塞拜疆的“协定”也已在6月13日签订，他只等待了两个星期，就在29日连忙宣布“波斯”民主党的成立。这个党时真正目的，是抵制伊朗人民党的影响，并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为卡旺获取多数选票，

但在表面上则说是为了搞好和三大国的关系和致力于国内改革。在油田危机后的三个星期的间歇期间，卡旺不动声色地按照他的计划积极进行。但是在9月8日据宣布：不屈不挠的穆扎法·菲鲁兹在伊斯法罕发现了一起反政府阴谋。这个阴谋是“得到外国帮助”的巴赫蒂亚尔部族酋长们为首策划的，目的是引起内部混乱和建立一个“反动的、封建的、部族的政府”。20日得到消息说，在法尔斯省的卡什盖伊等几个部族发生了骚动。三天后这个省的省长带了一份请愿书来到德黑兰，这是由部族领袖们和反对伊朗人民党的城镇人士在省会设拉子草拟的。他们要求除卡旺本人外的内阁全体辞职，释放被菲鲁兹逮捕的巴赫蒂亚尔酋长们；享有与6月份给予阿塞拜疆的同等程度的本省自治权。英国外交部否认了从德黑兰和莫斯科传出来的、关于停在波斯湾的英国船只正在以武器和弹药供给叛乱者的传说。正当苏联外交部中东司的首脑抵达德黑兰访问的时候，波斯驻伦敦大使要求英国外支部分对莫斯科电台的一项指责进行询查，俄国人的指责是：英国驻阿瓦士和伊斯法罕的总领事曾煽动南方的部族叛乱。尽管外交部绝对否认与他们有牵连，但波斯政府仍一度坚持要求把那两个官员调走。叛乱继续蔓延，政府失去了卡齐隆要塞和布什尔港，被迫与部族领袖们重开谈判，最后终于接受了他们的大多数要

求。那位伊朗人民党的宣传家后来写道：“在这样一种局势下，伊朗人民党与卡旺的合作不再有任何意义。10月6日），三位伊朗人民党的大臣根

---

引自《苏格兰人报》，1946年6月3日。

见劳伦斯·洛克哈特博士：“英一波石油争议的原因”，《皇家中亚洲学会季刊》，1953年4月，第40卷，第143—143页。

伊斯坎达里（《中东杂志》，1950年6月，第9—10页）；但参阅吉迪翁，哈达里：“伊朗土地改革问题”（Gideon Hadary：“The Agrarian Reform Problem in Iran”），《中东杂志》，1951年春季，第5卷，第194页：“尽管农民人口占压倒多数，而伊朗经济又属农业性质，乡村居民在伊朗人民党全盛时期的党员总数中只占一小部分。”伊斯坎达里在反复讲党的路线时说，1946年五一节，在三十个城镇中有七十多万人在伊朗人民党及其工会的旗帜后面列队游行；参阅巴什基罗夫，第70页。

油田雇用了数百名印度人。

《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1946年8月3日。8月4日伊拉克官方的一项公报说，英国打算派军队去接替已决定调走的驻在巴士拉附近舒艾巴机场的英国军队，伊拉克政府已表示同意（《纽约时报》和《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1946年8月5日）。

引自《泰晤士报》，1946年8月5日。

据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拒绝了参加内阁的工作。” 19日，卡旺重新改组他的内阁，去掉了身为伊朗人民党员的那三位大臣和穆扎法·菲鲁兹，对于后者，他很恰当地把他任命为驻莫斯科的大使。在德黑兰，据“可靠”消息说，由于卡旺罢免了79德黑兰、伊斯法罕和克尔曼沙赫三个地方的伊朗人民党员地方长官，已引起内阁危机；关于这件事，苏联大使曾提出警告说，这种行动是对苏联的一种侮辱，但是卡旺没有理睬苏联的警告（据华盛顿的“确实”消息）；他得到年青的国王的强有力的鼓励，而国王又转而从美国和英国大使馆那里获得了“给予支持的暗示”。

那位伊朗人民党的宣传家在回顾往事作“自我批评”

的时候，感到他的党曾“使自己被这样一种幻想引错了路：以为卡旺会恪守他在4月4日苏波协定上所作的一有可能就举行选举的保证，并且过高地估计了卡旺与国王之间的个人分歧”；“波斯民主运动”现在已不得不商对“一个越来越残酷的镇压”，这是卡旺为选举所做的准、备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时，11月24日很快就要到来，卡旺在4月里曾答允不迟于这个日期把苏波石油协定草案提交议会审批。苏联外交部中东司的首脑9月底访问德黑兰的目的之一，大概就是为了催促这件事。10月6日，正式宣布国王已签署举行选举的法令。但是，关于何时举行选举，仍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论。左翼当然要求加速进行，保守派则极力主张延缓，因为那几个省的局势还不安定。当官方的歧视和镇压已使伊朗人民党的影响受到很大损失的时候，中间派和右翼的报纸（得到官方的赞同）开始直率地发表他们的看法，而在几个星期之前就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11月4日首相宣布，选举将在12月7日开始，在11月21日他进一步宣称，“为了保证选举的自由和镇压可能发生的骚乱”，选举将在全国各地在政府部队的监督之下举行。过了两天，在国王、首相和军队司令官们举行

---

同上，1946年8月7日。据报道，在6月份的三个星期的罢工之后，英国政府就已提醒波斯政府注意在油田地区维持法律和秩序的重要性（《每日电讯报》，7月6日）。

英国共产党在8月9日声称：“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开会期间由西方反动派发动的谴责苏联压迫波斯的诽谤运动之后，现在英国的政策是公开地使用军事强制的办法来干涉波斯的内政了。……派遣部队和派遣一艘巡洋舰到波斯（原文如此）水域，是想压制为改善自己悲惨状况而正在举行罢工的英伊石油公司雇用的工人。这是吸收了波斯人民中很得人望的民主政党伊朗人民党的成员进入波斯政府中去之启立即发生的事。这种干涉，是最无耻的侵略性的帝国主义，为了大石油垄断组织的利益而去反对一个小国的自由。”（《工人日报》，1946年8月10日）

见上文；原著第68—69页。他在5月18日的一次广播讲话中曾说：“让这些卖国贼和坏心肠的人知道，我是充分了解他们的煽动和叛卖行径的，我要把他们彻底消灭掉，立象一个园丁必须把毁坏他花园的害虫消灭掉一样。”

伊朗人民党的宣传家伊斯坎达里谈到了企图在卡旺和伊朗人民党之间制造敌对的宫廷阴谋，并且从卡旺的党现在得到土地所有者和商人的支持这一方面看到了“英国和美国两个帝国主义共谋的证据”（《中东杂志》，1950年7月，第9页）。

参阅M·谢尔盖耶夫（M·Sergeyev）对部落领袖们的攻击：“在伊朗南方”（In Southern Iran），《新时代》，1946年2月15日，第20—24页。

他们之所以能够去尝试做这种事，不是由于人们所假设的英国人提供了武器，而是因为他们有获得武器的天生癖性。1941年8月英苏进行干预之后，波斯军队瓦解了，崩溃的军队丢下的大量武器给这些想得到武器的部落帮了大忙。关于这个地区在1941年以前武器走私，特别是通过马斯喀德的情况，可参阅阿诺

了一次会议之后，阿塞拜疆的“民主党人”总督得到通知说，这一法令也将适用于他那个省。尽管有6月“协定”，这个省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很少改善，而且政府军队在重新占领哈姆萨省的省会赞兼时还遇到了“民主党人”的抵抗，“民主党人”本来已同意在11月14日以前撤离该省。在来自大不里士的激烈抗议声中，美国大使乔治·v·艾伦在27日发表声明：大家都清楚地知道，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对维护波斯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给予支持。这个原则体现在联合国宪章中。

波斯政府打算派遣它的保安部队到波斯全国各地去，包括这种部队目前还未控制的任何地区，以便在选举期间维持秩序，依我看来这是完全正常的和适当的决定。同一天，据说苏联大使离开了他的病床，就波斯政府的“不友好政策”去向国工和首相提出抗议；苏联不能“以赞许的眼光看待阿塞拜疆的流血”。他向首相提到那个还悬而未决的石油协定；但是卡旺的行动已经巧妙地使苏联处于一种尴尬地位，它只能就两种相互排斥的办法选择其中之一：要么举行一次议会选举，作为把石油协定提交批准的初步措施，要么维持阿塞拜疆的共产党政权，而让批准工作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要使这两者结合起来，就必须再一次入侵波斯，或至少进行侵略威胁。俄国的外交政策

---

德·威尔逊爵士：《波斯湾》（Sir, Arnold Wilson: The Persian Gulf），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28年版，第270页；菲利普·格雷夫斯：《珀西·考克斯爵士传》（Philip Grayes: Life of Sir Percy Cox），伦敦，哈钦森，1942年版，第141—143页，第160—163页。

《纽约时报》，1946年9月24日；对照同一天伦敦《工人日报》外交记者的文章：“英国费了很长时间仔细拟订的使油田脱离波斯而并入伊拉克的计划，看来正在成熟。夺取了波斯湾各港口的部族成员武装得很好，但，提供给他们手提机关枪、来福枪和弹药的，并不是他们自己的政府。……据悉，这些部族的代表最近曾去过英国司令部所在地的巴士拉。……一种紧张的气氛正在被精心地制造出来——正是在这种气氛中，英国才有可能派军队跨过边界去‘保护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以实现它的威胁。”

《泰晤士报》外交记者报道，1946年9月30日；《每日电讯报》，1946年10月2日；约瑟夫·艾尔索普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的文章，1946年10月2日。那位伊朗人民党的宣传家后来声称。8月底波斯政府曾获得一份文件。文件透露巴赫蒂亚尔部族和卡什盖伊部族的酋长们向英国特务人员“在英国驻伊斯法罕总领事特罗特的面前”曾举行过一次秘密会议〔伊斯坎达里（《中东杂志》，1950年9月，第4页）；但事实上特罗特是驻阿瓦士的总领事：见《外交部名册》〕。这里谈到的那个文件大概是指“一名英国驻设拉子领事在从一位部族酋长那里接收一批缴获的德国武器的那张照片”。伊朗人民党的一名党员发现了这张照片，并“把它当作是一幅这位领事在发放英国武器的照片”（克里斯托弗·赛克斯（Christopher Sykes）致《新政治家与民族》周刊的信，1950年10月14日，第362页；关于一批德国特务人员1944年向卡什盖伊部族投降的事，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157页注）。英国驻伊斯法罕总领事在10月4日离开波斯去接受一项新的任命，“而这项新的任命是波斯骚乱发生之前就作了安排的”（《每日电讯报》，1946年10月5日），于是波斯政府要求把特罗特调走的事也就不再提起了。

伊斯坎达里（《中东杂志》，1950年10—11月，第13—14页）。

1947年8月，波斯政府免除了菲鲁兹的这项职务，检察长以叛国和挪用公款的嫌疑罪对他起诉。莫斯科说他已在9月14日乘飞机离开那里前往德黑兰。但是他实际并没有去德黑兰，而是奔向了日内瓦和巴黎，在那里他发表了一个声明，号召波斯的“进步人士”起来行动（《纽约时报》，1947年9月20日；《现代东方季刊》，1947年第3—4季度，第11—12期，第213页；比德尔·史密斯：《出使莫斯科》，第96页）。

罗伯特·斯蒂芬斯在《观察家报》上的文章，1946年10月20日；彼得·惠特尼（Peter Whitney）在《苏

总的来讲最近已变得更加和解——这种变化可以说起因于两件事：美国和英国对俄国战后侵略行动的抵制；俄国在重建它被战争破坏的经济中所遇到的内部严重困难。这时，当波斯政府军队继续从赞兼前进时（大不里士电台在广播中谴责说：“卡旺正在重复德国和日本法西斯分子的暴行”），卡旺拒绝了阿塞拜疆省议会提出的这样一个建议，中央政府应满足于派观察员和报纸记者前来观察由本省当局主持进行的选举，并在12月3日宣布选举推迟到11日开始。作为答复，大不里士电台宣布，省“政府”已经把武器分发给全体工人、“国民自卫队”和青年联合会的成员；据称中央政府的军队已经跨进该省边界，因此还作出了鼓动性的宣言：“在我们经过81天奋斗和流血建立了我们的共和国之后，我们一定要保卫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们全都决心执行我们的领袖的命令，领袖们必将带领我们去反对那些正在支持长枪党西班牙的外国秘密部队，而德黑兰政府则已经变成他们的盲目的工具。”皮沙瓦里叫喊：“让伟大的革命蓬勃兴起吧，它将使人民摆脱压迫者而获得自由”，但这种叫喊是徒然的。据说，卡旺在11月中旬已经采取了预防性措施，下令逮捕在德黑兰的一百名伊朗人民党重要成员：只有马赞德兰省的一个矿区域镇济腊布。对受到威胁的“人民民主”作出了深表同情的反应：但是伊朗人民党试图在哪里举行的暴动却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当中央政府的飞机在散发传单鼓动阿塞拜疆人民起来推翻“民主的”政权时，波斯政府又向苏联大使馆发了一份照会，保证所要采取的行动仅仅是为了监督选举，而决不是矛头指向苏联的利益。据人们在莫斯科的观察，苏联报纸把阿塞拜疆危机作为一转纯粹是波斯内部的事件，“用某种超然的口气”予以评论。政府军队在10日越过了省界，只遇到“装备不良和纪律松弛的”敌对部队的轻微抵抗，并且在第二天进入米亚内之后，就收到了“民主党人”投释的消息。现在除了几群孤立的狂热分子之外，抵抗已渐渐消失，13日下午政府单队进入了大不里士。那位伊朗人民党的宣传家又在“自我批评”地回顾时，为“民主党”的垮台找到了原因，那就是：“具有战斗精神的农民是这样的分散和宽组织，以致还不能实现他们同工人阶级的不可缺少的联盟；而工人阶级本身……也还缺乏必要的团结和政治训练，使它不能在革命运动中有效地发挥其领导者的作用。”他接着说，省议会在12月12日根据“极端严格的革命的逻辑”和“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分析”，作出了放弃武装抵抗的“严肃决定”：因为否则就要引起帝国主义列强在波斯西南部进行直接干涉，“把战争带到苏联的邻近边界，对世界的和平和安全构成严重的危险”。但是，他也承认，“民众”武装部队的撤退马上变成了82次“无组织的溃败”。皮沙瓦里和其他“民主党”领导人成功地逃到了苏联境内，他们的几百名

---

《格兰人报》上的文章，1946年10月24日。

伊斯坎达里，前引文。

见上文，原著第71页。

《曼彻斯特卫报》，1946年10月3日；《泰晤士报》，1946年10月7日和24日，11月5日和23日。

《泰晤士报》，1946年11月25日。

1946年4月在他四十三岁时被任命为驻波斯大使，以前曾是国务院近东和非洲司副司长。

《每日电讯报》，1946年11月28日。这一态度已由美国代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予以证实（《纽约时报》，1946年12月11日）。

《纽约时报》，1946年11月29日；参阅侯赛因·阿拉致安全理事会的信（联合国安全理事会，S204，



不幸的追随者则在从投降到政府部队“恢复秩序”这一期间，被追捕和杀掉了。

早在 12 月 12 日就到达大不里士的三名美英报纸记者报道说：政府军队受到了热情接待。一年以后，一位“进步的”外国观察家报道说：“民主”政权在一年里已经着手进行的改革，比之大不里士以往所作的改革更多些，其中包括建立一所妇产科医院，一所大学以及一座电台；采取有效的治字措施以减少犯罪与骚乱；实施劳动法；与鸦片实卖作斗争，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尽管搞得不彻底；此外还裁减了一些政府冗员。然而，他也听到了一些“刺耳

的话，甚至是来自朋友方面的，“说它滥用权力和助长恐怖，说它把商人从城市吓跑了，商业已严重衰退”。况且，“民主党人”“完全没能”赢得人民群众支持分离主义，也未能唤起农民的“坚定与热情的支持”。

由于征收原属地主的那份收获物，他们使人们仍旧认为封建主义并未消灭。阿塞拜疆农民弄清地主代理人与大不里士政府代表之间有什么区别。尽管他们被答应给予土地，而且在省内某些地区农民实际上已经得到土地证，他们仍然要承担向局外人交付贡物的义务。……所谓保证进行彻底的全面土改和输入机器与家畜的诺言……

乃是华丽而虚伪的辞藻，人们愈来愈不爱听这种空谈了。

此时波斯中央政府着手根除阿塞拜疆和库尔德斯坦自治政权的一切痕迹。据报道，阿塞拜疆的学生们“自发地”毁掉那些土耳其方言的教科书，这些书是“民主党”政府供给他们的。波斯语再次成为大不里士电台和当地报纸的语言。抵达马哈巴德的中央政府部队，逮捕了库尔德 83 自治共和国的大多数领导人，其中有些人，包括卡迪穆罕默德本人和他的两个亲戚，后来都受军事法庭审判，当众处以绞刑，而穆拉·穆斯塔法以及一千个左右他的巴尔赞追随者却越过边境，逃入苏联阿塞疆。波斯当局禁止用库尔德语教课，封闭库尔德文印刷所，公开焚毁他们所能找到的一切库尔德文书籍。同时，在德黑兰对伊朗人民党进行了疯狂的迫害。12 月 13 日，一批暴乱的阿塞拜疆流亡分子由于该省“民主党人”的投降而趾高气扬，捣毁了该党的总部，而德黑兰警察并不加以阻拦；民主党人的报纸《领袖报》和《胜利报》已被禁止发行，他们的俱乐部遭到袭击，并被关闭，据说这是一支叫做“自由卫队”的穿着制服的武装队伍所干的。据说，国营工厂里的工人如果不撕毁他们的伊朗人民党工会会员证与加入卡旺的党主办的新工会，他们就有被解雇的危险。在伊朗人民党内部，中央委员会把权力交给一个临时执行委员会，后者于 1947 年 1 月 5 日发表一项声明，批判“过去的错误”，谴责阿塞拜疆运动，指定一个委员会清洗党内的不良分子，并宣布它的政治态度是打算“遵

---

1946 年 12 月 5 日)。

参阅伦乔夫斯基：《俄国和西方国家在伊朗》，第 307 页。

参阅“这样的贫穷——和这样的富裕”（“So Poor - and So Plenti-ful”），《经济学家》，1947 年 3 月 15 日，第 380—381 页。

《泰晤士报》，1946 年 12 月 4 日和 5 日；关于这一年 7 月间伊朗人民党在德黑兰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以反对西班牙政权的事，见下文，原着第 84 页。

伦乔夫斯基：《俄国和西方国家在伊朗》，第 308 页；《纽约时报》，1946 年 12 月 8 日和 9 日；《泰晤士报》，1946 年 12 月 28 日。

循英美和瑞典实行的那些民主原则”。然而，看来这纯粹是一种权宜措施，因为六个月以后，一名法国记者报道说，尽管他发现新成立的执行委员会的那些领导人是“正派、聪明的人，在好些方面令人感到可新”，而且比波斯的当权派有着更为康洁的声誉，但同他们孜孜不倦地仿效的那些欧洲模范一样，他们有着一种不幸的趋向、即易于歪曲每一项与他们的观点不一致的事物的真相。他们用教条主义的眼光看待事件的进程，这样就曲解了事件进程对他们所具有的意义，使他们——多少有些自觉地——成了被他们称为鼓舞者的那些主子的工具。在波斯人眼中，他们蓄意在替俄国人出力，这样做大都是损害民族利益的。而且象波斯这样一个土地广阔，人口稀少、又治理得84很坏的国家在正常情况下，选举也要延长到几周，甚至几个月。这一次，由于政府对阿塞拜疆和法尔斯两省的控制很不稳固，更有理由与托辞把选举拖延得比往常更长久了。1946年12月，美国政府已在原则上同意向波斯军队与宪兵（斯瓦茨科普夫陆军准将这时还提任宪兵队的顾问）出售“适当数量的军需品，以便维持国内治安之用”。1946年12月26日公布了一项协定，其中规定今后二十年内将把英石油公司生产的大部分石油（据说是百分之二十）供两个主要的美国石油分配机构利用，以便供应东半球。占前东半球所需石油主要是由西半球油源提供的，如今决定将这一部分油源贮存起来了。1947年2月，据宣布，一家美国工程建设公司（莫里森-努森公司）已被波斯政府聘请去研究七年计划期间波斯发展的可能性。当时还报道说：它已建议向国际开发银行要求一笔约二亿五千万美元的贷款。杜鲁门主义宣布以后，美国接过了早先由英国承提的义务，向希腊与土耳其提供经济与军事援助，因为这两个国家分别受到共产主义革命与苏联侵略的威胁。同时，国务院设立了一个管理希腊、土耳其和伊朗事务的新部门。

愈来愈受共产党控制的世界工会联合会，这时已经对波斯的左翼政治势力发生很大的兴趣。它的总书记路易·赛扬（他自己就属于左翼）应波斯政府的邀请，亲

自去了解波斯工会运动的发展状况，他曾在1946年7月伊朗人民党在德

---

亚历山大·沃思（Alexander Werth）在《曼彻斯特卫报》上的文章，1946年12月10日。

“同国王很接近的”有关方面说：就在这个时候，苏联大使要求国王停止前进，因为这“将引起骚乱，苏联为了自己边界的安全，不能无条件地予以容忍”。而国王则能够这样答复他：没有发生骚乱的危险，因为大不里士已欢迎政府的军队去，内战已经结束了（《纽约时报》，1946年12月14日）。

伊斯坎达里（《中东杂志》，1950年10—11月，第13—14页和1951年1月，第12—13页）。

后来在德黑兰听说，在波斯政府要求引渡皮沙瓦里之后，来自苏联的消息说他已在巴库的了一次车祸中死去（《纽约时报》，1946年9月20日）。

同上，1946年12月14日。

莫里斯·欣德斯：《探索未来》（Maurice Hindus：In Search of a Future），伦敦，高兰兹，1948年版，第92—94页。作者于1947年夏访问过波斯，包括阿塞拜疆在内。又见约瑟夫·艾尔索普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的文章，1946年12月30日。

奇·罗斯福：“马哈巴德的库尔德共和国”，《中东杂志》，1947年7月，第1卷，第266—268页；雅姆·德科凯（James de Coquet）在《费加罗报》上的文章，1947年3月30—31日；爱德华·萨布利埃在《世界报》上的文章，1947年8月14日；《泰晤士报》，1947年10月24日。

《纽约时报》，1946年12月14日、17日、24日；安德鲁·罗思：“波斯剧场的后台”，《民族》周刊（Andrew Roth：“Backstage in the Persian Theater”，Nation），1947年5月3日，第516页。

黑兰组织的反对西班牙佛朗哥政权的群众示威游行时发表过演说。1946年12月18日，应波斯统一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莫斯科训练的共产党人礼萨·鲁斯塔的请求，以赛扬为首的世界工会联合会的一个代表团向波斯驻巴黎大使提出请求。他的政府必须让伊朗人民党控制的工会恢复行动自由；同时，一个世界工会联合会代表团被允许访问波斯。这个代表团是由黎巴嫩共产党控制的工会的领导人的穆斯塔法·阿里斯率领的，成员中有俄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1947年2月，该代表团抵达波斯之前不久，据报道说，波斯工会运动内部反共产党的一派已进占工会总部，并推翻了礼萨·鲁斯塔。后来鲁斯塔又因从事煽动与欺诈活动的罪名而被逮捕了，主要是由于他曾企图设法使坚强的共产党人担任世界工联派往波斯的工会顾问。在阿里斯和代表团的俄国成员建议之下，世界工会联合会代表团拟定了一份报告，在报告初稿中表示支持伊朗人民党控制的工会，不同意政府谴责工会打算发动革命的行为，声称工会的行动不过是工人阶级服务与反对法西斯主义，前一年7月的反佛朗哥政府的大示威就是一个明证。报告中说：“如果波斯政府坚持它的政策，如果波斯的这种比希特勒统治时期还有过之无不及的违背人道的状况继续下去，那么代表团建议把波斯工会的情况提请联合国进行讨论。”然而，在一次争论相当激烈的会议的末尾，英国代表（E·P·哈里斯，工会联合会大会组织部书记）退出了会场，并起草了一份少数派的报告。结果，与他共事的两位共产党代表（那个法国人显然已退出）大刀阔斧地修改了他们的报告。哈里斯签了字，因为他接受了修改稿的可取之处，虽然他仍然并不同意报告本身的大部分内容；在他看来，他的代表团内的共产党伙伴为之大喊大叫的那些被拘禁的工会人员，已经参与了未遂的国内叛乱，“任何一个政府面临这种情况”，都会如此对待他们的。代表团《关于伊朗工会情况的报告》提交给了7月在布拉格举行的世界工会联合会执委会会议，同月8日，赛扬向在那里的波斯首相提交了一份执委会的决议，谴责“波斯政府采取反对自由民主的工会及其成员的反民主措施”，并扬言要将此情况提交联合国讨论。 86

6月19日，波斯内阁辞职，卡旺受命组织新政府，有好几个成员被描写为“对西方政府极其友好”的人士，其中三个是德黑兰美国学院的毕业生。改组政府一事是与6月20日美国提供二千五百万美元军事贷款一事同时发生的。在整个炎热的夏季，当选举官员、审查议员当选狂等各项准备举行议会大会（选举终于结束了）的程序正在悠哉游哉进行着的时候，苏联的报纸与

---

见《埃及金融市场报》，1947年1月6日；《泰晤士报》，1947年1月10日；伊斯坎达里（《中东杂志》，1951年1月，第12—13页）。

爱德华·萨布科埃在《世界报》上的文章，1947年8月15—16日。伊朗人同党报纸《人民报》（Mardum）现在是他们的主要机关报（《领袖报》因为处于绝境已经停办），它被描写为“汉仅是《真理报》的毫无生气的翻版”（《泰晤士报》驻德黑兰记者报道，1947年10月24日）。

《纽约时报》，1947年4月11日。

《石油新报社》（Petroleum Press Service），1947年1月，第14卷，第9—11页；《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363页。

《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1947年2月12日；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的文章，1947年3月12日；并见下文，原著第92—93页和第98—99页。

见上文，原著第36页。

电台对“波斯反动派”、“工人阶级的刽子手”和“英伊石油公司的阴谋家”发动了猛烈的攻击。8月12日，苏联大使向卡旺·萨勒塔纳提交了一份根据1946年4月石油协定的方针制定的条约草案。六天以后，据报道说，卡旺已告诉苏联大使，他不喜欢协定的条文，也不可能强迫议会批准它。于是，苏联大使在8月28日交给他一份照会，提请注意他的政府“破坏”协定，并将他们的行为说成是“倒退到礼萨国王政府统治时期所执行的、往后赛义德、萨德和哈基米政府相继承袭的那种敌视与歧视苏联的政策”。

一旦苏联政府拒绝在规定的日子从波斯撤军，美国政府就在这一地区与英国政府联合起来抵制苏联的冷战，因而在十八个月中，英美两国的对苏政策没有明显的分歧：但是现在却即将出现分歧，这一分歧对于今后的年代具有重要的影响。据伦敦“消息灵通方面”说，英国政府担心，假如鼓励波斯政府完全拒绝苏联联合开发波斯北部石油资源的话，可能促使潜在的波斯民族主义向南87部的英伊石油公司的开采权挑战。9月时第一周内，英国大使向卡旺提交了一份照会，提出下列建议：

谨建议波斯政府最好勿堵死继续协商的大门。……波斯政府不应断然拒绝，就此了事。假如不能接受苏联的条约草案——因为它是在施加严重压力的时刻，在临时协议基础上制订的，并且是作为一项要求提出来的——他们可以等待机会，让对方以后提出经过修正的更为公正的条款。

这个照会发出后，在德黑兰即刻引起一种广泛的疑虑，认为英国与苏联，也许还有美国，已经达成一项牺牲波斯的

协议。接着英国大使离开波斯休假，直到11月初才返回。美国与英国不同，它的政府没有那种用为与波斯石油有直接利害关系而产生的顾虑。9月11日，美国驻德黑兰大使向波斯—美国文化协会发表了一个声明，波斯的舆论必然会理解，这是竭力鼓励波斯干脆拒绝苏联的要求，声明如下：

已经出现了某些关于美国对这件事的态度的谣言和传闻，为此，我被要求申述我国政府的立场。

美国政府经常表明它是尊重伊朗主权的，主权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任何国家都有充分的权利接受或拒绝有关开发其资源的要求。

伊朗的资源属于伊朗。伊朗可以免费将其转让，或者，不管有人愿出多少代价，它可以拒绝出让，如果它想拒绝的话。

美国没有必要关心任何外国政府向伊朗提出的商业上或其他性质的建议，只要这些建议完全是依据具体情况而提出的，其成败取决于对伊朗是否有价值。

然而，如果这种建议包含着极端敌视的威胁 或建议者扬言，假如伊朗拒

---

伦乔夫斯基：《俄国和西方国家在伊朗》，第311页。

《泰晤士报》，1946年7月22日；巴什基罗夫，第70页，第72—73页。

《纽约先驱论坛报》，伦敦《工人日报》，1946年12月19日；巴什基罗夫，第92—93页。

生于1911年左右，1923年在印刷厂工作，1934年成为共产党员，出席1935年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黎巴嫩代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世界共产主义的战略和策略》

(The Strategy and Tactics of World Communism)，增刊第4期，“三百名主要的扩党人”

(“Five Hundred Leading Communists”)，众议院文件，第707号(House Document No. 707)，1948年，第87页〕。

见E.P.哈里斯：《世界工会联合会代表团访问伊朗：(少数派)报告》，1947年，附录，其中载有关于

绝，就会遭到危险，那么我国以及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确实会变得关切的。

美国坚决认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政府向另一个独立自主的政府提出的任何请求，不应该包含恫吓与威胁。如果有人为了力求使对方接受而用这种手段，那么，这些建 88 议本身的价值就值得怀疑了。……

美国将其全部精力与资源都用于使世界人民摆脱遭受侵略的恐惧。无论对伊朗或对世界其他各处。我们都坚决遵循这项政策。因此，爱国的伊朗人士在考虑与其民族利益有关的事务时，可以深信不疑，美国人民将充分支持他们自由地作出自己的选择。9月15日，苏联大使向卡旺送交了措词“极严厉”的第二个照会，要求波斯必须放弃“拖延战术”。苏联报刊与电台继续展开“猛烈的辱骂与污蔑国王与波斯政府的运动”。最后在10月22日，卡旺向议会作了一个关于同苏联政府交涉情况的冗长说明，随后波斯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提出下列动议，以一百零二票对二票通过：1·宣布首相同苏联为订立石油协定而进行的谈判无效。但是他将免受1944年12月2日法令所规定的法律惩处，该法令禁止任何大臣与外国人进行有关石油开采权的交涉。

2. 波斯将在今后五年内开发它的石油资源，并用本国资本开发之。假如必需聘请外国专家，他们将来自“完全中立的”国家。3·如果波斯人的企业发现了石油，政府可以与苏联洽商出售，议会得随时了解整个情况。

4. 波斯不得将开采权授与外国列强，或让外国人成为任何石油公司的合伙者。5·“在任何情况下，如果伊朗的民族权利、特别是有关南部石油的开采权遭到侵犯，政府应进行必要的交涉，并采取必需措施以收回民族利益、并将结果通知议会。”未来的事态将证明最后一条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旁敲侧击地提及了英伊石油公司的开采权。四年以后，据报道，极端民族主义者侯赛因·法提米声称：“在埃及政府要求安理会谴责英国之后”（即1947年下半年），他立即在报纸上发动了将英伊石油公司收归国有的宣传运动。89 波斯议会内的民族主义热情已被煽动得如此高涨，以致卡旺对于他是否能控制议会感到惊惶。11月12日，他从苏联大使那儿已收到第三个照会，指责他的政府要为“背信弃义地破坏其保证”一事负责，此种行为是“与两国间的正常关系不相容的”。12月1日，卡旺在召开一次没有达到法定人数的议会秘密会议之后，向全国作了一次广播，告诫说波斯应在两个大国集

---

共产党人拒绝听取那些在伊朗人民党全盛时期在他们手中受害的人提供的证据。

《纽约时报》，1947年6月8日；并参阅《泰晤士报》驻德黑兰记者报道，1947年7月11日。访问代表团苏联成员记，见《苏联新闻》，1947年5月21日，并参阅巴什基罗夫，第92—97页。

《纽约时报》，1947年6月22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47年6月24日。

卡旺在6月12日已经说过：“我们签订协定时的那些情况，无可争辩地已经变掉了。……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愿望……强加给那些由普选产生的、享有充分的思想与言论自由的议员。因为。假如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将留着眼看协定的原则本身将被议会否决的危险。因此，双方必须估计到这些条件并且谋求谅解，以便向议会提出一个象样的、能被议会和公众舆论所接受的议案（爱德华·萨布利埃在《世界报》上的文章，1947年6月15日）。

原文载《苏联新闻》，1947年9月10日；参阅《真理报》的一篇恐吓文章，该文转载于1947年8月26日《苏联新闻》。

《纽约时报》，1947年9月13日。

《泰晤士报》外交记者报道，1947年9月15日。11月25日《泰晤士报》一篇社论指出，“从波斯方面

团之间保持中立。他在拒绝苏联要求开发北部石油资源的同时声称他也“继续注意英伊石油公司的情况”，并将“作出必要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使波斯民族感到满意”。而且，他还进行了干涉，以求维护波斯在波斯湾阿拉伯人的产油的巴林岛上的主权。他说这一地区是“波斯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这一地区，礼萨国王政府曾根据二百年前波斯的广大版图，不断提出享有主权的要求。然而，这种迎合民族主义感情的说法，并不能拯救卡旺。他在发表广播演说之前，并未征询他的内阁同僚们的意见，因此，除了其中三个人之外，他们都提出了辞呈。12月10

日，当他要求议会投信任票的时候，仅仅获得四十六票，反对者有三十九票，二十七票弃权，于是他辞职了。他被暂时拘留一段时间之后，到月底被允许去欧洲治病。同时，在12月22日，议会选举易卜拉欣·哈基米做他的继承人，而在1946年1月，在苏联对波斯施加压力最厉害的时刻，卡旺曾接替哈基米出任首相。就在同一天，联合国透露了一则消息，说美国和波斯在10月6日签订了一项协定，将派遣美国军事使团提高波斯军队实力。这一协定有效期十八个月：河以延长，在协定有效期间，除非得到美国同意，波斯政府不得聘请任何其他外国人担任与波斯军队有关的职务。

## 第二节 西方援助受挫——否决英伊石油补充协定， 1948—1950年

“一些国家愈是感到自卑，愈是怀疑别人向它们提供的一切援助。”

1948年1月31日。波斯议会打算从最近提供波斯用来购买战争剩余物资的二千五百万美元贷款中，出钱向美国购买价值一千万美元的这种物资，苏联政府就在此时发出了一份照会，抗议最近指派的美国军事代表团的的活动，他们说，这个代表团不仅在重新装备波斯军队和计划改组波斯的军工厂，而且在古姆（离俄国高加索油田四百英里）准备建立一座显然不是供波斯飞机使闲的大机场，同时还在波斯南部搞地下油库，沿苏联边界修建防御工事，还在同一地区打算修建机场和进行空中摄影。照会最后警告说：“所有上述事实与1921年签订的苏伊条约中宣告的睦邻关系是不相容的……苏联政府

---

的观点看来，1946年协定的条款决不是不利的；根据北部省份存在石油的假定，所建议的苏联和波斯之间分享石油的计划是相当公正的。……但是……苏联一开始就拒绝……在双方签署这一协定之前撤退军队……这就使得整个交涉的过程一开始就卷上强迫的气氛，这样就更增强了由来已久的波斯对苏联扩张势力的恐惧心理。”

《苏格兰人报》，1947年11月1日。

卡旺的一些同事前一天已说过，苏联大使曾经警告他，如果波斯议会不批准协定，俄国将把波斯视作“血海深仇的敌人”（《纽约先驱论坛报》，1947年9月11日）。

《纽约先驱论坛报》和《纽约时报》，1947年9月12日。

《泰晤士报》，1947年11月19日和1947年11月25日社论。

《纽约时报》和《战斗报》，1947年10月23日；原文第5条见1952年4月《石油论坛》（OilForum），特别“附录”〔A·H·T·奇泽姆：“英伊石油公司以事实答复伊朗”（A·H·T·Chisholm：Anglo-IraniananswersIranWithFacts）〕，第13页。关于1944年12月2日法令，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479页。

期望伊朗政府毫不延迟地采取必要措施，以消除现存的不正常状态”。这一照会的意图显然是……施加最大的压力，迫使波斯政府放弃对美国的依赖。波斯政府和美国驻德黑兰大使断然否定上述苏联的指责，波斯于2月4日提出答复，针锋相对地指责苏联庇护一年前逃往苏联的阿塞拜疆和库尔德的“卖国贼”以及巴库电台不断用波斯语进行挑衅。苏联照会的恐吓语调未能阻止波斯

议会在2月17日同意向美国购买价值一千万美元的军火，当时议会中经过激烈的争辩，只有六票反对和十票弃权。但奇怪的是，他们拒绝提供运输费和保险费，因此这批军火的运送被延搁下来了。路透社记者报道了当时德黑兰政界的心情是：

假如美国要使波斯成为另一个希腊或土耳其，假如美国国会认为波斯可能成为下一次战争的第一个战场，那么……美国应该免费装备波斯军队。

……美国应该以优惠的条件提供波斯大量贷款，使波斯能用未进行建设。该国……不希望成为俄国或美国或任何其他强国的战场或安全地带，并认为，如果自己被列强利用来“为它们谋巨大的利益，成为它们的替罪羊”，那么它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3月18日，莫斯科电台广播了一位名唤斯坦伯格教授的谈话，他斥责美国“企图攫取伊朗北部的石油，使伊朗成为第二个希腊”，并警告波斯首相，他是在“玩火”；

同时宣称“俄国不能允许在其边界存在一个企图将伊朗变成反俄幸事基地的政府”。波斯政府则坚决声明，他们最近与美国打交道的动机仅仅是为了维护他们的民族利益与国家独立。苏联政府又于3月24日发出照会予以答复，照会中回顾了1941年夏天波斯政府企图否认纳粹特务在波斯活动这件事所造成的后果；照会重申，美国目前已经取得了“将美国军事顾问安插在关键岗位上的垄断权”，并驳斥了波斯关于苏联向波斯人提供政治避难权的抗议，说这些波斯人是“由于他们的民主信念、由于维护民主和进步事业而

---

《埃及金融市场报》，1951年6月28日，转载开罗《最后一点钟》周刊（AkhirSaa）驻德黑兰记者报道；参阅L·洛克哈特在《皇家中亚洲学会季刊》上的文章，1953年4月，第40卷，第144页。

原文载《苏联新闻》，1947年11月22日。

关于经常滥用宪法中有关条款，即要求获得不正常的大量法定人数的情况，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479页注。

半官方报纸《消息报》（Ittilaat）于8月14日写道：“虽然伊朗尚未象土耳其那样加入反苏阵线，但由于伊朗、土耳其和伊拉克都邻近苏联边境，它们在这方面的立场是一致的。”（转引自《苏联新闻》，1947年8月26日）

《泰晤士报》，1947年12月3日。又见马吉德·哈社里：“伊朗要求对巴林的主权”，《美国国际法杂志》（“Iran'sClan to the Sovereignty of Bahrain”，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1951年10月，第14卷，第631—647页；《现代东方季刊》，1948年第1季度，第13卷，第54页，以及1948年第2—3季度，第14—15卷，第172页；《概览，1934年》，第224页，《概览，1936年》，第227页。

《联合国条约集》（United Nations Treaty Series），第11卷，第171号，第303—323页；《纽约先驱论坛报》，1947年12月23日。

J·F·科韦：“在伊朗冒烟的火”，《政治与议会评论》（J·F·Kover：“L'Incendie couve en Iran”，Revue Politique et Parlementaire），1948年4月，第71页。

受波斯政府迫害的”。波斯政府于4月1日反驳说，他们认为“不需要”就聘请美国顾问一事“作更详细的叙述或解释”：并且针锋相对地列举了战争结束以来波斯人对苏联的种种不满，说苏联包庇了逃出波斯的“那些罪犯和盗贼”，把他们称为民主的爱好自由者，这是令人遗憾的，也是与友好睦邻关系的基础格格不入的，尤其是违反了1921年和1927年的苏波条约。4月7日，苏联政府又向德黑兰提交了一份照会，反驳波斯对于3月18日莫斯科广播的抗议，举出的理由是，演讲者是一个普通公民，因此“有充分的自由随时随 92 地可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照会中继续说：“另一方面苏联政府强烈抗议波斯报刊毁谤苏联政府，刊登反苏的政治漫画以及其他讽刺画。”德黑兰有谣言说，苏联可能准备断绝外交关系，或许甚至开战，又据说苏联骁

德黑兰大使在同外交使团的另一名成员谈话时发表了激烈议论，扬言苏联近日会入侵波斯。但是，有人评论说，“大多数专家相信，苏联的虚声恫吓不过是神经战的伎俩，仅仅企图在目前助长混乱与动荡，克里姆林宫希望到处都如此。”

事实证明确实如此，虽然苏联的宣传运动继续下去，甚至在1948—1949年冬还有增无减。当时，易卜拉欣·哈基米政府在波斯议会中受到的批评愈来愈多，因为据说他的政府侵犯了那个不负责任的议会的主权。

1948年7月9日，议会拒绝对他投信任票，他的内政大臣阿卜德·侯赛因·哈希尔组织了一个新政府。7月29日在华盛顿签订了一个协定，在原来的一千万美元军火贷款之外，又增加一千六百万美元，用以修理、包装和运输波斯购买的武器。国务院预先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些武器中“没有会被用作攻击外国的进攻性的东西”。但在此后几个星期中，驻德黑兰的苏联大使和武官再次表示他们生怕美国打算利用波斯作为进攻苏联的基地；苏联军队开始在波斯边界附近演习，还发生了小规模边境事件；大约在这同时，正常的苏波贸易实际上中断了。

卡旺·萨勒塔纳政府曾要求美国的莫里森—努森国际公司提供建议，因而该公司于1947年提出了波斯七年发展计划的建议书。与卡旺政府最初提出的“极其野心勃勃的计划”相比，这个建议较为谨慎与切合实际，卡旺政府原先的计划曾打算耗费不少于十八亿四千万美元，即十倍于波斯当前的国库岁收。卡旺已向国际银行申请贷款二亿五千万美元，作为该计划的财政

---

见上文，原著第86页。

原文载《苏联新闻》，1948年2月3日。1945年12月，斯大林与美国国务卿谈话，提到此项权力时说：按1921年条约规定，假如在波斯出现来自第三方的对苏联的威胁，它有权把军队开入波斯，见上文，原著第63页。1950年5月14日，当苏联提出抗议，指责波斯准备雇用美国专家在与苏联接壤的省内从事空中勘探石油活动时，它发出的照会中重又提到这个条约（原文载《苏联新闻》，1950年5月16日）。

《泰晤士报》外交记者报道，1948年2月4日。

例如，据说古姆机场仅仅是一个小型的民用着陆场，美国军事代表团也仅仅是由三十名军官组成的。

见上文，原著第82页。

萨姆·波普·布鲁尔（Sam Pope Brewer）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1948年4月29日。

《格拉斯哥先驱报》，1948年3月16日。关于波斯已表示希望从美国得到“大量贷款”一事，见上文，原著第84页，以及下文，原著第92—93页和第98—99页。

照会原文载《苏联新》，1948年4月5日。



资助。但是，曾于 1943 年至 1945 年任波斯财政部美国顾问的 A·C·米尔斯波博士公开提出警告，反对这样做，并敦请波斯人提出真正切实可行、力所能及的计划。在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参与沙特阿拉伯和巴林石油生产的公司之

一）前总经理与“中东问题老手”马克斯·W·索恩伯格的鼓动之下，哈希尔政府委托一个美国工程、管理与商业估价公司的财团——海外顾问公司——起草了一份六亿五千万美元经费的七年计划。该财团开始调查研究之前，它的董事长已向报界声称，“美国纳税人不必为这项复兴计划付钱”，他说：大约三亿九千万美元将由波斯通货提供，二亿六千万美元将由美国或其他外国的通货支付。英伊石油公司支付的产地使用费：（当时每年是三千五百万至四千万美元）将是提供这笔经费的“重要来源”，或许还会向世界银行申请一笔贷款。

不过，1944 年和 1947 年 10 月，我们再次看到波斯议会中的议员对英伊石油公司的开采权眼红。1948 年 6 月 1 日该公司发表的关于 1947 年度红利的报告，促使波斯要求该公司为利用波斯最有价值的未开发资产而付出更多的报酬。该公司纳税后的纯利从 1946 年的九百六十万英镑上升为一千八百六十万英镑，这是一个新记录。

但是，根据英国工党政府限制红利的政策，红利保持上一年的同一比率，因此也自然而然限制了一部分直接交付波斯政府的产地使用费，因为根据 1933 年协定第十款，波斯政府每年除了按石油生产吨数收使用费之外，还收到超过规定最低额的一般股东应得的红利中百分之二十。这样，1947 年波斯政府从使用费与税款中所得的总数合计七百七十万英镑，相比之下，英国政府由于具有主要持股人和纳税人的双重资格，得到“略少于二千万英镑”的收入。公司方面意识到波斯政府对这种情况是不会满意

---

条约原文载《现代东方》，1948 年 4—6 月，第 91—93 页。

《曼彻斯特卫报》，1948 年 4 月 9 日。

《纽约时报》，1943 年 4 月 5 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4 月 12 日。

约瑟夫·艾尔索普在 1948 年 4 月 23 日《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在 2 月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共产党政变前不久，苏联针对挪威与丹麦发动的外交攻势也出于同样的计划。

《曼彻斯特工报》外交记者报道，1949 年 8 月 5 日。

美国官员估计，根据这一协定所提供的军火的原始成本为一亿二千万美元（《纽约先驱论坛报》，1948 年 5 月 29 日），直到 1949 年初，这些军火才运到波斯（《纽约时报》，1949 年 2 月 10 日和 3 月 29 日）。

C-L，苏兹贝格：同上，1948 年 10 月 25 日。

波斯的七年计划和关于波斯经济的报告”，《世界经济—研究与形势》

（“Le Plan septennal iranien et ses rapports avec l'économie iranienne”，E'tudes et conjoncture，Economie Mondiale），1950 年 1—2 月，第 5 卷，第 76—77 页，第 90 页，并参阅“在伊朗的美国工程师”，《幸福》

（“U.S. Engineers in Iran”，Fortune），1950 年 2 月，第 73 页：“政府的第一个步骤是，把在德黑兰还活着的最年老的官僚们记忆所及的每一项提出过的公共工程计划都采纳下来。结果开列出一张项目很多的一览表……但其中许多项目都不能使波斯农民得到一点好处。”

“现在给予开发贷款，结果会使波斯政府更严重地陷入那些无法维持和无法经营的企业之中。沉重地压在穷人身上的伊朗说收制度，无法适应不必要地扩大的军队的需求，以及浪费的、政治腐败的官僚机构的需求。预算（如果能称作预算的话）已表明最近六年来的赤字是够大的了。会计与审计落后得不可救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摘引，1948 年 2 月 10 日。参阅波斯人赫斯塔塔·阿拉：“如何不去开发一个落

的，所以提议考虑如何改订分红限制的规定，为此在 1948 年 8 月直派了一个代表团前往德黑兰。但是同年论员于 1948 年 9 月 23 日《金融时报》上估计，红利限额已使波斯在 1947 年度所收的产地使用费减少大约七分之一。11 月 6 日，哈希尔政府辞职了，因为它要求议会投信任票没有成功。新首相穆罕默德·赛义德·马拉盖——他于 1944 年任首相对曾抵制过苏联对波斯北部石油开采权的要求，——在 1949 年 1 月 10 日说：他的政府要求取得英伊石油公司利润中更大的部分，并说该公司的财富是“与国家的贫困状况”不相称的。

由伊朗人民党内的共产党人以及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与宗教徒（他们由于 1946 年支持政府反对伊朗人民党而在最近两年中得到了好处）两类人组成的两千名学生，于 2 月 3 日在议会大厦外面进行示威，举着旗帜，要求废除英伊石油公司开采权并关闭英国人办的伊朗帝国银行。人们认为，政府已遭到议会投不信任票的危险。但是次日，当国王被一名谋杀未遂者击中二颗子弹而负伤的时候，人们激动的情绪便转向那件事了。警察的报复行动不仅针对伊朗人民党，而且也针对两个极右组织。其中之一是由年老多病、但可敬畏的穆罕默德·摩萨台博士领导的“民族阵线”，他在 1944 年和 1947 年反对苏联要求取得波斯北部石油开采权的时候，也曾攻击英伊公司在南方现有的开采权。另一个组织是费代扬伊斯兰（伊斯兰教的信仰者），这个组织是受宗教领袖赛德·阿布·卡西姆·卡沙尼鼓舞的，他是英国人的不共戴天的仇敌，这时他也是被民党党员，美联社驻德黑兰记者后来却报道说：有力的证据表明并非如此（《纽约先驱论坛报》，1950 年 5 月 24 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50 年 6 月 7 日）。左翼与激进派方面〔《苏联新闻》，1949 年 2 月 15 日；安德鲁·罗思在《印度教徒报》（TheHindu）上的文章，1950 年 7 月 19 日〕则认为，刺客与狂热的宗教组织费代扬伊斯兰有关系（见上文）。正是这个组织在 1949 年 11 月谋杀了阿卜德·侯赛因·哈希尔，因为据说他极其恶劣地干预选举（见 T·凯勒·扬：“俄国与伊朗改革的竞赛”（T·

---

后国家”（HeshmatAla-T：“HowNottoDevelopaBackwardCountry”）、《幸福》，1948 年 8 月，第 76 页以下）关于米尔斯波对波斯已不抱幻想的情况，见他所著《美国人在波斯》（AmericansinPersia），1946 年版，以及给《幸福》杂志的一封信，1948 年 9 月，第 40 页。

《幸福》，1950 年 2 月，第 131 页；参阅《纽约先驱论坛报》，1947 年 3 月 20 日和 4 月 17 日。索思伯格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人在中东未能使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步调一致”，这一明确意见见他在《中东石油评论》（ReviewofMiddleEastOil）上的文章〔伦敦《石油时的》（PetroleumTimes），1948 年，第 99 页〕。

《幸福》，前引文和第 132 页。

《纽约时报》，1948 年 10 月 20 日。

见《概览，1939—1946 年：战时中东》，第 479 页，以及上文，原著第 88 页；又见《概览，1934》，第 224—247 页，关于 1932—1933 年与礼萨国王的争论。

载《国际联盟公报》（LeagueofNationsOfficialJournal）、1933 年 12 月，第 1653—1660 页，并由英国外交部转载：《1951 年 2 月至 1951 年 9 月，英国政府与波斯政府之间关于波斯石油工业的通信与有关文件》（Correspondencebetweenthe..U·K·andthePersianGovernmentandRelatedDocumentsConcerningtheoilIndustryinPersia，February

1951toSeptember1951），敕令第 8425 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51 年版），第 9—19 页。

波斯政府又从留作公司储备金的款项中贷得百分之二十，但是这笔款子在 1993 年开采权期满之前不得支付给波斯。

Cuyler Yongg: "The race between Russia and Reform in Iran")，《外交》季刊，1950年1月，第28卷，第282页；以及“现代伊朗政策的社会基础”（"The Social Support of Current Iranian Policy"），《中东杂志》，1962年之春季，第6卷，第142—143页）。1952年3月，他们又谋杀了温和派的首相阿里·拉兹马拉。逮捕者之一。

同石油公司的谈判于2月9日恢复了，但是3月9日又中断了三个星期，以便让代表返伦敦磋商。公司总裁威廉·弗雷泽爵士4月底亲自访问德黑兰，但是两星期后谈判再次中断；看来在公司提出按吨数使用费增加百分之五十的时候，波斯政府又提出大得多的数目。他们指出，1943年时，委内瑞拉政府使对方同意签订一个新协定，从而得到了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的一个子公司克里奥尔石油公司的一半利润。他们知道沙特阿拉伯政府已在逼迫阿美石油公司根据这些条件签订一项新协定，而且声称，英伊石油公司发展致具有现在这样大的规模和财富，是它牺牲波斯利益“不义致富”的直接结果，因此，他们要求获得英伊集团在波斯以及在全世界所得利润的一半。公司答复说：它准备把仅仅在波斯所得的利润的一半让与波斯政府，并说，“任何石油公司假如起打算维持业务的话，就不能同意在对拆利润的基础上经营，除非分配的利润仅限于公司在那里经营的国家中所得的部分”。公司在答复中还说，委内瑞拉克里奥尔石油公司时业务，不象英伊石油公司那样涉及分配与销售，而且委内瑞拉石油比波斯石油所需的运输费来得低。当某些波斯议员要求将分歧提交国际法庭或联合国裁决时，已经有些摩萨台博士的支持者，以有影响的报纸作后盾，要求收回公司的开采权。以后波斯人声称，有人对波斯政府施加压力，要迫使它签订1949年7月17日的补充协定，但公司方面否定了这个说法。根据这一协定，按吨计算的产地使用费从每吨四先令金币增加到六先令金币，而限制红利方面的困难将用下述办法克服：在任何一个特定年度内，留作储备金的数目在名义上增加到消英国的收税对它的影响，而波斯政府则立即可从增加的数目中得到百分之二十，不必等封

---

公司总裁在年度大会上的声明。（《金融时报》，1948年7月1日）以及论述，同上，1948年6月21日。

英国财政大臣于1949年1月25日宣布：虽然英国政府在公司中掌握着多数股票，但不打算干预主管人与波斯政府的交涉（下院辩论，第5辑，第460卷，第748栏）。但是三年以后，1950—1951年工党政府外交副大臣承认：波斯人反对该公司的“叛乱是可能预计到的，也许早就可以采取行动了”〔欧内斯特·戴维斯：“工党的外交政策”，《政治季刊》（Ernest Davies：“Labour's Foreign Policy”，Political Quarterly），1952年4—6月，第23卷，第129页〕。

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475页以后。

《泰晤士报》，1949年1月11日。

该银行享有的六十年特许权于1月30日期满。现在改用新名称“伊朗与中东的英国银行”，因为波斯政府反对“帝国”这个词儿，而银行当局指出这个事实：它在邻国的利益如今已超过在波斯本地的利益。波斯政府允许它继续成为经营外汇的储蓄银行，但命令它必须接受一个条件，即其公共存款的百分之五十五必须存入国家银行（伊朗米利银行），不支利息，其他外国银行也照此办理。该行行长说：这种“严酷的限制是没有先例的”（年度报告，《泰晤士报》，1949年7月6日）。无疑这是个原因，它说明为什么在野的英国保守党人不同意付给波斯八百二十万可兑换的英镑以清偿波斯铁路局为英国担任战时运输的费用的差额（1949年11月10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69卷，第1601—1602栏）。

1993年开 97 采权租让期满之时。这些调整措施的有效期可以追溯到 1948 年、由于实行调整措施，波斯在那一年和下一年所得的产地使用费总数是四千一百六十万英镑，而不是 1933 年协定规定的二千二百七十万英镑，并且可以期望在 1950 年和以后几年有相应的增加。波斯财政大臣“尽职地但并不热心地”企图说服议会批准他自己缔结的这个新协定。但是摩萨台博士的野心勃勃的支持者侯赛因·马基利用中间派的冷淡态度，几乎独自说服议会把这项议案搁置起来，直到 7 月 28 日议会解散，准备举行法定的大选。同时，首相保证他将试图与公司交涉，在新议会召开之前，搞一个更为有利的协定。

但是，在波斯大选拖拖拉拉地进行期间，并没有什么新发展，虽然有意思的是，摩萨台博士的四个支持者在德黑兰以最多票数当选。公司预付给波斯政府总数为一千四百万英镑的钱，作为政府期望得到的那笔产地使用费。但是，《纽约时报》驻德黑兰的一名记者报道：德黑兰的报纸编辑和散布政治流言者不满足于谴责石油公司制造斑疹伤寒流行病以转移人们对它的注意，而且暗示美国在石油争执中站在波斯一边，理由是“美国希望从实现七年计划中得到许多利益……因而英国石油利益和美国七年计划的利益之间发生了冲突”。

尽管这位记者补充说，当波斯人向负责的英美人试探时，后者十分明确地表示英美两国是团结一致的，但后来在美国却有人指责英国说：当美国在战后企图帮助伊朗稳定经济和提高可悲的生活水平时，英国人袖手旁观甚至加以嘲笑……诚然，美国国务院没有正式向英国提出一个填密的计划来共同设法消除伊朗的贫困状况。但是，这并不使英国人有权利采取 98 那种做法，似乎对他们最有利的就是帮助与教唆美国人干不适当的事。这时海外顾问公

---

尽管警察局提出文件“证明”谋杀国王的刺客（已被打死）是伊朗人

就在此时，伊朗人民党书记伊拉杰·伊斯坎达里逃亡到巴黎〔萨姆·瓦格纳（Sam Waagenaar）在《国际论坛》上的文章，1949 年 11 月 18 日〕，并开始为共产党的定期刊物《中东杂志》写他的有倾向性的党史。

见《概览，1939—1946 年：战时中东》，第 479 页。《泰晤士报》驻德黑兰记者提出了有先见之明的见解：“如果单凭热爱能使波斯强盛和繁荣，而无须知识、睿智或勤奋的话，摩萨台博士将是理想的首相”（1949 年 11 月 22 日）；参阅 L·洛克哈特文章（《皇家中亚洲学会季刊》，1953 年 4 月，第 40 卷，第 143 页），他指出，当 1944 年摩萨台领头反对苏联要求石油开采权时，他是得到“英美的同情与支持的”。

卡沙尼曾在伊拉克的纳贾夫的希镇度过青年时期，他参加过 1920 年的反英起义，为此英国人把他拘留在波斯湾一座炎热的岛上〔见《现代东方》，1951 年 4—7 月，第 92 页，以及《观察家报》“传略”，1952 年 9 月 14 日；并参阿 P·w·爱尔兰：《伊拉克——政治发展研》（P.w.Ireland:Iraq, a Study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伦敦，凯普，1937 年版，第 264—265 页〕。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波斯的某些知名人士由于同德国间谍弗朗茨·迈尔有联系，曾被英国人拘留，其中有卡沙尼和摩萨台博士的女婿（见《概览，1939—1946 年：战时中乐》，第 156—157 页）。

“伊朗阐明国有化情况”（“Iran Presents Its Case for Nationalization”），“一名波斯政府官员”在《石油论坛》上的文章，1952 年 3 月，第 87—89 页。

“英伊石油公司以事实答复伊朗”，《石油论坛》，1952 年 4 月，特别“附录”，第 13 页。

见联合国经济事务部：《中东经济状况评论》（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ffairs: Review of Economic Conditions in the Middle East），1951 年版，第 27 页。

《大晤士报》，1949 年 6 月 10 日和 11 月 22 日。当时公布的公司 1948 年年度报告表明：按照 1933 年协定的规定，英国的税收（二千八百三十万英镑）比应该支付给波斯的产地快用费（一千三百五十万英镑）多一倍以上。现在这个协定正在修改。

司已在德黑兰建立了一个以马克斯·W·索恩伯裕为首的十二人的机构，为波斯全国最高计划委员会执行七年计划提供建议。该计划已在一份一千五百页的报告中具体化了。波斯议会已采纳为该计划提供资金的建议，详见下表：

收入	美元(百万)	支出	美元(百万)
英伊石油公司所付的产地使用费和其它款项	242	农业与灌溉	201
政府资产出售	31	运输与交通	115
私人投资最低额	31	矿业与工业	112
米利银行贷款	139	波斯石油公司开办资本	31
国际银行贷款阳高	208	邮政与电讯	22
		房屋	46
		水电供应	31
		公共卫生	31
		技术教育	31
		杂支	31
	651		651

米利银行行长 是最高计划委员会的成员，他认为最初二年不必从国际银行贷款，因为这一时期计划的资金来源有下列几种；石油产地使用费（英国财政部交给波斯政府后可兑换硬通货的英镑，以便购买英镑区内不易买到的物资），国内贷款，以友使用现有的波斯通货的一半保证金，这种保证金非常可靠，完全足额，是用黄金与证券作担保的。可是，许多有产阶级的波斯人，包括国王在内，不愿削减通货的保证金。波斯事先承认，国王于11月99访问美国的目的一就是向国际银行搞到一笔贷款。他在纽约有一次与报界谈话时，估计波斯通常要本得到美元的数目是二亿五千万美元，并提到波斯所需要的更多的现代化武器。进出口银行已提供三千五百万美元的一笔贷款。国王访问结束时发表的正式公报说。美国支持波斯政府要求国际银行为实施七年计划提供“经济上有理由”的贷款。但是，对波斯这样一个政治上无能与腐败的国家而言，怎样才算“经济上有理由”呢？据报道，美国大使约翰·C·威利（1948—1950年）“曾明确表示，美国的援助是现成的，只要波斯人能建

有关运用这一原则的例子，见英国外交部：《关于波斯石油工业……的通信》，敕令第8425号，第22页。

一名波斯政府官员后来暗示：公司曾经“细心地选择”协定签字的时间，以便与波斯议会解散的时间相合，“这样使得议会只有很少的日子讨论和批准”。公司发言人驳斥此种说法，说交涉的结束阶段波斯政府的代表拖延了很久（见《石油论坛》，1952年3月，第89页以及1952年4月，特别“附录”，第13页）。

《金融时报》，1949年7月29日。

同上，1950年9月12日。

《幸福》，1951年3月，第166页。

阿尔比恩·罗斯（Albion Ross）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1950年2月23日：参阅《世界报》社论，1949年1月2—3日，又见上文，原著第93页。

《幸福》，1951年3月，第166页，第168页。

立一个改革的政府，有一套健全的计画，以推动国家走上较高生活水平的道路”；但是，在国务院中，把波斯比作国民党中国的倾向有着“明显的征候”；“把钱倒进老鼠洞里去”，这句话在德黑兰也是“众所熟知的”。160 从 1949 年 8 月初波斯国王宣布准备访问美国到他正式启穆的这一段时期中，苏波关系有了显著的缓和。波斯当局曾经给予在 7 月越境逃亡的一名苏联军官和两名士兵以保护，随之发生了苏联以绑架边境地区波斯士兵的形式进行报复的事件。但是这次抓去的一小队士兵十一人 9 月 25 日被遣返了。为了解救连年歉收所造成的灾情，波斯曾呼吁美国赠送二十万吨小麦。8 月 7 日，波斯首相埋怨美国“纯粹作为一项商业事务，而不是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作为一个经济或政治问题”加以处理。待到最后终于买到小麦时，美国小麦交货的情况很不好，波斯人工作效率太低又使这批小麦在霍拉姆沙赫尔港更加损坏变质。然而，10 月 5 日波斯成功地从苏联购得了十万吨小麦。苏联政府同意任命一名波斯董事派驻苏一波里海渔业公司。自从 1927 年创办以来，俄国人实际上一直在垄断着这个公司，但是公司的执照到 1952 年该到期更换了，据说苏联边境官员已接到指示，要更加“友好合作”。

“好几个月来，国务院认为伊朗的情况已经稳定，这个国家不必再成为美国战略家们一个大烦恼的根源。”然而，大致在 1950 年初，“开始从驻德黑兰的大使那里涌来一连串告急的报告”。大使馆向华盛顿表示急需提供一

---

按照萨姆·瓦格纳在“幻想的计画”（“Planification des Mirages”）一文（《国际论坛》，1949 年 11 月 11 日）中的说法，看来索恩伯格比波斯观察家们对计画的前景要乐观得多。

《世界经济—研究与形势》，1950 年 1—2 月，第 78—79 页。

此人是阿卜勒·哈桑·伊卜提哈杰（Abu'l Hasan Ibtinaj），“一个精明能干与精力充沛的人，西方商人把他看作是他们的自己人”（《幸福》，1950 年 8 月，第 73 页）。米尔斯波在战时认为他是“一个有干劲的行政官员，一个精通业务的银行家，也是一个诚实而勇敢的人”，然而又说：“他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而且毫不隐瞒他的自信心，认为自己的能力与美国人相等或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人很快就会注意到或听到他的神经质，他那令人难信的急躁脾气，他爱用粗暴手段压倒对手的性格，以及他的独裁癖。”（《美国人在波斯》，第 95 页。并参阅第 120—128 页）

见 T·凯勒·扬：“俄国与伊朗改革的竞赛”，《外交》季刊，1950 年 1 月，第 28 卷，第 287 页。

，国王曾利用有人在 1949 年 2 月企图谋害他一事，迫使议会扩大他的法权。鉴于议会曾滥用宪法赋予它控制行政部门的权力，而起了阻挠的作用，国王建立了一个上议院，其中半数议贵由国王提名，国王也有权任意解散一个议院或同时解散上下两院，见伊朗最近的宪政变更”

（“Recent Constitutional Changes in Iran”），《皇家中亚洲学会季刊》，1949 年 7—10 月，第 96 卷，第 265—266 页；《现代东方季刊》，1949 年第 1 季度，第 17 期，第 57 页和 1949 年第 2—3 季度，第 18—19 期，第 173—174 页；关于 1943 年赋予伊拉克国王扩大的权力，见哈杜里：《独立的伊拉克》，第 106—216 页。某些波斯人相信，当 1948 年 7 月国王访问英国时，英国政府已向他提出过有关打算扩大王权的法律上的建议，而这被认为是英国干涉波斯内政的又一个例子。

来自华盛顿的报道说：“虽然国务院官吏倾向于强调国天访问的‘善意’方面，伊朗的外交官们却毫不迟疑地阶庄意该因的军事和经济状况。”〔沃尔特·H·瓦戈纳（Walter H. Waggoner）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并参阅霍默·比加特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的文章，两文均于 1949 年 11 月 13 日发表。〕春天，埃贡·卡斯克利年（《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49 年 3 月 18 日）曾经评论说：“为什么特别在这个时候，伊朗的领袖们尽量不厌其烦地强调俄国的危险？伊朗的财政需要也许是其原因之一。”由于图谋杀害国王以后伊朗人民党被宣布为非法，还由于美国军火开始运交波斯，苏联的宣传加强了（见上文，原着第 92 页，第 95 页）。一些边境事件也引起了某种惊

两亿美元来给伊朗经济吃一帖补药。 1950年7月，英国一位权威人士在一篇公开估计“波斯的一些经济问

题”的文章中，表示了这样的意见，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用于修建波斯大铁道的“庞大资本支出”，已经引起一个通货膨胀的浪潮。这个浪潮又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盟倒在波斯开支的费用所扩大。通货膨胀对国家经济成了一种“经常性威胁”。“庞大的消费力”已经形成，然而消费品却没有相应地增长。于是通货的购买力不断下101跌。礼萨国王所提倡的新工业，在农业被忽视的一段时期，曾吸引好几千人离开农村。“农村失去了大量它所无力提供的劳动力，而在另一方面，城市人口过度膨胀，超过了它们提供生产性就业机会的能力，出现了住房和公共卫生这类无法解决的问题。”美国参与七年计划使波斯人产生了这种想法：他们自己“能够袖手旁观坐待美元去完成奇迹”。同时，少数有钱人骄奢淫逸，挥霍浪费：

“……到处都是闪闪发亮的美国汽车、豪华的住宅、衣着讲究的人们。商店橱窗摆满美国和欧洲工厂出产的奢侈品。”进口货通常比那些效能低下的波斯工厂，尤其比那些国营企业产品的售价低，而且常常还有很大的赚头。伊斯法罕和另一些制造业城镇的工厂，正在倒闭或缩短工时，其结果是民众中支持共产党的人以及失业工人的示威游行都增加了。最近的歉收使阿塞拜疆遭到了严重的损害。1946年底恢复的地方政权，据可靠的报道说，不过是不在乡间居住的地主的腐败工具。隐隐感到一种危险：农民可能会欢迎恢复共产党的统治。除开根本没有能够吸引大量美元贷款这一点主要失败之外，七年计划的详细内容也引起那部分有密切利害关系的波斯人的批评。正如我们所见，计划主要强调农业现代化。波斯国王已经表示他愿意将王室土地（其中大部分是他的专制父亲没收来的）分给无地的农民。并且鼓励合作化；现在的政府也曾建议限制地产的规模。然而，肥料、拖拉机的数量并不可观；许多小水坝的宣传价值也抵不上一座大水坝，农业教育的成果只令人感到这种教育收效太慢了。另一方面，许多有势分的波斯人都急急乎想干些什么，露他一手，如搞一座工厂或一口油井。某些人甚至宁愿选择一座还没有开工的工厂，而不愿意

搞己在进行的农业改革，因为农业改革的进行势必减弱他们的权势。……

同时，进口量大概增加了……然而出口量……在继102续减少。一些出

---

国王象某些土耳其人士一样，“据说很恼火”，因为美国准备提供的武器中不包括它的最新式喷气战斗机（《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德黑兰记者报道，1949年6月25日）。1950年5月23日签订了一个美国根据共同防务援助计划向波斯提供价值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美元军火的协定。

《纽约时报》，1949年12月31日。波斯人屡次要求根据1943年德黑兰会议后发表的三强宣言给予优惠的财政待遇，但是宣言文本对此并未加以肯定，宣言原文仅仅说波斯的经济问题在战争结束时必将“和联合国的其他一些成员国的经济问题一起受到充分的考虑”（《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年7月—1944年6月》（DocumentsonAmericanForeignRelations,July1943—June1944），波士顿，世界和平基金会，1945年版，第286页）。

《幸福》，1951年3月，第168页。

阿尔比恩·罗斯向《纽约时报》报道，1950年2月14日发自德黑

见《泰晤士报》，1949年8月15日和28日。

《纽约时报》，1949年8月8日和9日，1950年4月4日。

见上文，原着第71页注（即本书第122页注——译者）；《每日电讯报》，1950年8月18日。

口商认为只有里亚尔大量贬值才能重振他们的行业。但是，贬值无论如何……是不得人心的。甚至即使这样做能够复兴伊斯法罕棉纺工业的繁荣，也是会冒犯民族自尊心的。

正是这样的民族自尊心成为反对英伊石油公司补充协定的根源。英国人争辩说……石油公司给波斯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说协定是宽厚大方的。但是他们的争辩完全是白费唇舌，波斯人的感觉截然相反。他们的感觉是，他们的第二个最大的工业城市阿巴丹是按外国的式样建造的。那儿封处是外国人的机关，听到的是外国语言；这个城市完全依赖于一个由外国人控制的单一的工业，在这个工业中占据高级职位的主要都是外国人。即使那些完全相信波斯总石油公司的开采权能获得好处的波斯人，也不喜欢多想这些好处，因为他们无法完全克服他们自己的厌恶心理。

这是一种应当受到尊重的强烈感情。它根本是出于一种半自觉的对波斯历史，对它的精致的文化和独特的个性的追忆，如今，这些东西或多或少受到了西方和俄国的渗透活动的危害。造成的影响是国内一大部分人，象其他国家的那些类似的阶级一样，已经不太能有条有理的思索了，当然远不能说他们愚蠢。

面临着经济恶化，穆罕默德·赛义德·马拉盖政府几经改组以后，终于在1950年3月19日辞职了。1949年11月在伊斯但布尔和1950年3月在开罗召开的中东地区美国外交使节会议上曾经讨论过援助波斯的问题。但是，国务院明确表示这类援助的条件是：德黑兰必须建立一个保证改革行政机构的政府；5月底，六十八岁高龄的亨利·F·格雷迪（前两年他以驻希腊大使身分反共时赢得了“排除障碍的能手”的名声）被任命为驻德黑兰大使去“充当看门狗”，他带了几个经济专家协助他。波斯国王6月26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任命总参谋长阿里·拉兹马拉将军为首相，作为对此的响应。拉兹马拉在1946年12月镇压阿塞拜疆自治运动时露了头角，并且赢得了能干组织者的名声。据以后的报道说，离任的美国大使曾向波斯政府透露，他已建议华盛顿至少需要给他们一亿美元，以便“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他们向103格雷迪力争说，美国“已经许诺给他们”二亿五千万美元这样一个神秘的数目，正如我们所知，这是近三年来他们所追求的目标。直到10月份，进出口银行才提前支付了一笔二千五百万美元的贷款，以便购买农业和筑路机器。格雷迪没有能够说服华盛顿政府向波斯政府暗示这笔金额可能增加到一亿美元，“用于适当采纳的计划项目……基本的农业上的援助”。

---

约翰·M·海托华（John M. Hightower）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的文章，1950年4月17日；参阅《幸福》，1951年3月，第168页。

即爱德华·赛克斯（Edward Stokes）在《皇家中亚洲学会季刊》上的文章，1950年7—10月，第37卷，第262—272页。参阅T·凯勒·扬：“俄国与伊朗改革的竞赛”，《外交》季刊，1950年1月，第28卷，第281—185页；《幸福》，1950年2月，第132页，第134页。

与战前水平相比已经大大增高的生活费，1949年又增加了百分之十五到二十（《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50年3月9日）；这可能主要由于前个季节农业歉收。

赛克斯，前引文，第265—266页。路透社驻德黑兰记者利奥波德·赫尔曼（Leopold Herman）指出：德黑兰人口八年内已增长一倍，达到一百二十万（《印度教徒报》，1950年1月20日）。

赛克斯，前引文，第267页。这种看法无疑促使美国人责怪英国人把计划视作“幻想”（《幸福》，1951年3月，第170页）。



波斯政府 1949 年曾经请求从第四点计划中拨出一亿二千九百万美元以满足他们“最紧急的最低限度的需要”，而根据“第四点计划”的规定，只分派了五十万荣元给他们作为改善卫生、农业和教育事业之用。

这时候，七年计划碰到了政治困难，在所通过的计划中，正如我们所知，全部经费的百分之三七要用于农业与灌溉。但是第一年年仅仅分配了百分之五用于这一目标，反之却有百分之十五用于清偿“工业与矿业银行”的债务，这个银行是礼萨国王办起来向国营工厂提供经费的。另一些钱被用之于“更为壮观的（也是贪污横行的）项目”，例如，新建的铁路成立一个波斯石油公司，以便开发英伊石油公司租借地之外的整个波斯的石油资源。回顾起来，当时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阿美石油公司）正打算在这一年年底同沙特阿拉伯政府缔结一个分红协定，英伊石油公司同拉兹马拉谈判时，态度似乎僵硬得缺乏远见。向时，未来的石油开采特权范围未能确定下 104 来，再加上美国银行家们的疑虑不安，使得七年计划无法筹措资金。由于议会反对，粒兹马技政府所着手进行的清洗不忠实与无能官吏的工作停顿下来了，而苏联政斯：“伊朗的改革与强权政治”，《外交政策报道》（GorgianaG.Stewens:"RdformandPowerPolitiesinIran",ForeignPolicyReporis），1951 年 2 月 15 日，第 219 页。府利用波斯对英美两国的不满，提议签署一项新的贸易协定，“德黑兰所有从极端保守的到公开的共产党同路人的报纸”，几乎都表示了“言过其实的庆贺”，1950 年 11 月 4 日，这个协定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签字了；这一年年底，摩萨台博士主持的一个波斯议会委员会一致拒绝了石油补充协定，还辩论了是否要用国有化来代替它，而外国顾问公司也就同七年计划脱离关系了。一年前，一个美国的波斯问题权威已经作过评论：波斯一向是为了征询意见付出高昂的代价，然后又将意见束之高阁。人员问题将会变得很尖锐，这一点得很好地认识到。在公开的意见经常被搁置一边的时候，是很难留住真正有才干的顾问，也很难维持士气的。

……地主和商人阶级大概发觉到那个计划对他们今天的特权地位是一种威胁……所以完全有可能，在这些特权阶级中间将会有很多人竭力想破坏为计划所做的全部努力，力求维持现状的人将受到那些保守的僧侣们的挑动。

---

A·T·斯蒂尔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的文章，1950 年 12 月 10 日。

《纽约时报》，1950 年 2 月 15 日和 28 日。菲利普·托因比在证实贪污腐败的行为存在的同时，一方面又评论说：“在北部波斯的这些农民中间，对那些甜言蜜语的诺言显然表露一种直率的不信任情绪，这是多年的经验自动控制他们的。”（《观察家报》，1950 年 11 月 26 日，并参阅上文，原著第 82 页）。

《泰晤士报》驻德黑兰记者报道，1950 年 1 月 30 日：参阅利奥波德·赫尔曼在《印度教徒报》上的文章，1950 年 1 月 2 日；C·L·苏兹贝格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1950 年 4 月 4 日；“伊朗阐明国有化情况”，《石油论

阿尔比恩·罗斯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1950 年 6 月 27 日和 9 月 5 日。

新政府被摩萨台博士激烈地攻击为“独裁统治”，他又指责美国对波斯的政策是“英国政策的翻版”（《现代东方季刊》，1950 年第 2 季度，第 22 期，第 226 页）。

《幸福》，1951 年 3 月，第 168 页。

见上文，原著第 84 页，第 98—99 页。格雷迪说，这个数字的来源“一直是个神秘的东西”〔“伊朗出了什么事？”（WhatwentWronginIran？）〕，《星期六晚邮报》，1952 年 1 月 5 日，第 57 页〕。

同上，格雷迪没有提及波斯行政上的混乱，而这是美国疑虑不安时原因。

保守的僧侣担心这个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规划会威胁到穆斯林的宗教、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_\_一度是乐观主义者的马克斯·韦斯顿·索恩伯格，在间接提到那笔“应该公正地取自”石油公司的收入之后，抱怨说：当那些政客们插手进来并加以控制的时候，这个计划一开头就注定要失败了。重要人员的任用是根据政治和个人利益来决定的，而不是依据能力和经验。有效资金的使用，是由个人的和政治的利益决定的。在缺乏现代化的计算方法的情况下，在钱的问题上到底搞了些什么事情，105 就不得而知了。\_\_

### 第三编 阿拉伯国家与西方列强

#### 第一章 欧洲人在列万特各国的优势的结束

1945年5月的叙利亚危机和随之而来的英国在法国军队和叙利亚政府之间进行的干预，这主要应由戴高乐的不妥协态度负责：他的这种态度的后果，便是促使法国在列万特势力的最后告终（尽管目前法国军队仍驻在叙利亚的少数地点和黎巴嫩的全国各地），并使该地区的英法关系更加紧张，显然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这时，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正在迫切盼望外国军队的最后撤退。据1945年10月14日来自巴黎的报道说，一度中断的调整英法在列万特的关系的谈判已继续进行，但法国政府仍然希望英国能帮助他们去缔结抵得上战前它自己同埃及和伊拉克所订立的条约，甚至还要包括享有空军基地的特权。法国人同现实十分隔阂，以至当叙利亚政府关闭大约有四万六千名学生上学的法国学校时，竟引起了惊讶，导致了法国政府的抗议和法国报纸上的辩论。10月24日，叙利亚总理萨杜拉·贾比里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明确宣布，他的政府最希望的正是法国军队的撤出：而另一方面，英国军队的地位（他说）可以同驻在已解放了的欧洲的盟军的地位相比拟，一俟“战略上需要他们留驻的理由消失”，他们马上就会撤退。几天以后，舒克里·库阿特利总统告诉一名记者说：“除非法国人离开叙利亚和黎巴嫩，否则必将重新发生流血事件。当法国的特务和金钱正在破坏我的权威，当他们正在我国上空散发传单吹嘘他们将卷土重来时，英国人怎么能够期望我对法国人有信心呢？”

在这种不祥的气氛中，贝文和法国外交部长皮桂尔以及双方的大使，经过谈判，拟订出一个协定草案；他们并在12月13日互换了信件，信中确认：英法两国的军事专家们将于1945年12月21日在贝鲁特会晤，以便拟订一项分期撤军和相应的重新部署军队的详细方案。这次讨论的目的之一，是确定一个开始撤退的最早日期。

---

《幸福》，1951年3月，第170页；参阅“波斯能搞计划吗？”（“CanPersiaPlan?”，《经济学家》，1950年5月6日，第983页；M·菲利普斯·普赖斯议员的文章，《曼彻斯特卫报》，1950年10月9日，《皇家中亚洲学会季刊》，1901年4—7月，第38卷，第105页；乔治亚娜·G·史蒂文

当一个波斯政府的官员事后断言说：“1950年年中大家都知道阿美石油公司打算同意了”，英伊石油公司还坚持“直到1950年底才晓得有签订这项协定的可能。阿美石油公司事先没有谭知过英伊石油公司”（《石油论坛》，1952年3月，第89页和1952年4月，特别“附录”，第14页）。

作为一个可能由此诱使议会批准补充协定的政治上的让步，拉兹马拉掌权之初，要求公司同意让政府在公司石油出口量的审核上能进行更多的监督；把全部剩余的天然气给予政府，并减低卖给波斯的石油价格，还要加快实行它的用波斯人接替外国雇员的计划。公司答复说，政府早已有权审核石油出口量，他们还准备为政府挑选来进行定期检查的任何独立的检验商行支付费用，公司对第二点作了让步（参阅《石油论坛》，1952年1月，第19页）；他们也同意实施引进波斯雇员的计划，“只要这样做符合于使公司的行政工作和日常业务保持最高的效能和最大的节约”、关于新任美国大使对公司态度的批评，见亨利·F·格雷迪：“石油与中东”，《外交政策协会公报》（HenryF.Grady:"OilandtheMiddleEast",RordignPolieyBul-letin），1951年12月5日，第1—2页；“中东的紧张状态，特别是伊朗的”，《政治科学学会学报》（ProceedingsoftheAcademyofPoliticalcience），1952年1月，第24卷，第558页；“伊朗出了什么事？”《星期六晚邮报》1952年1月5日，第30页，第56—58页。

《现代东方季刊》，1950年第2季度，第22期，第227页。

双方已明确，在叙利亚的撤退工作应同时按同一步调进行，以便英国和法国军队能同时撤退完毕。撤退方案应考虑到，在联合国组织就列万特地区的集体安全组织作出决定前，应保证在该地区维持足够的军队以确保安全。在这些安排得到贯彻执行以前，法国政府将保留部署在黎巴嫩的部队。

联合王国政府和法国政府将把撤退的详细情况通知黎巴嫩和叙利亚政府，并将要求它们尽快地委派代表，来共同讨论根据这些决定应作出的、为各方所同意的各项措施。

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在1946年2月15日通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说：“当地各国政府要求得到保证，即只要别的外国军队仍然留驻未走，英国军队将不从列万特撤退；而我们则更认为：英王陛下政府在当时情况下所给与的这种保证，是同该协定的精神相一致的。”然而，当军事专家们开始其讨论时，法国人坚持他们的解释说：“当仍然驻在叙利亚的法国军队被重新部署于黎巴嫩的一些地点时，那里的英军应撤退到伊拉克、外约旦或巴勒斯坦”，这样，驻在列万特的法国军队，“在联合国组织还没有就列万特的未来安全作出决定以前，在人数上就不至于处于劣势地位……”。另一方面，英国军事当局似乎提议，驻在叙利亚的英国军队也应当在列万特重新部署，在那里，他们的人数应大大超过法国。“在那种情况下”，《泰晤士报》驻巴黎记者加以述评说，“一切将丝毫无助于法国的威望。……而那些协定的价值，特别是那个关于协108调两国政策的协定，在保护共同的利益方面，几乎是毫无价值可言。”然而，12月26日黎巴嫩驻巴黎公使声称：黎巴嫩享有联合国组织全体会员国所享有的同样的权利，它要求驻在其领土上的所有外国军队全部和同时一齐撤走。它愿意在作为联合国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一个成员国所应有的义务和权利的范围之内，同世界上一切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并拒绝充当矛头指向阿拉伯国家的独文的桥头堡。黎巴嫩总理萨米·索勒赫，他是1943年秋天领导民族主义者“起义”反对法国的里亚德·索勒赫的堂兄弟，在28日宣称，出席1月间在伦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的黎巴嫩代表团已被授权向大会提出英法两国占领他们国家的问题。《泰晤士报》外交记者在28日承认，12月13日协定的措词“即使还有……支持法国论点的地方”；但是，据说“在讨论期间，对法国政府来说，已经一清二楚的事情是，黎巴嫩人仅仅反对法国军队留在他们的国家内，因此，英国政府已答应在那

---

菲利普·托因比：“最薄弱的边界”（Philip Toynbee：“The Weakest Frontier”），《观察家报》，1951年2月4日。

关于摩萨台受到内政动机影响的程度，见L·洛克哈特在《皇家中亚洲学会季刊》上的文章，1953年4月，第11卷，第145—146页。

T·凯勒·扬：“俄国与伊朗的改革竞赛”，《外交》季刊，1954年1月，第28卷，第286页，第288页。据说极端派的宗教领袖卡沙尼曾指斥这个计划是一件“邪恶的事业”（《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51年1月12日）。

《纽约时报》，1951年1月9日；并参阅索恩伯格1950年4月5日的警告声明〔法国，内阁会议主席府：《文件摘记与研究》（France, présidence du Conseil：Notes et Etudes Documentaire），第1363号（1950年8月5日），“伊朗经济”（L'Economie de l'Iran），第26—27页〕。

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293—304页。

达纳·亚当斯·施密特（Dana Adams Schmidt）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1945年10月15日。

里留驻一些军队，直到双方军队最后都撤退时为止。”

12月31日，列万特的已经很紧张的局势更加紧张了，因为有一百五十至二百一十名左右的法国军队在贝鲁特登陆，表面上说是来替换比这个数目大的一批人员的，但它使人回想到引起先前5月危机的那次兵临城下；而且在那次危机中对炮轰大马士革应负责任的奥利瓦-罗热将军又同时抵达该城郊外的米扎机场。后来据解释说，他是到贝鲁特去收拾在6月间他被迫仓卒离开时不得不遗留下来的私人财物的，但是这个偶然的巧合所引起的谣言（特别是新抵达的军队都是塞内加尔人），却激起了民族主义的学生们（他们早已举行了示威游行反对英法协定）和其他的人在大马士革、阿勒颇和贝鲁特举行一次总罢工。在以后的几天中，据证实，苏联驻贝鲁特公使丹尼尔·索洛德曾口头上向黎巴嫩外交部长表示，他的政府不赞成英法协定；而且据说，美国也同样不赞成。当法国同英国政府之间对它们的“协定”的解释还继续存在僵局时，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在1月10日向它们提交了一个联合照会，要求“迅速和全部撤走”它们的部队，并于2月4日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一封信，要求他“把这个争端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并要求它作出一项决定，劝告驻在叙利亚和黎巴嫩领土上的外国军队全部和同时一齐撤离”。

当2月15日对这一控诉展开讨论时，在黎巴嫩和叙利亚的代表们陈述了他仍的提案之后，法国外交部长皮杜尔声称：法国的政策是让这两个国家……最后得到完全的独立，在这方面它并没有动摇。……12月13日的协定并没有被签订者双方看作是有任何企图要在安全理事会没有作出一项决定以前在列万特无限期地保持军队。我国政府准备同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一起来研究这个问题，以便同它们一起商定具体的解决办法。因此，我请求联合国的代表们，考虑到为实现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而已经作出的那些努力，把他们的信任给予法国，让它与大不列颠一起，保证解决这个问题。在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简单他说明了英国的立场之后，斯退丁纽斯表示，“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要求驻在其领土上的外国军队在切实可行的尽早时间内离开，这一愿望能够通过一项使双方满意的协定来得到实现”。维辛斯基批判地研究了皮

---

法国人说，根据1913年12月18日与奥斯曼帝国签订的一项协定。法国有权保留这些学校。而叙利亚政府则坚持：它们应向教育部呈报学校收入来源、教职人同布课程方面的详细情况，同意政府督学前往视察，划出最低限度的时间来教授阿拉伯语等。当法国专员打算以这些要求作为谈判的项目时，据说，叙利亚总理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声称，这个问题与其他问题有密切关系，特别是同法军的撤退有关，等等〔参阅《世界报》，1945年11月4日、5日；《黎明报》（Aube），1945年11月6日；叙利亚驻华盛顿新闻参赞西里·卡勒塔克吉（Sirri Kaltakji）给《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信，1945年12月16日；《政府公报：辩论集》1946年1月18日，第89页〕。

《费加罗报》，1946年10月26日；《世界报》，1946年10月97日；理查德·温德姆（Richard Wyndham）在《世界新闻》（NewsoftheWorld）上的文章，1946年11月4日。

原文载《泰晤士报》，1945年12月22日；《世界报》，1945年12月23—24日。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1年，第1辑，第1号，第295页。

《泰晤士报》，1945年12月27日。据估计，驻在列万特的英军为二万五千至三万人；而法军人数大约为八千人，其中一半是在当地招募的待种部队的残余部分（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286—288页，第303页），他们自愿仍留在法国国旗下服役（《苏格兰人报》，1945年12月18日；《战斗报》，1945年12月27日）。

《战斗报》，1945年12月27日。

杜尔的提议：由法国同那两个政府一起“研究这个问题”，“以便同它们一起商定详细办法”。他问道，难道这不是贝内将军在1945年5月18日致两110国政府的备忘录的一种回声吗？在这个备忘录中，法国提出了使人无法接受的保持法国文化、经济和战略方面特权的条件。12月13日的英法协定，也同样是对这两国的主权和独立的一种侵犯。至于说“为了保证安全”需要有外国军队，“看来好象就是那末一回事：英国军队集中在那里是为了防止由于法国军队的出现而引起的骚动；而法国军队留在那里，又是因为英军不肯撤离的缘故”。第二天，由于皮杜尔曾提到磋商，黎巴嫩和叙利亚代表就问他，对于所建议的撤军问题，需要进行什么样的磋商。皮杜尔回答说：或者是存在着一个争端，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我们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去进行磋商，以便找到一种解决争端的办法：或者是如果不进行磋商，如果拒绝进行磋商，那就只能假定为不存在争端。……

据我看来，最近几小时在这张桌子上发生的事情是：虽然在基本的问题上没有争论，但是有人正打算在得到完全的满足之外，还要得到一种类似谴责法国的东西。……法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会接受这样一种耻辱。黎巴嫩代表回答说：

皮杜尔先生说，法国不能回避国际联盟因委任统治而交付给它的维护安全的责任。……我们不再承认任何人有权在那种委任统治的基础上进行辩论，我们特别对要求享有委任统治下的种种特权的任何企图，感到愤慨。

……我们并没有打算谴责法国；我们所希望的和要求的是明确的规定，因为我们以前遇到困难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我们的关系不明确，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不明确，以及要求我们在什么基础上进行谈判也不明确。叙利亚代表更直率地补充说：“叙利亚政府并不要求在其领土上驻有武装部队的压力下，就任何问题进行谈判。它不得不说，因为它有过最近的经验，它担心这种事情可能会重新发生。”在作了进一步讨论之后，黎巴嫩代表说，他准备接受斯退丁纽斯所建议的如下决定，如果其中带有重点符号的字句也包括进去的话：

安全理事会……表示它相信，驻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外国军队将在切实111可行的范围内尽快地撤退，专门为了这一目的的技术性的磋商，将由各方毫不拖延地进行；并要求各方把磋商的结果，以及最后撤退的日期通知安全理事会。贝文反对，他说这些增加部分是不现实的，因为“还有其他问题也必须加以解决，正如我的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朋友们所知，其中有一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这时黎巴嫩代表就回答说：“正如我们在1945年5月18日所看到的，如果有人要我们同时讨论文化问题和战略基地的话，那对我们就会是一桩危险的事；那可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经过进一步讨论之后，他更明确地陈述其立场说：

撤退的方式和方法，它的技术方面和时间期限，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将非常乐于讨论。但我必须再一次重申，任何与军队撤退无关的问题一概不在讨论之列。我们准备讨论任何一个问题，无论是经济的、文化的或社会的，一俟我们达成协议，我们将通过所有的协定，但我们肯定地不能同意把载入12月13日协定中的政治条件仍继续作为依据。叙利亚代表甚至更加明确地

---

《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275页以后。

《纽约时报》发自贝鲁特的报道，1945年12月29日。

表示：我所说的话是表明我国政府的看法，我国政府宁可这样：在目前，只要军队仍驻在我国，就不要同法国开始进行别的问题的谈判。当军队已经撤走时，我们就能够表示，我们愿意就可能要求我们去磋商的任何问题开始进行谈判，我们就能够取得成果，使良好的关系能继续维持下去。一系列决议案（其中包括苏联的一项要求英法政府立即撤退其军队的修正案）都没有能获得通过议案所必需的七票，其后，美国原来提出的、未经修正的那个决议案得到了七票，但被维辛斯基行使否决权推翻了，他说：“因为那个本来可促使我投以赞成票的修正案没有被接受”。因此，决议没有被通过，但法国和英国的外交部长都声称，他们愿意执行投票中所表明的多数人的决定。

在此期间，1月20日戴高乐辞去法国总理一事，据信已使法英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虽然法国官方的意见仍希望安全理事会会认为应当由法国负起在列112万特最后建立一个集体安全体系的责任。3月1日，英法两国就撤退问题在巴黎开始了军方会谈，并在三天之内达成了一项两国军队同时从叙利亚撤出的协议，撤军将从3月11日开始，到4月30日完成。3月9日，据说英国军队将在6月30日之前撤离黎巴嫩，而法军指挥部和军队将于8月31日之前撤往的黎波里，这时一位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宣称，他们的撤退或许要到1947年4月1日才能完成。

这位外交部发言人冗长而又详细地坚持说，一年的拖延完全是运输军队和物资技术细节问题所造成的结果。他承认，在黎巴嫩只驻有八千名法军，但他列举了他所坚持的必须由法国人来拆除和处理的大批设施。

作为这些设施之一，他提到了在拉亚克的飞机场。他还提到了工程方面的事，以及停放在贝鲁特的坦克和装甲车，尽管在较早的时候就听说，在黎巴嫩的绝大部分物资是十分陈旧的。这位发言人说，明年4月1日这一天可以被看作是所有的法国人及其设备撤出黎巴嫩的最后一天。他说，如果黎巴嫩人能为撤退计划提供劳动力和执行人员，以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这个日期还可以大大地提前。

他承认英国人曾反对法国人提出的4月1日这一日期，但是他说，尽管如此，他们已答应提供船只援助。他说，法国人准备同黎巴嫩人进行讨论，以便在此地的会谈已表明撤退可议提早实现之后，使黎巴嫩人能够同意接受这个推迟一年的限期。

这位发言人还说，如果不是必要的话，法国人在黎巴嫩连一星期也不愿意多呆；而且也可以比规定的日期提前撤出，如果她们有象英属巴勒斯坦那样的靠近的领地的话。英属巴勒斯坦现在对英国军队的撤退是这样的方便，……而贝鲁特距离马赛有三千公里之遥，它带来了运输上的困难。黎巴

---

《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298—300页。

克利夫顿·丹尼尔（Clifton Daniel）发自大马士革的报道，《纽约时报》，1946年1月2日和3日。

“解放者”（即乔恩·金奇）也《观察家报》上的文章，1946年1月6日和13日；参阅《世界报》，1946年1月13—14日。苏联政府早在波茨坦会议上就曾提出过列万特各国的前途问题（W.D.李海海军上将：《我在现场》（Fleet Admiral W.D. Leahy: I Was There），伦敦，高玉兹，1950年版，第464页，第499页）。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1年，第1辑，增编第1号，第82—83页；参阅联合国大会：《正式记录》，第一届大会，第1部分，第248页，第255页（1946年1月19日）。在巴黎，戴高乐派的《国家报》（Pays）评论说：“多数人认为，至少可以这样说，苏联政策对于这个最近的建议并非是一个毫无关系的陌生人。”而右翼的《时代报》（Epoque）则把这个照会描绘成“维辛斯基转移视线手法的最新扩

嫩政府对这个建议并不满意，在其代表同法国人作了进一步的讨论之后，同意法军将于8月31日之前撤离该国，而一个由三十名法国军官和三百名技术人员所组成的工作队将留下来，以监督剩余物资的撤退，直到12月31日为止。4月17日，作为一个节日，叙利亚全国放假，举行庆祝，以纪念外国军队从本国撤退完毕；但法国人仍十分怀疑大不列颠正在试图取法国在列万特各国的地位而代之，并从某些英国商人在那里的活动中找到了一些根据。英国政府拒绝了叙利亚提出的让一个英国军事代表团继续训练叙利亚军队的要求，虽然一名福克斯准将后来又担任了这个有点吃力不讨好的任务，但他留任的时间并不长。

7月2日，中东司令部宣称，除了一小部分清理未了事务人员在9月30日撤离外，英军已完成了它在黎巴嫩的撤退工作；在8月31日，法军方面也作了一个同样的宣布，但没有提到清理未了事务的人员。一位记者写道：“法军的离开已……开始给法国在列万特的地位带来了正常的前景。在叙利亚仍然存在着一不妥协的激烈的反法情绪；……”

但在黎巴嫩，现在法国人再也不令人害怕了，他们又可以获得人们的羡慕了。”英国把中东部队在战时铺设的黎波里—拉斯—纳库腊铁路卖给了黎巴嫩政府，卖价是五百万黎巴嫩镑，即他们最初要价的十分之一；但是这里仍然存在着大得多的、法国政府在黎巴嫩的资产问题。当黎巴嫩政府在1946年1月要求保管敌产的法国人把那些（意大利的）财产移交给他们时，法国人不但拒绝交付，反而直接移交给了意大利驻耶路撒冷的副领事，另外，法国人还希望在混合法庭中暂时保留法国的地方法官，这都使黎巴嫩政府感到恼火。仍然存在法国政府在黎巴嫩的财产问题，关于这个问题，黎巴嫩外交部长在同一位法国记者谈话时曾说，法国应当把拉亚克的机场和一个军需仓库移交给我们。另一方面，法国的态度是，任何财产的移交“必须根据协定来办理，并按照法国议会批准的合理价格付款。……对列万特各国的委任统治已使法国受到很大损失而深感失望，这足以使我们要求在清理财产对不要再给我们的预算增加葡葡的负担”。

自从黎巴嫩获得独立以来，它的政府已经表示不赞成再举行领事弥撒，这是几个世纪以来，马龙派习以为常地在法国外交官或领事代表出席参加的情况下所举行的一种弥撒。现在政府认为：这种仪式乃是早已被抛在后面的过去所遗留下来的一种残余，表示希望马龙派（它代表114黎巴嫩人口中的

---

大表现”〔路透社，据《明星报》（Star）报道，1946年2月6日〕。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1年，第1辑，第1号，第290—294页。

《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295页。

皮仕尔曾说：“以前的国际组织曾给予法国一项委任统治权：也就是说，赋予它某种责任。当法国……在战争中间决定宣布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时，……我们面临着一个真空。……为了填补这个空隙，1945年12月13日的协定建议采取一种集体安全体系。”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1年，第1辑，第1号，第271—368页。

参阅《新苏黎世报》驻伦敦记者报道，1946年2月19日。

《泰晤士报》驻巴黎记者报道，1946年3月1日。

《泰晤士报》，1946年3月5日。

《纽约时报》驻巴黎记者报道，1946年3月10日。

原文载《世界报》，1946年3月26日。



百分之三十弱) 应该不再保持这一传统。贝鲁特的马龙派大主教伊格纳提乌斯·穆巴拉克阁下已准备在 1947 年的复活节时就照办, 但遭到马龙派总主教昂顿·阿里达阁下的拒绝, 他一贯认为, “既然黎巴嫩是基督教徒在列万特的唯一避难所, 它的独立就应特别受到法国的保护”, 以免遭受叙利亚穆斯林的侵害。作为一种妥协, 双方后来同意领事弥撒不再象以往那样在贝鲁特的马龙派大教堂举行, 而是改在布克尔基的大主教驻地举行。在法国有人认为是未解决的各项问题达成一项协议, 这事可以推迟到 1947 年的下一次选举之后再行。因为到那时黎巴嫩将有一个“比 1943 年更加自由的投票选举所产生出来的”政府; 但事实上, 1947 年 5 月 25 日的选举“普遍地被认为是一出耗资巨大的滑稽剧。甚至连政府的支持者也同意这一点, 虽然他们也争论说, 不公正地划分选区是不必要的, 因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政府提出的候选人反正能够极其容易地稳获胜利”。在法国的朋友们遭到了这次失败之后, 法国、黎巴嫩和叙利亚的代表们 10 月 1 日在巴黎开始了财政谈判。叙利亚和黎巴嫩所发行的纸币, 约相等于二百三十亿法郎, 是归法国控制的叙利亚—黎巴嫩银行管理的, 作为它的准备金的资产都存放在巴黎。法国建议在今后两年中用商品或欧洲货币交付七十亿法郎, 移交法国在列万特的财产, 其价值估计大约二十亿法郎; 并保证其余的部分在十年内不受法郎贬值的影响。黎巴嫩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 但叙利亚人坚持说, 贾德鲁将军在 1944 年 1 月曾许诺, 法国在任 115 什么时候都将保护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货币不受贬值的影响。他们拒绝了法国对其财产的估价, 坚持说很大一部分财产已在委任统治时期被强迫出售。他们抗议法国把委任统治时期维持这里的特称部队的一部分费用也算在他们的帐上。此外, 据说提由于法国人利用局势作出种种努力, 才使他们的贸易和文化利益有所恢复—对这种神话, 他们也感到愤慨。因此, 叙利亚政府在 1948 年 1 月 31 日宣布他们独立于法郎集团之外, 而法国与黎巴嫩则在 2 月 7 日签订了一项协定, 法国对黎巴嫩作了让步, 特别是接受了黎巴嫩出口货中的很大一部分, 以便缩小同法国贸易的极为悬殊的逆差。

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 在它们同法国的关系这个问题上, 都已变得更倾向于拆散伙伴关系、因为它们双方在分配作为委任统治时期的遗产的经济上的“共同利益”方面, 特别是在关税政策方面, 都没有达成协议。这样, 战时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政治家们为了从法国获得国家的独立而实行的联合, 不

---

对照 J.G.弗里尔 (J.G.Frere) 准将: “英国与叙利亚”, 《旁观者》周刊 (“BritainandSyria”, Spectator), 1946 年 4 月 19 日, 第 393—394 页, 和以帕蒂纳克斯 (Pertinax) 的笔名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 1946 年 5 月 27 日。

《纽约时报》, 1946 年 3 月 21 日; 《雷诺新闻》, 1946 年 10 月 13 日。

罗伯特·斯蒂芬斯在《苏格兰人报》上的文章, 1946 年 10 月 21 日。

E.萨布利埃在《世界报》上的文章, 1946 年 11 月 8 日。

参阅莫里斯·费罗: “对于在黎巴嫩的财产怎么办?” (MauriceFerro:

“Quedoitfairel'etatdesesproprieteslibanaises?”), 同上, 1946 年 9 月 26 日。

参阅英国外交部: 《联合王国和叙利亚之间关于在叙利亚法庭上解决悬案的换照》

(ExchangeofNotesbetweentheUnitedKingdomandSyriaconcerningtheSettlementofPendingCasesbeforetheSyrianCourts), 敕令第 7140 号 (伦敦, 英王陛下文书局, 1947 年版)。

莫里斯·费罗在《世界报》上的文章, 1946 年 11 月 29 日。

久就变成了强调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发展主义。而且，虽然法国在穆斯林叙利亚的影响仍然是微乎其微的，至少在 1949 年 3 月民族集团政府垮台以前是如此，但是法国对“贝鲁特的普遍的奢侈和安逸”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在黎巴嫩的基督教徒中间的影响，一般他说，是通过各种方式被“稳固地肯定下来了”。在叙利亚的胡斯尼·扎伊姆短暂的独裁统治期间（1949 年 3 月 30 日—8 月 14 日），法国在叙利亚的影响有了显著的增长。可是当扎伊姆被一个敌对的军事集团判处了死刑时，通常要作出反应的《世界报》就毫不迟疑地在 1949 年 8 月 16 日把法庭谋害他的责任归之于“斯特林、弗里尔、斯皮尔斯、格拉布和康佩奈之流，对他们来说，叙利亚的一个真正的民族政权，倒是一种反常状态，必须加以消除”。不过，人们希望，1950 年 5 月 25 日英、法、美三国政府宣布的一项共同的中东政策，已最终地使这一场历史上的竞争归于消灭。

---

社论，同上，1946 年 12 月 6 日。

在总数中大约有百分之三十六的人口属于同罗马有联系的各教派，并在他们与法国的关系上，接受马龙派的领导（参阅皮埃尔·隆多：《黎巴嫩的政治机构》（Pierre Rondot：Les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du Liban），巴黎，现代东方研究所，1947 年版，第 29 页）。

参阅穆巴拉克大主教阁下接见杰罗尔德·弗兰克时所流露的反穆斯林情绪〔《巴勒斯坦邮报》（犹太复国主义者刊物），1946 年 3 月 21 日〕：“我是非常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因为我对巴勒斯坦由衷地怀有好感。如果你希望追随穆斯林阿拉伯人的愿望的话，那他们就想要控制国家，把基督教徒撵走。我坦率地对你说，如果你反对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那就意味着重新让人民受野蛮的统治。……我们知道这里存在着文明与倒退之间的斗争，而犹太人是代表文明的。我们基督教徒的黎巴嫩人要文明而不要倒退。……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徒能够一起共事。如果阿拉伯穆斯林愿意给予帮助，那就太好了，但不幸的是，他们对一切意味着进步的事物都加以反对”；参阅各纳·林斯利同这位大主教的另一次谈话的报道，他曾这样说：“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犹太人到黎巴嫩来，我们需要他们。”〔“黎巴嫩注视着西方”（“Lebanon Looksto the west”），同上，1946 年 5 月 17 日〕

## 第二章 116 英国—埃及关系

### 第一节 谈判的背景，1945—1946 年

我们在这套丛书的前面一卷中已看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半年中，埃及政界舆论迫切希望通过英军和英国当局的撤出埃及和英—埃苏丹，完全结束埃及依附于英国的局面；显然，英国的政策仍保持不变，这或者是由于（正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一样）它被世界上其他地方更紧急的事情所缠住，要不就是因为丘吉尔个人仍倾向于把埃及看作是英国从前的保护国。据说，把英国战时司令部和大批驻军从埃及的两个主要城市开罗和亚历山大撤走，已成了英国外交部和军事当局之间的一个争论的问题；而后来奥特林厄姆勋爵（即从前的爱德华·格里格爵士，他在 1945 年 8 月 12 日以前曾任英国常驻中东大臣）宣称，早在 9 月他就劝告新成立的英国工党政府立刻宣布这样的撤退，并在条件许可时，立即付诸实现；据说，当时英国驻开罗大使馆就提出劝告，反对采取这样一种姿态。后来《圆桌》季刊的一篇文章说，在战争结束时，埃及“有着一种愿以宽大来报答宽大的心情”，它要把“一个感恩的埃及的自愿的合作”献给英国；但是，不愉快的英—埃关系所造成的七十年的失望，似乎不大可能产生这样一种结果。有迹象表明，英国工党政府的上台，也许已被期望过分急切的埃及人看作是英国准备让步的信号；面对埃及人这种想提出最大要求的心情，在开罗的英国官员们或许已经感到：他们现在的责任不是开动加速器，而是要扳煞车。1945 年秋天，大使馆要求埃及首相马哈茂德·努克拉希，别在那个时候要求就修改 1936 年的英—埃条约问题举行谈判，但努克拉希已经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立即行动。强大的华夫脱党，在 1944 年 10 月成为反对党，经过 1945 年 1 月的选举后地位未变；它一有机会就要给政府找 117 麻烦；各极端派顾名思义当然是反英的；而要求立即修改条约的口号，是由努克拉希内阁中以财政大臣马克拉姆·乌拜德为首的一派提出来的。于是，在 1945 年年 12 月 20 日埃及提交了一份照会，它说，1936 年条约所规定的对埃及主权的限制，是暂时性的，是过去一场国际危机所引起的；埃及战时的合作一定已经消除了英国在 1936 年时并没有完全消失的怀疑。埃及将“不惜任何牺牲，在最近的将来，把它的军事潜力提高到这样一种程度，能够在盟国和联合国的援军抵达之前就击退侵略”。另一方面，对英国外交部来说，侵略不是一个未来的

---

《埃及金融市场报》，1947 年 4 月 16 日。

莫里斯·费罗在《世界报》上的文章，1946 年 9 月 26 日。

凯文·海兰：“中东的‘瑞士’”（Kevin Hyland）：“Middle East ‘Switzerland’”，《苏格兰人报》，1947 年 9 月 30 日，参阅克利夫顿·丹尼尔发自贝鲁特的报道，《纽约时报》，1947 年 5 月 26 日。亲法的“黎巴嫩民族集团党”出版了一本《黎巴嫩选举的黑皮书》（Black Book of the Lebanese Elections），纽约，腓尼基出版社，1947 年版。

达纳·亚当斯·施密特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1948 年 2 月 1 日。

参阅“为了改进 1948 年我们与叙利亚的经济关系”，《列万特商业报》

（“pour un refondement de nos rapports économiques avec la Syrie en 1948”，Le Commerce du Levant），1948 年 1 月 14 日。

《经济学家》驻开罗记者报道，1950 年 6 月 24 日，第 1391 页。

假想，而是一个眼前的威胁，它表现在最近波斯阿塞拜疆的一个共产党政府的宣告成立和苏联对上土耳其施加的压力。于是他们在1946年1月27日答复埃及的照会说，将指示英国大使开始举行预备性会谈，以便把英—埃关系置于“一种完全的和自由的伙伴关系的基础之上，有如平等的双方之间的关系一样”，至于1936年条约中所包含的“各基本原则在本质上的正确性”已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予以证实。因此，英国和埃及的战后关系，两国政府从一开始就是以不同的“波长”来行动的（后来《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就是这样表述他）；埃及人关心的是国家的威望和渴望排除区域性强权政治伪现实，“而英国人关心的则是苏联对中东现状的新的威胁。因为这种严重的威胁出现之时，正值英国日益感到自己的力量由于战争而被削弱，所以英国在处理埃及或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问题时，就更倾向于首先考虑俄国的威胁，对于这些本地的问题就敷衍了事。在开罗和亚历山大早已组织了示威游行，来反对英国的这种敷衍了事和埃及政府之显然对此予以默认。示威游行者是来自人数众多的学生团体中的不大负责的成员，是由华夫脱党组织的，或者属于象伊赫万穆斯林或米斯尔法塔赫党这种极端分子的协会，还有是来自城市的无产阶级——头头新近把他们搞进了工会，那些头头本身受了共产党的影响，特别是因为参加了1945年9月118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工会联合会。在那次世界工会联合会巴黎会议之后，埃及成立了一个全国工人解放委员会，这个组织的名称本身就很意味深长，它同极端派学生领袖们建立了联系，并成立了一个“全国工人和学生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领导人物穆斯塔法·穆萨，后来成了一名华夫脱党左翼议员。1946年2月9日开罗福阿德一世大学的重新开办，是开罗、亚历山大以及其他城市的学生和工人发生骚动的信号，他们要求解散政府。后来据称，在这一点上，英国大使基勒恩勋爵（他在1940年至1944年之间曾四次对法鲁克国王施加影响来得到或保住一个听从英国政策的埃及政府）曾告诉国王说，英国政府怀疑努克拉希是否有力量维持秩序，以便修改条约的谈判能够进行。无论如何。在2月13日，努克拉希辞职了；国王授命有钱的和在政治上独立的伊斯梅尔·西德基组织一个新政府，西德基在1930—1933年曾博得铁腕首相的名声。不过，在要求他组阁时，法鲁克曾谈到人民希望要有示威游行，以此为“一种用来健康地表示人民热烈希望实现他们的正当要求的方法”，因此，西德基撤销了努克拉希新近设置的对示威游行的禁令。2月21日，“全国工人和学生委员会”作出反应，

---

见奥尔福德·卡尔顿：“1949年的叙利亚政变”（Alford Carleton：“The Syrian Coups d'Etat of 1949”），《中东杂志》，1950年1月，第4卷。第7—8页。

见下文，原著第312—313页。

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267—268页。

同上书，第197页注，第260页。

甚至在1936年英—埃条约签订后，军事当局还是不大情愿从开罗撤走，见戴维·凯利爵士：《几个统治者》（Sir David Kelly: The Ruling Few），伦敦，霍利斯与卡特，1952年版，第261—262页。

见《星期日泰晤士报》，1946年5月19日；1946年5月21日，上院辩论，第5辑，第141卷，第348—349栏；1951年7月30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91卷，第1049栏。

“英国—埃及关系”，《圆桌》季刊（“Anglo—Egyptian Relations”，Round Table），1951年3月，第115页。

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263页注。

组织了一次总罢工，它号召追随者们不要发生骚乱或捣毁财产之类的事；而只是向英国和全世界显示“埃及准备进行斗争，直到六十五年来的被占领局面结束为止”。然而，随着罢工而来的是对在开罗的英国人财产的大肆焚烧和掠夺。3月4日，在亚历山大纪念“为撤军牺牲的烈士们”而进一步举行示威游行时，一群暴徒放火焚烧了一个英国宪兵哨所，并用石头打死了驻在其中的五名哨兵中的两名。这些事件发生后，公开的相互指责接踵而至，英国和埃及政府都想把发生暴力行为和生命损失的责任，归之于对方的国民，全世界的共产党报纸也趁机利用这一局势大作文章。

## 第二节 在开罗和伦敦的谈判，1946年

就是在这种连续不断的混乱之中，在他们不断地用炸弹暴行来反对英国军队和平民的时候，西德基企图象在1935年一样，组成一个包括各党派的代表团来同英国举行谈判。然而，华夫脱党提出了他们参加谈判的条件：他们的代表应占多数，以他们的领导人穆斯塔法·纳哈斯为代表团团长，保证举行新的选举。因此，西德基把华夫脱党排除在代表团之外，而没有能使它包括所有的党派和重要人士。他在3月8日组成了这个代表团，并禁止三家华夫脱党报纸的发行，下令逮捕恐怖组织米斯尔法塔赫党的领导人和四名成员，以此进一步表示其坚决的态度。按照西德基后来出版的回忆录的说法，英国政府没有迅速宣布它的代表团名单，这在埃及政界引起了很大的惊讶；直到3月30日，英国新任大使（一个月前接替基勒恩勋爵的罗纳德·坎贝尔爵士）在答复西德基的询问时才说，他本人将率领一个包括高级军事专家和大使馆官员的代表团。西德基十分强硬地反驳说，埃及代表团的成员是属于埃及政治生活中最杰出的人士之列的；他期望与同等级别的英国人士举行谈判。他还补充说：“埃及人民相信，并且不会忘记，过去十年中，特别是战争期间所实行的政策——一项并没有给人留下好印象的政策——就是由这些你现在想依之为你的政治助手的大使馆官员所拟订和执行的。”于是，在4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宣布他将率领代表团，尽管谈判的最初阶段将由空军大臣斯坦斯盖特勋爵和英国大使来主持，1941—1945年英国驻伊拉克大使、现任外交部中东司司长基纳汉·康沃利斯爵士、将担任首席政治顾问，而中东三军总司令将担任军事顾问。斯坦斯盖特勋爵的任命，受到西德基的公开欢迎，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很少有别的英国人肯为我国说好话，只有他，当时还是韦奇伍德·本先生，在议会内外维护着埃及的事业。因此，韦奇伍德·本的名字在埃及总是被当作一线希望始终铭记不忘。”

当4月15日代表团抵达开罗时，按照斯坦斯盖特勋爵后来的记述，它从西德基那里听到的第一句话是：“除了以撤退为基础，你们不可能同埃及达成协议。”然而，英国军事顾问们力图提醒埃及代表团注意：苏联对波斯、土耳其和希腊施加的冷战压力，其中就存在着对整个中东安全的威胁；作为保卫中东的一个基地，他们强调下埃及的军事设施和交通是极其重要的，而

---

见上文，原著第58—60页。

见上文，原著第21—27页。

英埃两国的照会原文载《泰晤士报》，1946年1月31日。

且下埃及能提供大量的熟练、半熟练和非熟练的劳动力，这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已经证明是十分有用的；他们极力要求埃及人考虑整个地区的防务，而不是较狭隘的尼罗河流域的利益，而且，因为埃及的人力物力如无外援就不足以应付这种较广泛的防御设想，他们还要求埃及人在平时接受穿便服的英国技术专家，并在运河区维持一个地区性的司令部。然而，埃及代表团的看法却倾向于局限在尼罗河流域的狭隘范围内，而且他们一心只想结束英国的占领，这就排除了任何更广泛的考虑。此外，继续不断的学生示威游行和炸弹暴行，以及不时出现的暗杀冒险行动，也使人不敢偏离埃及的基本要求。于是，英国政府在5月7日提出了下列建议以谋求打破僵局：从埃及领土上撤出所有英国部队，并在谈判中解决这一撤出的各个阶段和最后完成日期，以及由埃及政府作出安排，使双方可能根据盟约在战时或受到紧急的战争威胁时相互援助。

在以后的十七天中，这个建议在下院辩论了两次，在上院也辩论了一次。战时曾在中东服务过的一些支持政府的人争辩说，不设在埃及领土上的基地，同样可以很好地保卫苏伊士运河；反对派发言人则指出，巴勒斯坦和昔兰尼加这两块显然只能选择其中之一的领地，英国能够121占据的期限都不是永久的；而塞浦路斯也不是很符合要求的。丘吉尔和艾登，对1940年6月危机中埃及政府的态度犹豫不决，是深有所知的，他们提出警告说（尽管他们并没有直接提到这一点），完全依赖于将来国际局势紧张时英国有权重新占领这些设施，那是十分危险的：同我们将不免发生争端的那个大国，当然要对埃及政府说：“我们将把英国军事力量进入运河区的任何行动看作一种不友好的行为。”难道有人竟能设想，无论如何不希望有英国部队或空军驻在运河区的埃及政府，面临这种局势，将不拒绝我们重新进驻的要求？……

难道有人能想象，在一场重新开始的世界斗争中，当可怕的结局是和平或者战争还悬而未决的时候，英国政府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会迫使结局早日来临？……这是一种独断的行动，一种将被广泛地看作是并加以谴责的侵略行动，一种正在摧毁和平的最后希望的行动。

赫伯特·莫里森无意中透露，政府已“勉强地”答应埃及的要求，先撤退然后再研究英埃同盟的将来和军事援助问题；首相说：“如果整个事情破裂，当然，仍然还存在着条约”；贝文则以作出下列的保证来结束这一系列的辩论：决不应当出现一个真空。如果埃及政府迫使局势中出现一个真空——这意味着我们已经撤离，而那里却没有可以代眷的东西来保证安全，例如地区性防务或其他组织——对此，我决不能同意。但我已经建议……一个使双方接近的新基础，对这个我有信心。或许伙伴关系是一个错误的措辞，但这是为共同防御作出的一种联合努力，这不仅是为了大不列颠和英联邦的利益，而且最终也是为了这样的利益，即为我所希望的、有待于变成保卫世界安全的联合国防务，作出贡献。

---

见扎基·巴达奥伊博士：《埃及劳工问题与工人组织》

（Dr.ZakiBadaoni:LesProblemesdntavailletlesorganisationsouvrieresenEgypte），亚历山大，埃及出版社、1948年版，第153—154页，第168—170页；威廉·J·汉德利：“埃及劳工运动”（WilliamJ.Handley：“TheLaborMovementinEgypt”）《中东杂志》，1947年7月，第3卷，第283—285页。

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39页，第208—210页，第259页。

引自自治领大臣1946年2月26日在上院的发言（上院辩论，第5辑，第139卷，第873栏）。

在此期间，埃及所有的报纸，除萨德党人的《宪政报》之外，都对英国的建议没有好评。反对党华夫脱党谴责英埃同盟的这种原则，其他报纸则对这种条件——英国在发生战争或有战争威胁的情况下必须在埃及占用各种设施——表示怀疑。5月21日，英国向埃及政府递交了有如后来努克拉希在安全理事会上所说的“一份同盟条

约的草案，以及一份军事条约的草案，它大体上把强加在1936年条约中的那些不胜负担的无法接受的军事条件122又写了进去”。前已引证过的那篇《圆桌》季刊文章的作者评论道、埃及代表团不久就看到了，而且是愤慨地看到了，英国外交部是在“把埃及当作一个狡猾的客户看待，迫使他签订一个绝对地万无一失的合同。……就是对待一个被打败了的敌人，也不可能比这还要更加谨慎戒备的了。”英国外交部对1940年6月和1942年2月埃及企图逃避条约所规定的责任，无疑是记忆犹新的；所以他们很可能已经感到，考虑到冷战已在中东的北端进行，如果过分依赖未来的埃及善意，那是靠不住的。

与此同时，华夫脱党同极端派民族主义者以及共产党人实行策略性的联合，继续从事反对英埃同盟和西德基个人的积极活动，并且成功地利用了社会不安的局势。由于战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已停止，社会不安已经加剧，现在由于英军开始撤退，就更进一步恶化了。有人早就作过估计，至少有二十万失业者，而那些有工作的人，他们在战时已经组织了萌芽状态的工会，拒绝承认现在对劳动力的需求已减少，他们不仅试图用静坐罢工来强迫实行每周四十小时的工作，而且要求雇主们必须维持生产，而不管对他们的产品的需求是否有波动的情况。共产党人授意的全国工人解放委员会重新改名为工人大会，并野心勃勃地宣称已把整个工会运动联合起来。在国营电报工人、政府工程师和教师的罢工当中，在一次总罢工的威胁之下，政府在7月9日通过了一项对国营企业工人罢工课以巨额罚款的法案。因为华夫脱党和马克拉姆的库特拉党号召在11日（1882年英国皇家海军摧毁亚历山大要塞——那是英国古领埃及的前奏——的周年纪念日）举行总罢工，于是发生了大规模的警察搜查华夫脱党员和可疑的共产党人住所的事件。十一个表面上是教育、科学和文化的组织遭到了查封。在那些被捕的人当中有：一个意大利—埃及籍犹太人，他在开罗的一个繁华的广场上开设了一家书店，陈列和出售马克思主义书籍；123一位著名的属于激进派的科普特作家萨拉马·穆萨；以及华夫脱党党报《华夫脱埃及人报》总编辑，一家政府机关报说他是“第三国际的一个代理人，他一直在设法使第三国际与华夫脱党和好”。他的报纸被勒令停刊，还有七种“进步”刊物也遭到同样命运。据估计被逮捕的人数达到了二百二十人；尽管到11月左右；他们几乎全都得到了释放而没

---

《回忆录》（Mudhakarati），开罗，达尔希拉勒，1950年阿拉伯文版。引自该书的几段译文是埃米尔·马默斯顿（Emile Marmorstein）先生提供的，他正从事于该书的全部翻译工作，

《回忆录》，第61—62页。

《泰晤士报》，1946年4月22日。英国保守党集团则相应地对斯坦斯盖特勋爵的任命持批评的态度。

后来斯坦斯盖特勋爵曾断言：“假如我们能够在—到达的时候就宣布，将来英国军队只有得到埃及的同意后才能驻在埃及，那么我们早就能在一个月之内缔结一项条约”（“埃及人的看法”

（“The Egyptian Point of View”），《听众》周刊，1951年1月25日，第127页）；但关于苏丹问题，他在这里却只字未提，而这个问题对埃及民族主义者恰恰是同等重要的；见下文，原著第125—127页。

有被正式加上罪名，那些“文化”组织获得允许重新开办，《华夫脱埃及人报》的总编辑也回到了自己的办公桌旁，但是这件事给共产党的《人道报》提供了机会，它以“在贝文操纵下的埃及法西斯主义”这个题目写出了一篇社论。

英埃谈判在盛夏中度过了六、七、八这三个月，其间穿插着双方的互换正式照会和向伦敦的请示。埃及代表团通过它的三四个成员的僵硬态度，继续坚持其原来的要求，代表团成员马克拉姆更是特别惹人注目，他公开声称决不放弃那些要求。而英国代表团仍继续提出建议，以求在他们原来的立场和埃及人的立场之间最后达成妥协。这样，尽管埃及人坚持要求英军在一年之内完全撤出（由于他们的技术设施极为复杂，这个期限在实际上也许是不可能的），而英国原来的建议是不超过五年，“以避免在英国最后一支部队撤走和埃及人承担起他们的义务之间出现一种‘防务真空’的危险”，英国人在8月中旬提出建议，折衷为三年。埃及人还希望把引起他们的共同防御义务的条件，限制在进攻埃及或埃及的毗邻国家的侵略行动上。而英国则力图把这种条件范围扩大致中东边缘那些最容易受到苏联冷战威胁的国家，即波斯、土耳其和希腊。英国在8月中旬提出的建议，对埃及人的害怕心理还作了一外新的让步，即对于那些不是埃及的近邻而是距离较远的国家，它的义务只限于“就应该采取的行动进行协商”。

这时在英一埃苏丹出现的具有政治意见的小团体中，很重要的一派指望在埃及的帮助之下获得自治，因此，他们迫切希望在目前谈判所取得的任何英一埃协议中不要漏掉关于苏丹未来地位的规定。因此，一个由这一124派成员和传统上不信任埃及的另一敌对集团的人员所组成的代表团就被派往开罗，他们带去了由双方妥协共同提出的建议：建立一个苏丹人的民主政府，并由它来自由决定他们的国家将来同埃及联盟和同英国结盟所应采取的形式。然而，当埃及各党派的政治人物都坚持要它接受在埃及国王统治下苏丹同埃及结成永久的联盟时，这个代表团再次分裂成为两派；那些赞成独立于埃及之外的人就回到了喀土穆。埃及人向英国谈判者们重申了这一主张，但后者坚守英国政府已经作出的保证：即在对苏丹国家的地位作出任何改变之前，应根据宪法程序同苏丹人进行协商。因此，英国人在8月中旬建议，这个问题应同埃及的防务分开，作为另行谈判的课题。

据说，驻伦敦的埃及大使被告知，8月中旬的建议是英国的最后建议，西德基和法鲁克国王两人也都准备照此接受。然而，由马克拉姆领导的埃及代表团中的不妥协派拒绝改变主张，并且始终如一地利用他们参加官方谈判所知道的消息，把秘密讨论的情况和机密文件予以公布，企图用以证明他们比其他同僚们更加爱国。……埃及最后答复英国建议的全文，在还未送交英

---

首相的发言，下院辩论，第5辑，第422卷，第781—782栏。

《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39页。

丘吉尔1946年5月24日的发言，下院辩论，第5辑，第423卷，第774—775栏。

下院辩论，第5辑，第423卷，第788栏。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947年8月5日（《正式记录》，第2年，第70号，第1747页）。

《圆桌》季刊，1951年3月，第115页。有些英国观察家认为，埃及代表团中的自由党和萨德党成员以及某些独立人士，准备同英国合作，尽管并不是按照英国的条件；但由于英国外交部及其军事顾问们的态度，他们的地征，同他们的极端派同事们和反对竞华夫脱党相对比而言，就变得不稳了。



国代表团之前，就被公开发表在一家阿拉伯文周刊上了，而它又是经过各方共同努力，使之具有最后通牒的那种不妥协的最后定局性质的文件……这时，事情也就达到了高潮。于是，西德基在 9 月 28 日辞去了首相职务；但是当国王 125 的叔父沙里夫·萨卜里试图组成一个包括华夫脱党、自由党和萨德党人的各个党派的内阁而告失败之后，国王在 10 月 2 日又重新转向西德基。与此同时，斯坦斯盖特勋爵和英国大使已前往伦敦进行磋商，西德基就向英国外交部建议，他应该跟在他们之后也去伦敦，以便亲自向贝文先生说明民族理想在影响他的政府的政策，并使自己相信，英国外交大臣已从他那里充分了解埃及为什么要抱这种态度。这就又引起了学生和工人的更为敌对的示威游行。

在 10 月 17 日到 25 日这一期间，西德基及其外交大臣、萨德党的易卜拉欣·阿卜德·哈迪曾在伦敦同贝文举行了五次会谈，会谈的结果是他们初步拟出了一项新的条约草案。英国答允在 1947 年 3 月 31 日以前撤出开罗、亚历山大和尼罗河三角洲，在 1949 年 9 月 1 日以前撤离埃及的其余领土。作为交换条件，埃及同意在发生“对靠近埃及的国家，进行侵略时采取行动，而联合防务部则将研究对可能威胁到中东安全的一切事件所产生的反响，并向两国政府作出……适当的建议，当威胁到埃及的任何一个邻邦的安全的情况发生时，两国政府将一起磋商，以便共同采取那些被认为是必要的措施。

仍然存在着难题：埃及对苏丹的主权要求，贝文在 3 月间作出的同苏丹人协商的保证，这两者如何调和？后来贝文说，他同西德基磋商，要在条约草案上附加一份关于苏丹的议定书时，他觉得把下列一点提了出来是做对的：

在埃及和苏丹之间存在着一个象征性的王朝联盟，其条件一直是假定现存的行政制度没有任何改变（凭了这种行政制度，苏丹由总督根据 1899 年协定所授与他的权力实行统治，这是 1936 年的英—埃条约所确认和说明过的）：还有一个条件是：为确保苏丹防务而作出的安排，假定也没有任何改变。

根据贝文的说法，西德基承认在拟议中的议定书里是无 126 法损害苏丹人获得其独立的权利的；但争辩说，这是一个普通原则，而不是条约草案中如何规定的问题。

这种想把埃及人和英国人关于苏丹的观点合并成一个简单的妥协方案的企图，跟公元 451 年在查尔塞登召开的普世基督教会议想要调和正教同（埃

---

一位作者在 1946 年 7 月 23 日的巴黎共产党报纸《人道报》上十分赞赏“象华夫脱党那样的比较进步的 and 民族主义的力量”。当华夫脱党的领导人为了对英国或者对当时的埃及政府（如果华夫脱党是处于反对党地位的话）施加压力，而屡次同共产党调情时，他们显然是在玩火。

在一次同记者谈话中；他攻击建议中的联合防御委员会“完全是一种戴着假面具的保护国，……实际上是一个英埃控制委员会，或不如说是一个联合国防部”（《金字塔报》，1946 年 7 月 17 日）。

《每日电讯报》和《苏格兰人报》驻亚历山大记者报道，1946 年 8 月 5 日。

苏丹近代史上的“大分裂”是这样造成的：1881 年栋古拉的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自封为那个久已为世人所盼望的马赫迪（按照民间的穆斯林传统说法，他的出现是太平盛世的来临），他后来为了反对埃及总督的代理人的压迫和腐败统治，又造反叛变。当西苏丹的部族集合在他的旗帜之下时，东部各省那些属于早就存在的哈特米亚教派的部族却反对他，而当这些部族被他征服时，它们的领袖就逃到埃及去避难。马赫

及和叙利亚的)一性论关于基督降生的观点的企图,是非常相似的,而且并没有取得更为成功的结果。西德基抓住了“在共同国王统治下的……联合”这个关键性词句,而且可能是依仗埃及人的不妥协态度同英国人的妥协习惯的相互作用,他在关键性词句后面所做的文章里为自己寻找出路。不论如何,在10月26日,当他回到开罗后,他对一位埃及记者发表了下面这样一个声明:“我在上个月曾说过,我要把苏丹带回给埃及。现在我要说,我已完成了这个使命,已经明确地决定要使在埃及国王统治下的埃及和苏丹的联合得到实现。”英国首相在28日对这个报

道表示“遗憾”,在他看来,这是“片面的和会引起误解的”。第二天,埃及官方消息发表了关于苏丹的议定书的一种叙述大意的文本,虽然也许同尚未公布的英文原本没有很大的故意的出入,但它似乎已经稍微带上了一些倾向埃及人观点的色彩,这些埃及方面的公告引起了苏丹的主张独立的人士的极大不安,他们再也不能相信,贝文——西德基议定书所建议的同埃及的王朝联合,将只是象征性的,而且必须取得苏丹人的同意。迈基·阿巴127斯是1944年创立的北苏丹谘询委员会的一名委员,他去出席了这个委员会的会议。在会议上,总督(即陆军少将休伯特·赫德尔斯顿爵士,他的大部分军事生涯是在苏丹度过的,1940年当意大利看来即将从东非入侵时,他被任命为总督)和民政部长“用尽气力也不能使委员们相信并没有改变现状的任何打算”。独立阵线和亲埃及的“民族阵线”,在喀土穆和乌姆杜尔曼这两个姐妹城市,举行了敌对的示威游行,主要目的是显示各自的力量。但双方都从各省召来了自己的支持者,因此造成了发生严重骚乱的危险。被召往伦敦的总督把这种局势告诉了外交部。

现在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埃及代表团的十二名成员中,有七名是反对西德基从伦敦带回来的草案中的所有三项主要条款的,即处理撤退事宜、共同防御和苏丹问题的方案。因此,在11月26日,法鲁克国王(据说,他公开

---

迪教派和哈特米亚教派之间的持续敌对行动,大约从1920年起,分别由苏丹的两位“伟大的长者”——赛德·阿卜德·拉赫曼·马赫迪爵士(马赫迪的遗腹子)和赛德·阿里·米格哈尼爵士领导,为苏丹“知识分子”中的两个敌对集团提供了相互攻击的论点;这两个集团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在苏丹走向自治的道路上应依靠英国还是依靠埃及的支持这个问题而发生分裂的(见迈基·阿巴斯:《苏丹问题》(MekkiAbbas: TheSudanQuestion),伦敦,费伯和费伯,1952年版,第108—110页,第130—132页)。  
《苏丹问题》,第110—111页,第133页。

贝文1946年3月26日在下院的发言,下院辩论,第5辑,第421卷,第217栏。后来斯坦斯盖特勋爵宣称,由于贝文曾提到苏丹人的自治政府“是走向最后独立的第一步”,因此,埃及人对“整个事端”就产生了偏见(《听众》周刊,1951年1月25日,第127页),迈基·阿巴斯说:“苏丹政府中的英国官员们,在感情上是同情于独立派的”;这种感情“也隐约地流露在民政部长(在1945年)发给所有的英国高级官员的一份秘密指示中”(《苏丹问题》,第133页;参阅不久前驻在苏丹的一位特派记者的报道,《泰晤士报》。1952年5月16日)。

《泰晤士报》驻亚历山大记者报道,1946年9月30日;以及10月1日的社论。

英国外交部:《关于修订1936年英—埃条约谈判文件》

(PapersRegardingtheNegotiationsforaRevisionoftheAnglo--EgyptianTreatyof1936),敕令第7179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7年版,此后简称敕令第7179号)。

敕令第7179号,第3页。前面引证过的一位英国权威“并不认为这种防御条款足以保护我们的利益,因此当它成为泡影时感到高兴”。

表示深信缔结一项两国都能接受的条约，对双方都是有利的）解散了这个代表团。西德基取得了一次信任投票，在由二百六十四名议员组成的议会中获得了一百五十九票，其余的议员或是缺席或是没有投票。但他立即碰到了一场新爆发的街头示威游行，这是由华夫脱党煽动起来的，因此，他禁止了华夫脱党打算召开的一次政治集会，并作出暗示说，他们正在得到苏联的物质援助。华夫脱党的《报道报》否认了这一指责，但只是补充说：“我们需要俄国和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友谊，为的是在我们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我们的问题时，好得到他们的支持。”

当西德基于11月28日在记者招待会上为其政策进行辩解时，据报道，他曾说过，很少有希望去说服英国接受埃及对苏丹所享有的完全的主权，而埃及公众现在相信这正是埃及的权利。12月6日，在同苏丹总督协商后，据说贝文给西德基送去了一封附在条约上的“解释信”草案，信中要求西德基同意，议定书草案“实际上是对苏丹的现有地位的一种确认”，并且“绝不影响联合王国保卫苏丹安全的权利”。对这一要求，西德基不能予以128同意。第二天，总督（现已返回喀土穆）宣称，英国首相已授权给他对苏丹人尺作如下的保证：

苏丹政府的宪法和权力并不因最近的谈判而有所改变，苏丹政府正积极从事的任务是，准备给苏丹人以自治，和准备让苏丹人自由地选择他们的未来地位。英王陛下政府……决不允许有任何使苏丹政府偏离其任务的事发生。伦敦又作了正式的补充：

由于早些时候在埃及透露了西德基—贝文谈判的部分情况而造成的苏丹国内局势，使得总督的声明成为十分必要。……面对着引起很大一部分苏丹人民激动的这种单方面的解释，苏丹政府继续保持沉默，势将造成严重的不安，如果不是更坏的话。……英国政府现正全力以赴地创造条件，以便一旦时机成熟，即由苏丹人选择他们的未来前途；如果他们有这样愿望的话，他们可以自由选择，他们选择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很明显，这只是他们得以选择的前途之一。比如说，他们也可以选择与埃及联合。

但是要任何英国政府默认同埃及订立的一项条约的某一种解释，那显然

---

见上文，原著第124页和注（即本书第212页注——译者）。

贝文在1947年1月27日的发言，下院辩论，第5辑，第432卷，第617—618栏。然而，当所传西德基的这一承认被苏丹总督泄露了出来时，他在1945年12月8日发表了一个公报，否认他在伦敦已同意承认苏丹有权最后脱离埃及国王的统治。紧接着就发生了他辞职的事；见下文，原著第128页。

“缔约双方保证在苏丹执行的政策是：在共同的埃及国王统治下，苏丹和埃及实行联合的体制内，将以下列各项为其主要目标：保证为苏丹人民谋福利，保证他们的利益的发展，他们为自治而进行的积极准备，以及随之而来的行使权力选择苏丹未来的地位。在缔约双方同苏丹人协商之后能完全一致地实现最后一项目标以前，1890年的协定仍继续有效。”（敕令第7179号，第4页）

“……具有不可混合的、不可改变的、不可分割的和不可分离的两重性格；这两重性格之间的差异并不由于它们的联合而消失，而是其各自的特征在（三位一体中的）一位和一性中联合在一起。”

《观察家报》外交记者报道，1946年10月27日。前面引用过的《圆桌》季刊的文章（1951年3月，第115页）对西德基作了如下的评语：“一个年迈多病、精疲力尽的老人，……当他在深夜里从飞机上蹒跚地走下来时，……作了一个不谨慎的和可能是报道错了的声明。作者本人深信，如果在所说的西德基帕夏的声明还没有正式引起人们的注意之前，就要求他加以更正，他是可能照办的，那就什么事也不会有了。”西德基的自传并未提到这一点。

是办不到的……这种解释否定了自由民族的一项基本权利——一种埃及自己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要求的权利。因此，西德基发表了一个公报，否认他在伦敦曾同意承认苏丹有脱离埃及国王统治的权利；并在12月9日辞了职，表面上是为了接受医生的劝告。

其实，他为调和埃及和英国的论点所做的工作，绝不比任何埃及人所能做的为少；但是，英国和埃及在撤军、共同防御和苏丹这三大问题上的欲望的冲突，已经使他不好办了。对于一个自治的苏丹的前景，埃及的基本忧虑<sup>129</sup>是：这将使苏丹处于一种能够限制埃及分享极其重要的尼罗河水的地位；但在这个阶段埃及报纸很少公开发表这种观点。更多的表演则是不可置信地借助于历史和假人类学来为之辩护。于是，在1947年3月，一家政府机关报《政治报》宣称：尼罗河流域的人民全都是哈米特族。至于语言，尽人皆知，苏丹人操阿拉伯语。他们中那些不懂这种语言的人讲一种原始方言，它甚至不能算作是人类语言中的一种形式。等到他们受过教育，他们就懂得了阿拉伯语。……苏丹人知道伊斯兰教以外的另一种宗教，这只是从受到帝国主义者庇护的基督教传教士入境以后才开始的。……一位《金字塔报》记者也大胆地断言：“非阿拉伯部族也是起源于埃及人。事实上，他们是古代埃及人的后裔，这是埃及学家已经有了定论的。在苏丹人中间确实有一些非穆斯林，但这些非穆斯林大部分是偶像崇拜者，他们所崇拜的就是他们的祖先，即古代埃及人，这一点也是同样确实的。”

努克拉希组成了一个萨德党和自由党的新政府。他的一心想维护埃及民族利益的主张，没有因为更广泛地注意到战后世界的一般问题而有所缓和；在这一点上西德基就和他不一样。1946年12月16日，努克拉希在议会中宣布。为了确认在埃及国王统治下的埃及和苏丹的永久联合，我们只是表达了居住在这个流域的居民的全体一致的意志和愿望。……当我说在埃及国王统治下的埃及和苏丹的联合是一种永久的联合时，我希望全世界将理解我是在表达所有的埃及人和所有的苏丹人的意见。……因此，猜测我们想把苏丹殖民地化，那是毫无根据的，正如想统治的欲望不可能存在于兄弟之间一样。苏丹政府决定任命一位苏丹人为苏丹大卡迪，以代替那位任期将满的埃及人，这在埃及引起了进一步的愤慨。埃及人坚决主张这个职务应由埃及国王根据爱资哈尔的130乌拉马的推荐来任命。1947年1月上半月，努克拉希和英国大使之间关于苏丹问题的谈判，没有任何进展，用贝文的话来说是，没有取得性质上属于双方一致同意的解释的任何协议，不管它是采取交换信件的形式，或是由双方发言人作出一致同意的声明，或者甚至是在已经一致同意的声明中，对于双方之间的分歧，老老实实他说希望能够以后再予以解决……我已经提出过各种保证来维护埃及在苏丹的利益——因为没有一个人能比英王陛下政府更清楚地了解，例如，埃及在尼罗河河水方面的利益是多么的重要——我已经建议过签署互助条约和关于撤退的议定书……并由我们、埃及人和苏丹人在会议上重新讨论苏丹问题。对所有这些建议，我所收

---

下院辩论，第5辑，第428卷，第295—296栏。

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260页。从一开始亲埃及的各党派就抵制它。

迈基·阿巴斯：《苏丹问题》，第118页，第134页。但是据在开罗的某些迫切希望英埃问题早日解决的英国方面看来，苏丹政府的态度这样大惊小怪是不必要的。

《泰晤士报》社论，1946年11月29日。

到的不是断然的拒绝，就是要我重新参加谈判那个论点，即苏丹人的自治权利必须以埃及和苏丹的永久联合作为先决条件。1月26日，努克拉希证实了早些时候的报道消息，即他的政府将把全部埃及与苏丹问题提交联合国。第二天，贝文在下院作了关于谈判情况的说明之后又说，英国政府将坚持1936年的条约（指在运河区保持他们的军队），直到他们能够同“一个更加有充分代表性的埃及政府”打交道，同这样的政府打交道，谈判就可以“避免受埃及党派政治的支配”。

### 第三节 埃及向安全理事会的呼吁，1947年

努克拉希政府花了2月份整个月的时间，试图扩大支持它的群众基础，并决定是否把埃及的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联合国大会或国际法庭。西德基公开地而其他则私下地敦促同英国恢复直接谈判。2月24日，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曾表示愿意充当调停人一事也证实了。3月2日，埃及政府宣布辞退英国军事代表团，它的工作在年底之前结束；次日，又宣布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呼吁的决定。在关于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府试图进一步进行调停的一片谣言声中，英国军队从三角洲至运河区的撤退工作于3月31日完成。在莫斯科外长会议期间，事后有报道<sup>131</sup>说，斯大林和贝文曾于24日回顾1942年英苏同盟时讨论了中东方面的问题，其中也包括埃及对英国的控诉。根据英国政府发言人的说法，斯大林当时看来是“一般地赞赏英国在中东和埃及的那种立场的”，并向贝文保证俄国在英埃争端中将保持中立。后来塔斯社否认这个说法，但承认英埃关系只涉及这两个国家，而“苏联遵循它一贯的不干涉政策，无意对这事加以干涉”。

5月16日，贝文声明，“不会有以牺牲苏丹人民的办法来取悦于埃及政府的事……无论他们是把这件事提交安全理事会或者是其他方面，我们都不能就我们已经提出来的方案再作让步”。这一声明终于使埃及放弃了要英国作出某些新的让步的那种希望。但是，党派间的纠纷、埃及驻外使节的不安，以及对于每个月轮到谁来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问题上的考虑等——这一切使埃及的控诉一直拖到7月11日才终于提出。该控诉声称，勉强埃及同意英国军队留驻在埃及领土之上事“触犯了埃及的尊严，妨碍了埃及的正常发展，也违反了主权国家平等的基本原则，……从而与联合国宪章的文字和精神，以及与1946年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的决议都是背道而驰的”。

---

参阅西德基：《回忆录》，第126页。

《纽约时报》驻开罗记者报道，1946年11月29日。

引自努克拉希1947年8月11日在安全理事会上的发言（《正式记录》，第2年，第73号，第1871页）。

《每日电讯报》，1946年12月9日。苏丹政府后来没有理睬埃及人的一项要求：即公布12月22日总督在乌拜伊德发表的演说的正式文本。乌拜伊德是拥护苏丹独立的中心地区之一。开罗报纸上发表的那篇演说的译文（苏丹政府曾批评它不正确），把总督的讲话说成是：他对于贝文—西德基议定书所承认的“名义上的和象征性的”埃及对苏丹的主权，表达了他个人的厌恶；而且还说总督讲：“苏丹政府将积极地谋求一项政策，即在苏丹准备好了的时候就允许它变成独立国家”，并且在此期间将不允许增加驻在苏丹的埃及官员和宣传机构。

《泰晤士报》，1946年12月10日。

它又说，英国政府对埃及“擅自”实行军事占领一事，使英国能自 1899 年以来迫使埃及与其合伙共同管理苏丹，而在以后又大权独揽。<sup>32</sup> 利用此种形势，英国又制定了一项把苏丹从埃及割裂出来的政策，诋毁埃及和埃及人的信誉，在埃及人之间以及在埃及人和苏丹人之间制造不和，并在苏丹人内部制造纠纷，煽动和怂恿人为的分裂运动。通过此项政策，联合王国政府过去竭力，现在仍然竭力损害尼罗河流域的团结，而置该流域人民的这种共同利益和愿望于不顾。

8 月 5 日，努克拉希对安全理事会呼吁的开场白是很动听的，但是当他谈到具体细节时，理由就不够充分了。在用埃及人的观点对安全理事会迅速地概述了 1882 年以来的英埃关系之后，他接下去就论证说：没有一个人能严肃地主张 1936 年条约所体现的对埃及主权的种种限制在战后还应当继续下去。战争就是这些限制存在下去的暗含的条件，而现在 1936 年条约早已完成了它的使命……今天埃及同联合王国的关系不可能再依据 1936 年条约的规定来办事了。它必须服从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

在这个尊严的讲坛上，我将不就 1936 年条约的法律地位进行辩论，但是我们的国家毫不犹豫地信赖联合国宪章。随后他又对安全理事会回顾了 1821 年穆罕默德·阿里征服苏丹后的历史情况：埃及的统治开辟了苏丹走向现代文明的道路。秩序和繁荣代替了过去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这就是联合王国贪婪地觊觎尼罗河流域时的图景！……一个自称为马赫迪的部落头头所领导的宗教叛乱，为英国提供了它所需要的那种机会。……当有力的行动可以把这场正在萌芽的叛乱镇压下去的时候，联合王国却用了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手段阻止了这种行动。它强迫解散在埃及的埃及军队，销毁其军火，并且把在苏丹的埃及人全部撤出。

在谈到在苏丹的英国人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歧视埃及并使这个国家保持着“落后和分裂”的状况之后，他控诉说：133 最近几年，恶意的宣传把尼罗河流域的统一说成是一个“埃及帝国主义”的概念——好象我们渴望同我们的同胞团聚一堂、好象我们想保持自然和历史把苏丹和埃及其他部分联结成

---

西德基在他的自传中断言：贝文—西德基计划完全能满足埃及关于撤走英国军队和对苏丹享有主权的要求。他把他的失败归咎于在埃及党派政治斗争中他的敌手搞的阴谋，归咎于苏联企图阻止达成任何协定，也归咎于英国保守党、英国外交部的某些官员和苏丹政府反对达成一个妥协的解决方案（《回忆录》，第 126 页，第 131 页）。

据《埃及金融时报》的报道，1947 年 3 月 13 日和 14 日。然而，大名鼎鼎的权威 C.G.塞利格曼（C.G.Seligman）教授曾写道：“编年史方面的因素使我们无法相信（南）苏丹的神圣帝王们是直接由于埃及的影响而产生的：我们倒是必须把他们看作古老的广为流传的哈米特族的信仰的实例，尽管通过，[古代]埃及人的影响，有一些特殊的埃及人的仪式，已经同神圣帝王联系在一起了。”[《埃及与黑非洲：对神圣帝王的一项研究》（EgyptandNegroAfrica,aStudyinDivineKingship），伦敦，劳特利奇，1934 年版，第 60 页]

一家开罗期刊讲得这样过分，竟认为在苏丹存在着一个反对同埃及联合的反对派；它简单地把这个反对派说成是包括“阿卜德·拉赫曼·马赫迪爵士的较少的家族成员、大部分是在西部各省的马赫迪主义的支持者和一群希望得到物质利益的机会主义者”。而支持联合的人则包括“反对反动的帝国主义的各个开明阶层人士和大批追随赛德·阿里·米格哈尼的宗教信徒”（引自《泰晤士报》驻苏丹特派记者的报道，1947 年 1 月 24 日）。

1947 年 1 月 27 日，下院辩论，第 5 辑，第 432 卷，第 619—620 栏。

为同一的实体的那种纽带也是帝国主义的了。

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代表英国发言。他指出，1936年条约在其1956年期满之前，只有经过双方同意才能法律上加以修改。埃及的论据说，由于轴心国对和平的威胁已不存在，签订条约时的那种环境也就有了变化，从而应当适用事过境迁原则，可是这原则在任何国际法庭中都是不会得到支持的。关于把英国军队驻在埃及说成是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那种提法，正是埃及所引用的1946年12月14日决议的文句，把“条约中自愿和公开表述的”同意一方军队驻在另一方领土之上一事作为例外情况，“……与宪章并不抵触”。他引用了一系列的话，证明1936年条约在埃及几乎是受到一致欢迎的；条约神圣也是国际法的一项首要原则。他的政府以“最同情的态度”来看待埃及修改该条约的要求，并提出在合理的条件下从埃及撤出英国军队。贝文—西德基协定没有生效，“只是由于一个原因，即埃及不准备将来给予苏丹人民以自决权利，亦即埃及为其他地方的阿拉伯人所力争的那种权利”。

8月11日，当安全理事会继续就这个问题开会时，努克拉希首先被邀发言。他把卡多根5日的发言说成是“为十九世纪帝国主义而作的一份肆无忌惮的辩护词”。卡多根则在答复中再一次宣称，英国之所以抓住1936年条约不放，只是因为埃及借口苏丹议定书问题否决了贝文—西德基草案的缘故。[他说]努克拉希帕夏回答说，安全理事会决不应受到“双方法律上种种权利问题的阻挠”。“不管条约不条约”，安全理事会应该一律照章办事。一旦缔约的一方说它对所承担的义务不满，以致宁肯使其人民制造对和平的威胁而不肯再继续承担这些义务时，安全理事会就应该把条约所规定的种种权利问题丢在一边。那些蓄意要达到他们的愿望的埃及政治家们，一直不断地煽起反对这个条约的情绪。如果存在着任何对和平的威胁的话，正在制造对和平威胁的，正是这些埃及政治家。134这时，讨论已进入一般性辩论的阶段。波兰代表发表意见说，安全理事会不应该由于本问题的法律规定方面而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一个“就其宗旨来说已经过了时，而就其目的来说已经实现了”的条约，对一个成员国的“正当的民族愿望”和主权是起了障碍的作用的。在关于英国军队“立即、完全和无条件”地从埃及和苏丹撤出一事上，波兰将支持埃及的要求，不过目前尚提不出有关“自治政府和自由政治机构的发展”问题的解决方案，但后者则应是联合国在苏丹问题上的首要目标。俄国代表葛罗米柯发表了同样的意见。8月20日，巴西代表提出一项决议草案，建议双方“恢复直接谈判，如果谈判失败，则就双方自行选定的其他和平方式以达成一项解决争端的方案”。中国（国民党人）代表建议在该决议草案序文中增加一段，说明英国已部分地从埃及撤出了它的军队，并且准备

---

1947年5月2日《埃及金融市场报》所报道的《金字塔报》上的消息；《纽约时报》，1947年5月8日；《苏联新闻》，1947年5月15日。埃及报纸报道：莫洛托夫最近告诉在莫斯科的埃及大臣说，他的政府准备在联合国中在苏丹问题上支持埃及；对此，塔斯社早在1月27日就已否认（同上，1947年1月29日）。苏联在这个时候的政策仍然是想同英国和解，作为把英国从美国那边拉出来的一种手段。关于贝文在莫斯科会议结束时所发表的带有几分乐观的那种意见，见《概览，1947—1948年》，第236页。

下院辩论，第5辑，第437卷，第1963栏。

同一年前一样，华夫脱党提出了下列参加出席成功湖会议代表团的条件：即要占代表团的多数、由该党成员担任团长并保证代表团回埃及后举行普选。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拉姆和他的库特拉克同努克拉希也是不能和解的。

谈判全部撤出的问题；他还补充说：“我不能理解本安全理事会怎么能够成为安排剥夺苏丹人民这种自决权的集会，而这种自决权正是联合国宪章的基础。”美国、法国和比利时的代表支持巴西的建议，该建议认为卡多根所提出的那一项要求，可以把1936年条约的效力问题提交国际法庭来裁决。

但是，努克拉希把巴西的提案看作是“逃避”安全理事会“主要责任”的遁词而加以拒绝：对于英国根据1882年“侵略”的那种“原始罪恶”所提出来的主张，埃及都不予以任何特殊考虑。他同样也拒绝了澳大利亚所提出的，在影响苏丹人前途的情况下应与苏丹人进行协商的部项修正案：努克拉希坚持说，埃及政府“将通过协商办法来解决苏丹前途问题，但不是同英国协商，不是同那些被英国的占领束缚住手脚的苏丹人协商，而是同那些能够按照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事的苏丹人协商。在这件事上，联合王国是没有份的，而且我们也不准备同它谈”。他冠冕堂皇地说了一大套：“我们将不背弃苏丹人。我们将不惜一切来保护他们不受一个外来的、陌生的帝国主义者的侵犯，使他们不致陷入到被奴役人民的洪流中无法自拔……我们更不会拿苏丹人民的前途作交易。”他的这些话丝毫不曾消除安全理事会所得到的那种不良印象——即（正如卡多根所强调那样）“苏丹自决的全权……显然埃及政府是不承认的”。法国同埃及的关系近来也变得紧张起来了。这是由于埃及未经法国许可就派135一艘辅助舰带着谷物去救济突尼斯的灾荒，以及由于埃及让摩洛哥人穆罕默德·阿卜德·克里姆（阿卜德·克里姆）到埃及来避难——他是在被流放二十多年后从被押往法国去的船上逃到埃及国土上的。因此，法国代表也相应地把努克拉希废弃1936年条约一事同战前纳粹废弃条约各事相提并论：“每次希特勒发动侵略总要先发表一项声明，宣称几年前或几月前签订的条约……现在是毫无用处了，是个时代的错误，是与历史发展趋势相抵触的。”对此，努克拉希则回答说：“没有任何法律文件能够拉住历史的潮流。在短短的十一年中，1936年条约早已失去它的生命力。事实已经剥夺了它的任何有效的发言权。今天它正象一个幽灵，踽踽而行：它只是作为过去海盗时期的一个遗迹而存留下来，但这却是这个世界正在试图忘掉的东西。”

当巴西提案提交表决时，出乎意外地以一票之差没有获得必要的七票：波兰投票反对，哥伦比亚的代表认为巴西提案太宽和太笼统，宣布打算在表决后提出一项新的建议，终于加入了那些弃权国家的行列（苏联、联合王国和叙利亚）。但是对于哥伦比亚准备提出的这项新建议只有五个支持者。澳大利亚的修正案，表示相信恢复谈判在早日撤军“以及解决其他争端方面”将能取得成果，也只有四个支持者。支持中国的决议案的则不过两票，而且该决议案还受到卡多根的反，因为看来它把撤军问题摆在其他问题之上了。由于再没有其他建议提出来，安全理事会遂于9月10日休会，仍旧把埃

---

这项决议建议有关各会员国，“在不抵触宪章和国际协议的条约或协定中如无对方自愿布公开的同意的情况下，另一方应撤退其驻在前者领土之上的军队，不得拖延”[《联合国大会第一届会议的第二阶段期间通过的决议》(Resolution adop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during the second part of the first session),第41号(1)]。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2年，第59号，第1343—1345页。

“在英埃关系的这种历史背景之下，这一类的同盟只不过是隶属关系的另一种形式。它掩盖了一种既不势均力敌又毫无尊严可言的关系。它使埃及依赖英国的经济；它使埃及屈从于英国反复无常的外交；它把埃及囚禁在英帝国淫威所及的范围之内”（同上书，第1756页）。



及问题留在议程上没有解决。

埃及政府的基本主张是：只有在符合事过境迁原则的条件下，它在一个协定上的签字才有约束力。但它的这项主张遭到拒绝这件事，对于埃及公众来说，犹如当头一棒，而且有些地方的反应也越出了常轨。开罗的巴西公使馆收到“埃及恐怖分子协会”的一封信，索取五百万英镑作为巴西在安全理事会提出议案的“失礼行为”的赔偿，并且于8月28—29日夜在公使馆外爆炸了两颗小炸弹，但未造成任何损失。中国和比利时的侨民也收到了威胁信，然而苏联却被吹捧成了埃及的朋友。与此同时，《泰晤士报》驻开罗记者1947年11月5日报道说：136一家流通根广的报纸曾说，英国为了给重新占领埃及城市作辩护，未必不想在这里制造反对外国人的种种暴行。另一个刊物……控诉英国有计划地屠杀印度的部落……公布了一些伪造的文件，企图以此损害这里的英国当局的信誉……当上月开罗附近发生霍乱的时候。几家主要的报纸立即把它的起源归之于运河区的英国军营，虽然在那里连一个病例也没有发现。

#### 第四节 英埃购政谈判，1947年

同时，在1947年2月中，英埃代表对于在埃及的英镑结存问题，开始了初步的谈判。这部分结存到埃及银行中的英镑，是在战争期间积累起来的。那时埃及从英国买不到什么货物，大部分英镑用不掉，而另一方面，那时英国驻在埃及和苏丹的军队则需要大量的埃及货币来偿付当地的劳动力、各种劳务和供应品。因此，在战争结束时，埃及结存了“大量英镑。但所有的供应都非常匮乏……虽然消费品的供应还算很快地跟了上来，但生产物资在战后许多年中仍旧短缺”。所以，埃及舆论一致希望把这笔英镑资产（据1946年财政部所作的调查，总数约为四亿五千万埃镑）用货物折算，以资保值。英国政府在1945年1月1日至1947年7月15日期间，向作为英镑区成员国的埃及拨出了价值三千零四十四万埃镑的外汇，因为根据1945年的英美财政协定的条款，所有新增加的英镑结存，都可以自由兑换成其他各国的货币。战后，英国竭力向那些它能够拿到外汇或买到原料的国家出口。在这个过程中，英国怀着一种帝国主义者的偏见，反对向前“殖民地”国家“无报偿地”进行出口——例如在战时积累了大量英镑债务的埃及和印度，特别是后者。英国的论据是，这些债务的数量是由于这些国家的政府在战时纵容了通货膨胀的泛滥而被不切实际地扩大137了，因而就应当把该数量削减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数字。另一方面，英国所指的这些国家的政府则认为，在他们现在真正需要生产和消费物资的时候，不应借口通货膨胀而叫他们吃亏，因为通货之

---

苏丹政府出版的一种叫做《苏丹：前进的记录，1898—1947年》(The Sudan: a Record of Progress, 1898—1947)一书在埃及被禁止出售，因为它描绘的“苏丹图景不同于埃及公众心目中的图景”（《泰晤士报》驻开罗记者报道，1947年8月5日）。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2年，第70号，第1753—1765页。

该原则是说，条约发生效力限于在其签订时的环境条件仍然存在的期间；但通常接受的则是另一项相反的原则，即在其所规定的期间之内条约必须遵守，概括为一个公式，即条约神圣。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2年，第70号，第1767—1784页。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1947年8月13日），第2年，第75号，第1955页。

所以膨胀大部分是由于战时英国需要他们的货币而又无力提供货物两事造成的。反对党领袖温斯顿·丘吉尔为英国提出了一个更为激烈的论点，说是应该对这些国家的英镑资产提出一项“反诉”，因为英国在战争期间是从“侵略和征服的种种恐怖和屈辱”中把这些债权国家救了出来的。他宣称曾经在战时联合政府的同事中间透露过这种想法，但是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当时没有向那些英镑债权日益增加的国家提出这种倒打一耙的要求。事实上，掌握在银行和商业公司手中的这部分资产，比之掌握在各个政府手中的那部分，数量上要大得多。

当正式谈判于1947年6月6日在伦敦开始的时候，按照财政大臣后来在下院的讲法，他本人曾“劝埃及代表提出全部或部分取消这笔战争债务的建议，因为这笔债务是我们为了保卫埃及，用生命和财产的昂贵代价，在进行战争中欠下的”。埃及代表则提出一项反建议：要求英国在四到五年内用黄金担保纸币的发行；让出苏伊士运河公司和在其他埃及企业中的英国股份——象英国最近让出其在阿根廷的资产那样；以及保证英镑不贬值。接着就是激烈地讨价还价。埃及代表团终于推迟他们打算离境的日期，到6月30日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该协议，英国政府“冻结”“二号帐户”中的埃及的大部分英镑结存，规定不能提取，便可用来作为投资和再投资（其总数当时估计为三亿五千六百万英镑），作为对埃及的补偿，英国将以外汇在任何货币地区自由支付一号帐户中的下列款项：

（一）埃及在联合王国银行中已核实的存款，估计约二千二百万英镑；  
（二）1947年下半年英国应偿付的八百万英镑；138（三）一千二百万英镑作为弥补埃及支付手段暂时短缺时的平衡基金；

（四）埃及将来的全部英镑收入。埃及代表团团长宣布，7月15日起薪的英镑收入可以自由兑换时，埃及就不再是英镑区的成员了。在埃及人眼中，这种同英国财政上的联系，在埃及准备要求安全理事会英埃同盟无效的时候，事实上是很讨厌的。埃及人感到，一旦摆脱了英镑区，从美国搞到借款的机会就更大。3月，美国已经根据杜鲁门主义来帮助希腊和土耳其了。但是，从7月15日以来的六个星期内，这种自由兑换造成了英国所持有的黄金和美元严重外流，迫使英国政府停止了埃及和其他持有英镑的国家在一号帐户中的自由兑换，并规定这个户头下的此类结存，只能用于英镑区以及与其他国家的英镑往来方面。对此，埃及政府提起了强烈的抗议，因为事实上埃及在这六个星期期间并不曾把其一号帐户名下多下来的那部分英镑结余兑换

---

即事过境迁原则是否适用这一点。——译者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2年，第86号（1947年8月28日），第2290页，第2292页。

该建议要求双方就下述事项恢复直接谈判：（一）尽可能早日完成从埃及领土撤出英国陆、海、空部队的工作，但为保证战时或受到战争严重威胁时苏伊士运河航行的自由和安全，双方应互相提供援助；（二）结束对苏丹的共管，但应照顾到各族人民的自决原则及其自治的权利。

1951年调查表明，显然有一帮人几年来一直制造假的文件，声称是外国的外交、军事报告和计划，并加以发表，以破坏英埃关系和损害埃及政治家的信誉；见《泰晤士报》驻开罗记者报道，1951年6月9日和11日。

驻巴黎埃及大使馆新闻参赞的一篇文章中曾重复了这种论调；见穆斯塔法·赫夫诺：《苏伊士运河引起的当前问题》（Moustapbael — Hef-naoui：LesProblemescontemporainsposesparleCanaldeSues），巴黎，吉耶莫和德拉莫特印刷厂，1951年版，第93页。

成美元。但是英国政府坚持不变。埃及不得不满足于再在 1948 年 1 月 5 日同英国重新签订一项新的协议。在该协议中，英国作了如下让步。

(一) 让埃及再从一号帐户中兑换六百二十五万英镑的美元外汇；(二) 埃及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银行以黄金提供相当于四百万美元的基金；

(三) 在 1948 年中，从上述未兑换成美元的那部分英镑结余中，拨出二千一百万英镑转入现在已受限制的一号帐户名下；并再拨出一千一百万英镑作平衡基金。

## 第五节 英埃苏丹的宪政发展， 1947—1948 年

人们都记得，1944 年设立的北苏丹咨询会议虽然受到亲埃政党一贯的抵制，却受到独立阵线的欢迎。后者希望通过同现在英国控制下的苏丹政府合作来获得自治。无论如何，它把咨询会议看成了达到其自标的垫脚石。根据它的要求，总督在 1946 年设立了一个苏丹人占大多数的行政会议，来进一步考虑促进宪政的问题，并且在 1947 年 7 月 29 日，即埃及在安全理事会控诉英国之前仅仅一个星期，罗伯特·豪爵士就批准了该会议的下述建议：由代表全国（包括大多不信教和不讲阿拉伯语的南部）的、多数代表是选举产生的立法会议，来代替现在的咨询会议；立法会议委任六个苏丹人为副部长，他们同内政部长、司法部长、财政部长、总司令以及总督提名的两个人员，共同组成十二个成员的总督行政委员会。这个建设及时提交给了英国和埃及政府。英国政府接受了，但埃及政府却于 11 月 25 日提出了如下的反建议：在该行政委员会上应有埃及代表；立即给予全国人民全部选举权，而不是象建议论为的那样：给予有限制的选举权将会更适合于许多地方文盲仍占多数的民众；保留给总督的种种广泛权力应大加缩减，而立法会议的权力应予扩大，但埃及政府则应保留其否决权。1948 年 1 月 9 日《泰晤士报》发表评论说：看来，埃及的这些建议代表了一种企图，那就是出价比英国高，争取把那些热中于抓到一部分当前政治权力的苏丹人拉过来支持埃及，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肯定说这些建议就是出于为了整个国家的最大利益。在南部的部落地区取得代议制的某些经验之前，为他们讲话的人不可能单纯地通过选举制度就遴选得出来，也许最好是由分正的官员加以推荐。即使如此，扩大建议中的立法会议的权力一事也是值得研究商榷的，除非立法会议的成员事实上是整个国家的代表而不仅仅是城市受过教育的阶级的代表。因此，埃及必须说服英国和苏丹双方，使它们相信埃及是真心实意希望苏丹人民负起行政管理责任的。1948 年 1 月，英国政府建议埃及政府任命英埃双方有关宪政实施问题的非官方权威人士，在与苏丹政府专家协商下，以有代表

---

皇家国际事务学会：《英国和埃及，1914—1951 年》（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Great Britain and Egypt, 1914—1951）；《通报》（Information Papers），第 19 号（伦敦，皇家国际事务学会，1952 年版），第 158 页）

1 埃镑=1.025 英镑。

见《金融时报》，1947 年 3 月 20 日。

1945 年 12 月 13 日，下院辩论，第 5 辑，第 417 卷，第 720—721 栏；参阅 1951 年 7 月 20 日，第 491 卷，第 1067—1068 栏。

性的苏丹人士意见作为参考，来研究苏丹政府的建议。但是，埃及报纸则以“子在苏丹建立专政的阴谋”之类的种种标题来对待该建议的发表。埃及内阁并于3月1日一致否决了该建议。3月9日，据报道说，北苏丹咨询会议讨论了有关该立法会议和行政委员会的法令草案后，一致建议苏丹政府应使这项立法尽早生效。

在5月初，埃及政府收到英国政府的新建议（认为满意。5月10日，建立了一个以埃及外交大臣（艾哈迈德·穆罕默德·哈沙巴）和英国大使为首的英埃委员会，来审查苏丹的宪政改革问题。在三个星期内，他们就下列各点达成了协议，

（一）英埃的苏丹委员会监督苏丹人逐步建立自治政府；

（二）英埃委员会监督立法会议的选举；

（三）从在苏丹任职的埃及官员中间提名两个埃及人为行政委员会成员；

（四）在苏丹的埃及部队将领出席行政委员会中有关防务问题的所有会议；

（五）在三年内，继续维持现行的行政制度，但可以延长。6月4日，哈沙巴把该协议草案提交埃及参议院外事委员会，带着有点抱歉的口气说，政府同意他参加这次会谈，只是为了实现苏丹人得以管理其国家的工作中实际上也有份的那种愿望；会谈并没有涉及苏丹的根本问题。但是，外事委员会不接受这个说法，还是一致否决了这个协议草案，理由是任命到行政委员会的两各埃及官员应担任部长职务，而且，在行政委员会中埃及人只占到两个位置，那无论如何也是不够的。

6月14日，英国政府宣布，尽管埃及对此否决，但“他们不再能妨碍总督行使其任意决定权”而颁布这项宪法改革法令。五天后，这个法令就正式颁布了，而与此同时，埃及首相又得到参议院的同意，推迟三周再对外事委员会的报告进行研究。“宪法改革法令作了如下规定：

（一）立法会议由选举出来的六十五名成员，不超过十名的指定的成员，以及一些兼职的成员（即行政委员会的成员和不是立法会议成员的副部长）等共同组成。在六十五名选举出来的成员中，十名将在喀土穆、乌姆杜尔曼和其他城市中直接选出；四十二名将史南部苏丹较落后地区间接选出；十三名将由南部三省的省议会选出。

---

休·多尔顿（Hugh Dalton）1947年7月3日在下院的发言。奥利弗·斯坦利（Oliver Stanley）在反对埃及的要求中支持在野的保守党：“我们认为埃及的要求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下院辩论，第5辑，第439卷，第1518—1521栏）

《金融时报》1947年7月7日报道的埃及财政部副大臣的话。他的大臣在1947年5月7日接见《埃及金融市场报》时，曾主张采取阿根廷的作法。

英国外交部：《联合王国和埃及间的财政协定，伦敦，1947年6月30日》

（Financial Agreement between the U.K. and Egypt, London 30th June, 1947），敕令第7163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7年版）。

4月份，埃及政府曾正式或半正式地向美国乞求八千八百万美元的十五年借款，但无结果（见《埃及金融市场报》，1947年4月17日，5月3日、5日，8日和10日）。

英国外交部：《联合王国和埃及间的财政协定，开罗，1948年1月5日》

（Financial Agreement between the U.K. and Egypt, Cairo, 5th January, 1948），敕令第7305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8年版）。

(二) 立法会议选出的领导人将成为事实上的总理。总督在任命其他苏丹人部长以及人数不超过十二人的苏丹人副部长时,应考虑其意见。

(三) 行政委员会由十二至十八个成员组成,其中苏丹人不少于半数,包括:

(1) 立法会议领导人,以及其他部长和副部长;

(2) 总督所任命的兼职人员不超过内政部长、财政部长、司法部长和总司令等四名;

(3) 总督根据任意决定权所任命的人员最多三名。

(四) 总督仍保留如下一系列的权力:

(1) 任命和罢免部长或副部长;

(2) “为了苏丹的良好的政府……如有必要”得否决行政委员会的决议;

(3) 解散立法会议和指导举行新的选举;

(4) 否决立法会议对议长的遴选;

(5) 行政委员会所制定的法律提案,如立法会议不予通过,则总督得发布法令代替立法;

(6) 规定何者系立法会议不得立法的保留事项,即宪法、共管、对外关系和苏丹国籍等;142(7)规定何者系立法会议(除非行政委员会同意)不得立法的特别事项,即防务、货币以及宗教和少数民族的地位等。一位负责的苏丹人评论这个宪法说:对于苏丹的民族主义来说,不管总督所保留的否决权是多么令人讨厌,它却是1899年共管协定的直接后果,并且这些权力必须在征询了英埃两国政府意见之后才能行使,所以事实上也是受到宪法规定的限制的。1947年11月埃及的反建议,使宪法公布的日期推迟了,但这件事也带来了好处,即立法会议的权限扩大了,并且行政委员会中阶苏丹人员也有了保证——应当是负责的部长,而不是象原建议那样,仅仅是副部长。

埃及报纸现在把苏丹政府企图让苏丹人参加政府的方案严厉地批评为“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苏丹的亲埃政党命令他们的追随者抵制立法会议的选举。但是,对于这次抵制运动将会使选举无法举行的那种乐观推测,《金字塔报》则抱着怀疑的态度。(它说)在这种情况下举行的选举一律无效的那种论点,毫无实际价值。1948年11月15日投票那天,亲埃政党进行捣乱,结果有十个人被打死,一百多人被打伤。在十个直接投票选举的城市选

---

见上文,原著第124页注(即本书第212面注)。

休伯特·赫德尔斯顿爵士由于年龄和长期任职,于1947年3月15日退休,埃及政府接受英国政府提名的罗伯特·豪爵士作为他的继承人。罗伯特·豪在过去两年中是外交部中东事务的首席顾问。

《泰晤士报》(1948年3月4日)把总督保留的权力说成是“从殖民统治转变到自治政府过程中的从所周知的平衡因素”;另一方面,《金字塔报》却发表一篇讽刺性的文章,标题是:“北苏丹、南苏丹和巴赫尔加扎勒的国王,罗伯特·豪一世陛下”。

埃及通知的原文载《现代东方季刊》,1948年第1季度,第13期,第9—11页。

当时,由于亲埃政党(其成员多数属独立阵线)对咨询会议的抵制,据说在咨询会议成员中至少有三个赛德·阿里·米尔加尼的支持者赞成改革[“苏丹生命攸关的一个月”,《非洲世界》

(“AVitalMonthintheSudan”,Africanworld),1948年4月,第25页]。

英国外交这官声明,1948年6月14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52卷,第19—21栏);《泰晤士报》驻开罗记者报道,1948年6月7日。埃及政府曾要求“与英国平分行政委员会的代表名额,以便过渡时期结束时,在共同的埃及国王名义下以及在全尼罗河流域统一的情况下,苏丹人得以完全掌握自己的事务”

区，估计只有百分之十八的选民投了票、多数席位被独立阵线成员占去。但是、投票人数这么少，是由于亲埃政党的抵制呢，还是由于大部分选民政治上普遍的成熟呢，这点还不清楚。这因为，正如欧内斯特·贝文后 143 来所指出的那样，在切 50 年埃及的普选中，“据了解，开罗大约只有百分之十五的选民投了票”。一方面，埃及政府两年后声称，苏丹的最重要的多数宗教教派都是支持“尼罗河流域的统一”的，而且，毕业生大会的选举和城市的选举，事实上也是对它投了赞成票。另方面，英国政府则宣称，“毕业生大会甚至不能代表苏丹知识阶层的多数，而且最近几年来……已经处于一个只代表极小一部分苏丹人民的极端分子集团的控制之下”；都市的选举不是决定性的，因为“联合党在喀土穆是少数，唯有在乌姆杖尔曼一个地方是多数”；这就使英国政府相信：“那些赞成同埃及联合的苏丹人不会超过全国总人口约五分之一的样子”。但是，不能从而得出结论说，其余的五分之四人口在表达他们的希望时就人同此心了，那些目不识丁的乡下人和部族成员，除非受到了外来的影响，多数将落入“民意”测验的专业人员所熟悉的“情况不明”的那一类。

## 第六节 插曲：巴勒斯坦战争及其后果， 1948—1949 年

在安全理事会结束其在埃及对英国的控诉问题上无结果的辩论之前，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在 1947 年 9 月 1 日就已经公布了关于在该地区建立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国家进行分治的建议。在联合国全体大会对这项建议旷日持久的辩论过程中，埃及参议员、前埃及驻华盛顿公使阿明·优素福——一个自称为“曾经诚心诚意为埃及和英国之间的密切谅解常成功地工作过”的人——给《泰晤士报》写了一封信，信中敦促英国政府“规定一个巴勒斯坦政策的总轮廓，说服阿拉伯人使其相信英国仍是他们的朋友”；要求英国军队“立即”从运河区撤出；并提醒英国政府“要懂得至少有百分之九十的苏丹人是赞成埃及和苏丹联合的”。<sup>144</sup> 一直有种传说——特别是从 1952 年 7 月法鲁克国王被废黜以来，盛传国王不顾努克拉希所领导的政府和埃及军队的种种顾虑，强迫埃及投入了对以色列的战争。一旦投入这场战争，合乎逻辑地，埃及就应当一心一意地进行这场战争，就应当同英国政府达成那怕是暂时的和解，而英国政府为了取得阿拉伯交战国的谅解，甚至不惜让英美关系变得紧张起来。然而，由于同英国谈判的破裂，埃及就一直利用阿

---

（原文载《埃及金融市场报》，1948 年 7 月 6 日）。

迈基·阿巴斯：《苏丹问题》，第 137 页。

下院辩论，第 5 辑，第 452 卷，第 19—21 栏。

根据 M·F·A·基恩：《苏丹宪法史话》（M·F·A·Keen: An Account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Sudan），喀土穆，麦科克代尔，1951 年版。

迈基·阿巴斯：《苏丹问题》，第 138—140 页。

《埃及新闻报》（Egyptian Gazette），1948 年 8 月 20 日，引用《工人之声报》（Sawtul-Umma）的话。

然而，无论如何，迈基·阿巴斯（前引书，第 138—139 页），指出双方在态度上还存在着差别：一方面，兄弟党[关于该党，见下文，原著第 143 页注（即本书第 244 页注——译者）]拒绝承认英国在苏丹的现政权所搞出来的任何立法会议，而另一方面，赛德·阿里·米格哈尼的支持者和联合党则宣称，如立法

拉伯联盟作为它反英政策工具（埃及对阿拉伯联盟施加影响，一是通过其秘书长埃及人阿卜德·拉赫曼·阿扎姆，二是仗着它为联盟书记处提供百为四十二的基金）。犹太复国主义者争取独立一事在阿拉伯城市中所激起的战争狂热，使歧视情绪从反对犹太人波及到也反对其他外国人，并且不大加以区别。萨德党人和自由党人所组成的努克拉希联合政府，软弱无能，怕冒触犯民族主义者感情的风险，不敢对英国作出任何明显的缓和姿态。我们看到：1948年5月英埃委员会所达成的关于苏丹问题的协议草案，已被埃及参议院否决，而巴勒斯坦第一次停战协定实施后，英国对阿拉伯国家的军火供应也已停止，所以埃及同英国和解的好处也就不大了。埃及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之间的倾轧过去一直听任其发展下去、严重地干扰了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所进行的战争。这不但是由于阿卜杜拉想建立上个叙利亚国家的野心，而且也是由于埃及为了反对英国的盟友阿卜杜拉，所以对英国的死对头——耶路撒冷的穆夫提有所偏袒。当胜利的以色列人跨进了埃及疆界而英国政府终于采取了行动以制止其进攻的时候，埃及政府（一星期前努克拉希首相为极端分子所谋杀，由于这个政治事件，政府已经陷于混乱之中，这也是真的）宁肯同以色列人谈判停战，也不肯援引英—埃条约要求运河区英国驻军的支持。因为停战可以说是被阿拉伯盟国抛弃的埃及所采取的自由行动，而英国驻军和条约却是埃及还没有取得完全独立的可憎的象征。然而，对以战争的结束，使埃及政府能够现实地处理某些实际问题。公共工程部在埃及和英国科学家的合作下完成了全部尼罗河盆地的测量工作，并于1948年公布了它的报告。在关于下一步灌溉工程的建议中间，占首位的是在乌干达欧文

---

会议的权力加以扩大而选举法又加以修改的话，他们是乐意参加选举的。

转引自《埃及金融市场报》，1948年10月28日。

有人提出探诉说，亲埃政党的官吏煽动了这些骚动，当时包括马克拉姆在内的七个埃及律师愿意在喀土穆为他们承担法律辩护，但为苏丹政府拒绝，理由是苏丹律师协会的成员完全有资格为被告担任辩护。没有许可就试图搭乘飞机进入苏丹的七个律师，这样就被迫在瓦迪哈勒法下飞机，被送回开罗。

英埃称立法会者为毕业生大会。——译者

英国外交部：《英埃关于苏伊士运河防务和关于苏丹问题的会谈，1950年12月—1951年11月》

(Anglo-Egyptian Conversations on the Defence of the Suez Canal and on the Sudan, December 1950—November 1951)，敕令第8419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51年版），第17页，第20—21页。上面提到的“极端分子集团”指兄弟党，名义上由一位苏丹人领导。据说他是由于在公家住房问题上要求优先照顾一事遭到拒绝，才脱离了教师的职业而投身于政治舞台的[穆罕默德·哈桑·海卡尔（Muhammad Hasanain Haikal）在《最后一点钟报》上的文章，转引自《埃及金融市场报》，1951年11月28日]；但是该党实际上是由开罗提供资金和操纵的。按照一个埃及作家说法，它声称代表苏丹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八左右”[拉希德·巴拉维：“埃及和苏丹”，《印度季刊》（Rashid al-Barawi：“Egypt and the Sudan”，India Quarterly），1951年10月，第7卷，第361页]。

见下文，原著第245—246页。

他是《独立的埃及》（Independent Egypt），伦敦，默里，1940年版）一书的作者。

《泰晤士报》，1947年11月21日。

见下文，原著第272—275页。1952年9月，极端民族主义者法西·里德方当上了埃及政府的宣传大臣。据说他曾声称，当埃及和伊拉克在1917—1948年间拒绝同英国缔结新的同盟条约时，《英国外交部为了煽起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曾唆使美国在中东进行干涉”；他还声称，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就是这样毫无准备地被投入巴勒斯坦战争的（爱德华·萨布里埃在《世界报》上的文章，1952年9月16日）。

瀑布（这里往南几英里就是尼罗河的发源地维多利亚湖）建立水坝和水力发电站。1949年5月宣布的埃及和英国政府的协议，估计开始时期工程的费用是分别由埃及出四百五十万英镑和乌干达出七百五十万英镑。这个设想不过是设想不过是更大的计划的一个部分，而该计划的完成则估计需要二十五年。按照该计划，维多利亚湖和阿伯特湖都要变成水库，并且还要绕过水库修建一条横穿苏丹南部苏德沼泽地带的运河，以便使流入尼罗河下游的水量不仅在旱季雨季而且在丰年和歉年都能长期保持平衡。这个时期另一个成就是1949年3月7日埃及政府和苏伊士运河公司所缔结的一项新协定。埃及总督伊斯梅尔，由于面临破产，不得不把他的百分之四十四的股票于1875年出售给英国政府，而破产了的埃及政府，把拖了下来。当1951年7月整个问题又回到财政委员会时，原材料的世界价格上涨，使这项工程的费用从最初估计的一千零五十万埃镑提高到二千四百六十万埃镑；事实上工程完成得很少。它每年的运河公司纯利的百分之十五所有权，于1880年也转让给法另地产信贷银行，这时候，埃及原来在运河上的财政利益已经没有什么了。但是根据1937年8月缔结的一项协定，运河公司让埃及在其董事会的三十二位成员中拥有两个席位，给埃及每年三十万埃镑的运河使用费，以及在运河区接纳埃及人就业——其比例到1958年146的时候应达到百分之三十三。1947年7月的埃及公司法，要求设在埃及的公司以及外国公司在埃及的支店或代理机构，在三年内必须把它们百分之四十的董事名额分配给埃及人，而其雇佣的办事人员和技术人员必须有百分之七十是埃及人，其雇佣的劳工也必须要有百分之九十是埃及人。运河公司则争辩说，由于其国际责任，该公司法不应适用于运河公司。但是，埃及政府坚持其论点。公司不得不考虑到二十年后，即到1968年的时候，运河租赁期满，就要由埃及收回。运河公司因而就同意了下述办法：在董事会中现有的两上法国的出缺席位转到埃及名下，埃及还将拿到下一个英国的出缺席位和今后十五年中再出缺的两个席位，总共占到七个席位；埃及每年所得的运河使用费折合为每年毛利的百分之七，其数额不少于三十五万埃镑；公司雇佣的埃及人的人数比例应逐渐增加，以不妨碍运河上作的有效进行为度；在运河的一个新支流上所雇佣的劳动力的百分之九十五应是埃及人；埃及将从三百吨以下船只免费通行的特权中得到好处。批准这个协定法案在参议院遭到反对党华夫脱党人的攻击，但它还是以六十一票对四十票通过了。

但是，英埃关于保卫埃及这个基本问题却不是那么容易就解决了。埃及政府从其武装力量被以色列打败中吸取的教训是；军费应大大增加，为数将达到下年度一亿九千三百万英镑总预算中的五千二百万英镑。众议院议长（一个知名的萨德党人，因此可以设想是代表政府意见的）宣称，埃及军队证明

---

见下文，原著第292页。

见上文，原著第140—141页。

见下文，原著第275—276页。

见下文，原著第270页，第280—281页，经286页。

1948年12月1日，阿卜杜拉在杰里科召开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会议上宣布自己是“全巴勒斯坦的国王”（见下文，原著第290页），当时，开罗报纸《今日消》（Akhbarul — Yawm）埋怨地说：“好象我们作出这么多的牺牲就是为了要使巴勒斯坦变成一个挂着阿拉伯招牌的英国基地——一个阿拉伯王冠之下的英国殖民地”（转引自《埃及金融市场报》，1948年12月6日）。



他们能够坟朴英国军队撤离埃及后留下的任何真空状态。“由于埃及的提议”，1949年3月访问埃及的大英帝国总参谋长（陆军元帅威廉·斯利姆爵士）和其后也访问了埃及的威廉·斯特朗爵士（外交事务常务次官）都重申了英国主张缔结联防公约的论点。在1949年夏秋两季的专门性讨论中，英国为埃及拟订了一项防空计划，在战争爆发时英国为埃及提供二十个空军中队的力量，以及相应的机场和通讯装备、雷达、一个空中监视团的兵力、高射炮和民间防空设施等。虽然英国设想这个计划应当放在英埃联合的基础之上，但是埃及政府“对其要承担义务一节却撰乏足够的支持”。在专门性的讨论中，埃及政府的发言人坚持其论点，说现在驻在埃及的五个英国战斗机中队在目前和平时期应撤到塞浦路斯、马耳他、昔兰尼加、约旦、伊拉克的英国基地上去，并应由英国装备埃及的空军来代替这部分力量。根据宪法，埃及有必要在1950年1月或1月之前举行普选，所以英国可能希望这次选举会产生（用贝文在1947年的话）“一个更具有充分代表性的埃及政府”；同这样一个政府打交道就可以使谈判“避免成为埃及党争的对象”，不会象华未脱党是在野党时经常出现的情况那样。这次普选的结果是华夫贼党重新执政，这使英埃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坎坷不平的经历将在1951年的《国际事务概览》中加以讨论。

---

见下文，原著第292—293页。

“只有埃及才是完全忠实于阿拉伯联盟的国家……在战场上孤军奋战，肩负着全部的重担，成为国际阴谋和国内矛盾的牺牲者。”[《泰晤士报》驻开罗记者文章，转引自政府报纸《基本报》（al-Assas），1949年1月5日]

在阿斯旺水坝建设一个大型水电站的计划，在1946年已开始动工，打算到1951年完成，但是在以后几年中，由于政治不安定，不可救药地

### 第三章 英国—伊拉克关系

1941年10月，在伊拉克短命的反英起义失败四个月以后，努里·赛义德。伊拉克政治家中间对英伊联盟最热烈的支持者，接任首相。直到1944年6月初他表面上由于健康的原因辞职前，他一直保持着首相这个职位而未中断过（虽然内阁成员有过几次更动）。在这个对伊拉克说来算是特别长的任职期间（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涯，特别从1933年起，是变化多端的），他曾与英国大使基纳汉·康沃利斯爵士保持着密切的合作，这个人作为英国在伊拉克的顾问已有长期的经验。主要的几个问题是：维持重要的补给；试图在战时困难中将通货膨胀控制在过得去的限度内；以及关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当中的部族暴动问题。当时由于伊拉克和英国的安全机关的通力合作、时时警惕的新闻检查以及英国地面武装

部队从1941年起即驻扎在那里，城镇中的政治狂热被控制在谨慎的限度以内。148 继承努里的新政府，最早的行动之一是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1944年9月10日），遵循一年之前埃及华夫脱政府所树立的例子。在这个行动的一个星期以前，一张新的日报——《人民报》——在色格达开始出版。9月15日，该报倡议建立一个政党以便为实现伊拉克民族的目标而工作，[它说]因为，如果不是人民参加民族斗争的话，即使盟国以最好的意图作了宣言和诺言，将依然只是纸面上舱诺言。一个月以后，在庆祝俄国革命的周年时，新闻检查便明显地放松了，《人民报》在一篇五栏的文章中宣布：这个革命已为阿拉伯人创造了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剥削者的若干有力的盟国；如果因为他们的国家弱小，便以为他们必须投靠这一个主人而不投靠另一个主人，这种看法就是错误的了；他们唯一的目标应是把他们自己从所有的主人手下拯救出来；他们并不需要模仿十月革命，而只是要研究这个革命，以便在他们自己的民族斗争中从俄国人民的经验里吸取教益。《联系》月刊赞扬苏联已经放弃了它从沙皇继承下来的在邻国的特权（特别是在波斯），并对在时拉伯人中忘经形成的对苏联的错误看法表示遗憾，（它说），这种看法多半是由于来自英美方面的混淆视听的消息。对于反对政府的众议员们的演说，则给予比过去任何时期都广泛的宣传：例如，马哈茂德拉米兹在1945年1月的一个声明，号召取消任何形式的外国控制，在声明中他提众议院，他是要求修改还有十年有效期的1930年英—伊条约的许多人之一。1945年2

---

贝文1949年5月19日在下院的发言（下院辩论，第5辑、第465卷，第617—621栏）。关于进度报告，见大不列颠中央情报局资料处：《英联邦事务》（C0tornonwealthAffairs），1951年4月13日，第4部分（i），第35—36页。

见H.E.赫斯特：《尼罗河》（H.E.Hurst：TheNile），伦敦，康斯特布尔，1952年版，第281—322页。当时埃及名义上仍属于奥斯曼帝国，实际上埃及国王即奥斯曼帝国的总督。——译者

《埃及政府公报》（Journalofficielegyptien），第73号，1937年8月9日；又见穆斯塔法·赫夫诺：《苏伊士运河引起的当前问题》，第254页。

见赫夫诺，前引书，第257—277页；协定原文，见同上书，第364—336页。

《基本报》报道，转引自《埃及新闻报》，1949年5月30日。这是对经验丰富的伊斯梅尔·西德基一封信的答复。西德基在该信中指出：埃及技术上落后于以色列，埃及应参加大西洋公约，“这些大国的利益是同我们一致的，并能够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愿望”（致《金字塔报》的信，转引自《埃及金融市场报》，1949年5月28日）。

月 10 日,《阿拉伯旗帜报》询问道:“伊拉克在和平会议中的前途如何”:列强正在从事于组织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将来,而伊拉克只希里获得其完整的国家主权,并消除其独立不完整的最后痕迹。

在欧洲战争结束时,具有政治自觉性的少数人的很自然的精神状态,就是这样。在此以后不久,哈姆迪·帕沙首相相对一个英国新闻记者概述了伊拉克政府正在与英国大使馆讨论的四点,其中只有一点需要对条约作实际的修订,而其余几点只不过是一种共同安排的事情。7 月初,伊拉克在开罗的公使馆否认了外面流传的关于修改条约的谈判正在进行之中的种种报道,并评论说,当英国同日本还处于战争状态之中时,这未免为时过早。但是在 7 月 13 日,1939 年起就提任年幼的费萨尔国王的摄政王的阿密尔·阿卜杜拉在伦敦声明,在他现在访问英国期间,他将商讨使这个条约符合战时情势的改变办法;某些条款要作更动,但仍保持盟英伊联盟。摄政王和首相在 12 月的一次谈话中都再度提及——虽然两人讲的重点有所不同——缔结 1930 年条约时的一项关于伊拉克雇用外国专家应给予英国人优先权利的换文。1946 年 1 月 30 日,哈姆迪·帕沙政府辞职,原因是不能满足青年知识分子(受到英国工党在 1945 年普选中获胜的鼓舞)所提出的取消检查制度和安条例以及给予组织政党自由的要求,而这个要求是新从美国回来的摄政王在 1945 年 12 月的一次演说中公开支持过的。在二十五天没有政府以后,一个开明一柴的内阁由政界元老陶菲克·苏瓦伊迪组成,他设立一个委员会以研究修英英—伊条约。4 月 29 日《包括左翼和左翼、大体上是代表青年一代的五个新政党,正式得到承认,并被允许出版报 150 份和小册子以及在全国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但是,苏瓦伊迪政府很快失宠于一些有影响的政治势力,在 5 月 30 日被迫辞职,由巴格达市长阿沙德·乌马里领导的一个政府继承,他公开宣称是一个中立者,将举办宪法规定应在明年举行的普选。然而,当时伊拉克和波斯双方的政治形势变得日益紧张。英美调查委员会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报告于 5 月 1 日发表时,据说这五个伊拉克政党曾呼呈苏联驻伊拉克公使帮助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6 月 28 日,当三千名

---

见英国外交部:《英埃关于苏伊士运河的防务和关于苏丹问题的会谈,1950 年 12 月—1951 年 11 月》,敕令第 34 号,第 3 页;埃及外交部:《埃及王国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之间的会谈记录、备忘录和换文(1950 年 3 月—1951 年 11 月)》(Egypt.MinistryofForeignAffairs:Records of Conversations,Notes—and Papers exchanged between the Royal Egyptian Government and the United Kingdom Government, March 1950—November 1951),第 44—47 页,第 54—55 页。

1947 年 1 月 27 日,下院辩论,第 5 辑,第 432 卷,第 620 栏;见上文,原著第 130 页。

《概览,1939—1946 年:战时中东》,第 56—78 页。

《泰晤士报》,1944 年 6 月 5 日。

哈杜里:《独立的伊拉克》,第 3—9 章。

参阅 A.R.普雷斯特:《初级产品生产国的战时经济》(A.R.Prast: War Economics of Primary Producing Countries),剑桥大学出版社,1948 年版,第 199—200 页。

在其宪政生活的二十年中,伊拉克所经历过的激烈的派系政治斗争,是远远过分的,一如在大多数别的中东国家一样,这已经变成个人之间的倾轧。唯一的一套真正具有特色的政纲,是由受西方改良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进步”的民粹派所提出的;但是这个一度曾经希望成为 1936 年巴克勒·西德基军事独裁的受益者的集团,即使在 1937 年巴克勒被推翻前,也已经被迫从舞台退居幕后(见哈杜里:《独立的伊拉克》,第 104—107 页,第 118—120 页)。

工人和学生在巴格达市游行，重新提出这个要求并且要求英国的军队立即从伊拉克撤退时，发生了延续五个小时之久的骚动。政府的回答是提出警告，然后又暂停违法报纸的出版。7月，巴格达共产党人利用了伊拉克石油公司基尔库克油田的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住房的一次罢工；这次罢工，同显然是由共产党人策动的英伊石油公司阿巴丹大炼油厂的工人总罢工，恰巧是在同一天发生；当警察局向基尔库克工人射击并杀死五个到八个工人时，政府就招致了更大的民愤。当伊拉克政府同意英国政府派遣印度人的装甲兵旅到巴士拉，以保证阿拉伯河在波斯一侧的英国伊朗油田的安全时，群情激昂，达于顶点。9月4日，内务大臣对巴格达的两家左翼报纸《人民报》和《人民之声报》在基尔库克罢工问题上发表了据说是错误的报道一事，提出公诉，并下令禁止苏联刊物《新时代》周刊、《苏维埃周151刊》、伦敦的《工人日报》、共产党人办的《劳工月刊》和具有类似倾向的若干其他刊物入境。

由于乌马里对左翼煽动给予有力的回击，假使即将来临的选举是在乌马里首相的统治下举行的话，那怎样也不可能称这个选举为公正无私的。几乎象巴经成了传统那样，当形势被认为是失去控制的时候，总是努里出来组阁，所以努里（他与土耳其订立的友好条约已于3月29日草签）于1946年11月21日组织了一个新的内阁。他尽力设法使这个内阁具有代表性，在内阁中还包括有经常反对他的团体的成员，其中有国家民主党，虽然后者后来辞职了，因为象在伊拉克这种半部落社会里怎样才能构成自由选举的问题上还有不同的意见。三个小的但是闹哄哄的左翼政党——人民党、民族统一党、民族解放党——抵制了这次选举。虽然塔斯社把这件事宣传为针对伊拉克政治情况

---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苏联政府正在强烈提出要求，催索从沙皇统治沿袭下来的包括整个波斯北部五省的石油开采权（《摄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475页和注）。

一、伊拉克在伦敦的公使馆，以及其它外国驻巴格达的公使馆，要升格为大使馆一级。二、伊拉克在选择外国专家方面具有更多的自由。三、英国同意提高伊拉克军队的水平。四、英国在发展灌溉、农业和运输方面给予援助（理查德·温德姆报道，《世界新闻》，1945年7月1日）。

A·C·塞奇成克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1945年7月7日。

《曼彻斯特卫报》，1945年7月14日。

“伊拉克政府如需要外国官吏服务时，在通常情况下将雇用英国臣民。……但对于那些无合适的英国臣民可资雇用的职位，这将不能限制伊拉克政府雇用非英国臣民的官吏的自由”[英国殖民部：《联合王国和伊拉克之间的联盟条约，巴格达，1930年6月30日，以及双方所交换的照会》（Great Britain, Colonial Office: Treaty of Alliance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Iraq, Baghdad, 30th June 1930, together with Notes exchanged），敕令第3627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30年版），第10页，照会3]：参照克利夫顿·丹尼尔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1945年12月19—20日。

在这个政府执政的最后几天中，这个委员会匆忙地报告说，鉴于联合国组织的成立，英伊同盟是不再需要了，因此，1930年条约应由一个简单的友好条约所代替。假使苏瓦伊迪不知道他的政府即将垮台的话，该委员会是否还会提出这样一个报告，那可能倒是一个疑问了。这个报告的发表是算计好了要使他的继承者陷入困境的。

见哈杜里：《独立的伊拉克》，第217—218页，第265—266页。1941年起义的政治领袖拉希德·阿里·吉拉尼，在1945年6月从欧洲逃到沙特阿拉伯，独立党的民族主义者由此受到鼓舞。据报道，在德国崩溃以后，拉希德·阿里·吉拉尼在一个法国船上伪装为司米，从奥地利旅行到布鲁塞尔、巴黎、马赛，然后从海路到贝鲁特。耶路撒冷的穆夫提，乃是他在政治策划上和其后被放逐在轴心国集中营里的同伙，如今也落在法国当局手中（参阅1945年10月24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14卷，第1987—1988栏和第2005

的一种反映，实际上在几个小党方面这只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行动，因为反正它们连赢得一个席位的希望也是没有的，不管选举是多么的自由。

当选的全体议员中，如同通常一样，大部分是非党人士（这次为全数的百分之四十五）。同时，在1947年1月，警察逮捕了地下的伊拉克共产党、持不同政见的“共产主义者联盟”以及其“同路人”民族解放党的领导成员，并搜获了大量的暴露内情的文件。5月底，努里与土耳其签订的条约草案提交议会批准的时机终于成熟了。草案受到左翼人民党和民族统一党报纸的猛烈攻击，这些报纸宣称伊拉克正在被人将它和一个由“帝国主义”控制的国家束缚在一块，而且把这个条约描绘为英国企图暗中152 损害阿拉伯国家联盟；议会中反对政府的人则谴责这个条约是酝酿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国际计划的一部分，要伊拉克承担支援土耳其，如果土耳其发现它自己与叙利亚、苏联、保加利亚或希腊交战的话。被这些攻击所激怒的政府，对人民党和民族统一党领导人提出刑事诉讼。6月24日，一直在审判1月份所逮捕的共产党人的法庭，判决被告的十个人各十五年徒刑，对三名党派领袖判决死刑（7月14日，改判为终身监禁）。依照1945年英美财政协定规定，所有新获得的英镑得以良由兑换其他通货，而伊拉克作为英镑区域的一个成员，在截至1947年7月15日为止的两年半里，从英国的拨款中，获得了总数约为九百万零七千四百英镑的外汇。关于伊拉克所持有的英镑结余的前途的谈判（这种萨达巴德公约和其他充满致命危险的帝国主义计划的悬崖绝壁之上（《现代东方》，1947年，第107页）。评论家们已经认土耳其—伊条约中，从一个1947年1月11日签订的土耳其—外约旦友好条约和一个4月15日的罗拉克—外约旦联盟条约中，看到恢复，1937年四国签订的萨达巴德公约的企图（马塞尔·科隆贝：“土耳其机中东问题”，《现代东方季刊》，第3—4季度，1947年，第11—12卷，第138—141页；参阅《概览，1936年》，第793—801页和《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489—490页）。埃及从它当时与英国的关系的自我中心的立场出发，宣布说：“英国政客们的目的是要组织一个包括土耳其、伊拉克和外约旦在内的东方集团，……我们已经听到东方集团组织的组成将是针对共产主义和俄国的，……我们必须说英国已经对于阿拉伯国家联盟感到厌倦，现在的目的是分裂阿拉伯国家。它正在用尽办法试图将一些土地归并到土耳其、波斯或阿富汗的领土之内……”[易卜拉欣·阿卜德·卡迪尔·马齐尼（Ibrahim Abdul-Qadir al-Mizzi）在《报道

---

栏；《新苏黎世报》，1945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1945年10月28日）。然而法国当局正式否认对拉希德的行动负有丝毫责任，说他在逃亡期间，未曾穿越法国，也没有证据证实他曾通过贝鲁特，便未曾在法国船上上过避难（《费加罗报》，1945年10月30日）。

他们可能感到，这是过快地放松战时安全措施；而且正在安卡拉和土耳其谈判一个条约的努里，并不理睬巴格达的指示，他和政府意见有分歧（哈杜里：《独立的伊克》，第262页，第266页）。关于与土耳其所订的条约，见下文，原著第151页。

见哈杜里：《独立的伊克》，第267页；《巴勒斯坦邮报》，1946年5月19日；《泰晤士报》，1946年6月29日。

见上文，原著第76页；哈杜里：《独立的伊拉克》，第274—275页，

参阅《人民之声报》（Sawtul-Ahali）编辑兼任中间偏左的国家民主党副主席穆罕默德·哈迪德（Muhammad Hadid）的肯定是片面的抱怨：“伊拉克情况”《新政治家与民族》（“Gonditions in Iraq”，New Statesman and Nation），1946年9月14日，第186—187页。

报》(al-Balagh)上的文章,转引自《埃及新闻报》,1947年6月20日]。

结余,是英国战时支出所造成的后果,估计在六千万英镑和七千五百万英镑之间),已于1947年3月5日由英国财政部驻巴格达的威尔弗雷德·伊迪爵士开始进行,并于6月18日由外交部长穆罕默德·法迪勒·贾马里为首的伊拉克代表团在伦敦继续下去。他的政府急于要获得最大可能数量的自由通货,以便按照一个英国人任主席的水利发展委员会最近所推荐的方针发展农田灌溉。经过153过长期的谈判以后,于8月13日签订了一个协定。按照该协定,英国应立即付出一千一百万至一千二百万可兑换的英镑,并在五年的期间增付一千五百万此种英镑。

《泰晤士报》在《市中心札记》栏中评论道(8月21日)

鉴于我国目前所处的外汇地位,从表面判断起来,这笔开支简直是吉诃德式的慷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无疑是……假使英国不抛出大量的款项的话,伊拉克就会面临一场经济危机。……有许多理由都说明,在伊拉克发生一场危机那可是讨厌的。正如我们看到的,其中理由之一是伊拉克政府正在遭受着反对党所施加的政治压力。另一个理由是修改英—伊条约的谈判终于即将开始,萨利赫·贾卜尔在4月10日曾说过这是他的政策的基础。1941年起驻扎在伊拉克的英国军队,到10月26日已经撤退完毕,只有两个小的空军支队现在还留在哈巴尼亚和舒艾巴基地,因为它们在和平时期的驻扎是由1930年条约所规定的,到了1948年1月6日的时候,通过外交途径所进行的谈判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因此萨利赫·贾卜尔、努里和国防大臣(沙基尔·瓦迪)偕同无党派人士陶菲克·苏瓦伊迪到达伦敦来结束这场谈判,而法迪勒·贾马里从联合国大会回家途中到达伦敦也已有三个星期了。同月10日,当萨利赫·贾卜尔和英国外交大臣草签一个新的条约草案时,代理首相贾马勒·巴班在巴格达发表一个声明,说英国已同意伊拉克的“民族要求”,放弃英国对国有铁路和巴士拉港的部分控制,并交还两个条约基地;对此,“议会制宪阵线”,即民族主义反对派各政党的一个暂时联盟回答说:“新旧条约基本上是相同的,特别是在有关防务事宜、军事指导和训练伊拉克军队方面的英伊合作上——那可是全国反对的。”因为伊拉克的一些政治家

---

《工人日报》(1946年9月5日)抗议这个“对伊拉克民主运动的总攻击,在英国完全知情的情况下一直进行了几个月”。

参阅哈社里,前引书,第267—268页,关于摄政王从英国访问归来时所表示的不同意。

原文载《现代东方季刊》,1947年第3—4季度,第11—12卷,第149—150页;参阅哈社里,前引书,第261—262页。这个条约的动机是在苏联对土耳其和波斯的冷战中互相援助(参阅上文,原著第30页)。9月27日,英国政府已同意放弃他们以前坚持的英国大使应对所有其他列强的代表具有优先地位一事而把伊拉克驻伦敦的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英国外交部:《联合王国和伊拉克关于伊拉克驻伦敦外交使团的地位和联合王国驻巴格达大使的优先地位的换文,巴格达,1946年8月3日》(Exchange of Notes between the U.K. and Iraq Respecting the Status of the Iraqi Diplomatic Mission in London and the Precedence of H.M. Ambassador at Bagdad, Bagdad, 2nd August 1946),敕令策6913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6年版)]。费萨尔国王的异母兄弟埃米尔·载德,成为首任伊拉克大使。

参阅《苏联广播收听报》,1946年12月30日。

这些文件后来印在六卷本的《关于秘密的伊拉克共产党的秘密文件汇编》

(Secret Compilation Regarding these Iraqi Communist Party),巴格达,政府出版社,1950年,阿拉伯文版。

萨利赫·贾卜尔在这次选举后成为首相,努里任参议院议长。一个具有同情心的英国报纸记者曾评论道:

154 在访问英国的海军设施，而贝文又在怀特岛休养，新的条约就在 1 月 15 日在朴次茅斯签订，签字后两个代表团登上英王陛下的“胜利”号军舰，一起进餐以庆祝这次仪式。“胜利”号军舰“是在一次老早以前的保卫自由、反对侵略的战争中就赢得了它的不朽的声誉的”。新的条约建议继续 1930 年条约所建立的英—伊联盟，并重申任何一方都不得采用不符合这个联盟的外交政策。正如在流产了的 1946 年英国—埃及谈判中一样，英国政府谋求使这个联盟显出几分平等的模样，其方法是建议立即成立一个英伊联合防务部来代替英国军事使团。这个联合防务部规定由来自两国政府的同等数目的胜任称职的军事代表人员组成，其职能将包括：

（一）制订符合两国共同战略利益的协商一致的各种方案；

（二）如果遭受战争威胁，立即进行磋商；

（三）双方应协调其措施，以便任何一方的军队均能履行条约所规定的义务；

（四）就训练伊拉克武装部队并供应其装备问题进行磋商；

（五）就联合空军训练演习事宜作出安排。在任何一方面面临战争或战争的威胁时，伊拉克得请英国派遣必要的各种兵种的武装部队进入伊拉克，并须提供一切便利和协助，包括使用伊拉克国内的各项交通路线和工具。英国皇家空军现役部队将继续自由进入哈巴尼亚和舒艾巴两个航空基地，直到和平条约已对一切前敌对国生效而盟国武装部队亦已从这些国家的领土上撤退时为止；此后，伊拉克也可根据当时出现的情况，按照联合防务部的建议，邀请英国皇家空军部队使用这两个基地。英国将提供技术人员、设施和装备，以便使这两个基地，不论战时或平时，都保持必要的作战效能水平。伊拉克将继续从英国臣民中挑选其外国的军事教练，并派遣其人员到英联邦内的机构接受高级军事训练，但如所需要的训练无法在英联邦内取得时，亦不排斥派遣其人员到其他地方。伊拉克部队的武装基本装备，将继续采用英国式样。1930 年条约关于允许英国舰队访问阿拉伯河的条款仍旧保持。条约有效期是二十年，在十五年以后任何一方可以要求修改条约，这种修改是为了准备继续联盟和合作。在附加于条约之后的双方换文中，英国政府承担提供专家或技术上熟练的官员去帮助伊拉克进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庞大计划。在签

---

一些正在猛烈攻击英国“帝国主义”的年青党派的若干领导成员，曾经毕业于英国的大学，他们在那里获得了在社会经济问题上的英国左翼的思想；又见乔恩·金奇：“伊拉克与英国的破裂”《十九世纪以来》月刊（“IraqBreakswithBritain”, NineteenthCenturyandAfter），1943 年 6 月，第 307 页；以及《论坛报》（Tribune），1948 年 4 月 23 日，第 9 页。

哈杜里：《独立的伊拉克》，第 262—263 页；《埃及金融市场报》，1947 年 5 月 29 日和 6 月 5 日。1947 年 4 月 21 日《真理报》曾引用人民党的《祖国报》（al-Watan）的话说：“伊拉克人民不希望承担义务，同反动的土耳其人勾搭在一起，作从属于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的奴隶。……伊拉克人民不希望成为一种英国政策的中心，这个政策的目的是迫使伊拉克人置身于

英国外交部：《大不列颠和伊拉克关于延长有关伊拉克外汇需要的现行协定的换文，巴格达，1947 年 2 月 10—22 日》

（ExchangeofNotesbetweentheU.K.andIraqconcerningtheProlongationofExistingArrangementsregardingIraqForeignExchangeRequirements, Bag-dad, 10th/22ndFebruary, 1947），敕令第 7110 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7 年版）。

伊拉克政府（黑格）水利发展委员会：《关于伊拉克诸河流的控制以及其河水利用的报告》（1940 年）

字仪式中，贝文说，这个条约“是一系列新的条约的开端，它巩固并表达了这个国家和阿拉伯世界的友谊。大不列颠珍视这种友谊，他深信阿拉伯世界也是同样地尊重它的”。萨利赫·贾卜尔则因回答说：他们正在签订一个条约，这个条约表达了他们作为自由来平等的盟国和朋友来生活的共同愿望和决心。条约把他们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置于一个新的坚固结实的基础上。这个条约将帮助他们为国际和平和繁荣而一起工作。然而海外的评论却不是那么有利的。《世界报》（1月17日）评论说：“文字是改动了，精神是原封不动。”《印度教徒报》评论说，除了英国对民族主义情绪作了某些让步以外，新旧条约并无差别，而如果发生战争的话，两国将如过去一样紧密地束缚在一起。我们没有从新条约中看到有什么革新的东西足以使我们意识到它是中东防务系统的典范或基石。伊拉克软弱地位，不仅在防务安排上，而且在外国人继续垄断石油上，都是明显的。一个在联合国保障下发生作用的真正的中东区域何制，只有当阿拉伯国家的经济独立得到保证的时候才能到来。巴格达温和派的报纸，“虽然对联合防务计划并不热心”，可是也指出，鉴于苏联在中东的压力，取得一个大国的援助是必要的，因此应该把它看作一个可能做到的差强人意的办法而接受这个计划。支持政府的报纸迟迟不作评论；但独立党（它被英国观察家们描绘为毫无疑问在为精神上，可能也是在实际上，是1941年起义中达到顶点的拉希德·阿里领导的亲纳粹运动的子孙，现在也被日渐激烈起来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激动起来了），自然而然地出来强烈反对这个条约。反对党自由民主党和国家民主党，则抱怨1947年选156举没有代表人民的真正的意见，也宣布它们将不接受本唇政府所签订的任何条约。共产党依旧在地下继续活动。由于这些力量的煽动，从1月3日起巴格达几乎每天都有抗议谈判的示威。这个条约在16日报上发表以后，各木学的学丰们宣布总罢课三天。20日和21日，警察和六千名左右的骚乱者发年了冲突，骚乱者向英美办公处所掷石或纵火，并且光靠着人多势大，就把警察对他们的最初几次弹压都顶回去了。

---

[ IraqiGovernment , ( Haigh ) Irri-gationDevlopment , Commission :

ReportontheControloftheRiversofIraqandUtilizationoftheirWaters , ( 1949 ) ] ; 参阅“为伊拉克提出的一个计划”(“APlanforIraq”),《泰晤士报》,1947年6月25日。

英国外交部:《联合王国和伊拉克之间的财政协定,伦敦,1947年8月13日》

(FiinancialAgreementbetweentheU.K.andIraq , London , 13thAugust , 1947 ) , 敕令第7201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7年版)。

事实上,就在那一天,国际上英镑的猛跌,迫使英国政府无限期的暂停兑换。与伊拉克的一个补充协定因此就成为必要的了[英国外交部:《联合王国和伊拉克之间为补充1947年8月13日协定而订立的财政协定,巴格达,1947年11月7日》

( FinancialAgreementbetweentheU.K.andIraqSupplementarytotheAgreementof13thAugust1947 , Bagdad , 7thNovember1947 ) , 敕令第7269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7年版) ] 。

《泰晤士报》,1947年4月17日和10月27日。

英国外交部:《联合王国和伊拉克关于伊拉克铁路系统的协定……巴格达,1936年3月31日》

( AgreementbetweentheU.K.andIraqregardingtheRailwaySystemofIraq..Bagdad , March31st1936 ) , 敕令第5282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36年版)。

《曼彻斯特卫报》,1948年1月12日。

《泰晤士报》社论,1948年1月16日。



据报道，有七个警察和四个平民被杀，几百个人受伤。21日晚，摄政王召集未去英国的内阁成员和其他政治领袖开会，其中包括有几名前首相、争议院副院长，众议院议长、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和各政党的代表。一个公报中说：他们已一致决定，在朴次茅斯所签订的英伊条约未能实现国家的愿望，也不是巩固两国友好关系的有益的工具。由于大臣会议未同意批准这个条约，因此摄政王向伊拉克人民许诺，对于凡不确保国家权利和民族愿望的条约均将不予批准。萨利赫·贾卜尔于次日在英国发表了一个声明。在声明中他说：“在我们回到伊拉克的时候，我们将对议会和人民说明新的条约的意图，我们深信人们会发现在这个条约中本国的民族愿望是完全被实现了的，而本国的绝大多数157数的人民是会支持它的。”那天下午，贝文在下院中说道：“巴格达一定有些误解，但是我们相信在伊拉克代表们回去的时候应该能够消除这种误解。”然而，相反，在萨利赫·贾卜尔于26日回到巴格达以后，示威以加倍的忿怒爆发了。据报道，次日约有三十个人在这次与警察的巷战中被杀，三百个人受伤。象过去常常在中东发生的那样，当管家不得不严惩这些不受约束的政治示威的群众的暴行时，政客们却把他们抛弃不顾了：司法大臣、众议院议长和约有三十个众议员都辞职了。27日晚，摄政王宣告萨利赫·贾卜尔内阁辞职，并广播了一个呼吁，要求人们遵守秩序，把这个国家从流血中拯救出来。28日，十万人参加了在示威中被杀的十五名学生的葬礼：政教界领袖走在六英里长的游行队伍前面，棺柩上覆盖着大旗，上有用牺牲者的鲜血写的大字。成千上万的人挥舞着剑、刀和手枪，举着旗帜，上面写着“为自由和独立而牺牲的人们”、“你们牺牲，是为了伊拉克人民得以生存”、“我们要萨利赫·贾卜尔、努里·赛义德和他们的走狗们的脑袋”等口号。示威者重新在城中穿过……赞扬摄政王在“反对叛徒们和帝国主义的奴才们中所表现的智慧”。晚报上的标题写着：“三十年的奴役三天就被摧毁了”，“我们的鲜血洗掉了叛徒萨利赫·贾卜尔的签字”。前首相溜到希拉省，在那里他作为什叶派的一员，获得有势力的部族的支持，而一个“著名的四平八稳”的内阁上了台，以迁就示威者和恢复几分表面秩序作为它的基本任务。对这次使示威者遭受死伤负有责任的警察官员受到了

---

见上文，原著第119—130页。

原文见英国外交部：《联合王国和伊拉克之间的联盟条约，朴次茅斯，1948年1月15日》

(Treaty of Alliance between the U.K. and Iraq, Portsmouth, 15th January, 1948)，敕令第7309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8年版）。

《泰晤士报》，1948年1月16日。

《泰晤士报》驻巴格达记者报道，1948年1月20日；参阅哈杜里，第217页。拉希德·阿里政变失败以后，被重新上台的伊拉克政府拘留过的几百名拉希德·阿里的党羽，已于1946—1947年中释放。“这些被拘留过的人……不但远远没有因为被关过牢监而丢了脸，相反却可能在目前把自己打扮成帝国主义压迫的受害者，从而享有颇为可观的声誉。可以衡量出政府对这种事情的态度方面的转变的，是这样的事实：不仅旧人员官复原职，而且付他们监禁期内的全部薪水，并答应把被拘禁这件事作为他们晋级和领取年金的根据。……他们在政治生活中重新出现的效果是完全可以预计到的。许多人成为高等教育院校的教师。另一些人则在政治、报刊编辑和广播方面重操他们独立的旧业。利用学生的爱国心和工业工人对经济的不满成为他们的主要目标。”[乔治·皮戈特：“伊拉克的后退”（George Pigott：“Iraqi Relapse”），《旁观者》周刊，1948年6月25日，第761页]

见下文，原著第251页以后。

惩罚。而在一个时期中听任示威者对政府施展民族主义的压力而不加干涉。

群众愤怒反对这个条约的缘故之一，是进行谈判的方式。萨利赫·贾卜尔“天生具有强烈保守秘密的气质”，后来他承认，他下过训令，吩咐关于条约的阿拉伯文译本必须要等他从伦敦回来以后才公布，以便使他有机会向议会和全国清楚地提出这个条约。他显然未曾估计到 158 这些条款会被非官方泄露出去，也没有意料到在他任职：将近一年之后他会失去摄政王、军队和都市居民的信任到如此程度。军队反对他干涉奉派到英国去采购军备和运输工具的委员会，而都市居民正遭受着面包匮乏的极端困苦，那是由歉收和富有地主出口小麦两者一起造成的恶果。尽管摄政王在 1947 年 12 月底时已经对国内的一般情势感到惶惶不安，但他对于随着条约公布而来的群众不满的示威则几乎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的。几乎巴格达的每一个政客都参加了这次示威。由于对萨利赫·贾卜尔的恶意，独立党的强硬分子们带头示威，而共产党人的作用则由于去年所受的压制，已大为减弱。在英国方面，大使弗朗西斯·斯通休尔—伯德爵士在阿拉伯世界曾有长期经验，但他已于 7 月因重病被迫离去，因而谈判的事也就不复在他的掌握之中了。

然而，民族主义反对派对拟议中的修改英伊联盟所采取激烈行动，并未如某些新闻记者所预期的那样，使伊拉克永久地后退到一种突然而来的孤立状态。相反，1948 年阿拉伯军队在同以色列战争中的失败，似乎已使巴格达的起作用的决策者感到，回到一种较为稳健的计划是有利的。1949 年 1 月，政界元老努里回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除了 1949 年 12 月到 1950 年 2 月这一短短时期以外，他继续控制伊拉克的政策达三年之久。没有试图重新谈判修改对英联盟的问题；但是尽管反对派的策略是不断干扰，政府还是能对一个水利发展委员会的报告予以研究，并据以采取措施。这个委员会受命成立于 1946 年，由印度工程事务部的一名前官员 F·F·黑格领导，其任务是调查国内抗洪、蓄水、灌溉以及排水等方面的需要。1950 年，陶菲克·苏瓦伊迪政府设立了一个发展委员会，共有六个执行委员，他们的任命有意识地是非政治性的。尽管反对派对雇用非伊拉克人提出批评，位英—埃苏丹政府前财政秘书还是被任命为负责财政经济事务的委员兼秘书长，同时也任命了一位美国灌溉专家，这两人在一个伊拉克人担任的副主席领导下工作，其他三个委员则都是伊拉克人。除了一个估计费用约为八千八百万英镑的长期发展计划以外，黑格委员会还提出了一个估计费用约为二千万英镑的抗洪、

---

国家民主党的发言人宣布，伊拉克和英国缔结的任何条约必须与联合国宪章的精神相一致，即承认订约双方的平等。“英国不得再将伊拉克着作它的势力范围内的一个国家，而一定要承认伊拉克是一个拥有遵循自己自由意志的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的国家”[引文见“伊拉克政治演变略述”

(“Aperueusurl'evolutionpolitiquedelIraq”)，法国内阁会议主席府：《文件摘记与研空》，第 1501 号，1951 年 7 月 7 日，第 11—12 页，注(77)]。

《泰晤士报》驻巴格达记者报道，1948 年 1 月 20 日；共产党的《中东杂志》(1950 年 2 月，第 6—7 页)中的一篇文章后来吹嘘说，“站在这次运动的最前线，作为这次伊拉克起事的参谋本部的一个合作委员会，是由伊拉克共产党倡议组织的，其代表由民族解放党、库尔德民主党、人民党……无党派人士和共产党人所组成。它保证了独立斗争中各种民族力量的团结”；但参阅下文，原著第 158 页。

哈杜里：《独立的伊拉克》，第 270 页。

《纽约时报》驻巴格达记者报道，1948 年 1 月 21—22 日。266@雕 e 问蠢

《泰晤士报》，1948 年 1 月 22 日。

灌溉和发展的计划。通向地中海的巴尼亚斯的新输油管完成的时候，人们期望：由于伊拉克石油公司扩大生产而获得的石油产地使用费收入增加，将能为这个计划提供资金。国际复兴发展银行于1950年6月给予一笔一千二百八十万美元的贷款，以便偿付建设一个大水库所需的外汇开支。大水库修建在底格里斯河中游以西一个叫做瓦迪萨尔萨尔的干旱的溪谷里，以防止洪水和日后进行灌溉为目的。

## 第四章 英国在塞浦路斯的统治

### 第一节 背景，1931—1945 年

塞浦路斯人的起源不明，他们的历史也只是旁人的历史；然而塞浦路斯人的心却都向往着那位从未生养过他们的希腊母亲，向往着那个与他们毫不相干的布猎历史。……从性格和外表上来看，他们和一水之隔的长得颇为结实的安纳托利亚人倒有着更多共同之处。事实也确实如此，当希腊人最初来到塞浦路斯等某些部分开拓殖民地时，他们所遇到的一种当地居民，就很可能属于小亚细亚的种族的。但是，自从拜占庭统治之日起，塞浦路斯人在语言、宗教和文化上都成为和希腊人一模一样了。

在帝国崩溃以后，他们并未试图去抵抗拉丁族人和穆斯林的征服。然而，他们的征服者却从未能同化他们。表面上他们接受了外来人的统治，不过骨子里一种顽强的希腊人意识却依然保存了下来。

塞浦路斯百分之八十的居民的代言人说道，要在政治上和现代希腊国家合并（意诺西斯）的要求，这百分之八十的居民都讲希腊语，并且都隶属于正教会和使徒教会。英国政府根据 1878 年与奥斯曼帝国所达成的协议，占领了塞浦路斯，它一直不愿满足这个合并的要求；这首先是出于英帝国的战略理由，其次是考虑到了总计居民百分之十九的操土耳其语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反对。操希腊语的多数民族在政治上的不满，在 1931 年 10 月的骚动中表现出来了。在这次事件中，总督府曾被烧个精光。以后所颁布的政府法令，取消了塞浦路斯的立法会议，废除了区和市政会议的民选，取缔了所有的俱乐部和社团组织，规定不经官方允许，不得自行悬挂旗帜，还规定除非有当地特派员的批准，不得擅自举行五人以上的集会，对报刊和电影也实施了检查制度。总督兼驻军司令在行政会议的襄助下进行着官僚式的统治。该行政会议有四名官员，还有两名非官方的成员：“一名是穆斯林，另一名是非穆斯林”，也就是希腊人。另外，自从 1933 年起，在岛上就有着由总督所任命的四名官员和十名非官员所组成的咨询会议，根据官方宣告，该会议“并无立法之权，只供政府在立法方面与其他措施方面的咨询！它发挥一种作为沟通手段的作用，凡品格与学识均堪胜任的人士，可以通过它对政府就殖民地诸事务提供正式意见。” 尽管由于岛上降雨量和水的供应时有不足，

---

哈杜里：《独立的伊拉克》，第 272 页。

《曼彻斯特卫报》，1948 年 1 月 29 日。

约旦国王和首相预期中的访问明显地受到民族主义者的抵制，后看所持理由是前看对不列颠太有好感；见金奇：《七根倒了的柱子》，第 89—90 页，并见同一作者的“伊拉克与英国的破裂”，《十九世纪以来》月刊，1948 年 6 月，第 303 页；《论坛报》。1948 年 4 月 16 日，第 9 页。

《苏格兰人报》驻巴格达记者报道，1948 年 2 月 6 日；《泰晤士报》，1948 年 2 月 19 日。

见乔治·皮戈特：“伊拉克的后退”，《旁观者》周刊，1948 年 6 月 25 日，第 761 页。

例如乔恩·金奇：“伊拉克与英国的破裂”，《十九世纪以来》月刊，1948 年 6 月。

见伊拉克政府，（黑格）水利发展委员会：《关于伊拉克诸河流的控制以及其河水利用的报告》（1949 年）。

见国际复兴发展银行：《伊拉克的经济发展》（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Iraq），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52 年版。

农村中尚存在着大量的贫困与负债现象，然而据 1939 年的报告说，该岛“并非是不繁荣的。1929 年，即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之前一年，政府的收入达到七十五万七千英镑，在 1938 年上升为一百零二万英镑；这些年度即使称不上飞跃的经济发展，也可以说是稳步向前迈进的。1937 年底，工会运动开始兴起，其结果是工时有所减少，工资也有所增加。

尽管如此，这些物质上的好处，却一点也没有安抚住塞浦路斯人中占多数的希腊族内那部分政治上有觉悟的人。他们所以感到不满，是由于他们至今仍未得到政治自由。这种政治自由，他们的希腊同胞在希腊自 1829 年以来即已享有；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亦已逐渐为毗邻的中东各国人民所享有，而其中有些国家的人民过去在政治上的成熟程度曾经远远不及塞浦路斯人民。他们的 161 一位代言人认为：自 1931 年起在塞浦路斯建立起来的“英国独裁”，甚至比希腊的最厉害的梅塔克萨斯独裁还要坏几分。他承认，1937 年在伦敦组成的“争取塞浦路斯自治委员会”（伦敦是“唯一的能提出有关塞浦路斯政治问题而无须担心受迫害的地方”），通过它在英国报刊上和议会里宣传这些政治问题，成功地吸引大家来注意英国统治的几个“最令人憎恶的方面”，从而促使“压制有所缓和”。不过，他仍然抱怨说，英国殖民部对该委员会于 1939 年提出的一份表达了两百个塞浦路斯个人和团体的“基本宪法要求的文件以”，竟然“漠然无动于衷”。反对这种观点的，有 1933 年到 1939 年担任过总督一职的里奇蒙·帕尔默爵士，他曾在议院质询中对塞浦路斯要求政治自由并与希腊合并一事的严重性，提出了疑问。

1939 年 7 月 5 日，在下院回答一系列的批评性口头质询时，英国殖民大臣马尔科姆·麦克唐纳也表示了类似的怀疑，他说：最近，在塞浦路斯出现了对宪法改革问题的一些讨论。这种宣传鼓动的一个主要手段，就是在人民群众中散发要求更改宪法的请愿书。搞这种工作的当事人，在征求签名时所采取的方法，并非在所有场合下都是正当的。如据代理总督汇报说，一批人把请愿书放在仰承其鼻息的村民的面前，并且签名也都是用虚假的暗示骗来的。例如有人说，在不久的将来岛民即将被赋以自治政府，而且暗示，一旦自治政府建立起来，那些拒绝签名的人可就要吃苦头了。

我深信大多数的塞浦路斯人民，在现政府的管理下并无不满之处。现政府的政策乃是朝着建立更有代表性的代议制政府的方向努力；不过这一过程不能仓促从事，而且依我看来首先还得逐步增强地方政府的责任。

正如上面所引的那位塞浦路斯作家承认的那样，塞浦路斯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态度最初是冷淡的。

没有一个人能够告诉他们，英国政府的句标免竟是什么。

---

帕特里克·鲍尔弗：《孤零零的国土》（Patrick Balfour: The Orphaned Realm），伦敦，帕西瓦尔·马歇尔，1951 年版，第 25 页，第 207—208 页。

统计数字见英国殖民部：《塞浦路斯 1950 年年度报告》（Annual Report on Cyprus for 1950），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51 年版，第 10 页。

从很早的时候起，塞浦路斯教会便是正教组织的独立成员之一。

见《概览，1931 年》，第 360 页。一位驻塞浦路斯的特派记者认为关于照顾土耳其少数民族的考虑，是“作得过了头了”；后者倾向于提出这样一种“表面看来煞有道理的论点，即由于塞浦路斯的地理位置，希腊血统的塞浦路斯人处在一个土耳其人和穆斯林世界中，才真是道道地地的少数民族”（《泰晤士报》，1952 年 5 月 30 日）。

作为英帝国的一个政治组成部分，他们被宣布为交战国，并被号召作为志愿人员入伍。然而殖民部却没有采取过任何至少可能使塞浦路斯人有所指望的行动，他们指望生活情况可能会得到改善，或被赐予一点点自由。因而，只是在发生一连串严酷的事件以后，塞浦路斯人才对战争采取了明确的态度。

作为一支作战力量，塞浦路斯联队于1940年2月建立——“可是它吸引到的入伍者却寥寥无几”。一直等到意大利参战，特别是意大利于1940年10月对希腊入侵，才使操希腊语的塞浦路斯人感到“这下战争是打到自己头上来了”。据说有六千名塞浦路斯人加入英国武装部队参与了希腊战役。到了1941年10月，约有一万九千人在英国部队中服役，其中五千多名在外国作战。志愿入伍的人们主要是工人和农民。

1942年11月25日，英国殖民大臣宣布，作为恢复代议制政体的第一步，正在采取步骤准备在塞浦路斯进行市政选举。同时，“劳动人民进步党”（通常简称为AKEL）也获得政府的许可开始建党，但没有获准在1942年开会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12月，受政府雇用在首都（尼科西亚）从事国防和其他劳动伪工人，为争取提高

工资，举行了为期十天的罢工。因为，尽管政府提供了可观的补助，力图控制物资供应和物价，同投机活动和黑市进行斗争，但生活费用指数还是上涨到了二百四十六（1939年8月为一百）。另一方面，由于国防工作和大量的军事开支，就业机会是不缺乏的，终于使得农民摆脱了身上的债务负担。牵涉到1942年12月的罢工事件，七个工会人员因威胁一个“工贼”的生命安全而被关进了监狱。

1943年3月21日，一位中产阶级出身的意诺西斯分子，通过市政选举

---

这种建立自治政府的尝试并不那末顺利。B·J·瑟里奇（B.J.Surridge）在他的《塞浦路斯农村生活概观》（Survey of Rural Life in Cyprus, 1930年）中曾指出：“只有百分之十八的农村业主不欠债……农民受看放债人的奴役，被迫以最高的价格从他那里购买种子和家畜，然后再以最低的价格把所有的产品都卖给他”（转引自W·L·伯恩：“塞浦路斯之未来”，《半月评论》（W.L.Burn：“The Future of Cyprus”，Fortnightly Review），1947年6月，第410页）。另外，总督在1926年时还发现，在会议里代表操希腊语的多数族的十二位委员（包括八名律师、一名主教、一名商人和一名农场主）中，便有四人是搞放债的〔费边殖民地局：《战略殖民地和它们的未来》（Fabian Colonial Bureau：Strategie Colonies and their Future），伦敦，费边出版社和高兰兹，1945年版，第32页〕。

无论是对操土耳其语的少数民族，抑或是对政治上不满的“希腊人”都是明显地一律对待，实行检查。阿塔图克葬礼的影片就这样被禁映了（《泰晤士报》，1939年5月3日）。

殖民部：《1938年年度报告：塞浦路斯》，第9—10页。

“当战争爆发之际……经常负债以及放债人的勒索，便是套在农民脖子上的磨石”（塞浦路斯总督查尔斯·伍利爵士的话，根据《泰晤士报》1945年5月22日报道）。

多罗斯·阿拉斯多斯：《塞浦路斯，过去和……未来》（Doros Alastos：Cyprus, Past and... Future），伦敦，塞浦路斯事务委员会，1943年版，第44页，第60—61页。

里奇蒙·帕尔默爵士：“塞浦路斯”（Sir Richmond Palmer：“Cyprus”），《皇家中亚洲学会季刊》，1939年10月，第26卷，第606—607页，第617页。在两篇对塞浦路斯政府带有批评性的文章中（《每日电讯报》，1938年12月29日），阿瑟·默顿（Arthur Merton）写道：“根据我在1931年从事塞浦路斯报业的经验来看，政府下决心控制报纸确实是有道理的。不过各种规章法令应该是容许明智的解释的。对于整个控制制度也有必要进行彻底的改订。”

当选为首都的市长。与此同时，劳动人民进步党的候选人在法马古斯塔和利马索尔等港口也取得了胜利。利马索尔的新市长普卢蒂斯·塞尔瓦斯，以前当过印刷工人，1929年致1934年是在莫斯科度过的，后来又被希腊驱逐出境。紧接着就有人出来抗议生活费用的高涨。同劳动人民进步党有密切联系的工会则进行威胁，要在1943年8月27日举行为期一天的总罢工，但由于官方警告说举行这种罢工便是违法，结果算是取消了。不过，不管怎么样，宣布于10月25日举行的一次全日总罢工却在若干城市地区取得了一些成功；在利马索尔，有两名曾经在过去被判处阴谋妨害治安罪的市政参议员以及另外三个人都被判处监禁，而其他三十人（其中包括塞尔瓦斯），由于未得官方允许就组织游行，违反了1932年的立法，因而被处罚款：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塞浦路斯政府邀请工会为所有的负责处理生活费164用的谘询委员会提供自己的代表。但是，工会以及由劳动人民进步党掌权的利马索尔和法马古斯塔市政机关却都声明，除非政府事先同意采纳这些委员会的结论性意见，否则拒绝进行合作。英国殖民大臣不肯接受这种办法，其理由是：“这样就会明显地同政府对社会所应的责任有所抵触。”这两个市政机构还拒绝对一个控制销售易腐产品的方案予以合作，论据是民选机构理应享有更大的控制权力；而这些产品的生产者支持这个方案的。1944年3月1日，一千八百名政府雇用的、主要在军事工程方面工作的工人和技工们，为要求增加工资而举行罢工，但在官方保证对他们本满的原因进行调查后，就在25日复了工。与此同时，在一家利马索尔的工厂举行罢工时，手榴弹扔到了好几个人家里：在4月初，政府就准备召集一定数量的特别巡警来协助正规警察维持秩序，然而特别巡警中的工会会员们却提出要求，认为特别巡警的人选应平均地来自各个不同的政党。当这些要求遭到拒绝后，便报之以旷工。

---

W.L.伯恩（《半月评论》，1939年7月，第85页）曾经谈到过一种很复杂的“存在于几乎每个塞浦路斯村庄中的由于债务所造成的交织着恐惧和虚伪的网”。另外，也存在着教会的强大的、无孔不入的影响，它的教士们乃是意诺西斯运动的主要动力。

下院辩论，第5辑，第349卷，第1283—1285栏。

阿拉斯多斯：《塞浦路斯，过去和……未来》，第61—62页。

“政府开始意识到塞浦路斯人所遭遇到的困难，这就是，他们一面在实际地参加争取自由的巨大斗争，可是一面还得在政治上承受着专制主义的严酷的束缚。因而政府也就开始改正自己的错误。苏联的参战，[以及]大西洋宪章的颁布，给了进步力量以新的动力”[《塞浦路斯，过去和……未来》，第66—67页；参阅《每日电讯报》，1941年10月21日；L.S.艾默里（L.S. Amery）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的文章，1947年4月6日]。

1942年11月25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85卷，第742—743栏；《工人日报》，1942年11月27日。阿拉斯多斯（前引书，第67页）争辩说，劳动人民进步党起着“类似英国工党的作用……这是一个在农民占优势的国家中进行活动的工党”；但是，根据马丁·埃邦（Martin Ebon）的说法[《今日世界共产主义》（World Communism Today），纽约和多伦多，惠特尔西公司，1948年版，第423—424页]，则AKEL这几个大写字母所代表的名称还在1934年就被塞浦路斯共产党所采用过。该党支持为进行“反法西斯战争”而开展的征兵运动，不过后来据一位英国观察家说，“它的成百名受过高度训练的宣传员和鼓动员……三三两两地”渗透到选定的单位里去了[贝弗利·尼科尔斯（Beverley Nichols）访问塞浦路斯后，在《每日电讯报》上的文章，1946年7月30日]。显然，劳动人民进步党的政治色彩究竟是什么，成了问题的中心，而申于事情本身的性质，想得到关于这个党和岛外共产党组织的联系的准确而有结论性的证据，却是困难的。

同时，中产阶级政党中的意诺西斯分子也并不是保持缄默或无所作为的（例如，他们对1943年3月31日上院辩论过程中所提出来的批评就曾大加谴责）。而当1944年7月21日政府宣布殖民部常务次官科斯莫·帕金森爵士即将访问塞浦路斯时，塞浦路斯独立教会的代理大主教就试图说服民族党（中产阶级的意诺西斯分子们）、农民和有组织的工人，要他们对于准备向帕金森165递交的一份联合备忘录表示同意。帕金森刚到，他就接到了各政治组织打来的种种电报，要求在希腊解放后和它合并，要求立即废除所有“苛刻的”法律和政令，并给予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8月19日，约有七十五个人，其中包括利马索尔市长塞尔瓦斯和工会领导人安德烈亚斯·齐阿尔蒂斯，因分别在拉尔纳卡和尼科西亚未经批准即举行游行示威，而被处以罚款或具结保释。在22日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帕金森告诉希腊文报纸的编辑们说：他并未受权以任何方式讨论塞浦路斯和英帝国分离的问题。于是，劳动人民进步党、工会委员会和店主联合会立即宣布在28日举行总罢工一天，作为“表达人民的民族感情的日子”，并通知帕金森说：“他在塞浦路斯逗留期间，如果废除政府所施行的苛刻的法令的话。他们就愿意会见他。”尽管如此，他还是在9月3日就离开了。没有同劳动人民进步党和工会代表见面。12月，当英国在希腊的驻军为阻止共产党企图暴动而进行干涉时，塞尔瓦斯致电《工人日报》表示抗议，谴责英“帝国主义”的宣言也在尼科西亚贴了出来。以后文禁止了劳动人民进步党所掌权的两个市政机关向希腊救济基金分别捐送五百英镑的行动，因为市政机关法规定市政收入只能专用在市政的开支上，虽然英国当局承认，过去允许市政委员会为慈善事业作过

---

“当地报纸断然认为这不符合实际情况，激烈地予以驳斥。说也奇怪，政府在一个长时间内连对于那些最基本的日用品也不愿意设法控制，更不用说配给了，听而任之的物价涨势在他们干涉以前几乎成了脱缰之马。在某些物资如石油的分配上，就曾经出现过丑闻。”（费边殖民地局：《战略殖民地和它们的未来》，第33页）塞浦路斯政府劳动部《1943年年度报告》（Annual Report for 1943）承认“衣着变得越来越稀少，而且由于游资充斥，物价也暴涨了。……那些为了补充政府提供的物资的不足而在自由市场上购物的人们，被迫支付比战前物价高出七倍甚至更多的钱。……社会上所有阶层的人都不愿局限于有啥有啥。”（第1—2页，第2段和第8段）

1945年5月21日，总督宣称债务调解委员会曾经审查了一万四千名农民所欠的总计这一百三十万英镑的债务。这些债务经债主和负责人友好协商或由委员会下达命令，均加以取消或削减，利息也降到五厘（《泰晤士报》，1945年5月22日）。

这件事曾在成斯特敏斯特国会中提出来过：见下院辩论，1943年2月3日，第5辑，第386卷，第888—889栏；1943年3月3日，第387卷，第536—537栏；上院辩论，1943年3月31日，第5辑，第126卷，第1028栏，第1042栏；阿拉斯多斯：前引书，第69—72页。

“专员和塞尔瓦斯先生相处得很好，并且告诉我说：他根本不是个坏人。……一头乱蓬蓬的灰白头发，一种懒洋洋地冷眼看人的气派，自有其吸引人的地方。讲起政治来带着可爱的自由主义的说理腔，这要么是反映了他的真正的个人信念，要么也可能反映了莫斯科最新指示的策略姿态。”[鲍尔弗：《孤零零的国土》，第189页；参阅L. 马斯兰特·甘德（LMars - landGander）在《每日电讯报》上的文章，1943年10月21日，理查德·卡佩尔（Richard Capell）的文章，同上，1944年4月14日；贝弗利·尼科尔斯，同上，1946年7月30日]

《每日电讯报》，1943年6月27日；《工人日报》，1943年9月2日。



几笔小的捐赠，无意之中也是违反过这个规定的。与此同时，希腊左右两翼的冲突，又使塞浦路斯中产阶级意诺西斯分子和劳动人民进步党之向潜在的矛盾公开化了。1945年3月25日在庆祝希腊独立日时（政府批准了举行集会和游行的所有申请），在莱夫料尼料村，左右两翼政党间爆发了一场争吵。它们中的一个（显然是劳动人民进步党）事先未作过申请，也没有获准，就举行了一次游行。根据一个官方文件的说法：一位塞浦路斯警官，由于害怕在各党派之间发生更严重 166 的冲突，对游行队伍进行了干涉，并曾多次要求解散队伍。然而示威者却没有这样做，于是警官就叫来了两名塞浦路斯巡警，三人一同开了枪，造成的后果是：一个男人和一个男孩被打死，还有十四人受伤。政府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在事件发生和调查委员会第一次开会之间的三天内，对刊登报道和评论都有所限制（因为流传着对伤亡数字大肆夸张的种种说法），虽然当时已加说明，一俟审讯开始，限制就会撤销。然而报纸的编辑们和印刷工人工会和卖报人工会还是一致决定不出版3月28日的报纸，以示抗议。在大不列颠，工党议员们（其中包括未来的殖民大臣阿瑟·克里奇·琼斯）都以激烈的言词批评了这次警察行动。而4月27日的《曼彻斯特卫报》的社论则宣称：“塞浦路斯政府为一个已经绝望地动不动就抱怨英国统治的民族提供了新的火上加油的资料。”

## 第二节 工党政府和立宪主义，1945—1948年

本章引用过的英国费边社的那本研究性著作《战略殖民地和它们的未来》，出版于1945年10月，也差不多是大不列颠经过普选由工党上台执政的时候。因此，英国工人运动的一个喉舌在此期间对塞浦路斯所采取的路线，也就颇有历史意义。

[这本著作的结论这样说]如果低估当前为争取脱离英国而同希腊合并所掀起的骚动，那就非常愚蠢了。塞浦路斯境内的希腊民族主义情绪的力量，乃是当前形势中一个十分现实的因素。这个问题是个感情问题。对一个塞浦路斯人指出，留在帝国内他会得到多大的好处，这种劝说是毫无用处的。他大可以发问说，有什么根据来相信那个历史上有案可稽一向忽视塞浦路斯的英国，将来会变得好一些呢？即使可能在理智上说服了他，一旦他和他的同胞们聚集在一起，理智上的同意就会被感情上的冲动所淹没。

不过，感情固然不能忽视，完全屈服于它却也不一定是最聪明的办法。向骚乱屈服和立即批准自治政府，会加强某种反社会的影响和反动的利益。这也会延缓地方政府的发展，减弱政治责任感，并且最终会损害一般老百姓的真正的社会和经济利益。由于塞浦路斯不能自给自足，它不得不依靠一个大国以取得保护和安全，因此，尽管存在着猜疑，经济恢复和提高生活水平

---

判决监禁一事后被最高法院改判（见英国外交大臣1943年11月3日的发言，下院辩论，第5辑，第393卷，第649—651栏；《工人日报》，1943年12月7日和20日）。

1943年12月1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94卷，第385—386栏；1944年1月26日，同上，第396卷，第676—678栏。

1944年3月20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98卷，第1420—1425栏；《曼彻斯特卫报》，1944年3月14日；《工人日报》，1944年3月18日和19日；《雷诺新闻》，1944年3月26日。

1944年5月3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99卷，第1312—1314栏。

的最大可能性 167 仍是在于和英国的联盟。英国现在已在积极推行经济、政治和教育发展的计划，并且已经认真地在其他领土上奉行一种进步的殖民政策方针。有一个未经证实的报道说，可能是由于美国的劝告，新的英国政府在 9 月份本已“接近于”把塞浦路斯割让给希腊，但是“出于战略上的理由和害怕一个雅典的左翼政府，便改变了他们的主意”。不管怎样，10 月 10 日，殖民大臣乔治·霍尔明确地宣称，工党政府，至少是在目前，不打算批准塞浦路斯和希腊合并的要求，他声称，政府对塞浦路斯的政策是：在把代议制度推行于中央政府机构以前，首先在当地行政机关范围内加以发展。根据这项政策，民选的市议会已在 1943 年恢复起来。另外，准备把通过民选的议会以建立地方行政机构的制度推向农村地区的打算，也已于几个月前公诸于世。我希望，这些地方议会将会证明是成功的，足以导致尽早考虑建立一个由非官方指派的、选举出来的代表所组成的立法议会。正在这个时候，回家度假的塞浦路斯士兵举行了示威，反对延长他们的海外服役期，并且要求及早复员。10 月 8 日，印度部队被派到法马古斯塔中继站营地去把两连不服从命令的塞浦路斯士兵弄上运输舰时，发生了开枪事件，一个塞浦路斯人被打死，两个受了伤。军事调查法庭报告说，伤亡是由达姆弹造成的，而印度部队并不配备有这种子弹，故而推论说子弹来自混杂在聚拢来的人群中的人。尽管如此，正如一份英国报纸所讲的那样，这些判决还是遭到了“那部分怀有偏见的地方报刊”的“驳斥”。去年 7 月 20 日，全塞浦路斯工会委员会的十八个 168 成员被控犯有阴谋妨害治安罪。该委员会（同一百二十二个依法得到承认的工会不一样）并没有正式登记过，虽然据称它是在 1944 年 9 月由代表一万三千五百名工会会员的四百三十五位代表开会产生的，而且政府曾提供便利让它的代表参加 1945 年 2 月在伦敦召开的世界工会会议和 10 月的世界工会联合会的巴黎会议。克里奇·琼斯过去曾经批评过政府对塞浦路斯的政策，而现在他是殖民部常务次官，根据他的说法则是：

有人向塞浦路斯政权揭露，一大批妨害公共秩序和煽动性的书面材料正在秘密地、非法地流传着，而干这些事的人就是在本案中被告有罪的人，这些文件中包含煽动人民从事妨害公共秩序活动的指示。……简单地说，罪名是进行宣传以怂恿人们通过革命来推翻塞浦路斯宪法，通过暴力来推翻塞浦路

---

基里层亚和基蒂翁的主教，由于在引起 1931 年骚乱的宣传鼓动中曾经起过主导作用，均被判处终身流放（《概览，1931 年》，第 382—387 页）。1937 年所制定的法律曾明文规定：塞浦路斯的大主教必须是塞浦路斯人，并须得到总督的认可，而且必须是不曾由于破坏治安而被驱逐出境或被判过罪的。塞浦路斯教会一直坚持说，这些法令是违反宪法的，而且由于这些流放的结果，1938 年以来便存在的大主教辖区会议里，产生了缺额，而目前却没有法定人数的主教们可供补充。结果只得由留下来的唯一主教，佩福斯的莱翁蒂奥斯作为代理大主教来对大主教辖区加以管理（阿瑟·默顿在《每日电讯报》上的文章，1938 年 12 月 29 日；1944 年 2 月 16 日，下院辩论，第 5 辑，第 397 卷，第 161—162 栏；《曼彻斯特卫报》，1943 年 12 月 22 日，1944 年 2 月 22 日）；但见下文，原著第 174—175 页。

1944 年 10 月 4 日，下院辩论，第 5 辑，第 403 卷，第 919—921 栏；根据该材料，帕金森曾答应塞尔瓦斯，在成一项“会见后不举行游行”的谅解基础上举行会见，后来这个谅解被撕毁了。参阅塞浦路斯事务委员会：《为争取塞浦路斯民族复兴而努力》（Committee for Cyprus Affairs: National Rehabilitation for Cyprus），一本小册子，1944 年版。

《工人日报》，1944 年 12 月 9 日；《每日电讯报》，1944 年 12 月 15 日。

路斯现政府以及其他食法政府，而这非法，手段变更当今的法律。尼科西亚巡回法庭于12月17日开审，并于1946年1月21日结束，结果十二名被告被判十八个月的徒刑，其余的被告则被判处一年的徒刑。辩护人声称，起诉一方提出控告的许多宣传材料，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语录，例如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和《列宁主义》”。据报道说，塞浦路斯副检察长在审讯的过程中说，根据塞浦路斯法律，藏有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是犯罪的行为。不过，后来英国自治领国务大臣却解释道：“我们的意图是要告诉大家：象被告那样对马克思主义文献所作的解释以及在他们文件中所进行的那种宣传，是构成犯罪行为的。”在请求准予上诉一举被驳回后，L·J·索利（他是一位律师，后来于1949年因同情共产党而被工党开除）在英国下院提出了该案件的问题。索利把被告被判刑的那些法律看成是“就其性质来说是法西斯的和反工人阶级的”。他说，这些被告也“仅仅是从事社会主义经典著作的宣传而已”。他还说：“很难想象任何一个诚实的、爱国的塞浦路斯人对于使他一生都受苦受难的那个外国政府会不感到仇恨，而且确实也很难想象他不会以他所有的任何手段去推翻那个政府。”一个显然在岛上有过切身经验的169作者谈到这个年代时写道：在任何情况下都惯于把现状当作神圣的东西来看待的政府，作为一个自然而然的反应，它会辩说，把一部自由的宪法颁给塞浦路斯人会比不起作用还要糟糕，因为即使撇开一些细小的理由不谈，塞浦路斯人也会立刻起来破坏这部新宪法。他们这样做也是作为达成与希腊合并那种毫不死心的愿望的一项手段。因此，政府总是要争辩说，哪怕仅仅考虑一下对塞浦路斯人开明一点，也是白白浪费时间，而在维持英国统治的过程中，过一段时间就关押甚至枪毙几个塞浦路斯人，倒还较为实际一些。

在1946年5月26日举行的市政选举中，右翼的“国民阵线”同以劳动人民进步党为核心的左翼“国民合作阵线”彼此争夺甚烈。劳动人民进步党不仅保持住他们在利马索尔和法马古斯塔的阵地、而且在尼科西亚和所有主要城市（仅两个城市除外）都获得胜利。8月，英国政府决定把当时刚从欧洲非法来到巴勒斯坦的大批犹太难民转移到法马古斯塔附近的拘留营去。

---

1945年4月11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09卷，第1832栏。

“在每个城市和村庄，你都会看到在街道和咖啡店的墙壁上都有粉笔写着的意诺西斯字样……并且在这个字的下面经常有E.A.M.三个字母，即希腊共产党组织的简称。”《贝弗利·尼科尔斯在《每日电讯报》上的文章，1946年7月30日）

“关于劳动人民进步党还可以写更多的东西，如它精心制定的间谍制度；它的逐步的飞然而只是持久不懈的通过牧羊人对农村地区的渗透——这些人一般都是那些地区潜在的恶棍和匪徒”（同上）。

1945年4月18日和5月16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10卷，第192—194栏，第2460—2461栏；参阅《工人日报》，1945年3月31日，4月6日。

费边殖民地局：《战略殖民地》，第36页。已经指出，“在当前……希腊的悲剧性的局面使人认为，同希腊联合会解决提高塞浦路斯的生活水平问题的希望，今后多少年内还是很渺茫的。”（同上书，第34—35页）

C·L·苏兹贝格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1946年7月7日。当这位新闻记者早些时候描述包括塞浦路斯希腊联盟在内的美国官方所制定的东南欧计划时，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就曾经说过，苏兹贝格“大概看到了国务院的某些部门的研究性文件，这些文件是密件，而且不是定稿”（同上，1945年1月1日：《泰晤士报》和《每日电讯报》，1945年1月3日）；参阅下文，原著第172—173页。

这就招致劳动人民进步党的成员，法马吉斯塔的市长立即发表了一项声明。声明说，这件事使人们“怀疑有人企图通过外国人涌进国内的办法，来削弱原来占多数的希腊族的地位”。

在官方声明这些难民不得成为塞浦路斯的居民以后，利马索尔的市长仍然要求总督停止把这批难民转送到塞浦路斯来，因为据说难民们的给养将会导致当地供应的短缺和物价的上涨，而这又会使塞浦路斯的舆论更加强硬起来。

1946年夏，非官方的报道说，在埃及即将同英国作出充分的共同防务安排的情况下，所有的英国军队都将从埃及撤出；这样一来，结果就会在塞浦路斯建立起新170的英国陆军和空军基地。也就在这个时候，英国政府企图使政治制度自由化并发展岛上的经济。10月5日，英国政府宣布说，迄今尚在工党政府中担任民用航宏大臣的温斯特勋爵即将出任总督。同月13日，十二位被判较长徒刑的工会领袖受到赦免出狱。同他们一齐获释的还有服刑满期的六位判册较短的同志。他们立即发表演说，重申他们准备为了民族事业继续进行斗争。23日，已就任殖民大臣一职的克里奇·琼斯声称政府已在重新审查政策：

重新审查的目的是在处理岛上内部事务中寻求建立起更开明的、更进步的制度的机会。……我建议请总督查尔斯·伍利爵士召开由岛上各方代表人物所组成的协商会议，由他们去考虑作出宪法改革建议的轮廓，其中包括中央立法机构的重建。……

英王陛下政府还决心大力加速推行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纲领，该纲领业已在最近几年内有了顺利的开端。……一个系统的、详尽的今后十年发展规划……今天正向塞浦路斯公布。这个规划涉及到岛上生活和经济的各个方面——农业和灌溉、森林、医疗和教育事业、港口的扩建、旅游设施的提供等等。

还有两件事，我也可以宣布决定了。第一件是关系到目前塞浦路斯教会的情况的。这个教会的大主教辖区会议无人主持已经多年。毫无疑问，1937年所制定的以控制新的大主教的选举的某些方面为目的的三个地方法令曾经妨碍了这个问题的解决。……英王陛下政府现在决定，应该按照实际上的可能，尽快取代这些法令。

最后，政府认为：现在，允许因参加1931年骚乱而流放出岛的人们重返塞浦路斯的时候已经到来了。171 尽管温斯特勋爵发现新的政策声明很不错，但是他后来声称，他曾经主张要等他到达塞浦路斯就任新总督时，由他亲自向人民提出改革措施之后，再行公布这项声明。

---

下院辩论，第5辑，第414卷，第218栏。

《泰晤士报》，1945年10月9日；《纽约先驱论坛报》，1945年10月10日；1910年10月23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14卷，第1862—1863栏；1945年10月31日，同上，第415卷，第574栏。

1946年3月5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20卷，第304栏。

法庭由三位法官组成，却没有陪审员。岛上的英国行政机构并没有把英国的陪审制度移植到塞浦路斯来。

珀西·阿诺德：“塞浦路斯进退两难的局面”，《当代评论》（Perey Arnold：“The Cyprus dilemma”，Contemporary Review），1946年8月，第80页。

《经济学家》，1946年10月28日，第656页。

见下文；原著第227页注（即本书第389页注——译者）。

另一方面，克里奇·琼斯则坚持说，立即宣布政府的意图还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样才有希望争取开明的舆论、温和的工会人员和农村的支持。由于温斯特勋爵未能在伦敦取得政策方面某些确定的保证，结果他直到 1947 年 3 月才到达塞浦路斯。而克里奇·琼斯的声明一发表，埃思纳克委员会（一个由代理大主教以埃思纳克或“民族领袖”身分主持的非官方意诺西斯组织）就电报给英国政府说：“任何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办法，如果不给予同希腊联合的民族自由，则一律断然愤然予以拒绝”，而这时候各希腊族党派却都在极力主张组成一个统一战线，为意诺西斯继续进行斗争。1931 年以来，《曼彻斯特卫报》一贯批评英国在塞浦路斯的官方政策，可是 1946 年 10 月 26 日的社论却欢迎克里奇·琼斯的声明，称它对多年的“暗淡的立宪时期”说来是一种“姗姗来迟的补偿”。但在其结论中却表示遗憾。认为声明所引起的直接的反应只不过是使意诺西斯的要求再度被提出而已。这家自由党的报纸同意工党政府的意见，认为对这些要求没有让步余地：“在那条道路上摆着僵局和幻灭，因为在不可预见的将来，朝那个方向一步也迈不出去。我们把塞浦路斯从黄昏中唤出来，并不是为了要看着它堕入更深的、更绝望的黑暗之中。”12 月底，一个由代理大主教率领，包括商会主席（体表右翼“国民阵线”）、尼科西亚市长克利里德斯（代表左翼“国民合作阵线”）和一位秘书的国民代表团到达伦敦，提出同希腊合并的问题。他们路经雅典时，公众和整个报界都对他们深表同情。不过英国自由党的同情者却表示怀疑：在希腊内政如此混乱之际同希腊进行合并，究竟是否确实可敢？1947 年 2 月 7 日，代表团向英国殖民大臣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声称该岛和岛上的居民就宗教、

语言、传统和民族意识来说都是“牢固地、不可变地”希腊型的，因而拒绝了大臣在三个月前所宣布过的宪法改革 172 和经济规划；至于土耳其少数民族的权利则会得到充分保障，而且无疑还会同希腊政府作出安排以确保英国在东地中海的防务利益。

就在这时候，一贯指望从同英国的联系来保持自己地位的土耳其少数民族的政党，却给英国政府打电报，抗议埃思纳克委员会和该代表团日用全体塞浦路斯人民的名义讲话。新总督即将到来，土族各组织敦促其成员届时欢迎他，埃思纳克委员会及其各政党则指示希腊族对他加以抵制。2 月 28 日，当希腊议院一致通过决议，要把“塞浦路斯同希腊合并的神圣民族要求”交

---

《纽约时报》，1946 年 8 月 11 日和 9 月 8 日。犹太复国主义者自然竭尽全力来煽起塞浦路斯的反对；参阅巴尼特·利特维诺夫（Barnett Litvinoff）在《犹太复国主义评论》上的文章（1946 年 8 月 16 日，第 1 页）：“除非英国政府担负起粮食供应的全部责任（而在目前则是无论如何得不到保障的），否则人口的突然增加就会严重地影响粮食问题。塞浦路斯很可能变成一座巨大的集中营，充满着与饥饿俱来的秩序混乱。”

见上文，原著第 120 页。

1939 年，在即将退休的总督里奇蒙·帕尔默爵士致词的那次皇家中亚洲学会会议上，温斯特勋爵〔那时他还是一位海军中校兼议员，名叫 R·弗莱彻（R. Flofcher）〕批评了最近的塞浦路斯政策的“某些方面”，他说：“除非塞浦路斯永远处于专制政府的管辖之下，否则总要出现我们究竟在什么时候起步的问题以及沿用旧宪法还是采用有所修改的旧宪法问题。”（《皇家中亚洲学会季刊》，1939 年 10 月，第 96 卷，第 614—615 页）

付希腊和英国政府去进行友好讨论时，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这时候，来自左右两翼的骚动继续在塞浦路斯发生。据传说，全塞浦路斯工会委员会已发出号召在3月9日举行“群众性的动员来反对外国的占领”。于是，21日在华盛顿有人看到一份由国务院秘密递交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的“非正式的背景文件”后走漏了风声，而递交这份文件是为了提倡杜鲁门主义以援助希腊和土耳其。这份文件特别宣称美国政府赞成塞浦路斯同希腊的合并——如果希腊和英国两国政府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话。据报道，来自英国官方的消息说，英国方面对在如此微妙的关头泄露这项消息，表示惊讶和不安。于是国务院就把这一段落以及其他段落都从文件中抽掉了，并且解释说，从初步研究材料中搞出来的这些段落是有错误的，由于国会要求提供情况来不及作充分的修正。

紧接着这件事，1947年3月27日，温斯特勋爵终于前来就任总督。首都的许多希腊族人依然高悬着两天前他仍在庆祝希腊独立日时所升起的希腊国旗，结果只有英国官员和土耳其族的成员去欢迎这位新总督。次日，在埃思纳克委员会的指示下，被邀请出席为欢迎新总督而举行的一个招待会的所有希腊知名人士，除担任政府官员者外，全部没有出席。在这以前，该委员会已向新总督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谈到了一个被奴役的民族为争取自决而斗争。招待会缺席的人有：代理大主教，流放十五年后新近回来的基里尼亚主教，尼科西亚市长克利里德斯，还有四位咨询会议的成员。自然很难期望总督会容忍他的咨询会议的成员如此顺从埃思纳克委员会，两天以后，总督就通知这四位冒犯了他的人说：从此以后不再需要他们任职办事了，而行将开会的咨询会议，尽管曾经邀请

过他们出席，也拒绝他们参加了。在这不祥的开端以后，4月4日总督就向塞浦路斯人民发出号召，要他们注意殖民大臣在1946年12月11日曾重申过的英国历届政府的政策，即塞浦路斯将作为分享英联邦共同力量的一个受到重视和信任的伙伴而继续留在英国主权管辖之下。此项政策依然不变。与此项政策结合在一道的是塞浦路斯的发展方案以及在塞浦路斯内部事务中建立开明、进步的制度，并促进其繁荣的那种意图。……

新的起点的道路是平分清楚的。……为了达到我在你们面前所提出的目

---

《泰晤士报》，1946年10月19日。

从1941年到1946年3月，英国政府为了上述目的曾在殖民地发展和福利法案项下给塞浦路斯提供了总共六十万英镑的赠款，现又拨出了一百七十五万英镑。发展规划总的估计需要六百万英镑，而为全岛供应电灯的另外一个计划估计也要花费三百三十五万英镑，优先执行的计划部分则需约四百万英镑。由于银行存款只有一千一百五十万英镑之多，所以寄希望于增加国库收入和举办地方借款〔塞浦路斯政府：《塞浦路斯十年发展规划》（Cyprus Government: A Ten-year Programme of Development for Cyprus），1946年版，第2页〕。

见上文，原著第164页注（即本书第282页注——译者）。

下院辩论，第5辑，第427卷，书面答复，第396—397栏。

见温斯特勋爵：“塞浦路斯的行政问题”，《联合帝国》（Lord Wins-ter: “Administrative Problems in Cyprus”，United Empire），1949年7—8月，第40卷，第179页，和在《每日电讯报》（1949年4月28日）上的一篇文章。《经济学家》（1946年10月26日，第655页）评论说，克里奇·琼斯的声明在提法上说服力很差，没有抓住塞浦路斯人心目中的要害。

标，让我们从一开始就友好地共同前进吧！

到了这种为时已晚的阶段，要期望意诺西斯分子会作出什么响应是不大可能的。4月26日，塞浦路斯政府的辅政司警告报纸的编辑们说，尽管批评政府的权利，无论那批评是多么尖锐，将得到维护和受到尊重，但是，对于任何利用报刊来进行活动和宣传，其性质系企图引起混乱或颠覆国家机器者，政府决不再不闻不问。某些报纸在报道新闻中表现得“极端不负责任，从狡猾地歪曲真相一直到蓄意造谣，无所不为”，其目的就是要使塞浦路斯政府威信扫地和遭人蔑视。今后哪里发生这样利用报纸的事，他就会毫不迟疑地运用自己的权力取缔这家报纸或勒令暂时停刊。

温斯特勋爵后来写道，当时已经决定，允许在协商会议召开前举行大主教的选举。大主教总是敌视政府的，这是一个事先就可下的结论。所以仿效一个英国指挥官曾允许敌人先开火的那种精神，我们居然同意了在我们按计划行动以前，就把一个强大的对手引进了战场。代理大主教对们的希腊族支持者再三声明，保证拒绝被提名为大主教。4月27日，他辞去他的一切职务，并且宣布他打算退隐到阿托斯山的一个寺院翼去。有报道说，他讲过他本人受到指责，说他不团结人民，反而把人民分裂了；他讲这话时，还神秘地补充了一句：“所有对此感兴趣的人都是大人物，他们是独裁者。大国统治着近东和地中海，它们要将自己的秩序强加于人，而为了民族的利益，我们的民族却需要这些大国。”尽管如此，次日他还是听从了前来补足法定主教人数的君士坦丁堡普世基督教175大主教代表的劝告，撤销了自己的辞呈。

---

《曼彻斯特卫报》驻伦敦记者报道，1947年1月22日。

《泰晤士报》，1947年2月8日。代表团的秘书事后显然毫无根据地声称，克里奇·琼斯曾允许把他们的建议递交给内阁。但后者则告诉下院说，他曾提请他们不要忘了他于1946年12月11日在下院所作的一个作为答复共产党议员皮雷廷质询的声明：政府并不曾考虑对岛上的现状作任何更动（《曼彻斯特卫报》，1917年2月27日；《泰晤士报》，1947年2月28日；1947年3月12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34卷，第1318—1819栏）。

《泰晤士报》，1947年2月17日。一位记者事后说，抵制是劳动人民进步党策动的，因为它“害怕右翼会同英国就自治问题或就将来答应给予某种希腊公民权问题达成协议……有很多迹象说明一部分右翼领导人是反对这样做的；然而，面对左翼的拒不出席，右翼竟然客气地予以接待，这样就会引起人们指责右翼，说它是想去讨好英国或者想搞什么自治。这两种情况都会意味着严重丧失人民的支持。”（《经济学家》，1947年7月26日，第

原文载《希腊公报》，由希腊新闻处发行，伦敦，1947年3月3日。据报道，1941年11月，希腊流亡政府总理曾发表过一个声明，设想了塞浦路斯同希腊战后合并的那种情况。又据说，1944年他的继承者帕潘德里欧在意大利和丘吉尔进行的讨论中，也提出了这一问题〔《每日电讯报》，1941年12月5日；《约克郡邮报》（Yorkshire Post），1944年9月20日〕。史蒂文·朗西曼（Steven Bunciman，1945年到1947年期间，英国驻希腊委贸会的代表）事后说：“在希腊本土，希腊人对他们的塞浦路斯兄弟并不是十分热情的。他们经常告诉别人说，塞浦路斯人是希腊的爱尔兰人。不过每一个希腊人仍然感到有人强使塞浦路斯人和他们分离。对于希腊人来说，塞浦路斯是一块和他们难割难分的统一土地。尽管从整个说来希腊人对英国有好感，因而不至于对这些过分耿耿于怀，但是这种被分开的感觉仍是普遍存在的。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假如希腊政府突然收到塞浦路斯这份礼物的话，那末希腊反倒会觉得非常尴尬了。希腊是一个穷国，处境十分困难，这样一来，该岛就会成为希腊的一个财政和行政上的负担了。”（《联合国》，1949年7—8月，第40卷，第182页）

路透社：“基里尼亚”（Kyrenia），转引自《新苏黎世报》，1947年3月11日。

他现在得到了左翼政党，特别是劳动人民进步党的支持。除某些村庄中所发生的动刀子的殴斗外，5月4日的初选平静地过去了；在这次初选中，他的支持者获得了压倒的胜利。如此产生的选举团在6月20日又按照手续把七十五票中的五十八票投给了他。他再度地拒绝接受当选，然而却又一次在大主教代表的迫切呼吁下让了步。年迈的基里尼亚主教原是右翼的支柱，他看到谚种情形便大喊大叫起来：“我决不拥立你为大主教，我也不会承认你”，但后来他也被说服，不再反对了。这样就使教会选举会议得以宣布说，佩福斯的莱翁蒂奥斯主教已在全体一致的情况下当选为大主教，基里尼亚主教还担任了大主教登位典礼的司礼人。尽管他得到左翼的支持，但他还是立即表明自己当选后的身分，拒绝了莫斯科大主教的邀请。莫斯科大主教这一职位，是苏联政府为了要同君士坦丁堡普世基督教大主教职位分庭抗礼，于1943年重新建立起来的。莫斯科大主教邀请他或他的代表作为塞浦路斯教会的代表出席即将在莫斯科召开的正教教会全体会议。他说，只有

普世基督教大主教才拥有召开这类性质会议的特权。据可靠方面报道说，塞浦路斯政府对于这次选举的结果“并未感到过分的不安”，而在7月9日，总督发表分告，邀请各方面对协商会议的人选进行提名，该协商会议的任务是向总督作出有关采取何种宪法形式的建议。以便保证塞浦路斯人民得以参加岛上内部事务的管理，而同时对于少数民族的利益出予以应有的注意。受到邀请的有：各市政委员会、律师公会、医师联合会、工业主联合会、商会、农场主联合会、中学教师联合会、报界、全塞浦路斯工会、新成立的塞浦路斯工人联合会、土耳其农场主联盟、土耳其工会等机构和社团所提名的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人士。大主教立刻发表声明说，总督的公告是“对塞浦路斯人民怀有敌意的，我们将竭尽一切力量来使它提出的目标无从达到”。跟着发布了一份反击的宣言，刊登在所有的希腊文的报纸上，并且在一切正教教堂的讲坛上加以宣读。在这份宣言中，大主教声称英国送给塞浦路斯人“一把用以宰割他们自己的民族权利的刀子，因为这是要求人民签字画押，担保自身永远受奴役”。他又说，拟议中的那个协商会议的组成，是建筑在“反民主和法西斯的原型上的”，是给民主概念的一个致命打击；人民将团结起来继续为意诺西斯前进行合法的斗争，对总督的公告将充耳不

---

参阅上文，原著第36页。

詹姆斯·赖斯顿（James Reston）在《纽约时报》（1947年3月22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1947年3月24日）上的文章。“在美洲的成百万希腊人也正和欧洲的希腊人或塞浦路斯希腊人自己一样，迫切地想看到塞浦路斯重返社国的怀抱。在种族意识强烈、势力强大的希美协会（A.H.E.P.A.）的领导下，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使这一问题经常盘旋在美国公众的胸海中。”〔托马斯·安森：“塞浦路斯的闹剧”（Thomas Anthem：“The Cyprus Farce”），《现世评论》，1947年6月，第338页〕约在这个时候，英国政界元老L.S.艾默里非正式地访问了该岛。他重提了他当初在担任殖民大臣期间（1924—1929年）曾经研究过的一个建议，但实际上即没有引起什么反应。这建议是：“任何塞浦路斯人，在希腊居领住过最低限度的法定期限后，得以享有希腊公民所有的权利和待遇，而其在希腊以外地方的英国臣民地位则不作放弃论。反过来说，以塞浦路斯为其住所的任何希腊公民，在并不丧失其希腊公民地位的情下，同样地享有一个在塞浦路斯的英国臣民所有的全部权利和待遇——而且在较长时间的定居后，也可能同样在塞浦路斯以外享有英国臣民所有的权利和待遇。”（《星期日泰晤士报》，1947年4月6日）

《泰晤士报》和《每日电讯报》，1947年3月25日。

《泰晤士报》，1947年4月7日。



闻。然而这却已是莱翁蒂奥斯大主教的最后一次政治行动了，因为在长期患糖尿病以后，他又感染斑疹伤寒，在7月26日去世了。温斯特勋爵事后写道：“于是我们决定，在我们温和地进行我们自己的计划以前，允许另选一位大主教出来。”10月5日初选时，右翼争取到四十名代表来支持年迈的基里尼亚主教，而德尔康主教（他做过选举莱翁提奥斯大主教时普世基督教大主教派来的代表）只得到左翼方面二十六名代表的支持。从第二位大主教当选之时起（温斯特勋爵后来说），他就使用教会所拥有的一切权力来抵制英王陛下政府的每一项建议，并且宣传颠覆和不服从的学说。国务大臣倡议了重新恢复岛上的教会领导结构，到头来却自食其时。他所得到的是一个坚决不和英国统治妥协的反对派，大主教就是这样运用他所拥有的一切影响来挫败英国政府的所有意图和目标的。

至于说到发展纲领，那末我们所遭到的又是百分之百的拒绝，在任何方面都得不到合作。不管我们提出什么发展他们的工业或其他项目的计划，我们都得不到任何帮助或支持。根本没有任何合作。

与此同时，就在快要到8月底的时候，总督“有鉴于流传甚广的谣言”，便否认了关于英国政府打算要把塞浦路斯让给希腊的任何推测。他说：“在英国和希腊政府之间决不存在着任何形式的有关塞浦路斯和希腊合并的协议。”他还说：“不仅如此，也没有正在谈判或考虑这样的协议。同我的说法相反的声明和传闻，都是不真实的，而且是完177全没有根据的。”最后，政府终于准备就绪，在尽可能公正和具有代表性的基础上，发出参加协商会议的邀请。因为在这个岛上，正如市政选举所表明的那样，选举原则是在许多方面遭到滥用的。原来的打算是要组成一个有四十名成员的会议，但是由于教会加以抵制，所以它的成员从来没有超过十八个人，其中包括八个左翼希腊人和六个土耳其人，两个无党派希腊人和一个马龙教派成员，

而以曾经参与马耳他和锡兰的宪法制订工作的大法官爱德华·杰克逊爵士为主席。当塞浦路斯政府辅政司问上述八名左翼希腊人，是否愿意在其工作范围之内与协商会议进行合作时，他们都对他说愿意。然而，当会议在1947

---

在这时候，左右两翼彼此关系紧张。因为利马索尔和法马古斯塔的两个劳动人民进步党市长都不答应意诺西斯当局的要求，拒绝在希腊国王乔治二世葬礼时下半旗。4月6日，有一大群人聚集起来去冲击利马索尔的市政厅（《每日电讯报》，1947年4月7日）。

这是塞浦路斯政府在总督下面的最主要的官员，当然应与伦敦的殖民大臣区分开来（殖民大臣和辅政司的原文均为 Colonial Secretary——译者）。

《泰晤士报》，1947年4月28日。英国殖民大臣证实说，是在和他本人商量后才发出这一警告的。具有十分讽刺意味的是，在保守党自1931至1945年的长期执政期间，塞浦路斯政府曾经常援用《报刊法》，而安东尼·艾登却要求反对党“保证这种情况不再继续下去，而他（殖民大臣）应该和总督商定在何时可以完全恢复出版自由”（1947年5月7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37卷，第409—411栏）。

《每日电讯》，1949年4月28日。

根据查尔斯·G·柯伦（Charles G. Curraill）的说法（《旁观看》周刊，1948年8月20日，第294页）：他对劳动人民进步党具有“不寻常的影响”；但是温斯特勋爵把他说成是“极左的人”却很难说是正确的（《联合帝国》，1949年7—8月，第2卷，第179页）。

参阅上文，原著第47页。

《泰晤士报》1947年4月29日，5月6日，6月28日。

年 11 月召开时，这几个左翼人物就立即提出了可否讨论有关自治的问题，并且不听英方主席的劝告，一定要向克里奇·琼斯送交一份备忘录，要求有一部和马耳他或锡兰宪法相类似的宪法——包括一个全部成员是选举出来的立法机关，而总督的权力则仅限于有关国防、外交以及少数民族特殊利益等几个方面。当得不到答复时，一个由利马索尔市长塞尔瓦斯、尼科西亚市长克利里德斯和塞浦路斯共产党书记所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伦敦，以促进他们主张的实现。根据温斯特勋爵和殖民部官员的劝告，克里奇·琼斯拒绝正式地接见代表团：但是他又听从了一部分工党议员的建议，同这个代表团进行了“简短的、非正式的谈话”，但并未涉及到宪法问题。尽管如此，这次谈话却使得关于协商会议还可能取得成果的任何残余希望都化为乌有了。因为，在代表团回到塞浦路斯时，塞尔瓦斯“透露了风声，谁是他已经得到非官方的强大支持，而且离自治也为期不远了”。

### 第三节 冷战到了塞浦路斯期， 1948—1949 年

马夫罗武尼地区的属美国所有的塞浦路斯矿业公司的工人提出了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和增加工资的要求；要求遭到了拒绝，他们便在 1948 年 1 月 13 日开始罢工。公司设法招募非工会会员的工人。当招募到的十二个人在 3 月 3 日报到时，大约一千名左右的人群，拿着棍棒和石头，聚集起来。一名警官和五名巡警，全都没带武器，发出警告，叫人群散开，可是人群拒不散开。随后又调来了两名巡警和一些人员，最后一批援军还带着两支步枪。巡警们再次命令人群散开，可是毫无效果。十二名待用的雇工离开时……人群便用石头攻打他们和警察。一名巡警又进一步发出警告，他对人群说：不散开就要开枪了。人群轻易地把一个没武装的警官打倒在地，又踢又打。在这当口，开枪了，一共打了十五发子弹……主要是对着正在殴打警官的那些人。后来警官被送到医院去治疗，他的一只手断了，头部也受了伤。人群中则有四个人被打伤，其中三个是轻伤，只有一个受重伤。……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警察的行动还是有克制的。8 日，警察再次向一群人开枪，因为这些人

---

该联合会建于利马索尔，为的是要摆脱左翼影响，但是从一开始就被资格比较老的、和它进行竞争的“全塞浦路斯工会”说成是一个“公司的工会”〔塞浦路斯政府，劳动局：《年度报告》

（Cyprus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Labour: Annual Report），1943 年版，第 3 页，第 13 段〕，而英国工党政府的殖民部次官后来却把它说成是由“右翼政党发起的”（1948 年 11 月 17 日，下院辩论，第 5 辑，第 458 卷，第 363—364 栏）。1946 年底时，它拥有的会员人数只有比其较左的全塞浦路斯工会的会员人数的百分之九。英国殖民部：《1947 年年度报告：塞浦路斯》第 8 页；参阅下文，原著第 182 页。

《泰晤士报》，1947 年 6 月 25 日，7 月 10 日，11 日和 14 日。考虑到教会所抱的不可调和的态度，也就很难接受 C·L·苏兹贝格（一个一贯为意诺西斯吹嘘的宣传家）的说法，他责怪说：“殖民部表现出一种倾向，把意诺西斯运动看得比共产主义的壮大更具有威胁性。……结果是共产主义被允许得到发展，而希腊民族主义却受到了抑制。”（《纽约时报》，1949 年 5 月 17 日，发自巴黎）

《泰晤士报》驻尼科西亚记者写道（1947 年 7 月 28 日）：“不同意他的政治观点，但是却尊重他作为一位真诚的牧师和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的当地英国人，对他去世的消息却“深表吊慰”。

《每日电讯报》，1949 年 4 月 28 日。

《联合帝国》，1949 年 7—8 月，第 40 卷，第 179 页。

企图阻止为公司提供设备的一艘美国商船卸货。在前一天，全塞浦路斯工会联合会就宣布在全岛举行二十四小时的总罢工，而矿工们的罢工一直延续到五月份的时候，就有人声称：“在塞浦路斯，每一个有组织的工人”都为罢工基金捐出了一天的工资，而且还收到了世界各堆的塞浦路斯人寄来的捐款。这时，英国人正在塞浦路斯建造配有雷达的空军基地，并从巴勒斯坦（那里的委任统治将于5月15日斯满）把数目相当可观的一批军队、中东无线电监听站和阿拉伯广播电台都迁到塞浦路斯岛上来了；再加上美179国（它在战略方面的协作后来成为众所周知的事）自1878年英国占领该岛以来又首次在塞浦路斯开设了领事馆——可能就是由于以上种种事实，使得共产党工会领导人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就在这时候，塞浦路斯政府极力催促英国政府，要它就制定一部理想的宪法问题提出自己的具体想法，作为对于协商会议中左翼人士所提要求的反建议。作为一个起点，英国政府就把爱德化·杰克逊爵士1947年11月7

日已经在协商会议上所提出的临时性大纲拿了出来。无论如何，在内阁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案”以前，几个月却过去了。一直到1948年5月7日，总督才从辅政司那里收到一份有关塞浦路斯宪法的文件，以供协商会议进一步讨论之用，而总督在上月份还到过伦敦去进行他就职十三个月以来的第三次磋商。该文件建议：立法机构应由四名官员（辅政司、总检察官，财政司和首席专员），以及二十二名由全体男选民普选出来的成员组成（如协商会议愿意的话，普选权也可以扩大到妇女）。这二十二名中，十八名由总登记区选出，其余四名则由土耳其族登记专区选出。立法机构得对四位官员提出质询，对其立法职能的唯一的绝对限制是不得涉及塞浦路斯在英联邦内的地位问题。此外，凡提出有关财务的法案或决议案，或提出一项总督认为影响及于防务、外交、少数民族特殊权利，或涉及修改宪法的法案，事前都必须征得总督的同意。不仅的此，为了对立法机关所通过的法案，特别是上面列举的各保留项目下的法案，“留待英王陛下表示意旨（也就是予以否决）起见”，总督得保持其“通常的立法保留权力”；并在他认为由于涉及公共秩序、政府信用或良好统治而有必要时，得宣告立法机关已否决的任何提案或动议为无效，也得宣告立法机关以不能接受的形式所通过的法案或决议为无效。该文件还补充说，这些规定并不是企图对立法机构的自由进行不必要的限制；因必要而使用其中某些规定的场合，特别是使用“保留权力”的场合，应是非常罕见的。所以，这些规定只应看作是英王陛下政府认为必要的保障措施，而不应看作是英王陛下政府蓄意干预立法机构在处理岛上正常内部事务上的行动自由的证据。文件还建议任命三个希腊族和一个土耳其族的民选成员180参加到目前还几乎全由官员所组成的总督行政会议中去任职，分别联系政府某些特定部门，成为政府各该特定部门的次官，正如英—埃苏丹新宪法建议所规定的那样。

---

《泰晤士报》，1947年3月27日。

见温斯特勋爵，前引文，和《每日电讯报》，1949年4月28日。

见《经济学家》特派记者报道，1948年5月29日，第884页。

具有兵产主义思想的“全塞浦路斯”劳动联盟在5月举行的年会上同意下述看法，即只要希腊被一个“法西斯王朝”统治着，那末，实现同希猎的合并就是遥遥无期的（《工人日报》，1947年5月26日）。毫无疑问，这种政策的改变既是由于企图利用成立协商会议所提供的机会，也是由于希腊的政权庄杜鲁门主

殖民大臣的文件还警告说，政府“对从根本上超越这些向完全自治的方向前进的建议范围的宪法，是无法表示同意的”。然而就在这些翘有等待的月份里，塞浦路斯温和派却变得垂头丧气起来；在教会和共产党都宣告反对声中，温和派转而采取旁观态度。大主教发表了一份声明，把这些建议说成是“全然不能接受的”，敦促人民去支持“意诺西斯，只有意诺西斯”的原则，还要他们去抵制普选，并责怪英国在协商会议中同左翼希腊人士打交道；因而“助长了共产主义”。“人民阵线”（这是它现在的自称）所开的一次会议也这样教导群众，要他们不接受英国的各项建议，因为这些建议都“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在5月20—21日协商会议开会时，他们正式反对这些建议，并且退出了会议，于是协商会议只得无限期地休会了。

1948年7月27日，当总督再次到伦敦讨论应采取的下一步骤时，C·L·苏兹贝格访问了希腊国王保罗。后者在答复一个问题时说：希腊肯定希望，而且将继续希望塞浦路斯会和希腊的其余部分合并在一起。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件事到现在还没有实现。有人认为这件事会影响到英国的安全地位，这种论点是站不住的。如果塞浦路斯就象它的大多数居民所希望的那样交给希腊的话，那末这是决不会影响到英国已经在那里建立起来的任何军事或其他基地的。不仅如此，假如可以由联合国来进行安排的话，那末希腊准备为英国或美国在克里特岛和其他任何地方提供更多的基地设施。就在这时候，英国在雅典助代办也发表了一份备忘录，声称根据他的政府的意见，“鼓励任何赞成塞浦路斯和希腊合并的宣传，都是不符合大不列颠或希腊的最高利益的”。希腊的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报纸《论坛报》和《自由报》都责怪国王干预了政治。8月2日，阿米兰佐斯的英美石棉矿的一千五百名雇员，为提高工资和其他要求而宣布举行总罢工，并占领了地下和地上的工地。警察用警棍进行冲击，想把他们赶出去，也没有成功。当消息传到尼科西亚时，大群的人聚集起来游行，向辅政司抗议，口中高呼要求自治和反对“反工人阶级政府”的口号，并以紧握拳头的姿态行共产党式的敬礼。结果有二十七个人，其中包括十名工会和劳动人民进步的领袖，因参加这次未经批准的示威而被法院起诉。8月12日，总督通知协商会议里剩下的土耳其族和无党派的成员说，由于左翼希腊成员投票反对英国政府的宪法建议并且退出了会议，所以协商会议现在解散了。“但是任何时候，如负责的和有充分代表性的政治领袖”出来要求重新研究

这些建议或与其类似的建议时，则这些建议仍然可以再度加以考虑。

我必须再次重申，政府在塞浦路斯主权问题上没有改变政策的打算。我受权断然宣称，任何有关大不列颠和希腊之间意欲就此事进行谈判的传闻，均非事实。将来，在这里或其他地方你们也许会听到与此相反的任何说法，但这都是蓄意要使你们相信问题依然尚待决定或者行将进行谈判。不过，这些

---

义下接受了美国援助而得到加强这一事实。

两年以后，克利里德斯在1949年5月的市政选举中被打败了，于是就和极左翼决裂，而且，据报道，开始组织一个中间派的社会党，这样就使得左、右两翼都给他一个投敌派的头衔〔《塞浦路斯邮报》

（CyprusMail），1949年10月30日—11月30日〕。

克里奇·琼斯1948年4月26日的发言，下院辩论，第5辑，第450卷，第377—378栏；参阅《工人日报》，1948年1月31日，笔名阿蒂克斯（Atticus）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的文章，1948年3月21日。

温斯特勋爵，前引文。

说法都不会是真实的，其所以提出来，也仅仅是为了在英王陛下政府已经决定了政策的问题上来欺骗你们，来造成你们的误解而已。……

英王陛下政府同你们站在一起，对造成这次暂时挫折的反对行动的不负责任的性质表示遗憾，而你们已用自己的行动表明，在塞浦路斯有着这样的领袖：他们准备挺身而出，把岛上的福利置于首位，摒弃卑鄙的阴谋或不顾现实形势的政策。——《曼彻斯特卫报》在其社论中评论说（8月14日）：这些建议，本来会为塞浦路斯人在政治责任感上提供一种无与伦比的经验，几个世纪以来岛上从未见识过的经验。同时，建议还提出了一个踏实的政纲，可由此朝着自治更迈进一步。但是他们却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也没有好好加以利用，这就说明塞浦路斯政治中有着一种不现实和不负责的空气。人们长期以来都受到没有出路的“意诺西斯”的支配……以致一旦有真正前进的机会来到时，也会把它一脚踢开，因为它满足不了泛希腊主义口号182的要求。

总督的声明一发表，左翼的工会联合会就立即组织了群众性的集会，对“伦敦的所谓工党政府”表示抗议。8月13日，一万五千名工人参加了二十四小时的总罢工，就这次立宪问题提出抗议，并对后来于30日结束的阿米安佐斯罢工表示声援。与此同时，工会联合会又号召在建筑业中举行另一次罢工。当分裂出去的塞浦路斯工人联合会拒绝加入这次罢工时，由劳动人民进步党所领导的罢工工人就开始炸毁正在建筑的房屋，并且朝他们的对手们扔手榴弹。11月17日，殖民部次官在下院声称：“自6月1日以来，已经发生过二十九起使用炸药的事件，还有七十四起殴打、伤害和纵火事件，据信这些都和敌对工会之间的冲突有关。在有记录的案件中，有一百二十名原告是右翼的，还有九名是左翼的”。警察当局相信，刚从埃及撤到塞浦路斯来监听苏联和共产国际情报局广播的一座美国电台——它的房屋正在建筑中——是这次破坏的特定目标。10月17日，一个特派记者自尼科西亚报道说：……现在业已明显的是，塞浦路斯左翼仅仅是奉命行事而已，而他们所执行的命令也只是莫斯科在本地区反西方活动的一个侧面。……控制着太多数的以上会名义为掩护的那些政治组织的左翼，有足够的金钱，是能为长期的罢工提供经费的。据信，至少有些这样的款子是用金英镑的形式走私进来的，其来源于贝鲁特的一个赤色支付站。塞浦路斯事务委员会书记埃夫佐多斯。伊奥安尼泽斯为伦敦《工人日报》（1948年9月13日 1949年2月24日）所撰写的文章，对于这样从冷战的角度来解释事态，表示支持。他肯定地说，塞浦路斯人民“已经下了最大的决心”，要通过示威和罢工的手段，既反对独裁的威胁，又反对把塞浦路斯变为“反苏的帝国主义基地”。他引用的事例有：建筑足以训练十万名士兵的兵营、改进港口、183成队的英国战斗机和美国飞机在岛上着陆，以及修建美国的无线电监听站，等等。作者还宣称：“旨在结束帝国主义统治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加强”使政府和塞浦

---

《工人日报》，1948年5月6日。十天以后罢工结束了，结果是某些工种的工人的工资稍有增加，而且还改订了工会组织法，规定只有塞浦路斯矿业公司的工人才能参加工会，这是为了要使它摆脱外来的干涉和政治控制（《泰晤士报》，5月18日）。

在回答阿拉伯《东方报》广播电台于3月迁来塞浦路斯的问题时，英国外交和殖民大臣均宣布，它是“一批阿拉伯人和对阿拉伯事务感兴趣的英国人”所经营的（19托年6月16日和23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52卷，第409—410栏，第1342栏）。

路斯的右翼都十分惊慌，他们为了破坏劳动人民进步党的信誉，竟不惜雇用一批破坏分子去炸毁各种建筑物。为了同民族党人两个星期前举行的一个动员大会唱对台戏，劳动人民进步党于10月31日在尼科西亚举行游行示威，形成了其宣传鼓动的高潮。据估计，有两万五千人参加，成百辆卡车载来了农村居民，还有一部分人举着“我们不要英国或美国在塞浦路斯的战争基地”的旗帜，步行了一百英里。利马索尔的市长发表了演说，还有人为希腊共产党叛乱领袖马尔科斯募果捐款。11月11日，总督再次去伦敦同殖民大臣进行磋商。同时《泰晤士报》驻尼科西亚的记者驳斥了某些发向国外的报道，认为是严重地过甚其词。这些报道说塞浦路斯处于无政府状态，结果是保内乱险的保险率竟上涨了五倍。工党政，府大力争取塞浦路斯人的合作，以推行一项渐进地给予塞浦路斯自治、但不允许它脱离英帝国的纲领；与此同时，在塞浦路斯集会和游行必须得到政府批准的种种法律，是没有严格执行过的。但是这些法律白纸黑字保留在法典里面。现在根据温斯特勋爵的请求，伦敦英国政府同意又回到比较严格地执行这些法律的路上了。11月10日，法马古斯塔的劳动人民进步党市长阿达曼托斯被罚款一百英镑，因为只授权他讲有关建筑工人罢工的问题，他却发表了一篇政治演说。另一工人领袖则由于未经批准即架设扩音器转播该市长的这篇闯祸的演说而被罚款五十英镑。11月26日，利马索尔市长塞尔瓦斯被监禁三个月，而劳动人民进步党的三十一个成员也分别被判处一个月到两个月的徒刑，罪名是为了要求举行普选，参加了利马索尔的未经批准的游行。共产党人抱怨说，由于要重新强调政府的威信，结果有一百二十六人被判184短期监禁，还有几百个人被处罚款。据报道说，共产党的坚强核心的人数想来不超过三千至五千人，而政府的这一行动所产生的效果，是使这个核心的许多偶然追随者——估计有四万左右——灰心丧气。

与此同时，劳动人民进步党的总书记菲菲斯·伊奥安努和工会领袖齐阿尔蒂斯据说在冬季曾到布拉格和布加勒斯特去同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领袖们进行过会晤。三年一次的市政选举规定应在1949年5月份举行。3月初，劳动人民进步党的一份声明宣称：党的领导成员犯了严重的错误；“自我批评揭露，中央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是由具有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分子构成的，而这种小资产阶级倾向在劳动人民进步党的领导中不应占有地位”。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都相应地辞了职，以便于更换领导，于是伊奥安努的总书记一职，便由E·巴巴约安努所替代。后者于第二次大战期间曾在英国积

---

萨姆·波普·布鲁尔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1948年3月7日；C·L·苏兹贝格，同上，1948年7月12日。1878年前不久，塞斯诺拉两兄弟分别被任命为美国驻塞浦路斯的领事和副领事，以便利他们的考古工作。

英国殖民部：《空浦路斯宪法》(Cyprus Constitution)，第227段(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8年版)，第5页。

菲茨休·特纳(Fitzhugh Turner)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的文章，1948年5月13日；《泰晤士报》，1948年5月12日、15日、18日。

《纽约时报》，1948年7月28日。

1948年9月22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56卷，书面答复，第120栏。当希腊外交大臣声称国王所讲的话“被不正确地报道了”时，首相则说他“仅仅是重述了在国会中已经表达的民族感情”(《每日电讯报》，1948年8月2日；《泰晤士报》1948年8月4日)。

极地参与了塞浦路斯的事务。这些更动的目的，可能是为了重新制订党的路线，即从要求“自治”已因向英国政府谋求宪法让步不成而告失败退到要求“意诺西斯”，从而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和右翼进行竞争。3月21日，一个区法庭又判决劳动人民进步党的报纸《新民主报》的编辑米诺斯·佩迪奥斯以三个月的监禁和罚款五十英镑，罪名是门谎称政府阴谋伪造选举名册。29日，塞浦路斯政府的《公报》刊登了对刑法的一条修正条文，规定文字或文件的出版，如以破坏公共秩序为目的，其最高刑期从监禁六个月提高到五年。接着，监修利马索尔选举名册的法官于4月12日下令把市长塞尔瓦斯和一名市政参事的名字从选民名册中吊销，理由是他们最近在尼科西亚的监狱中服刑，这就使他们在利马索尔的居住期中断了。”

从1949年5月8日至29日，连续四个星期日，不同城市的市政机关分别举行了选举。第一天，在农村地区的最大城市——莫尔富，劳动人民进步党赢得了八席中的七席，但是15日再选举时，优势已转向右翼候选人。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22日一些大城市开始选举侧候。劳动人民进步党以微弱的多数继续控制了利马索尔、法马古斯塔和拉尔纳卡等港口，但是民族党人却夺回了首都尼科西亚。这一切都是在两个敌对派系“每隔几分钟”就大打出手的情况下进行的，结果有一个人被打死，好几个人受伤，还有一百七十人被捕。最后的结果表明，民族党人掌握了十五个市政机关中的十一个，总共获得了百分之六十的选票。

---

《泰晤士报》，1948年8月13日。温斯特勋爵后来指出，出来攻击英国宪法建议的反对派是由四个主要城市的市长领导的：“有一件事唤起了我的注意，那就是在这四个城市中，都没有一个够得上叫做救火队的救火队——无论这个名字的那一方面的意义来讲。只要任何一个城市发生一场大火灾，它就会被烧得精光。在我看来，一个连救火队都搞不好的人民要去搞自治，未免稍谦为时过早。我是很严肃地讲这个的。事情严重到这样的地步，以致我不得不把救火队从市政机关调开，而把它们交给了警察局。在我们谈论自治的时候，这些事情都必须牢记在心。人民也必须意识到自己有责任，让自己在走向自治的道路上接受指导和帮助。”（1949年4月13日，上院辩论，第5辑，第161卷，第1224栏）

辩论，第5辑，第458卷，第363栏。

，《经济学家》1948年10月23日，第666页；参阅萨姆·波普·布鲁尔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1949年1月4日以及让·沃尔夫（Jean Wolf）在《埃及金融市场报》上的文章，1948年6月11日；“南斯拉夫或保加利亚的船只不时访问法马古斯塔。经常在这种情况下，船上的职员和某些以颠覆活动而闻名的岛上鼓动者就在岸上或船上会晤。……不久前，有一般这样的船访问了利马罗尔。在驶离的前夕，它的一位船员喝得酩酊大醉，便向一个同饮者倾吐心腹；而后者是个情报机关的特务，立即向有关当局作了汇报。于是对这条可疑的船组织了大搜查，虽然海关在它们的例行的、浮面的检查中一无所获，而宪兵却发现了一个装起来的船身部分，里面藏有印刷品和成千上万份准备散发的希腊文小册子，还有金英镑以及成千万张英镑钞票。不少船员身上的证件也是伪造的。

在政府表示这项同意之际，殖民大臣也“遗憾地”接受了温斯特勋爵要“摆脱”总督。一职的愿望，温斯特勋爵所以产生这种愿望，“纯粹是由于争取大家接受宪法所作的努力……已经证明无济于事，他当初就任此职的主要宗旨……也不复存在了”（殖民部声明，《观察家报》，1948年11月14日）。又见《泰晤士报》，1948年11月15日；克里奇·琼斯1948年19月1日的发言，下院辩论，第5辑，第458卷，书面答复，第174栏；温斯特勋爵（《联合帝国》，1949年7—8月，第40卷，第181页）。

阿达曼托斯和塞尔瓦斯以前各因有过这样的违反法令行为，曾分别九次和八次被判为有罪（克里奇·琼斯1948年11月24日和12月8日的发言，下院辩论，第5辑，第458卷，第1238栏；第459卷，第358栏）。至于帕特里克·鲍尔弗对阿达曼托斯的印象，见《孤零零的国土》，第169—190页。

报纸上记载了在拉尔纳卡发生的一件事。左翼市长拒不出借市政机关的洒水车去冲洗右翼所占有的运动场。于是尼科西亚的右翼市政府便出借自己的洒水车，这辆洒 186 水车大摇大摆地开进了拉尔纳卡，冲洗了它的运动场，然后在一大群支持者的前呼后拥下驶过拉尔纳卡的街道，沿途把街道大事冲洗。

在大山般的世界意识形态的冲突里，却只冒出了市政府这样一只小老鼠。塞浦路斯人的政治上的激荡的洪流，又重新无声无息地流回到诸如城市地下排水道和农村供水池这样的渠道里去了。除了地方政府以外，这股洪流没有什么更宽广些的出路了。塞浦路斯仍旧没有选出一个代议制的议会，没有选出一个立法会议，来处理更加关系重大的事务。

政府在发展农业、保护森林和公共卫生（特别是基本上根除了过去曾严重影响岛上居民寿命的疟疾）等的各个领域内部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在政府领域里，塞浦路斯岛上的希腊居民集团和英国政府之间的谅解却一点也没有改进。如果希腊集团中确有一部分人是欢迎妥协的话，那末这部分人也缺乏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意志。民族党人仍象过去一样，坚持他们的意诺西斯要求，毫不妥协。劳动人民进步党也没有能好好地利用英国的宪法建议来为自己取得政权打开道路。他们有必要喊得比民族党人还要响亮，所以要求立即实行完全的自治。然而这样一来，他们所要求的就超出了英国工党政府愿意对塞浦路斯所作的让步的范围，尽管长期以来英国工党都是支持在英国各殖民地内建立自治政府的。当然，原因并不是由于任何一届英国政府曾真正认为塞浦路斯人要比例如缅甸人（更不用说苏丹人或利比亚人了）在政治上更不成熟。他们拒绝把已经给予缅甸人的东西给予塞浦路斯人，因为他们意识到，一旦塞浦路斯人也取得自治地位所享有的全部权利，他们就会象缅甸人一样利用这种权利脱离英帝国，而当时出于战略上的原因，英国的两个政党都决心要把塞浦路斯留在英帝国的范围之内。到了 1948 年，由于埃及和伊拉克都拒绝了英国的建议，不愿同英国在冷战中实行共同的区域联防，再加上英国政权又在巴勒斯坦垮了台，结果就使塞浦路斯重新获得了曾在 1878 年吸引过迪斯累里、但后来却在 1882 年被英国占领的埃及取而代之的那种战略上的重要意义。1948 年下半年，塞浦路斯共产党人和他们

---

埃夫佐曼斯·伊奥尼泽斯（Evdoro SIOannides）在《工人日报》上的文章，1949 年 2 月 24 日。

《纽约时报》驻尼科西亚记者报道，1949 年 1 月 4 日。

C·L·苏兹贝格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1949 年 1 月 4 日。

《每日电讯报》和《工人日报》，1949 年 3 月 9 日；C·L·苏兹贝格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1949 年 5 月 17 日。紧接着总督解散协商会议之后，七名曾参加过该会议的左翼塞浦路斯政界领袖（五个主要城市的市长和两名工会联合会的代表）就向总督送交了一份请愿书，这已预示行将发生的转变。这份请愿书提请注意“民族要求”，并呼吁为同希腊的合并一事举行一次公民投票[《泰晤士报》，1948 年 9 月 13 日；普拉茨-米尔斯（Platts-Mills）1948 年 9 月 23 日的发言，下院辩论，第 5 辑，第 456 卷，书面答复，第 174 栏]。《经济学家》的一位记者（1948 年 9 月 18 日，第 459 页）详述道，其所以这样做，“目的是为了在市政选举中捞到些意诺西斯分子的选票……近一个时期来，由于教会的政治团体组织得比较好，再加上捷克政变和铁托事件后俄国的影响下降，所以右翼已明显地取得优势。除非左翼认真振作一番，否则是无法指望重获在上次市政选举中所得到的那种应得的。……采用这个投其所好的意诺西斯口号是它的选举运动的开始。”参阅一位记者在《论坛报》上的文章，1948 年 12 月 31 日，第 10 页。



的追随者 187 猛烈地抨击了英美在塞浦路斯建立军事设施的协议。这表明共产党人这方面很懂得：在英国反对他们的政治要求的背后，也是隐藏有战略动机的。伦敦的英国工党政府和它所任命的塞浦路斯总督之间，就同一问题所产生的意见分歧（或者至少是在处理问题的时间表上的分歧），看来就是温斯特勋爵辞职和选择一位文官作他后继人的原因之一。更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共产党人的暴力行动，同过去一样，竟挫败了他们自己的目的，反而促使塞浦路斯的教会和中产阶级的民族党人都起来组织了自己的支持者的队伍，并在 1949 年 5 月的市政选举中击败了共产党人。

---

据报道，齐阿尔蒂斯于 1948 年 12 月 21 日在伦敦说，政府刚刚制订一项法律，规定市政选举中的投票权限于曾在同一城市居住至少两年的人们，并把准备选民名册的责任交给了右翼头目（《工人日报》，1948 年 12 月 22 日）。这里指的是市政机关（修正）法，它“根据以往的经验大幅度地修改了主法——选举法——的规定，特别制订了新的规程，规定由麦克塔斯和阿札斯[村长和委员会]来准备选举名册，并规定由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特地从区法院的法官中提名任命一位监修法官来监修名册”[塞浦路斯政府：《1948 年期间的立法》（Legislation during 1948），会议期间文件，1949 年，第 4 号，第 4 页，第 34 号]。英国殖民大臣解释说，规定两年居住期的目的“是要把一些临时性的雇工和进城打短工的村民从市政选举的名册中剔除出去，因为这些人对市政事务并无长期的利害关系”（1949 年 1 月 27 日，下院辩论，第 5 辑，第 460 卷，书面答复，第 181—182 栏）。

英国殖民部次官在这个问题受到质询时答辩说：市政机关（修正）法的内容“并未涉及自愿迁移的问题，因此争论的中心是，能否将监禁时期算作就法律意义而言的‘暂时不在此地’。负责监修名册的法官，根据过去判决类似案件所规定的原则，裁决说不能这样算。……这是一个司法上的问题，我的可尊敬的朋友不应对此进行干预。”（1949 年 5 月 5 日，下院辩论，第 5 辑，第 464 卷，书面答复，第 69 栏）5 月 12 日，尼科西亚法庭判决塞尔瓦斯犯了诽谤罪，罚款一千英镑，因为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把一名行政参事称为“同政府勾结的邪恶的内奸”（《工人日报》，1949 年 5 月 13 日）。

## 第五章 英国在巴勒斯坦的统治，1945—1948 年

### 第一节 委任统治国和犹太抵抗运动， 1945 年 8 月至 10 月

三十年来日益增长的巴勒斯坦的紧张局势，终于导致 1948 年战争的爆发，这部分地是由于在这段时期内支配着巴勒斯坦的外交文件措词含糊不清。贝尔福宣言和委任统治允许“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而不使“现存的非犹太人社团的公民和宗教权利”受到损害。一个律师可能会辩护，这两种条款不是彼此不相容的。但是，这种法律观点，在心理学的必然性面前总是脱离实际的，因为这个公式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阿拉伯人双方的心灵中，会唤起种种的确是不能调和的期望。这种委任统治是属于“甲”级的，适用于已经“达到一定发展阶段的属于土耳其帝国的某些社团”，“而它们作为独立民族的存在”是能够“得到条款上的承认的”；再考虑到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已构成当时巴勒斯坦人口的压倒多数，他们自然会把委任统治当作是承认他们有权成为一个完全自治的阿拉伯民族——象前奥斯曼帝国的其他 188 阿拉伯人终于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约旦成为完全自治一样——尽管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中，又包含这么个条款：要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之家。同时，这也并不奇怪——尽管犹太复国主义者遵守委任统治的规定，保证非犹太的巴勒斯坦居民的权利——他们竟然会把“为犹太人民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之家”这一点解释为“承认巴勒斯坦为犹太人民的民族之家”，这是他们曾经在 1917 年提过的要求，事实上并没有获得同意。

1939 年 5 月的《巴勒斯坦白皮书》对进一步扩张犹太人民族之家这一问题，给予了严格的限制；其基本目的是为了英国在中东的战略基地的安全，防止泛阿拉伯民族主义采取同仇敌汽的行动，在当时迫在眉睫的战争中对基地进行破坏（那就会对整个战争部署带来最严重的后果）。这个目的，白皮书已经多半完成了。但是在限制未来五年内犹太人移民总数为七万五千名这一点上，就使不知其数的犹太人不能进入巴勒斯坦，否则的话，这些人可能已从欧洲逃出来了，可是这样一限制，也就把他们划入四百万到六百万的希特勒的犹太牺牲品中间去了。因此，到欧洲战争末期，由于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原因，犹太复国主义者对白皮书本来就忍受不了；如今再加上但愿为欧洲大陆幸存的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提供家园，而由此愿望又产生了一些明显

---

那些被捕的人“都是些青年，有些人的前额还有伤，他们[从警车上]纷纷跳下，相互谈笑，看上去都是高兴得意的，挤到牢房里去了”。“这些左翼帮派都是一些年青人，年轻得还没资格投票。他们都穿着有颜色的衬衫，戴着徽章，腰上则是最时髦的塑料皮带。我瞧瞧他们的裤子背后的口袋，看看有没有武器。从每一个口袋里突出来的，并不是短棒或手枪，而是一些五颜六色的袖珍木梳。因为，说到底，这儿究竟是塞浦路斯。（帕特里克·鲍尔弗：《孤零零的国土》，第 195—196 页；第 183—197 页的一整章极其精采地描绘了塞浦路斯的政治）

由劳动人民进步党所组织的一次祝捷游行不得不取消了，新上任的党的总书记也只好这样宣称“在右翼恐怖的情况下”本党仍然保持了三个港口和百分之四十的总票数，这表明从 1946 年选举以来本党的支持者实际上还是增多了的[《新民主报》（NeosDemocrat）转引自《塞浦路斯邮报》，1949 年 5 月 28 日]。

鲍尔弗：《孤零零的国土》，第 197 页。

的和更为迫切的考虑，这就对白皮书越发感到忍无可忍了。

由于他们最近同集中营里或大半是同刚从纳粹魔掌下解放出来的那些欧洲地区的犹太幸存者建立了联系，这种极端迫切的感觉就更加加重了。因为总数估计为一百二十五万到一百五十万名的犹太幸存者，绝大多数似乎感到在他们遭受过骇人听闻的惨无人道的迫害的国家里没有前途；而且（即使犹太复国主义者已准备在新的情况下，否定1905年所做的关系重大的决定，当时他们拒绝了太不列颠提出的，在东非为犹太人提供一个民族之家的提议），也没有任何其他海外避难所现在主动提供任何值得考虑的容身之地。欧洲犹太人的最大潜在避难所是美国，1945年12月22日，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宣告一项迅速接纳来自欧洲的政治避难者和难民进入美国的189政策，并且对有关政府机关发布一个相应的训令，立即设立一个部间委员会去实施这项政策。这一工作的执行，当然要遵照现存的美国移民法规办事。一年以后，在1946年12月19日，总统宣告，到10月21日为止，只有四千七百六十六人在这些行政安排下被接纳入境。此后，就准备好一个现行法规修正案；而由此产生的难民条例，则规定二十万零两千名难民在两年之内进入美国，不考虑移民的分配限额，但是这个条例直到1948年8月才成为法律，也就是说，一直到英国的巴勒斯坦委任统治结束和以色列国家成立一个月以后才成为法律。这些措施并不是全部地为着犹太难民的利益的，在美国，任何大量地在犹太社团增加人数，似乎连犹太社团本身也不赞同；因为犹太人总数业已达到五百万以上，而且犹太人集中在美国那些大城市里也早已引起了程度严重的反犹太主义，而犹太社团则极力希望不要去使它激化。除了人道主义的理由迫使大规模的移民立即进入巴勒斯坦以外，还有一种顾虑是时间可能不利于犹太复国主义者。正象韦茨曼于1945年8月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上讲到的那样，“中东正在造成许多新的事实，据推测这些事实不利于这个问题。”而其中主要的事实是阿拉伯国家联盟作为一个松松垮垮的邦联于1945年3月宣告成立，这个邦联在其宪章中立誓要抵制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的种种政治目标，这使它的英国倡议者很有点为难。这些政治目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纳粹灭绝政策的压力下，已经找到了极端的表现，而当时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运动和巴勒斯坦犹太人的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操纵的机构，已经势不可挡地采取了1942年初的“比尔特莫尔计划”。他

---

见“塞浦路斯的农业，回顾十年来的进步”，《英联邦概览》（com-monwealthSurvey），1949年6月11日，第33—36页；“塞浦路斯的森林”（“ForestryinCyprus”），同上书，1949年11月12日，第41—42页；M·阿齐兹：“塞浦路斯根除疟疾”，《花冠》杂志（M.Aziz：“EradicationofMalariainCyprus”，Corona），1950年3月，第2卷，第102—104页；鲍尔弗，前引书，第200—201页；《泰晤士报》驻塞浦路斯特派记者报道，1952年5月29日。

根据温斯特勋爵的说法，民族党人还从来用不着添上“一星星简单的资料或一条经济上的论据”去加强他们的“雄辩的和激情的”，吸引力。这些话载《每日电讯报》，1949年4月28日和《联合帝国》，1949年7—8月，第40卷，第180页；参阅鲍尔弗，前引书，第207—210页。

参阅鲍尔弗：《孤零零的国土》，第206页。

在共产党的宣传鼓动达到高潮时，土耳其的学生舆论和当地反对派的报刊也都对塞浦路斯的土耳其少数民族采取了支持态度，并提出这样的论证，说是假如英国统治就此结束的话，那末该岛就应该归还给土耳其〔《纽约时报》，1948年12月12日、26日和31日；劳伦斯·S·穆尔（LawrenceS.Moore）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的文章，1949年1月5日〕。

们当初曾经要求在委任统治下把整个巴勒斯坦领土建成一个犹太国，作为保证在移民和 190 购买土地这些大事上有完全自由的唯一手段；但由于英国在中东有着重大的利益，它需要去研究阿拉伯的各项要求，如同它需要去研究犹太复国主义者所主张的各项要求一样，所以，犹太人在委任统治下并不曾得到移民和购地的自由。

早在 1945 年 5 月 22 日，就在欧洲胜利日过去了仅仅两周以后，犹太代办处已经向英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后来塞缪尔勋爵在上院把这些要求描绘成“一种造成惨重损失的政治错误”，这些要求包括政府接受极端的比尔特莫尔计划：（一）应即决定把巴勒斯坦建成一个犹太国，并将决

（二）授予犹太代办处一切必需的权力，以便使尽可能多的犹太人有可能来到巴勒斯坦落户，并全面而迅速地发展这个国家的一切资源，特别是土地和动力资源：

（三）给予国际贷款和其他帮助，以便第一批一百万名犹太人移居到巴勒斯坦，并促进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虽然丘吉尔作了答复：巴勒斯坦问题一定要等待大国在和平会议上加以研究，尽管巴勒斯坦的希伯来报纸采取慎重态度，但工党在英国普选中获得的大胜，还是在该地区的犹太社团中间放出了“一个无限乐观的信号”，诚然，长期处于反对派地位的工党的一些决议。已经一贯地激起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希望，而在 1944 年甚至已经超过了他们所表示的要求（他们只要求在巴勒斯坦有放手处理的权力）。

在选举结果公布一星期后，即 8 月 1 日，犹太复国主义 191 义者大会在伦敦召开，韦茨曼博士表示了这种信念，认为从贝尔福宣言以来，他已采用与英国政府合作的办法，试图驾御犹太复国主义的政策，而这种办法随着工党的执政可能有一个更好的机会，特别是因为英国政府的反对派依然是由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老朋友丘吉尔领导的。另一方面，犹太代办处的执行主席和

---

新总督安德鲁·赖特爵士在先后担任特立尼达的辅政司和冈比亚的总督之前，已经在塞浦路斯供职达二十年之久。劳动人民进步党把他的任命看成是“一个标志，即帝国主义的安排是要把新的独裁强加在塞浦路斯人民身上以完成使该岛变成帝国主义战争基地的工作”（《泰晤士报》驻尼科西亚记者报道，1949 年 5 月 11 日）。

钱姆·韦茨曼：《磨炼与错误》（Chaim Weizmann: Trial and Error），纽约，哈珀，1949 年版，第 203 页。韦茨曼是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的主席，也是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运动的主席，他本人在 1946 年 12 月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上不得不承认：“一个解释与另一个解释之间有很大的差距”（《新犹太》（New Judaea），1946 年 12 月—1947 年 1 月，第 66 页）。

见《概览，1939—1946 年：战时中东》，第 10 页。

校国会议员西德尼·西尔弗曼（Sydney Silverman）的看法为“几十万人”（1946 年 8 月 1 日，下院辩论，第 5 辑，第 426 卷，第 1263 栏）。

当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在惠特森召开的 1946 年工党大会上（见下文，原著第 217 页）宣布，美国压迫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的理由是“因为他们不要犹太人住在纽约”，一位美国的犹太记者承认，他的评论“有些道理，尽管令人不痛快。许多对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的最热心的大会支持者，同样也是限制犹太移民进入美国的热心鼓吹者。甚至美国的那些犹太组织，对要求放宽这个国家的移民法的想法，也是踌躇不定的——因为他们知道，或者他们自以为知道，这此法律的任何变更肯定会是变得更坏的”（莫里斯·J·戈德布卢姆：“历史中的这一月”（Maurice J. Goldbloom：“The Month in History”），《评论》，1946 年 7 月，第 60 页）；参阅西德尼·赫茨伯格（Sidney Hertzberg），同上，1946 年 2 月，第 48 页；理查德·克罗斯曼：《巴勒斯坦使命》（Richard Grossman: Palestine Mission），伦敦，哈密什·汉密尔顿，1945 年版，第

巴勒斯坦犹太人孚有众望的领袖戴维·本-古里安，对他的听众的过度乐观发出了警告；决定性的考验将是新政府贯彻白皮书的行动，所以他号召“对白皮书政策的施行，不管采取现在的形式还是采取修改过的式样，都要作消极和积极的抵不着象现在那样的种种限制”，以便成立一个“幸福、自由和繁荣的巴勒斯坦犹太国”。然而，这些括应该同摘自多尔顿演说（修正稿校样）的下列一段加重点号的话连起来读：“这不是一件应该认为要由英国政府单独负责的事情。如果我们要获得一个意见一致的居留地，如果这个居留地经过年复一年的变化坚持下来而不动摇的话，它必定要得到美国、苏联和英国政府的拥护和支持”，等等。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5年8月3日，第5页）列举了“公开表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新议会的九十名工党议员的名字。共有二十八名“父母双方都是犹太人的犹太子弟”被选人议会，其中二十六名属于工党，一名是共产党人。十九名第一次入席，有人说，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是英国犹太人的第一代，即移民的后裔〔《1947年犹太年鉴》（JewishYearbookfor1947），第319—320页；马克·雷文（笔名）：“困难中的英国犹太人”（MarkRaven：“BritishJewryinHeavyWeather”），《评论》，1947年5月，第453页〕。抗。”美洲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拉比阿巴·希莱尔·西尔弗宣布，“昨天的个人外交途径”（象韦茨曼所用的）“在今天是完全不适当的”；“政治艺术的高峰就在于不带政治家的味道”，在于使犹太群众随时准备应付任何紧急情况，并保持他们的战斗精神，他们必须永远不再把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国的目标去同单纯的移民和“避难主义”混淆起来。犹太代办处的政治部领导人摩西·谢尔托克（后甸沙雷特承认，现在没有希望在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的基础上同拉伯人达成定，而犹太代办处却在尽力辩论：同巴勒斯坦问题密切有关的主要是各大国、全世界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而阿拉伯世界的其余部分，除了联合国成员国的身分以外，在这件事情上是没有地位的。这样，就在大战刚结束的日子里，犹太复国主义者没有得到他们的一些“老成持重”的前辈政治家的任何警告，就向英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激烈要求。一年之后，丘吉尔在下院说：如果他在普选中恢复执政的话，他打算，192“就在战后初期的讨论中，把下列问题向我们的美国朋友提出，要么他们应该参与这个犹太复国主义问题……以同等的条件平均分担义务，来帮助我们，要么我们应该辞去我们委任统治的任务”；凡是“超过委任统治国所同意的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全部重量”，都是对英国的一种“不公平的负担”，而对我们帝国说来是“休戚相关的阿

---

58—59 页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5年8月10日，第4页。

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342页和注。

同上，第21—23页。

1947年4月23日，上院辩论，第5辑，第147卷，第80栏。

这些要求被1945年在伦敦举行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所批准（《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5年8月17日，第6—7页），由此看来，后来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关于比尔特莫尔计划“从来没有被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所正式采用过”的论点，是没有根据的（扎赫尔：《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67页）。

达夫尼·特雷弗：《在白皮书下》（DaphneTrevor:UndertheWhitePaper），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出版社，1948年版，第145—146页；这本书后来在犹太代办处出版的文件目录中登有广告。

拉伯人和穆斯林人，却在诚惶诚恐，并且同我们疏远起来，而美国……和其他国家却以完全不相干的自由态度，坐在界线外批评着我们的缺点”。因此，在波茨坦会议上，丘吉尔和（随着普选的结果而发生的政府变动以后的）新首相艾德礼同杜鲁门总统讨论了巴勒斯坦问题，希望完成一个公共舆论是全部赞成“把孩子们送回家里去，”而反对承担政客们（后者定要坚持1939年白皮书的信件；他们威胁说，如果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要求投降的话，他们就要采用暴力手段）双方散布的激烈宣传，英国工党政府就设立了一个内阁附属委员会去研究这个问题，却搞得左右为难，因为工党当初在承担执政责任以前，对犹太复国主义所许诺的义务，同门负责中东事务的常设官员们在当

前提出的劝告之间，显然存在着鸿沟。由于战争的结果，英国物资力量的衰落，增加了英国在中东的战略地区维护睦邻关系的重要性，从黎波里塔尼亚到波斯湾口的这个三千英里宽的国家集团，其中部的三分之一——包括从埃及到伊拉克——大多数穆斯林阿拉伯人，对于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具有政治意义的主张，从来总是敏感的。

人们记忆犹新的是，本一古里安曾经在伦敦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上说过，同1939年白皮书有关的行动，将是对新政府一场决定性的考验；这个文件强行规定的七万五千名移民限额，现在只有千把人到达巴勒斯坦。在工党政府执政的头十天内，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团（由193本一吉里安领导）再次对新任殖民大臣（乔治，以后更名为第一代霍尔子爵）提出了曾于六月中旬向丘吉尔政府提过的那个要求；立即发放十万张移民许可证书，以满足对集中营内发现的犹太人幸存者作好安排的紧迫需要，并立即宣布巴勒斯坦应成为一个犹太国。工党成员理查德·克梦斯曼，对巴勒斯坦问题深感兴趣，而对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一边表示同情，他后来评论说，这是一次“灾难性的会见”。殖民部于8月25日答复，提出了一个看来是主要想给政府争取喘息时间的建议：白皮书限额中留着来用的约莫两千张许可证，应该首先予以分配。或许殖民部希望谋求阿拉伯人同意继续移民，每月移入一千五百人——即按照1937年皇家委员会提议的限额增加百分之五十，万一它初步建议的分治不被接受的话。而犹太代办处认为这个建议完全不当，就简单地予以拒绝了。同时，杜鲁门总统已受到了强大和一致的压力，要他去支持当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正在提出的种种过分的要求。美国四十八州中，有三十八个州的州长，最近支持了一个请愿书，要求杜鲁门采取步骤为犹太人的

---

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316页；“英国工党的誓言”（British Labour's Pledge），《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5年9月28日，第4—5页。哈里·扎赫尔（前引书，第29页）引用休·多尔顿1945年在惠特森对工党年会的演说，在会上他鼓吹犹太人移民进入巴勒斯坦“用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5年8月3日，增刊，第4页：

关于在大战期间，本一古里安在巴勒斯坦已经占了韦茨曼的上风。参阅《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311页。

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315—316页。

韦茨曼同斯福和丘吉尔的谈判，见同上书，第312—314页。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5年3月10日，第6页。

同上，第10页；1945年8月24日，第3页。然而有人向各阿拉伯国家保证，它们会发现犹太国是它们“人口稀少和不发达地区的”一个“忠实盟国”（同上，1945年8月17日，第6—7页）。

大量移民和殖民打开巴勒斯坦的大门，并“在尽可能早

的时间内”为了确定犹太民族独立，把巴勒斯坦改成一个犹太人的国家。

8月31日，杜鲁门对艾德礼传递了他提名参加难民问题政府间委员会的代表所提出的那个建议，即对德国犹太难民应同意发放十万张进入巴勒斯坦194的移民许可证，还评论说。德国犹太难民问题的主要解决办法，看来在于迅速撤走“尽可能多的犹太人……把他们遭到巴勒斯坦去。如要收到实效，此举就不应拖延”。据悉英国首相于9月对此回答说，移民政策有利于犹太复国主义的任何根本改变将取决于美国，它要准备为维护巴勒斯坦的安全分担义务。这个条件曾在波茨坦会议上向总统建议过，但为总统所拒绝。

“抵抗”、“战斗”、“进攻”和“斗争”是8月间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上所用的关键字眼：而美国和英国政府的利益很不相同，所显示的融响也很不相同，它们就这样神经质地触动着两个单独的然而又相互联系的问题，即：

欧洲犹太人没有家园的问题，巴勒斯坦在其中东环境中的前途问题。而犹太代办处工作人员中有一批急躁的“行动主义者”，为了迫使英国政府从犹豫不决的一手转向坚决行动，同背禽犹太代办处当局的那些极端派组织的“持不同政见分子”，已开始搞阴谋策划。犹太代办处在不到上年前曾强烈地斥责极端派的暗杀活动，而后者最近一直在实施他们的威胁：“英国的欧洲胜利日就是我们的进攻日”。8月，三十七岁的摩西·斯奈博士（近在1940年他才从波兰到达巴勒斯坦，并立即在犹太复国主义党中取得一个领导地位）已被增选为犹太代办处负责人）成为那个主要的犹太复国主义地下活动准军事组织——“哈加纳”的司令，有人认为“哈加纳”约有六万名主要是为了自卫其居留地而装备和训练起来的成员。早在1915年犹太复国

---

1916年8月1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26卷，第1250—1253栏。

参阅J.C.赫尔维茨：《争夺巴勒斯坦》（J.C.Hurewitz：TheStruggleforPalestine），纽约，诺顿，1950年版，第228—229页，第231页。

乔恩·金奇报道，贝文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这两位内阁附属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回到内阁……发怒了。……他们强烈地感到：他们做了他们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朋友们最易打交道的牺牲品”〔《七根倒了的柱子》，索142页，根据“在犹太复国主义问题上英国工党的改弦易辙”（“BritishLabor'sTurnaboutonZionism”）一文，《评论》，1947年12月，第512页〕。参阅R.H.S.克罗斯曼在《新政治家与民族》周刊上的文章，1951年2月10日，第48页。

见赫尔维茨：《争夺巴勒斯坦》，第225页。当英美调查委员会在1946年2月访问这些犹太人时，有九万八千名犹太人在德国和奥地利的集中地点。韦茨曼报告1944年召开的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联合会，他们在某些条件下能许可一年十万名犹太人到巴勒斯坦，这是韦茨曼在1944—1945年访问巴勒斯坦时制定的政策的一部分（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326页；又见下文，原著第207—208页，第214页）。

1946年8月1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26卷，第1314栏。

克罗斯曼：《巴勒斯坦使命》，第201页。后来霍尔勋爵说：“要英国陛下政府考虑的……不是一个请求……而是一个要求”；“这种态度……同我过去碰到过的任何情况都不同”（1947年4月23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147卷，第107—108栏）。

老成持重的摩西·斯米兰斯基（MosheSmilansky）后来写到，“看来几乎是确实的”，英国政府准备把限额增加到每月二千五百名，“也愿意指示地方当局放松对犹太人购买土地的限制”〔“建设而非‘战争’”〔Constructionnot‘war’〕〕，《评论》，1946年12月，第533页〕。

主义者大会上，斯奈就说过。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得不发明新的方法去抵抗白皮书的全部政策。他们不得不只当这个文件并不存在那样去行动。他们不得不公然违抗白皮书的规定，而这并不意味着恐怖行动”。然而，他回到巴勒斯坦时，犹太代办处的领袖们（韦茨曼、本-古里安、谢尔托克）在伦敦同英国政府进行的谈判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斯奈与两个恐怖主义组织的那些领袖们则在达成一个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他们和“哈加纳”，可在“哈加纳”的指挥了，在进攻军事设施的行动计划上共同合作。9月23日，斯奈给犹太代办处的伦敦办事处发了一份密码电报，这是许多为英国当局所截取、破读的动象从居留地来的农民，象无害的公共机构或委员会的成员，却从事着专门任务：在政府职员、工程师和警察中，也有“哈加纳”的官员；劳工组织者、教师气出租汽车司机和其他接触到的人……

“另一天，现在的那路撒冷行政领导人，告诉我二十年颠他在‘哈加纳’的日子……如果英国警察突然侵入他们的隐藏处，他们只能发现一群学生和他们的教师，讲着天真的故事，摆着一堆书，证明他们是无罪的。”〔哈里·莱文：《严阵以待的耶路撒冷》（HarxyLevin；JerusalemEmbattled），伦敦，高兰兹，1950年版，第73—74页〕密码电报中之一，但决不是第一份。斯奈在电报中建议，如果英国政府不同意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要求，战斗组织就得制造“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以便公布于世，作为“一个警告和一个象征，暗示着会有更多更严重的政治事件要威胁一切英国利益的安全”。这个建议，显然标志着巴勒斯坦犹太社团的成员们进一步求助于组织暴力行动的一个新阶段。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当时负责在广阔的中东背景上执行巴勒斯坦政策，他在接见韦茨曼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阿卜德·拉赫曼·阿扎姆以前，一直在同来自中东的英国外交代表们交换意见。按照韦茨曼的说法，在10月5日他们举行的会议上，贝文的“开场白”196里有这么两句话：“你们打算逼我摊牌吗？如果你们要打仗，你们可以打嘛。”假使贝文说过这些话，这就可以推定，这些话是贝文对截取到的斯奈那份电报的反应，显然至少有一个犹太代办处的负责人准备利用恐怖手段胁迫英国政府。

---

韦茨曼：《磨炼与错误》，第440页。他在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联合会的一次紧急会议上讲到，犹太代办处已“通知政府，他们不能根据白皮书同他们打交道，他们总是认为白皮书是不道德的和不合法的”（《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5年9月28日，第3页）。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5年7月13日，第2页。

原文载《纽约时报》，1945年11月14日。根据前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的说法，总统的民主党顾问们已通知他，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纽约州州长杜威（该州集中了二百二十万参加犹太教礼拜仪式的教徒，更不用说不参加这种仪式的犹太人，他们在政治上可能依旧象前看那样感觉和行动），打算公开处理难民的问题〔萨姆纳·韦尔斯：《我们不需要失败》（SumnerWells：WeNeedNOtFail），波士顿，霍顿·米夫林，1948年版，第32页〕；参阅下文，原著第229页注（即本书第393页注——译者）。

这些人属于伊尔贡-兹瓦伊-卢米组织（“民族武装组织”“通常缩写为伊尔贡或伊兹一），其活动力量估计有一千人，后备队有四千人，其分支为斯特恩集团（“为以色列的自由而奋斗的战士们”），估计有一百五十到二百个危险的狂热者。参阅《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321—324页；巴勒斯坦政府：《巴勒斯坦概览》（PalestineGovernment：ASurveyofPalestine……），巴勒斯坦政府出版局，1946年版，第2卷，第601—606页。

见陆军少校R·D·威尔逊：《封锁线和搜查：1945—1948年在巴勒斯坦的第六空运师》（MajorR·D·Wilson：CordonandSearch,With6thAirborneDivisionPalestine,1945—1948），奥尔德肖特，盖尔与波尔登，1949年版，



诚然，犹太代办处内部的这些“行动主义者”表现着巴勒斯坦犹太社团内心的急躁情绪，这些社团中很可能有极大多数的人或者不得不为纳粹统治下死亡的亲戚和朋友而哀悼，或者已重新同一些侥幸活下来的人有了接触，希望把这些人引向安全。几个星期过去了，英国政府正急于谋求同美国合作，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种种过分要求和阿拉伯人拒绝放松白皮书的种种限制之间，寻找折衷办法，而犹太复国主义的“抵抗运动”却有一触即发之势。为了骚扰纳粹，曾由盟国（特别是英国）热心地在欧洲鼓励过这种抵抗运动。10月4日，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的领袖们，号召在四天以后举行半天的总罢工，作为反对继续实行白皮书政策的群众性抗议，同日，“哈加纳”的非法流动广播电台“以色列之声”，从1939年大战爆发起原已停止广播，现在又以“犹太抵抗运动广播电台”的名义重新开始广播了。同时，犹太复国主义的各个官方组织，现在通过犹太旅队以及象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美国犹太人的“分配联席委员会”等救济组织，同欧洲各地幸存的犹太人充分地建立了联系，已经积极地恢复偷运非法移民进入巴勒斯坦，一面走海路，一面走陆路；越过北部地区的边界。10月6日那天，就在边界上，搜查一股非法移民的外约旦边防军，同窝藏这股非法移民的邻近的犹太定居地居民发生了一次冲突。“哈加纳”的突击队——“派尔马契”，10日袭击了海法南部阿斯利特为移民而设的巴勒斯坦政府的调度营，释放了二百零八名被拘留的非法移民，随即由各犹太定居地吸收，并发给了伪造的身分证。12日，巴勒斯坦高级专员戈特勋爵，接见了三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领袖，其中包括加拿大出生的伯纳德·约瑟夫，他在谢尔托克长期驻在伦敦的情况下正在充当犹太代办处的政治部首脑。早在10日，伯纳德·约瑟夫已向犹太代办处伦敦办事处打了报告，汇报了犹太代办处负责人内部对于向英国当局挑战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存在着意见分歧。在他看到高级专员的那一天，有人把一个预先安排的密码答复，从伦敦以谢尔托克的名义发送给他，传达了本一古里安批准搞些“孤立行动”的指示，这样就不致同英国卷入一场总冲突中去。

---

第 48 页。

塞缪尔·罗尔班特 (Samuel Rolbant) 把他描绘为“杰出而锐利的人”，《新政治家与民族》周刊，1951年8月18日；参阅《巴勒斯坦事务》(Palestine Affairs)，1946年11月，第8页。

作为“安全事务”的专家，根据《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5年8月31日，第4页。

“哈加纳”的田史，可参阅巴勒斯坦政府：《巴勒斯坦概览》，第2卷，第600—601页；《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247页，第307页。“哈加纳”成员哈里·莱文 (Harry Levin) 后来写到“哈加纳”地下组织的许多地区精心设计的各式阴谋：“哈加纳”的一些领袖，是很少有人知道的，行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5年8月10日，第6页。

这些年青的阴谋家，“哈加纳”的领袖(摩西·斯奈)、伊尔贡-兹瓦伊-卢米(梅纳赫姆·贝京)口斯特恩集团(内森·弗里德曼-雅林)，都一道在华沙大学耽过，他们在那里是犹太学会会员之家的寄宿伙伴(见梅纳赫姆·贝京：《起义》(Menaahem Begin: The Revolt)，伦敦，w·H·艾伦，1951年版，第183—185页，第199页)。因此他们代表着继承本一古里安和谢尔托克的东欧犹太“行动主义派”的下一代，也能够暂时弥补意识形态上互不信任的裂缝，这个裂缝使“哈加纳”的社会主义者和伊尔贡-兹瓦伊-卢米的右翼分开了。

例如，见英国殖民部：《巴勒斯坦关于暴行者消息的声明》(Great Britain, Colonial Office: Palestine: Statment of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Acts of Violence)，敕令第6873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6版)，(此后简称敕令第6873号)。殖民大臣拒绝发布英国政府所掌握的关于犹太代办处和恐怖主义者之间的关系的

与此同时，在巴勒斯坦的英国军队，预料到形势不稳，正在增援之中，最显著的是第六空运师的到达，这个师是以1944—1945年的西欧战役而闻名的；为了拦截非法的移民船只，英国海军和皇家空军巡逻着海岸；并且积极招募巴勒斯坦警察的英国干部。10月份过去了，并没有得到不耐烦地等待着的英国政策的声明，但是在这个月的月底，有一些报道说，有希望设立一个英美联席委员会去调查巴勒斯坦问题。10月31日—11月1日的晚上，犹太抵抗运动发动了警告性的打击。“派尔马契”击沉了三艘用来拦截非法移民的小军舰，破坏了五十个地方的巴勒斯坦铁路的铁轨；伊尔贡—兹瓦伊—卢米袭击了卢德火车站，造成某些破坏和死伤，还有斯特恩集团对海法炼油厂进行了袭击，该厂中有一人被杀。11月1日，198犹太代办处在本—古里安和谢尔托克常驻在国外的怀况下，向伦敦办事处报告了这次一致发动的行动。他们吹嘘说：“这些行动在国内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当时官方被搞得晕头转向；“哈加纳”的秘密电台“以色列之声”公布，“阿斯利特事件以来的英雄主义之夜，是我们的力量和决心的表现”；斯特恩集团的非法刊物也宣布：“这是第一次协调而集中的攻击。犹太抵抗运动已团结了一切犹太抵抗力量，以期在一个权力的统一指挥下共同作战。”《巴勒斯坦邮报》的社论宣布：“那些答应把这片土地给犹太人作为民族之家……又威胁着这片土地上的犹太人生存的外在因素，将要受到人民的反对。因为人民认为，他们已经被迫要为他们生存作战斗了”；《犹太复国主义评论》的记者直截了当地说：“即使犹太人不能而且不要对英帝国进行武装斗争；他们一定也要表示，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政策将也是难于适用的，它甚至要比亲犹太复国主义的政策带来更大的损失。——

## 第二节 英美调查委员会及其流产报告， 1945年11月至1946年5月

巴勒斯坦英国当局并没有立即对这些挑衅行动的肇事者们起诉，因为在11月13日贝文终于能宣布美国政府已接受邀请，参与英美调查委员会这一联合组织进行合作了。贝文也宣布了委员会的受权调查范围，其内容是：

“一、调查巴勒斯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情况对犹太人移民和定居问题的影响。……

二、调查在欧洲各有关国家遭到纳粹和法西斯迫害的那些犹太人的处

---

全部证据（1947年3月3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34卷，第36栏）。犹太代办处向英国政府挑战，要英国政府作出证明，为什么敕令第6873号中所发表的那些电报的拟稿、批准或发送应由犹太代办处来负责，而本—古里安的评论是：“我并不是说所有这些文件都是伪造的，但是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人所熟知的。”（《泰晤士报》，1946年7月26日；《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6年8月2日，第8页）但是贝京又毫无保留地承认这些文件的真实性（《起义》，第183—185页）。

韦茨曼：《磨炼与错误》，第440页。

理查德·克罗斯曼在下院的一次演说中讨论了“哈加纳”和恐怖主义者之向的关系问题（1946年7月31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28卷，第1008—1013栏）；《新犹太》社论，1948年3—4月；扎赫尔：《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188页。关于“哈加纳”除自卫外试图避免牺牲的情况，见下文，原著第202页注（即木书第346页注——译者）。

境……” 199 上述权限范围，把重点等同地放在这个问题的欧洲方面秘巴勒斯坦方面，但是贝文在他的附带声明中说，在最近提出的为犹太移民大规模进入巴勒斯坦的那些要求中，英国政府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原来居留在欧洲各有关国家的犹太人，曾经成为纳粹的受害者，现在再也不能在那里生活下去而不遭到歧视了。虽然巴勒斯坦可能对欧洲犹太人问题有所贡献，但它本身并不具备解决全部问题的充分条件；英国政府对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负有双重义务，后两者之间的主张相互冲突，极易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区域里导致混乱；未经适当协商的任何急剧的政策变更，都“可能在整个中东引起种种严重的反响，并在印度激起普遍的不安”，也就是说，在印度占少数的九千万穆斯林中间引起普遍不安，当时他们还没有成为独立出来的巴基斯坦国家。英国政府不会允许用暴力冲突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就在等待委员会那些临时建议的时候，他们希望阿拉伯人同意这样一个协定，允许犹太移民继续按照现行月度限额进行下去（由 1939 年白皮书所规定的七万五千名犹太移民的明确限额，现在实际上已完成了）。贝文在结束他对下院所作的说明时，对偏袒犹太人和偏袒阿拉伯人的双方质询者们呼吁，不要继续进行种族对抗，还补充说，“我愿以我的政治前途来担保解决这个问题，但不限于目前这种有限的范围之内。”后来报社记者们问到犹太复国主义者设想大力开发自然资源以增加巴勒斯坦吸收移民的容量的问题，据报道，贝文说过，那些设想，在他看来，似乎把八分宣传同两分事实结合起来，但是专家们必须作出鉴别。他还发表了另外一个意见，后来经常被人们断章取义地引用来反对他，他说：“我非常渴望，犹太人不要过分强调他们在欧洲的种族处境。我在下院所作声明的基调是希望制止种族冲突，因此，如果那些遭受了种种苦难的犹太人，要想站在受施 200 舍者队伍的最前面大捞一把，那么，在各方面你就会都碰上另一次反犹太人的那种反应的危险。”他最后警告犹太人的武装组织，指出他们的进攻只会使他们的事业遭到误解而蒙受不利，他强烈要求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放下他们的武器。

英国政府已经明确决定，巴勒斯坦问题必须根据英国在中东利益的格局在总的方面予以考虑。虽然英国内阁的某些成员被认为一开始对犹太复国主义是表示同情的，但现在由于犹太代办处为了表达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急切心情而求助于“行动主义”，这种同情已一扫而光了。在美国，贝文的声明遭到各种各样犹太人组织、宣传部门和形形色色的政客们的大量批评。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参议员塔夫脱（一个强有力的共和党总统竞选者）和民主党参议院代理议长都支持了美国巴勒斯坦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联合主席，而这个委员会是被怀疑与恐怖主义的斯特恩集团有联系的。在纽约市举行的一次犹

---

参阅克里斯曼：《巴勒斯坦使命》，第 86—87 页。在 1945 年 6 月和 7 月的七个星期中，八千个难民通过犹太旅队在意大利的战线走向巴勒斯坦，据伯纳德·卡斯珀：《和犹太旅队在一起》（Bernard Casper：With the Jewish Brlgadc），伦敦，戈德斯通，1947 年版，第 70—90 页。

特雷弗：《在白皮书下》，第 136—137 页。关于陆上的偷运移民的组织，当时被英国方面的一个战地安全部门的军士所察觉。参阅理查德·皮尔斯：《庄列万特三年》（Richard Pearse：Three Years in the Levant），伦敦，麦克米伦，1949 年版，第 190—195 页，第 210—222 页。

最后一个字母“h”不象哈加纳中的“h”不发音，而是作尖声的吐气音发音，但是同喉音的“kh”不同；一般的英语音译是“palmach”，这在发音上是含糊不清的。这个字是希伯来文 plughtha-mahatz 的缩写，意为“突击队”。有人估计他们的人数约为二千名以上。

犹太复国主义群众大会，据说在全城二百万犹太人中有十五万人来参加；据报道，他们当中许多领导人，不仅公开赞成巴勒斯坦的“行动主义”，而且还谴责英国政府在阿拉伯各国挑起反犹太人的暴行。在巴勒斯坦，“哈如纳”的秘密广播电台“以色列之声”于11月14日作了一次号召积极抵抗的广播！为了反对犹太人，过去希特勒用杀人放火的闪电战所做过的，现在又由凤主国家通过缓慢、折磨人的政策的形式重演出来。今天我们正被赶到难以容忍的贫民窟里去生活，却是为了不使欧洲丧失它的犹太籍天才。新的建议

是反犹的，也是不近人情的。这块土地是我们的，我们要在这块土地上劳动，建设，创造，我们也要保卫这块土地。……我们号召你们起来反对这种阴谋，全力以赴，同新民主政策的那些邪恶的法令进行战斗。在此时刻我们要再次重复我们的誓言，我们要用一切力量保卫我们所最珍视的一切。201鉴于这样的煽动，发生下列事件也就不足为怪了，犹太民族会议在这一天宣布罢工七十二小时以示抗议，这给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的少数暴乱分子造成了机会，他们放火焚烧政府建筑物，抢劫英国商店，用石块投击军队和警察，结果导致特拉维夫市被置于军事占领下达五日之久。

一个美国犹太记者，于11月早些日子到达巴勒斯坦，目击了特拉维夫市的暴乱，他描述一帮一帮的犹太青少年怎样大肆破坏；他听到一个英国军官命令他的部下对准成年教唆分子开枪，但是据报道，这五天内，在犹太人伤亡总数中有六名被杀害，大约六十人受伤，其中包括二十名十六岁以下的受伤儿童。空运师的历史学家观察到，由于军队作了“坚决处理”，这种规模的群众暴乱从此就不再在特拉维夫发生了。在那一天（11月18日），特拉维夫市市长对巴勒斯坦政府秘书长抱怨说，如果早点采取警察行动，生命的损失是可以避免的，而犹太代办处英方联合秘书则面告英国犹太人代表委员会说，他们必须向英国政府提出警告：如果他们打算永远把巴勒斯坦犹太

---

敕令第6873号，电报第2号和第3号；参阅《犹太复国主义评论》，耶路撒冷记者报道，1945年10月26日，第8页。

然而根据该师的历史家的说法，要尽力设法阻止这个空运师介入内部安全任务（威尔逊：《封锁线和搜查》，第4页）。

据后来报道，设立这种委员会的决议的通告，是被推迟了，“可能是为了避免损害民主党”在纽约市市府选举中的“票数”（西德尼·赫茨伯格：“历史中的这一月”，《评论》，1946年1月，第39页）。在早些时候，据说英国政府本来打算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给早期发展中的联合国组织，但当“三大国”的外交部长所参加的伦敦会议确认了苏联政府把它的利益扩张到地中海的要水时，就改变了他们的计划（《纽约时报》，1945年9月24日和10月7日）。

敕令第6873号，电报第4号、第5号和第6号；《巴勒斯坦邮报》，1945年11月2日；《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5年11月16日，第6页。然而，秘密电报泄露出犹太复国主义领导班子内部有关“行动主义者”政策存在着长期的意见冲突。在11月2日巴尔福宣言二十儿周年的日子，埃及某些城镇的暴徒们，袭击了犹太人和一些别的外国人，对财产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个暴力运动波及到利比亚的黎波里时，使该处英国的军事当局吓了一跳，在11月4日到7日之间，有一百多个土长土生的犹太人被穆斯林们屠杀了。

1945年11月13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15卷，第1929栏。杜鲁门总统后来徒然地试图通过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去拦阻国会通过一项联合决议，类似1944年这位行政首脑曾经成功地遏止的那种决议，即支持犹太移民自由进入巴勒斯坦，以便“他们可以自由地进行巴勒斯坦的建设，把它建成犹太民族之家，并和各阶层的人民一起建立一个不分种族和信仰，人人权利平等的巴勒斯坦民主政权”（1945年12

人限制成国内的少数，他们就得“消灭每一个巴勒斯坦的犹太人”。

犹太代办处目前的清道仍是促进非法移民，这是得到巴勒斯坦犹太组织全力支持的，甚至包括那些温和派的支持：例如朱达·马格纳斯博士，他是始终如一地反对代办处的种种政治目标的，但支持非法移民。一个美国犹太报纸记者，一直劝告保持克制态度，乃至英美委员会提出其建议时，他就报道说他已经得到了答复：“我们在等待那几个民主大国的行动，而六百万犹太人已在欧洲死掉了。如果我们在冬季十指交叉地坐在这里，等他们再来调查时，将会有成千成万更多的幸存者死去的。”驱使非法移民组织者们的动力，实在就是德国难 202 之民营中的犹太人寻找一个新家园的生存需要，而这种愿望却悲惨地同托管国的意图大相径庭，后者急于想制上巴勒斯坦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不让它失去控制。一艘非法移民船在特拉维夫市北面约十二英里海面上被截获之后两夜，即 11 月 24—25 日夜里，两个有截击装备的海岸警卫站被“派尔马契”分子炸毁了，预个警卫站里的警寒先开火，“派尔马契”分子是予以还击的。警犬从海岸警卫站凭嗅觉跟踪到四个犹太定居地，英国军队就在定居地四周设置封锁线，意在搜查破坏分子。可是，犹太复国主义地方当局以为英国军队的意图在于搜查非法入境移民（估计在遭受拦截之前已有大约两百个移民从船上逃脱），并且按照这种猜想采取行动，对周围各定居地进行煽动，于是就有上万名组织得很好的犹太

---

月 17 日，《国会记录》，第 12138—12143 页，第 12165—12189 页；参阅《概览，1939—1946 年：战时中东》，第 315 页，第 318 页，第 319 页）。

由美国犹太人资助的一个经济研究项目曾经估计，“在今后十年中，移民总数的中间幅度可能降到约六十八万五千名到一百二十五万名之间”，其中犹太人占百分之九十 [ 罗伯特·R·内森、奥斯卡·加斯和丹尼尔·克里默：《巴勒斯坦问题及其前途》（Robert R. Nathan, Oscar Gass, and Daniel C. Cramer: Palestine Problem and Promise），华盛顿，美国巴勒斯坦协会公共事务出版社，1946 年版，第 399 页】。

贝文的率宜措词，尤其是他后来抱怨美国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施加影响的露骨言论（主要查阅他在 1946 年工党大会上的讲话，见《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6 年 6 月 21 日，第 3 页，以及他在下院所作的说明，1947 年 3 月 25 日，下院辩论，第 5 辑，第 433 卷，第 1907 栏），里惹起犹太复国主义者责备他是“反犹太的人物”，甚至是“希特勒衣钵的继承人” [ 弗兰克·E·曼纽尔：《美国—巴勒斯坦关系的真相》（Frank E. Manuel: The Realities of American-Palestine Relations），华盛顿，公共事务出版社，1949 年版，第 331 页；并参阅麦克唐纳：《我在以色列的使命》，第 22—24 页】。为了另作其他解释，有一种讲法把他的这种态度说成是：他作为一个工会的领导人不得不同“一小撮恰巧是共产党人的犹太人翁恰巧是犹太人的共产党人”进行斗争 [ 金奇：《七根倒了的柱子》，第 143 页，引自他原发表在《评论》（1947 年 12 月，第 512 页）上的一段文字；又见贝文本人 1947 年 2 月 25 日的发言，下院辩论，第 5 辑，第 433 卷，第 1910 栏，以及波利蒂库斯（Politieus，笔名）在《犹太复国主义评论》上的文章，1947 年 3 月 7 日，第 6 页】。不过，更有可能的是理查德·克罗斯曼后来的结论，即贝文的主要动机“并不是出于某些心理上的变态或反犹太主义的情调，而萦绕在他头脑中的却是……中东的基地问题”（《新政治家与民族》周刊，1951 年 2 月 10 日，第 148 页）。

1945 年 11 月 13 日，下院辩论，第 5 辑，第 415 卷，第 1927—1935 栏；《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1945 年 11 月 14 日。

见上文，原著第 198 页注（即本书第 339 页注——译者）。又见《经济学家》，1945 年 11 月 24 日，第 751 页，1945 年 12 月 8 日，第 828 页；西德尼·赫茨伯格：“历史中的这一月”，《评论》，1946 年 1 月，第 37—38 页。

人聚集在一起，以木棍和石块为武器阻止搜查。他们顽强的抵抗也付出了代价，至少有六人被杀，四十二人受伤，而搜查的主要结果是，在一个定居地发现有一百七十五磅以上的炸药。犹太代办处把一份“严正抗议”的海底电报发到美国，指责英国军警强行进入三个和平的犹太农业居民区。残暴殴打成百男女居民，枪杀四人，而且无理取闹地打伤多人。再者，正当保安部队庆祝圣诞节时，20在“哈加纳”周密部署的一次行动中，有一批二百五十名非法入境移民在海法登陆，并即潜入邻近的定居地。这次行动，“哈加纳”象任何正规武装力量一样，任命了一些联络官员，还同一个犹太血统的英籍路透社记者建立了经常的联系，并带他到进行战斗的地方去参观。“哈加纳遭到逮捕，警察对他们进行盘查浪费了时间，这就为新登陆的移民制造了脱逃的机会。在那些农业居民区，全体居民会阻挡英国军队进来并拒绝他们进行身分查验——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臂挽着臂，躺在地上，迫使英国军队逼着每个人单独离人群而进入围着铁丝网的场所接受搜查”（见施洛莫·卡茨，前引文）。由于抵抗带来的伤亡，经久不变地成为整个犹太世界进行恶毒宣传的题词。纳”与“持不同政见的”恐怖主义组织之间的谅解，并不妨碍恐怖主义组织的独立活动；因而经过一段平静时期以后，大概是出于对当时所公布的英美调查委员会成员名单的反响，伊-兹-卢（它作为一个报复性暴力组织，是由于英国当局不断把恐怖主义嫌疑分子放逐到厄立特里亚的英国拘留营去而建立的）于12月27日对耶路撒冷以及位于雅法—特拉维夫边界的两处公安指挥部发动了毁灭性的破坏活动，还袭击了特拉维夫的一个军火库，共杀死保安人员九人。根据伊-兹-卢领导人后来的公开证言：“哈加纳”的那些首脑人物事先已“非正式”同意伊-兹-卢的上述攻击行动。但是根据代办处发表的一项通报，本-古里安和谢尔托克则在高级专员召见时，认为这些行动“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完全无关”，并对造成伤亡一事表示遗憾，可是又说：“我们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协同制止这些过火行动所作的努力，由于当前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政策缘故，已经变得徒劳了。当巴勒斯坦政府本身就是一贯地违反托管国的根本法的时候，向犹太人所提出的遵守法律的任何号召，都会被置若罔闻的。”

犹太复国主义者深刻地体会到及时宣传的效果，将别在美国，高度组织起来的“压力集团”的行动，长期以来就是一个有力量的因素。在我们这一

---

《曼彻斯特工报》1945年11月15日。

迈耶·莱文：“儿童之战”（Meyer Levin：‘The Battle of the Children’），《评论》，1946年1月，第25—27页；参阅特雷弗：《在白皮书下》，第161—163页。

威尔逊：《封锁线和搜查》，第29页。六年后，当这里发生激烈的反对以色列政府的示威时，以色列政府的半官方机关报《耶路撒冷邮报》，指出最近三十年已经清楚地教训了犹太复国主义者，“那些准备使用暴力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为了政治目的去破坏国家法律的非法分子，在他们第一次进行威胁恫吓时，只要毫不迟疑地使用必要的武力，就能迅速加以镇压”（转引自《泰晤士报》，1952年1月9日）。

代表团是一个庄严的组织，1943年犹太复国主义者“用渗透的方法”，得以控制该组织，“引起当时广泛的敌对行动”。根据艾伦·A·施佩：“伦敦：战后英国的犹太人”（Alan A. Schper：“London：British Jewry Post-War”），《评论》，1946年8月，第163页。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5年11月23日，第4页和第9页。

见《概览，1949—1946年：战时中东》，第248页注。

I·F·斯通（I.F. Stone），在《民族》上的文章，1945年12月22日，第678页。

章所涉及的历史 204 里，在不止一次的紧要关头，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采用了一种可能使其对象都会有理由感到愤恨的手法。在关键的时候，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会突然抓住某种一个本身并不是比较重要的偶然事件，反复地大作文章，通过一些宣传渠道加以歪曲，一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又把它弃而不谈了。例如在英美调查委员会即将在华盛顿举行会议开幕式之前，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德国的英籍首脑中将弗雷德里克·摩根勋爵，在法兰克福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所作的即席讲话中，有些评论竟惹起了一场犹太复国主义者强烈声讨的大风暴。这些评论并没有逐字逐句的官方报道公开发表，但根据美联社报道，摩根说：成千的波兰犹太人自东方进入美国地区……在一个“组织严密，切实可行的计划下离开欧洲”。他相信此项渗入的幕后有一个未知的秘密犹太组织。……巴勒斯坦问题是和这种运动紧密地联系着的。……他不相信“关于波兰境内发生大屠杀的传说”。……犹太人自罗兹及其他波兰中心地区，由列车满载着到达柏林的都是“丰衣足食，面色红润，并有大量钱财。……他们看上去肯定不象遭受过迫害的人们。……未的那些人都千篇一律地谈到大屠杀的故事。”两年后犹太复国主义作家们揭露了这个秘密的真相，原来犹太人途经中欧秘密地到巴勒斯坦去的活动是由“哈加纳”所组织的；但当时韦茨曼在美国谴责摩根的讲话“显而易见是反犹太人的”；世界犹太人协会美国分会主席拉比斯蒂莎·怀斯宣称，这篇讲话不仅有最恶劣的纳粹的味道，而且令人回忆起虚构的“郇山元老议定书”；犹太电影明星埃迪·坎托在《纽约时报》上用两栏的广告地位刊登了以“我以为希特勒已死去”为标题的文章，谴责摩根；还有无线电台评论家沃尔特·温切尔宣称，“在端庄有礼的美国人能够再次对英国表示怜恤同情之前，英王陛下的政府必须摒弃这位将军，剥去他的军装。不甘 205 心被喧嚣的美国舆论所胜过，世界犹太人协会的伦敦政治秘书宣告：“摩根将军断言欧洲内部存在着

---

威尔逊：《封锁线和搜查》，第 30 页；“哈加纳”的电台“以色列之声”将这次事件归立于犹太抵抗运动。1946 年 1 月 22 日，“哈加纳”一种“地下”刊物宣称，在支援非法入境移民或袭击旨在阻挠入境的设施的斗争中，除了出于自卫外，他们要设法使自己和敌人都避免生命损失（转引自施洛莫·卡茨：“对巴勒斯坦犹太抵抗运动的理解”，《评论》，1946 年 7 月，第 47—48 页）；参阅贝京：《起义》，第 213—214 页，关于“哈加纳”抵抗“哲学”部分。

参阅威尔逊：《封锁线和搜查》，第 38 页；特雷弗：《在白皮书下》，第 164—171 页。“哈加纳”的这种行动的战术可描述如下：“当‘哈加纳’武装部队掩护犹太移民登陆时，广大犹太居民在周围转来转去，借以牵制，并在战略地点封锁可能来援的警察力量。有时他们就混在新来到的人群中间，去阻止对新来者的盘问或逮捕；久居巴勒斯坦的住户拒绝出示身分证因而

《纽约先驱论坛报》，1945 年 11 月 28 日。把英国保安部队与他们以前的纳粹迫害者等向起来，已经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常用的宣传手段，参阅 1946 年 6 月 29 日“以色列之声”广播：“……泰特斯（Titus）的肮脏的子孙……纳粹—英国政权”（转引自贝京：《起义》，第 205 页）。据第六空运师历史学家报道，当军队搜查定居地时，儿童们排列成行，在大人纵容下，放肆地“用粗话辱骂”。他评论道：“当然军队不致为此而故意地去激起仇恨的。……但是象‘盖世太保’和英国杂种之类恶毒咒骂言词，简直不可能老是置之不理；毫无疑问，有时也用辱骂回击。”（威尔逊：《封锁线和搜查》，第 59—60 页）另一方面，迈耶·莱文则在其文章（《评论》，1946 年 1 月，第 25—27 页）中记载了 1945 年 11 月在特拉维夫军事行动期间英国军队和警察人员对犹太人无休止的“中伤”与诽谤；并参阅理查德·M·格雷夫斯后来写的《无政府状态中的试验》（Richard M. Graves: Experiment in Anarchy），伦敦，高兰兹，1949 年版，第 147 页，1948 年 2 月 24 日日记摘抄。

一支犹太秘密军队，旨在撤出大批移民并送往巴勒斯坦，这不仅纯属捕风捉影之谈，而且显然是想要过早判断英美调查委员会调查的结果。”这种非难低毁是提不出证明的，是不能使人民信服的，而且也象所有这类论辩一样，只能是适得其反，叫那些诋毁制造者自食其果。

英美调查委员会的六名美方成员和六名英方成员中，有三人后来发表了个人的论述，以及几次公开会议的记录，他们都变得赞向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了。工党党员理查德·H·S·克罗斯曼系《巴勒斯坦使命》一书的作

者，为了献身于政治，他放弃了大学职务，于1945年进入国会。他在委员会工作时期所写的日记，有一部分就摘录在他那本书中，这些材料正直而透彻地分析了引起他个人思想变化的那些反应，使他的《巴勒斯坦使命》一书具有特殊的价值。《在丝幕后》的作者巴特利·C·克鲁姆是旧金山一家公司的法律顾问，也是一个“战斗的自由主义者”；他对犹太复国主义始终如一和不加批评的同情，以及他对英“帝国主义”的不信任，对国务院所采取的据说是亲英国的策略的不信任，使他成了一个不及克罗斯曼那么可靠的记者了。詹姆斯·G·麦克唐纳博士在1935年辞去了国际联盟德国难民救济工作高级专员的职务，以此表示他对国际上处理这一问题态度摇摆不定的抗议；以后他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犹太复国主义事业。1948年杜鲁门总统选中他为美国第一个出使以色列的外交使节。委员会中其他英国成员（英国方面由一位高级法官约翰·辛格尔顿勋爵率领），不论他们政治上如何忠诚，思想上却普遍有所怀疑，他们大部同意达成一个不致严重干扰英国在中东的地位的协议。值得重视的是，外交部委派的两秘书之一，便是哈罗德·比利，他早期编写的《国际事务概览》一书对战前巴勒斯坦问题的演变所作的评价，

---

金奇：《七根倒了的柱子》，第161—167页。

“他们声称，他们将试图阻止在报纸上对这次行动进行谴责。”（贝京：《起义》，第198页）贝京又称，在此时期，哈加纳—伊-兹-卢联合会议一般是每两星期举行一次（同上书，第188页）。

戈特勋爵在11月初辞职后不久死去。接替他的是陆军中将艾伦·坎宁安爵士，他担任高级专员一直到托管期满。作者听到过负责方面的评论：戈特习惯于在那路撒冷街头安步当车，而他的后任（也应该承认情况越来越糟）出门须乘坐防弹汽车，并由装甲车保卫——对比起来，前后两任政权的特征于此可见。

《曼彻斯特卫报》，1945年12月29日。在犹太代办处负责人中，唯一留下来的非犹太复国主义看的犹太人代表，于12月24日向韦茨曼递送辞呈时指出：“我的多数同事……以及象西尔弗博士那样的人们，或是被群众的情绪牵着走，却没有去影响引导他们，或是应对造成或煽动群众有害的政治姿态负责，而不是象一个政治家那样去指导他们。”[参议员沃纳博士（Dr. Werner Senator），原文载《评论》，1946年10月，第384—386页]

参阅爱德华·哈利特·卡尔：《新社会》（Edward Hallett Carr：The New Society），伦敦，麦克米伦，1951年版，第74—75页。

转引自西德尼·赫茨伯格：“历史中的这一月”，《评论》，1946年2月，第44—45页，其中有段评论说：“过去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说犹太人是为了穷困和饥谨才逃亡的。他们之所以逃亡，或者人们认为他们之所以逃亡，是为了图活命或为了不致变成疯子。当波兰反对犹太人示威行动尚未采取大屠杀时，从身心两方面来看，都不难理解为什么前途迷惘的波兰犹太人最迫切的大事是，放弃本国国籍，移居到国外去。”有关最近犹太“企业家及中层阶级”从共产主义罗马尼亚移居国外的情况，参阅亲犹太复国主义分子豪尔赫·加西亚-格拉纳多斯：《以色列的诞生》（Jorge Oarcia-Granados：The Birth of Israel），纽约，诺夫，1948年版，第226页。



曾遭犹太复国主义者强烈抨击。辛格尔顿以外的另一位主席，即美国方面的首席代表联邦巡回法庭法官哈奇森，是一个不落陈套的得克萨斯州人，他在自己的工作经历中流露出对外境困难的外侨的同情，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信奉《旧约全书》的基督教徒”，因此，在他的同僚中，至少有一部分是本能地对英“帝国主义”感到不满的，还有一个美国犹太记者指出，总统对美方成员的遴选，普遍地受到赞赏。

美国成员之一的威廉·菲利普斯，战时曾任罗斯福总统驻印度特派代表，他过去没有接触过阿拉伯世界，所以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当美方提议咨询调查应在华盛顿进行时，英方感到有些“烦恼和猜疑”，认为从工作一开始，他们就会遭到犹太复国主义宣传的“全力冲击”。可是据克罗斯曼称，委员会美方成员中那些头脑比较客观的人对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提出的“极权主义”要求，也感致震惊。克鲁姆后来记载了（如他当时所报道的那样）他在华盛顿，也在委员会跨越大西洋的航程中，听到国务院的代表们以及英国外交部哈罗德·比利对他的告诫而感到惊奇，他们认为委员会不可能摆脱强权政治的影响去考虑同巴勒斯坦与犹太难民有联系的种种问题，相反地，委员会所要作出的是必须在某一地区付之实施的决议，而这个地区早已是大国强权的争夺中心。事实上，苏联在波斯阿塞拜疆所操纵的：“民主政变”的冲击才 207 只有一个月，而苏联宣传机器已经开始了一场既反对土耳其政府又反对英—伊石油公司的“神经战”。

当阿拉伯人和亲阿拉伯的发言人同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在华盛顿和伦敦也过甚其词地强调他们自己那方面的理由时，克罗斯曼正从伦敦的那些意见听取会（1946 年 1 月 25 日至 2 月 1 日）出来，带着一种“奇特的气愤之感”。他说，他的同事们也有同样的感觉。这种气愤是因某些犹太人所提出的那种双重要求、“双重忠诚”而引起的。这些人不去巴勒斯坦，但期望既把巴勒斯坦划给犹太人作为他们的民族之家，又同时期望“在每一个民主国

---

见马克·维希尼策著：《平安定居》（Mark Wischnitzer：To Dwell in Safety），费拉德尔菲亚，美国犹太人出版社，1848 年版，第 278—279 页；特雷弗：《在白皮书下》，第 143 页；克罗斯曼：《巴勒斯坦使命》，第 91—95 页，附有评论：“将军的谈话内容距离事实甚远”。

转引自赫茨伯格：“历史中的这一月”；参阅《福雷斯特日记》，第 544 页，第 546—547 页。

《曼彻斯特卫报》，1946 年 1 月 3 日。

一个美国非犹太人评论家警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说，“每当事件出现变化时就歇斯底里大喊大叫，可不是对待朋友和影响人民的好办法。”（乔治·菲尔丁·埃利奥特的话，转引自赫茨伯格：“历史中的这一月”，第 47 页）摩根将军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上司们立即要求他辞职，但是摩根拒绝了；一月底，他在华盛顿与总署署长赫伯特·莱曼（曾任纽约州州长）会晤几次之后，他对于他的谈话所引起的误会表示“深切的遗憾”，而他的任命则得到了确定，只是在同年 8 月才由继任署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曾任纽约市长）将他调任其他职务。

克罗斯曼在委员会大部分工作时间内，对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要求，采取比较含蓄和缓的态度，他在 1933 年以前对德国所作的几次访问中结交了一些犹太知识界朋友，而在德国解放以后，他也曾亲眼目睹达豪集中营的恐怖情况（《巴勒斯坦使命》，第 15—16 页，第 18—22 页）。

《在丝幕后》[（Behind the Silken Curtain），纽约，西蒙与舒斯特，1947 年版]一书的序言中，克鲁姆（Crum）“自豪地”断言：“这决不是一部兴趣索然的著作”，他特别对美籍犹太复国主义作家杰罗尔德·弗兰克在编写方面（序言第 6—7 页）“给予的卓越的帮助”表示深厚的谢意。他自称他了解到国务院在开始时是反对杜鲁门总统选他担任委员会成员的（同上书，第 4 页）。

家里都有一个分开来的、特有的犹太人社会”。他们既主张自己是犹太人，同时又要求人家承认自己是非犹太民族的国家中的公民；“既要忠于他们现在所住的国家，又要忠于他们的民族之家”。委员会的下一步动向，对于他们的情绪和想法肯定是会发生很大影响的，因此，如果这下一步不是按照委员会的权限办事的话，那就会遭到批评了。在规定委员会的各项工作清单中，委员会的授权范围中也提到“在调查欧洲的犹太人难民的处境之前，要先调查巴勒斯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情况对犹太人的移民和定居问题所产生的影响”。原来的设想是，仔细制定这些权限内的各项工作，就是要按照规定严格执行。可是，由于改变了授权范围指示的先后次序，委员会反而在此阶段先访问了欧洲。这就使委员会在访问巴勒斯坦和中东之前接触了无家可归的犹太难民，遭到巨大的感情上的冲击。他们在德国和奥地利的难民集合地点看到几乎足足有十万名犹太人的幸存者，物质生活条件虽差强人意，但由于长期来在这些地方深受拘留之苦并亲身

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种种恐怖，以致精神状态越来越走下坡路。犹太复国主义的理想，就成了抵制这种精神状态的在组织和自我约束方面积极的力量源泉。虽然实际上所有的幸存者首先都渴望在某种新的环境开始新的生活，但对其中约有百分之七十的人们——大部分都是从集中营中活了下来青年人来说，除了以色列的土地（巴勒斯坦）而外，其他避难的地方是不能想象的。委员会的权限 208 范围允许它发表一个临时性报告和其他种种建议，因此敏感的克鲁姆提议，委员会应该干脆建议，允许这十万名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但委员会大多数成员表示反对：

认为还没有踏进巴勒斯坦，还没有研究当地形势，就接受这么个整数，这会给阿拉伯人以合法控告的理由。大多数英方在员诚然希望对犹太人从东欧渗入这一事实及时引起注意，因为这正在增加向巴勒斯坦移民的压力。两名英方成员，包括两主席之一的英方主席在内，要求英美双方政府注视这个反常现象：虽然来自东欧的渗入正在受到德国美占区的怂恿，而英占区执行的却是阻止渗入的政策。克鲁姆因为他所提出的关于立即建议让移民入境的要求未被接受而恼火了，甚至以辞去委员会的职务来要挟，只是由于杜鲁门总统提出不应有临时性报告或建议的咨文，他的气恼才被平息下去。

在开罗，委员会听取到阿拉伯国家联盟观点的一个不妥协的表态，即：犹太复国主义者除了它在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里处于少数民族地位的权利

---

犹太代办处发表了它的两份呼吁书：《拯救巴勒斯坦》（Palestine to the Rescue）和《难民向何处去？》（Where Can the Refugees Go?），分别在 190 年和 1945 年发表于伦敦。

代表团一行场达纽约的那天，克罗斯曼在他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述：“我们感觉到犹太民族之家整个概念是英国必须摆脱的一个死胡同……阿拉伯独立最终必须予以承认。”（《巴勒斯坦使命》，第 25—26 页）

见 L.B. 纳米尔：《战斗》（L.B. Namier: Conflicts），伦敦，麦克米伦，1942 年版，第 109—119 页，《概览，1938 年》，第 1 卷的一篇评论的重印本的一部分。哈罗德·拉斯基教授要对比利进行攻击：见《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8 年 10 月 1 日，第 3—4 页。

见 I.F. 斯通在《民族》上的文章，1945 年 12 月 22 日，第 678 页。对委员会成员性格所作的简短的评价，见克罗斯曼：《巴勒斯坦使命》，第 23—25 页，第 29—31 页及克鲁姆：《在丝幕后》，第 3—11 页。

见克罗斯曼，前引书，第 22 页，第 47 页（1946 年 1 月 13 日日记摘抄）。

见克鲁姆，前引书，第 7—8 页，第 31 页，第 33 页，第 35—36 页；并参阅克罗斯曼，前引书，第 49—56 页，题为“美国强权政治”（“American Power-Politics”）的那部分。

以外，他们在巴勒斯坦没有任何其他权利；这个表态在3月6日传到了耶路撒冷。1月17日，贝文通知联合国大会，他的政府的意图要在不久的将来把外约旦变成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并予以承认。过去，巴勒斯坦委任统治书第二十五条规定了外约旦的特殊地位，1922年英国就援用了该条规定，说对外约旦不适用委任统治书有关在巴勒斯坦促进建立犹太人民族之家的那些规定，并且以后又说在外约旦不适用英国—外约旦所签订的、有关巴勒斯坦走向自治政府的总方向的各项规定。现在，上述英国政府的意图总算是向前迈出了合乎逻辑的一步。联合国大会托管209委员会相应地接受了英国的建议。但是，另一方面，犹太复国主义者从来不承认外约旦不包括在他们可能建立他们的民族之家的那个地区范围之内；的确，按照他们的名词解释，约旦河仅仅把“东巴勒斯坦”从“西巴勒斯坦”

划分开来，而并不是巴勒斯坦的一道边界线；因此他们强烈抗议使外约旦独立的建议。

February 20, 1928), 敕令第 3488 号 (伦敦, 英王陛下文书局, 1935 年版); 《联合王国与外约旦之间的协定, 辅助条款 (指对前面的协定), 耶路撒冷, 1934 年 6 月 2 日》 [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rans-Jordan, Supplementary (to the foregoing), Jerusalem, June 2, 1934 ], 敕令第 4999 号 (伦敦, 英王陛下文书局, 1935 年版); 外约旦阿卜杜拉国王:

《回忆录》(King Abdullah of Transjordan: Memoirs), 伦敦, 凯普, 1950 年版, 第 220—221 页。

1939 年白皮书所准许的七万五千名犹太移民到这时已经额满, 高级专员根据伦敦方面的指示, 谋求同巴勒斯坦政治领导者们就继续移民这件事达成协议, 在英美委员会作出新的建议之前, 暂时按照每月移民一千五百名的现行定额进行。可是, 阿拉伯国家联盟所宣布的联合抵制犹太复国主义商品的运动, 就在这年年初付之实施, 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导者们在移民这个重大问题上也就拒绝作出任何让步。与此同时, 那些犹太恐怖组织据传在“哈加纳”默许下继续进行他们的破坏活动, 以抗议对非法移民的拦截。1月28日,

---

见上文, 原著第 21—27 页和第 58—61 页。

克罗斯曼:《巴勒斯坦使命》, 第 73—74 页。

克罗斯曼:《巴勒斯坦使命》, 第 76 页。在这节文字中, 克罗斯曼谈到另外两类犹太人: 彻底的同化主义者和到巴勒斯坦去的具有民族意识的犹太人。但他指出, 从经济上和道义上支持民族之家的犹太人, 虽然继续居住在别处, 还是“构成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大多数, 也是除苏联以外的世界犹太人的大多数”。

另一方面, 1947 年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推迟了访问欧洲难民的日期, 直到它在巴勒斯坦及阿拉伯各国开过听取意见会以后。

见克罗斯曼:《巴勒斯坦使命》, 第 85—86 页, 第 90—91 页, 并参阅克鲁姆:《在丝幕后》, 第 79—127 页。

克鲁姆因脱离委员会其他成员单独行动, 未经许可而接见记者并从个人印象出发, 发表有关“难民”处境的谈话而遭到指责。事后他强调(前引书, 第 121 页, 第 127—128 页), 他所提出的准许难民迁入巴勒斯坦的及时建议, 曾得到与他同在德国集中营访问的英国成员的支持, 并包括克罗斯曼在内; 但克罗斯曼(见前引书, 第 105 页)的意思似乎与此相反。

关于这些人员事实上是否处于危险境地的论争, 见上文, 原著第 204 页和注 (即本书第 300 页和注——译者)。波兰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多次局部冲突终于激化为大屠杀, 煽动其事的原委不明。据报道, 1946

巴勒斯坦政府相应地公布了保卫治安的补充条例，对参与恐怖主义者的袭击，或“系任何集团成员而该集团的个人或多人犯有本条例所规定的罪行”，或非法持有或制造枪枝、弹药、炸弹、纵火物或炸药者，一律予以严惩，直到判处死刑；而在该项条例有效期间，高级专员有权把任何人驱逐出巴勒斯坦或拒绝他入境。不管怎样，高级专员在30日相应地宣布了每月移民定额将暂时仍保持一千万名。次日，犹太社团对继续限制他们自由移民及购买土地举行了罢工抗议，并作了这样的决定：假使白皮书的限制不取消，“对其余的以色列人进入巴勒斯坦的大门不敞开”，那么，他们就绝不罢休。犹太代办处继续按月接受到奶的入境人员，这样，在多事的欢年，有二万一千名犹太人（或现有人数的百分之一）合法进入巴勒斯坦。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则于2月2日举行罢工，抗议这种不照白皮书所严格规定的条文办事的背离行为，虽然大多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白皮书公布时曾认为规定很不适当，但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迁，白皮书已演变成为他们渴望争取独立的依据。而准许被放逐了的穆夫提的亲戚贾马勒·侯赛尼重返巴勒斯坦，这事也使他们感到欣慰；贾马勒·侯赛尼是1941年伊拉克政变之后被俘，拘留于罗得西亚的。

英国军事当局企图使用德国战犯在巴勒斯坦南部兴建军事设施的声明，遭到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强烈攻击，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搞这些军事设施是英国在加强它的统治权力。而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的常务理事也会提出抗议：“任何德国人以任何原因进入巴勒斯坦”都是“一种粗暴的挑衅……一种很可能扰乱国家治安的行动”，这种“治安”实际上早已被破坏了，那是由于“哈加纳”重新与恐怖主义者勾结起来，一再联合袭击那些用以对付非法移民的军事设施。2月20日，“派尔马契”炸毁了海法雷达站，八名皇家空军人员受伤；两天以后，对巴勒斯坦别动队（巴勒斯坦警察的一种特殊组织）的三个营地同时进行了袭击；25日，伊-兹-卢与斯特恩集团破坏或摧毁了三个飞机场上的十五架飞机，估计造成英国损失七十五万英镑。”哈加纳”通过散发小册子及其“地下”电台的广播，为“犹太抵抗运动”参与这些行动而大吹特吹。

---

年7月5日在基埃尔策有三十六名犹太人被杀害。

克鲁姆：《在丝幕后》，第128—129页；克罗斯曼：《巴勒斯坦使命》，第105—106页。

关于阿拉伯国家联盟要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中间，在穆夫提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建立统一阵线的种种意图，参阅赫尔维茨：《争夺巴勒斯坦》，第233—235页，第239—240页。

见《概览，1925年》，第1卷，第361—363页；英国外交部：《英王陛下与外约旦埃米尔之间的协定，耶路撒冷，1928年2月20日》（Agreement between His Majesty and the Amirof Trans-Jordan, Jerusalem,

联合国大会：《正式记录》，第一届大会，第1部分，第167页，第591页。1946年3月22日，外约旦正式独立；见英国外交部：《联合王国与外约旦同盟条约，伦敦，1946年8月22日》

（Treaty of Alliance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rans-Jordan, London, 22nd March, 1946），敕令第6916号（伦敦，英主陛下文书局，1946年版）。

见摩西·斯奈：“什么是事实真相呢？”（Moshe Sneh：“What are the Facts？”），《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6年2月15日，增刊，第1页。

“我们总是期望这样的一些安排，使犹太定居地在外约旦境内有可能存在，并且允许它们与巴勒斯坦共同发展。这是犹太代办处可以发动，并和外约旦境内的阿拉伯人一起来完成的。这同时会使犹太人的定居地有可能发展，并改善居民处境条件，我们在继续维护联合托管中看到通往共同发展的大门敞开着。我们从

尽管对巴勒斯坦政府采取挑战蔑视的态度，曾经长期负责“哈加纳”和民族自卫工作的本-古里安（据笔者国前所知，这个情况后来已经证实而未加否认）还是在3月11日第一次出现于耶路撒冷英美委员会面前，他显然表现得不够坦率，以致克罗斯曼在他的日记中作了不利于他的评论，也导致了本-古里安本人再度被传至耶路撒冷英美调查委员会，出席3月26日的最后一次质问，由两主席之一的英方主席进行了法律上的质问。这次活动的逐字逐句记录，无须再加评论：

辛格尔顿：……“哈加纳”是设在犹太代办处之下的吗？

本-古里安：我并不曾谈到过它。“哈加纳”是一个希伯来字，字义是“防卫”。

问：它是个某种类型的团体吗？

答：我认为在巴勒斯坦有很多防卫国体。

问：不要把它说成一种想象的事物，我们在这个大厅里曾听到属于军事组织性质的团体，就用“哈加纳”这个名称，它是设在犹太代办处之下的吗？

答：我不认为有取名“哈加纳”的这样一种组织。我只认为在希伯来语中，“哈加纳”这个字的字义是“防卫”。在巴勒斯坦当然有犹太人的防卫组织，我相信到处都有。我可以肯定在每一个犹太人社团中都有这样一种组织。

问：这种组织是设在犹太代办处之下的吗？

答：不，它是在巴勒斯坦犹太人之下。……犹太代办处所从事的工作非常多——这是一个属于防御和安全的问题，时常要求英国政府加强殖民地、定居地、城市的安全。……

问：……那末，“哈加纳”并不是在犹太代办处某种形式控制之下？是吗？

答：不，代办处并不从事于任何非法的或任何秘密的活动。问：我没有问你那个问题，我问你的只是这个问题：“哈加纳”“是”或者“不是”处于犹太代办处的某种形式控制之下？答：我可以奉告的是关于代办处的事，但不是关于212“哈加纳”的事。我在这里代表犹太代办处，并不代表“哈加纳”，我也只可以就代办处作答。代办处同在这个国家里的犹太人的任何非法或任何秘密活动毫无关系，因此也就同任何秘密组织毫无关系。

问：本-古里安先生，你必须明白，你答非所问……“哈加纳”是处于

---

没有把约旦河对岸适宜于定居和发展的那一片片广阔、荒芜而又未经耕种的土地，放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外。”（谢尔托克的话，1946年1月24日，引自1946年1月25日《巴勒斯坦邮报》）修正派与伊-兹-卢继续要求全部并吞外约旦；《纽约时报》的萨姆·波普·布鲁尔写道：“除去已故的朱达·L·马格纳斯博士以外，本记者在巴勒斯坦所访问过的犹太领袖从来不曾强烈地批评过那种奢望。”见《中东杂志》，1951年冬季，第114卷；查冈肯尼思·W·比尔拜：《近东的新星》（Kenneth W. Bilby: New Star in the Near East）。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6年1月4日，第1页）将联合抵制运动描述为“发疯的民族主义”，同时巴勒斯坦政府因未宣布抵制运动是非法的而受到指责。在开始的头三个月当中，巴勒斯坦运往履行联合抵制运动国家的出口物资，与1945年第一季度价值相比较，约减少百分之三十一，但从西方依然很难得到的那些犹太产品却使黑市交易随之而起，另外阿拉伯“知名人士”出现于犹太医院，向医术高明的犹太医生求医的事情仍时有发生。

见贝京：《起义》，第196—198页。

犹太代办处某种形式的控制之下吗？

答：据我所知，尚无这样一种组织处于犹太代办处的控制之下。

问：你回答我的问题了吗？

答：是的，先生。

问：那末你是在说，“哈加纳”不是处于犹太代办处某种形式的控制之下吗？

答：……它不受犹太代办处的控制。

问：谁支付它的经费呢？答：先生，我不知道。是巴勒斯坦的那些犹太人吧。问：是通过犹太代办处这样做的吗？

答：先生，不是，我告诉你了，不是。

问：在你的帐目中，有用于防卫组织开支的吗？

答，是的，有很多。问：很好，我可以认为犹太代办处同“哈加纳”组织毫无关系吗？

答：毫无关系，先生，那是一个秘密组织。就防卫来说，有关系。“哈加纳”这个字有双重含义。“哈加纳”这个字的字义是防卫，但当你提到“哈加纳”时，是指一种秘密组织的专门名称。我们同防卫是有关系的；但同名称叫做“哈加纳”的组织，没有关系。

问：你可以把我问你的问题看作是就最广泛的可能含义而言的。犹太代办处同“哈加纳”有任何关系吗？

答：我已告诉你了，没有关系，就防卫而言，有的、因为“哈加纳”也含有“防卫”的意思。无论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发言人，还是阿拉伯的发育人，在那路撒冷所提出的论据都无非是些老生常谈，因为不在场的穆夫提及其被送回来的仆从贾马勒·侯赛尼这两个人物，都有势力去威胁任何可能持不同政见的阿拉伯人，而在犹太社团中间后来有一种说法是：“有人下了严格的命令，除了按照‘官方路线’以外，任何人都不得作证。”委员会的各个部门在其他那些阿拉伯国家中举行 213 了意见听取会，它们以一种令人回想起那些极权主义国家的传统做法，把当地一些犹太社团的代表们带到意见听取会上来，使他们顺从地去证实：他们对当前的地位是满足的，也并不希望移民到巴勒斯坦去。委员会在洛桑起草报告时，显然只有克罗斯曼和克鲁姆赞成把巴勒斯坦分割为一个处于地质肥沃的低地的犹太国和一个处于亮地的阿拉伯国。但是委员会中的大多数人，因为考虑到这两个在政治上敌对的社团在经济上的根互依赖关系（毫无疑问，还考虑到苏联对中东北部边缘地区的

---

贝文 1947 年 2 月 18 日在下院的发言，下院辩论，第 5 辑，第 433 卷，第 986 栏。虽则犹太复国主义者抨击移民限额象一股“细流”，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每年移民人数和总人口的比率，在 1914 年以前仅仅例外地超过百分之一，此后，就再也没有接近过这个数字 [ 见威廉·S·伯纳德：《美国移民政策》（William S. Bernard: American Immigration Policy），纽约，哈珀，1950 年版，第 158 页，表 37 ]。

参阅《概览，1938 年》，第 1 卷，第 465—466 页。

关于这一阶段的阿拉伯政治局势，见赫尔维茨：《争夺巴勒斯坦》，第 239—242 页。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6 年 3 月 1 日，第 1 页；参阅特雷弗：《在白皮书下》，第 189 页。

根据贝京：《起义》一书，第 93 页，摧毁或破坏的飞机数目是“成打的”。

敕令第 6873 号，第 7 页，并参阅特雷弗：《在白皮书下》，第 179 页，第 186—187 页。在袭击一处巴勒斯坦别动队营地时，“派尔马契”有四名青年成员丧生，这事引起了对“哈加纳”的广泛公开的批评；显然为了反击这种批评，犹太代办处为他们举行了公葬，同时所有希伯来文报纸都刊登了他们的讣告（贝

压力），全不顾以往十年来所有的经验，还始终抱着希望，认为如果能从美国获得一个更大的合作方案，作出担保使好斗分子不从国外接受财政上和物质上的援助的话，就能设法导致这两个集团和平共处。委员会回想起：1938年的英国分治委员会在两个地理上纠缠在一起的社团之间决定一条公正的分界线曾遭到巨大的困难，一方面即便分治这种设想也会引起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各国的反感，而另一方面，犹太复国主义者则很可能拒绝任何一个不给他们许多新的地区作为定居地的分治方案。由于心中有着这些事实，英国的官方意见事实上对这种没有美国撑腰而试着去强行分治的想法，就表示了畏缩。当时正赶上这样一个当口：苏联政府在积极从事“神经战”，想把上土耳其和波斯降低到卫星国的地位，而列万特各国和埃及则在要求英国军队全部撤离，因而使英国继续在巴勒斯坦占有一个基地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因此，英国就渴望在阿拉伯各国和英国的关系上避免发生214纠纷。这两个分治问题的鼓吹者最后表示服从多数人的意见，而那个报告就在4月19日由全体一致同意签署，“以备在4月30日到5月1日的午夜发表。虽然报告对巴勒斯坦问题各个方面的评价，特别是在犹太复国主义经济不稳定这方面，含有许多健全的意见，报告中提出的建议显然试图使所有各方都感到有所满足，把它们的提议四平八稳地凑在一起，作为这个问题的一种“解决”办法。建议提出立即发放十万张犹太难民的移民许可证，但是摒弃了赞同托管制的一个犹太大国或一个阿拉伯国的想法；建议要求援助犹太移民和取消对犹太人购买土地的种种限制，但是也要求撤销那些由犹太国民基金会提供经费的企业单位不得雇用非犹太劳动力的法定禁令；建议鼓励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但是也注意到犹太复国主义者利用约旦河水源进行大规模灌溉而制订的雄心勃勃的计划，需要得到阿拉伯邻国的自愿合作。最后，根据英国的坚决主张，建议提出还应该予以明确的是：毫无疑问对我太人和阿拉伯人说来，任洞一

---

京：《起义》，第192—193页；参阅《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6年3月1日，第1页）。

L·阿维格多：“‘独立日’的戏剧”（L·Avigdor：“The Drama of Independence Day”），《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9年4月29日，第4页。

“他似乎想要两者兼得，一面按照法律条文规定，保留代办处主席的职务，一面默认恐怖行动，作为向管理机构施加压力的一种方式。……爱尔兰领导者们决定转入地下：他们公开向英国宣战。我不了解为什么本·古里安不能再明智一些，采取爱尔兰人同样的行动，要不就接受韦茨曼以及那些稳健分子的领导，后者真正坦率地把使用武力看成是一种错误。”（克罗斯曼：《巴勒斯坦使命》，第139页）关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因“两面政策”而丧失信誉，可参阅阿瑟·凯斯特勒：《许诺和兑现：1917年至1949年的巴勒斯坦》（Arthur Koestler: Promise and Fulfilment: Palestine 1917—1949），伦敦，麦克米伦，1949年版，第137—138页。

据后来透露，在三十年委任统治期间，犹太代办处的主要财政机构犹太建国基金会 [ 伊斯雷尔·利恩：《犹太复国主义运动》（Israel Cohen: The Zionist Movement），伦敦，马勒，1945年版，第179页] 在“全国性组织，的伪装下，花在防卫方面的款项达二千七百万英镑 [ 见M·埃斯科尔斯基：“国家筹建基金会”，《以色列与中东》（M·Eskolsky：“Foundation Fund of Statehood”，Isrheand Middle East），1950年6—7月，第101页。

《英美调查委员会的公开讯问记录》（Public Hearings before the Anglo-American Committee of Inquiry），耶路撒冷，1946年3月26日，油印本，第12—14页。据一个目击者为一家基本上偏袒犹太复国主义的周刊所作实况报道中称，他观察到“在整个过程中，摩西·谢尔托克正好坐在目击者之后，面色苍白；不时拉扯本·古里安的衣袖，并与他小声耳语” [ 《中东时报》（耶路撒冷），1946年3月28日 ]。

方试图以暴行威胁，以恐怖主义，或者以组织或利用种种非法武装部队去阻止本建议的执行，则任何一方的这种行为，将要受到坚决的压制。

此外……在镇压恐怖主义和非法移民方面，在维持整个巴勒斯坦的法律和秩序方面（这对包括新移民在内的各方的私益说来，都是必要的），犹太代办处应立即重新恢复其与委任统治国的积极合作。

克罗斯曼和委员会中美国委员的观点是/用武力解除犹太人的武装这一尝试，只会加强恐怖主义者的地位，并且还会牵涉到承担较之迅速而果断的贯彻执行这个报告远为巨大的军事义务、但是正当苏联在中东北侧进行着“神经成”的紧要关头，而英国又正在试图与埃及拟订一个新的条约时）=美国拒绝分担责任同落实报告搞在一枘起，，就会牵涉到英国政府（象克罗斯曼所承认的）重新检查其整个中东政策。克罗斯曼的估计——认为犹太社团地其不公平待遇一旦被纠正对、就会压制恐怖主义者并忠诚地与英国合作一大概没有充分考虑到犹太复国主义看胁迫些不可妥协的要求，也没有充分考虑到要满足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要求，就不可能不促使阿拉伯各国同样不可妥协的各派政治力量方面发生亲苏反应的危险。“尽管一再紧急请求”，贝文仍不愿与克罗斯曼以及他的一名英国同僚在未来的几个月中间讨论这件事。根据克罗斯曼的说法，内阁只是在英美委员会的那个报告经过军政官员们所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苛刻地分析了以后，才对那个报告加以考虑的。4月25日，这些深思熟虑还在继续酝酿，一次恐怖主义袭击却在特拉维夫的一个军车停车场上发动了，该场有七名士兵被猝然捉住并杀死，这就坚定了英国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意见。此外，克罗斯曼还承认，杜鲁门总统在4月30日公布英美委员会报告时发出的信件，在英国造成了“可悲”的影响。该信件把委员会所提出的有利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一切建议，都作为“当前的一些目标”来欢迎，却把另外那些建议作为“需要仔细研究，而且我还要进行周密考虑的长期政策问题和国际问题”来摆脱。欧内斯特·贝文的传记作者报道，杜鲁门的信件使贝文陷入了“我所见到的最厉害的狂怒”。他立即向华盛顿递交了一份抗议，而克罗斯曼说，艾德礼在5月1日在下院所作的一个声明中的反应也是“极端尖锐的”。首相“非常合乎分寸地”反对216总统

---

摩西·斯米兰斯基 [公开赞成同阿拉伯人采取妥协办法的伊胡德 (Ihud) 小集团的著名成员]：“英美报告指出了道路”（“The Anglo-American Report Points the Way”），《评论》，1946年7月，第5页；参阅《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248页注，伊胡德小集团的领袖朱达·L.马格纳斯博士带了一些更为温和的建议出席了委员会，根据报道，这些建议给委员会以深刻的印象，对于它们的建议有很大的影响。马格纳斯博士和马丁·布伯所提出的证据已发表于朱达·马格纳斯和马丁·布伯：《阿拉伯—犹太的统一》（Judah Magnes and Martin Buber: Arab-Jewish Unity），伦敦，高兰兹，1947年版。

见克鲁姆：《在丝幕后》，第238—249页。

见克罗斯曼：《巴勒斯坦使命》，第176—179页。

这种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是1946—1947年英联邦的建议的基础，也是1947年为“经济上联合的分治”作出的联合国计划的基础（见下文，原第223—224页，第245—246页）。

当时委员会建议还在执行之中，英国关于英美共同负责维持日耶斯旦秩序的提议，因没有得到美国委员会的好感而被撤回（见克罗斯曼：《巴勒斯坦使命》，第185—186页；麦克唐纳：《我在以色列的使命》，第22页）。

见赫尔维茨：《争夺巴勒斯坦》，第246—247页。



对委员会建议的挑剔态度，他希望知道，履行那些建议附加的军事责任和财政责任，英国将分担到什么程度，他还宣布，除非在解散巴勒斯坦的“非法军队”并缴械以后，英国政府硬是不能承认这么一大批移民，尽管这十万名原来是由韦茨曼作的计划，为杜鲁门总统所赞同也为委员会所采纳的。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同样必须立即解除武装，同时必不可少的是，在压制最近对英国人的生命和军事设施进行猛烈袭击那方面，犹太代办处应“发挥积极作用”。

亲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各界人士，强烈地批评英国政府把发放建议中的十万张移民许可证同解除犹太复国主义非法组织的武装这样牵连在一起，他们辩论说：因为委员会的报告从来没有这样的使这一个建议取决于另外那一个建议的。人们一定会回想起，英国政府可不象它的批评家们和委员会，它通过所截取的密码电报，是完全能明白犹太代办处的负责人和4月25日刚犯过“残酷谋杀”罪的恐怖主义者还在继续进行经常的勾结的；因此，它既不倾向于把“哈加纳”和“持不同政见分子”所各自遵守的关于暴动的不同道德概念区别开来（这种区别是克罗斯曼和其他关心于陈述犹太复国主义的情况的人们所划分的），又不倾向于相信“哈加纳”会一心一意地把那些恐怖主义分子们限制在某些范围以内。5月3日，“哈加纳”的“地下”电台“以色列之声”谴责英国政府把移民问题和解除武装问题牵连起来，“只是想妨害和竭力避免实行报告中……的有效建议”。5月7日，“哈加纳”司令部通知伊尔贡-兹瓦伊-卢米的领袖，为了使英国政府撤销关于解散非法组织的坚决主张，犹太复国主义者正在对美国施展影响，要美国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5月12日，当英国政府有条件地向埃及政府提出英国军队全部撤出埃及时，“以色列之声”发表了一个由谢尔托克授权的挑战性的广播。在这个广播里，犹太抵抗运动对英国政府“以错误设想为基础的……策略”发出了警告。英国政府设想以巴斯坦取代埃及作为它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而又不履行其委任统治国的责任，一如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所解释的那样。如果英国政府继续在英美委员会“不冷不热的结论”上摇摆不定，特别是在允许十万名217移民问题上犹豫不决，犹太抵抗运动将“尽一切努力去阻挠英国的基地转移到巴勒斯坦，并阻止他们在这个国家把基地建立起来”。

---

见上文，原著第106—111页和第119—120页。需要减少英国在埃及的庞大战时基地并从近东诸国撤离，或许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其重要性不亚于为了维持巴勒斯坦秩序而在那个国家里把英国驻军提高到近十万人，而在这一方面却为游击队的进攻提供了一系列的暴露出来的死靶子。

根据克鲁姆的说法（《在丝幕后》，第279页），英国的委员，除克罗斯曼以外，大多数人都被英国在恐怖主义者手中遭到伤亡所触动；约翰·辛格尔顿爵士和其他的人主张，结束“哈加纳”与犹太代办处的同谋的这种无法无天的运动，应该是允许进一步犹太移民的条件。

美国国务院/樊美调查委员会：报告》（U-6. i, epartmentofState: AzIJ 卜 AmelimmComdtteeofInquiry: Beport），华盛顿声国政府晰1局，1946年版，第L页。克罗斯曼在1946年3月23日的日记中记载，巴斯坦政府一些成员希望在犹太代办处的重新改组和“哈加纳”解除武装的条件下，有进一步的犹太移民（《巴勒斯坦使命》第166页，并参阿第196页），克鲁姆把这种观点归之于委员会的英方成员，而他们在1月份还正在们夜大西洋（怖丝幕后》，第43页），恒克鲁姆的证据或许不能象克罗斯曼的那样信以为真。

束罗斯曼：《巴勒斯坦使命》，第199—201页。他在1951年费边社的演说中说，英国政府“让专家的意见推翻了它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原则被虚伪的鼓吹权宜之计的人

5月15日，英国外交部通知说，他们根据英美委员会的建议所作出的决定必须等待同美国政府达成协议，并且也要同阿拉伯和犹太的领袖们达成协议。与此同时，在美国，代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10日已向阿拉伯各国的代表们保证，根据1945年罗斯福对伊本·沙特的允诺，美国政府对巴勒斯坦问题作出任何决定以前将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双方商议；20日，美国国务院邀请双方在一个风内提出他们自己的看法，迪安·艾奇逊评论说，英美委员会只不过是一个谘询机构，因而它的建议并不具有约束力。华盛顿的犹太复国主义领袖的会议，宣布对于因循延误“甚为愤慨”。他们的发言人非常不满地说：美国国务院一般的态度“与其说符合于总统的观点，倒不如说更符合于英国的观点”，而《犹太复国主义评论》驻耶路撒冷的记者则报道说：

平心静气地考虑最新的发展是困难的。虽然尽一切努力保持心平气和，血还是非常迅速地在血管中奔流，当钢笔写到纸上的时候，墨水就变成愤怒的红色。对于要同阿拉伯各国协商的决定，伊休夫群情沸腾，这样说并不过分。

如果对中东安全有什么危险的话，这种危险更可能是来自犹太人，而不是来自阿拉伯人。……对于伊休夫的许多成员说来，特别是对于年青人说来，这些事情的逻辑是不可避免的：阿拉伯人凭借其空洞的威胁，再一次迫使英国让步。那末，为什么不以武力为后盾，再搞一点破坏行动，借此试试威胁的效力，表示我们是说得到做得到的呢？

### 第三节 实力的较量和妥协的失败， 1946年6月至1947年3月

由于英国政府对英美委员会报告的态度，这一次他们在工党惠特森年会上受到了批评。这次批评主要来自该党的政治哲学家和主席哈罗德·拉斯基教授。他虽然承认巴勒斯坦的局势是过于复杂，以致人们难于接受一个犹太国的“方案”，但是却提出要求说：不应该容许“阿拉伯的讹诈”和大不列颠的中东战略把十万名欧洲犹太难民变成“唐宁街犹豫和怯懦不决的牺

---

所推翻”（R.H.S.克罗斯曼和肯尼思·扬格：“社会主义的外交政策”（R.H.S.Crossman and Kenneth Younger：“Socialist Foreign Policy”），费边社文件，第287号，伦敦，费边社国际局，1951年版，第3页）。克罗斯曼深信：“犹太人在中东已经决定实行革命暴力，这种做法最终会对阿拉伯人有利”（《巴勒斯坦使命》，第176—177页）。英国有责任立即处理中东的“冷战问题”，而克罗斯曼的这种想法，对于英国当局的困难当然并没有提出任何解决办法。

师长对特拉维夫市市长的道歉信回答说：“我主张要谴责犹太社团。我心中一点也不怀疑，有许多成员或者知道这个计划，或者本来可以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前提出某些警告。其次，我十分肯定，假使你，作为特拉维夫社会的代表打算这样做，你是能够获得足够的消息使你逮住罪犯的。”第二天夜里，英国军队随意处罚和攻击某些无事的犹太人（威尔逊：《封锁线和搜查》，第47—48页）。这显然是英国人未经许可即对犹太恐怖主义报复的第一个例子，虽然在1988—1939年阿拉伯人的叛乱期间这种对阿拉伯人的报复也曾是常见的。

美国，第七十九届国会，第二次会议，《参议院文件》，第182号，第9页。

弗朗西斯·威廉斯：《欧内斯特·贝文，一个伟大英国人的肖像》（Francis Williams：Ernest Bevin，Portrait of a Great Englishman）。伦敦，哈钦森，1962年版，第260页。

牲品。……把那些从希特勒主义折磨下逃出来的犹太人牺牲给阿拉伯国家领导者的一个英国政治家，是不理解社会主义者的设想故基本原则的。”对于这种诉诸社会主义原则的作法，贝文在6月12日以他的实用主义态度作了回答，但有些地方几乎也是不能自圆其说的。他宣称，如果采纳立即容纳十万名犹太人的建议，就需要另派一师英国军队到巴勒斯坦去，并且要花费两亿英镑，财政大臣也认为这是办不到的。因此，政府已向美国政府建议，任命一个专家联合委员会来考虑这些有关的实际问题，“财政、军事、运输、住房，以及或许是所有问题中最棘手的一个，即土地问题”；而杜鲁门总统也在前一天任命了一个年阁委员会来研究英国提出的有关这些项目的一份调查询问表。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杂志6月21日的一篇社论问道：“贝文先生是否如此确信，把犹太人拒于巴勒斯坦门外比起放他们进去——从军事观点来看——会使他花钱更少？”按当时的情况看，这就是在宣战，因为16日傍晚“派尔马契”就炸毁或破坏了四座公路桥、四座铁路桥和约旦河上的艾伦比桥，而在第二天傍晚，斯特恩集团又袭击了海法铁路的工厂厂房。犹太抵抗运动如此重新恢复其阴谋活动。促使英国政府决定采取军事当局所力求采取的措施，即授权高级专员对那些据知是参与这219些暴力行动的人起诉。在6月29日开始的军事行动中被捕的人当中，有犹太代办处的这样一些著名的成员，如谢尔托克和伯纳德·约瑟夫（但没有本一古里安，他仍然在欧洲），以及犹太民族会议主席戴维·雷梅兹。耶路撒冷的犹太代办处大楼曾一度被占，以便查封文件，特拉维夫的许多大楼也曾被占，据信，一些非法组织把这些大楼用作司令部。最后，英国军队受命尽量逮捕“派尔马契”的成员。两年以后，“派尔马契”的一位营长承认说，英国人完全知道到哪里去搜查和逮捕哪一个。……我们许多最高指挥官及时得到了警告，但是我们有两百名军官被捉住并被投入监狱”；总计有二千七百人被捕，其中约有七百人在审讯之后被拘留起来。当军事行动开始时，还没有料到有可能彻底搜查军火；但是在靠近海法的亚瓜尔定居地（后来，“派尔马契”一位营长承认，这是他们的主要军火库之一），经过一周的搜查。发现三十三个隐藏在幼儿园的地板下和牛棚等处的军火库，包括十挺机关枪，三百二十五支步枪，九十六门迫击炮，八百磅炸药，四十二万五千发小型武器弹药等等。后来，在8月28日和9月2日之间，英国军队搜查了杜鲁特和鲁哈马，这是第二次世

---

克罗斯曼：《巴勒斯坦使命》，第197—199页。

1946年5月1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32卷，第195—197栏。

北京：《起义》，第202页。

见上文，原著第120页。

敕令第6873号；参阅扎赫尔：《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190页。

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327页。

本杰明·施瓦德伦在《巴勒斯坦事务》上的文章，1946年6月，第2页；又见西德尼·赫茨伯格：“历史中的这一月”，《评论》，1946年6月，第67页。

“一个愤怒的社团”（“AnAngryComunity”），《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6年5月31日，第5页。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6年6月14日，第2页。

官方发表的文本载上述杂志，1946年6月21日，第3页；《阿拉伯新闻公报》（ArabNewsBulletin），1946年6月28日。

世界大战期间在南巴勒斯坦建立的两个定居地，被“哈加纳”用作收藏从埃及偷运进来的偷窃来的英国军火的寄存处。“我们希望让他们知道，我们只要高兴，随时都可以查封他们的武器，使他们无法活动，”威尔逊少校写道，“或许可以对他们施加影响，让他们放老实些。这种希望是很有根据的，在以后的两年时间里，‘哈加纳’以其行动一再显露出他们很明白他们是 220 有隙可乘的。”

犹太复国主义者一年来一直在试图强使英国人屈从于他们的不妥协的要求，他们对英国人的这种正面攻击感到恼火，并在一些无稽的批评中表现了这种怒气。韦茨曼把耶路撒冷的穆夫提现在的地位同谢尔托克之被拘留作一对比，谢尔托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拉起一支二万五千名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军队，与英国人并肩作战，而穆夫提则是：“一个战犯和一个英国的不共戴天之敌”。穆夫提在 5 月 29 日，作为一个政治难民在巴黎附近从半监视的情况下逃脱，并冒名用一张叙利亚护照，乘一架

美国飞机飞往开罗，韦茨曼说，现在他“坐在一座宫殿里”——似乎这次成功的逃跑是得到英国赞助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英国宣传说，围捕“派尔马契”，目的是反对犹太工联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和合作村社居留地，克罗斯曼在下院宣称，军队已逮捕了“全部……政治左派……

认为他们是抵抗运动的领导人。”贝桑地区的定居地所发表的一个荒谬透顶、颠倒黑白的声明中宣称：“男女老幼，孕妇病人以及跛子，均被用枪托野蛮殴打，用刺刀戳，用脚踩，被踢得不省人事。……很多人手足断折，失去知觉。”然而，后来一位犹太代办处所赞同的历史学家

---

贝文无疑是想表达这样的意思：阿拉伯人对犹太人大批移民的反应或许会使英国花很大一笔钱去维持秩序（参阅艾德礼 1046 年 7 月 1 日在下院的发言，下院辩论，第 5 辑，第 424 卷，第 1911 栏）；但两亿英镑这个数目似乎大得出奇。后来犹太复国主义者讽刺地写道，这是贝文方面一个“小小的计算错误”，他们仅仅提到运输移民的费用，估计是两百万英镑（见彭登尼斯（Pendennis，笔名）在《观察家报》上的文章，1946 年 6 月 12 日，并参阅本-古里安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1946 年 6 月 20 日）；但贝文的一个更为明白的说法是，“这不仅是把人运去放在那里就算了。”

敕令第 6873 号，第 8—9 页。在 6 月 15 日傍晚，即袭击桥梁的煎一天，“以色列之声”电台在广播中宣称，“哈加纳”曾得到一份非常机密的军事文件，其中包括巴勒斯坦当局消灭“哈加纳”和清除犹太人的计划，以及相应的作战命令。然后它提供了据称是这份“不名誉的文件”的内存（原文见《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6 年 6 月 21 日，第 7 页；特雷弗：《在白皮书下》，第 211 页注(14)），但这只是一大串不着边际的东西，根据“哈加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英国参谋部的行动的了解。编造起来是轻而易举的。更不要说他们已经渗透到巴勒斯坦英国各个部门中的活动之中了（见威尔逊：《封锁线和搜查》，第 36 页）。但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后来接着发表的这类所谓盗得的文件都是更为低级的。不能和这份所谓“非常机密的”计划相比（见美国基督教巴勒斯坦委员会：《阿拉伯人的战争努力：有文件证明的报告书》

（AnericanChristialIPalestineCommittee：TheArabWarEffort：aDocumentedAccount），纽约，1947 年版；《英国军事情报机关和其他官方来源所揭示的英国关于分治问题的记录》

（TheBritishRecordonPartitionasRevealedbyBritishMilitaryIntelligenceandOtherOffioalSourees），纽约，《民族》周刊增刊，1948 年 5 月 8 日

6 月 18 日，伊一兹一卢也绑架了六名英国军官作为人质，用以交换该组织的两名因恐怖活动被判死刑的成员。其中一名军官逃掉了，而其余的后来都释放了（两名在恐怖分子的死刑获得减刑之前，其余的在这之后释放的）。见贝京：《起义》，第 245—250 页；威尔逊：《封锁线和搜查》，第 55—56 页。

同上书，第 47—48 页。

承认，全国“在第一天军事行动结束后，只有一名英国士 221 兵和四个犹太人被打死。……此后，再也没有人被打死。……在数十名受伤的人当中（据官方公报的说法是八十名）——移民们计算的数字加在一起就高得多了——只有一个人……在医院住了一个相当的时期。”

杜鲁门总统听从了英国人一再坚持的意见，认为英美委员会的报告需要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并派遣他的巴勒斯坦问题内阁委员会中的“代表”们到伦敦去，在亨利·F·格雷迪大使领导下，与英国巴勒斯坦问题专家寻求一个谅解。与此同时，伊-兹-卢和“哈加纳”的指挥官看到，由于 6 月 20 日英国大规模的逮捕，使相当一部分犹太人的自信心发生了严重的动摇，并判定“只有通过一次成功的反击，才能使她们重振士气”。早在春天的时候，伊-兹-卢就想出了一个炸毁巴勒斯坦政府总部的计划，这个总部与军事司令部同设在耶路撒冷大卫王饭店的东侧和上面几层楼上，下面几层楼通常用作旅馆。对这个计划及时提交“哈加纳”的指挥官加以考虑，他们在原则上并不反对，但当时认为尚不成熟。然而，在 6 月 29 日英国的围捕之后，他们立即批准该项计划，作为一种报复，并决定在下班之后执行，以免人命损失。

在以后几周内，显然他们曾两次或三次要求过推迟拟议中的日期，最后，伊-兹-卢决定在 7 月 22 日中午单独行动。卡车上放着装满炸药的牛奶桶，车上配备有穿着阿拉伯人衣服的恐怖分子，开进了（显然是没有设岗的）饭店的厨房入口处，并沿着底层走道一直开到东侧的底层：厨房人员被阻止入内，

---

劳伦斯·拉德：“‘派尔马契’的幽灵”（Lawrence Lader：“The Spirit of the Palmach”），《新共和》周刊，1948 年 11 月 15 日，第 14 页；参阅特雷弗：《在白皮书下》，第 216 页。伊-兹-卢的领导人决不是“派尔马契”的朋友，他赞赏地写道：“‘派尔马契’的部队‘秘密’驻扎的每一个村社，英国军事情报机关都了若指掌。……对‘派尔马契’的这一场打击是巨大的”（贝京：《起义》，第 204 页）。英国政府后来似乎很伤脑筋，因为看来这次行动更直接打击到的是“派尔马契”，而不是“持不同政见的”恐怖主义分子，这些人更善于隐蔽（见赫尔维茨：《争夺巴勒斯坦》，第 355 页注(15)）。

同上书，第 254—255 页，看样子，英国军事行动之有所抑制，是由于考虑到美国对英国的那笔重要贷款的命运，美国众议院即将辩论这笔贷款，这时候已经听见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反对声了。

威尔逊、前引书，第 57 页。

拉德，前引文。

威尔逊：《封锁线和搜查》，第 79 页；但可参阅赫尔维茨：《争夺巴勒斯坦》，第 255 页。隐藏军火的金属容器埋在地下四英尺半至五英尺深的地方，以免被电动的地雷探测器所发现，但被受过专门训练的警犬发现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恶毒宣传曾说英国把亚瓜尔变成了“另一个利迪策（捷克蒙难村，1942 年 6 月德国法西斯屠杀该村居民，并烧光全村。——译者）”（见莫里斯·J·戈德布卢姆在《评论》上的文章，1946 年 8 月，第 143 页），再次斥责在后来的搜查中所发生的对“和平农业居民区（的“野蛮破坏行动”；但是要搜查隐蔽得如此巧妙的隐藏所怎样才能够不引起损失，这一点倒是不曾说明过。犹太复国主义者也经常指责军队抢劫，这无疑是有根据的。按照威尔逊的说法是：“然而抢劫既不是普遍的，也非经常性的”，而且在许多场合下，当城镇遭到搜查时，抢劫“最终查明都是些不大讲良心的犹太人干的”（前引书，第 62 页）。

赫尔维茨引自韦茨曼的话，《争夺巴勒斯坦》，第 256 页。有关穆夫提的逃跑情况，见《纽约时报》，1946 年 6 月 9 日，《泰晤士报》，1946 年 6 月 10 日和 13 日；并参阅《概览，1939—1946 年：战时中东》，第 158 页注。“哈加纳”曾宣称，他们 6 月 16 日的破坏行动的动机之一是，“抗议使穆夫提重新回来的‘疏忽行为’”（施洛莫：卡茨在《评论》上的文章，1946 年 7 月，第 49 页），但他们 6 月 18 日的广播并没有提及此事（见敕令第 6873 号，第 8—9 页）。

一位在场碍事的英国军官被开枪 222 打死。恐怖分子在一个不伤人的“爆竹炸弹”掩护下安全逃脱，并嘱咐一个女党徒打电话警告饭店经理人员从大楼撤退，还对靠近饭店的《犹太复国主义巴勒斯坦邮报》的办公室和法国领事馆发出警告。定时信管拨准在半小时后引爆五百磅梯恩梯炸药和硝酸甘油炸药。这次爆炸造成了饭店东侧的整个南部一半房屋的倒塌，炸死英国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共九十一名，伤四十五人。

在这次暴行事件发生后的当晚，“哈加纳”最高指挥部命令其下属对英国当局采取顺从态度，“以表示犹太人反对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件”；正如以往发生这类事情时的情况一样，代办处和犹太民族会议对犹太人发表了一个敷衍塞责的呼吁，号召他们“起来反对这些令人憎恨的暴行”；然而，与此同时，新的“哈加纳”指挥者显然恢复了和恐怖分子领导人的共谋活动，摩西·斯奈在哪里停下来，他们就从哪里接着干。“我觉得，”伊-兹-卢领导人写道，大卫王饭店暴行事件“以后的一段时期内，他们与我们的关系也许最为亲密”；“我们长久继续准备协同行动的计划”。与此同时，代办处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一些多种多样的宣传途径再次做了他们对摩根将军 1 月记者招待会所做的工作。他们发现，现在正好有一个办法，可以用来转移人们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恐怖运动的注意力。巴勒斯坦地区的总司令（陆军中将伊夫林·巴克爵士），发布了一项限于在他管辖的范围内传达的命令：着即停止军队和犹太人之间的一切社会接触。其措辞如下：223 巴勒斯坦犹太人对于一连串暴行事件（其顶点是炸毁大卫王饭店中的大部分政府办公室，造成人命的惨重损失）决不能逃避罪责。如果没有一般犹太老百姓的现行的或消极的支持，则真正进行这种犯罪行动的恐怖主义匪徒们一定会很快被挖掘出来，从这方面来说，这个国家内的犹太人都是同谋，都在参与犯罪。

我决心要使他们受到惩罚，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以蔑视和憎恶看待他们这种行为。……我估计到采取这些措施将使我们的士兵遭到一些困难，然而，我确信，如果把我的道理向他们讲清楚，他们就会懂得这些措施是适宜的，就会用这种措施（这也是犹太民族或任何民族所最不喜欢的的方式）去惩处犹太人——打击他们的巢穴，显示我们对他们的轻蔑。这个命令的全文很快就落到了犹太复国主义者手中，命令的希伯来译文贴满了巴勒斯坦的三座主要城市，一位犹太记者乔恩·金奇把它传到了国外。7 月 31 日在下院辩论巴

---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6 年 7 月 5 日，第 1 页；946 年 7 月 1 日，下院辩论，第 6 辑，第 424 卷，第 1873 栏。两年多以后，克罗斯曼也提到被捕的“派尔马契”成员“大部分都是好的、正派的工联主义者”（1949 年 1 月 26 日，同上，第 460 卷，第 982 栏）。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6 年 7 月 12 日，第 10—11 页。

见上文，原著第 190 页注（即本书第 326 页注——译者）。

特雷弗：《在白皮书下》，第 221—223 页。7 月 30 日—8 月 2 日在特拉维夫进行军事搜查之后，《犹太复国主义评论》驻耶路撒冷的记者写道（1946 年 8 月 16 日，第 6 页）：“军队的行为——在 6 月 29 日和搜查居民区的时候以及后来——一般说是有所约束的。但也的确发生过令人遗憾的事情，特别是在市内较穷苦的地区；但这些事情还不足以提出对任何野蛮行为的控告。……军队的行为甚至应该受到称赞。”

贝京：《起义》，第 217 页。

犹太代办处的一位军官后来说，在 1944 年 11 月斯特恩集团杀害莫因勋爵之后的数月期间，代办处曾向英国提供某些协助，以反对恐怖分子（见《概览，1939—1946 年：战时中东》，第 325—326 页），在这段时间里，代办处曾几次向英国当局提出警告说，要提高警惕，防止极端分子企图炸毁大卫王饭店（T·科

勒斯坦问题的过程中有人就巴克将军的这个命令提出质问时，英国政府感到他们同这份命令的实际措辞必须摆脱干系，尽管他们“表示满意，认为这些指示……是正当的”，并且“完全谅解我们部队所遭受的这种挑衅”；这个命令在8月9日被撤销了。

英国首相出席巴黎和平会议时，贝文生了一场大病（这场病使他在后来的几年中逐渐丧失工作能力），于是便由枢密院长赫伯特·莫里森勋爵来宣布政府的目前政策。他说，英国和美国的“专家代表团”已作出“双方一致的建议”，打算首先使相当数量的在欧洲和国外的欧洲战时流民重新定居下来，并在巴勒斯坦建立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省，在中央政府管辖下，这些省享有较大程度的自治。为此，这个国家将划分为一个犹太人省和一个阿拉伯人省，其中前一个省将“包括犹太人已经定居的大部分地方，以及在各定居地之间和周围的相当一部分地区”，而后一个省将“几乎把全部阿拉伯人的土地和人口两方面都包括进去”；中央政府将继续直接管理包括伯利恒在内的耶路撒冷地区，以及“目前耕种范围以外的巴勒

斯坦南部的三角地带的荒地”。犹太人省和阿拉伯人省将在内部实行自治，而中央政府将单独拥有国防、外交、征收关税和消费税的权力，并在开头时拥有管理法律和秩序的权力。高级专员在同他们选出来的立法机关协商之后，任命犹太人省和阿拉伯人省的各部部长，并可对立法机关所通过的那些法案行使否决权，倘若该法案与所规定的保卫国内和睦和少数民族的权利不相一致的话。犹太人省有权在其经济吸收能力的限度以内容纳移民（中央政府有权最后控制），希望在计划付诸实施的一年之内，容纳来自欧洲的十万名犹太人；但阿拉伯人省完全有权拒绝犹太移民。鉴于巴勒斯坦和外约旦双方都需要大规模发展经济、共同的水源应当尽快地进行勘测，但需征得外约旦政府的同意。当下院在第二天继续进行辩论时，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解释说，政府虽然不打算“把犹太代办处放在次要地位，却有意在伦敦同‘来自世界各地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代表’讨论这个地方自治计划”；并且

---

立克（T.Kollek）在《新政治家与民族》上的文章，1948年8月10日，第99页；参阅1946年7月31日和8月1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26卷，第1009—1010栏，第1315栏】。

扎赫尔：《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191页。

据说，韦茨曼曾发怒说，6月16日“哈加纳”袭桥一事，事先并没有通知他（显然是因为一时没有联系上），而在6月29日英国反击之后，他威胁说要辞去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主席职务，除非“哈加纳”在即将召开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之前停止袭击，除非撤销摩西·斯奈对“哈加纳”的指挥权。逃脱了英国搜捕的摩西·斯奈，在大卫王饭店暴行发生之前一天，即在7月21日宣布辞职（见贝京：《起义》，第209—210页；金奇：《七根倒了的柱子》，第157页，第182页；《曼彻斯特卫报》驻耶路撒冷记者报道，1946年7月22日）。

在安排警告的时间方面，恐怖分子显然并没有给予政府机关充分的时间以离开饭店；而开枪打死英国军官好象又使饭店经理人员陷入混乱。后来，政府的宣传部门的官员否认秘书处的任何一个“有正式职位的有权力采取行动的人”曾接到过警告（《巴勒斯坦邮报》，1946年9月25日）；但是传闻说：曾经收到过这种警告，但高级官员不把它当作一回事。一个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提到过秘书长的名字，被这位秘书长在法院提出控告，打赢了官司，但是并没有把这种谎言完全压倒。见《旗帜晚报》

（EveningStandard）1949年4月12日；贝京：《起义》，第221—222页；扎赫尔：《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191页。

也同“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国家”进行讨论，虽然并不把穆夫提从他在开罗的新避难所请来。

在辩论过程中真相就立刻清楚了，原来这个地方自治计划并不是英国和美国顾问们的新创造，而是战时联合政府属下的殖民部搞出来的一份计划，准备在万一最 225 后确定的分治计划不被采纳时作为替代的方案（当时的殖民大臣奥利弗·斯坦利及其许多同僚都认为这个分治计划是切实可行的，“许多巴勒斯坦问题的权威人士也认为它切实可行而接受了下来”）。斯坦利补充说，他始终把地方自治计划看成是次好的计划。此外，1 月份有一套与此十分类似的建议提供给英美调查委员会，但被它拒绝了，“因为它似乎并不具有完美无缺的优点”。工党政府在处理巴勒斯坦问题上，第一次遭到来自议会中其他方面、而不是他们自己这边亲犹太复国主义的少数人的严厉对待。奥利弗·斯坦利批评他们说，现在这份计划一直都搁在殖民部里，却又听任英美委员会去毫无目的地白费时间和精力，但政府本来是可以回答说，在令人烦恼的管理巴勒斯坦问题上，如果（尽管这是一个很大的“如：果”）能够最终地导致美国政府对一项解决办法分担责任

的话，那么消耗一年的时间，将不算是付出重大的代价。或许最激烈的建议是丘吉尔所提出来的，他主张，政府应当说：“如果美国不来分担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重担（作出规定或是达成协议都可以），我们现在就应公开声明：我们要把我们的委任统治的职责还给联合国组织，我们还要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从巴勒斯坦撤退。”大约两年以后，一位保守党党员宣称，政府在那时没有听从丘吉尔的这番劝告，是“由于顽固不化和用错了的乐观主义两者相结合，并且也是因为它拒绝……相信社会党不能使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达成协议”，这种指责的前一半或许有一部分道理，但是就整个事实而论，就不那么有道理了。1946 年 8 月，对任何一个英国政府来说，在巴勒斯坦委任统治问题上决不是一个可以采取决定性步骤的时刻，这时候，同埃及的条约谈判，以及能否把眼看可能落到苏联卫星国地位的波斯挽救回来，这两个问题都正处于一种微妙的似稳非稳的状态！而在下一年，我们将能看见，在中东总的形势中，变化不定的成分已从这两个重要因素中暂时消除了，于是英国政府至少在那样一个程度上，可以变得比较没有拘束地选择他

---

见威尔逊：《封锁线和搜查》，第 70 页注。

北京：《起义》，第 226 页。英国军事当局获悉伊-兹-卢在特拉维夫司令部指挥下行动，从 7 月 30 日—8 月 2 日对该城进行了交通封锁和搜查，但没有捉到恐怖主义者的领导人（参阅同上书，第 227—230 页）。一批军火连同伪造政府公债券的设备以及价值五万英镑的伪造公债在犹太人大会堂的底层里被发现，还有更大一批军火在一个学校的底层结构中所建造的三个贮藏处中被发现（威尔逊：前引书，第 67—73 页；特雷弗：《在白皮书下》，第 232 页注(29)）。

见上文，原著第 204 页。

《泰晤士报》，1946 年 7 月 29 日。

金奇：《七根倒了的柱子》，第 176 页，

赫伯特·莫里森的发言，下院辩论，第 5 辑，第 426 卷，第 959 栏。另一方面，工党机关报《每日先驱报》的一位编辑在 7 月 30 日宣称：“如果巴克将军果真写过此信，那么，在我们看来，他是无可挽回地表明了他与他的指挥权是不相称的。”前殖民大臣奥利弗·斯坦利执相反意见，他同意政府的观点，认为处在大卫王饭店暴行事件所造成的那种心神疲惫的情况下，“说两句厉害点的话”也是情有可原的（下院辩论，第 5 辑，第 426 卷，第 975 栏）。



们的巴勒斯坦政策了。226 在丘吉尔发表演说之前，事情已十分明显，政府希望美国能接受地方自治计划（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格雷迪—莫里森计划，或称莫里森—格雷迪计划），看样子不会实现。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姑且不谈美国政府和人民传统上一向厌恶在平时对海外承担义务，目前正逢到 11 月要举行的国会选举的硬仗，无法指望民主党会有所作为，它只可能与反对党共和党争着去讨好那强大的犹太复国主义压力集团。早在地方自治计划的内容公布之前，詹姆斯·G·麦克唐纳，即英美调查委员会美国成员中两个犹太复国主义的坚决支持者之一，就曾说服两名亲犹太复国主义的参议员同他一起向杜鲁门总统抗议这个新计划。总统在接见他们时态度非常冷淡，以至他竟想不准麦克唐纳宣读一个表示他看法的简短的备忘录；但他的民主党顾问当中的犹太人显然警告过总统说，如果他的政府继续支持新计划的话，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可能使“犹太人选票”受到影响。杜鲁门举棋不定，在美国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主持下，他重新召集英美调查委员会中的六名美国成员同新从伦敦回来的内阁委员会“代表”一起讨论这项新计划；这六名委员自然而然地把这个计划看成是一个激进的方案，认为它已经背离了他们早些时候所推荐的方案，便一致建议予以拒绝。总统这才放弃了这个计划，没有听从国务卿的劝告，而且美国也没有参加即将举行的由英国政府召开的讨论这个计划的伦敦会议。227 与此同时，犹太代办处执行委员会在巴黎开会，这是为了本—古里安也能参加，他与他的其他“行动主义分子”同僚仍然列于巴勒斯坦政府要拘捕的名单之中。这个委员会在 8 月 5 日宣布，它拒绝地方自治计划；但是十分明显，尽管在大卫王饭店暴行之前，一位犹太抵抗运动的宣传家曾经威胁说，如果英国在移民问题和购买土地问题上不放弃自己的意见，“就要显著地加强斗争”，然而巴勒斯坦的英国军事当局采取

---

见英国外交部：《关于巴勒斯坦未来地位的建议，1946 年 7 月—1947 年 2 月》

（Proposal for the Future of Palestine, July 1946-February 1947），敕令第 7044 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7 年版），第 3—8 页（此后简称敕令第 7044 号）。

见本书末图一。

按照犹太代办处 1930 年修改过的宪法的条文（根据这个宪法，它得到美国犹太人在财政上的支持），它的各个机构，包括它的执行处，应由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非犹太复国主义者对等组成；但后者被逐渐排挤出去，作为抗议与恐怖分子共谋，后者在执行处中的最后一个代表在 1945 年 12 月辞职〔见上文，原著第 203 页注（即本书第 349 页注——译者）和艾伯特·M·海厄姆桑：《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

（Albert M. Hyamson: Palestine under the Mandate），伦敦，梅休因，1950 年版，第 116 页〕。殖民部在 1947 年指出，当时犹太代办处的组成情况“并不符合 1930 年所同意的安排”，并要求它采取“紧急措施……使其人员组成无可非议地按宪法办事”（《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7 年 6 月 6 日，第 2 页）色因为阿拉伯国家最高委员会是否能自称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代表，是很成问题的（见赫尔维茨：《争夺巴勒斯坦》，第 250—253 页），所以英国政府有某些理由，邀请来自这两个“官方”组织以外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然而，结果是，没有来自随便哪一方面的独立的个人或组织，敢于不顾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官方组织双方的拒绝，准备前来参加建议中的会议。

见上文，原著第 220 页。

斯坦利（Stanley）的发言，下院辩论，第 5 辑，第 426 卷，第 984985 栏；R·E·曼宁厄姆-布勒（R·E·Manningham-Bulter，英美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和克罗斯曼的发言，同上，第 1024—1025 栏；参阅克罗斯曼：《巴勒斯坦使命》，第 67 页。

的更为坚决的反措施，已动摇了代办处执行委员会的信心。它现在答应撤回比尔特莫尔计划所提出的极端的政治要求，虽然为时已晚，而犹太复国主义者领导人仍然把这个计划作为他们的正式政策向英美委员会提出。现在他们在巴黎起草一个计划，要“在巴勒斯坦的一个适当地区建立一个可以生存下去的犹太国”，除了地方自治计划所建议的地区之外，它应当包括整个加利利地区（这是1937年皇家委员会建议过的）以及整个内格夫即南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则将占有从杰兹里勒谷往南到希布伦和比尔谢巴两地中间的一条界限为止的那个地区，并且在雅法还有一条通往

地中海的走廊。这个计划用飞机送到华盛顿，提交杜鲁门总统；8月15日。韦茨曼和代办处执行委员会中的两名美国代表，向英国殖民部建议，把它作为谈判的基础。然而，关于代办处正式参加建议中的巴勒斯坦问题伦敦会议的程序并未达成协议。英国政府坚持地方自治计划作为第一项议程，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代表可以充分提出修改意见；而代办处则要求完全自由指派自己的代表，“包括一切现在已被拘留或作为拘留对象的人”，并要求在与英国政府协商的情况下，邀请犹太代表团的所有成员，该代表团中将包括代办处以外的重要团体和组织的代表。

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最高委员会也拒绝派遣一个代表团，除非这个代表团是作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唯一代表参加会议，因此，只有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出席了9月10日召开的会议，他们建议巴勒斯坦的权力应移交给一个单一的国家，这个国家由分别按人数比例普选出来的各方代表来治理。只有在奥斯曼帝国或在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时期出生为本地公民的人，或在1939年白皮书发表之前通过入籍取得巴勒斯坦公民身分的人，或在以后取得公民身分并曾定居十年的人，或根据同样条件可能在后来取得公民身分的人，才能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然而，任何情况下，在立法议会中的犹太人代表人数不得超过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现行的土地转移限制应该保留，将来犹太人移民应受到完全禁止，除非立法议会中占大多数的阿拉伯人议员投票通过其他决议，方可解禁。在犹太人占绝对多数的地区，希伯来语应成为第二种官方语言，而犹太人以及其他团体可以保留私立学校和大学，但必须强制教授阿拉伯文，并受政府监督，“以保持教育水平，防止讲授颠覆性内容，从而创造一种普遍的忠诚”。原来保证给予犹太人的各项权利，未经立法议会中大多数犹太人议员的同意，不得变更。<sup>9</sup>会议就以这样的调子休会二至三个月，直到美国举229行选举以及联合国大会和外长会议

---

1946年8月1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26卷，第1256栏。

R·E·曼宁厄姆-布勒1948年3月10日的发言，同上，第448卷，第1348栏。

见上文，原著第123页和第75—77页；并参阅乔恩·金奇：“英国工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向后转”（“British Labor's Turn-about on Palestine”），《评论》，1947年12月，第515页。

参阅克里普斯1946年8月1日的发言，上院辩论，第5辑，第426卷，第1242—1243栏。

据说早在1945年底，在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领导人就曾以统计数字为证，宣称“犹太人选票”是罗斯福在1944年总统选举中获胜的一个因素（见西德尼·赫茨伯格：“历史中的这一月”，《评论》，1946年1月，第39页）；并有人声称，1947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从犹太人那里获得“相当一部分”基金，那些犹太人希望能影响政府的巴勒斯坦政策（《福雷斯特日记》，第345页）。除去所得税，美国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全国基金会和机构的捐款增加情况如下：

<sup>9</sup>—1944年平均1.537

开会之后再开。

与此同时，当恐怖主义组织在9月重新恢复他们的暴力活动时，代办处谴责他们；而“哈加纳”虽然没有重新恢复与政府的合作来反对他们，也发表了一个小册子，谴责他们是靠“匪徒行为、走私、大规模贩毒、武装抢劫、组织黑市和盗窃”<sup>4</sup>的办法来维持他们自己的生存的。10月1日，英国外交大臣和殖民大臣同韦茨曼及其代办处的同僚初步交换意见，在会议上，贝文提出一个想法（和克罗斯曼在下院早已建议过的一样），<sup>5</sup>暂时安排为期三年、五年、或十年的托管，最后导致自治。十分清楚，政府象代办处执行委员会一样，急干想沟通他们之间的分歧。10月4日，作为内阁改组的一部分，克里奇·琼斯从政务次官提升为殖民大臣，他本人是同情犹太复国主义的；<sup>\*</sup>同代办处代表的对话继续进行，尽管杜鲁门总统发表了一个新的声明，威胁要给英国谈判人拆台。对犹太230人定居地的军事搜查停止了，另一方面，10月21日在阿拉伯抵制委员会的海法办事处捉了人，因为该委员会的人员曾阻止和没收过境的犹太货物。第二天宣布巴克将军（他对大卫王饭店暴行的无法衡量的愤怒大家还记忆犹新）不久将提升为一支国内部队的司令官。29日，犹太复国主义者内部会议在伦敦举行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他们一方面拒绝考虑在任何情况下的任何限制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权利的建议，拒绝在释放现已被拘留达四个月的他们的领导人问题上进行讨价还价；另一方面也谴责了恐怖主义，并号召犹太人拒绝对那些犯有这类罪行的人提供任何帮助。因此，新的殖民大臣在11月5日宣称，政府已经同意释放犹太领导人和在6月中旬围捕中所拘留的其他人。这个月稍后又宣布，有二千八百名被拘留在塞浦路斯的非法移民，将被准许移居巴勒斯坦，作为11月至1月（1946年）名额的一部分，尽管同时新到达的非法移民继续被送往塞浦路斯

---

<sup>4</sup>—1945 犹太年 3.989

<sup>5</sup>—1946 犹太年 5.768

<sup>\*</sup> 全国财政”，《犹太代办处经济研究所公报》（“JewishNationalFinances”，

BulletinoftheEconomicResearchInstituteoftheJewishAgency），1947年，第2版，第66页，第68页）

见《福雷斯特日记》，第346—347页。拉比西尔弗后来在12月告诉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说：“美国政府拒绝了这项计划，这当中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是众所周知的。”（《新犹太》，1946年12月—1947年1月，第41页）

见《福雷斯特日记》，第346—347页；麦克唐纳：《我在以色列的使命》，第10页；《纽约时报》，1946年8月8日。

施洛莫·卡茨：“对巴勒斯坦犹太抵抗运动的理解”，《评论》，1946年7月，第49页。

英国人6月29日的行动“结束了……某些工党领导人，其中包括已故的伯尔·卡曾内森和本-古里安多年来在巴勒斯坦所鼓吹的……‘他们不敢’的理论”〔罗伯特·韦尔施：“比尔特莫尔道路的告终”

（RobertWeltsch：“TheEndoftheBiltmoreRoad”），《评论》，1947年2月，第106页〕。施洛莫·卡茨（前引文，第50页）也曾断言说，英国只能把新到达巴勒斯坦的移民拘留起来，一直到按照每月的限额轮到他们的时候再放过去，而无力采取更为有力的措施来防止非法移民，然而，在5—7月期间有七千二百名非法移民乘船到达，而且还可望有更多的人到来；因此，英国政府宣称，他们今后将被遣送到塞浦路斯，以等待准许他们进入巴勒斯坦（《泰晤士报》，1946年8月9日、10日和13日）。在海法港的两艘运输船遭到破坏，而希望移入的人进行了暴力抵抗；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机构不与巴勒斯坦政府合作的威胁，只是一句空话，因为他们政治上的合作早已是有名无实了，而经济上的不合作又必将使犹太人自食其果（见特雷弗：《在白皮书下》，第247页）。

斯。20日获悉，政府部门前因大卫王饭店暴行事件而迁地办公，凡属为之提供房舍而被逐出的犹太人店主以及其他一切人等，将从政府得到补偿；自从对“派尔马契”采取军事行动以来，已经停止为犹太人定居地招募警察（它的核心就是这种警察），这种招募工作将恢复进行。用一位犹太代办处所赞同的历史学家的话来说是，“这些姿态，尽管半心半意，确实达到了消除紧张气氛的目的。……如果没有给231人以一种新开端的耳目一新之感的话，如果没有重新恢复真正的自信的话，那么至少给了人们一种可以喘一口气的感觉。”

全世界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运动，这时正在选举出席第二十二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的代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这是第一次举行；而犹太代办处的领导人需要有这样一个喘息时机，以便使他们能够组织起对他们最近的政策改变的支持，即他们现在愿意接受仅仅在巴勒斯坦的一部分（既然不可能在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然而，当12月9日大会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时，十分明显，犹太复国主义者运动中更好战的一翼有希望形成一个强大的阵线。韦茨曼以勉强的百分之五十一的代表票数当选为大会主席；他在他的主席致词中推荐执行委员会的分治计划，本-古里安也同样推荐，他们受到毫不妥协的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副主席伊曼纽尔·纽曼博士的斥责，说他们放弃了在1945年8月伦敦会议上予以重申的比尔特莫尔决议，该决议要求在一个“不可分割和不能缩小的”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

---

哈里·萨谢尔暗示，他们早已准备从英美委员会手中接受巴勒斯坦的分治，他并且说他们将在“原则上”接受委员会的报告，因为这份报告“打开了不受限制地移民和发展的可能性”（《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189页）。

《纽约时报》，1946年8月14日，并见本书末图二。10月6日，十一个犹太定居地，在内格夫西北部有较好灌溉条件的可耕地上，同时建立起来（《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6年10月11日，第5页；1947年8月29日，第8页）。

在12月召开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上，犹太复国主义者这种政策变化的维护者进行辩论说，“执行委员会一时之间别无选择，当时出现一种绝对的僵持状态，与政府没有接触，而巴勒斯坦的领导人都在监狱里。如果不作出这个建议的话，那么美国就会把这整个棘手问题丢开不管了”（内厄姆·戈德曼博士在《犹太复国主义评论》上的文章，1946年12月20日，第6—7页；参阅拉比西尔弗在《新犹太》上的文章，1946年12月—1947年1月，第61页）。

英国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同情者试图劝告政府，象谢尔托克和雷梅兹这样的人，既然他们愿意和热心协助捕捉伊尔贡的领导人，则应予以释放（克罗斯曼：《巴勒斯坦使命》，第205页）。然而，从后来他们的行为来判断，似乎只有在政府对移民问题让步的条件下，他们才可能进行这样的合作；参阅下文，原著第238页注（即本书第408页注——译者）。

互换信件的全文载《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6年9月18日，第4—5页。

全文载敕令第7044号，第9—11页。1948年5月，埃及首相告诉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调解人说，建立单一的国家仍是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巴勒斯坦政策，他“希望”在这个单一国家中，犹太人少数民族“将能够在整个巴勒斯坦而不只是在犹太人地区自由购买土地，发展工业和从事商业。然而，如果犹太人购买土地的钱是从外面提供的，那么，为了自卫的目的，阿拉伯人可能不得不采取措施，以限制犹太人购买土地的权利。”〔福克·伯纳多特伯爵：《前往耶路撒冷》（To Jerusalem），伦敦，霍德与斯托顿，1951年版，第26—27页〕

转引自扎赫尔：《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192页。参阅《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6年9月20日，第2页；9月27日，第3页。

执行委员会中两个美国成员之一，内厄姆·戈德曼博士，曾把新的计划带到华盛顿，并同韦茨曼一起在8月15日把它交给英国殖民大臣；他回答说，犹太复国主义者运动必须准备作出“惨痛的让步来打破目前的政治僵局”以摆脱外国统治并给大规模移民打开大门，1942年的比尔特莫尔计划，以及它所要求的对整个巴勒斯坦进行委任统治，是建立在战后几百万犹太人能够立即移居巴勒斯坦的设想这个基础之上的；但此事并未实现，而232设想美国会同英国在犹太复国主义者要求占有巴勒斯坦问题上认真地发生争吵，也只是一幻想。拉比西尔弗再次抨击他所说的英国政府的“有组织的阴谋”，即企图否认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的“权利”；他表示担心，执行委员会的分治计划将会削弱他们在伦敦会议上进行讨价还价的力量，他并且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运动的代表参加会议。这场政治辩论是由韦茨曼来收场的，他回忆说，1944年他曾希望从丘吉尔政府那里获得一个“或许是建立在巴勒斯坦的一个相当大的地区上”协犹太国，由于斯特恩集团杀害莫因勋爵，这个希望便被粉碎了，他说，这是“最近几年来使我们一蹶不振的一场最大的灾难”。韦茨曼所持的论据是本·古里安在驳斥拉比西尔弗与伊曼纽尔·纽曼时候用过的，他宣称，在南巴勒斯坦建立的新定居地，要比讲一百遍关于抵抗的话还有价值，“特别是准备在耶路撒冷或者特拉维夫进行抵抗、却在华盛顿和纽约讲这种话。……当你把别人送去充当英国枪炮和坦克的炮灰时，在道义上、财政上和政治上的支持是微不足道的……”——这是对美国好成分子进行的一场正面攻击，它显然使这位年高德欲的主席遭到来自伊曼纽尔·纽曼的反击，被斥为“蛊惑人心”。韦茨曼在讲话结束时对想走捷径的办法提出警告，特别是警告恐怖主义，说这是“巴勒斯坦犹太民族国家身上的一块癌肿”：我们经常对我们自己援引爱尔兰、布尔人和其他民族革命运动的例

---

1948年7月31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26卷，第1018栏。

然而，在英国大选使他的党制权之前，报道所说的他于1945年在纽约市内一次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集会上所讲的这番话，不应认为是准确地传达了他本人的意思的。这番话是：“我们要在伦敦的议会中和其他地方进行我们的工作，以使……白皮书的政策得以改变，从而使犹太人能够确信，他们的‘民族之家’终将牢固地和安全地建立起来，他们能够有他们自己的国家。”（转引自拉比西尔弗1948年3月5日的发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3年，第36—51号，第18页）

杜鲁门屈服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竞选上的压力，于10月4日（犹太人赎罪日前夕）发表一个声明，支持犹太代办处的新政策：“在巴勒斯坦适当的地方建立一个能以生存的犹太国，来管理其移民和经济政策”，并立即发放十万张移民许可证，作为一种“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方法”（原文载《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6年10月11日，第3页，又见《新犹太》，1946年12月—1947年1月，第61页，拉比西尔弗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上的发言；参阅《福雷斯特日记》，第309页）。乔恩·金奇（在《评论》上的文章，1947年12月，第516页）证实贝文的话说，正当杜鲁门发表这个声明之际，同代办处执行委员会的会谈，“在英国政府内部引起了很大的希望，认为终于可能有一种解决办法了”；贝文曾在事先被告知要发表这项声明，他要求不要发表，但是人家告诉他，要是不发表这个声明的话，共和党领导人、纽约州州长杜威与他的二百五十万犹太人就会要发表另一个声明来竞争，作为他们国会党选活动的一部分（贝文1947年2月25日在下院的发言，下院辩论，第5辑，第433卷，第1907—1908栏；参阅西德尼·赫茨伯格：“历史中的这一月”，《评论》，1946年11月，第452—457页）。据说，艾德礼曾强烈抗议过杜鲁门总统的声明，而且说移民政策将不会改变，除非制宪问题得到解决；根据《巴勒斯坦事务》（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紧急委员会编，1946年12月，第1页）的说法，当杜鲁门再次提出要求增加迁往巴勒斯坦的移民时，艾德礼列举了杜鲁门在这个问题上历次成事不足的干涉作为对他的回答。

子。但是忘记一件事。……假如你们对好时光终将到来这一点失去信心，而想通过与犹太人的道德、犹太人的信条或犹太人的历史不能相容的手段来获得救赎，我对你们说，你们这是在对冒牌的神灵烧香。……去重读一下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和以西吉书吧，按照我们伟大的先知和圣人的教义去检验一下我们所作的和我们所想作的事吧。他们知道犹太民族的本性和品格。“犹太国将通过正义而得到救赎”——而不是用任何其他手段。用一位当代历史学家的话来说，这次大会呈现出一片混乱不堪和令人惶惑的景象，最后对各项决议的表决，总是与局外人的，也往往与投票者本人的分析大相背谬，不过……尽管有某些集团投票反对他仍所支持的建议，又中了别人的圈套，把他们所憎恶的领导人选进了领导机构里，尽管大会及其各种委员会被徒尚空谈的风暴所席卷，被个人恩怨搞得七零八落……其结果倒也大体上是准确地反映了犹太复国主义者运动的状况及其政策所遭到的失败。

本-古里安的马拜党(工党)与韦茨曼在中产阶级的普通犹太复国主义者之中的支持者，联合提出一项决议 233 案：如果自由移民，大规模定在和在巴勒斯坦一部分地区上建立一个犹太国等条件得到承认，执行委员会有权决定参加或不参加重新召开的伦敦会议；但是早在 12 月 24 日，这个决议就被否决，仅得到一百五十四票，却有一百七十一票赞成一个限制更大的决议。支持这后一个决议的有：来自美国的拉比西尔弗的追随者，修正派，要求占有整个巴勒斯坦的精神中心党，以及想在整个巴勒斯坦成立一个犹太-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而反对分治的左翼政党。鉴于人们反对他的渐进主义政策，韦茨曼放弃了他的代办处主席候选人资格，结果这一职位无人承担，因为他本人的卓越地位还没有人能取而代之。从拉比西尔弗一派人中多少有点儿生硬地选出了一个新的执行委员会。然而，大会禁止参加伦敦会议。并没有能阻止本-古里安和代办处其他领导人对克里奇·琼斯进行初步的试探，根据某种理由，克里奇·琼斯暗示：如果能有三个月不在巴勒斯坦搞恐怖活动或非法移民的话，那么英国政府那时也许会变得慷慨些：而困难在于，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正因为禁止移民才激起了恐怖活动”。事实上，恐怖活动是在 10 月 29 日犹太复国主义者内部会议谴责它之后才变本加厉的，但是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期间，出现了一种“不稳定的停战”，这显然是受到“哈加纳”压力的结果。在整整一年中，有二十八名巴勒斯坦警察被打死，四十五名英国军人被打死，九十三人受伤，巴勒斯坦各种团体的三百名平民被杀害（包括大卫王饭店的牺牲者）或受伤，在这些犯罪行为中，没有一个

直接参与其事的犯人被判过罪。恐怖主义者得以逍遥法外的主要原因，

---

因为这种“有礼貌地明升暗降”在后来的四个月中并没有生效，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就不认为它是一种能弥补他们的尊严所受到的侮辱的“惊人的漂亮姿态”了（特雷弗：《在白皮书下》，第 271—272 页）。

特雷弗：《在白皮书下》，第 274 页。

与此同时，一些被拘留的阿拉伯极端主义分子获释或被赦免，并允许返回巴勒斯坦（下院辩论，第 5 辑，第 428 卷，第 1226—1230 栏）。

关于把非法移民送到塞浦路斯的新政策，见上文，原著第 227 页注（即本书第 389 页注——译者）。政府在 10 月 15 日拒绝了代办处关于增加移民数额“作为改善关系的姿态”的要求，说是他们已经答应阿拉伯人，在伦敦会议休会期间不改变政策（本杰明·施瓦德伦在《巴勒斯坦事务》上的文章，1946 年 12 月，第 4 页）；后来政府公报中对于为非法移民“所迫”只得继续把他们送往塞浦路斯表示“遗憾”。《犹

是犹太人与英国当局的不合作，而这部分地也由于他们害怕在恐怖主义者手中受致报复，由于犹太人从传统上希望避免同外国军官接触；但是，或许还有一部分是由于犹太人对他们的民族敢作敢为所怀有的某种自豪感，甚至这种行为采取了一种不正当的恐怖主义形式时，他们也为之自豪，而且也由于他们相信，他们那些在希特勒手下死去的亲人，如果没有被英国逐出国外的话，现在还会在巴勒斯坦活着。与此同时，英国军事法庭处理被捕的恐怖主义组织成员的例行诉讼，正遭到伊-兹-卢的大肆报复。据信这又引起英国军事当局方面再次要求放手采取反击措施。12月29日，由于对一个年轻的极端分子参与武装抢劫一家银行判处鞭刑之后，伊—兹—卢捉去了一个英国军官和三名军曹。把他们也痛打了一顿。在高级专员离开耶路撒冷去伦敦进行磋商期间，秘书长（亨利·格尼爵士，他新近继任约翰·肖爵士的职务）赦免了陆军总司令批准的另一起鞭刑；而在1947年1月21日，又宣布了一项国防条例的修正案，把可受鞭刑的青年人的最高年龄从十八岁降低到十六岁。与此同时，在本-古里安和从伦敦返回的高级专员会谈以后，犹太民族会议在1月20日通过了一项决议，宣称它痛恨把暗杀作为政治抵抗的一种手段，但又申言它支持政治斗争并斥责任何一种想对恐怖主义采取积极对抗的主张：“我们不是在挑起内战，我们也不希望挑起互相残杀的格斗，当我们在外面为我们的权利进行战斗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在内部进行任何争斗。”

从1942年发生犹太恐怖主义活动以来，在巴勒斯坦从来也没有对恐怖主义分子执行过死刑，尽管在1946年有十九个人被判死刑，而后来则被减为终身监禁；但是在1947年1月24日，巴克将军批准了对道夫·格鲁纳判处死刑，由于他参加袭击一处警察岗哨，有一名警察在岗235哨中被打死。伊-

---

太复国主义评论》（1947年4月4日，第6页）后来吹嘘说，在十四个月中，有二十四艘“由‘哈加纳’成员购买、开船和领港的”船只，驶入巴勒斯坦水域，载运了二万三千五百名左右非法移民，一位没有署名的评论员评述说：“现在塞浦路斯拘留营中二万名移民遭受的灾难是‘哈加纳’强行非法移民政策的自然结果”[笔名巴勒斯坦纽斯(Palestinius)：“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成立以后巴勒斯坦的情绪”(“palestire'sMoodafterUNSCOP”)，《评论》，1947年10月，第342页]。

被政府征用并筑有防御工事的这片房屋，官方称之为耶路撒冷要塞，犹太人给它起个绰号叫做“贝文堡”。特雷弗：《在白皮书下》，第278页。

要“通过移民，定居和建设来积累力量”，自治是必需的，并可以此与其阿拉伯邻国保持和平〔代办处执行委员会财政部长埃利泽·卡普兰(FliezerKaplan)在《犹太复国主义评论》上的文章，1946年11月15日，第5页；参阅本-古里安的文章，同上，1946年11月29日，第4页〕。

要求占有整个巴勒斯坦和外约旦的修正派，他们的战斗队就是伊-兹-卢（正如“哈加纳”就是代办处的战斗队一样），他们在全世界运动中赢得百分之十点六的席位，在巴勒斯坦赢得百分之十四的席位（见《巴勒斯坦政府……致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补充备忘录》(SupplementaryMemorandumoftheGovernmentofPalestine~totheUnitedNationsSpecialCommittee)，耶路撒冷，1947年版，第20页。

该计划要求占有委任统治时期巴勒斯坦地区的百分之六十五左右。根据《犹太复国主义评论》的说法(1946年12月13日，第7页，本-古里安赞它是旨在使“目的是不毛之地的西巴勒斯坦的四分之三以上的土地肥沃起来”。

见上文，原著第190—191页。

最近国务卿在华盛顿宣称，如果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阿拉伯人双方都将参加复会的伦敦会议，那么美国政府将派一位观察员参加。

《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323—324页。

兹-卢立刻反击，在1月26日和27日绑架一名特拉维夫区法庭的英国法官和一个英国平民作为人质。高级专员发布了一个最后通牒，宣称，除非在四十八小时之内，不加伤害地释放他们，否则即对特拉维夫地区实行军管。1月28日和29日，有人告知说，格鲁纳的律师在申请向枢密院上诉，反对判处死刑；陆军总司令答戎暂缓执行，尽管格鲁纳已拒绝在上诉书上签字；两名人质被释放了。这个时候，英国政府正身受双重压力，在内政上大伤脑筋：一是战后的财政虚弱；二是遭到燃料生产的严重不足，这种情况更因为遇上了六十六年以来最冷的冬天而愈加恶伦。这时，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妇幼可能会遭到绑架，并被拘留起来作为人质，他们对这种威胁的反应是：1月31日，下令妇幼和其他一些平民撤退，以便不妨碍政府和军队执行他们的任务；2月4日透露说，仍然国衣吕个走要城市盼英倒基本人员，将集中在许多筑起围墙和进行戒备的地区，在这些地区里，有二千三百名犹太人和八十名阿拉伯人被赶出自己的住房，以便为他们腾出地方。在这前一天，秘书长接二连三地建议犹太代办处进行合作以阻止恐怖主义活动（这些建议全都遭到拒绝或回避），并要求它必须“立即断然表态：代办处和犹太民族会议是否准备协助政府在七天之内同警察和军队合作，找出恐怖主义集团的成员并把他们缉拿归案”。尽管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中间谣传说，即将颁布戒严法，但代办处在2月10日直截了当地拒绝了秘书长的要求：

犹太人……不能应召以受政府的驱使，去同一种政策的恶果作斗争，这种政策是政府自己制定的，而且伊休夫把它看成是对其自身存在的一种威胁。政府建议向犹太人发出的任何呼吁，将不仅不起作用，而且很可能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的代表，这次还包括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1月27日在伦敦恢复了他们与英国政府的；谈判，而犹太代办处执行委员会在29日开始同英国外交大臣和殖民大臣分别举行非正式的会谈。据说，在这些讨论中，贝文透露，如果达不成协议的话，政府打算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犹太复国主义者领导人似乎并不喜欢这种前景，他们提出，如果在委任统治下，英国能够承认他们一贯的要求，使移民“达到国家经济尽可能吸收的程度”和不受限制地购买土地的话，“就不提成立一个犹太国的目标而留待以后再说”，然而，如果英国寻求一种立即解决的办法，他们就将重申

---

见上文，原著第227页注（即本书第390页注——译者）。

《新犹太》，1946年12月—1947年1月，第65—67页。

特雷弗：《在白皮书下》，第293页。

特雷弗：《在白皮书下》，第299页。

特雷弗：《在白皮书下》，第289—290页，第292页；1947年1月22日和31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32卷，第197栏和第1336栏。

见施罗莫·卡茨：“耶路撒冷的宵禁”（Shlomo Katz：“Curfew in Jerusalem”），《评论》，1946年12月，第530—531页。

据说在过去一年里，伊—兹-卢增加了自己的成员，大部分是从“哈加纳”中招募来的，大约有五千人到一万人左右，此外还有数千名消极同情者（《犹太复国主义评论》驻耶路撒冷记者报道，1947年5月30日，第4页；参阅克罗斯曼1947年1月31日的发言，下院辩论，第5辑，第432卷，第1322—1324栏）。它的大部分财政支持来自美国，美国的报刊上公开报道了年轻男女犹太人极端分子在纽约布受军事训练的情况（参阅西德尼·赫茨伯格：“历史中的这一月”，《评论》，1946年4月，第66页），《纽约先驱



他们的要求，在巴勒斯坦适当地区建立一个能以生存的犹太国。据说 在英国内阁大多数人的支持下，克里奇·琼斯主张：既然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阿拉伯人的要求显然地不能调和，那就应该提出分治；但政府的法律顾问说，企图把分治强加于任何一方，都将与委任统治的条款不符；在阿拉伯人这种毫不妥协的情绪下，外交部显然感到英国或许会卷入与他们的严重冲突中去。因此一致同意贝文应当提出一项最后的折衷建议：英国继续管理五年，并事先言明，以准备实现该国独立为目的；中央政府将在较大的范围内把它的权力移交给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地区的地方政府，而高级专员将尽力组成一个由这些地方行政当局和劳工组织以及其他组织的代表构成的谘询委员会；在以后两年内犹太人的移民将保持在每月四千人的名额，以保证近十万人左右进入，此后则由高级专员与谘询委员会协商后决定，如果意见不一致，则提交联合国仲裁法庭解决；237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地方行政当局，分别控制他们地区范围内的土地转移；在四年结束时，在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双方成员的多数赞同下，一个选举产生的立宪大会将应邀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如果这个打算行不通，则请联合国托管委员会就以后该怎么办揭湍意见。

这个在 2 月 7 日作出的建议，被双方所拒绝，谢尔托克抱怨说，“分配给犹太人的地区不够用，没有进一步扩充的余地，而只是把他们围起来罢了”，并再次提出要“建立一个适当的犹太人地区，能充分控制移民问题……并至少在巴勒斯坦一部分地方最终承认犹太人的独立。”而阿拉伯各国代表团领导人，则再次强调他们拒绝包括任何形式的分治或犹太人移民的任何建议。僵局就这样造成了，于是，2 月 14 日，贝文宣称，政府决定把整个问

---

论坛报》在 1947 年 5 月 15 日以整页广告刊印了十一封由一个电影剧本作家（本·赫克特）签名的庸俗的颂扬信，“给巴勒斯坦恐怖主义者一封信”，这个作家是极端主义的争取自由巴勒斯坦美国联盟的联合主席。1947 年 4 月 23 日，霍尔勋爵在上院提到的一个报告中指出，从那一年初开始已在美国募集到了二千五百万到三千万美元，供犹太人的非法目的之用，包括非法移民在内（上院辩论，第 5 辑，第 147 卷，第 114 栏）。

“我们祖祖辈辈，在数不清的庄园土地上遭受我们的压迫者的鞭笞。……现在压迫者还要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鞭打我们吗？”（贝京：《起义》，第 231—232 页）

贝京宣称，英国人曾试图劝这个年轻的犯人提出要求，说他身体不好，不能挨鞭打，但是无效（同上书，第 234 页）。

1 月 31 日丘吉尔在下院评述说：“这是一条可怜的失败之路”（下院辩论，第 5 辑，第 432 卷，第 1345 栏）。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7 年 1 月 31 日，第 2 页。代办处政治部的代理主任戈尔达·迈耶森夫人也对恐怖分子发出警告，但她补充说：“我们决不打算发动内战而使我们的处境更加困难。我们已不止一次地向政府讲清楚，我们能够使用道德压力。……我们没有国家或警察权力，因此我们不可能承担起警察的责任。”（《纽约时报》，1947 年 2 月 3 日）

威尔逊：《封锁线和搜查》，第 89 页。

同上书，第 120 页：这一点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无论是恐怖主义者，也无无论是正式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运动，都不打算对仁慈作出反应；事实是英国已忍无可忍，才出此下策，但达夫尼·特雷弗却把这项死刑判决看作“处心积虑，选择最妙的时机，一举破坏高级专员和犹太领导人方面数月来的努力”（《在白皮书下》，第 301 页）。

见《1947 年年鉴》，第 5—6 页。

题提交联合国，自己不提出任何特别解决的办法。当26日在下院辩论这种新的形势时，代表反对党的奥利弗·斯坦利和代表另一方的克罗斯曼都批评政府没有早在数月之前看出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阿拉伯人的要求是不可调和的，因而未能及时把这个问题提交给，1946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他们催促说，如果联合国不能同意某种英国能够支持的政策，英国就应当讲明一个日期，到时即放弃委任统治，并让联合国去制定政策。英国议会中的一位犹太籍无党派议员丹尼尔·L·利普森，他经常批评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这次向政府和阿拉伯人呼吁，准许每月四千人移民的名额，正如在2月7日被否决的英国建议中所规定的那样，直到这件事提交联合国为止；但外交部的着法是，正如后来所表示的那样，移民政策对于法律和秩序的维护“极为重要”，而政府不仅有责任维护法律和秩序，而且也有责任保证不发生任何足以损害联合国最后决定的事情。238 现在伊—兹—卢恐怖分子加倍努力来迫使英国政府放松对移民的限制。3月1日下午，他们用炸药炸毁了耶路撒冷的戈德史密斯军官俱乐部：同一天，海法一处停车场上的一些车辆遭到了破坏，在别处还发生小规模的暴行，总共有十八人被杀，二十五人受伤，其中一些是平民。因此，高级专员决定把一些犹太人地区置于成文的戒严法管制之下，人所周知，绝大多数恐怖主义行动是从这些地区搞起来的，这些地区是一条宽约三四英里的狭长地带，从特拉维夫向东延伸七英里，直到佩塔提克瓦。和一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半贫民窟地区、在这些狭窄的区域内约住有二十四万犹太人，超过犹太人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这个决定生效后，该地区的正常的文官政府，包括民事法庭在内将停止活动，银行关闭，并按照军事指挥官的命令，对进出这个特殊地区的人和车辆加以控制。这个禁令一直延续到3月17日，这时正式宣布说，有七十八人因与恐怖分子共谋而被捕（然而，恐怖分子的活动始终没有减弱）：同时也宣布说。在犹太人中有许多自愿协助当局的“事例”；并称“不希望无限制地扩大损失、失业和经济情况的混乱”。一位犹太复国主义的记者认为，这条禁令是“正当其后果眼看就要变得真正严重时”才被取消的，据估计直接损失是二十万英镑，而恐怖分子却怀着“一种真正胜利之感”依然健在。在温和派报纸

---

殖民大臣说，没有一个阿拉伯人被逐出耶路撒冷（1947年4月3日，是院辩论，第5辑，第435卷，书面答复，第380栏）；但这并没有堵住斯特拉博尔吉勋爵（Lord Strabolgi）的嘴巴，他仍然绘声绘色，大谈其“大队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被赶出耶路撒冷的那些地区……他们并肩行进，以示抗议”（1947年4月23日，上院辩论，第5辑，第147卷，第87栏）。

戈尔德·迈耶森的话，《纽约时报》，1947年2月3日报道。

因为戈尔德·迈耶森曾说过：“他们希望我们大家都变成告密者。……我们不能用这六十万犹太人去制造告密者，人人都去监视他的邻居或朋友”（同上），秘书长的函件中便继续这样说：“所要求的只是承认任何文明国家里公民和机构的普通寻常的法律和道德责任，即与政府进行合作反对犯罪，决不能把这种要求和‘告密者’、‘暗探’这种名词联系在一起。”（《泰晤士报》，1947年2月4日）

然而，高级专员在2月9日通知代办处代表说，目前并不准备实行戒严法，但是在恐怖分子所造成的这种局势中，要为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作好准备。

《纽约时报》，1947年2月11日。

见扎赫尔：《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72页；并参阅《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7年3月74日，第8—9页。

《观察家报》政治记者报道，1947年2月2日。

《国土报》上刊登了一系列社论（1947年3月11—23日），谴责代办处执行委员会对比尔特莫尔计划和“行动主义”

的口号采取墨守成规的态度，来鼓励和提高恐怖主义极端派的威信，并要求由韦茨曼博士领导的新的执行委员会，应当在此事提交联合国之前再作一次努力，以求寻找一个同英国政府谈判的基础。然而，执行委员会举行了十天的会议，会议结束时，否认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领导中间出现任何分裂，本-古里安对犹太民族会议发表了一次演说，他在演说中，用最不妥协的口气斥责了英国的政策。

#### 第四节 联合国的调查和辩论， 1947年4月至11月

4月2日，出席联合国的英国代表团，要求秘书长召集一次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来建立一个研究巴勒斯坦问题并向9月间的大会常会提出报告的特另委员会；在大会特别会议上，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表达英国的意见说，英国“不应单独负起责任强迫实施一种双方都不接受的和违背我们良心的解决办法”。大会根据地区原则，并（违反苏联的意愿）排除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选出十一个国家的代表，组成了一个特别委员

会“特别委员会被授与“最广泛的权力……去调查与日勒斯坦问题有关的一切问题和争论”，“在巴勒斯坦和它可能认为有府的在何逾方幽满碴”，并于打掃：日之前向秘书长摺出报哉：苏联料脯这个特别会议期间的政策是要致力于结束英国和巴勒斯坦的联系：苏联代表团和它的三个卫星国代表团支持阿拉伯自家提出的、=但没240有获得成功的一项修正案：把结束委任统治和宣布巴勒斯坦独立列入这次特别会议胁谏）葛罗米柯在他的最佑发言牛税一如果=个单一的独立国家磁以实现的恬：，他赞成在犹太复p主：义者和阿拉伯人之间把巴勒斯坦山分为二户

其间，巴勒斯坦犹太人和英国人之间的关系继续恶化。在犹太人方面，恐怖行动持续不断；在英国人方面，军队和警察在耶路撒冷对犹太人攻击的次数也有一些增加；4月16日道夫·格鲁纳和另外三个恐怖分子的被绞死，重加激怒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本来期望对这些政治犯所判的死刑能有所减轻。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之后，当联合国秘书长应英国的请求，要求所有

---

阿拉伯国家代表团甚至拒绝讨论“任何分治计划或者任何可能导致分治的计划，以及任何方式的继续移民”（载于《泰晤士报》上的公报，1947年2月5日）。

克里奇·琼斯1947年2月25日在下院的发言，下院辩论，第5辑，第433卷，第2004栏。

克里奇·琼斯暗示说（同上，第2005栏），犹太人地区将与地方自治计划中的建议大致相同。

贝文在2月25日表示他相信阿拉伯人“能够被说眼同意”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移民（下院辩论，第5辑，第438卷，第1909栏）。

见敕令第7044号。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7年2月14日，第3页。

但请参阅克里奇·琼斯的说法。他说，政府不是到联合国去交还委任统治，而是去请教怎样把委任统治搞好，如果现在这种形式搞不好，怎样补救一下（1947年2月25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33卷，第2007栏）。

成员国在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期间尽可能阻止前往巴勒斯坦的非法移民时，犹太代办处谴责英国的这种行动是“一种不正当和不道德的诡计”，并指责秘书长的遵从英国的要求也是不道德的。在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里有一位对犹太复国主义坦率地表示同情的危地马拉成员——豪尔赫·加西亚—格拉纳多斯；他并且得到乌拉圭代表们的支持，在乌拉圭有一个组织得很好并且很活跃的犹太人团体集中在它的首都。当这个委员会于6月2日举行第一次全

体会议时，正如预期的那样，瑞典法官、原海牙国际法庭成员埃米尔·桑德斯特勒姆被选为该委员会的主席，但241是加西亚-格拉纳多斯这位与之竞争的手也得到了由他自己和乌拉圭、南斯拉夫的代表所构成的少数票。在这个委员会到达巴勒斯坦之前，受开罗的穆夫提势力控制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曾决定抵制它的行动，比较更有远见的阿拉伯社会的成员也许清楚地看到他们的事业可能要遭到损害，但是，因为确实害怕激烈的报复，使他们不敢违背穆夫提的命令，于是阿拉伯人一致持这种消极态度。

另一方面，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接近这个委员会却是积极的和投机性的。当巴勒斯坦政府由于安全的理由要求该委员会的发言人在秘密会议上听取意见时，加西亚—格拉纳多斯和委员会的另外两个成员就出来反对；当犹太代办处派驻于这个委员会的两位联络员被排除在秘密会议之外时，犹太代办处也表示抗议。这些抗议的目的就是要在犹太代办处和巴勒斯坦政府之间建立一个“严格平等”的待遇。这时恰巧军事法庭刚刚通过对三名伊—兹—卢恐怖分子判处死刑，使得巴勒斯坦政府处于一个很为难的地位，这三个恐怖分子的罪状是在5月4日参加了一次组织得很好的对巴勒斯坦主要监狱阿卡（阿克）要塞的袭击，让四十一名犹太人和二百一十四名阿拉伯人（后者主要是普通罪犯）得以从狱中逃跑。伊—兹—卢已经宣布，在联合国委员会来访期间，他们准备停止他们的恐怖活动，但是唯一的条件是英国人同样应该不再

---

按照哈里·莱文：《严阵以待的耶路撒冷》（伦敦，高兰兹，1950年版，第43页）一书中的说法，后来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声称，高级专员支持这个呼吁，并曾在政府不接受这个呼吁时提出过辞职。

《泰晤士报》，1947年8月22日。请与老练的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哈里·扎赫尔的议论对照一下（《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7年3月7日，第9页）：“政府应当鼓励用移民的办法进行扩张，并且鼓励那种使犹太当局撤退时能够承担起他们的责任的、必要的创造性的努力。”

见贝京：《起义》，第319页。

见特雷弗：《在白皮书下》，第318—319页注(77)。一个附在这个宣言之后的公报中指出，自从政府早在一个月之前呼吁代办处和犹太民族会议进行合作反对恐怖主义者未获效果以来，已经发生了四十八起恐怖主义的暴行事件。代办处发表了一个反声明，提出进行合作的条件，要求在增加移民数额上作出让步，并补充说：“现在政府因为少数几个亡命匪徒的罪行对全体伊休夫进行报复，并企图强行实施戒严法……来惩罚所有的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7年3月7日，第2页）

然而，当政府希望通过散发十名“通缉”的恐怖分子的照片和文字说明以求获得情报时，希伯来文印刷所拒绝承印（特雷弗，前引书，第324—325页）。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驻耶路撒冷记者报道，1947年4月4日，第4页；贝京：《起义》，第323页。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7年8月28日，第3—4页；但参见同上，1947年3月14日，第6页和1947年3月21日，第1页，这几处表现了一种忧虑，提心恐怖活动以及实施戒严法对犹太人中不太坚定的分子所能产生的影响。

阻挠非法移民，不再宣判死刑，不再进行搜查或实行宵禁。犹太代办处的一位发言人评论说，这个委员会将要在“绞刑架的阴影”下开始它的工作，这是“非常可悲的”，于是，这就成了这个委员会内部争论的一个问题。经过将近两天的讨论之后，以十一名成员中六人赞成的勉强多 242 数通过了一项决议，对判刑的执行“可能会引起的不利反击表示关切”。政府的秘书长回答说，除非经总司令批准，

否则判刑没有法律效力。

在这个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整个期间，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表示他们自己行动的独立性和使英国当局为难方面始终保持主动，而英国当局现在也使用了比过去英美委员会时期更为尖锐的语言来议论犹太复国主义者。这种气氛。还受到当时英国在巴勒斯坦的武装力量同犹太恐怖主义分子之间的斗争相关的一些事件的影响。据说，联合国委员会的两位成员，曾出席参加在特拉维夫为“派尔马契”分遣队的一名成员举行的“英雄葬礼”。这个人是在封锁一条地道时被隐藏的炸弹炸死的，恐怖分子掘这条地道是打算炸掉特拉维夫的英军司令部。一件英国警察也卷进去的非常严重的事件是，一名曾参加恐怖组织斯特恩集团的十六岁犹太青年亚历山大·鲁博威茨，在 5 月 6 日失踪了。他显然是被巴勒斯坦警察的一支突击队抓去的，这支由陆军十字殊勋勋章获得者、二十六岁的罗伊·法兰少校指挥的新近组成的队伍，是专门为了以机智来击败恐怖分子的。从此没有找到过鲁博威茨，不论是活的还是死

---

“其目的在于消灭作为一个民族的犹太人，而只承认可以当作屠杀或怜悯对象的个别犹太人的存在。……目前，英国政府对取得一个解决办法以消除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分歧，并不感兴趣；由于一些既与犹太人无关，也与阿拉伯人无夫的原因，他们更希望这些分歧继续存在下去。……巴勒斯坦警察对于铲除恐怖主义匪帮不作认真的努力，令许多记者大为惊讶。……有些人公开断言，警察和恐怖分子之间是有接触的。且不说其动机如何，目前的政权从恐怖活动中获得具体的益处是十分清楚的。”（《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7 年 4 月 11 日，第 3 页）同样，据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朋友告诉在 1947 年 6 月抵达巴勒斯坦的联合国特别委员会中最亲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成员豪尔赫·加西亚-格拉纳多斯说，英国故意允许恐怖主义运动继续存在，“以便从全国动乱中得到好处”（《以色列的诞生》，第 117 页）。

1947 年 5 月 9 日，联合国：《大会第一次特别会议正式记录》（official Record of the 1st Special Ses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第 3 卷，第 184 页，这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宣布英国的观点，对它的确应该比过去作更多的考虑）

这十一个国家是奥地利、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危地马拉、尚未分治的印度、荷兰、波斯、秘鲁、瑞典、乌拉圭和南斯拉夫。

关于这个发言受到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赞赏，见《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7 年 5 月 23 日，第 1 页；5 月 30 日，第 5 页；阿拉伯报纸则相当沮丧。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相比，情况的确已经变化；那时，苏联的宣传曾鼓励阿拉伯叛乱并谴责犹太复国主义是英帝国主义的一件武器；见马丁·埃邦：“共产党在巴勒斯坦的策略”（Martin Ebon “Communist Tactics in Palestine”），《中东杂志》，1948 年 7 月，第 2 卷，第 255—269 页。

如考虑到局势，事件的次数比人们担心的要少得多。1 月 31 日克罗斯曼曾说，去年夏天他从巴勒斯坦方面收到的关于许多据说是军队干的暴行的调查报告，使他相信，虽然有少数几件是真实的，然而，“一般他说，……在几乎不可想象的情况下，过去七个月里居然发生得这样少，这简直是怪事”（下院辩论，第 5 辑，第 432 卷，第 1323 栏；参阅特雷弗，《在白皮书下》，

见上文，原著第 233 页。

一条通过法国和意大利的地中海港口和来自黑海的、经常不断的交通线，在官方的默许下继续存在，尽

的。 法兰后来也从未被绑架鲁博威茨一案中的任何犹太见证人指认为案犯，他还声称那时候他到别的地方去了。 但是，一位朋友在6月2日警243告他说，当局为了抢在犹太复国主义向联合国委员会陈述之前，已经决定要他对那个青年的被害负责；因此，法兰两次从拘禁中逃走，又两次来自首，这自然给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抗议增添了力量。7月7日，犹太代办处向委员会提出了一份备忘录，陈述巴勒斯坦的混乱状况，要法兰的突击队对鲁博威茨被拷打致死负责，并说一些警察成员应对3月16日炸毁代办处的新闻处负责。

当联合国委员会还在巴勒斯坦的时候，那里的英国“当局由于“1947年出国”号这只船的到达而感到很为难（可能是故意选择这个当口）。这只船装来的非法移民，其数目之大是过去任何一只船所不曾有过的。这只船是“‘哈加纳’的朋友们”从美国一家轮船公司买来的，并配备有一个“哈加纳”的船员班子，在中美洲的一个国家登记后，从美国东海岸的一个港口出海航行的。由于英国伙同葡萄牙和意大利政府进行干预，这只船受到追踪和耽搁；有人领航，这只船进入了马赛以西八十五英里的一个法国小港——塞特。“哈加纳”组织的卡车队在6月底把总数有四千五百五十四名的犹太人从德国装运到了塞特，他们都持有去哥伦比亚共和国的护照和签证。虽然由于英国的建议，派了一名哨兵去防止这艘船启航，但是它再一次成功地溜出了港口，并且在7月17日到达了离巴勒斯坦海岸大约六十英里以内的地方。《基督教科244学箴言报》驻海法记者写道：“在这里的犹太人相信，要促使委员会信服，一艘‘非法的’船，也许抵得上一千万句空话”。“哈加纳”的“地下”电台开始转播这只船的无线电广播。英国的办法照例是只在巴勒斯坦三英里的领水之内拦截这种船只，据官方所声明，这一次就是照此办理的；但是这只船的无线电则声称它仍处于领水之外十四英里。它采取了“急剧的

---

管英国呼吁各有关政府给予合作来阻止它；见下文，原著第243页注（即本书第417页注——译者），和原著第244页注（即本书第418页注——译者）。

见《泰晤士报》，1947年4月24日；《纽约时报》，6月7日；《纽约先驱论坛报》，6月10日。

见M·Z·R·弗兰克：“美洲的犹太人”（M.Z.R.Frank：“The JewsoftheAmericas”），《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2年1月2日，第6页；A·L·舒斯海姆：“拉丁美洲的犹太民族”（A.L.Sehusheim：“Latin-AmericanJewry”），同上杂志，1948年8月6日，第10页。

见《纽约先驱论坛报》和《泰晤士报》，1947年6月3日；加西亚-格拉纳多斯：《以色列的诞生》，第13—15页。据报道，南斯拉夫代表在这个委员会上“对一切反对英国的证据表现出最强烈的兴趣……令人回想起葛罗米柯在联合国特别会议上的表演”。据西德尼·赫茨伯格：“历史中的这一月”，《评论》，1947年8月，第160页。南斯拉夫与苏联的不和这时还没有发生。

第二年秋天巴勒斯坦阿拉伯工人协会书记萨米·泰哈的被害，据说就是因为他反对穆夫提的领导的缘故（见理查德·格雷夫所：《无政府伏态中的试验》，第84页；赫尔维茨：《争夺巴勒斯坦》，第234页，第281页，第292—295页；关于1938—1939年阿拉伯叛乱期间的类似的报复行为，参阅《概览，1988年》，第1卷，第418页，第421—422页）。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特派记者报道，1947年6月27日，第3页；加西亚-格拉纳多斯，前引书，第43—44页。

见克里奇·琼斯在下议院的声明，1947年5月7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87卷，第416—417栏；威尔逊：《封锁线和搜查》，第123—127页；贝京：《起义》，第276—279页。

见同上书；第299页。

逃避行动”，企图再次驶往三英里的界限之外，以致使它自己和正在拦截它的几艘英国驱逐舰都受到损伤。英国海军的上船检查队伍受到了“喷气、浇油、放烟雾弹和爆竹、投掷罐头和瓶子以及催泪弹”等等的反击，及至这只船被控制住的时候，有两名犹太人被棍棒打死。当“出国”号被押送到海法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哈加纳”总部便对于“罪恶地违犯国际法在领水外进行海盗式的攻击”一事，向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发出了一份抗议；犹太代为处也对“一种肆无忌惮的、恶毒的行为……一种毫无人性的残暴行为”提出控诉。原来想要得到的效果，事实上在这个委员会于7月20日离开巴勒斯坦去贝鲁特之前就已经得到了；南斯拉夫共产党政府的代表叫喊说：“这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的证据。”

联合国委员会发现阿拉伯国家联盟的代表们仍旧毫不妥协，不亚于他们在伦敦会议上的表现，当7月30日在日内瓦开始考虑委员会的建议时，它的成员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是这样的大，以至于委员会在8月5日同根据一种说法，负责这一转运的英国军事当局的意见是这样的：“如果没有岸上的犹太人和船上更加狂热的人们的威胁，很多乘客无疑将会愿意离开这几条船的，但是面临着这种有组织的反对，他们踌躇不定，终于留了下来。”（威尔逊：《封锁线和搜查》，第137页）法国的地方官员让“哈加纳”的代表通过一只船上的扩音器对那三条船讲了话，在它们停泊在法国须水内的三个星期期间，只有大约一百三十名或百分之三的乘客接受法国的邀请上了岸；其余乘客的一位发言人则宣称：“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决不在欧洲登陆。”这时，英国官方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因为7月31日在巴勒斯坦发现了两名英国警官的尸体，他们是被伊—兹—卢绑架和吊死的，作为对6月16日判处三名恐怖分子死刑并于最近处决的报复。作为反报复，英国警察部队的成员也杀害了一些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并且在英国几个城市中举行了相当强烈的反犹太人的示威游行，正如《犹太复国主义评论》的一名记者所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1947年8月8日，第3页，第10—11页；1947年8月15日，第4页，第14页；1947年11月14日，第6页）。“出国”号的乘客得到了最后警告：决不会把他们带往巴勒斯坦或塞浦路斯；这是在法国登陆的最后一次机会：最后将他们仍运回德国的英国占领区——“除了塞浦路斯之外，能够立刻为这样一大批人准备好足够的住房和食物的唯一的一块英国官辖的领土”（英国外交部声明，1947年3月21日的）。根据一位美国人关于最后一段经过情况的叙述，“在整个航海过程中关系是这样的好，以至于很多犹太人说，他们确信，这种军队决不会服从对他们使用武力的命令的。尽管这些军队试图善意地、委婉地劝说他们不要这样想，但是很多犹太人仍旧指望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另一些作最坏打算的人，则事先就为他们决心要在汉堡进行抵抗表示歉意，并解释说它的目标不是针对军队，而是针对他们的政府。但是，无论是这些亲近，还是任何其他的表示，都不能打动这支军队。当登陆的时间到来的时候，他们在两只船上遇到了强硬的抵抗，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才完成登陆工作”（威尔逊：《封锁线和搜查》，第137—138页）。会议正式休会，改为非正式的讨论。讨论一直继续到27

---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7年6月20日，第1页。《新犹太》1947年6月第2—3页的社论说，“一项宽大的措施可能会产生一项对国家最为有益的效果”；但是它没有提到，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一系列缓刑措施并未作出过反应，这种措施只是因4月16日的执行死刑而中断了（见上文，原著第240页）。

日，距离应该向秘书长作出报告的限期只剩下五天了。一致同意的一点是委任统治已证明不切实际，但是波斯和印度两国的穆斯林代表以及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人，赞成两个民族的联邦国家。八国的多数派则开始拟订一个“实行分治但在经济上联合”的方案，但是象他们的前辈英国人在1938年时的情况一样，他们发现要分配西部加利利、南部沙漠（内格夫）和耶路撒冷地区的领土，就会遇到几乎是无法克服的困难。经过一系列仓促的磋商和互让，结果是把这个只比威尔士或马里兰大一点的国家从纵的方面分为两半；然后再从横里分三段；此外，还建立一块被包围在中间的国际化的耶路撒冷和伯利恒地区；设置246个“交叉点”，以便使阿拉伯和犹太的南北各两块土地同它们各自的中心地区之间得以沟通。按照这个方案，各由三段领土构成并象两条互斗的蛇一样纠缠在一起的阿拉伯和犹太这两个国家，只有当它们签署了一项十年经济联合条约，并于其中规定，由经济上较优裕的犹太国给予较贫弱的阿拉伯国以财政补助时才能得到独立；这种规定使得这个“割成千段而死亡”的方案更加不可能实施。据估计，在犹太国内，起初至少有百分之四十五的人口（如果贝督因人也计算在内，则占人口的百分之五十）是非犹太人；但是，在过渡阶段提供犹太移民，将很快地改变这种反常状态；另一方面，在建议中的阿拉伯国内，少数民族犹太人将只占它的人口总数百分之二稍多一点。

9月2日，犹太复国主义者总会政治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关于早日建立一个主权的犹太国家的建议。这一决议还写道：“但是，建议中的领土，只是原先根据犹太人民的历史权利而答应给予犹太人的领土中的一小部分，并且没有包括那些最重要的地区。”韦茨曼在7月8日曾亲自告诉联合国委员会说：“我相信有很多认真思考的阿拉伯人，如果他们感到这个计划是以联合国所拥有的全部权威、尊严和……道义力量来推动的话……最终将会予以默认。也许穆夫提将不会予以默认，但是我不认为这将引起不可克服的困难。”“一般普通的巴勒斯坦犹太人”据说对这个报告“在目前基本上是乐观的和满足的”，这种满足在《犹太复国主义评论》的一位正式记者对

阿拉伯人可能会有反应的估计中也反映了出来。不顾阿拉伯国家的不可

---

见赫尔维茨：《争夺巴勒斯坦》，第292页。

见威尔逊：《封锁线和搜查》，第131页；《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7年7月7日，第4页；贝京：《起义》，第291—293页。

《每日电讯报》，1947年6月21日；《泰晤士报》，1947年6月26日。

见罗伊·法兰：《带翼的匕首》（Roy Farran: Winged Dagger），伦敦，柯林斯，1948年版，第351页。

他的失踪在犹太人中间引起了各种各样的谣传，从这支独立自主的突击队的存在这个事实，一直到在警察内部有一个英国法西斯运动的核心小组这种传说为止。见《新犹太》，1947年6月，第175页；《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7年6月13日，第4页；《纽约时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1947年6月14日。后来，犹太复国主义者把1948年2月1日炸毁《巴勒斯坦邮报》大楼和2月22日耶路撒冷的本·耶胡达街大爆炸（大约有五十个犹太人被炸死）都归咎于这个“大家知道以前曾由法兰上尉领导的……反闪族的警察法西斯匪帮”（《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8年2月6日，第2页；参阅同上，2月13日，第6页）。本·耶胡达街那次暴行，是一些穿着英国制服（在当时巴勒斯坦所处的那种情况下，这不能证明穿英国制服的就是英国人）乘坐偷来的军警车辆的人搞的。一些收信人在3月3日还收到过一份用奇特的英文写的传单（原文载凯斯特勒：《许诺及其兑现》，第172页注），其意图是想说明这个暴行是“英国军警联合会（巴勒斯坦分部）”，即英国法西斯分子干的。1948年3月10日有三个开小差的英国警察，在参加



避免的反对，联合国大会设立了一个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就巴勒斯坦问题的各种建议进行研究和提出报告。在这个委员会开始工作之前，英国还宣布了一项决定：把英国主要的中东军需仓库从运河地区迁往肯尼亚；这项决定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考虑后作出的。克里奇·琼斯于9月26日这个委员会开幕时致辞说“247……联合王国政府不准备用武装力量在巴勒斯坦强制推行一项政策。在考虑它将参加执行一项解决办法的任何建议时，它必须考虑到两个方面，即这种解决办法固有的合法性和实行这种办法将需要多大力量……在缺乏解决办法时，它不得不计划从巴勒斯坦早日撤出英国的部队和英国的行政机构。”

最初，犹太复国主义者把英国意图的这种警告当作是“讹诈”，不予理睬，但是《犹太复国主义评论》的驻耶路撒冷记者却注意到，高级专员10月8日重申的，除非犹太人和阿拉伯达成协议否则就要撤离的意图，“肯定造成了一个局势严重的印象。阿拉伯国家拒绝作出最微小的让步（这种让步可能会影响一部分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并未承担义务的联合国成员国转过来支持它们），这就再一次表明它们十分缺乏建设性的政治理智。相反地，从9月16日至19日在苏法尔（黎巴嫩）举行会议的阿拉伯国家联盟政治委员会，却作出决定，要用一切实际可行的和攻击性的手段，来抵制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建议的实施。开罗《金字塔报》也写道：“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将发动一场无情的战争。来击退对他们国家的这种攻击，特别是因为他们知道，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将支持和援助他们，供给他们人员、金钱和弹药。”犹太选举会议立即宣布犹太人力总动员，并且以“狂热的活动”开

---

阿拉伯人袭击一处犹太居民区时，在一辆偷来的装甲警车上被逮捕，为此他们被判处十年监禁的徒刑。

法兰，前引书，第351页。

仍担任犹太代办处政治部代理主任的戈尔德·迈耶森夫人，在6月23日向高级专员递交了一份根据她收到的情报写成的关于鲁博威茨的所谓被拷打致死的详细情况（《纽约先驱论坛报》，1947年6月24日）。1947年10月1日，法兰来到普通军事法庭受审。法庭根据英国法律，承认法兰的上司有权拒绝透露他在鲁博威茨失踪的第二天同法兰的谈话内容，因为这有可能使他自己成为有罪的人。法庭还支持辩护人反对把法兰在监禁中所写的东西拿出来作证据，理由是既要为他辩护就得有这个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举出来把法兰牵连进去的唯一证据就是一顶呢帽，在帽子的里边写着一个墨迹已很淡的名字，看上去很象是法兰的名字。这顶呢帽是作为鲁博威茨的追捕者所遗留下来的物证而提出的。一个十三岁的犹太孩子曾亲眼看到绑架，但是后来在三次对证时都没有能认出法兰或他的十人小组中的任何一人。他说他先把这顶帽子交给一所犹太会堂，从那里，据说在一个星期后帽子又转到了鲁博威茨的兄弟手里，他再把它交给了警察。在英国法律程序规定的各种限制下，起诉人提出的这个证据是不充分的，于是法兰被释放了。

“哈加纳”的移民部头子在6月15日承认，英国外交方面的压力，严重地干扰了从欧洲的难民营前往地中海各港口的非法移民的行动（《纽约先驱论坛报》，1947年6月16日；参阅《纽约时报》，1947年7月2日和10日；马里奥·罗西：“意大利：犹太的巴勒斯坦万岁”（Mario Rossi：“Italy：Vivala Palestinaebraica”），《评论》，1947年7月，第23—27页。

关于逃走的详情，见鲁思·格鲁伯：《目的地巴勒斯坦：“哈加纳”船“1947年出国”号的故事》（Ruth Gruber：Destination Palestine, the Story of the Haganah Ship Exodus 1947），纽约，A·A·温，1948年版；加西亚格拉纳多斯：《以色列的诞生》，第172—176页。法国对这件事的态度多少是出于这样一种愿望：为法国从近东各国被赶出来一事对英国进行报复。参阅《世界报》，1947年7月24日社论，“不久前还在想尽办法把我们从中东排除出去，现在却要我们在那里承担新的责任，这不是奇怪吗？”

“宣传工作已做到什么程度，这可以拿下面的例子来说明。把一个几天前在船上死去的一岁孩子陈列出

始改组“哈加纳”，把它从地下部队改变成一支正规军。“哈加纳”部队被部署在叙利亚边界沿线，据未证实的谣传，那里有阿拉伯军队在集中；夜间，他们给碉堡和装有探照灯的岗楼配备人员。然而，《犹太复国主义评论》驻耶路撒冷记者，对于真的会跟阿拉伯人发生一场冲突仍旧表示怀疑。英国下院议员、248 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丹尼尔·利普森向犹太复国主义者呼吁，“不要追求一种将会增加另一次战争危险的政策”，但没有成效。

在特别委员会的一般辩论中，美国和苏联的代表都支持分治建议》尽管对于建议中的犹太和阿拉伯两国之间的边界有所保留。美国代表指出，在通向独立的过渡时期内，巴勒斯坦的行政管理责任仍由委任统治国担负，独立之后，为了维持国内的法律和秩序“可能需要建立一支史联合国在自愿基础上征募的特别保安部队或警察部队”。克里奇·琼斯在 10 月 16 日的答复中表示，英国政府拒绝“单独地或在起主要作用方面”承担责任；他对犹太复国主义者“造谣和断言”巴勒斯坦政府正在鼓励阿拉伯人暴动表示悲愤；他还抗议，“某些政府默许由它们的国家提供船只，武器和金钱”来帮助非法移民，“这种做法大大影响了阿拉伯世界的感情，并且对不容易控制的工作施加了不负责任的影响”。但是，英国代表赫谢尔·约翰逊，还是在小

---

来，并向报界发表声明说：‘卑鄙的纳粹英国凶手用煤气毒条了这个无辜的受害者。’一位比较温和的乘客对军队中的一些人低声说道：‘这不是反对你们，是对报界说的’，但是这种话于事无补”（威尔逊：《封锁线和搜查》，第 110 页）。

在埃及边界的腊法附近的海面上，距离海岸很近；参阅同上书，第 135 页。

《泰晤士报》驻海法记者报道，1947 年 7 月 19 日；《纽约时报》，1947 年 7 月 20 日。参阅加西亚-格拉纳多斯：《以色列的诞生》，第 177182 页。向他提供消息的人是一位卫理公会牧师，亲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美国基督教巴勒斯坦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他通过“哈加纳”的帮助也搭上了这艘船，后来在“哈加纳”的纽约总部他还接见过记者（《纽约时报》，1947 年 8 月 9 日）。

雷默·比加特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的文章；1947 年 7 月 19 日和 20 日。英国外交部于 21 日声明：依照战前办法，根据国际惯例以及与法国政府达成的协议（法国政府在 3 月间曾答应在阻止往巴勒斯坦非法移民方面给予合作），“出国”号上的乘客正在用三艘英国运输舰运回法国。超过白皮书上规定数字的三万名犹太人，现已被允许进入巴勒斯坦，另外一万五千至一万六千人（接近一年的限额）正在塞浦路斯等待轮到他们前往巴勒斯坦（霍尔勋爵 1947 年 8 月 13 日的发言，上院辩论，第 5 辑，第 151 卷，第 1388 栏）。但是，法国政府回答说，他们不能对乘客从法国启程他往负责，因为他们都有哥伦比亚签证的护照。虽然巴黎的哥伦比亚公使馆否认这些签证是真的，而这些护照这时似乎都已经被销毁，但是，法国政府说，当这些乘客于 7 月 29 日抵达法国领水时，他们将被允许自由选择去向。

参阅英国殖民部：《巴勒斯坦分治委员会：报告，1938 年 10 月》（PalestinepartitionCommission: Report, October 1938），敕令第 5854 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38 年版）。

见本书末图三，其中包括后来为联合国大会所采纳的一些小的修正；参阅下文，原著第 249 页注（即本书第 426 页注一译者）。

《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给大会的报告》〔《大会第二届全体会议正式记录》（Official Recordsof the 2nd Ses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1947 年，增编第 11 号〕附有地图；参阅加西亚-格拉纳多斯：《以色列的诞生》，第 233—246 页。

《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给大会的报告》（《正式记录》，前引文，第 82 页）。本-古里安在 7 月 4 日曾告诉这个委员会说，如果犹太复国主义者从这方案中得到一个有利的裁决，那末他们就会走到阿拉伯人那里去同他们说：“这里是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决定。我们是正确的。我们希望和你们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如果你们回答说，那末我们将使用武力来对付你们。”（同上，第 56 页）

组委员会上竭力敦促英国部队在一个联合国三人委员会的监督下负起法律和秩序的责任，一直到1948年7月1日犹太(和阿拉伯)国诞生的那一天为止。

另一方面，苏联代表则想让委任统治在1948年1月1日结束，要英国军队在那个日期之后三四个月内撤出；到11月10日，美苏两国就下列两个日期达成了协议；委任统治在5月1日结束，两个国家在1948年7月1日建立。因此，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在11月13日宣称，英国政府打算到，6月1日把他们的军队从巴勒斯坦撤退完毕，尽管由于联合国大会显然已经不能订出一个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民政管理随时都可能结束，他反对小组委员会在11月19日向特别委员会提249出的决议草案中所包含的那项建议，即联合国大会一旦采纳了一项解决办法，巴勒斯坦的行政管理应立即移交给由大会委任的一个五人委员会，而英国的委任统治则务并且在指挥这个匪帮的活动”（《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7年9月12日，第5页；参阅J·L·特勒的文章：“在巴勒斯坦阿拉伯‘军队’的背后”，《评论》，1947年3月，第243—245页，第249页，其中提到了传闻“渴望转移视线的英国人”“煽动”阿拉伯人等情）。仍可继续维持到不迟于1948年8月1日。他说，只要英国政府还掌握委任统治权，它就要坚持不可分割的统一管理，但是一旦已从那个领土上撤走军队时，它就会把它伯权力移交给建议中的委员会。在逐步撤离期阿，英国军队将维持他们仍驻守地厦的秩序；但不能把英国军队作为无论是对犹太人或阿拉伯人强制实行一种解决方案的工具来使用，也不能用它来替建议中的委员会维持秩序，尽管它将不妨碍委员会的工作。卡多根的副手补充说，委任统治国“只能是注意到”小组委员会的这样一个建议（最初是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伊曼纽尔·纽曼博士提出来的），即委任统治国应尽最大努力来保证尽早地、无论如何不迟于1948年2月1日，从犹太国领土内具有能为广大移民提供一切方便的海港和内地的地区撤走。犹太代办处表示，如果小组委员会的建议被接受，它愿意对拥有六千五百名阿拉伯居民的比尔谢巴镇，对该镇以北和东北的一百零六平方英里地区，对内格夫南部沿埃及边界的大约七百平方英里地区，均放弃其要求，但阿拉伯代表仍旧不屈服。小组委员会的决议草案要求，在过渡时期内委任统治国和五人委员会之间应尽可能地协调一致和进行合作；但是万一要把联合国的一项决定强加给不情愿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那种可能性，还没有受到充分的正视，因为除了苏联集团外没有一个联合国成员国亟于想卷进去。当各种建议回到特别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时，委员会首先表决并否定了一项主要是由穆斯林国家支持的建议：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单一的国家。然后于11月25日再表决分成一个犹太国和一个阿拉伯国的建议。委员会如要通过一项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的建议，只需要有一个简单的多数就够了；但

---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7年9月5日，第1页；E·拉泽松（ELasorson）少校的文章，同上，1947年9月12日，第4页。

《泰晤士报》，1917年9月13日和16日；参阅艾德礼1946年10月15日和1947年2月27日的发言，下院辩论，第5辑，第427卷，第791—792栏；第433卷，第2275—2276栏。

《联合国大会第二届会议，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简要记录》（U.N.GeneralAssembly, 2ndSession,AdhocCommiffeeonthePales-tinianQuestion,summaryrecords），第3—5页（此后简称特别委员会）。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7年10月10日，第5页；10月17日第6页。

见贾马勒·侯赛尼的不妥协的发言（特别委员会，第5—11页，并参阅第116—117页）。

是大会最后采纳这个建议，就需要有投票总数的三分之二的多数 250 票，弃权除外。委员会中投赞成票的只差一票就达到了这个三分之二的多数：二十五票对十三票（后者包括穆斯林和亚洲国家，再加上古巴），而缺席和弃权的也有十九票之多。

当联合国大会于 11 月 26 日开始研究这个决议草案时，在举行“大集会”于公众旁听席上的纽约犹太人的面前，卡多根根据他政府的指示，明确地重申：英国的军队和行政机构不能被用来保证不为巴勒斯坦双方所接受的决议。赫谢尔·约翰逊代表美国表示遗憾地说，英国正

在为它们的合作制造“不可能办到的条件”，他说，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需要“使用刀子”；但是他希望阿拉伯和犹太两国之间的边界将象美国各个州之间的界线那样可以自由跨越，并且象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边界那样可以友好地通过。某些在特别委员会上曾经弃权的代表团现在宣布他们的立场：荷兰、新西兰和比利时赞成这个解决方案，因为除分治之外唯一的抉择是“如果不是完全的混乱，也是更为严重的麻烦”；希腊和海地反对。菲律宾仍旧摇摆不定；在特别委员会上曾经反对这个解决方案的暹罗代表，则已被政变后新近掌权的暹罗新政府免职。联合国大会在感恩节休假，在这期间争取选票的活动仍在继续进行，据非官方的一项估计，现在可望有三十一票赞成分治，或许能保证稳得三分之二的多数。可是，当大会于 11 月 28 日继续举行时，法国（它的一票仍未确定，这也许是因为它在非洲有几百万穆斯林归它统治）怀着在最后一分钟达成一个双方让步的协议的希望，建议再体会一天；251 尽管美国和苏联代表团反对，这个建议还是以二十五票对十五票被采纳。但是以前在小组委员会上曾打算在阿拉伯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立场之间进行的调解，没有成功。尽管担任英国代表团顾问的哈罗德·比利提出了一个新方案，黎巴嫩代表 11 月 29 日的首次发言表明，阿拉伯国家联盟方面的立场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变。于是，分治建议得到三十三票对十三票的胜利，大大超过了三分之二的多数，十票弃权。

## 第五节 巴勒斯坦的游击战和以色列国的宣告成立， 1947 年 12 月至 1948 年 5 月

---

参阅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 3 年，1948 年 5 月增编，第 4 页。两个敌对的半军事性组织，“行义”（al-Futuwwa）和“勇敢”（an-Najjaca），在政治上分裂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中间逐渐发展起来。据估计，它们联合起来的力量是三万至四万人，“装备和训练都很成问题；它们一般不被看作为一个重要的军事因素。……‘哈加纳’则完全是一个更为可怕的家伙”（《苏格兰人报》驻耶路撒冷记者凯文·海兰报道，1947 年 8 月 29 日）。参阅 J.L.特勒：“在巴勒斯坦阿拉伯‘军队’的背后”（J.L.Teller：“Behind Palestine’s, Arab Armies”），《评论》，1947 年 3 月。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7 年 10 月 10 日，第 2 页；1947 年 10 月 17 日，第 5 页。

同上，1947 年 10 月 10 日，第 5 页。

见哈马比特（Hamabit，笔名）对他的攻击，《新犹太》，1947 年 10—11 月，第 6 页。

见特别委员会，第 63 页，第 70 页。

同上，第 64 页。

一位“哈加纳”发言人曾说，它的组织“已经证明，最近在国内各地进行恐怖活动的一个阿拉伯匪帮，是政府的特务人员所着手组织的，这些特

在联合国委员会离开巴勒斯坦后的四个月内，阿拉伯人不时地袭击犹太人，只有在“哈加纳”施加报复后才得以制止。正当世界各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欢庆联合国投票支持他们的时候，在各阿拉伯国家内，其中包括象亚丁这样远离巴勒斯坦的地方，爆发了骚乱性的示威（骚乱中还有一些外国人受害）来反对犹太人和当地的共产党人（因为苏联集团支持分治）。就在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当局宣布圣战的时候，在巴勒斯坦，由当时在大马士革的穆夫提领导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也宣布自12月2日至4日举行为期三天的总罢工，然后在5日（星期五）中午的祈祷后再举行一次游行示威。罢工的第一天，阿拉伯骚乱者就在那路撒冷烧掉了一个犹太商业区，次日阿拉伯人又在雅法和特拉维夫边境的贫民区大打出手。在252海法，阿拉伯最高委员会书记（侯赛因·哈利迪博士）拒绝了巴斯坦政府要委员会取消罢工的宴求，并且声称委员会希望罢工能“尽可能和平地。过去。而不负责任的分子则“不可避免地”要“象他们在其他地方所做的那样”为所欲为。“哈加纳”被动员起来进行自卫；犹太复国主义者抱怨说，英国治安力量在保护犹太人的生命和财产方面做得很不够。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现在所做的事要比他们应尽的责任来得少，因为英国驻巴勒斯坦士兵的情绪业已受到下述事实的影响：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1947年10月20日这个期间，他们中已有一百二十七人丧命于犹太恐怖分子之手，另有三百三十一人受伤（在该时期最后三个月中被杀害的八人和负伤的八十二人也包括在内）。那路撒冷市政委员会的英国人主席谈到他的印象说—在该城市发动骚乱的那些阿拉伯“青年无赖汉”，由于英国警察的“漠然置之”而肆无忌惮。据犹太人方面说，犹太人在那路撒冷和其他地方的立即报复行动是由极端分子挑动起来的，是违反“哈加纳”的初衷的。而且从这时起，除非想夺取武器，伊-兹-卢已经几乎不再攻打英国人的设施了，他们全神贯注于对付阿拉伯人。在这一时期，英国人的政策是仍然不愿意叫“哈加纳”作为一支武装力量公开出来抛头露面。但是，12月15日日勒斯坦政府却宣布说，特拉维夫—佩塔提克瓦地区的警察任务将全部转交给犹太人，雅法的警察任务则转交给阿拉伯人。就在游击战声势正盛的时候。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却抱怨说：尽管英国军队奉命在两个敌对的社团

之间严守中立，然而这些命令一般解释得都比较片面，对他们很不利：英国海军为了防止非法移民潜入而在沿海进行巡逻，这就使得犹太人从海外获得武器要比阿拉伯人经内地从阿拉伯邻国得到装备自己的武器来得困难；

---

见《新犹太》，1947年10—11月，第13—15页刊载的口头报告。

加西亚-格拉纳多斯说（《以色列的诞生》，第251页，第255—256页），约翰逊最初相信英国政府将会赞成这个计划，但后来他的幻想破灭了。

见《以色列的诞生》，第261页。

见特别委员会，第170页，第249页和下文，原著第255页。赫谢尔·约翰逊代表美国说话，抱怨英国代表团缺乏合作，使得委员会的工作更加困难（同上书，第169页，第180—181页）。

同上书，第168页，第171页；见本书末图三。小组委员会早已建议，拥有八万阿拉伯人的雅法，应该是阿拉伯国的一块飞地，而不是象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所建议的作为犹太国的一部分。

见莫里斯·J·戈德布卢姆：“历史中的这一月”，《评论》，1947年11月，第460页。

这些国家是阿根廷、比利时、中国、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法国、希腊、海地、洪都拉斯、利比里亚、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新西兰、巴拉圭、菲律宾、联合王国、南斯拉夫。

再加上好几个星期以来，英国警察当局都拒不准许犹太人定居地的警察（他们实际上全都是“派尔马契”的积极成员）使用他们在1936—1939年阿拉伯人反叛期间所搞到的装甲车，结果便有一批人都中了阿拉伯人的埋伏而作战身亡。“哈加纳”坚决地反击那些在他们看来是阿拉伯人出击地的据点：而且力图使阿拉伯的村民得到深刻的印象：他们最好还是采取消极不介入的态度，因为能够使他们最感到害怕的乃是犹太人的报复，而不是阿拉伯的战斗人员。当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双方在海法和那路撒冷都干出了骇人听闻的暴行。在约旦河的上游，报复和反报复的结果是1948年1月9日阿拉伯非正规军首次自叙利亚越界入侵，攻打两个犹太人定居地。英国装甲车干预了这次战斗，并且给叙利亚政府发了外交照会，要它阻止这种入侵行动。尽管如此，1月下半月，受过训练、装备得很好的叙利亚人，在从叙利亚军队中抽调的军官的带领下，进一步成队地进入了巴勒斯坦，去加强作战效率较差的当地的阿拉伯战斗人员。他们还不时乘坐卡车在阿拉伯军团的默许下驶过约旦河上的儿座桥梁。英国人在他们陆续撤走的时候，正在把巴勒斯坦的完全是阿拉伯人居住的地区的守卫工作，交给阿拉伯军团。尽管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报复行动给阿拉伯巴勒斯坦边缘地区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了很大损失，然而据3月初估计，共五千多人的七批援军的到来，还是给加利利和萨马利亚的阿拉伯人地区以及耶路撒冷附近地区增添了纪律的因

---

阿利斯泰尔·库克（AlistairCooke）在《曼彻斯特卫报》上的文章，1947年11月28日。

联合国：《联合国大会第二届会议正式记录》，全体会者，第2卷，第1324页，第1326—1327页。

根据《福雷斯特日记》（第309页，第323页，第344—346页，第348—349页，第357—358页），杜鲁门总统在他本党顾问们的压力下，竭力确保那些接受美国影响或听从美国意见的国家将投赞成票；最高法院的两位法官也在为同样的目标而努力。这个说法得到前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的证实（《我们不必要失败》，第63页）；参阅《费拉德尔菲亚记录》（PhiladelphiaRecord），1947年12月3日，下院引文，1947年12月11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45卷，第1284栏。另一方面，加西亚-格拉纳多斯声称，总统曾亲自告诉他说并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压力（《以色列的诞生》，第269页）。

特别委员会，第146页。

据《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1947年11月29日报道，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看攻击比利根的根据。

下列各代表团在特别委员会进行表决时曾弃权或缺席，现在则投赞成票：法国和比、荷、卢三国，新西兰，海地，利比里亚，巴拉圭和菲律宾。曾投反对票的暹罗现在缺席；曾投赞成票的智利现在弃权；曾经弃权的希腊现在投票反对。中东和亚洲各国代表团没有一个投票赞成这个解决方案。

见理查德·格雷夫斯：“无政府状态中的试验”，第72页；《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7年8月15日—9月5日。

在大马士革，示威者把他们的怒火发泄在一个苏联机构和叙利亚共产党人的身上，杀死了好几个人。夫国驻大马士革和贝鲁特的使馆遭到攻击，在巴格达的美国新闻处也被捣毁。在阿勒颇，三百所犹太人的房子和十一座犹太教堂被烧毁，据说全城五千名犹太人中有两千入逃亡 [M·皮尔曼（V.Pear）在《巴勒斯坦事务》上的文章，1948年1月，第4页]。在亚丁，由于那里的行政当局措手不及，据官方报道，有七十六名犹太人和三十八名阿拉伯人被杀。对构成大部分现有治安力量的亚丁保卫（阿拉伯）民团的行为，有很多批评。参阅英国殖民部：《1947年12月亚丁骚乱调查委员会报告》

（ReportoftheCommissionofInquiryintotheDisturbancesatAdenDecember1947），殖民部文件，第233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8年版；A·S·戴蒙德：“亚丁骚乱”（A·S·Diamond：“TheAdenDisturbances”），《犹太月刊》（JewishMonthly）1949年1月，第2卷，第582—586页。

素，也暂时提高了农民和易受外界影响的城市下层居民的士气。对犹太人定居地正面的 of Transjordan, Amman, 15th March, 1948) ]，敕令第 7368 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8 年版）。它的司令官和相当大的一部分军官都是英国人（见下文，原著第 273 页注，即本书第 468 页注——译者），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和犹太人开始积极活动以来，它就是被当作英国在巴勒斯坦驻军的一部分来使用的。关于谴责阿拉伯军团对“和平的犹太居民”和交通运输的“屠杀成性的袭击”和“无缘无故的侵犯”的发言等，见 1947 年 11 月 18 日，下院辩论，第 5 辑，第 445 卷，书面答复，第 418—419 栏；谢尔托克 1948 年 2 月 27 日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发言：《正式记录》，第 3 年，第 16—35 号，第 351 页；扎赫尔，前引书，第 200 页，第 202 页，然而阿拉伯军团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挑衅也有它自己的说法，见《中东杂志》，1953 年春季，第 7 卷，第 256 页。攻击，几乎不可避免地要使阿拉伯人遭到惨重的失败。然而他们终于施展了一种更有效的、也就是扫除外围定居地的持久战的策略，其办法就是袭击公路交通线，以切断对这些地方的粮食和弹药的供应。这些袭击充满了血腥味，没有一方会放过一个活着的敌人或交还俘虏。阿拉伯人一举歼灭了一支三十五人的“哈加纳”分遣队，他们是奉命前往增援守卫着埃特锡翁村据点的另一支“哈加纳”支队的；那里有四个犹太居民点，孤零零地座落在耶路撒冷和希布伦之间的犹太山中。

1 月 20 日，英国殖民大臣宣称，允许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他们各自占绝大多数地区为本身的安全作出安排的政策，已经进一步得到贯彻，所以英国的警察就可以集中驻扎在耶路撒冷和这两个民族混杂居住的其他一些地区；并已通知犹太代办处，只要它的防务组织纯粹起防御自卫作用的，就不会受封阻挠；也本会再去搜查武器，除非武器被错误地用之于发动进攻。接着，里斯托韦尔勋爵又谈到了近几周来在耶路撒冷旧城内所发生的激烈冲突：大多是犹太恐怖组织投掷炸弹而引起的，而阿拉伯人则对旧城犹太人居住区实行封锁，以资报复。在“哈加

纳”威胁要用武力来突破封锁后，只得在英军的武装护送下，对被围的犹太人运送食物。就在这个时候，奉命实施联合国大会分治计划的五国委员会（由玻利维亚、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巴拿马和菲律宾的代表组成），已于 1 月 9 日在成功湖开始工作。然而，他们发觉：巴勒斯坦的战斗，已使英国政府愿意协助该委员会贯彻联大决议的劲头大为减弱。英国代表团通知委员会说，根据巴勒斯坦政府的意见，假如委员会到巴勒斯坦去的话，那末就有遭到阿拉伯人袭击的危险，而且它肯定得不到一般阿拉伯人的合作，也肯定得不到构成行政机构成员约百分之六十二的阿拉伯文职人员的协作。英国政府无法负责委员会的安全，也不能在他们决定结束委任统治的那一天（5 月 15 日）之前，就把一部分权力移交给委员会，因此也就不准备让委员会在

---

菲茨休·特纳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的文章，1947 年 12 月 4 日。· 430·

1947 年 7 月 29 日，下院辩论，第 5 辑，第 441 卷，第 947—248 栏；1947 年 7 月 30 日，同上，书面答复，第 50 栏；1947 年 10 月 29 日，同上，第 443 卷，书面答复，第 72—73 栏。

格雷夫斯：《无政状态中的试验》，第 102—103 页，1947 年 12 月 2—3 日的日记。

莫里斯·J·戈德布卢姆：“历史中的这一月”，《评论》1948 年月，第 60 页。

皿威尔逊：《封锁线和搜宣》，第 155—156 页。

更早于，譬如说，5月15日前两个星期的某一个日子，就来到巴勒斯坦。他们不能遵从联大的决议，把一个海港及其内陆让给犹太复国主义者，以便利大量的移民，因为大批移民、可能还有武器的到来，无疑势必会进一步使内部冲突白热化，也会使巴勒斯坦行政机构中英国人员的退出和英国军队以及物资的撤走变得更加危险。英国方面还反对让所建议的犹太和阿拉伯两个国家的临时委员会行使法律规定的权力，反对在委任统治结束之前就授权组织武装民兵。事实上，巴勒斯坦的两个敌对社团已经变得越来越独立于委任统治的政权之外；对于英国想在委任统治结束之前至少保留一点残存的秩序的愿望，设在成功湖的委员会可能没有给以足够的估价；但联合国和全世界还是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即英国的态度说来说去还是由不愿意合作的想法所

左右着的。

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委员会就在2月16日向安理会提出了给予武装协助的问题，因为只有在这种武力的支持下，委员会才能继续进行自己的工作。24日，英国殖民大臣就他的政府所以不遵从联大决议的某些条文这一问题，在安理会极力辩解说，他们认为那些条文不现实地忽视了安全方面的困难和责任分散所造成的危险。他说，某些重要的行政职务正在转交给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政权机构，英国并不想破坏它的统治在巴勒斯坦已完成的事业，在过去三个月的游击战争期间，又有近一百名英国军警人员被杀害，另外还有好几百人受伤，因此，英国的公众舆论，不再会同意见用牺牲英国人生命和浪费英国人财富的办法，在巴勒斯坦硬性推行某种政策。而谢尔托克则代表犹太代办处谴责英国人采取一种保持中立的理论，“一种在攻击者和被攻击者之间，在维护与蔑视联合国权威的双方之间，不分青红皂白、等量齐观”的理论。

---

M·亚历山大（MAlexander，笔名）：“犹太国以色列的建立”。《欧洲档案》

（“DieGründungdesJüdischenStaatsIsrael”，EuropaArchiv），1949年9月20日，第2459—2460页；扎赫尔：《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203—204页。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驻耶路撒冷记者报道，1948年1月2日，第4—5页。

见格雷夫斯：《无政府状态中的试验》，第120—121页，第124页；并参阅莫里斯·J·戈德布卢姆：“历史中的这一月”，《评论》，1948年2月，第168页。

威尔逊：《封锁线和搜查》，第159—160页；参阅犹太代办处的说法。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3年，1948年5月增编，第9页。

在这些队伍的指挥官中有叙利亚上校阿迪卜·希沙克利和阿克拉姆·胡拉尼（见《纽约时报》，1948年1月18日），他们后来在1949—1901年的叙利亚军事政变中起了领导作用。较为人所知晓的，是这一北方战线的总指挥官福齐·卡武吉。他是一位来自黎巴嫩的黎波里的穆斯林，曾在奥斯曼帝国的军队中服役，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历任驻叙利亚的法国军队中的情报官、伊本·沙特的军事顾问和伊拉克军队中的军官；在1998年的起义中又做过巴勒斯坦阿拉伯游击队的“大元帅”（《概览》，1936年，第738页），1941年他参加过流产的伊拉克反对英国的暴动，然后又逃往德国。战后，在被俄国人监禁过一个时期后获释，同穆夫提一样，在法国找到了避难所。1947年2月他化了假名离开法国去埃及，在卢德机场他又混过了英国的护照检查关卡（1947年3月5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34卷，第468—470栏；以及1947年3月3日，同上，书面答复，第18栏）。

1902年，一位不抱偏见的英国权威人士对作者发表自己的见解说，由穆夫提在巴勒斯坦境外进行领导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在这次战斗中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组织得好。它已经在所有的阿拉伯城镇和大约二百



他还抱怨说，英国人实际上是歧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如果那个“清楚指明的”维护巴勒斯坦秩序的国际力量无从建立的话，那末他就要求对“那些准备为贯彻”联合国建议而“承担起防卫责任的人”（也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取消武器禁运，而对那些抵制联合国建议的人，包括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所有成员国，则不得再供应武器。257 联合国秘书长在巴勒斯坦委员会于1月9日举行第一次会议时，曾乐观地告诉它的成员们说：“你们可以深信，一旦有必要的话，安全理事会将在贯彻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时担负起全部责任。”然而，及至安全理事会面临着委员会的要求予以武装协助时，事情也就不那末简单了。联合国大会关于巴勒斯坦的决议，本来也只是一种建议，因此它对任何国家都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而贯彻这一决议的最大责任，则要落在美国的身上，美国的制订计划人员要考虑到许多麻烦的问题，诸如苏联可能会钻空子，乘机把军队或军官作为联合国部队的一部分而派到巴勒斯坦去，还有巴勒斯坦危机也会影响到美国在阿拉伯国家中的石油储备等等。如果西半球的石油储存有一部分要作为战略储备而保存起来，那末这就更是生死攸关的了。另外由于实行欧洲复兴计划，西欧对石油燃料的需求，预期将会大大增加；已经在计划把中东石油的产量从1947年的三亿零八百万桶增加到1951年的六亿二千万桶。因而，早在1月21日，华盛顿的国务院和国防部就已得出结论：联合国的分治计划是“行不通的”；如果不使用武力就不能使这一计划付诸实现，那末美国也就没有义务去支持它。没有局部的动员，美国能够抽调动用的兵力就很少，所以必须采取步骤撤销这一计划。2

---

七十五个村庄中设立了地方民族委员会（见赫维茨：《争夺巴勒斯坦》，第m9页），以及类似地方自卫队的准军事支队，工作效率都很高。

2月22日，犹太代办处向安全理事会控诉说，英国人忽视了他们在四十八小时前就提出过的关于这样一次入侵的警告。阿拉伯军团完全是靠英国的财政补助来维持的，这是1946年的英国—外约旦条约所规定的，不久又在1948年3月16日的修订条约中重申过（英国外交部：《联合王国与哈希姆外约旦王国之间的同盟条约，安曼，1948年3月15日》

（Treaty of Alliance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Hashimite Kingdom

见英国殖民部次官，1948年3月3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48卷，书面答复，第65—66栏；谢尔托克，前引文。

这里的阿拉伯人的指挥官是阿卜德·卡迪尔·侯赛尼，他是穆夫提的在兄弟，曾于1939年随同穆夫提去巴格达。有人怀疑他组织了1941年11月9日在那里暗杀穆夫提在巴勒斯坦的最活跃的冤家对头法克里·纳沙吉比的阴谋活动。关于这件事的背景，见《概览，1938年》，第1卷，第443—444页。

尽管如此，阿拉伯人中间的那些比较温和而又不好斗的人，对这种非巴勒斯坦阿拉伯军队的出现并不那末兴高采烈，因为它们会把“哈加纳”吸引来对当地居民进行报复（见威尔逊：《封锁线和搜查》，第163—164页）。参阅1949年3月13日犹太代办处致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备忘录：由于驻雅法的一名伊拉克指挥官破坏了该城市的阿拉伯人市长同特拉维夫市长之间的停战谈判，使该城受到了很大的威胁，然而这位伊拉克指挥官却对此漠然无动于衷（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3年，1948年5月增编，第31页）。

威尔逊：《封锁线和搜查》，第163—164页，第184—185页；参阅M·亚历山大在《欧洲档案》上的文章，1949年9月20日，第2460页。

根据扎赫尔的说法（《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224页，第229—230页），犹太代办处不愿意由于放弃这个难以固守的据点而使向拉伯人气焰更盛，它宁愿为了意识形态而牺牲战略。犹太人在保卫这一组居民点的战斗中遭到了重大的损失，最后，在委任统治结束时它终于被阿拉伯人攻占了（见下文，原著第271页）。

月 24 日，参议员沃伦·奥斯汀建议安全理事会，要它的五个常任理事聚集在一起考虑一下：是否存在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威胁，他的建议于 3 月 5 日被采纳；19 日在向安全理事会陈述自己的意见时，他说（针对苏联的异议，苏联在去年 12 月曾呼吁安全理事会担当起全部责任来贯彻实施分治计划），安全理事会不准备设法使用武力来强制贯彻一项计划。这项计划（正如巴勒斯坦委员会、英国以及犹太和阿拉伯双方发言人自己已指出的那样）由于双方都得到了从外面进来的大量的战斗人员和非法的武器，所以就无法和平地加以实现。因此，美国政府相信，应该在托管理事会的领导下对巴勒斯坦进行临时性的托管。以便再给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一个机会来达成一项协议，对于协议的性质则不应事先存有偏见。安全理事会如提出这样一项建议，就得立即召开一次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而在此之前，安全理事会应命令巴勒斯坦委员会暂时停止在贯彻执行所建议的分治计划方面的一切努力。

英国政府于 2 月 22 日宣布，巴勒斯坦的英镑结余（总计约 1 亿英镑）在最近几个月里支取极快，现在要加以冻结，巴勒斯坦今后将不再是英镑区的一个成员。对此，犹太复国主义者曾表示十分愤慨。现在他们又强烈抗议美国政策的这种“令人吃惊的大转变”。在巴勒斯坦，259 犹太代办处和犹太民族会议于 3 月 23 日坚决拒绝了任何要建立一个托营制度的计划，哪怕是短时期的也不持分治的电报，然而大概在五十份电报中只有一份电报的发电人姓名听起来不象是犹太人”（“分治在华盛顿”（“PartItioninWashington”），评论》，1948 年 3 月，第 213 页）。行。

因此，沃伦·奥斯汀在 39 日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决议草案，不再提托管御建议，而是号召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阿拉伯人政权都派代表到安全理事会来安排停火事宜。草案特别强调说，任何一方如不遵从这一决议，就要承担重大的责任：它号召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武装团体立即停止暴力行动；它还要求召开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叙利亚代表欢迎召开特别会议

---

上院辩论，第 5 辑，第 153 卷，第 487—488 栏，第 491—492 栏；参阅莫里斯·J·戈德布卢姆：“历史中的这一月”，《评论》，1948 年 2 月，第 163 页；《新犹太》，1948 年 1—2 月，第 64 页；又见下文，原著第 264—265 页。

1947 年 12 月 12 日，贝文宣布政府拒绝放宽移民的限制（下院辩论，第 5 辑，第 445 卷，第 1374 声，第 1400 栏）。一万五千名犹太人，分乘迄今为止在这条航线上搞这项工作的最大的两条船，来到了塞浦路斯，这就使住在塞浦路斯临时收容营的犹太人总数超过了三万一千人（利斯托韦尔勋爵（LordListoye1）1948 年 1 月 20 日在上院的发言，上院辩论，第 5 辑，第 153 卷，第 492 栏）。

犹太复国主义者抗议说，英国人在向同他们有条约关系的阿拉伯国家（埃及、伊拉克和约旦）提供武器，这些武器又会通过各种途径送到巴勒斯坦阿拉伯游击队手中；而犹太复国主义者要“遵行”联合国的政策却受到了阻挠：因为美国国务院在 1947 年 12 月 5 日发布禁令；不准将武器运往中东，也不再把护照发给想在外围武装力量中服役的美国国民（见谢尔托克的声明，据《犹太复国主义评论》报道，1948 年 1 月 23 日，第 4 页；参阅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Baruch）1948 年 2 月 3 日的发言，引文见《福雷斯特日记》，第 364 页）。关于破获犹太代办处在纽约私自购运炸药一事，见《泰晤士报》，1948 年 1 月 5 日、10 日、12 日和 2 月 18 日。

见联合国巴勒斯坦委员会：《第一个月和第二个月进展报告》（U, N.PalestineCommission: FirstandSecondMonthlyProgressReports). (A/AC21/7, 1948 年 1 月 29 日；S/695, 1948 年 3 月 15 日，包括 A/AC ;21/14, 1948 年 3 月 12 日。英国政府的总态度是受到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的；见 R·A·巴特勒（R. A. Butler）1948 年 3 月 10 日的发言，下院辩论：第 5 辑，第 445 卷，第 1262—1264 栏。

议，因为这对阿拉伯人想延缓实行分治的打算是有利的，但在停火建议上，他仍保留以往的态度。对英国高级专员在4月3日广播的在整个巴勒斯坦实行停火的呼吁，犹太代办处表示接受，但并不是无条件的。它坚持“所有外国军队和游击队”都必须撤出；根据新的英国—外约旦条约，英国有责任把阿拉伯军团的所有部队都调往外约旦；必须防止阿拉伯国家在将来进行入侵，并且必须明文规定，军事上的停火不排斥犹太移民，“不问他们的年龄或健康情况如何”。总之，犹太代办处在安理会的发言人谢尔托克始终坚持，停火不得使独立为之延期；他满怀信心地说，犹太复国主义者已经踏上了建国的大道，他们拒绝再倒转回去。他谴责英国人默许阿拉伯武装力量大规模地越过边界进行渗透：在拒绝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提供武器的同时，却继续武装阿拉伯国家，让耶路撒冷旧城的控制权依然落在阿拉伯匪帮的手里。犹太复国主义者责备英国人有意在撤出后给巴勒斯坦留下一个“行政上的烂摊子”，但这种责难是有些过甚其辞的。因为尽管英国当局确实拒绝在委任统治结束前把行政管理职能转交给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或阿拉伯人的中央政府，然而他们倒也时常在把这样的职能转交给地方当局。犹太复国主义者久已准备了一个政府机构的干部班子，这样就能随着英国人的撤出而逐步接管权力。由于缺少武器，犹太复国主义者迄今未能充分运用他们的人力来从事进攻，虽然3月底从捷克斯洛伐克运来了一船军火，对他们有所帮助，这船军火的货款是用美国犹太人捐献的美元来支付的。4月初，犹太复国主义者仍严重地受到“阿拉伯解放军”的挑战。这时候，这支军队已公开地得到各阿拉伯国家政府的庇护，并且已增强到大约有六千到七千五百人的兵力，其中多数是叙利亚人和伊拉克人，再加上在加沙的一个埃及分遣队。阿拉伯武装力量的基地分设在分治决议指定给阿拉伯国家的领土内的各个地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到英国人容许的。在北部，他们袭击海法东南二十六英里的米什马尔哈伊米克犹太人定居地，使得海法与特拉维夫之间的犹太人交通线受到威胁。为了避开敌对的沿海公路上的阿拉伯村落，这条交通线不得不绕

---

克里奇·琼斯 1948年2月24日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的发言：《正式记录》，第3年，第16—35号，第269—273页。

谢尔托克曾宣称犹太人忠实地接受联合国决议（致秘书长的信，1948年3月17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3年，第52号，第11页），但是后来这些决议已被用来达到了建立犹太大国的目的时，这种忠实的接受也就大有变动了。参阅里德·布拉德爵士：《英国和中东》（Sir Reader Hullard：Brittall and the Middle East），伦敦，哈钦森，1951年版，第156页；又见下文，原著第277—278页。

谢尔托克 1948年2月27日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发言：《正式记录》，第3年，第16—35号，第344—356页；并参阅拉比西尔弗 1948年3月5日的发言：同上，第36—51号，第15—16页。

联合国文件 A/AC.21/SR.1，第2页。

见克莱德·伊格顿：“巴勒斯坦与联合国的组织法”（Clyde E. Gleason：“Palestine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美国国际法杂志》，1948年4月，第397—399页。美国对外关系协会：《美国在世界事务中：1947—1948年》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Affairs, 1947—1948），第339页；参阅哈尔·莱曼：《以色列的创始及其明天》（Israel, the Beginning and Tomorrow），纽约，斯隆，1952年版，第271页。

1947年，美国在阿拉伯国家（不包括波斯）石油生产中的份额已达到生产总额的百分之七十二。阿拉伯国家威胁要停止给美国公司以石油开采特许权一事可回溯到1945年秋季（赫尔维茨：《争夺巴勒斯坦》，第231页）。

道翻过卡尔迈勒山脉。在南面，他们主要攻击耶路撒冷的犹太“新城”和被阿拉伯山村控制着的公路大道，这座城市就是通过这条公路，从四十五英里之外的犹太沿海平原取得必要的物资供应的。耶路撒冷以西五英里的卡斯塔勒村是一个战略要地，两军在那里曾进行过激烈的争夺战。在4月9日清晨的一次战斗中，“哈加纳”占领了这座要塞，在这次战斗中，阿拉伯的耶路撒冷军区司令官（阿卜德·卡迪尔·侯赛尼）也被打死了。与此同时，在靠近耶路撒冷二英里的地方，伊-兹-卢和斯特恩集团共约二百人的一支武装力量袭击了戴尔亚辛的阿拉伯村庄，这里的居民还是以爱好和平并同他们的犹太邻居保持友好关系而闻名的。后来，另一方面又有不同的说法：说是一支阿拉伯队伍夺取了这个村庄，以便进攻耶路撒冷；说这是该地区阿拉伯游击队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甚至说，“哈加纳”的耶路撒冷地区司令曾批准这次进攻，因为计划在此地建立一座犹太

太机场。伊-兹-卢进攻者从一辆装甲车上通过扩音器用阿拉伯语大声叫喊，命令居民们在十五分钟内离开住屋躲藏起来。有一些居民照办了。伊-兹-卢后来宣称，在随后的逐屋战斗中遭到了相当大的伤亡，但阿拉伯人方

---

《福雷斯特日记》，第360页，第411页。在福雷斯特接连担任海军部长和国防部长时，他对中东石油的供应就很关心，这可以追溯到1947年5月（同上书，第272页）。他反对美国不问是非、不加区别地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这就招致了他们对他的怨恨。令人感兴趣的是，詹姆斯·G·麦克唐纳，一方面一味地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而另一方面作为福雷斯特的老朋友却在他死后热烈地为他辩护：“对他所作的恶毒攻击，使他心力交瘁……这些恶毒攻击是最丑恶的例子，说明某些政客和政论家会以爱国主义的名义，使用最下流的手段去搞垮那些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和忠于职守的社会

原文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3年，第36—51号，第35—36页。建议正式接受大会分治决议的那一段文字未获得必需的三分之二多数票：有六国弃权。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3年，第36—51号，第159—168页。据说，停止支持分治的决定是由国务院作出的，事前并未征求过杜鲁门的意见：杜鲁门在前一天还对韦茨曼表示过他保证给予支持（J·丹尼尔斯：《独立的人》（J·Daniels：The Men of Independence），伦敦，高兰兹，1950年版，第318—319页）。但是，到了3月29日，杜鲁门却准备同意美国将“尽我们的一切力量”来参加建立一项托管制（《福雷斯特日记》，第406页）。早在三个月以前，参议员范登堡就曾表示过自己的看法：美国在支持分治方面的单方面行动“将会引起一个猛烈的排犹浪潮”（同上书，第349页）。犹太记者哈尔·莱尔曼指出，他“曾查看过大捆大捆的发给白宫表示支

七百万英镑将被解除冻结，再加上当前的英镑收入，可供委任统治结束前日常开支之用。往后的政策则将由英国驻联合国代表与巴勒斯坦委员会讨论决定。尽管英国政府一直在把则政情况逐渐恶化的事告诉巴勒斯坦委员会，后者还是他怨说它事先并没有收到过要发布这一决定的通知。至于要巴勒斯坦政府从财政收入中拨讨两百万英镑，来维持在塞浦路斯的犹太非法移民的生活，并对不再继续任用的巴勒斯坦文官给予贴补费。巴勒斯坦委员会对此也表示不能同意。委员会反驳征，“应当优先考虑的是获得必要的食品供应，并为委员会提供必需的工作基金”而不是这些开支（联合国巴勒斯坦委员会：《给大会的报告》

（Report to the General Assembly），《大会第二次特别会议正式记录》，增编第1号，第30—34页；克里奇·琼斯1948年4月23日的发言：《大会第二次特别会议正式记录》，第2卷，第61页）。犹太代办处的司库埃利泽·卡普兰指出，巴勒斯坦的英镑结余，同其他许多国家不一样，并不仅仅是由于英国在战争期间的军事花费，而是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国外犹太资本的输入，这笔外汇收入的总额自大战结束以来已超过七千万英镑。他还谴责巴勒斯坦政府，“想尽办法要把国家搞穷”（《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8年2月27日，第三页）。另一方面，在英国人的眼里，政府所采取的行动看来“几乎是无法避免的”（《经济学家》，1948年2月28日，第3533页）：尤其是考虑到后来也承认的事实：代办处曾按三美元换一英镑的黑市汇

面则大约有二百五十人被打死，其中约半数是妇女和儿童。两天后，国际红十字会驻巴勒斯坦的首席代表访问了该村，他所得的印象是：伊-兹-卢的行动是由一帮“严守纪律和按命令行动”的青少年干出来的一次“有计划的大屠杀”，现在因为阿拉伯人也尝到了残忍暴行的滋味而大为高兴（这种残忍暴行正是阿拉伯人曾施之于犹太人的）。红十字会代表返回那路撒冷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当局对他的报告表示“极大的憎恶和讨厌”；但就在这同一天，犹太复国主义者总委员会批准了一项大屠杀前签订的“哈加纳”与伊-兹-卢之间进行合作的协定。阿拉伯人也回过来进行了报复。他们在那路撒冷郊外拦劫了一支护送车队，这支车队是开往孤悬在具有战略意义的斯库普斯山岭上的哈达萨赫医院和希伯来大学的，大约有七十七个医生、护士和大学师生被杀害。

在巴勒斯坦北部，“哈加纳”成功地击退了由福齐·卡 262 武克吉指挥的一支人数上占优势的阿拉伯队伍对米什马尔哈伊米克的进攻。犹太复国主义者现在也准备在这个地区发动进攻了。看来在 3 月底左右捷克斯洛伐克的军火就可以开始陆续运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手里，这批军火靠了美国犹太人提供的美元和运输方面的帮助才得以避开英国人的封锁。不管这批新军火的重要性如何，战事的发展趋势现在是极其有利于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方。

在太巴列，阿拉伯人在地势低下的市区阵地，被犹太人在山坡上的较高阵地所控制。英国人主持的停火谈判，据说由于外来的阿拉伯武装力量的抵达而被打断了，4 月 18 日。英国军队把阿拉伯居民（在平常时期占人口百分之四十七，居少数地位）撤了出来，把城市让给了犹太人。在海法，阿拉伯人有了一支很可观的增援部队（主要是伊拉克人、叙利亚人、前外约旦边防军士兵——巴勒斯坦政府保持的一支正规部队，但最近被解散了——以及几个德国人和其他欧洲人），已经可以进攻和威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主要阵地：阿拉伯旧城附近山坡上的哈达尔-哈卡尔迈勒地段。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召来了增援部队。到 4 月 19 日时，战事已迫在眉睫了；而当地的英国部队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又很分散，实在无法控制这种紧张局势。由于不到一个月英国的委任统治就要结束了，英国驻军师长决定把他的部队撤到港口地区以及通往港口的大道上，以便掩护英军和物资撤退；同时又可以不介入犹太阿拉伯双方的冲突。4 月 21 日晨，在相继一个小时之内，他把自己的计划通知了双方。

当天下午犹太人发动进攻时，阿拉伯平民的逃亡也就开始了，并且由于“哈

---

率进行非法交易，而当时的官价则是四点零三美元换一英镑，“把得来的钱花在例如非法移民和购买武器等方面，凡此后来均有助于这个独立国家的建立”（《郇山》（Zion），1949 年 10 月，第 4—5 页）。

：见拉比西尔弗 1948 年 3 月 19 日和 24 日的发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 3 年，第 36—51 号，第 169 页，第 244 页。参阅《新犹太》，社论，1948 年 3—4 月，第 81 页。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 3 年，第 36—51 号，第 247—248 页。

原文见同上，第 62 号，第 8—9 页。

见上文，原着第 23 页注（即本书第 433 页注——译者）。

见谢尔托克 1948 年 4 月 1 日在安全理事会上的发言，《正式记录》，第 3 年，第 52 号，第 5—23 页。

奥布里·S·埃班（Aubreys, Eban）1948 年 10 月 14 日在安全理事会上的发言，《正式记录》，第 3 年，第 116 号，第 31 页。摩西·皮尔曼：《以色列的军队》（The Army of Israel），纽约，哲学丛书，1950 年版，第 126 页。

莱尔曼：《以色列的创始及其明天》，第 14 页，第 47 页；参阅拉比西尔弗 1948 年 4 月 22 日在联合国

加纳”的广播车和传单搞的“心理闪击战”而更加快了速度。经过一夜的战斗，当他们的司令官和参谋人员已偷偷地溜走时，阿拉伯军队的抵抗也就停止了。在一个 263 星期之内，由于纷纷逃跑，人口从往常的五万人减少到只剩下八千至一万人了，而且还在不断地减少。4 月 25 日，又轮到雅法和阿卡分别受伊-兹-卢和“哈加纳”的攻击；在英国皇家军队将进行干涉的威胁之下，虽然雅法暂时停了火，但是该城已经有三万名左右的阿拉伯居民逃跑了，以后还会有更多的人继续外逃。犹太复国主义者当时估计，逃亡的阿拉伯人总数超过十五万人，在所建议的犹太国的地区之内，大约有三十个阿拉伯村庄被放弃了。

大批阿拉伯人的开始逃亡，可以追溯到阿犹冲突的前一阶段。早在 1 月 27 日，高级专员就已承认：有能力离开的阿拉伯中产阶级家庭，带着他们的车子 and 大批家用物品，正在“源源不断地出国”。据犹太复国主义者方面估计，三月份已有荫万到两万五千阿拉伯人离开海法和一万五千到两万阿拉伯人离开雅法。由于阿拉伯非正规军利用地点方便适中的阿拉伯村庄作为进攻犹太人区域的基地，结果犹太人对这些村庄进行了报复，这就使很多阿拉伯人从犹太人领上边缘的村庄逃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后来，犹太复国主义者断言，戴尔亚辛大屠杀之前“好几个星期”，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就已经“号召阿拉伯居民成群结队地离开该国”。对这种说法应该持保留态度，因为没有确实的证据可以证明。但是毫无疑问，阿拉伯报纸和电台宣传报道戴尔亚辛大屠杀的目的，本来是为了引起同情，结果却反而大大加速了士气的瓦解和非 26 战斗的阿拉伯人的逃亡。在战争的这一阶段，犹太人对阿拉伯人逃亡这一件事抱什么态度，是不够清楚的。确凿的证据表明，海法民政当局曾试图安抚阿拉伯居民；可是犹太战斗人员却在该地和其他地方都巧妙地运用心理战术来瓦解敌方的士气，结果在平民身上恰巧收到了原来所指望的效果。在稍后阶段，以色列军队毫无限制地对阿拉伯平民施加压力，以引起平

---

的发言，《大会第二次特别会议正式记录》。第 2 卷，第 46 页；《新犹太》，1948 年 5 月，第 125 页。

扎赫尔：《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 236 页，第 272 页；金奇：《七根倒了的柱子》，第 214 页。

见扎赫尔，前引书，第 227 页，第 236—237 页；皮尔曼：《以色列军队》，第 99 页。

见扎赫尔，前引书，第 234 页，第 296—287 页。

《新犹太》（1948 年 1—2 月，第 64—65 页）驻耶路撒冷记者报道说，他们成功地赶走了入侵其村庄的一支阿拉伯匪帮。参阅莱文：《严阵以待的耶路撒冷》，第 57 页；一位记者在《犹太复国主义评论》上的文章，1952 年 2 月 25 日，第 13 页。

达纳·亚当斯·施密特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1948 年 4 月 10 日，他在攻击发生后立即走访伊-兹-卢，写出了这一访问记。参阅贝京：《起义》，第 162—163 页。

据贝京（前引文）说；四人被杀，约四千人受伤；据进攻部队指挥官对级约犹太人听众的一次讲话时说，八人被杀，五十七人受伤（《纽约时报》，1948 年 11 月 30 日）。

事先派往现场的一名犹太警官报告说，只有一个阿拉伯人被杀（格雷夫斯：《无政府状态中的试验》第 V9 页），但是犹太代办处和“哈加纳”曾竭力阴挠红十字会代表进行调查（德雷尼埃：《一面旗帜飘扬在耶路撒冷的火线上》，第 69—70 页，第 77 页；莱文：《严阵以待的耶路撒冷》，第 59 页）。

德雷尼埃：前引书，第 71—74 页。在戴尔亚辛行动的同一天，《犹太复国主义评论》刊登了一张占半页版面的犹太人尸体照片，这些尸体是在一次耶路撒冷—希布伦公路上的战斗之后被阿拉伯人加以残害的（《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8 年 4 月 9 日，第 3 页，并参阅 4 月日历，第 7 页；《新犹太》社论，1948 年 3—4 月，第 83 页）。

民的恐惧情绪。他们用武力来驱逐平民。例如：5 月份对阿卡居民（包括从海法逃来的人）；7 月份对卢德和腊姆拉居民（包括从雅法逃来的人）；10 月份对比尔谢巴和西加利利居民。也有一些犹太人想逃避战争。但是那些弄到外国护照想出国的人，犹太复国主义当局不仅要他们呈验“哈加纳”发给的免服兵役的证件，而且还必须呈验纳税收据，证明他已向犹太当局缴付过“一笔税款以供军费开支和救济欧洲犹太人之用的”。这种税款是按惩罚性的标准来估计征收的，征收多少按实际情况而定。犹太人的迁移就这样受到了官方的控制和管理；而有限制的从那路撒冷迁往沿海平原，就成了人口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确实在耶路撒冷这个地区，犹太人的事业现在最直接地处于危险境地，因为不仅旧城的犹太区仍然处于阿拉伯人的封锁包围之中，而且北面的阿拉伯人居高临下，使耶路撒冷犹太人的新城的一部分也处于他们的火力之下。因此，当 4 月 18 日高级专员提出当地局部停火建议时，犹太代办处就表示准备接受，但是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拒绝了。接着又开始谈判只限于旧城的停火。主持谈判工作的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支持下于 4 月 23 日成立的一个停战委员会，委员会由美国、法国和比利时三国驻耶路撒冷的总领事组成。犹太复国主义者仍然不相信阿拉伯人提出的保证，即：如果“哈加纳”部队撤离旧城的话，阿拉伯人将保证该地犹太区的安全和粮食供应。但 265 是，28 日还是达成了一项旧城停火的协定。然而，4 月 29—30 日夜， “哈加纳”向卡塔蒙的阿拉伯人和欧洲人居住的郊区发动了进攻。卡塔蒙座落在一条山脊之上，当地中产阶级居民已经逃走，阿拉伯人以该地为坚固据点，居高临下地向犹太人郊区开火。“哈加纳”占领了这个阵地；当它同意 5 月之日英国人发出的停火命令，以便谈判一项更广泛的休战时，也还坚

---

犹太复国主义者坚持说，在护送车队上标明有红盾（犹太人使用的相当于红十字的标记），因此，摩该得到日内瓦公约的保护。不官哪一方都承认：车队是由武装车辆伴送的，在哈达萨赫医院和希伯来大学内也有武装的犹太人。德雷尼埃的记述是很权威的（前引书，第 80—81 页）。因为作者在整个战争时期都是国际红十字会驻巴都斯但代表团的领导人，他并且应犹太代办处的要求在事件发生的当天（1948 年 4 月 12 日）就前往调查这一特殊事件。据德雷尼埃讲，在他的一再追问下，犹太人向他承认：他们利用了红盾车队来接济和更替他们驻在哈达萨赫医院的军队。他们争辩说这是正当的，理由是他们的军队驻在医院里仅仅是为了保护医院的。对此，德雷尼埃是这样看的：“我们持有这样的观点，即流动医疗队在转移时毋需带有武器，亦不须有部队伴送。或者采取武装保护的办，或者采用日内瓦公约规定的办法（也就是悬挂红十字会的旗帜），须在这两者之间作一选择。整个哈达萨赫地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可以从这里攻打阿拉伯人战线的后方。故而保留一支军队以及对它进行补给，同医院完全是两码事。”次日；德雷尼埃为了证实这些原则，沿着同一条路线在非武装人员的陪同下去哈达萨赫医院旅行了一趟，来去都没有遭到袭击。

卡武克吉早已与穆夫提意见不合，这一次的挫败据说曾使得他就休战问题去向犹太复国主义看试探，但后者予以拒绝（见威尔逊：《封锁线和搜查》，第 182 页，并参阅第 187—188 页；莱文：《严阵以待的耶路撒冷》，第 60 页；金奇：《七根倒了的柱子》，第 216 页）。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流言蜚语指责英国人供应卡武克吉以军火和汽油，并赠给他一种发射二十五磅炮弹的新式英国炮。其实，据后来的报道说，他的重武器只有七十五毫米的法国炮和迫击炮（见贝京：《起义》，第 350 页；1948 年 4 月 14 日，下院辩论，第 5 辑，第 449 卷，铭 953—995 栏；皮尔曼：《以色列军队》，第 109 页）。

见上文，原著第 260 页注（即本书第 444 页注——译者）；莱文：前引书，第 208 页。

威尔逊，前引书，第 197 页；《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8 年 4 月 23 日，第 1 页；谢尔托克，1948 年 4 月 23 日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发言，《正式记录》，第 3 年，第 62 号，第 26 页。

守在那里。现在，问题的焦点并不是一千七百名被围困在旧城的犹太人的处境，而是新城十万犹太人的粮食供应问题。“哈加纳”于4月9日夺取卡斯塔勒以后，护送亟需的食品的车队，已从海岸开抵耶路撒冷犹太人居住区。但是，4月17日阿拉伯人开始在城西十二英里的瓦德隘口拼命攻打，力图切断大路，断绝犹太人的水与食品的供应，因为这个城市的用水绝大部分是依靠极易受到破坏的一连串抽水站从特拉维夫以东十英里的艾因角的一些水井输送过来的，而这些井已经被伊拉克非正规军占据了，水管也被炸坏了。停火谈判一次次地继续下去；到5月9日，阿拉伯人的军事处境已十分恶化，以至不得不宣布他们准备在整个耶路撒冷实行停火。但是现在轮到犹太代办处来不理睬高级专员的邀请了。他们在安理会的发言人（美国公民伊曼纽尔·纽曼）解释说！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几位高级官员大概已经会见了高级专员，而他想会见的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则在特拉维夫。纽曼还说：在这些日子里，从特拉维夫失去耶路撒冷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里有着某些障碍和困难。犹太代办处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总的说来现在是在竭力设法排除这种障碍，希望不久就可以让人民更加自由地来往。\_\_在这次含蓄而带讥讽的谈话中，纽曼提到了犹太复国主义266义者对阿拉伯人俯瞰瓦德隘口路障的阵地所发动的一次新进攻。虽然最初他们是成功的，但是阿拉伯人进行了反击，使他们仍然不能打通通往首都的交通线。耶路撒冷的大量英军，从5月8日至14日，在那儿维持了这一种不牢靠的停火。但是；当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破坏了停火的时候，他们双方都动用重武器再度开战。5月12日，即委任统治结束前两天，高级专员提出了一项新的停火建议。沮丧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接受建议，但是犹太代办处再次不予答复。14日上午6时，英国国旗从政府建筑物上降落下来，最后一批英军从耶路撒冷撤走了。过了几个小时，“哈加纳”和犹太“异端分子”在新城的几个他们还未曾占领的重要地点挫败了阿拉伯人的抵抗。

---

金奇（他亲自在海法），前引书，第219页。关于后来在阿卡搞的类似的心理战，见扎赫尔《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245页。

按扎赫尔（前引书，第243—244页）和《经济学家》（1948年10月2日，第541页）所说，据一个英国目击者报告，海法的阿拉伯居民领袖们接到阿拉伯最高委员会的指示，命令他们放弃该城，因为各阿拉伯国家的联军很快就会替他们收复的。但是阿拉伯方面否认有这件事。

显然犹太大军队在雅法第一次屈服于大肆掠夺的诱惑（阿拉伯非正规军也已经在那里搞过了），过了几天之后，犹太军队又抢劫了新近夺得的耶路撒冷近郊阿拉伯人地区（见金奇，前引书，第224页；莱文：《严阵以待的耶路撒冷》，第116页，第135—136页，第226页）。本-古里安自己后来也承认。竟发展到了各阶级的体面的犹太人都卷了进去的程度，这是“一个可耻又可悲的景象”（《以色列政府手册》（IsraelGovernmentHandbook），第5712号，伦敦，西摩出版社，1951、1952年版）。

E.拉泽松少校在《犹太复国主义评论》上的文章，1948年4月30日，第5页；本-古里安，同上，1948年5月7日，第1页。后来公布说，4月初时难民总数超过十三万人（以色列政府：《以色列的阿拉伯人》（IsraelGovernment:theArabsinIsrael），1952年版，第5页）。

联合国巴勒斯坦委员会：《给安全理事会的第一份特别报告，（FirstSpecialReporttotheSecurityCouncil），A/AC.21/9（1948年2月16日）。第7页。参阅《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7年12月20日；第1页；和钱宁·B.理查森（ChanningB.Richardson）在“中东的国际紧张局势演说和文件集”（InternationalTensionsintheMiddle-East,aSeriesofAddressesandPapers...）中的记载。《政治科学学会学报》，1952年1月，



就在这个时候，参议员沃伦·奥斯汀4月5日非正式地告诉安理会成员们一项美国提出的建议，把它作为在委任统治结束之后确保公共秩序和维持政府工作的一种紧急措施。建议主张由托管委员会通过一名总督来管理巴勒斯坦，直至这一制度为阿拉伯和犹太双方大多数人所赞成的一项政府方案所替代的时候为止。4月20日，根据安理会的提议，联合国大会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进一步考虑巴勒斯坦未来的问题，在会上美国提出了它的建议。几名犹太复国主义高级官员，其中包括谢尔托克，据说曾表示愿意接受这项建议作为一项临时性267的权宜措施，但是被本-古里安和支持他的好斗的极端分子们否决了。据报道，沃伦·奥斯汀曾说过，他希望可以利用驻在巴勒斯坦的英军和别国的部队，在托管制度下帮助维护法律和秩序。苏联和它的卫星国在这方面

也采取了一条强有力的路线，其坚定不移的目的是：破坏英国在中东的势力并阻止美国势力在中东的增长。当联合国大会上旷日持久的争论继续下去的时候，美国政府同犹太复国主义和阿拉伯各国驻联合国的代表们开始讨论。它建议委任统治结束的日期延迟十天，以便代表们前往巴勒斯坦商量制订停止敌对行动的条件。这个建议没有被交战双方接受，也没有被英国人接受。大会所能作出的最大成就也只是于4月15日任命了一个联合国调停人：很有意义的是，规定给他的职权并没有要他受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分治决议的约束。

---

见《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8年3月19日，第7页，和1948年4月2日，第3页；扎赫尔，前引书，第149页。英国官员有时劝说阿拉伯人去寻找安全的场所，这可能就成了后来犹太复国主义者断言英国人激起了阿拉伯人的恐慌和制造难民问题的根据（见莱文，前引书，第104页，关于希伯来报界的报道；贝京：《起义》，第179页）

原载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委员会1951年12月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转引自爱德华·莱瑟姆（Edward Latham）主编的《中东危机》（Crisis in the Middle East），纽约，H.W.威尔逊，1952年版，第136页。

关于海法，见上支，原著第262—263页，并参阅德雷尼埃：《一面旗帜飘扬在耶路撒冷火线上》，第76页；贝京：《起义》，第164—165页；凯斯特特：《许诺及兑现》，第207页，第215页。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特派记者报道，1948年5月14日，第6页。

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3年，1948年5月增编，第56页，引自《纽约时报》驻耶路撒冷记者达纳·亚当斯·施密特的话；克莱尔·霍林沃思（Clare Hollingworth）在《观察家报》上的文章，1948年5月2日。

哈达萨赫医院车队遭到灾难性伏击的地点，就在阿拉伯人的战略要地谢赫—贾拉（见上文，原著第261页）。但是，当4月25日“派尔马契”夺占该地的时候，英国人将他们赶跑了，因为这里控制着向北的大道，英国民政机构留下的一些人三星期后就是从这条道路作最末一批撤退的。犹太人那时又第二次企图夺取谢赫—贾拉并重新打通通往控制阿拉伯旧城的斯库普斯山阵地的交通线，但是没有成功。

3月8日，当本-古里安与耶路撒冷市委员会的英国主席讨论停战计划时，据说，他曾痛斥把武装的犹太人撤出旧城而代之以信赖阿拉伯人的保证的建议是一种侮辱性的主张（格雷夫斯：《无政府状态中的试验》，第155—156页；参阅伯纳德·D·温赖布：“耶路撒冷问题”（Benard D. Weinyb：“The Case of Jerusalem”），《巴勒斯坦事务》，1948年5月，第66页：“犹太代办处不可能接受一种阿拉伯人的保护制度”）。据说“哈加纳”自己曾强烈要求在委任统治结束之前撤出犹太人区（见比尔拜：《近东的新星》，第35页），但是继续遭到犹太复国主义政客们的反对，这些政客提出的耶路撒冷休战条件是：完全开放“从特拉维夫至哭墙（耶路撒冷市内所罗门时代留下的断垣残壁——译者）”的交通线，并撤走所有非巴勒斯坦的武装

这时，在杜鲁门总统的干预之下，国务院负责管巴勒斯坦事务的洛伊·w·亨德森（他很久以来就是犹太籍，第 450 卷，1117 栏）。5 月 1 日英国派遣增援部队去日勒斯坦一事引起了人们极大关切；但两星期以后，实行休战或组织一个临时政府的希望已经消失的时候，国防大臣宣称，他们去那里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保护英国人撤退（1948 年 5 月 14 日，同上书，第 2439 栏）。复国主义者攻击的一个目标）把他的职务转交给了 J·H·希尔德林少将。希尔德林在上一年秋天担任出席联合国大会的美国第二代表时，就已经热烈支持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主张；在这最近一次任命的前一天，在 1948 年犹太人福利基金募捐运动的开幕大会上，他在一次演说中又坚定地表明了他的态度。随着日子一天天过 268 去，事情就变得很清楚了：当 5 月 14 日委任统治结束时，在那里将既没有停火，也没有在新的犹太国家与阿拉伯国家联盟各国军队之间的任何临时性安排，而国务院与总统的政治顾问之间的意见分歧；也缩小到了美国承认那个犹太国家应提早到什么程度。直到 5 月 13 日总统才同意暂且慢一慢；对他施加政治压力还在继续；14 日中午，国务卿要求再给他几天时间，以便同英法两国政府磋商；但是总统的一位政治顾问，据说在最后终于说服他要坚持必须立即承认。据一位可靠的记者说：政府中没有一个人否认，想要胜过俄国人是一个重要因素……假如终究得承认一个犹太国家的话，政府觉得十分重要的是，做这件事的第一个政府应当是一个民主的政府而不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大国。苏俄很难说是应当享有这样一种有历史意义的权利而赢得以仑，列人民的感激的。而且，别人这样告诉俄说，被一个民主国家首先承认，不仅对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是必要的，而且对于美国的犹太人甚至更为必要，一个犹太国家将是克里姆林宫的工具，这这种活已经谈得够多的了。

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地区。一个古老的民族在准备迎接它的奇迹般再生的独立。他们的脸上容光焕发。他们保持平静，非常平静，好象是在默默地祈祷和感谢上帝的仁慈，让谜们还他活着看到这一天的来临。他们已经一代又一代地祈祷，有的人天天祷告，有的人每周一次，也有人一年一次，祈求这得到拯救的一天的来临。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对多数犹太人来说，它已经是毫无意义的了——一种不可能如愿的祈求，一种被逐走了的希望。这可能是真的吗？这是真的。——此时此刻的英雄是工党领袖本—古里安。在最后几个星期，当他的那些同事已经打算妥协的时候，他的勇气和决心仍然坚定不移。正是他，这一位当选总理而又尚未就职的人，1948 年 5 月 14 日下午 4

---

阿拉伯人（莱文：《严阵以待的耶路撒冷》，第 127 页，1948 年 5 月 7 日）。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 3 年，第 65 号，第 15—16 页，1948 年 5 月 12 日。在耶路撒冷的代办处发言人（沃尔特·艾坦（Walter Eytan）后来任以色列外交部办公厅主任）曾抱怨说：停火谈判时，英国人对待代办处是敷衍了事的，他们“竭力营救阿拉伯人，以免遭受太严重的打击”（《纽约时报》，1948 年 5 月 9 日）。

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前引文，第 2—3 页。

停战委员会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正式记录》，第 3 年，第 71 号，第 3 页，文件 S/762。

这项建议是：卖现停火，向时不准运入军火和别的战斗器械；允许运入必需民用供应品，但必须由一个双方均接受的公正团体加以检查；进入耶路撒冷的各条道路对必需供应品和非武装人员开放，但是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的数量或武装实力都不准有任何实质性的增加：作为自由进入旧城犹太人区的交换条件，犹太人必须从阿拉伯人的卡塔蒙郊区撤出。

时在特拉维夫现代美术馆举行的一次犹太民族会议上，简短地回顾了犹太民族多少世纪以来的变迁和悲剧，犹太复国主义政治运动的兴起，纳粹的大屠杀和联合国成立前的活动，接着他以 269 响亮的声调宣布：“在巴勒斯坦建立的犹太国家叫作以色列”；他宣布给予国内阿拉伯居民以充分的和平平等的公民权利，同所有邻国和睦友好，并呼吁全世界的犹太人与以色列团结一致。他结束讲话时宣称：“怀着对全能的上帝的信任，我们在 5708 年 8 月 5 日，安息日的前夕。于特拉维夫城召开的这一临时国务会议上，谨作此宣布。”然后本一古里安宣读了新政府通过的第一号法令，即废除 1939 年的英国白皮书以及白皮书对移民和购买土地所施加的限制。金奇加以评论说：“这证明了一个人和一种理想的正当；这是先知、极端分子和鼓动家反对现实派、温和派以及政治家们的永久的保证。”而且，似乎是为了提供更多的对照，年老力衰的钱姆·韦茨曼甚至当时没有在场，而是在美国充当驻联合国的以色列发言人和对国务院的发言人；只是在三天以后临时议会召集第一次会议时才推选他担任总统。

特拉维夫的公告发表后十六分钟，杜鲁门总统办公室就立即宣布美国在事实上承认以色列；这一宣布打断了正在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当天傍晚加西亚-格拉纳多斯驱车从芳草地回到纽约的时候，他看到以色列国旗骄傲地飘扬在许多高楼大厦上。真的，这个美国大都会的犹太居民比整个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的犹太人还多两倍；这个新国家——只就它的诞生得归功于强权政治的作用这一点而言——可以说，是在纽约诞生的，虽然这听起来也许有点荒唐。危地马拉政府（它的驻联合 270 国代表就是加西亚-格拉纳多斯）只比美国晚一天就承认了以色列；接下来是苏联（5 月 17 日）；波兰，乌拉圭和尼加拉瓜（5 月 18 日）；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5 月 19 日），后者这时还没有公开脱离苏联集团；南非是在 5 月 24 日承认以色列的，即在

---

关于这个被撤销的行政机关从那咯撒冷到海法最后一次旅途中所得的印象，见巴勒斯坦最高法院院长威廉·菲茨杰拉德爵士：“历史和政治中的巴勒斯坦圣地”（Sir William Fitzgerald: ‘The Holy Places of Palestine in History and in Politics’），《国际事务》，1950 年 1 月，第 26 卷，第 9—10 页，=

扎赫尔暗示，这个建议——他认为是受到英国外交部的启发而提出的——鼓舞了原先还在踌躇不决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各国，它们在随后的一周中召开了理事会会议，决定正式向犹太复国主义者开战（《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 106—108 页）。

联合国：《大会第二次特别会议正式记录》，第 1、2 卷附件，第 12—31 页，文件 A/C1/277。

见比尔拜：《近东的新星》，第 260 页；贝京：《起义》，第 24—247 页。

加西亚-格拉纳多斯：《以色列的诞生》，第 277 页。美国建议的第七条中，对于建议中的巴勒斯坦总督可以要求哪些政府给予军事援助，没有指名，留着空白。英国外交大臣于 5 月 4 日声明：关于被邀请共同帮助巴勒斯坦临时政府一事，他的政府将不得不极其谨慎地考虑（下院辩论，第

见 1948 年 5 月 14 日乌克兰代表的发言（联合国：《大会第二次特别会议正式记录》，第 2 卷，第 257—258 页）；参阅约瑟夫·邓纳：《以色列共和国，它的历史和它的希望》（Joseph Dunner: The Republic of Israel, Its History and its Promise），纽约，惠特尔西书店，1950 年版，第 89 页。

见菲利普·杰塞普博士（Dr. Philip Jessup）1948 年 5 月 13 日的发言（联合国：《大会第二次特别会议正式记录》，第 2 卷，第 245 页）。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者们说，国务院向犹太复国主义代表施加了很大压力，要他们早些宣布独立，并暗示这种压力倒可能“迫使犹太国家投入苏联的怀抱”（加西亚-格拉纳多斯，前引书，第 284—285 页；乔恩·金奇在《雷诺新闻》上的文章，1948 年 5 月 9 日，发自特拉维夫的报道；莱尔曼：《以色列的创始及其明天》，第 282 页；邓纳，前引书，第 96 页）。

标志着史未资将军终于退出政治舞台的大选的两天前,匈牙利于6月1日,芬兰和罗马尼亚也分别于6月11日和12日承认了以色列。

## 第六章 巴勒斯坦战争及其后果，1948—1950年

### 第一节 巴勒斯坦战争，1948年5月至1949年1月

#### (一) 从阿拉伯国家的干涉到第一次停战， 1948年5月15日至6月11日

当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日渐接近其不体面的末日时，阿拉伯人暂时丢开了他们内部的严重分歧，同意对犹太复国主义进行一场联合的武装干涉；但是他们对这种干涉所作的准备却是很不充分的，直到1946年5月14日委任统治期限届满的那天，传闻阿拉伯国家联盟的秘书长阿卜德·拉赫曼·阿扎姆还在说，他决不希望阿拉伯国家当真会不得不打仗。比较最有战争准备的阿拉伯军队，是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的阿拉伯军团；可是即使这支军队也只有四个步兵营和一个最近成立的野战炮兵连，再加上一支临时凑合的“国民军”，并且在许多重要方面都严重地装备不足。这支军队几个月前从英国弄来六门发射二十五磅炮弹的大炮，可是炮手仅仅受过三个月的训练；而犹太复国主义者那方面则已经制造了大批的迫击炮，并能熟练地使用它们。阿拉伯军团的五十辆英国造装甲车，虽然按1941年英国的标准已经陈旧，但质量还很好；

可是在数量上远远赶不上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八百辆自己制造的装甲车。阿拉伯军团只有少量的军火储备，一批从苏伊士运河地区运来的英国军火5月间在中途被埃及军队扣留，始终没有交还。在委任统治满期的前夕，犹太复国主义者派去见阿卜杜拉国王的一个秘密代表团，没有能说服他不去参加泛阿拉伯对巴勒斯坦的干涉行动。

不过可靠的消息却说，约旦政府已经答应英国外交部，当271阿拉伯军团去占领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决议指定给阿拉伯人的地区时，将不侵犯指定给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那部分地区。

以色列人公布了一份看来规模颇为宏大的阿拉伯联合作战计划，可是，不管这份文件的来源或者真实性如何，它肯定不是阿拉伯统一指挥部的产物，因为这样的一个机构是不存在的。阿拉伯各国的军队，除了阿拉伯军团外，都苦于参谋工作很差和组织不健全，而埃及和伊拉克的军队还要控制很长的交通线。此外，埃及的军队还由于司令人员的腐败或有失职守，大受其害，在武器、弹药和医疗事业各方面造成严重供应不足情况。再则，一般说

---

见联合国：《大会第二次特别会议正式记录》，第2号增编（决议），第5—6页，第186号（S—2）。  
卡尔·莱文（Carl Levin）（《纽约先驱论坛报》，1947年9月19日）曾报道过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亨德森的批评和对希尔德林的“不偏不倚”的期望。

见《纽约时报》，1948年4月29日、30日；《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8年5月7日，第4页。这一年又是一个美国的大选年，离召开党的大会推选总统候选人仅仅只有三个月，这一事实给了犹太复国主义看以最好的机会，促使犹太人在美国的政治势力能更加支持他们的事业。据说，美国政府三月间放弃联合国大会的分治方案。已经对民主党在纽约州的前景产生了不利影响；又据犹太复国主义者方面的消息（《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8年5月7日，第4页，华盛顿来电）说，在就这一问题征询了希尔德林少将的意见之后，总统才任命他担任这一职务的。

见丹尼尔：《独立的人》，第319—9—320页；《福雷斯特日记》。第440页。

来，阿拉伯人缺少主动精神和纪律，在以色列的抵抗面前不能进攻到底，而以色列则以顽强拼命的防守和足智多谋的反攻弥补了它的物质条件的不足。在北面，叙利亚部队在剧烈的战斗之后被阻于约旦河流域，而黎巴嫩的小分遣队始终没有对敌人构成一个严重的威胁。埃及军队派出两个纵队跨越西奈沙漠进入巴勒斯坦。头一个纵队顺着沿海公路前进。经过主要是阿拉伯的地区而到达特拉维夫以南二十英里的伊斯杜德（古代菲力斯廷人的城市阿什杜德），然后被阻于以色列的主要防线之前》只有三处小的犹太人居民点在这次进攻面前放弃了，同时大约有二十处其他居民点的人转入了“地下”，决心准备抵抗。第二个埃及纵队通过完全属于阿拉伯的地区，经过比尔谢巴、希布伦和帕利恒而到了耶路撒冷的南部。在此期间，乘英国人5月14日从耶路撒冷撤退之机，以色列人立即发动了一次坚决的攻势来肃清仍然盘踞在耶路撒冷城北面和南面的阿拉伯的非正规部队，然后解救了被围困在旧城犹太人居住区的一千七百犹太

人。阿拉伯军团在参加占领犹太人居民点汇集的埃锡翁村以后（孤悬在那路撒冷西南十二英里的阿拉伯领土里面），现在又投入了保卫剩下的那部分阿拉伯耶路撒冷地区的战斗，并开始炮轰犹太人的新城。在最初两周的战斗中，他们给城里的十万居民造成了大约一千二百七十二人的死伤，其中被打死的有四百五十人。由于来自沿海平原公路的给养和援兵被截断，城中受到了逐渐瘫痪的威胁，这是阿拉伯军团据有拉特伦地方的警察堡垒，扼守着通往瓦德峡道的要隘，封锁了公路交通的结果。以色列人不顾一切的、但显然是计划不周的、夺取拉特伦的企图失败了，可是他们总算绕过了拉特伦这个阵地，迅速地和秘密地改建了一条六英里长的牲口小道，使它可以勉强通行车辆，以便把少量的接济送至被围困的那路撒冷。然而，没有办法挽救旧城中传统犹太教的那座“大教堂”了；尽管以色列政府还想保存这座古代遗留下来的象征，但是旧城终于在6月28日投降。新城保卫者看到轰炸犹太教堂所扬起的迷漫硝烟更增加了切肤之痛。自称“圣军”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非正规军，占据着离特拉维夫东南只有十二英里的战略要冲卢德德机场。

虽然伊拉克军队不顾阿拉伯军团的劝告，企图在贝桑对面渡过约旦河遭到严重的挫折，但却在十五天后占领了距离地中海只有十英里的阿拉伯城市图勒卡姆，达到了犹太城市哈德腊附近的海边。由于伊拉克军队已经向前冲得离开他们给养和弹药的队伍太远，这就使以色列人从埃斯德拉埃隆溪谷发动的对阿拉伯城市杰宁的反攻几

人。阿拉伯军团在参加占领犹太人居民点汇集的埃锡翁村以后（孤悬在那路撒冷西南十二英里的阿拉伯领土里面），现在又投入了保卫剩下的那部分阿拉伯耶路撒冷地区的战斗，并开始炮轰犹太人的新城。在最初两周的战斗中，他们给城里的十万居民造成了大约一千二百七十二人的死伤，其中被打死的有四百五十人。由于来自沿海平原公路的给养和援兵被截断，城中受到了逐渐瘫痪的威胁，这是阿拉伯军团据有拉特伦地方的警察堡垒，扼守着通往瓦德峡道的要隘，封锁了公路交通的结果。以色列人不顾一切的、但显然是计划不周的、夺取拉特伦的企图失败了，可是他们总算绕过了拉

---

莱尔曼：《以色列的创始及真明天》，第285—288页。

金奇：《七根倒了的柱子》，第226页。

特伦这个阵地，迅速地 and 秘密地改建了一条六英里长的牲口小道，使它可以勉强通行车辆，以便把少量的接济送至被围困的那路撒冷。然而，没有办法挽救旧城中传统犹太教的那座“大教堂”了；尽管以色列政府还想保存这座古代遗留下来的象征，但是旧城终于在6月28日投降。新城保卫者看到轰炸犹太教堂所扬起的迷漫硝烟更增加了切肤之痛。自称“圣军”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非正规军，占据着离特拉维夫东南只有十二英里的战略要冲卢德德机场。

虽然伊拉克军队不顾阿拉伯军团的劝告，企图在贝桑对面渡过约旦河遭到严重的挫折，但却在十五天后占领了距离地中海只有十英里的阿拉伯城市图勒卡姆，达到了犹太城市哈德腊附近的海边。由于伊拉克军队已经向前冲得离开他们给养和弹药的队伍太远，这就使以色列人从埃斯德拉埃隆溪谷发动的对阿拉伯城市杰宁的反攻几乎成功。

5月17日，即阿拉伯各国公开进行干涉的三天之后，美国代表团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九条向安全理事会提出一项决议案：命令交战双方在三十六小时以内停火。然而，对于援用第三十九条是否适宜（该条要确定谁是侵略者并对其实施制裁）以及在目前变化不定的局势下命令双方停止行动是否切实可行，英国首席代表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都表示怀疑。他愿意看到对委任统治结束后的巴勒斯坦法律地位能作出某些规定以便全面加以研究；并建议安全理事会应采取温和的方式谋求停战——也许应先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再指望最后扩大到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后来据报道，这位英国国务大臣曾于5月21日告诉一位下院议员说，英国驻在所有阿拉伯国家故外交代表都曾奉到指示，要他们不论条件争取停战。卡 273 见莱文，前引书，第151页；扎赫尔，前引书，第257页。

见上文，原著第254页。根据莱文，前引书，第154页的说法，军团的干涉使幸存的犹太人得以未受当地阿拉伯村民的屠杀多根也同样奉到指示，要他“尽可能设法实现停火，但不得同意对阿拉伯各国实行制裁”。阿卜杜拉国王的阿拉伯军团在那路撒冷的干涉，使人注意到一件事——在该军团服务的英国军官事实上是正在同以色列的军队打仗，同时也使人注意到英国政府所发表的一项声明，即除非联合国认为约旦现在占领1947年11月大会决议指定给阿拉伯人的地区的行动是违法的，否则英国政府将继续在条约所规定的义务范围内，给予阿卜杜拉国王以军事上和财政上的援助。5月22日，沃伦·奥斯汀宣称，阿拉伯各国对其干涉行动的所作的辩解——即巴勒斯坦是一个单一的国家，其委任统治结束后的前途应取决于占到多数的阿拉伯人的意志——就是“国际违法行为最高级的典型证明”。他指责约旦的抗拒，请安全理事会责成联合国各会员国“迫使阿卜杜拉安守本分”。可是

---

地理上的巴勒斯坦，其希伯来文的名称是 Eretz Yisrael，即“以色列的土地”，但是经多次讨论以后，认为这样称呼这个国家不适当，因为在联合国的裁决之下，它仅仅得到巴勒斯坦的一部分地区；最后采用了“以色列国家”（Hednat Yisrael）。见沃尔特·艾坦：“找一个恰当的名称”（Walter Eytan：“The Search for a Name”），《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8年1月30日，第5—6页。

宣言的全文载《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8年5月21日，第1页；《新犹太》，1948年5月，第121页，·

金奇：《七根倒了的柱子》，第228页。

关于在当时对这位犹太复国主义前辈老政治家的印象，见麦克唐纳：《我在以色列的使命》，第26—28

美国提出的，在宪章第三十九条的意义范围内，宣布巴勒斯坦的和平已受到破坏的决议案，却只获得了少于法定的七票。无论如何，安全理事会还是决定下令要求在三十六小时内停火。可是两天之后，安全理事会多数国家又同意了阿拉伯国家的一项要求（受到卡多根的支持），把停火命令的限期延长两天，以便阿拉伯国家联盟对此加以考虑。然而，过去十天的事态的发展，已使英美关系达到了许多年来最紧张的程度。英国的舆论早就对华盛顿政府的那种倾向性非常不满。在英国人的眼中，华盛顿政府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由于顾虑到在美国国内政治中犹太人选票所具有的力量，至少是听任这种顾虑过多地影响了它的公开姿态；而另一方面，却对巴勒斯坦局面中的现实问题以及英国在那里处境上的种种困难又考虑得太少了。这一年（1948年）又是一个大选的年头；总统立即承认以色列国家这件事以及它可能从美国获得一笔借款的谣传，都在伦敦引起了愤慨。

另一方面，在美国，英国人提出来的那些说法——阿拉伯各国从英国得来的武器是作为履行条约义务的一部分而供应的，并且是“早在目前战事发生之前很久”就已订购的。而在阿拉伯军团服务的一些英国军官则是军团直接雇用的人员，而并不接受英国的命令等等。都被看成是以法律为借口的诡辩。参议员布鲁斯特建议根据欧洲复兴计划对英国的财政援助应该重新考虑，“以便确定美国将在多大程度上对那些在成功湖和中东显然是气势汹汹地反对美国政策的人还进行援助”；他的这个建议在参议院得到了支持。美国报界（据英国观察家断言，它经常受到刊登商业广告犹太客户的压力，以影响它对巴勒斯坦争议的报道）开展了一场——正如一个驻华盛顿的英国记者所说的——二十年来最严重的反英运动。在美国驻伦敦的大使时常和贝文会面的期间，阿拉伯的发言人于5月26日在安全理事会上宣称，他们只有在犹太移民和军火都停止进入以色列的条件下才同意停火。次日，卡多根宣称：没有英国军官正在参加目前耶路撒冷的战斗，英国正在采取措施来保证那些从英国部队调派到军团去的军官不在巴勒斯坦服务；英国应于7月12日交付给约旦的下一期补助金的那项条约义务，将按联合国决定的精神来重

---

页，第38页。他死于1952年11月。

据凯斯特勒的《许诺及兑现》（第202页）说，临时议会内两个修正派成员中的一个曾表示反对，认为韦茨曼是一个英国公民，他从来没有取得过巴勒斯坦国籍。

加西亚-格拉纳多斯：《以色列的诞生》，第290页。与英国的紧张关系，对英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是有影响的，他们之中有些人后来诉苦说，在私人集会场合以外，他们要公开表示喜悦和兴奋“也许还有些不好意思”（《犹太复国主义评论》社论，1948年7月30日，第8页）。

《泰晤士报》驻联合国大会记者曾报道说：代表们普遍认为，“不管其得失如何，也不谈苏联和美国给予的联合支持，分治计划除了在纽约之外，没有别的城市是会予以赞同的。”（1947年12月1日）

见L·阿维格多在《犹太复国主义评论》上的文章，1949年4月29日，第4页。这个代表团有两个成员，其中之一就是俄国出生的妇女劳工领袖戈尔达·迈耶森夫人，犹太代办处政治部的代理主任。

贝文后来指出，阿拉伯军团只是“在联合国指定给阿拉伯人的地区中”进行干涉，并没有进入指定给“建议中的犹太国家”的地区（1948年5月26日和6月2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51卷，第187栏，第999—1000栏）。

见莱文：《严阵以待的那路撒冷》，第170页，1948年5月18日的日记；扎村尔：《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246页，关于本-古里安的报道；并参阅《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8年6月11日，第5页。



新加以审查，英国政府将暂停对于目前为履行现行合同义务而向埃及、伊拉克和约旦交付的军火，如果安全理事会决定实行全面禁运，以便有效地阻止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双方的军火供应。卡多根还继续说，他的政府已经劝过阿拉伯各国接受安全理事会的停火方案，但未成功，“可是他的政府也不能赞同只根据这次努力的结果而作出的形势判断”。因此他建议：安 275 全理事会应呼吁双方下令停止一切武力行动四个星期，在此期间双方都不得把战斗人员或合于军事年龄的人员或者战争物资引进巴勒斯坦，这些条件的遵守，应由联合国驻巴勒斯坦的调解人福耳克·伯纳多特伯爵指导下的军事观察员若干人加以监督。伯纳多特伯爵是根据 5 月 14 日联合国大会的一项决议而被任命的。

28 日恢复讨论时，以色列发言人（奥布里·S·埃班，即后来的以色列驻美大使阿巴·埃文）宣称，当阿拉伯各国边境对人力和物资都是开放的时候，有人建议要对以色列取得武器和移民入境两者加以控制，他觉得这种“不怀好意”的建议是件“咄咄怪事”——后者正是对这个新生国家的原则和良心问题上的最敏感部分，就其主权所强加的一种“侮辱性的限制”。一项苏联提案同那个已经失败的美国提案唱一个调子，要求于三十六小时内停火，否则即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实行制裁；它得到美国的支持，但只获得五票赞成，仍然是那六个代表弃权，同美国的提案付表决时一样。要求停止敌对行动一个月的英国提案，于 5 月 29 日通过，苏联和乌克兰弃权。由于美国的主张，提案中包括了两点对以色列的让步，即禁止战斗人员或战争物资在所有的有关国家中移动或者进入其境内，而不是仅仅禁止进入巴勒斯坦；以及以色列可以接纳合于军事年龄的移民，但在停战期间不得动员或者训练他们。这样就在英美两国对巴勒斯坦战事的态度方面日益扩大的裂口上搭了一道桥，两国政府利用此后几个星期的暂息时期，做到了使它们在这方面的政策不会再出现这样公开的和严重的对立。

联合国驻巴勒斯坦的调解人受托执行停战事宜。6 月 4 日，他报告说：由于受到犹太移民问题的阻碍，双方未能就停战条件的实施取得一致意见，因为阿拉伯人坚持把这些条件理解为排除一切已达军事年龄人员的移民。以色列当局不接受这种解释，但准备让联合国调解 276 人在停战期中监督他们移民的入境。于是，6 月 7 日他呼吁双方同意从 11 日起停战一个月，条件是他可以允许若干已达军事年龄的移民入境，但其人数应以不使以色列在军事上得到好处为限——他们将被安顿在有调解人的观察员监督的营地之内，以确保在停战期间他们不会被动员或受训练。双方都被禁止输入战争物资，关于阿拉伯国家封锁沿海对那路撒冷十万犹太居民的粮食和水的供应一事，

---

战斗部队的这些疾苦，后来虽经过查究，但大部分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终于酿成 1952 年 7 月埃及的军事政变。

详见扎赫尔：《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 207—217 页，第 272 页。

见本书末图三：参阅扎赫尔，前引书，第 251—255 页；皮尔曼《以色列的军队》，第 131—133 页；比尔拜：《近东的新星》，第 49 页。

杰弗里·D·戈尔茨坦：“和贝文先生的一次谈话”（Geoffrey D. Goldstein：“A Talk with Mr. Bevin”），《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51 年 2 月 9 日，第 10 页。

英国军官共计三十七人：大多数是从英国军队中借调来的，十三人是和约旦政府订有合同关系的平民，还有三人（包括军团的司令 J·B·格拉布陆军准将）在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期满时已与英国殖民地政府断绝关

在是否应该解除的问题上双方原有不同意见，现商定如下办法加以解决：救济品应由国际红十字会一个委员会处理，以保证主要供应品的储存量在停战期中不大量增加。其“明显的用意”是要保证任何一方都不会在军事上得到好处。尽管以色列在对移民的限制上还有进一步的保留意见，但双方都接受了停战办法，并于6月11日按时实施，只在最初几天中有一些次要的违反约定办法的行动。

## （二）第一次停战情况，1948年6月11日至7月7日

由于安全理事会对于代表联合国调解人监督停战的军事观察员的国籍未作规定，调解人曾于5月30日非正

式地向驻开罗的美、苏、英、法四国大使探询他们的国家是否可以派人担任观察员。可是，调解人在6月5日通知苏联的代办说，除了他自己带到巴勒斯坦的那些瑞典军官以外，“已经决定”只从美国、法国和比利时三国抽调军事观察员，因为这三个国家的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过去两个月中已是那里的停战委员会的成员了。对此，葛罗米柯抱怨说，这是美国单方面的决定。伯纳多特后来提到，尽管美国代表在安全理事会表现得对停战非常热心，但美国在提供它应该分担的观察员一事上，却比法国或者比利时慢得多，看来部分原因是怕观察员万一遭到277伤亡，会使政府在即将到来的大选运动中受到批评。他承认以色列人发的牢骚，即阿拉伯国家在前一阶段受到的监督不够充分，是有一点理由的。

以色列人不愿他们所承担的在停战期间不输入战争物资的义务，大大地利用了这个暂息的机会来弥补他们几乎完全没有战斗机、大饱和重型装甲车以及自动武器和弹药严重不足的缺陷。巴勒斯坦斗争已经跨越冷战的正常界限到什么程度，下述事实可以说明：这些武器买卖所需要的硬通货，很大一部分是由美国犹太人捐献的美元提供的，而供应最多的来源之一，却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国营军火工厂，那里的共产党已于这一年的2月间夺取了政权。英国军队从巴勒斯坦撤退现在已到达最后阶段。虽然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都准备送大量的钱给可以腐蚀的英国军官和其他人员，但武器、装备、甚至还包括一些坦克的非法交易，大部分却是以色列人在沿海平原进行的。以色列买到的第一架轰炸机是从美国和英国走私出来的。意大利是另一个供应来

---

系，参加了约旦军队。至少有一个美国军官，大卫·马库斯陆军中校，在以色列那边参战。

《泰晤士报》外交记者报道，1948年5月19日；参阅上文，原著第270—271页。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3年，第72号，第42—44页。

哥伦比亚、法国、乌克兰、美国和苏联赞成；阿根廷、比利时、加拿大、中国、叙利亚和联合王国弃权。

韦茨曼总统于5月25日受到杜鲁门总统的接见。据报道，他曾要求贷款九千万至一亿美元，其中一部分需要用来购买坦克和反坦克炮（《泰晤士报》驻华盛顿记者报道，1948年5月26和28日）。

《泰晤士报》外交记者报道，1948年5月24日。

《国会记录》，1948年5月21日，第6279—6281页。1946年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曾施加压力，使美国对英国的贷款要求要以英国立即让十万名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为条件。然而，拉比斯蒂芬·怀斯曾反对这种在贷款上强加条件的企图。

弗兰克·奥利弗（Frank Oliver）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的文章，1948年5月30日。

然而，《泰晤士报》驻耶路撒冷的记者曾报道英国军官参加了26日在那里的战斗（《犹太复国主义评论》，

源，在那里“哈加纳”的代理人一般总能够机智地胜过他们的阿拉伯对 278 手。强硬派的伊一兹一卢尽管名义上属于以色列陆军，但在行动上却仍然是有些独立的，这时由于购买了一船军火，引起了同“哈加纳”的一次政策上的冲突，后者的迫击炮火于 6 月 22 日在特拉维夫的海面击毁了这条船（“阿尔特利纳”号）及其大部分货物。

联合国大会任命一名驻巴勒斯坦调解人的决议案 并没有明确地要他遵守 1947 年 11 月分治计划的细节。1948 年 6 月 27 日，伯纳多特在同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协商后，向双方提出了一系列“可能作为讨论基础的建议”。他的原则是，巴勒斯坦这块委任统治地和外约旦，可以合并成一个经济联盟；在这个联盟里，有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双方可以通过一个中央议会来调节它们的共同利益，遇有分歧时，例如在移民问题上，有向联合国申诉的权利；因战事而流离失所的人有返回家园并收回其财产的权利。调解人还建议对 11 月的分治计划作某些领土方面的调整，使其符合目前的军事形势。在他提出来认为“值得考虑”的关于领土的各项建议中有：把内格夫（南巴勒斯坦）的全部或者一部分划入阿拉伯领土之内，而把加利利西区的全部或一部分划入犹太领土之内作为交换；把耶路撒冷城划入阿拉伯领土之内，但使犹太人居留地享有市政自治权（他们和以色列其他部分的交通联系一直是很不稳定的），并规定保护“圣所”的特别办法；以及在海法建设一个自由港（包括输油管终点和炼油厂），在卢德设立一个自由航空站。这些建议，据调解人的说法，虽然是同他个人的一些合作者一起研究出来的（其中特别是腊尔夫·本奇博士，联合国秘书处的一位官员，自从一年前被任命在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 279 特别委员会工作以来，他一直在处理巴勒斯坦问题），但确实也反映了——不管是多么间接地——美国和英国政府的愿望，即战事应该通过以色列和约旦的达成谅解来结束。然而，以色列政府在 7 月 7 日的

---

1948 年 5 月 28 日，第 1 页，援引 5 月 27 日《泰晤士报》的早晨版；参阅 5 月 26 日贝文对质问的含糊的答复，下院辩论，第 5 辑，第 451 卷，第 187—188 栏）。后来据报道，贝文曾于 5 月 20 日告诉一位议员说，他在战事开始时曾命令所有的英国军官都从阿拉伯军团撤出；可是他又提到：“把英国军官留在阿拉伯军团的目的是希望这样会防止部队涣散，使军团有纪律，以及他们能在未来的阿拉伯地区上维持秩序。”（杰弗里·D·戈尔茨坦：“和贝文先生的一次谈话”，《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51 年 2 月 9 日，第 10 页）

见上文，原著第 267 页。伯纳多特伯爵是瑞典王室的一个成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积极参加红十字会工作。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 3 年，第 76 号，第 6—7 页，第 9 页。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1948 年 5 月增编，文件 S/801。

英国政府遭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大肆攻击，因为它把七八千名适合军龄的非法犹太男移民继续扣留在塞浦路斯的收容营中，一直到 1949 年 1 月。联合国调解人小心地避免赞成或者谴责英国的这一行动。

“口粮定量比纳粹集中营里还少”（E·拉泽松少校在《犹太复国主义评论》上的文章，1948 年 7 月 2 日，第 3 页）。“一个多星期以前有些部分的士兵只能吃到面包和人造巧克力酱。燃料的情况极糟，最后剩下那部分石油是供全城暖气系统用的，现在也都都被征用来供给面包厂了。……假如不是为了耶路撒冷的这种局面，政府决不会同意停火。”（莱文：《严阵以待的耶路撒冷》，第 243—244 页，1948 年 6 月 10 日的日记）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 3 年，1948 年 6 月增编，第 77 页，第 79—84 页，文件 S/823、S/826、S/829。

答复中，不仅认为调解人关于耶路撒冷的建议是“危害极大……鼓励了阿拉伯人的错误的希望和伤害了犹太人的感情”，而且认为把阿拉伯巴勒斯坦和外约旦联合起来的建议，将造成一种新的局面，从根本上改变 1947 年 11 月大会决议案中有关领土的各项规定。这些规定，以色列政府进一步争辩说，是在以色列作出重大牺牲之后给予它的一种“不能再少的最低限度的东西”，而现在这些规定则需要加以改善——既要保证以色列的安全不受阿拉伯国家侵略所带来的危害，又要体现它在击退侵略中所取得的那些收获。

同时，随着一个月的停战即将满期，调解人于 7 月 3 日和 5 日呼吁交战双方同意延长期限。英国代表团也于 7 日在安全理事会提出了一项同样的动议。以色列准备延长停战。而英国政府据说也“多多少少说服了外约旦、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黎巴嫩予以同意……但叙利亚和埃及则坚持恢复战斗，并最终迫使其他阿拉伯国家顺从了它们的观点”。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三国政府，事实上已经陷入了它们在 5 月战斗期间一直为其本国舆论所编造的那种假话连篇的宣传迷网之中。报纸的战事报道和官方公报，都距离真相如此之远，以致特别是埃及的公众竟信以为真，在期待早日取得全面胜利了——“一星期内打到特拉维夫”。所以，阿拉伯国家联盟前此于 6 月 11 日接受停战命令一事，使人感到了意外和失望，从而产生了一个神话，说正是由于停战才使以色列幸免于难的。阿拉伯的领导人们知道，他们为了进行战争所存储的军事装备，特别是在弹药方面，从来就不曾充裕过，而且，由于联合国的禁运，也不可能随时得到补充。“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军队已经暴露出严重缺乏武器，沙特阿拉伯和也门两国口头以外的援助也微不足道。”可是由于阿拉伯各国的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英国人的合作中学会了严峻的新闻检查办法，已经把本国和外国报纸中不利的消息铲除干净，压制了对阿拉伯领导的任何批评，结果是受了蒙蔽而期待早日胜利的舆论，仍在叫嚷要重新开战。许多不利的消息，公众都不知道；其中，有一件事是：阿拉伯领导人彼此之间的不牢固的谅解在一个月停战期中破裂了。4 月间，阿拉伯国家联盟会议决定，一俟委任统治满期，就对巴勒斯坦进行干涉。当时他们还作出一项自律的戒条，要求大家不以扩大自己的领土为目的，而只是为了拯救巴勒斯坦免受犹太复国主义的侵害，把这个地方还给它的人民。

---

伯纳多特：《前往耶路撒冷》，第 31 页，第 57 页。

同上书，第 191—193 页，第 198 页。

观察员的分布状况：1948 年 8 月 1 日 1948 年 9 月 8 日（131 名观察员）（315 名观察员）以色列 63%40% 耶路撒冷 8%25% 阿拉伯国家和阿拉伯巴勒斯坦 29%35% 资料来源：联合国大会：《正式记录》，第 3 届会议，增编第 11 号 [S/648，《联合国调解人的进度报告》（Progress Repo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Mediator）]，第 38 页；又见麦克唐纳：《我在以色列的使命》，第 41 页。

详情见扎赫尔：《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 272 页。

埃胡德·阿夫里埃尔（Ehud Avriel），1948 年 6 月 20 日正式派驻捷克斯洛伐克的以色列公使（《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8 年 7 月 16 日，第 2 页；10 月 15 日，第 6 页），后来被称为本-古里安的《驻欧洲购买军火的主要代理人》（乔恩·金奇在《评论》上的文章，1952 年 9 月，第 243 页；参阅金奇：《七根倒了的柱子》，第 249—251 页；比尔拜：《近东的新星》，第 42 页）。以色列共产党领袖舍穆勒·米库尼斯（Shmuel Mikunis）后来说，他在 1948 年 5 月间曾得到本-古里安的允许去访问欧洲共产党国家，从那里购买武器（《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51 年 5 月 11 日，第 6 页）。

两名英国军官和两名二等上士因出售武器从“哈加纳”方面得到大约两万英镑；见关于审讯他们的报道，

然而，战争的第一个月已经使阿拉伯国家首脑中最现实的阿卜杜拉国王相信，以色列是一个既成事实，不可能用阿拉伯的武力把它“赶到大海里去”。剩下的阿拉伯巴勒斯坦这一小块地方，决不能成为一个健全的独立实体；而且那里有几个有势力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家族，长期以来反对耶路撒冷的穆夫提的政策和他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但却赞成把阿拉伯巴勒斯坦合并到阿卜杜拉的“约旦王国”里去，英国政府和联合国调解人显然对此表示同意。在6月的最后一周中，阿卜杜拉访问了法鲁克和伊本·沙特两位国王——后者是他二十五年来不曾见过面的老对头，并向两者陈述了他的理由。在5月中旬对巴勒斯坦进行干涉的时候，阿卜杜拉就已宣称阿拉伯最高委员会不再代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并谋求通过提名最高委员会财务处长艾哈迈德·希勒米帕夏担任耶路撒冷的行政长官，把他争取过来。在开罗期间，阿卜杜拉同穆夫提举行了会晤：自从穆夫提在1937年为了逃避英国人的逮捕离开耶路撒冷以来，阿卜杜拉一直没有见过他的这个政敌。可是所有这一切都落空了。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政治委员会的态度，由于它在7月9日宣布成立一个巴勒斯坦“行政委员会”而明朗化起来。该委员会的主席是文哈迈德·希勒米，并以穆夫提的亲戚贾马勒·侯赛尼作为一个负责内部安全的成员——这显然是摒弃了阿卜杜拉的建议。

### （三）十天战役，1948年7月8—18日

7月8日停战期满，一支埃及军队于当天清晨在南巴勒斯坦开始行动时，阿拉伯国家间缺乏共同政治目的，因而缺乏一个大家一致的军事计划的情况就立刻显露出来了。以色列人准备充分，对阿拉伯军团在沿海平原上的前哨——卢德的飞机场和离特拉维夫东南只有十二英里的邻近的阿拉伯城市腊姆拉——发动进攻。这个军团在耶路撒冷的阵地，也有立即受到以色列袭击的危险，据说当地的以色列司令官曾夸口能在四天之内拿下该阵地。关系重大的英国对约旦的财政补助，原应于7月12日拨付的那一期款项，被扣住未发，要等安全理事会考虑形势后再作决定。英国所供应的武器和弹药也是如此。军团因此在物力上面临的是一个瘫痪的局面。军团司令格拉布帕夏认为：他不能冒险把他的兵力放到比控制着耶路撒冷和沿海之间主要公路的拉特伦重镇更西的地方，因而就必须把卢德和腊姆拉放弃。于是，这样就让以色列人

---

《泰晤士报》，1951年10月21日和28日；12月13日和14日。

以摄制一部文献纪录片作为掩护，“哈加纳”驻英国的主要代理人曾为以色列买过飞机。他的英国同谋者中有两人因这种非法的输出被判刑，另一个人供认曾处理掉一个犹太汽车商的尸体，此人和后者一道曾同一帮把飞机和武器走私到以色列以及把汽车走私到英国的集团有过关系（《泰晤士报》；1948年4月26日，10月10日；1950年1月24日和26日，12月23日）。

见贝京：《起义》，第154—159页，第166—175页；凯斯特勒：《许诺及兑现》，第245—252页。这批非法军火的一部分，已经于6月20—21日夜在特拉维夫和海法之间的地方，卸到了岸上，但联合国观察员们未能从以色列当局方面把这批军火没收；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1948年7月增编，第13—17页，文件S/862和S/861/Add.1，并参阅伯纳多特：《前往耶路撒冷》，第123—124页，第188页。

见上文，原著第267页。

见伯纳多特，前引书，第126—131页。

占领了这两个城镇。在其他阿拉伯国家看来，这回阿拉伯军团的撤退却是一次不应该的临阵脱逃的行为。这因为以色列人把卢德和腊姆拉的阿拉伯居民共计六万人左右都赶了出来，其中包括来自海法的那些已经是难民的阿拉伯居民；与此同时，以色列人实际上还占领着整个西加利利地区，包括阿拉伯城市拿撒勒在内，而且在南线对埃及人的作战中也取得一些进展。在耶路撒冷，以色列军队被挡住了，他们也未能截断阿拉伯军团和拉特 282 伦的交通。联合国调解人飞到成功湖亲自向安全理事会作了汇报以后，接替沃伦·奥斯汀担任美国首席代表的菲利普·C·杰塞普于 7 月 13 日提出一项决议案：命令于三天内停火，否则根据宪章第七章实施制裁。据说以色列的年轻的作战部长和他的军队同事们都极力怂恿他们的政府“不要同意停火而要进行到胜利”。在以色列，卡多根立即支持美国这项决议案一事，被人用来同他在 5 月间顽强反对对阿拉伯实施制裁一事，作了讽刺性的对比。然而，即使安全理事会 7 月 15 日通过并于 18 日生效的第二次停战决议使以色列人不能得到进一步的好处，他们也还颇有理由感到满意，因为在两次停战之间的十天战役中，他们从阿拉伯人手里夺得的领土，已经三倍于他们在第一个月战斗中所获得的领土；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不团结，则由于约旦未能守住卢德和腊姆拉两地而大大地恶化了。

#### （四）第二次停战和联合国调解人的被害，1948 年 9 月 17 日

在第二次停战的执行中夹杂着许多双方不遵守停战条件的情况，结果零零落落的战斗继续发生，特别是在耶路撒冷。以色列人由于最近取得的一些成功而洋洋得意，倾向于残酷对待那些袭击以色列交通线的阿拉伯非正规军出没的地区。在南面，埃及人不让以色列的公路运输队向二十五个内格夫定居地供应粮食，除非以色列人先停止向定居地的空运供应；而以色列人则拒不停止空运办法，也不肯接受联合国的监督，除非埃及人先让公路运输队通过。同样，因为阿拉伯军团仍旧占据着从海岸到耶路撒冷的输水管道上的拉特伦抽水站，约旦政府拒绝恢复对新城十万犹太人的供水工作，理由是以色列人没有履行关于耶路撒冷非军事化的停战条款规定（这个 283 理由未能使调解人满意）。

---

以色列临时政府的驻伦敦代表（温和派的内厄姆·戈德曼博士）于 5 月 26 日告诉调解人说，英国正在考虑这样的领土交换，而且评论道，“犹太领导人们自己对南内格夫的重要性的看法也不完全一致”（同上书，第 10 页）。据说，贝文在他 1947 年 2 月间同犹太复国主义者领导人的谈话中曾劝他们不要要求巴勒斯坦南部的领土（扎赫尔：《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 128 页）。

詹姆斯·G·麦克唐纳 7 月底从伦敦美国大使馆的一个成员的谈话中听到说，调解人关于耶路撒冷的建议“大部分”也都是英国政府的建议（《我在以色列的使命》，第 20 页，第 62 页，并参阅乔恩·金奇在《犹太复国主义评论》上的文章，1948 年 7 月 31 日，第 3 页）。不过，这位调解人曾斥责一家以色列报纸的报道不负责任，因为它硬说他曾和英美两国政府进行了直接联系（伯纳多特，前引书，第 107 页）；关于他所以建议把耶路撒冷划入阿拉伯领土之内的理由，见同上书，第 152—153 页。

同上书，第 118—119 页。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 3 年，1948 年 7 月增编，第 27—30 页，文件 S/870。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成功湖记者报道，1948 年 7 月 10 日；参阅《泰晤士报》，1948 年 7 月 10 日。法鲁克国王 1952 年被迫退位后受到指控说，就是他强迫了一个（由马哈茂德·法赫米·努克拉希领导的）

调解人和以色列政府之间的对立由来已久，即在他到达巴勒斯坦后的十天内就开始了。当时，关于谢尔托克对他的停战建议所作的“非常激动的”批评，他提出过

抗议，说谢尔托克反对安全理事会和世界的舆论，“肆无忌惮”地威胁他。可是，无论如何，由于伯纳多特于6月27日建议，作为一项“值得考虑”的办法，把耶路撒冷划入阿拉伯领土之内，紧张的程度又大大增加了。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大概因为越来越同阿卜杜拉国王意见不合）在7月底已准备考虑耶路撒冷的非军事化问题，而这个问题在一个月前他们还认为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现在却轮到以色列政府来提出非军事化的先决条件了——这就是撤销调解人关于把耶路撒冷划归阿拉伯统治的那项建议。<sup>被</sup>与此同时，“伊一兹一卢”和“斯特恩集团”的极端分子则决心反对调解人的建议，已经把他们的力量集中到耶路撒冷。<sup>5</sup>斯特恩集团在他们的头子内森·弗里德曼—雅林的领导下，最近已经带上了极左的性质。<sup>1</sup>第一次停

战刚刚开始，斯特恩集团就对联合国调解人及其观察员采取了威胁的态度，<sup>伊</sup>并且在调解人8月9日至11日访284问耶路撒冷时公开示威反对他。<sup>线</sup>意味深长的是，一部分以色列报纸一口咬定说这位调解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阶段期间作为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曾同希姆莱有过暧昧的勾搭，<sup>战</sup>而现在又成了“英美帝国主义”和“石油利益”

的一个代理人。除了这些过分的指责外，以色列政府和实际上整个报界都对调解人及其联合国观察员采取了敌对的态度，说他们偏袒阿拉伯人，没有起了什么作用。<sup>战</sup>早在9月间，调解人就为耶路撒冷的紧张局势非常担心，正在考虑把他自己的总部（当时设在罗得岛，该岛和巴勒斯坦的空中交通会受到冬季暴风雨的影响）和他手下观察员构总部（当时设在海法）都迁到耶路撒冷城里来。斯特恩集团的领袖大概当时还不知道调解人在这个阶段的令摩西·斯奈[关于此人，见上文，原著第194页和第221页注（即本书第333页和第380页注——译者）]，于1947年重访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他的祖国波兰后，也认为“这个年青的犹太国家如果转向苏联，比之依附伦敦和

---

不愿意打仗的埃及政府和军队同以色列开战的。

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阿扎姆本人曾于5月30日对调解人说，“阿拉伯军队的战略和技术地位特别有利……因此他们不会有多大困难就能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一项对他们有利的军事决策伯纳多特：《前往耶路撒冷》，第34页）。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拉克代表后来声称：“阿拉伯军队正在向特拉维夫集合，并在即将消灭犹太复国主义威胁的时候，调解人出来干涉了。”[1948年11月17日的发言，《大会第三届会议正式记录》（Official Recordsofthe3rdSessionoftheGeneralAssembly），第1部分，第一委员会，第663页]

《泰晤士报》驻开罗记者报道，1949年2月11日。下列各战线上阿拉伯和以色列被俘人数的比率，说明了各战线的相对重要性：

<sup>被</sup> 俘人数 以色列被俘人数

<sup>5</sup> , 458人) (总数942人)

<sup>1</sup> 百分比

<sup>伊</sup> 拉克战线 67.8 77.0

<sup>线</sup> 30.2 16.8

<sup>战</sup> 线 1.4 5.7

<sup>战</sup> 线 0.6 0.5

华盛顿来，可能得到更多的好处”（埃邦，前引文，第 266—267 页）。意图，曾在 9 月 6 日他的特拉维夫的新闻传单上的一篇文章里用了这样的话来作结尾：“当前的任务就是赶走伯纳多特和他的观察员们。祝福这样干的人们！”<sup>源</sup>然而，关于耶路撒冷犹太极端分子组织的威胁态度的报告，送到以色列当局面前的时候，他们似乎并不在意。耶路撒冷的军事长官伯纳德·约瑟夫，就反对调解人搬到城里来办公。谢尔托克则于 9 月 14 日说，内阁已推迟作出取缔极端分子组织的决定，因为有些部长希望能说服它们和平地解决。两天后，即调解人到来的前夕，谢尔托克本人和作战部部长据说曾在特拉维夫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批评了联合国的观察员。9 月 17 日，调解人对耶路撒冷的犹太占领区进行访问。自从斯特恩集团在 8 月间对他举行示威以来，这是他第一次来访问。陪同他的是一名以色列联络官，但没有带武装的警卫。他的汽车

被一辆吉普车堵住去路，四个穿以色列军服的人，结成一 285 伙，其中一人在近距离把调解人和一个法国观察员当场击毙。据说立刻用飞机把凶手们偷送到捷克斯洛伐克去了。后来有人说他们属于一个叫作“祖国阵线”的组织，显然就是斯特恩集团的一个分支，但后者却矢口否认。

在谋杀事件发生后又拖延了二十多小时，伯纳德·约瑟夫才下令在耶路撒冷实行宵禁，而在这段时间内斯特恩集团的成员仍然在城里自由地活动，但是它的“官方发言人”却发表了一项声明，指责说，干这件罪恶勾当的是英国情报人员。对行动迟缓所作的辩解是：以色列军事年 9 月 27 日）。最后，《曼彻斯特卫报》驻特拉维夫记者报道说，以色列政府在致瑞典政府的一份备忘录中承认，对调解人“未提供警卫，因为当时认为他也许不愿意要警卫”（《曼彻斯特卫报》，1950 年 6 月 20 日）。

8 月 29 日在埃及部队里服务的沙特阿拉伯非正规军杀害了两名联合国观察员，因为他们的飞机事先未通知就在加沙机场降落（《联合国调解人的进度报告》，联合国大会：《正式记录》，第 3 届会议，增编第 11 号，A/648，第 40 页，第 16 节）。当局对调动他们耶路撒冷防地的军队一事是很勉强的，因为他们要提防阿拉伯人的进攻。可是那些被以色列警察逮捕的斯特恩集团

---

<sup>源</sup>：沙布泰伊·罗森尼：《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停战协定》（ShabtaiRosenne：

Israel's Armistice Agreements with the Arab States），特拉维夫，布卢姆斯坦因代国际法律协会以色列分会出版，1951 年版，第 64 页注。以色列人还俘获同阿拉伯人一起作战的英国人十三名和其他国籍的人两名。

《泰晤士报》驻中东记者报道，1948 年 8 月 2 日。

马吉德·哈杜里：“肥沃新月统一的方案”，《近东与诸大国》，理查德·N·弗赖伊主编，第 155 页，第 158 页。

见上文，原著 270—271 页，以及埃斯蒙德·赖特：“阿卜杜拉的约旦，1947—1951 年”（Esmond Wright：“Abdallah's Jordan：1947—1951”），《中东杂志》，1951 年秋季，第 5 卷，第 445 页。

法鲁克曾于 6 月 7 日通知调解人，他刚收到约旦外交部长的抗议。说埃及部队在巴勒斯坦战争中使用的国旗比阿拉伯军团的约旦国旗大四英寸，这曾引起“严重的纠纷”（伯纳多特：《前往耶路撒冷》，第 69 页）。

《纽约时报》，1948 年 7 月 12 日。

金奇：《七根倒了的柱子》，第 255 页；参阅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 3 年，1948 年 7 月增编，第 65 页，文件 S/891（耶路撒冷停战委员会主席的报告，1948 年 6 月 11 日）。



成员却听任其逃走，或逐渐被释放了。弗里德曼—雅林和他的作战司令官，由于参加恐怖组织，于1949年2月10日分别被判处八年和五年286的徒刑，但是由于同时宣布了大赦，也都获得释放。这样，弗里德曼—雅林就在他刚被选为议员的以色列议会里人座了。瑞典政府抱怨说，以色列政府在调查伯纳多特伯爵被害一案中严重地有失职责。过了将近两年，以色列政府才承认“组织工作有缺点和经验不足”，弥补了两者之间的裂痕。

### (五) 1948年10月以色列的进攻

阿拉伯各国的领袖在巴勒斯坦远没有达到他们的军事目的，这时强加的第二次停战，却使他们得以在1948年夏天期间就巴勒斯坦政治地位问题大作文章。9月20日，一个在穆夫提领导下的“全巴勒斯坦阿拉伯政府”宣布成立，并且在10月间得到了除约旦以外所有阿拉伯国家的承认。在埃及军队占领的那部分南巴勒斯坦地区，这个设在加沙的政府所拥有的威信，也是暂时和空有其名的。至于那些拥护阿卜杜拉国王的人，这时也在筹备一个“巴勒斯坦民族会议”。10月1日，有五千个著名人士自称代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外约旦的人民，在安曼集会，抨击加沙政府，并且请求阿卜杜拉把巴勒斯坦置于他的保护之下。与此同时，以色列军队一直是通过一条秘密途径暗中从捷克和其他方面不断获得军需物资，上述情况使他们有理由相信，只要不攻击耶路撒冷—拉特伦战线的阿拉伯军团，对于以色列向埃及战线发动进攻，阿拉伯军团可能不闻不问。调解人的进度报告（9月中旬公布）建议：如果以色列要保留它现在占据的西部加利利地区（根据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已划给阿拉伯人），作为交换条件，它应当把从马杰达勒至法卢贾线以南的那部分巴勒斯坦领土（根据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已划给以色列）全部让给阿拉伯人。可是，以色列既不肯放弃位于那条线以南的内格夫地区内二十五个定居地，又不肯放弃在辽阔的沙漠地带可能找到的矿产资源。以

---

但见皮尔曼：《以色列的军队》，第151—153页；扎赫尔：《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278—281页。以色列人得力于两辆克伦威尔式坦克，这是他们在英国人即将最后撤出海法之前通过腐蚀一些英国士兵而取得的〔比尔拜：《近东的新星》，第43页；格尔雄·阿格龙斯基（Gershon Agronsky）在《犹太复国主义评论》上的文章，1948年9月10日，第7页〕。

见《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8年7月30日，第5页，1948年8月20日，第1页；金奇：《七根倒了柱子》，第252—255页。

7月12日扣住未发的英国对约旦的补助五十万英镑，于28日付讫，以酬答约旦接受新的停战决议。

联合国观察员证实，在第二次停战生效后的一周中，以色列人对卡尔迈勒山脉下的三个阿拉伯村庄进行“警察搜查”，结果是村民被打死或失踪的“将近一百三十人”；其余的居民被赶跑，两个村庄被毁灭。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以及一些阿拉伯国家则指控说，被逮捕和屠杀的人数以万计（《联合国调解人的进度报告》，联合国大会：《正式记录》，第3届会议，增编第11号，A/648，第40页）。

见伯纳多特：《前往耶路撒冷》，第141页，第145页，第203页。调解人最后裁决：以色列人退出停战后所占领的两个阿拉伯村庄，作为交换条件，拉特伦抽水站应交给一名联合国观察员管理。他希望对耶路撒冷的供水工作能于两三日内恢复。可是应他的请求派出的联合国的武装警卫人员还未来得及出发之前，阿拉伯人（可能是非正规军）在8月11—12日的夜间用炸药就把抽水站完全破坏了。以色列人于是开始使用他们自己的一条管道，并占据着那两个村庄不走。

伯纳多特：《前往耶路撒冷》，第60页。

以色列与在南巴勒斯坦的埃及占领军，为了被围困的定居地的粮食供应一事，一直存在着争执，这使以色列在该 287 地区采取直接行动有了借口。10 月初，以色列的参谋部一方面坚持要埃及政府接受他们向定居地派遣护送队的要求，另一方面则阻止联合国向该地区派一位常驻观察员，同时还有计划地把军队和武器装备从其他战场调到该地区。10 月 14 日，他们通知联合国参谋长，将于次日早晨派遣一支护送队，后来又宣称他们的护送队受到埃及军队的袭击。埃及陆军司令官反诉说，该日晚间，以色列用装甲车对附近地带袭击，这就构成了 15 日清晨总进攻的一部分。以色列这时第一次借助其空军优势，击败了顽抗的埃及军队，攻占了大片土地，21 日拿下比尔谢巴，22 日攻克拜特哈农（在加沙东北只有五英里），不

久又占领拜特吉卜林（位于通往希布伦的方向）；有一旅埃及兵被围困于法卢贾地区，但在其苏丹司令官的指挥下又坚守了三个月之久。虽然双方同意自 10 月 22 日起实行停火，但以色列政府却极力反对腊尔夫·本奇以代理调解人身份所提出的，并且在安全理事会为英国代表团和中国代表团所支持的那项建议——以色列可向内格夫地区的定居地派遣护送队，可是必须把军队撤回至 14 日进攻之前的原来阵地。以色列代表反对说，他们自上述日期后所占据的那部分领土，原来就是根据 1947 年 11 月联合国大会决议划给以色列的，并声称，这是英国的政策蓄意要把这个地 288 区从以色列分割出去，尽管那里“定居、建设和开发”工作都已经在进行。为了反击，以色列政府发言人说：据报告，有一营英国军队最近从外约旦进入巴勒斯坦，集结在耶路撒冷附近，他要求联合国对此进行调查。以色列政府发言人还谴责英国违反停战协议，把军火供给了伊拉克，可能也供给了其他阿拉伯国家。可是，当英国外交部和陆军部予以绝对否认之后，以色列也就不坚持这种论调了。11 月 6 日安全理事会通过一项折衷决议，指令代理调解人要求交战国磋商签

---

见上文，原著第 278 页。

谢尔托克（1948 年 7 月 28 日）和伯纳德·约瑟夫（8 月 3 日）的声明：《联合国调解人的进度报告》，第 12—13 页。

伊尔贡被说服把耶路撒冷电气公司的五名英国职员移交给“哈加纳”去审讯，这五个人是因间谍嫌疑于 1948 年 7 月 6 日被他们逮捕的。可是一个英国籍犹太女人曾叙述过，在 8 月间她和几个相识的犹太人是怎样因类似的罪名而被斯特恩集团严刑讯问的 [波林·罗斯：《耶路撒冷之围》

（Pauline Rose: The Siege of Jerusalem），伦敦，帕特莫斯出版公司，1949 年版，第 74—85 页]。这里，有重要意义的一点是极端分子集团的独立行动。

马丁·埃邦：“共产党在巴勒斯坦的策略”，《中东杂志》，1948 年 7 月，第 2 卷，第 265 页注(17)。1948 年，当亨利·华莱士召开民主党的美国总统竞选运动会议时，“在华莱士先生的记者招待会上散发的唯一文件就是斯特恩集团的文件……该集团已经在这里为华莱士的代表们设立了办公室”（《泰晤士报》驻费城记者报道，1948 年 7 月 25 日）。当前任“哈加纳”总司

苏联集团曾在安全理事会上激烈抗议不让苏联观察员进入巴勒斯坦一事（见上文，原著第 276 页），并一贯地对伯纳多特伯爵保持批评的态度，指责他在 1939 年芬兰受到苏联进攻时，曾为芬兰招募志愿军（参阅 v. 别列日科夫：“伯纳多特伯爵遇刺记”（V. Berezikov：“The Assassination of Count Bernadotte”），《新时代》，1948 年 9 月 29 日，第 30 页，转载于《工人日报》，10 月 19 日）。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 3 年，第 116 号（1948 年 10 月 14 日），第 15 页。

伯纳多特：《前往耶路撒冷》，第 158 页。

同上书，第 222 页；参阅麦克唐纳：《我在以色列的使命》，第 47 页。

订一项停战协定，以便划定永久性分界线、实现撤军和裁减武装部队。可是，以色列为确保自己新征服的土地，提出了各种精心编造的理由。10月22日，在巴勒斯坦的东北边境也发生了战斗，该地的停火线、使北加利利的一部分地区得以由福齐·卡武克吉指挥的“民族解放军”占领。这支军队的根据地在黎巴嫩，而黎巴嫩本国军队，倒在战争中已不起任何重要作用了。看来，以色列和卡武克吉的军队都越过了停火线，但前者拒绝联合国观察员的调查，理由是观察员“所进行的干涉……已经越权”。当卡武克吉的军队拒绝从以色列停火线境内撤出其重行占领的丘陵阵地时，以色列不顾联合国参谋长的警告，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到10月31日已把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卡武克吉的部队全部肃清了，并占领了黎巴嫩境内东南角二至六英里地区内的十五个村庄。

#### (六) 联合国中的僵局，1948年10月至12月

同时，联合国大会的第一委员会开始讨论已故的前调解人进度报告中有关领土和其他方面的建议。英国无保留地支持这些建议，美国则把这些看作是和平调整分歧的基础，其接受的态度不冷不热。伯纳多特伯爵在9月份被暗杀之前不久在拟定这些建议时，已放弃了把耶路撒冷地区划入阿拉伯领土的那项6月27日的主张，而代之以建议把耶路撒冷应置于联合国实际控制之下，同时给予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以最大限度地方自治权。可是这位已故的调解人仍维持原建议中这一部分，即：以色列在西部加利利地区的实际占领可以合法化，但作为交换条件，它必须放弃它在南巴勒斯坦地区的大部分土地，当时尚未被以色列所占领。可是，以色列的发言人谢尔托克和埃班寸步不让，坚持一方面根据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占有直到亚喀巴湾为止的全部南巴勒斯坦地区，另一方面也要占据现在“由于的事胜利而落入以色列手中的”整个加利利地区、他们商人一口咬定说，耶路撒冷的犹太新城必须是以色列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又赞成由联合国管理阿拉伯人所控制的耶路撒冷旧城，理由是大部分圣所部在那里，并且，联系到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曾设想给予阿拉伯的巴勒斯坦以一个独立地位的那项决议，他们便反对已故的调解人把巴勒斯坦余留部分与外约旦合并这么一比较切合实际的建议了。美国代表团主张，以色列在其根据联合国大会分治计划所获得的领土以外，如再有其他领土要求（例如其现在所占据的西加利利），它就必须同阿拉伯人协商，以便进行适当的领土交换。苏联集团的所有代表则谴责英国和美国。说它们为满足其在南巴勒斯坦的战略和石油利益，对已

---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3年，1948年10月增编，第5页[代理调解人腊尔夫·J·本奇（Ralph J. Bunche）的报告，文件S/1018，1948年9月27日]。

麦克唐纳，前引书，第62—65页。

《纽约时报》驻耶路撒冷记者报道，1948年9月19日。

没有带武装的警卫这一点引起了各种解释。据美国派赴以色列的特使了解，调解人“不愿意”接受武装的警卫以“扩大以色列的权威”（麦克唐纳，同上，第85页，1948年9月25日的日记）。以色列政府在1949年5月3日的一项声明中说，调解人“认为由于他的地位关系，武装的警卫是不必要的，并且也……不适宜。……因此没有对他提供武装保护”（安理会文件，S/1315，第1页第3节）。然而，腊尔夫·本奇则报道说，虽然调解人从不要求武装的警卫，但如果地方当局认为要提供时，“他总是毫无疑问接受……”

故的调解人的建议施加了影响。苏联集团仍然坚持主张，阿拉伯巴勒斯坦部分应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对英国支持已故的调解人所提出的、把阿拉伯的巴 290 勒斯坦和外约旦合并的建议（在对其他阿拉伯各国有利的地方都作了修改），表示强烈的反对。无论如何，在埃及领导下的其他阿拉伯国家，不仅拒绝承认以色列的事实上的存在，并且，由于已承认了穆夫提的徒有其名的“全巴勒斯坦政府”，而坚决反对把阿拉伯巴勒斯坦给与英国的朋友阿卜杜拉国王这一建议，说阿卜杜拉已在 7 月间“背弃”，了阿拉伯人的共同事业—当以色列 10 月间在埃及和黎巴嫩战场上大为得手的时候，阿卜杜拉却严格地叫他的阿拉伯军团采取守势。《纽约先驱论坛报》驻以色列的记者曾到安屋去了又回来，以个人身分居间为本—古里安和河卜杜拉进行调解； 11 月 30 日，以色列军队和阿拉伯军团在耶路撒冷地区的停火谈判达成协议，第二天，两千名巴勒斯坦阿拉伯代表在杰里科开会，拥戴阿个杜拉为：“全巴勒斯坦的国王”。这件事所造成的反响是：其他阿拉伯国家和一些亚洲与拉丁美洲国家，伙同苏联集团，于 12 月 3 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否决了已故的调解人的建议中有关阿拉伯巴勒斯坦与外约旦合并的那一节，而该节正是英国所提决议案的内容。这次旷日持久的辩论的主要结果是：以色列得以把它新近夺取的土地变成了事实上的占领：此外，还成立了一个三人调解委员会去接替已故的前调解人的职务，以便彻底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大多数国家同意该调解委员会应当由美国、法国和土耳其的代表组成，而不把苏联集团的代表包括在内。

同时，12 月 2 日安全理事会开始考虑以色列政府申请加入联合国的问题。美国代表菲利普·杰塞普博士要求安全理事会作为紧急事项处理以色列的申请，使其得以在本届大会结束前取得联合国大会的席位。注意到宪章第四条规定：联合国接纳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为会员国，美国代表宣称，安全理事会不应忘记以色列政府“在履行安全理事会和调解人所提出的建议时所给予的合作”的程度，预料卡多根会提出反对，说是以色列的边界问题还根本没有解决—不要说细微末节，就是大片重要的地区（最引人注意的是加利利地区和南巴勒斯坦 291 地区）都尚未定界—杰塞普解释道，当美利坚联邦共和国刚诞生时，它的国土“甚至还不曾经过开拓，谁也不知道美国的要求

---

正象他前几次访问以色列控制下的地区时那样”（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 3 年，1948 年 10 月增编，第 6—7 页，文件 S/1018，

一个以色列军事法庭表示，它相信真正的凶手和“祖国阵线”组织（如果该组织确实存在的话），都是斯特恩集团队伍里的人，可是无法证明他们是奉该集团的命令行事的（安全理事会文件 S/1315，1949 年 5 月 3 日，附件，第 3—5 页。在这个文件中的 LHY 三个字母是斯特恩集团的希伯来文正式名称“以色列自由战士”（LohmeiHerut Yisrael）的缩写]。

见《泰晤士报》驻特拉维夫记者报道，1948 年 10 月 19 日；1949 年 5 月 5 日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的发言：《大会第三届会议正式记录》，第 2 部分，特别政治委员会，简要记录，第 244 页。以色列警察后来逮捕了两个以前在耶路撒冷英国人圈子里活动的南非犹太人，说他们是斯特恩集团和英国情报机关两方面的代理人（见比尔拜：《近东的新星》，第 134 页）。苏联的宣传机器马上抓住这个暗示，说英国人组织了这一罪行[见 V·别列日科夫：“伯纳多特伯爵遇刺记”，《新时代》，1948 年 9 月 29 日，第 31 页；G·奥西波夫：“查尔斯·克莱顿在巴勒斯坦的所作所为”（G.Osipov：“The Palestine Doings of Charles Clayton”）同上，1948 年 12 月 22 日，第 11 页）。

见麦克唐纳：《我在以色列的使命》，第 70—74 页。

到哪里为止，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的要求从哪里开始”。苏联支持以色列的申请，但卡多根则主张无限期地推迟考虑这个问题，理由是调解委员会需要时间进行工作，而联合国大会也要等1949年4月1日会议开始后就能就安全理事会的建议作出相应的决定。法国代表不能同意杰塞普把巴勒斯坦同刚诞生的美国相提并论，以色列的边界不取决于原始森林的开拓或对野蛮部落的斗争，而是取决于与现存各国所达成的协议，他建议延期一个月，可是，无论他的建议，或英国的建议，或以色列实质性的申请，都没有在12月17日获得必要的七票。这个问题便暂时自动延期了。

#### （六）以色列“害了埃及人”和迫使贝文摊牌， 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

12月22日，埃及战线方面的以色列军队，在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土可以自由行动的口实下，向自10月以来一直被困在法卢贾的埃及旅发动了进攻，与此同时，以色列空军还轰炸了加沙及其南面的一些村庄。以色列发言人和某些作者后来所提出来的重新发动攻势的理由是：埃及一直在调动大批援军力图解法卢贾之围，并不断袭击靠近边界的以色列定居地，而埃及飞机又轰炸了海法、特拉维夫和拿撒勒的近郊。代理调解人则建议，在以埃两国开始停战谈判的同时，应将后者在法卢贾的军队逐步撤回埃及，但对这一建议（据以色列方面的说法）埃及方面却故意推托，正如夏天伯纳多特在同一地区设法要解决以色列定居地粮食供应问题时所碰到的情形一样。以色列方面接着宣称，发动这次攻势是由于有官方消息（由292联合国停战监督小组的负责人——美国的赖利将军传出来的）说：埃及对举行谈判的建议已加以拒绝。以色列人还说，根据22日至27日期间俘获的埃及军官的供词，埃及定于27日进攻，他们为了先发制人，才采取了行动。另一方面，赖利将军给代理调解人的报告中却揭示，以色列有计划地回避10月战争以后重新制订的停火条件——最明显的就是他们不让联合国观察员在该地区设立观察所。以色列发言人企图把安理会以后要作出的有关停战谈判的决议，讲成是当前遵守停火条件的先决问题，而安理会中的比利时和法国代表则认为这种讲法虽然是巧妙的，但是不能接受。于是，英国12月29日的决议草案——要求立即

---

在雅法的斯特恩集团囚犯们把他们的监狱变成了一幕吉尔伯特（英国音乐喜剧家——译者）式的滑稽场面，他们解除了狱中警卫兵的武装，接管了监狱，为招待朋友大请其客，请客时由警察巡官来充当酒吧的侍者。大多数人觉得这是一次胆大包天的开玩笑，是没有任何犹太人能够不表示钦佩的壮举。甚至态度最严肃的法律家也说：“你可是不得不赞扬这些年青人呀。”（迈克尔·戴维森在访问以色列后在1948年10月24日《观察报》上的报道；参阅扎赫尔：《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132页；以及《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321页注）

《纽约时报》，1950年3月10日，6月20日，7月6日。

埃斯蒙德·赖特：“阿卜杜拉的约旦：1947—1951年”，《中东杂志》，1951年秋季，第5卷，第445—446页；《纽约时报》，1948年10月2日。

英国外交部估计，从第一次停战到1948年底期间，以色列空军飞机除去战斗中的损失外，由四十架增加到一百十四架（《泰晤士报》外交记者报道，1949年1月6日）。

见联合国大会：《正式记录》，第3届会议，增编第11号，A/648，第18页。

见本书末图三，和麦克唐纳：《我在以色列的使命》，第48页，第49页，第80页。

停火、撤退到 10 月战争以前所占有的阵地上和派遣联合国观察员执行有效的监督——终于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而美国、苏联和乌克兰则在投票中弃权。

可是，这项决议同以前几个决议一样，也没有起什么作用。当埃及旅仍然在法卢贾坚守时，埃及军队的右翼——驻扎在从比尔谢巴西南方向经过哈菲尔乌贾到苏伊士运河的那条汽车公路上——受到以军的突然袭击，其主力被包围压缩在加沙地区，而以色列军队便大举深入西奈半岛的埃及地区。那时由于开罗的新闻检查无法把不光彩的节节败退的消息完全加以封锁，这就使一些极端主战派组织——其中，引人注目的是组织上强大的伊赫万穆斯林党（穆斯林兄弟会）——反对马哈茂德·法赫米·努克拉希政府的敌对情绪大为抬头。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街头上的恐怖行动是在犹太人和欧洲人身上泄愤的；但是，10 月和 11 月间埃及政府试图制止看来是极端分子想夺取政权的活动，已经为时太晚了，12 月 28 日，首相自己也被一个伊赫万穆斯林党徒暗杀了。

在埃及的前线，军事上是一团糟；而其首都又由于政治上 293 一片混乱，危机四伏。在这种形势下，英国政府于 12 月 31 日威胁要援引 1936 年的英埃条约（无视埃及于 1947 年曾请求安全理事会废除该约这件事），如以色列军队不迅速从埃及领土上撤出，英国即进行武装干涉，美国政府在向以色列政府转递英国政府的该项警告时，对报道中有关以色列此时调动军队威胁约旦一事表示遗憾，提出其自己的警告说，除非以军撤退，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可能不得不重行考虑。无论如何，现在易卜拉欣·阿卜德·哈迪领导下的埃及政府既不愿英国政府援引 1936 年的英埃条约，又觉得埃及的阿拉伯盟国已把埃及抛弃了，因而通知代理调解人本部说，如以色列同意停火，则埃

---

见上文，原著第 271—272 页和第 282 页。

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 3 年，1948 年 10 月增编，文件 S/1042 号，附件 1，第 58—60 页，第 62—63 页；参阅以色列代表奥布里·S·埃班和代理调解人腊尔夫·本奇的发言，10 月 19 日，同上书，第 118 号，第 7—17 页；比尔拜：《近东的新星》，第 49—50 页。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 3 年，第 118 号，第 4 页，和 1948 年 10 月增编，第 55—56 页。以色列陆军声称，10 月 6 日和 9 日埃及军队曾袭击以色列阵地（皮尔曼：《以色列的军队》，第 173 页，第 176 页；麦克唐纳：《我在以色列的使命》，第 59 页）；可是，扎赫尔坦率地写道，他觉得议论这个问题，“未免有点学究味道……埃及人由于莽撞从事、自食其果而大受谴责”（《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 295 页）。

见皮尔曼：前引书，第 188 页，第 215 页。扎赫尔：前引书，第 299 页。

以色列军队在夺取拜特吉卜林上后朝希布伦的方面向东推进，但被阿拉伯军团驱逐出丘陵地带（埃及军队已从其希布伦—伯利恒突出阵地撤出）。根据扎赫尔所述（前引书，第 263 页），本—古里安当时曾企图对耶路撒冷以北腊马拉地区的阿拉伯军团发动攻势，以图推进到约旦河，但为其内阁同僚所否决。

埃及宣传人员把此项功绩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功绩相提并论。见极端分子青年埃及党主席艾哈迈德·侯赛因：《保卫法卢贾》（Ahmad Husain：The Defence of El Faluja），伦敦，1949 年作者自己出版的第 6 号小册子。

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 3 年，第 122 号，第 17—21 页，和第 124 号，第 13—18 页，1948 年 10 月 28 日和 11 月 4 日。自从 1939 年白皮书公布以来，在这地区里的所有定居地，事实上都建立起来了，其主要目的是确定这些地方的所有权，这些定居地的人口总数大约只有二千人（见扎赫尔：《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 251 页）。

及愿意举行停战谈判。以色列声称，到 1949 年 1 月 2 日为止，以色列军队已从埃及领土上撤出，但是以

色列方面的报道本身却说明一直到 1 月 7 日为止，还继续有以色列军队在边界线上的腊法村以南的地方。由苏伊士运河地区英国皇家空军基地起飞的飞机，据称在空中侦察时发现：以色列军队于 1 月 6 日又有新的大举入侵埃及领土的行动。次日（1 月 7 日）早晨，四架喷火式战斗机奉命执行另一次侦察任务，指示它们穿过战区上空，但不得逗留，并不得越过埃及—巴勒斯坦的边界。但是由于在过去几天中埃及空军出现在战区上空的次数比较频繁，以色列空军便进行了截击，结果全部英国侦察机都被击落了。就是在这天，埃及政府已经同意于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下午二时起实行停火，但是证实这件事的消息迟迟才到达运河区英国人那里。因此以色列军与埃军之间的局部战斗在腊法又持续了三小时之久，而在这段 294 时间之内，另一架执行侦察任务（寻找当天早晨失踪的四架英国飞机）的英国飞机又被以色列空军击落，坠毁于巴勒斯坦边界的一边。这些事件使英国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英国驻华盛顿大使请求美国政府出面支持，但为杜鲁门总统所拒绝；而以色列政府则谴责英国在停战谈判的前夕组织了一场针对他们的军事和政治活动的大表演，包括在“东地中海的大规模海军演习”以及“模拟在以色列海岸登陆”的演习。以色列政府再一次诬控说，英国秘密地把军火供给与它结盟的一些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同阿拉伯各国开始停战谈判，以及这些事件对英国议会和公众舆论所造成的冲击——这两件事加在一起使贝文对以色列一直寸步不让的态度有所改变。1 月 18 日他宣称，英国政府准备释放一直扣押在塞浦路斯的那些合于兵役年龄的犹太移民。1 月 29 日，英国政府宣布对于以色列给予事实上的承认；美国政府也于二天之后宣布，对于以色列和约旦给予法律上的承认。

---

哈尔·莱尔曼实际已承认，武器禁运的付诸实施，“严格上也变成了一面倒……只针对阿拉伯人。大家都知道武器是如何从捷克大量流入以色列的。联合国观察员看到海法地区装卸工为以色列卸下军火时，只得尴尬地站在一旁，无可奈何。”（《以色列的创始及其明天》，第 290 页）

11 月 19 日，以色列政府通知安全理事会，其军队已经全部从自 10 月 14 日以来新攻占的地区撤出（安全理事会文件 S/1051，1948 年 11 月 19 日）；但是为了设法使该通知与他们实际上所保留的新占土地不矛盾，又称以色列的流动部队过去一直在埃及战线的后方地带活动，因此，这些地带并不是他们新占领的土地。

1948 年 11 月 6 日，代理调解人的报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 3 年，1948 年 11 月增编，文件 S/1071；参阅扎赫尔；前引书，第 300—302 页。《犹太复国主义评论》曾报道过，在以色列有一个“自由黎巴嫩运动”（1948 年 10 月 15 日，第 5 页）；以色列代表后来通知安全理事会，有一些南部黎巴嫩（什叶）村庄曾请求置于以色列军事当局管辖之下（1948 年 11 月 16 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 3 年，第 126 号，第 26 页；参阅罗伊·艾伦：“以色列的最友好邻国，黎巴嫩”（Roy Alan：“Lebanon, Israel's Friendliest Neighbour”），《评论》，1952 年 6 月，第 13 卷，第 556—557 页）。以色列从北巴勒斯坦的德鲁兹和彻尔克人少数民族中为其军队招募分遣队：在英国委任统治结束之前，恐怖分子的斯特恩集团已获得阿布·加瓦什（古什）族的支持。该族来源于波斯尼亚克人。自十九世纪初叶一直到英国在巴勒斯坦建立了统治的期间，古什族在它的村庄据点里向来往于雅法和耶路撒冷之间的旅客勒索安全通行费（见《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848 年 8 月 27 日，第 9 页；《以色列经济学家》（Israel Economist），1952 年 7 月，第 8 卷，第 144 页）。

联合国大会：《正式记录》第 3 届会议，增编第 11 号。A/648，第 18 页。

## 第二节 战争的后果，1949—1950年

### (一) 以色列—阿拉伯停战， 1949年1月至7月

据信美国政府代表曾作了很大的努力，促使以色列和埃及于1月13日开始举行停战谈判。在代理调解人主持下，这次在罗得岛举行的停战谈判，一开始就面临

着许多困难。这因为埃及不久前虽吃过败仗，但仍然要求收回以色列10月进攻前它所占领的阵地。同时，以色列也针锋相对地要求埃及军队从加沙到埃及边界之风的：

沿海地带撤出，并且拒不同意让被困在法卢贾的埃及军队撤走。虽然后来对以上两点作了让步，但以色列仍坚持要保持沿边界的乌贾地区。该地区位于埃及和比尔谢巴之间的内陆公路的交叉点上，具有战略价值，埃及右翼纵队于1948年5月就是从这条公路进入巴勒斯坦的。埃及人仍不承认以色列占领比尔谢巴的合法性。不过，双方还是在2月24日签订了一项妥协性的停战协定。由此项协定和以后其他协定所制定的分界线“于其划定时„……在涉及最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不得损害任何一方的权利、要求和地位”，并“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得解释为一种政治上或领土上的边界”。仍归埃及军队占领的加沙地带，规定为二十五英里长，延伸至瓦迪哈锡的河口为止，其宽度则从海岸算起为三英里半至五英里半，巴勒斯坦战争爆发前，该地带人口原有七万左右，由于有二十万左右难民迁入，因此人口激增。停战分界线把许多村庄与其耕地分割了开来，使那些耕地归以色列人去耕种了。位于巴勒斯坦边界境内的战略要冲乌贾地区被划为非军事区，埃及人在距离该地区十四至十七英里的边境之内不得设防。

黎巴嫩参加对以色列的战争一直是半心半意。1月16日，即以以色列—埃及停战谈判的第四日，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代表在黎巴嫩—巴勒斯坦边界线上的纳库拉角会晤，开始试探性谈判，同时，以色列军队从去年10月所占领的四个黎巴嫩村庄撤出。这次谈判也拖延了很久，因为在叙利亚没有表

---

石油开发（巴勒斯坦）有限公司为英美法—伊拉克石油公司的一个子公司，在这个地区事实上已经进行过一些探钻和勘探工作。见《石油时报中东石油评论》（Petroleum Times: Review of Middle East Oil），伦敦，1948年6月，第64—65页。

但参阅上文，原著第236页。

见比尔拜：《近东的新星》，第53—58页。

关于投票情况，见联合国：《大会第三届会议正式记录》，1948年，第1部分，第一委员会，第887—890页。不顾来自其他阿拉伯各国首都的责难，12月13日外约旦议会一致通过把阿拉伯巴勒斯坦的其余领土加以合并的决议，12月20日，阿卜杜拉宣布任命他的亲信之一为耶路撒冷的穆夫提，以取代他的死对头哈吉·穆罕默德·阿明·侯赛尼（见埃斯蒙德·赖特：“阿卜杜拉的约旦”，《中东杂志》，1951年秋季，第5卷，第446—447页）。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3年，第128号，第11—12页。

法国和加拿大代表均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以以色列能否算为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这一点，只能根据其履行联合国的建议来加以决定，而该建议则要在联合国大会辩论已故的调解人的进度报告后才能提出来，美国原想以色列能在本届大会加入联合国，结果大失所望。



示准备从巴勒斯坦那一边前线邻近土地上所占据的阵地撤出之前，以色列不肯从靠近叙利亚—黎巴嫩前线属于黎巴嫩领土的战略要地上撤出。但是，3月21日代理调解人终于能提出报告说，叙利亚已同意谈判，接着，以色列与黎巴嫩便在3月23日签订了停战协定。协定以巴勒斯坦—黎巴嫩的边界为分界线，分界线的两边都划有非军事区，任何一方区内驻军均不得超过一千五百名。<sup>296</sup> 虽然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曾建议把巴勒斯坦南部延伸到亚喀巴湾的长形地带划给以色列，但当1948年6月阿拉伯军团占领死海南端大约二十英里以内两个从前巴勒斯坦的警察哨所时，该地带还没有犹太移民或军队进入。人们还记得，英国政府和已故的调解人在夏天的时候曾建议过，约旦可以保国该地带而让以色列获得西加利利作为交换。可是，以色列人却决心要在亚喀巴湾获得一个出海口，从而可以不通过苏伊士运河而达到红海和印度洋。其次，以色列人还打算开发巴勒斯坦南端早在所罗门国王的时期就已经开采的矿产资源。

在10月进攻中，以色列军把沿海平原的埃卑击退；11月间，又沿阿拉伯河谷一直推进到死海以南四十五英里的地方。12月1日《即与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军团签订停火协议的次日），又与这个遥远的南端地区的阿拉伯军团发生了一次小的接触。12月内埃及军队的失败使以色列军得以自由向南推进。但据报道，1949年1月2日，阿卜杜拉国王援引了英国—外约旦条约，结果是英国派遣了一小队兵力驻亚喀巴。在2月最后的一个星期以前，军事形势一直没有变化，而当时约旦和以色列的停战谈判即将在罗得岛举行。可是，2月24日，以色列的一支巡逻队（违反以一埃停战协定向南推进，穿越埃及的西奈）出现在亚喀巴西北十英里的险峻的关口之前，四天之后才扬长而去。当3月2日停战谈判开始时，以色列方面否认曾到过该地区；但当约旦政府声称事实上占领了亚喀巴以北六十英里的阿拉伯谷地时，以色列谴责约旦政府企图利用“既成事实”来破坏谈判。作为反击：以色列还<sup>297</sup> 控诉说，在伊拉克和约旦军队控制的中部巴勒斯坦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把以色列沿海平原的最狭隘处压缩到只有八英里宽了。3月7日，停战谈判陷于停顿。当天早晨，有两个以色列纵队沿阿拉伯河谷向南推进，直指亚喀巴湾。过去伊拉克政府拒绝同以色列进行双边停战谈判，但同意接受约旦所答应的停战协议的约束；这时决定在以色列向其攻击之前将其军队从巴勒斯坦中部撤出。这样一来，稀疏地驻守在从亚喀巴湾至耶路撒冷以北、长达一百三十余英里战线上的阿拉伯军团也就必须掩护其暴露的北翼，并且不能在南端发生一场冲突的危险。早在3月10日，由于驻守在亚喀巴的阿拉伯军团的小部兵力已经撤走，以色列军队进入了该地以西五英里的海湾地带——前巴勒斯坦的警察哨所在地乌姆拉什拉什，后来以色列人又把它改名为埃拉特。在代理调解人的安排下，双方于3月11日签订了一项停火协议，但两天之后

---

见莫里斯·费希尔（Maurice Fisher）1948年12月28日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的发言，《正式记录》，第3年，第136号，第14—22页；皮尔曼：《以色列的军队》，第221页，第224页，第226页；扎赫尔：《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304—305页。

根据费希尔前引文所述，坚持要把“立即和全部撤出在法卢贾的驻军”作为先决条件；但根据扎赫尔所说，埃及要求以色列军队撤退到10月战争以前的阵地。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3年，1948年12月增编，文件S/1152，第300—304页。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3年，第137号，第23—25页。

英国把亚喀巴的兵力加强至一个旅的规模时，以色列又提出了抗议，认为这种行动有碍它与约旦的和解；而约旦政府则要求英国的巡逻范围向北扩大到死海，以便制止以色列军侵入巴勒斯坦—外约旦的旧边界。代理调解人在美国批评英国对亚喀巴的增援违反停战规定时，英国外交次官则说，英国政府坚信；正是由于有了这支部队，才稳定了局势，使以色列和约旦停战谈判不致中断。英国还向以色列保证说，这支军队的目的只是为了防御，不会影响到以色列对前巴勒斯坦南部领土的占领。但在北面，以色列却对约旦进行威胁，不承认阿拉伯军团接收以前属于伊拉克的那部分地区。在舒奈的冬宫与阿卜杜拉国王所进行的一次秘密会谈中，鲁文·希卢阿（以前叫扎斯拉尼，现负责以色列外交部的“特种工作”）和摩西·达扬上校两人，以恢复敌对行动为要挟，迫使阿卜杜拉国王接受其要求，使阿拉伯军团从其五十五英里长的战线上，平均后撤二英里。这样，就解除了对以色列手中的特拉维夫和哈德腊以东沿海平原地带所受的压力，从而使以色列得以毫无阻碍地控制那条越过卡尔迈勒山脉至埃斯德拉埃隆溪谷和加利利两地的主要战略公路。这次后撤还使大片阿拉伯村民的耕地落到以色列方面，使这些村民变得无依无靠（正如在加沙地带一样）。后来，阿卜杜拉的阿拉伯敌人就把这件事用来作为反对他的一种新的宣传武器。但根据4月3日所签订的停战协定，约旦在希布伦地区所拿到的领土却非常有限。分界线使耶路撒冷被两国军队的铁丝网从西南向东北分割开来。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希伯来大学和哈达萨赫医院同以色列

（按原图译制）列的新城被割裂开来的问题、阿拉伯旧城同耶路撒冷发电厂被割裂开来的问题，以及通向圣所的一般权利问题等等，则提交给一个特别委员会处理。

由于叙利亚国内局势不稳定，以色列和叙利亚的谈判延期了。1943年选出的民族集团政府在1945年曾借助于英国的干涉摆脱了法国对叙利亚的军事控制，并于1947年在一次多少是自由的选举中，再度得到选民的信任，继续执政，但在1948年对以色列作战中却显得软弱无能。军事上的耻辱和日

---

见S·兰兹胡特：“中东穆斯林国家的犹太人”（S.Landshut: Jewish Communities in the Muslim Countries of the Middle East），伦敦，《犹太纪事》周刊（Jewish Chronicle），1950年，第33—38页）；关于其他阿拉伯国家对犹太人的报复，同上，第47—50页，第59—60页。

警察局长在群众示威时被一个开罗大学学生打死以后，12月8日埃及政府命令解散伊赫万穆斯林党，为此，伊赫万穆斯林党杀害了埃及首相作为报复。1949年2月13日，该党领袖哈桑·班纳亦被枪杀，凶手不明。哈桑班纳原是个不出名的中学校长，大家认为是他的战争狂；促使他产生了不采取常规的政党活动途径来夺取政权的野心（见J·海沃思—邓恩：《现代埃及的宗教和政治趋势》（J.Heyworth—Dunne: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Trends in Modern Egypt），华盛顿，由作者出版，1950年版，第48页，第74—76页）。

见上文，原著第130—136页。

参阅下文，原著第310页。

麦克唐纳：《我在以色列的使命》，第107—108页；参阅《福雷斯特日记》，第542页；比尔拜：《近东的新星》，第59页；扎赫尔：《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307页。

见政府官方报刊《基本报》的不满言论，由1949年1月5日《泰晤士报》报道，1月6日《纽约时报》上有一个阿拉伯人反对阿卜杜拉和反英的宣传的好例子，是来自贝鲁特的报道。

皮尔曼：《以色列的军队》，第241页；扎赫尔：前引书，第306页。

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同常常听到的政府官员中投机倒把、贪污舞弊的传说结合在一起，激起了学生的游行示威和总罢工，迫使贾米勒·马丹政府于1948年12月1日辞职。有两个多星期叙利亚没有政府，后来才由一个无党派政治家前总理哈利德·阿兹姆出来拼凑了一个大部分成员是无党派人物的新政府。它同法国顺利地解决了作为委任统治时期悬案的货币问题（前任政府在该问题上同法国的谈判于1948年1月中断）；还批准了与美国一外约旦油管公司所签订的一项协定，为从沙特阿拉伯油田到地中海一个叫赛达（西顿）的新港铺设油管；并且也终于同意了与以色列开始停战谈判。为了阻止财政情况的不断恶化，新政府又建议削减军饷，这样一来就在以后引起了新的问题。胡斯尼·扎伊姆上校是一个库尔德族出身的军官，受过奥斯曼帝国军队的训练。1919—1920年期间先在费萨尔国王军队中服务过，后来又为法国效过劳。1948年5月，叙利亚参加了阿拉伯各国对巴勒斯坦干涉的战争，但在十天之内就暴露出叙利亚的这支军队完全不中用，接着在改组其领导骨干时，扎伊姆被提升到叙军参谋长的职位上。贾米勒·马丹政府在12月里垮台后，扎伊姆亲自到全国各地进行了视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群众对军队的信任，同时或许使他本人也产生了一种信念：国家的安全和繁荣，今后是他的职责所在了。后来有报道说，1949年2月他已为通过军事政变来推翻哈利德·阿兹姆政府作出了初步的准备——或许还是串通了政府中的某些成员一同干的；因此，民族集团的领袖舒克里·库阿特利总统打算解除扎伊姆代理参谋长的职务。然而，还是扎伊姆先下了手。3月30日凌晨，军队占领了电话局和大马士革的其他主要建筑物，未经流血就逮捕了总统、总理和部长等其他人员。4月1日，议会举行特别会议，对扎伊姆及其所提出的无所不包的“民主”改革纲领投了信任票，虽然仅仅是微弱的多数；政客们对支持军事政变一般都很勉强。次日，扎伊姆宣布解散议会，并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起草一份“保证实现人民的愿望和恢复人民被侵犯的权利与自由”的新宪法。4月12日，叙利亚和以色列正式开始停战谈判，但由于叙利亚人坚持要保持固在巴勒斯坦边界境内仍由阿拉伯人军事占领的三个小地区，谈判又

---

根据皮尔曼的说法（前引书，第241页，第243页），以色列空军在击落该英国飞机前，没有认清它是英国飞机。但当时被以色列俘虏的一个英国空军驾驶员后来报告说，以色列人对这件事非常得意，也许是由于这件事提高了“哈加纳”在伊—兹—卢面前的威信的缘故。另一方面，英国非官方的可靠方面则说，以色列的政府对这件事非常关切。

参阅上文，原著第288页，并见麦克唐纳：《我在以色列的使命》，第115—116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文件S/1201，1949年1月11日。扎赫尔也说他知道英国曾命令一支突击队准备在加沙登陆（《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141页），关于英国在停火期间向埃及供给坦克的说法，参阅同上书，第304—305页。

下院辩论，第5辑，第460卷，第36—37栏。

见本书未图四。

在联合国大会所任命的调解委员会接替代理调解人的职务之前，他继续行使职权（见上文，原著第290页）。

参阅上文，原著第287—288页。

见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调解委员会：《联合国中东经济考察团的总结报告（1949年）》（United Nations Conciliation Commission for Palestine Final Repo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Survey Mission for the Middle East (1949)），第1部分，第19页。

进入长期僵持状态。1920年12月23日的英法协定所规定的疆界，把加利利海以北二十五英里的全部上约旦河流域都划入了巴勒斯坦，而现在叙利亚所要求的这个流域的土地中最大的一块，是座落在胡拉湖下方约旦河两岸那部分人口稀少、疟疾盛行的地区。为了解决这个僵局，代理调解人建议：把这些地区以及以色列控制的邻近地区全划为非军事区，也象在其他停战协定中所规定的一样，由一个混合停战委员会予以监督，其主席由联合国任命。1949年7月20日所签订的停战协定把上述建议包括在其第五条之内，并为“逐步恢复”非军事区31的民间正常生活和“不得妨害永久定居”两事都作了特别的规定。可是，这里仍然埋伏下了叙利亚和以色列日后解释本条文时产生争端的种子。叙利亚希望该地区恢复英国委任统治结束时的状况，还进一步争辩说，叙利亚共和国不受1920年英法协定所规定的巴勒斯坦—叙利亚边界的约束，而以色列则能证明，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已把整个地区划给以色列了，”自此决心按照他们的长期规划办事——把疟疾盛行的胡拉盆地的积水排干，并利用冲积土以发展农业，使成千上万的移民得以在这个战略地区定居下来。以色列坚持要在这一非军事地区实行上述各项规划，导致1951年春与叙利亚的一场严重的局部冲突。

## （二）以色列加入联合国，1949年5月

与此同时，法国代表在1949年3月3日的安全理事会上，追溯了去年12月法国政府曾建议推迟讨论以色列申请加入联合国一事，声称：现在，以色列同埃及签订停战协定以及同黎巴嫩和外约旦所举行的谈判又取得进展，这两件事已足以证明它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因此，法国代表团将投票赞成其加入联合国。美国和苏联的态度一如既往，表示赞成；可是，埃及也同样保持它原来的态度，继续表示反对，并设法在议事程序方面挑起争论。英国代表特伦斯·肖恩爵士说，英国政府虽对巴勒斯坦局势的好转感到满意，一般说来对以色列申请加入联合国的愿望也表示同情，可是，对本—古里安和其他以色列负责人的某些声明却颇为不安（他们声明，1948年12月11日上届联合国大会重申的、作为联合国政策的耶路撒冷国际化，只适用于阿拉

---

停战协定文本，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4年，特别增编第3号和特别增编第1号所附地图。

根据肯尼思·比尔拜（《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1949年4月25日），据说黎巴嫩正规军中被打死的不超过十名，受伤者在二十名以下。参阅以色列作战处长在《犹太复国主义评论》上的文章，1948年7月30日，第5页。半心半意的态度，至少一部分是由于黎巴嫩人宗教上的分歧。这种在半数非穆斯林的人口，有些人觉得呆在阿拉伯国家联盟中有点不自在，同时，亦有大部分东正教徒和小部分天主教徒却的确完全信任阿拉伯国家联盟，甚至在并非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黎巴嫩人中也有许多人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黎巴嫩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一项直接威胁——例如，天主教的和黎巴嫩民族主义者报刊《今日报》（LeJour）是既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又同样反对阿拉伯的

原文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4年，特别增编第4号。

见上文，原著第278页和注（即本书第477页和注——译者）。

1949年1月26日，贝文告诉下院说，这事是阿卜杜拉主动提出的，但同时又提到：“过去，犹太巡逻队曾经侵犯过外约旦的边界。当时读到这些报告时，我就担心，以色列人会不会由于因为旗开得胜，趾高气扬，而把事情搞成不可收拾。”（下院辩论，第5辑，第460卷，第939栏）关于以色列政府不得不制

伯人所占据的旧城，而犹太人的新城则必须划归以色列)。肖恩又说，以色列是否准备遵守联合国大会同一天所通过的另一项决议——即对现在估计已超过五十万人的阿拉伯难民，以色列应容许他们仍因到如今仍为其所占据的土地上的家园，或给予他们以补偿——这也不十分清楚。安全理事会向 302 联大推荐以色列加入联合国这一建议，以九票通过，埃及反对，联合王国弃权。5 月 3 日，当该提案交联大特别政治委员会讨论时，许多罗马天主教国家提出了以色列对待耶路撒冷国际化及阿拉伯难民两事的态度问题。罗马教廷不久前的一道通谕强调耶路撒冷的国际化问题，因而引起了世界各地犹太复国主义者普遍的非难。丹麦代表对以色列迄今仍未采取有效措施把杀害帕纳多特伯爵的凶手缉拿归案一事，表示不满；他的意见还得到英国代表的支持。以色列发言人阿巴·埃文（过去的名字是奥布里“埃班”）这时争辩说，以色列人保卫耶路撒冷是有利于圣城内基督教徒的利益的，否则耶路撒冷早已不可挽回地并入穆斯林国家之内了。同时，他又声明：以色列政府最近把五个部由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在政治上或法律上制造新形势，只不过是了

促进耶路撒冷犹太区的经济恢复工作，而以色列政府对阿拉伯难民的重新定居问题的贡献如何，将完全决定于它与阿拉伯国家之间能否建立和平友好关系。黎巴嫩提出一项决议草案，主张把接纳以色列参加联合国一事的表决推迟到秋季举行，但以二十五票对十九票被否决。

然后，特别委员会又以三十三票对十一票、十三票弃权，推荐以色列加入联合国；决议于 5 月 11 日生效。

### （三）联合国调解委员会，1949 年

---

止它的顺利进军的青年司令官们无节制地侵入阿拉伯领土一事的报道，见麦克唐纳：《我在以色列的使命》，第 105 页；金奇：《七根倒了的柱子》，第 266—267 页。R-H-S 罗斯曼在《新政治家与民族》上的文章，1951 年 2 月 10 日，第 149 页。以色列政府在安全理事会对英国政府的“气势汹汹的态度”提出抗议，并否认它自己威胁了外约旦的领土完整（联合国文件 S/1201，1949 年 1 月 11 日），以色列方面有人声称，1 月 31 日在安曼与以色列的一个代表进行秘密会谈时，阿卜杜拉断然否“他事先知道将派英国兵去‘亚喀巴’，或有人事先就此事征求过他的意见”（麦克唐纳，前引书，第 124 页）。

根据未曾公布的材料，“既成事实”这几个字好象实际上也是以色列军队进行这次战役所用的代号。

六个月以后，这地区的以色列军队司令员告诉肯尼思·比尔拜说：“毫无疑问……我们违反了停火协议。……这是许多次精心策划的违反协议的行动之一，而在这样做时我们都谨慎地权衡了政治上的风险。”（《近东的新星》，第 103—105 页）又见《泰晤士报》驻安曼的记者与格拉布帕夏会见后，1949 年 3 月 15 日的报道；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文件 S/1295，1949 年 3 月 23 日；皮尔曼：《以色列的军队》，第 245 页，第 247 页。

见《曼彻斯特卫报》，1949 年 3 月 24 日，但参阅本奇 8 月 23 日那篇性质上带有解嘲味道的报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文件 S/1295）。扎赫尔嘲笑英国在亚喀巴的增兵是“贝文先生无效而又荒唐的好战表现的最后一次吵吵闹闹”（《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 145 页）。

1949 年 3 月 28 日，下院辩论，第 5 辑，第 463 卷，第 846 栏：参阅邓纳：《以色列共和国》，第 183—184 页；《泰晤士报》外交记者报道，1949 年 3 月 22 日。

麦吉多峡谷是公路沿卡尔迈勒山脉而通至埃斯德拉埃隆的要隘。早在公元前十五世纪，埃及吐特摩斯三世于该地打败了卡什什王和某巴勒斯坦盟军；在公元前 608 年，埃及第二十六王朝的法老又在该处打败并杀死犹太国王约书亚；而在公元 1918 年 9 月，艾伦比在该处击败了第七、第八土耳其军。

这时，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调解委员会的三个成员国（美国、法国和土耳其）于4月27日在洛桑同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开始举行一系列会议。5月12日，调解委员会要求双方以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所建议的巴勒斯坦分治计划为基础，对阿拉伯难民问题和领土调整事宜加以考虑。阿拉伯各国继续争辩说，恢复难民正常生活的第一步应由以色列按照1948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决议的规定，收容那些愿意回到自己家园的人们。

阿拉伯人还进一步建议，应立即遣返下述地区的阿拉伯难民，即其家园所在之地根据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的建议，原已划归阿拉伯国家，而在以后的战争中又为以色列所占领的。但以色列则声称：如允许它占有加沙地带，以色列准备把该地带现有阿拉伯人口，包括原有居民和难民一并作为以色列的公民来加以接受，但在以色列领土上安顿难民一事，则必须以有国际援助为条件。如加沙地带不能割给以色列，则其代表团对政府所能收容难民的数目就无从提出建议。在美国施加一些不太大的压力之后，以色列代表团于7月28日在表面上作了让步，表示可以在联合讨论总的和平解决方案的议程中，把难民问题放在首位，8月3日，以色列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它准备让十万名难民重返家园，但条件是它有权把难民的定居问题重新加以安排，使其得以在以色列经济发展总计划中有其应有的地位，而不致被利用为反对以色列的第五纵队。调解委员会认为该建议不能令人满意，阿拉伯各国也反对把重新安排难民定居问题屈从于以色列经济上和战略上的便利。阿拉伯各国继续要求以1947年11月的分治计划为基础来讨论边界问题，虽然该分治计划最初通过时却曾遭到它们那么强烈的反对；这种情况

象1939年5月英国白皮书公布时遭到它们那么强烈的谴责的情形一样，而自1945年以来、当该白皮书随着时间的推移已被束之高阁并积满灰尘时，阿拉伯人却又把它捧了出来当作其政治权利的守护神而乞求它的保佑了。8月23日，调解委员会决定设立一个经济代表团作为其附属机构，由美国（戈登·R·克拉普）任主席，英、法和土耳其为成员。它的任务是考察受巴勒斯坦战争影响的那些国家的经济情况，提供有关难民遣返、重新定居、经济和社会复兴方面的建议，以便于最短期间，在自给的基础上，把各该建议贯彻到各区经济生活里去，并使其得以促进有利于维持和平和安宁的经济条件。经济代表团还提供了许多“试验性的示范”计划，使难民立即有工作可做，并为执行这些计划的人员提供有用的经验。自1950年1月1日开始为期十八个月的这项计划，估计费用是三千五百万美元（其中约有六百万美元由当地政府以实物提供），再加上对符合条件的难民的直接救济费用一千九百万美元—据估计，其合于法律规定的人数为六十五万二千人，虽然民间救济机构（其工作由联合国救济巴勒斯坦难民机构加以协调，拥有基金三千二百万美元，由三十三个国家的政府捐献）目前分配的配给食品已达九十四

---

见上文，原著第295页。

见下文，原著第310页和第315页注（即本书第528页和第537页注——译者）（“经济上的难民”）。1953年仍然在伦敦流行的一种谣传是，交给出席罗德岛停战委员会约旦代表签字的那张1:250,000比例的地图是假造的；但是本作者手中却有一张影印的1:100,000比例的综合地图，上面还有约旦代表的签字。后来罗德岛的会议中有过小的争执，而当分界线在地面上加以测量时又有过小的争持，这也都是真的。

原文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4年，特别增编第1号。

万份。

#### (四) 耶路撒冷的僵局，1949 年

调解委员会成立时，联合国大会指示该委员会根据

上一年的建议，草拟详细提案，以便为耶路撒冷地区订立一项永久性国际管理制度，保证彼此大不相同的每一民族集团都享有与这一特别国际管理制度不相抵触的最大地方自治权。1948 年 12 月此项决议通过时，以色列和约旦两方军队已同意沿一条将那路撒冷城划分为不相等的两部分的停火线停火，以色列占领较大的西部，而较小的东部（包括大部分圣所的整个旧城）则为约旦所占领，<sup>305</sup> 调解委员会于 1949 年 9 月 1 日建议承认犹太区和阿拉伯区（两区间的分界线日后而定），各区“目前人口的均衡”不得因移民迁入各该区而改变；除保留给国际管理机构处理的事项外，各区地方当局对各该区居民有完全管理权。国际管理机构包括：（1）中立的专员一名，由联合国委派，保证圣所的防护及自由出入，监督耶路撒冷地区的永久复员和中立状态，保障居民个人及集体的应有权利；（2）一个十四人组成的委员会，由两区负责当局各派五名，再由专员从每区不同的少数民族集团中各指派二名。委员会调整及处理有关两区利益的主要公共事业，并向各区地方负责当局提出有关促进耶路撒冷地区经济发展及其与世界各地贸易的一般措施的建议；（3）一个混合法庭，审理当事人不是同住一区居民的案件；还有一个国际法庭，审理专员职权以内或牵涉到两个区的负责当局与专员之间的案件，并复审混合法庭的判决。一个颇有地位的权威人士说：有些似色列的重要领袖认为：耶路撒冷在战略上的脆弱性及其国际化的经济利益，较之其在历史上及宗教上的吸引力更为重要。这些“现实主义者”，如果有胆量的话，就会赞成一个折衷方案，或者无论如何总比本一古里安及其内阁的态度较为缓和些。可是他们并没有人敢站出来讲话，因为当时以色列的舆论干脆坚决反对这个新城的任何形式的国际化。调解委员会的建议公布不到一星期，以色列外交部长（摩西·沙雷特，原名为谢尔托克）就抨击他们的建议“不合时宜和不妥当”，他拒绝在委员会内犹太人与阿拉伯人有相等代表权的计划，并且批评了禁止移民进入耶路撒冷是行不通的，只可能对该城的经济前途产生威胁。他说，完全解除武装是无视这样的事实：犹太区被阿拉伯领土三面包围，这种形势使解除武装的形式上的平等成为表面文章；犹太耶路撒冷的将来，是成为以色列国的一部分；国际责任除非只限于绝大部分圣所所在的旧城，也就<sup>306</sup> 无需超出对圣所的监督。阿拉伯国家（包括约旦在内）的总政策是：依照联合国大会 1947 年 11 月所提出的分治建议的原来条文，承认

---

见《概览，1939—1946 年：战时中东》，第 272—306 页和上文，原著第 106—113 页。

这些传说中最引人注意的一则是，总理的侄子福阿德·马丹上尉被派到意大利去购买一批武器，挪用公款，而且让该批武器被以色列搞去了（《现代东方季刊》，1949 年，第 1 季度，第 17 期，第 50 页；1949 年第 2、第 3 季度，第 18—19 期，第 157 页）。

由于美国政府支持了以色列，前政府也不曾批准这项协定。

国防部长艾哈迈德·沙拉巴提的辞职消息是在 1948 年 5 月 24 日宣布的。

阿勒颇大学校长奥尔福德·卡尔顿博士：“1949 年叙利亚政变”，《中东杂志》，1950 年 1 月，第 4 卷，第 3—4 页。

耶路撒冷国际化的原则；但，特别是埃及政府，仍然反对把任何领土划给亲英的阿卜杜拉国王，因而打定主意要迫使依据实际情况将耶路撒冷国际化。阿卜杜拉则坚持只要以色列人撤退至 1947 年 11 月分配给他们的地区，他就可以放弃阿拉伯人的那半个城市——在战略上，那可是“约旦的要冲之地”。

他准备根据这样的条件，通过调解委员会的协助，或直接与以色列人谈判，以求得和平解决。

当调解委员会的建议于 11 月 24 日提交联大特别委员会时，美国代表认为这些建议是一种“适当的、可行的、合乎常识的途径”，实行这些建议，联合国每年所费不到一百万美元，比 1947 年建议的每年化三千万美元将耶路撒冷建成为一个单独实体的办法要好得多；而且，现在的建议还把自 1947 年以来的政治发展也考虑到了。他的政府确信那路撒冷地区应在国际监督之下非军事化，但是。他们不能附和关于联合国委员会（除了紧急时期外）应该有权限制或禁止犹太人（或阿拉伯人）定居在耶路撒冷的建议。法国代表认为这些建议作为讨论基础是有价值的，并在以后得以修改的条件下予以支持。澳大利亚政府代表两年前曾支持建立以色列国，而现在则建议应将调解委员会扩大，并给予一年时间制订一项把耶路撒冷地区作为单独实体的计划，以完全实现其国际化。在卡多根 307 宣布英国政府全面支持调解委员会的草案后。摩西·沙雷特代表以色列对此加以强烈攻击。他说，这是把“宗教象征主义的迫切要求”，“毫无理由地”置于自有其工商业、教育和文化的那路撒冷新城的“生活需要之上”。他建议联合国应只保留监督圣所的职能：旧城只占那路撒冷市土地的百分之六点五，只占计划中的城区的百分之二，城内有三种信仰的主要圣所，全部基督教管区、若干修道院、穆斯林教坛和一个包括所有古代：的犹太教会堂在内的犹太人区；这里大部分是狭窄、弯曲、有拱形圆顶的僻街小巷，两旁都是些破旧肮脏的阿拉伯人……的房屋。城内的犹太教会堂……自从战争结束后，实际上已经夷为平地。阿拉伯当局已拒绝犹太人接近哭墙。……

如果能提供较好的居住条件，劝诱围墙内旧城的阿拉伯居民自愿迁出这片拥挤不堪的居住区，定居安顿在旧城围墙以外的空地上，就可将有围墙的旧城改变为只包含圣所和教坛的场所，在联合国的保护下，专供各种宗教信徒的礼拜及朝圣之用。

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许多投票人可能被这样的想法所动摇：耶路撒冷不是一个只从政治及实用主义的考虑来决定其将来的普通城市，而是这样一个城市：与它有关的各种各样的宗教联想，对许多人来说，仍然是至高无上的。支持完全国际化的是罗马天主教、希腊教会、阿拉伯和穆斯林集团（约

---

《泰晤士报》驻大马士革特派记者报道，1949 年 8 月 15 日。

《泰晤士报》驻贝鲁特派记者报道，1949 年 4 月 4 日。

英国外交部：《1920 年 12 月 23 日关于……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委任统治的协定》（Franco-British Convention of December 23, 1920 on... the mandates for Syria and the Lebanon, Palestine and Mesopotamia），敕令第 1195 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21 年版）。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 4 年，特别增编第 2 号，附有地图。

见雅各布·C·赫尔维茨：“从阿拉伯—以色列停战体系看以色列—叙利亚的危局”，《国际组织》（The Israeli-Syrian Crisis in the Light of the Arab-Israeli Armistice Syste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51 年 8 月，第 5 卷，第 459—479 页。



旦除外），以及苏联集团。苏联集团把美国和英国政府赞成一个迁就现实情况的方案，归之于帝国主义的动机。但正是这两个政府和法国，更为关心不使联合国（可能又一次象前两年一样）作出无权或无力实行的建议。当 11 月末，特别委员会指派一个十七人小组委员会研究各项建议，搞出一个决议草案时，在以 308 票，有人希望完全国际化或调解委员会的折衷方案 都得不到必要的三分之二多数。但小组委员会于 12 月 2 日汇报，提出一个将由托管理事会制订法规的完全国际化建议草案。美国代表袭用英国政府两年前对于巴勒斯坦分治建议所用过的几乎是同一种说法，批评了这个建议，他说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可能会引起使用联合国所不准备使用的武力。美国代表支持荷兰和瑞典代表提议的折衷方案，依照这个方案，联合国专员的权力将限于保护圣所；但是美国政府这种为时已晚的行动，不能使它免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责备，他们认为美国没有对犹豫不决的代表们施加其有力的影响，以对抗“梵蒂冈的直接干涉”。在 12 月 7 日的特别委员会上，完全国际化的决议案，以超过必要的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投票赞成的国家是各式各样的；9 日在联合国大会的全体会议上也以多数通过，票数又有增加。

托管理事会于 12 月 19 日指示其法国主席罗歇·加罗去准备工作文件，作为耶路撒冷国际化法规草案的基础，这时，联合国和美国都警告以色列和约旦双方不要作出任何行动以损害有利于国际化的决议案。但是，12 月 26 日，以色列议会在耶路撒冷而不在特拉维夫开会；除

外交部仍留在特拉维夫与各国外交使节保持接触外，其余大多数还未迁至耶路撒冷的各部现在都一起迁去；

1950 年 1 月 23 日议会批准一个声明说，自从将近两年前宣布独立以来，耶路撒冷就已经是以色列的首都了。据报 309 道，以色列与约旦政府正在讨论一个协定，其中有一项就是要解决它们在耶路撒冷的各自的管辖区问题；而罗歇·加罗则于 1 月 30 日向托管理事会提出一个介于联合国大会的完全国际化决议案与调解委员会建议案之间的折衷方案。他的提议是：既然整个耶路撒冷地区应该是一个非武装的单独实体，犹太人区和穆斯林区仍应分别隶属于以色列和约旦的主权之下；旧城的基督教徒和犹太人居住区以及在旧城墙外的数处圣所，应置于联合国集体主权之下，作为一个“国际城”，其居民得自由选择作为该城的公民，或保留其现有的国籍。但这个提议遭到有关各方面的拒绝，认为这是个不能接受的折衷方案；以色列不愿改变它合并犹太新城的意图，约旦甚至不愿讨论国际化问题；托管理事会只得转向于修改它那个已于 1948 年拟就的法规草案，这是一种学究式的任务，也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工作，直至 4 月 4 日才告完成。——

#### （五）介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联盟之间的阿卜杜拉国王，1950 年

---

见上文，原著第 290—291 页。

见联合国：《大会第三届会议正式记录》，决议第 194 号（ ），第 8 段，第 23 页。

见联合国：《大会第三届会议正式记录》，决议第 194 号（ ），第 11 段，第 24 页。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 4 年，第 16—17 号，1949 年 3 月 3 日和 4 日。

原文载《罗马观察家报》（Osservatore Romano），1949 年 4 月 15 日；《现代东方》，1949 年 4—6 月，第 52—53 页。

关于瑞典政府的不断抱怨，见上文，原著第 286 页。

同时，对于国际化建议以及阿拉伯国家联盟之支持这些建议，以色列与约旦都是一致反对的，它们彼此之间一直在谈判一个解决方案。据美国驻以色列大使了解，在联合国大会讨论耶路撒冷问题之前，阿卜杜拉国王已重新要求通过比尔谢巴和加沙至地中海的出口，要求归还失去的耶路撒冷阿拉伯郊区，并寻求在海法能有一个自由港的便利，而作为交换条件，却只给以色列一些有限的好处，让它在亚喀巴湾能有一个自由港，能有一条通路到达死海北端钾碱厂的遗址（那个工厂，犹太人早就放弃并且放火焚烧过，1948年5月又被阿拉伯人掠夺过）。这些条件当然非以色列所能接受。但在1950年初，由于联合国大会已通过决议，要对耶路撒冷实行国际化，据了解”，以色列政府便接受阿卜杜拉的五年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作为谈判基础；根据这个条约，将准许自由越过现存的停战线进行贸易和旅行，并在海法开辟自由港区使约310且得到它所亟需的地中海出口。但又据说，本一古里安和以色列军事当局，在稍示慷慨是否可取的问题上，与其

外交部长意见不同。关于可望达成一项协议的事，从以色列传出一些互相矛盾的报道，结果使得阿卜杜拉国王在埃及和叙利亚以及在约旦国内的敌人一下子都起来反对他。1950年3月初，反对与以色列和解的约旦陶菲克·阿德勒了胡达政府辞职，但是在萨米尔·里法伊组织一个比较依从阿卜杜拉愿望的政府遭到失败后，陶菲克·阿德勒一胡达政府又改组留任。在埃及，华夫脱党政府由于1950年1月的大选而重握政权后，展开了一次猛烈的宣传运动，来反对阿卜杜拉，作为其反英总政策的一部分，并毫不踌躇地捏造了一个故事说：阿卜杜拉与本一古里安，在亚喀巴湾的一艘英舰上，当着英美两国公使的面，秘密签署了一个协定。阿卜杜拉·塔尔，一位年轻的阿拉伯军团退役军官，于1948年防卫耶路撒冷时曾得到阿卜杜拉国王的宠爱。但后来

---

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调解委员会：《第三次进度报告》（3rdProgressReport），文件A/927，1949年6月21日，第4页。前一个时候，洛桑方面报道过两条消息。其一，埃及代表团有过暗示，说埃及政府准备放弃加沙地带及该地地上的难民。其二，约旦与西方的交通运输，过去仅仅依靠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好意，这不但靠不住，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也是不方便和费用浩大的，所以约旦想借助于一个从希布伦到加沙的“走廊”，来谋求一个可以直接通向地中海的出口，（见1949年5月1日《观察家报》；G·L·苏兹贝格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1949年5月7日，又见下文，原著第309页）。

见麦克唐纳：《我在以色列的使命》，第165—168页；扎赫尔：《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147—148页。

该主席的姓引起了这样一种麻烦：阿拉伯语克拉普委员会一词立即被人读成了Lajrtatul-Kilab（“群狗委员会”）。

见《联合国中东经济考察代表团的总结报告，1949年13月28日》

（FinalReportoftheUnitedNationsEconomicSurveyMissionfortheMiddleEast，28December1949），第1部分，第18--19页，第22--23页。以难民的估计人数和过去的人口相比较，每个国家和行政区所接纳的难民人数的百分比大体如下：加沙地带.....280%阿拉伯的巴勒斯坦.....60%外约旦.....15%黎巴嫩.....9%以色列.....4%叙利亚.....2%伊拉克.....极微

由于他自命不凡的野心得不到满足，辞职退居开罗，现在正好抓住机会将数份以色列人于 1949 年 3 月强逼阿卜杜拉国王签订的舒奈协定供给《今日消息》周刊，并提议阿拉伯国家联盟应要求阿卜杜拉国王退位。驻沙特阿拉伯的约旦公使，也辞职迁居开罗，当阿拉伯联盟于 3 月 25 日召开春季会议的时候，由埃及带头的一项动议，以阿卜杜拉与以色列谈判为理由，要求开除约旦的盟员资格。但是这些谈判已突然停顿，4 月 1 日（据说，经英国在埃及和约旦之间调停以后）约旦驻开罗公使代表他的政府签署了这样一个 311 阿拉伯国家联盟决议案：单独与以色列订立条约或协定，应受剥夺盟员资格的处罚。

在外约旦和阿拉伯巴勒斯坦的残余部分举行大选，这已在 1949 年 12 月宣布，并于 1950 年 4 月 11 日付诸实施，阿卜杜拉声言，“约旦政府今后将对选出的议会负责，而不再象以前那样向英王负责。前任穆夫提则发出抵制的号召。“在希布伦、纳布卢斯以及[那路撒冷的]旧城发生一些骚动，有人出来告发伪造选票：据说有一个地区的投票数远远超过百分之一百。”儿位知名的“批评阿卜杜拉政策的人物当选，新内阁的十一个阁员中有五个是巴勒斯坦人。新内阁首相赛义德·穆夫提于 4 月 24 日宣布阿拉伯巴勒斯坦（除加沙地带由埃及占领外）正式合并于约旦，而对两日前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提出的警告置之不理；参众两院联席开会给予批准。以色列政府拒绝承认这一“单方面的”合并行动，并宣布他们认为“约旦以西的阿拉伯地区”的地位，依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4 月 27 日，英国国务大臣在一项声明中宣布英国政府对以色列的正式的和法律上的承认。1948 年英国—约旦条

---

见上文，原著第 245—246 页和第 289 页。

见上文，原著第 290 页。1944—1945 年，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对于耶路撒冷市长一职继任人选问题不能达成协议时，有一个委员会曾向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政府建议，应将该城划分为犹太和阿拉伯两区，以便实行地方行政管理（见《概览，1939—1946 年：战时中东》，第 319—320 页注，以及威廉·菲茨杰拉德爵士：《关于耶路撒冷地方行政的报告，1945 年 8 月 28 日》（Sir William Fitzgerald: Report on the Local Administration of Jerusalem, 28 August 1945），耶路撒冷，1946 年版。从那时以后，以色列人蚕食了属于阿拉伯人的西南郊区，但旧城内的少数犹太人在 1948 年 4—5 月战争中已被赶出。

联合国文件 A/973，1949 年 9 月 12 日。

麦克唐纳：《我在以色列的使命》，第 189 页。

《纽约时报》，1949 年 9 月 17 日。在联合国大会上，以色列发言人阿巴·埃文攻击调解委员会的建议（见《大会第四届会议正式记录》（Official）Record of the 4th Ses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全体会议，第 93—94 页）；恐怖主义的伊-兹-卢的政治上的化身—自由党的成员，在耶路撒冷发出威胁说。他们要重新组织人马来于悼任何企图扮演伯纳多特伯爵角色的联合国专员（见《泰晤士报》，1949 年 9 月 22 日；皮埃尔·隆多：“圣地问题”，《亚非季刊》（“Le Problem des Lieux Saints”，IAfrique et l'Asie），1950 年第 1 季度，第 14 页）。

根据《埃及主融市场报》报道，1949 年 10 月 27 日，埃及政府向阿拉伯国家联盟 1949 年秋季会议提出集体安全公约的动机，不仅是为了应付以色列侵略的危险；而且为了防止出现阿拉伯国家的任何“地方性集团”，例如阿拉伯巴勒斯坦与约旦联盟，或者拟利亚与约旦或伊拉克联盟之类。在 1949 年下半年已发生过叙利亚—伊拉克，“亲善”的强大运动，直至 12 月阿鱼卜·希沙克刹上校武装政变后才被制止；见下文，原著第 12 页和注（即本书第 531 页注——译者），原著第 314 页和注（即本书第 535 页注——译者）。

隆多，前引书，第 13 页。

约将可以适用于以色列—约旦停战线以东的整个领土，或者经过双方同意而修改的停战线以东的整个领土，但和平时期英国将不在约旦河以西寻求军事基地；又鉴于去年 12 月联合国大会曾投票赞成国际化，英国对以色列和约旦分治那路撒冷地区只作事实上的承认。这位大臣支持丘吉尔提出的关于使阿卜杜拉国王与韦茨曼总统“实现最密切和谐的接触”的可能性问题；但英约条约扩展到阿拉伯巴勒斯坦，这是以色列政府难以接受的，以色列政府与阿卜杜拉谈判时总是坚持这个条约的适用范围应限于外约旦。埃及这时向阿拉伯国家联盟政治委员 312 会提出：应该将约旦开除出去，因为约旦固执己见，合并阿拉伯巴勒斯坦，但由于伊拉克和也门的弃权，在 5 月 15 日那天没有获得一致通过。6 月间复会，埃及要求开除约旦，只有沙特阿拉伯支持，因而不得不满足于一个保持面子的决议（伊拉克于 5 月间提出这个议案作为一个折衷办法时，曾被阿卜杜拉所拒绝），即：“约旦占据的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部分，作为委托约旦代管，直到巴勒斯坦问题按当地居民利益获得最后解决时为止”。

#### （六）1950 年 5 月西方三强宣言

与此同时，5 月 11 日至 13 日美英法三国外长在伦敦开会，以求协调他们关于中东的政策。争论问题之一是对中东国家的军火供应。1949 年 8 月安全理事会裁定：阿拉伯同以色列缔结的停战条约，取代了暂时休战以及与此有关的军火禁运，这时，联合国对巴勒斯坦战争中的交成国的军火禁运，也已经解除。于是，英国依照它限埃及、伊拉克和约旦的条约义务，恢复对这些国家供应军人；据传说，法国也供应相当数量的军火给它的被保护人叙利亚独裁者胡斯尼·扎伊姆。尽管英国供应的军火，官方说成只是“数量有限”，但据指出，那些军人包括喷气式飞机、坦克和大炮，不仅可能作为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保卫中东之用，还可能更直接地作为阿拉伯反对以色列的“第二个回合”之用；于是，以色列便被逼“以暴涨的高价通过曲折的途径”来购买军火，因为英国和美国对它还是拒绝供应的。据称，英国官方的意见认为：以色列尚拥有优势的军事力量，因而它对于同阿拉伯邻国的任何 313 解决办

---

不《泰晤士报》，1949 年 11 月 21 日，关于该报驻会曼记者访问阿卜杜拉国王的报道。

意味深长的是：澳大利亚大选在即，按照 1947 年的人口调查，百分之二十点七的人口是天主教徒，由于最近的教皇通谕（见上文，原著第 302 页），预料他们可能有意赞成那路撒冷国际化〔参阅《澳大利亚联邦官方年鉴，1946—1947 年》（Official Yearbook of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1946—1947），第 37 卷，第 1286 页和利利·舒尔茨：“耶路撒冷的故事”（Lillie Shultz：“The Jerusalem story”），《民族》周刊（纽约），1949 年 12 月 17 日〕。

联合国：《大会第四届会议正式记录》，特别政治委员会简要记录，第 261—264 页。以色列政府后来非正式提出，如果同约旦媾和的话，以色列可以出钱赔偿在犹太新城被征用的阿拉伯财产，以便将失去财产的阿拉伯人安置在“一个在旧城东面和南面的阿拉伯新城内”（麦克唐纳：《我在以色列的使命》，第 192 页）。

见麦克唐纳：《我在以色列的使命》，第 186—187 页；莱尔曼：《以色列的创始及其明天》，第 239—240 页。

联合国文件 A/AC.31/11，1949 年 12 月 2 日；并参阅莱尔曼，前引书，第 237 页。

法都采取僵硬态度，但有传闻说，美国政府反对英国方面对阿拉伯各国提供军火的那种规模，带头主张在这个问题上举行三国会谈。这些外长所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法国和美国国内的某些方面，明显反对据说是英国的一种作法——鼓励伊拉克和约旦政府把叙利亚共和国拉进某种“肥沃新月统一”的方案之内。因此，美、英、法三周政府于5月25日发出一个联合宣言，证实它们反对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展开的军备竞赛，而且声明：这些国家对军火或作战物资的一切申请，都要从合法自卫的角度以及对保卫整个地区所起的作用方面来加以考虑。三国政府宣称：三国的愿望在于促进建立并维持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定，它们坚定不移地反对在这个地区的任何国与国之间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三国政府如发现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准备侵犯边界或停战线，将一如既往地履行其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义务，立即在联合国内及联合国外采取行动，以防止这种侵犯。

阿拉伯人反对这个宣言，因为他们看到，这个宣言保证三大国支持维持停战线，而这些停战线是由以色列在美国默许下破坏休战才获得的；同时，有鉴于美国的态度，阿拉伯人怀疑：这三个大国是否会在事实上进行有效干涉以防止以色列使用武力作进一步扩张。在一篇很长的回答中，阿拉伯国家联盟政治委员会宣称，尽管它们怀有对和平的真诚愿望，它们却不能准许发生任何蓄意损害它们主权或独立的行动。

## (七) 结论

### (1) 阿拉伯各国的失败和难民

314 阿拉伯国家联盟节节失败，首先是未能网武力阻止以色列国家的诞生，其次是未能把以色列这个国家限制在1949年11月联合国大会所建议的地区之内，以实现一项公平合理的领土交换。联合国和态度更为勉强的英国，终于在1949年和1950年分别承认了上述事实。在埃及的努克拉希帕夏和阿卜杜拉国王被暗杀事件中，以及在叙利亚的一连串军事政变（包括两个陆军上校独裁者被枪杀）中，我们已经看到阿拉伯各国国内那种早已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但是，更加根本的问题却是：阿拉伯人的自尊心和正义感所受到

---

见联合国：《大会第四届会议正式记录》，特别政治委员会简要记录，第344页。

利利·舒尔茨：“耶路撒冷的故事”，《民族》周刊，1949年12月17日，第589—591页。哈尔·莱尔曼（前引书，第238页，第247页）说，梵蒂冈已命令它的外交代表去访问派驻国政府的外交部长，对于联合国大会的投票产生了“立即的和惊人的”影响。他又说，美国政府政策的摇摆不定”的可能解释，系由于“严重地考虑到”美国有二千五百万罗马天主教徒。

在全体会议上最后投票赞成国际化的三十八个多数国家，包括有十七个罗马天主教国家，十二个阿拉伯和亚洲国家，五个苏联集团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埃塞俄比亚、希腊和利比里亚。反对国际化的有以色列、美国、联合王国、加拿大、南非、土耳其、南斯拉夫及斯堪的纳维亚诸国。

联合国托管理事会：《正式记录》，第4年，第六届会议，第49—50页和第52页，第36—37段。

1950年瑞典和比利时在联合国大会提出过关于耶路撒冷的决议案，但都未得到必要的三分之二多数〔见联合国大会，第五届会议：《正式记录》，附件，议程项目第20号，第7—8页（文件A/1724，特别政治委员会报告）和第396次全体会议，1950年12月15日，第684页〕。

犹太复国主义者说，掠夺一事是同拉伯军团干的；而军团已对作者否认了这种说法。

的严重冲击，有力地推动了他们对西方的权威和势力的反抗，这种反抗本来就是他们争取独立的民族运动所固有的东西。正是英国，在贝尔福宣言中首先发起建立巴勒斯坦犹太民族之家，以后又用英国军队对它加以保卫，最后特别是在 1936—1939 年又镇压了巴勒斯坦阿拉伯叛乱——所有这些都难以从阿拉伯人的记忆中消除。纵然英国自 1939 年以来就努力抑制犹太复国主义者想在巴勒斯坦称霸的企图。在阿拉伯人眼里，英国在 1938—1939 年镇压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时采取的措施是多么坚决，而现在对付以色列人却犹豫不决、半心半意；英国于 1947 年在犹太复国主义得寸进尺面前的步步退让，以及在 1948 年的放弃委任统治权，都被认为是比美国对以色列的积极支持还要严重的出卖。虽然，也有两个卓越的阿拉伯思想家敢于坦率地在文章中对失败的种种原因进行分析，但是，大多数阿拉伯人却往往只看见在巴勒斯坦战争的失败中西方应负的那部分责任，而看不见他们自己在政治上团结和军事上紧密配合方面的缺陷。穆萨·阿拉米（前巴勒斯坦政府的一个官员，他在 1937 年巴勒斯坦阿拉伯叛乱时辞职，后来又同穆夫提极端主义割断了联系，在 1944—1945 年的

历次创建阿拉伯国家联盟的会议上，都正式代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并于 1946 年在伊拉克政府的协助下在美国、伦敦和巴黎各地设立阿拉伯办事处，以对抗这些地方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就承认：首先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其次是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在组织、纪律和万众一心各方面，都完全不能同犹太复国主义者相匹敌：两者都被本身的分裂和松弛懈怠给害了：

在敌人面前，阿拉伯人没有一个国家，只有几个小朝廷；是几个集团，而不是一个民族；他们彼此心怀恐惧，互相监视，尔虞我诈。他们所最关心的事和指导他们的政策的東西，不是打胜仗和从敌人手中把巴勒斯坦拯救出来，而是在这场斗争结束后会出现什么局面，谁将会在巴勒斯坦占据统治地位或谁将会把巴勒斯坦据为己有。以及他们如何才能实现自己的野心。他们所宣布的目标是拯救巴勒斯坦，而且还说，以后巴勒斯坦的命运应该交给它的人民。这种话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而已。在内心深处，他们都希望一切金是自己的；哪怕只剩下了残羹渣滓，他们中的大多数也要急于防止他们的邻人优先占去。另一方面，大多数有政治头脑的阿拉伯人，都倾向于把他们失败的大部分责任推到以色列、西方国家和联合国身上去；他们这种拒不对事实的态度，最有害的是表现在：对于处理阿拉伯难民问题的所建议的各项实际措施上。联合国的一个经济调查团于 1950 年 11 月估计，难民的数目为七十五万七千人，另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仍然留在他们的村庄里，但是从前维持他们生活的土地，却由于与以色列划定的停战界线而同他们隔绝了。

---

见麦克唐纳：《我在以色列的使命》，第 193—194 页。

见《纽约时报》，1950 年 3 月 1 日（驻耶路撒冷记者报道一个“以龟列上层人士所透露的消息”）；《泰晤士报》驻特拉维夫记者报道，1950 年 3 月 2 日；乔恩·盒奇在《犹太观察家和中东评论》（JewishObserverandMiddleEastReview）上的文章，1952 年 2 月 29 日，第 10—11 页。

见上文，原著第 297—298 页；1950 年 3 月 27 日《埃及进步报》（ProgressEgyptien）有目的地选刊了其中一部分。阿卜杜拉国王于 1951 年 7 月 20 日在那路撒冷被杀害，据信这一暗杀案系由阿卜杜拉·塔尔扣前任穆夫提合谋组织的；见 S.G.T.：“阿卜杜拉国王的暗杀者”（S.G.T.，：“KingAbdullah'sAssassins”），《今日世界》，1951 年 10 月，第 7 卷，第 416—417 页。

据估计，在这个总数中，不到五分之一暂能自给或另有生活着落，而其余则全然无依无靠。难民当然要求重返家园和收回田产，而阿拉伯世界的政治领导人却不敢告诉他们这只是痴心妄想。以色列必须对这批遭劫的人们归还其全部的家园和土地——这已经成了一项必须要顽固坚持的阿拉伯政治原则了（在这个问题上表示公开异议，对一个阿拉伯政治人物来说是会发生人身危险的，不管他私下会怎么说）；一些政治上不负责任的出谋划策者则鼓励难民坚持要求，寸步不让，并拒绝联合国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于1950年3月16年初成立，代替了单纯的救济组织）让他们在适宜的阿拉伯国家土地上重新定居和再建家园的建议。阿拉伯各国政府本身（阿卜杜拉国王的政府除外，由于他希冀巩固其已经扩大的约旦王国）却都不大赞助这种重新定居的建议。1949年联合国经济调查团所建议的重新定居计划的费用，由于世界物价的上涨而增大，远远超过了联合国会员国自动捐款的总数。朝鲜战争产生了一个新的难民问题，在大多数国家的眼里较之现在的阿拉伯难民问题更为迫切。1952年中，一个旅行者发现大多数的阿拉伯难民都处在极为悲惨、无人过问的环境中，靠着仅有的一点救济苟延残喘。

## （2）以色列的经济问题

阿拉伯人特别抱怨的有一件事：阿拉伯人原有四百万到五百万英镑的款子存放在银行里，由于这些银行在巴勒斯坦分治时划归以色列控制，结果作为敌产被没收了。以色列政府一贯宣称，它将考虑发还这笔款子，并按照规定数目接纳一部分回乡的阿拉伯难民，或用其他方式作出贡献以改善这批难民的处境。但这必须成为与阿拉伯各国谈判总的和平解决方案——包括阿拉伯各国停止对以色列的经济抵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诚然，以色列在物质上所能提供的东西是极为有限的，因为以色列取得独立和打败阿拉伯人所付的代价也并不小。除了以色列最强壮的男人的伤亡外，所耗费的金钱就达一亿英镑，平民财产的损失在一千万英镑以上。在阿拉伯各国方面，战争所造成的当前的物质损失比较起来还不象今后在民族心理方面所产生的影响那么重大。犹太复国主义者搞垮英国委任统治的权力以及同阿拉伯人打仗，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移民自由。一旦以色列宣告了独立，以色列的大门就必须对移民敞开，让其无限制地流入，这在政治上是不可避免的，而在军事上无疑也是有利的。到1950年底，流入的人数已达五十万人，大约比在委任统治结束时巴勒斯坦犹太人的人口又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在本—古里安的领导

---

见《埃及金融市场报》，1950年3月28日，“把约旦开除出去”（“Versl'ex0InsiondetaJordanie”）。采用的手法是出自埃及的建议，即邀请前往穆夫提的有名无实的“全巴勒斯坦政府”派一个代表参加联盟会议，这就成了对阿卜杜拉要求占有阿拉伯巴勒斯坦残余部分的直接挑战。

《纽约时报》驻特拉维夫记者报道，1950年3月25日。

埃斯蒙德·赖特，“阿卜杜拉的约旦”，《中东杂志》，1951年秋季，第5卷，第457页；又见《费加罗报》，1950年4月13日，法新社驻安曼记者报道。

与埃及，叙利亚当时的宣传相反，依照有确实根据的报道，绝大多数的前巴勒斯坦人是赞成合并的，因为这样会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和军队来支持他们，而有些外约旦人则有更多疑虑，恐怕教育水平比他们高些的巴勒斯坦人会侵犯他们的利益。

《纽约时报》，1950年4月25日，发自该报驻特拉维夫记者的报道。

下，以色列进入了和平时期的生活；他不断表现出令人钦佩的精力和才略，并且充满了高度的信心。当时有一种倾向，人们都相信紧接着政治上智胜英国政府和军事上战胜阿拉伯人这两个奇迹之后，这个国家的经济问题也将会同样象奇迹般地得到解决。以色列的主要出口物是柑橘和钾碱，但缺乏足够的能源（特别是从伊拉克把从基尔库克油田通至海法炼油厂的输油管失掉后），也缺乏大多数重、轻工业部门所需要的主要原料以及人与牲畜所需要的基本粮食和饲料。所有这一切，都必须依靠犹太复国主义者运动的超人的智慧和计谋，并得到世界犹太人在财政上的不断支援，才能从无到有搞起来。1948年，即巴勒斯坦战争的那一年，通过犹太人联合会的呼吁，美国方面的私人捐献就有一亿五千万美元（1950年降至八千六百万美元）；1949年初，进出口银行给予以色列一亿美元的贷款，后来又增加了三千五百万美元。估计头三年中，作为赠予、贷款或投资，在美国为以色列募集的款就超过了四亿美元。在1939年前，移民“先驱者”（哈卢齐姆）都要经过仔细的选择和训练，以便一到巴勒斯坦就能在经济上发生作用，但是这种办法对独立后的年代里大量流入的移民就不能适用了。移民的数目激增，住房供应跟不上，即使是利用原来阿拉伯难民丢下的村舍也无法满足需要，而可以利用上的资源也不足以给移民安置就业，从事生产。此外，新的移民成分上也参差不齐，因为大多数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创造性热情所感召的人们，过去移民时早就被接纳到以色列来了。那些被准许离开东欧国家的犹太人，大部分只是些从铁幕后面共产党统治下逃出来的小资产阶级；他们中间有相当数目的一部分还打算干他们那小本经营：的老行当，都跑到特拉维夫、海法和耶路撒冷等城市去，使那儿已经拥挤不堪的人口更加拥挤。从也门、伊拉克和利比亚来的东方犹太人，带来了社会和经济同化这样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为了拯救他们。使他们摆脱阿拉伯人报复的危险和离开还是中世纪犹太区的那种生活环境，曾组织了不断的空运，从美国和其他地方流入的资金，原来是打算投向那些增加出口、代替进口或满足基本需要的各项计划中去的；但这些目标是否正在达到，有人表示非常怀疑。根本的问题是：这个国家1950年的出口（由于缺乏原料，商品范围非常有限），仅仅相当于其进口的八分之一，它将怎样来承受每年超过现有百分。之二十的移民所同时造成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它将怎样维持一支按比例看来数目很大而又装备精良的军队，以阻止阿拉伯各国发动“第二个回合”的冒险行动；以及它又雄心勃勃地要为组织起来的工人谋求中欧的生活水平。而在执政的以色列工党（在本-

---

下院辩论，第5辑，第474卷，第1137—1139栏。关于1950年3月30日英—以财政协定，见英国外交部：《关于清理结束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未了财政事项的协定，伦敦，1950年3月30日》

(Agreement...forthesettlementoffinancialinattersoutstandingasaresultoftheterminationoftheMandateforPalestine,London,30thMarch1950,)，敕令第7941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50年版）。

《泰晤士报》驻特拉维夫记者报道，1950年4月29日。

《埃及新闻报》，1950年6月22日，引自《金字塔报》。

至于以色列、英国、代理调解人、美国和法国的观点，各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4年，集36号（1949年8月4日），第15页，第21页，第22页第27页；和第38号（1949年8月11日），第2页。

见《观察家报》，1949年6月18日；《苏格兰人报》，1949年12月2日。



古里安领导下)和遍布各地的犹太工人总工会联盟中,这些工人的政治影响虽然高于一切,但其实际生产效率却难以维持这样的生活水平。1950年,以色列政府采用了一种政策,把新来的移民都直接迁到工作营(“马阿巴罗思”)——特别是那些人口比较稀疏的边疆地区的工作营。在这些地方,他们可以被安置到农耕、公路建筑或植树等工作方面,或者他们可以在工业中找到固定或临时的就业机会。可是,这仅仅是治标的办法,因为世界物价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而上涨,使财政部长的困难与日俱增。政府企图在最基本的食品<sup>319</sup>和衣着方面强使消费者接受一种节约的制度,但是由于商品和外汇的黑市猖獗,使这种企图大部分归于失败。这种黑市使以色列镑的自由兑换价格大为降低,牌价从二点八美元兑换一以镑跌到非正式的喊价仅有六角美

金。为了努力在“经济生存的艰巨复杂的斗争”中制造一个转折点,以色列政府于1952年2月13日开始推行其所谓的新经济政策,把以色列镑的汇率从二点八美元逐渐压低到仍然不现实的一美元这个数目:移民入境在1952年也削减到只有1951年数字的百分之十三点五。

1951年6月的管制外汇和发行强制性公债,使货币流通量暂时减少了百分之十五;可是到12月份,数字又超过以前5月1日的最高额,而至1953年2月还在上升。出口在进口中所占的比重从1951年头七个月的百分之十六点七跌到只有1952年同期的百分之十三。前几年富有魅力的种种预测如今都被抛弃了。举个例子说,本-古里安所宣布的雄心勃勃的造林计划已经公认是“投资年限长,对生产远水救不得近火,结果是弄得财力大为枯竭”。

前财政部新经济政策的总管在回顾一年来的实施情况时,不得不把以色列描绘成“一个贫穷和不发达的国家”,又“缺少保证购买力扩大的潜力和资产”,新经济政策不是“而且也并不打算作为一帖可以治好我们经济生活中种种毛病的万应灵药,而这种种毛病则是需要和可能、目的和手段之间相差悬殊所造成的结果”。——

---

英国外交部次官的发言,1950年4月19日,下院辩论,集5辑,第474卷,第114栏。

见威廉·克拉克:“中东的军火紧张”(William Clark:“Arms in the Middle East”),《观察家报》,1950年3月5日,从以色列方面的迹象看来,英美的禁运可能又一次迫使以色列从铁幕后购买军火。根据英国外交部次官说(见前引文),以色列拥有“足够的作战物资可供国内安全和国防之用”;可靠的估计是,它的军事力量同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合在一起相等,而它的飞机则多一倍。

